

傅斯年 韓德培 郭有平 雷雨 傅克實 傅希孟

柏家壁 錢福升 李洪培 王雲生 李新以 張東蓀 錢歌川 傅斯年

陳衡哲 戴世光 楊西孟 雷雨 錢歌川 傅斯年

胡適 周子亞 吳澤霖 傅斯年

錢鍾書 吳世昌 蕭乾 沙中 曹風 曹明

李廣山 徐盈 高覺敷 陳瘦竹 趙超構 潘德瑋

魏瀾齡 馮真 蔡維藩 費孝通 梁實秋 陸之愚 李淑林

馮友蘭 張忠絳 曹曉庵 顧翊羣 潘光旦 王惠中

顧翊羣 潘光旦 王惠中 顧翊羣 潘光旦 王惠中

顧翊羣 潘光旦 王惠中 顧翊羣 潘光旦 王惠中

顧翊羣 潘光旦 王惠中 顧翊羣 潘光旦 王惠中

觀察

文選

唐聘華 選編

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观察》发刊词



闾教出版



--关注有惊喜--



--欢迎选购--

上架建议：人文·思想

ISBN 978-7-5334-6794-4



9 787533 467944 >

定价：98.00元

觀察

文

選

唐聘华
选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察》文选/唐骋华选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334-6794-4

I. ①观… II. ①唐…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8656 号

Guancha Wenxuan

《观察》文选

唐骋华 选编

-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 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 出版人 黄旭
-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 开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 印张 33.5
- 字数 531 千
-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7-5334-6794-4
- 定价 98.00 元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导言

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市场上，《观察》曾经是一块响亮的招牌。这份创刊于1946年9月、彻底终结于1950年5月的杂志，发行量最高时超过十万份，对大众特别是以公教人员、政府官员、媒体人、工商界人士、自由职业者等为主体的城市知识阶层、中产阶层，拥有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如果进一步把《观察》放置到长时段历史中，就更能辨别出其独特地位。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意味着中国开始“被现代化”。英吉利这个闻所未闻的偏远小国首度打破了东方的朝贡体系，以通商口岸、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租界等形式给老大帝国植入了现代因子。但是，旧秩序真正走向瓦解则要到十九世纪末，并由天朝所鄙视的“蕞尔小邦”日本扮演终结者——甲午战争表明，从政治体制、国际关系、大众动员直到军事能力，倾力“脱亚入欧”的日本均完胜清廷，“同光中兴”被无情地击败。

新兴异质文明的冲击使儒家文明因无力应对而崩塌，这引发了连锁反应。儒家依靠政治权力垄断思想市场近两千年，它的猛然崩塌，给各种思潮以生长空间。其中，既有士人对经世致用、佛学等传统思想资源的“再开发”，也有对西方学说的汲取和引介，而后者逐渐突破窠臼，呈“冲决罗网”之势。于是晚清的思想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杂景象，物竞天择、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变法维新等新词汇迅速紧俏，在士大夫的笔尖和唇齿间翻滚。及至五四运动前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你未唱罢我登场，似过江之鲫，看得人眼花缭乱。

思想市场上的“乱象”，并非如轻佻之辈所言是无关痛痒的口水仗。它

实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人们迫切地想知道该怎样解释及其应对之道。这种渴求又激发了对新讯息、新学说的强烈好奇心，它是如此强劲，并且借助外来资源、大众媒介，其声势、规模和深度均超过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试图满足这种需求的“思想供应商”多种多样，除了在启蒙与救亡的大方向上勉强能保持共识，在以何启蒙、何以救亡等问题上则分歧迭出、针锋相对，以至于所谓“共识”只具有修辞意义。

《观察》是众多思想供应商里的一家。那么，在天折六十余载、同时代刊物多被遗忘的今天，为何人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提起这本老杂志呢？

从思想传承看，《观察》和《现代评论》（1924—1928）、《新月》（1928—1933）、《独立评论》（1932—1937）等杂志属同一条脉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这些刊物的共同特点是，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中国的转型目标，为达此目标则应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分析时局、引介外来文明，从而既避免激进手段对社会造成的大破坏，又要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端，收循序改良之效。到《观察》时期，此种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调适的倾向更为明显，且代表了知识阶层的主流理念。这就不能不提及《观察》的创办者储安平。

储安平，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早年毕业于光华大学英文系（一说政治系），起初热衷文学创作，受《新月》主编徐志摩赏识，曾出版过小说集《说谎者》。不过储安平的最大理想是出洋求学，为困境中的祖国找寻一条通往民主自由之路。辛苦筹措到学费后，他于1935年奔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政治学家、工党领袖哈罗德·拉斯基，潜心研究英国历史和政治制度^①。

拉斯基是费边社核心人物。费边社由韦伯夫妇、萧伯纳等创建于十九世

^① 此为通行的说法。不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储安平研究者韩成在详细梳理了相关史料后认为，储安平最先进入的应为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时为1936年夏。因不满于该校的教学，遂于次年转赴伦敦自学。但是，储安平并未正式就学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更不曾受拉斯基亲炙，可能只是属于“游学”性质。详见韩成：《储安平并未师从拉斯基》，刊载于南都网：<http://news.nandun.com/html/201402/12/772671.html>。

纪末，采古罗马将领费边缓进待机的办法，主张调和社会矛盾与各阶级利益，通过非暴力的、一点一滴的改良，推进社会变革，实现社会正义。此即“费边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拉斯基成为费边主义的领军人物。他长期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罗隆基、张君勱、王造时、吴恩裕、金岳霖、费孝通、张奚若、萧乾等中国学者皆曾慕名而来，由此，拉斯基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理念风靡中国知识界，并在思想市场上形成了一个理念契合而形式松散的同人群体。

抗战爆发后储安平回国，著有《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等。1945年他在重庆与张稚琴合办《客观》周刊，并任主编。十二期后他离开重庆，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另起炉灶，缔造《观察》。而前述诸人中的吴恩裕、费孝通、张奚若，都一直作为特约撰稿人名列杂志封面。这就难怪储安平被目为“拉斯基传人”了。

关于《观察》的缘起和宗旨，本书选录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阐述得非常清楚，它也是《观察》的发刊词，此处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致胡适信里，储安平如此剖白心迹：“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79，第166页）这表明，当“国共对决”之势已成，自由知识分子倍感言论空间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亟需寻找“杨（极端利己主义）墨（集体主义）以外”的第三条道路。

具体而言，《观察》选取的道路是以书生论政为径，又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至少储安平自己从未涉足政治漩涡。这与傅斯年对胡适的忠告相契合：“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据此，储安平为杂志奠定了基调：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谢泳先生曾考证，蒋经国曾透过经济学家竺移今资助过《观察》并成为股东，但这并未影响储安平的立场，因此我们依然可以说，《观察》自始至终靠订户、零售所得来运营，未得官方的直接资助，更没有武力后盾，可将其视作“市场化媒体”。

为经营好杂志，储安平每半年会撰写一篇“报告书”做总结，从中能看到，为扩大销路，他确实想了很多办法——例如今日商家仍惯用的“饥饿营

销”。值得称赞的是，在金融大崩溃的1948年，《观察》的销量不跌反升，遍及沿海和内地的各城市乃至边疆省份，连“没有任何阅读习惯”的广大职业群众也热心阅读。这反过来说明，在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中人民对思想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

但思想市场从来都不是为所欲为的，要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1948年11月6日，第五卷第十一期的《观察》刊登了储安平《一场烂污》。针对破产的金圆券改革，他怒斥国民党政府：“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此文惹恼当局，于是数“罪”并罚，12月25日杂志社被封。

尽管1949年11月《观察》一度复刊，却已今非昔比。而因为储安平以及诸多《观察》撰稿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有关这个人、这个群体、这本杂志的往事长期尘封。不过，随着近些年对民国知识分子、民国思想的关注度提高，《观察》又回到公众视野。张新颖编的两卷本《储安平文集》，谢泳先生编著的《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储安平与〈观察〉》，特别是岳麓书社的《观察》影印本，对发掘和认识这份杂志及其撰稿人有重要贡献。我们编选这本《〈观察〉文选》的目的，也是将那一群人在那个年代的所思所言，将他们的灼见也好谬论也罢，真实地呈现出来。

《文选》以岳麓书社《观察》（全六卷）影印本为底本，选录自1946年9月创刊至1948年12月被查禁期间的77篇文章，分为时局分析、《观察》立场、经济观点、各地通信、理念探讨和领土问题等六个类别。由于《观察》刊载的文章甚多，编选时须有所侧重，为此编者确定了两个原则：

其一，以经济评论类文章和各地通信为选编侧重之点。由于内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最终经济总崩溃，严重侵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权益，因此，财政和经济成为1946—1948年间知识界、军政公教人员及普通市民最为关切的问题。同时，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阐释，学者们也表达了自身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立场。梳理这些文字，有助于后人较完整地把握民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主题的思考和探索，为观测当时的“思想光谱”提供了极佳案例。

“各地通信”为《观察》的特色内容。在当时，《观察通信》栏目因及时、准确、客观而广受好评，是《观察》杂志火爆发行的重要因素之一。鉴

于时过境迁，且关于解放战争的资料和论述已汗牛充栋，编者遂放弃新闻性比较强的“军事通信”，主要选取了以民生、民情为视角的通信。这些通信来自全国各地，有正剧、有悲剧亦有笑剧，堪称记录民国最后几年民生状况、政局风云的第一手材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其二，鉴于储安平、费孝通、潘光旦、张东荪等名家均有文集面世，且他们在《观察》发表的文章已被多种文集收录，故本书只取其最具代表性的几篇文章，而将主要篇幅留给伍启元、刘大中、笄移今、严仁赓等人，以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呈现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知识水准。

上述学者国人可能并不熟悉，甚或闻所未闻——即便在网络搜索极为便利的当下，也很难检索到他们的详细资料——但某一时段的声名不显，并不会永久掩盖他们的光芒。这些学者大都有着极深的学术造诣，假以时日，人们必会了解到他们的价值，给予他们应有的评价。例如伍启元，曾赴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其博士论文《国际价格理论大纲》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莫瑞·罗斯巴德盛赞，至今仍不断再版；又如刘大中，赴美后专攻计量经济学，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曾接受他指导。编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有心人读过《文选》后认识到他们的价值，挖掘整理出更多的史料和文献，这当是对先贤最好的告慰。

唐骋华

目 录

导言	唐骋华 / 001
----------	-----------

《观察》立场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编 者 / 003
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	储安平 / 007
艰难·风险·沉着——本刊第二卷报告书	储安平 / 022
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三卷报告书	储安平 / 035
政府利刃 指向《观察》	储安平 / 049
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四卷报告书	储安平 / 053

时局分析

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	王芸生 / 073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傅孟真 / 076
国民党往何处去?	杨人楩 / 081
从世界潮流论中国出路	伍启元 / 086
我们对于大局的看法与对策——正告美国	杨光时 叶毅 孟庆渊 陈序廷 叶蔚华 虞世兰 车戟 周扬 吴奇策 吴文烈 / 094
我们对于时局的几点认识	严仁赓 / 096
国共问题何以不能和平解决的追索	陈 彦 / 103
动员·戡乱·行宪	楼邦彦 / 107

论当前的政局和美国对华政策·····	吴世昌 / 111
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	周炳琳等 / 117
政治年度总结账·····	《观察》特约记者 / 119
论不满现状·····	朱自清 / 122
一个农业工作者的自白和意见·····	袁国弼 / 125
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楼邦彦 / 133
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	季美林 / 137
和真比战难么?·····	董时进 / 141

经济观点

论当前中国经济情势·····	伍启元 / 147
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	伍启元 / 151
企业家与企业精神·····	简贯三 / 155
公教人员的待遇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伍启元 / 158
中国经济危机的出路·····	笄移今 / 161
经济之改造 (一)·····	胡先骕 / 167
经济之改造 (二)·····	胡先骕 / 173
经济之改造 (三)·····	胡先骕 / 178
经济之改造 (四)·····	胡先骕 / 183
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	陈志让 / 187
现代财政动向与中国财政政策·····	伍启元 / 190
从黄金风潮论经济对策·····	庄智焕 / 194
经济正义与社会安全·····	郑林庄 / 200
现代经济思潮的趋势·····	吴元黎 / 204
中国当前的经济祸患应由既得利益阶级负责·····	杨西孟 / 210
论中国土地改革·····	施若霖 / 217
论经济与政治——对于目前几种经济急救方案的一点批评之一 ·····	陈振汉 / 224
论征用豪门富室在外国的资产及征用的技术问题·····	韩德培 / 227
中国经济问题·····	赵迺抃讲 / 233

从“新经济学”谈到凯因斯和马克思	张培刚 / 238
物价狂涨！物价狂涨！	刘滌源 / 242
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	笄移今 / 248
平抑物价乎？管制收益乎？	罗坚白 / 255
金圆券能够稳定物价吗？	樊 弘 / 262
改革币制已届成败关头	刘大中 / 267
政治力量安能稳定物价！	严仁赓 / 272
百孔千疮的物价管制	刘滌源 / 276
评最近官方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	施复亮 / 283

理念探讨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吴世昌 / 293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	杨人楩 / 298
释“左”与“右”	严仁赓 / 305
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	李孝友 / 312
我们对于争取学术独立的意见	国立七大学研究所同学会 / 316
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	施复亮 / 320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张东荪 / 327
读《自由主义宣言》	潘光旦 / 333
释 Liberal · Liberalism	郑慎山 / 341
一八四八·一九四八——历史的两个转折点	严仁赓 / 345

领土问题

琉球应归还中国	万 光 / 353
论琉球归属问题——及可能纠纷的日本领土	李纯青 / 359

各地通信

宋子文的政绩·政策·作风·资本	本刊特约记者 / 367
从中国乡村看中国政治——一个政府简任官吏的回乡见闻	本刊特约记者 / 371

浙江的征丁征税·····	本刊特约记者 / 377
西安的面荒·····	本刊特约记者 / 381
北方学运的源原本本·····	王 水 / 384
在内战最前线·····	何 彭 / 388
从数字看江西·····	王克浪 / 394
淮上血泪·····	梁 马 / 398
苏北实地视察录·····	乡 少 / 403
泪眼看东北·····	高 超 / 409
国大·总统·宪法·····	《观察》特约记者 / 414
人民对于内战的负担·····	《观察》特约记者 / 418
金圆券与政治的延续·····	《观察》特约记者 / 426
我逃出了长春·····	陶永芳 / 432
饥饿的野火·····	《观察》读者投寄 / 439
部分作者简介·····	/ 445
《观察》(全六卷)篇目索引·····	/ 457
出版说明·····	/ 523

《观察》立场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编者

—

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创刊伊始，兹谨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

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论评时事的刊物。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实在烦闷。在多年的烦闷中，意志软弱的，渐渐趋入麻痹、消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刚强的则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厉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瞻念国家，中心忧惧，莫此为甚！我们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们对于青年，一无成见，他们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们能够信其所信，无宁且为我们所鼓励并器重者。我们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

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二

其次，请一述我们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约：

一、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二、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三、进步 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我们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我们反对一切的停滞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开倒车。停顿、落后、退步，都是自杀。我们要求中国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齐着世界主流，迈步前进。

四、理性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

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我们谨以上陈四义，作为我们追求努力的鹄的，并本此以发言论事。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发刊之始，谨述其志趣与立场如上。尚祈全国贤达，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国家幸甚。

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

储安平

本刊年出二卷，每卷二十四期。一卷出完后，休息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第二卷第一期定三月一日出版。

我们除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以外，在这一卷中，未尝有一字涉及本刊自身；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先让读者自己就本刊的言论、风度、水准、内容，获取一个大概的了解。在这半年中，我们得到许多前辈、朋友、读者的爱护关切，使我们增加不少工作的兴趣和努力的勇气。在这第一卷的最后一期，我们谨一述本刊诞生的经过及半年来的各种情形。

发起·筹备·诞生

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须发六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个星期的筹备时间。那时正是抗战刚告胜利，政治酝酿改变的时候，多年以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的许多积郁，我们这时秉笔直书，亦确能言所欲言。我们愿意毫无夸张地说，那时确有许多读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观》的出版。——这些读者后来都成为《观察》的读者，今日《观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带有广大的销路，一部分亦应归因于《客观》

的影响。有许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了为什么我们骤然放下《客观》，另立《观察》。我们无意在此追述那些业已过去的琐碎事情，只能就原则上补叙一笔。我们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论机构，在纸面上，它的评论写行头头是道，极其动听，而这个言论机构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则和办事精神，与它所发表的议论不能符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假如我们主张政府负责而我们自己做事不负责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们自己腐化，这对于一个有高度理想的人，实在是一种难于言说的苦痛。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

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天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

第一次的发起人会议于三十五年一月六日在重庆举行，决定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关于这个刊物的生命能否维持，当时我们笼统地建筑在两个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当时国内还缺少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在抗战中，昆明重庆等地都有水准很高的刊物，但因战时邮递困难，环境限制，都未能布及全国）。假如我们自己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各方面的前辈及朋友，无论识与不识，一定乐于支持我们，为本刊写稿。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我们的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则本刊当可获得众多的读者。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并与各方取得初步的接触后，决定以全副力量并持久决心来创办这个刊物。我们认为像这样一种工作，有以全副精力去努力的价值。我们认为今日中国实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个刊物，并可鼓励一般自由思想学人出而说话。而我们之所以要想供大家一个说话地方，并鼓励大家说话，实因我们深切

相信，这种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今日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此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今日中国所迫切需要者。

关于编辑部分的筹备工作，大体上都是在重庆办理的。我们拟了一张“拟约撰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缘起，二、“拟约撰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撰稿人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材料。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履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作一符号，可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长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为国家的福利努力。

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为我们对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名单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八位先生迄无复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履约担任”。并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的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种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们不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七十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

事务方面的筹备工作，较为艰难。第一是股款不易措筹。我们预定的股额是一千万元，当时（三十五年一月）根据上海方面的报告，我们估计每期的总成本是五十万元，如有六百万元，即可着手，（二百万元为开办费，四百万元为八期的周转金）。措筹此数应无困难，但事实上不若想象的那样顺利。我们这批朋友，多是以教书为生的。读者一定充分明了，在抗战的八年中，教育界人员是如何的在饥饿线上挣扎。所以到真正收款时，常常止于“口惠”。其间还遇到使人极其难堪的事情。

但是也有令人感动的事情。我有一个学生竟然征得了他父亲的同意，卖

掉了几亩租田，来助成我们的刊物。还有好几位《客观》的读者，知道我们另筹《观察》，愿意入股。我们那时筹款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请他们再为考虑。我们表示：一、一般公务人员都非常艰苦，若是生活优裕，略出余力，以助文化，自然不失为一种义行，但若仅从生活零用中，节省出钱来入股，我们实在感觉不安，不忍接受；二、现在社会诡诈百出，读者和我们向未谋面，似亦不能单凭我们的文章就相信我们，我们劝他们慎重出之。结果还是有一位读者在薪水中抽出了五万元入了一股。

我于去年三月中旬，由渝飞沪，只带来一小部分股款。那时物价激涨，一般言之，似非有二千万元不能出刊；但是我们连一千万元，尚感不易。正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在去年四月五月，南京方面两次以高级公务员见委；但我实乐于有这样一个艰苦的时期以锻炼自己的情操。我们做人做事，说不该半途而废，见异思迁。就在这一个远东第一豪华的大都市里，我落寞地守了好几月。这些日子是黝暗的，但我还有着一盏明亮的灯，这盏灯挂在我的心底里，吹不灭，抢不掉；这盏灯发射光亮，冲散着周围的昏暗。

到六月中，股款渐渐像个样子，七月底，大体已近收足。事务方面的第二件大事是“房子”。在上海，房子就是金条。以我们这戈戈之数，绝对放不得手；但是没有金条弄房子，几如登天之难。后来幸得朋友之助，租到了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总算是贯彻初衷，未出金条，月付租金二十万元，说定以半年为期。刊物出了几个月，前途如何，较有眉目，到那时，我们容易放手做事；所以只租半年，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条件。

各事进展到八分程度时，我们开始发函约稿。我们最初原想在七月出版，但是酷暑将至，学校放假，各地复员，我们深感此时出刊，“天时”不利。考虑再三，决定守到九月一日创刊。这个夏天确是一个热闷的夏天，但是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夏天！

发行·定阅·财务

刊物出版以后，各方面的反应非常良好。发行情形完全超过我们预期的数目。第一期究竟应该印多少份，事前无法得到科学的根据。一部分朋友甚至怀疑我们这样一个硬性的高级刊物，是否可以销过三千份。我们第一期决定印五千份。我们虽然定九月一日为本刊的创刊日，实际上创刊号的出版日

期是八月三十日（星期六）。在八月二十九日，我们已发出四千七百余份。可是在第二天的下午，本埠批销人立即电话添批，本社驻京办理处于九月二日三日连发两封快信，四日并用电报催促加寄，据说第一期七百份在南京两天之内全部售出，各书店均派人至本社驻京办事处添批，无以应命。第二期我们仍印五千份。这个决定，实在属于一种“商业政策”，在各方面极其切迫需要的时候，我们仍旧控制印数，控制批数，使在发行方面造成一种抢购的现象，增强购买人与批销人对于本刊的心理重量。第三期增印至七千份，第五期增印至八千份，第六期增印至九千份，同时创刊号及第二期在各方的殷切需要之下，再版、三版、终至四版。在再版三版之中，许多读者亲至本社索补，即使只剩了破缺的，读者也一律愉快购去。至第十期时，九千份仍有不敷分配之势，自第十三期起，遂增印至一万份。其发行数列表如下：

第一期	初版	五千份	第九期	九千份
	再版	一千五百份	第十期	九千份
	三版	一千份	第十一期	九千份
第二期	初版	五千份	第十二期	九千份
	再版	一千份	第十三期	一万份
	三版	一千份	第十四期	一万份
	四版	一千份	第十五期	一万份
第三期	初版	七千份	第十六期	一万份
	再版	一千份	第十七期	一万份
	三版	一千份	第十八期	九千份
第四期	初版	七千份	第十九期	九千份
	再版	一千份	第二十期	七千份
第五期	初版	八千份	第二十一期	七千份
	再版	一千份	第二十二期	七千份
第六期		九千份	第二十三期	七千份
第七期		九千份	第二十四期	八千份
第八期		九千份		

出至第十七期后，销路渐趋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多种的：一、在水准上，我们自己检讨并未下降，但在读者的心理上，或许感觉本刊内容，已不若最先几期的齐整。正如一位读者所说：“刊物办久便老了”！我们自己并未因销路的下降发生忧虑。我们有我们的水准，而我们对于水准的是否下降，远较销路之是否下降为关切重视。不过因为稿件不宽，我们在编辑时，亦确有窘促之感，因之亦难免影响刊物的生气。但我们并未以不合水准的文字填凑篇幅。在那几期，在编辑技术上仅仅可以批评的一点，即是不该同时刊载二篇续稿（自十五期我们同时刊载了两篇续稿）。这两篇长稿都是高度的硬性论文，本刊本已极其严肃沉重，同时刊载两篇长篇论文，对读者的口胃，确是过重的担负。二、季节关系。天冷了，跑书店、跑报摊的人，渐渐减少，据内行报告，在这个时候，一般刊物的销路，都向下跌。三、自十八期起，我们增加了售价。四、而最重要的原因，则为邮资的涨价，每一份的航空邮费，自一百二十二元增至三百十元。本刊是一个全国性的刊物，有半数均散布在川、黔、滇及西北、华北一带，这一带都是需用航空寄递的。邮资的加价，对于京沪杭一带的批销，自然不受影响，对于后方远地一带则影响颇大。在后方远地一带，邮资的涨价对于直接定户一部分，尚无显著的影响，而对于同业的批销，则影响极大。一方面是售价增加，一方面是邮资涨价，遂使后方同业的批销成本提高，因亦使刊物在后方门市的售价增加。后方的生活程度本较上海为低，以生活程度低的地方的购买力来购买生活程度最高地方的书刊，再加上批销书店的利润，自然要影响售卖的数量（所以我们希望后方读者均能向本社直接订阅，在经济上合算得多）。五、最后一个原因，接连的阳历年关和阴历年关，各地同业大都不能按期汇付货款，我们因为放出各地的账目为数太大，本社经费有限，已有难于负担之势，遂不得自动减少批数（因为垫付的邮资，其数可观）。我们可以说，销路即使稍降，八千份的数目应可维持，但因我们自动减少批数之故，所以我们自第二十一期起即减印至七千份。那时正是阴历年底，又是第一卷最后的几期，我们存意平平维持过去，以待春天来到，自第二卷起，重行推动。最近几天因年关已过，各地同业陆续有款汇到，本期回复增印至八千份。

关于发行方面我们尚须顺便一提的：一、上述发行数字，都是实在的，并无一般虚报的习气。我以发行人的身份，向社会报告这个发行数，我负人

格上的责任。二、我们在发行方面可谓未曾尽力推动，这个发行数是一个自然的发行数，非已极尽其力之结果。我们所以未能极尽其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本刊草创，一切开支力求节省，故办理发行的职员，是兼任而非专任。这一兼任的职员，他本身另营书刊业务，以致事实上未能全力顾到本刊的业务。我们现在深感兼任之不妥，故已另聘职员，专职办理。三、发行是经营一个刊物最感棘手的一部分工作。各地同业虽然纷纷批销，但大都不能预汇款项，或者第一次汇了一笔货款来，而以后不按期源源汇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因为货款已完，停止寄刊，则刊物的发行数字势必渐渐下降。但如继续寄刊，则飘荡在外面的帐，越放越大，纵然每一客户所欠数目为数不大，但全部欠款的总数，实在可观；其中邮资都是我们垫付的。一个刊物总希望和各地同业，维持连系，非不得已，不愿中断；其间实极焦人。

关于直接定户，截止本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共为二千七百零九名。正如批发一样，这个定户数也是自然的，我们并未出以人力的推动。我们除在创刊前分散过一次宣传品以外，以后即未再在此方面有所努力，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事繁人少，每日应付日常的工作，已经筋疲力尽，分不出精力再来从事推广工作，另一个原因，我们认为要推动定户，必须先有通盘的计划，中途零零碎碎的做，无甚补益。定户的进度表则如下述：

2709名定户的地域分佈



注：“华北”包括冀、鲁、晋、豫、绥、察、热等省。“西北”包括甘、陕、新、青、康、宁等省。“华中”包括湘、鄂、皖、赣四省。“华南”包括港、粤、闽、桂、台等地。

创刊号出版前	六三人	第六期出版日止	八五五人
第二期出版日止	一四一人	第七期出版日止	九七七人
第三期出版日止	三〇六人	第八期出版日止	一一三九人
第四期出版日止	五一三人	第九期出版日止	一二九三人
第五期出版日止	六七六人	第十期出版日止	一一七四人

第十一期出版日止	一六八二人	第十八期出版日止	二三四七人
第十二期出版日止	一七九四人	第十九期出版日止	二四三三人
第十三期出版日止	一九一〇人	第二十期出版日止	二五〇六人
第十四期出版日止	一九八五人	第二十一期出版日止	二五六三人
第十五期出版日止	二〇七三人	第二十二期出版日止	二六一〇人
第十六期出版日止	二一五一人	第二十三期出版日止	二七〇九人
第十七期出版日止	二二六六人		

这二千七百零九名直接定户，其地域分布及职业分布，我们统计制表如右：

直接定户是一个刊物的基本读者，也是这个刊物最忠实并最关切这个刊物的读者。现在有些刊物，号称拥有数万直接定户，或征求数万直接定户，我们对于他们的气魄，只好敬佩。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能有二千七百零九名的直接定户，已是得之非易了，因为现在一般刊物，很少能得到一个像样数字的直接定户。不过若就本刊基础而论，目前的定户数，显然是不满足的，我们呼吁各地的零购读者，都能早日直接定阅，并希望已经是我们的直接定

2709名定户的職業分類



注：“其他”包括律師、醫生、教師等。

本刊未曾向讀者調查職業，此項統計，系根據定單存根而制，故一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類。

戶，能再為我們多介紹幾個定戶。一般讀者所以寧願零購而不願定閱，主要的原因是恐怕這個刊物中途夭折。但是我們相信，當讀者讀了這篇報告書後，或者可以了解，我們主持這個刊物，不是一件隨便輕率的行為，除非因政治打擊而遭封閉，我們決不中途停止。很公平地說，在任何理由之下，直接定閱均較零購省事省錢。特別是外埠遠地的讀者，論迅速，寄給遠地書店的刊物，因系成捆，郵遞間有延擱等情，而單冊刊物，則甚少延擱，必可早到。（此系指郵運而言，至於本社寄刊，寄戶及批發，均系同時提前一日付郵。）論經濟，遠地書店出售本刊，因為利潤關係，常售一千五百元或二千元一冊，而直接定閱，連航空郵資僅須一千一百元左右（第二卷第一期起售

一千元一册，定户八折，实收八百元，外加航空邮资三百十元）定阅实较零购合算得多。

关于财务，按照本社“征股简约”第四条：“出版满一年时，主持人应向出资人提出财政报告”，我们应于今年九月，向股东提出财政报告书。但我们愿意在此提出简略的报告：本社的资金是一千万元，但是现在在账面上，本社的资金已超过二千万。我们愿意向股东说明，我们在筹备时期，从未开支过一文车钱，也从未开支过一文交际费。第一次租屋及最近的迁移，我们都没有用什么钱。甚至在开办的时候，我们也几乎可以说，没有用过什么开办费，一切家具都是借用旧的，借以节省支出。而且我必须说，我们是绝对“干净”的。一切比较大的支出，如买纸、付印刷费等，都由我亲自经手办理，在良心及人格上，我们可说绝无弊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社会上主持独立的事业，我们认为我们的信用及前途较之金钱远为珍贵。至于刊物本身，可能自给。

作者·读者·编者

编辑经验是一种苦痛的经验。读者的立场、口胃、期望、要求，各各不同，任何一个刊物，都无法使每一个读者完全满意。读者对于一个刊物的要求，都是从他个人的角度出发的，而一个编者，他必须从全盘着眼。举一个最普通而最为一般人所忽视的例子：京沪一带的读者，阅读心理和大后方的读者的阅读心理，有很大的距离。通常一个刊物编者，最容易犯一个毛病，即只顾这个刊物发行地带附近的读者，而忽略远地的读者。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性的，发行数的一半都在后方远地，我们在地域上必须以全国的读者作为对象，而不偏重于某一地区的一部分读者。

我们这一个刊物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许各人陈述各人的意见，在今日这种“两趋极端”的局面下，我们认为最需要提倡这种“自由”与“宽容”的精神。所以我们一再申述我们的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中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意见不同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非非得编者同意不可。我们最注重者，是文章的内容与态度，亦即文章的水准与风格。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文章，各言其是、无统一的论调。在我们自己，我们不以此为病；甚至可

以说，我们且以不一致为贵。（假如以后我们几个朋友发表意见相同的文章，那也仅是偶合，而非设意如此者。）记得有两位读者曾来面谈，问本刊有无具体主张及能否对于青年作进一步的具体指示（指组织而言）。关于第一点，我直捷了当的说：我们无具体主张；关于第二点，我说我们无意为此。曾在或将在本刊上写文章的人，他个人或许对于国事有具体的主张，但是“我们”，或者说本刊，至少至目前为止，还谈不上这点。我们自承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些基本原则，论评国事。但我们做的是一种言论工作，而非组党工作。中国“热心”于组党的人太多了，你一个党，他一个党，我们认为在中国现行局面下，党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乱。就编者个人而言，我极其赞同张东荪先生所言：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执政”（见第十三期张文）。“干政”就是一种“舆论”的做法，而“执政”必须是一种“组党”的做法。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谈不上“具体主张”；我们无意组党，所以我们无意担任组训青年的工作。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

许多读者感到本刊的“分量”太重，太严肃，甚至说太枯燥了。有的说本刊不够“刺激”，说“刺激”的文章太少了。关于这点，须分层说明。第一、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在本刊的基本编辑方针上，中学生不在我们的读者对象范围之内。）一个高级刊物是显然无法“轻松”的；我们绝对拿定这一方针，不稍动摇。其次，我们是一个理性的刊物，我们绝不感情发言；一切感情冲动的文章，概所不取。就事论事，本刊过去确曾发表了几篇“斤量”相当重的文章，在我们看来，有时严厉的八个字，其斤量远在看似泼辣而实无重量的八千字以上。不过这几年来，大家太苦闷了，以致人人都希望读到所谓“刺激”的文章，感情越冲动的文章越容易吸引读者；但此与本刊的基本精神相背，我们无意如此，更无意仅仅为了吸引读者而向此方面发展。我们创办本刊的目的是替国家造福，我们绝不忘怀我们最初的动机。因此，据我们的一般印象（我们尚未做过读者调查的工作），本刊的读者，大部分是在三十岁，或者至少是二十五岁以上的读者。

我们不拟迁就读者的口胃而改变我们的方针。第三、一般读者都感觉本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即没有时事短评，因而使这个刊物大大减低了接触现实的程度。关于这点，我们完全承认，并亦充分同感。我们愿意在此坦白陈述我们的困难，而困难的症结，在于人力的限制。不仅本刊的撰稿人都在外埠，就是本刊的发起人，也都散处各地。这种时事短评，要认真写，固可由一人执笔，而必得至少有两三个人经常讨论，才能避免过偏或不及的弊病。现在全部的编辑责任都在编者一人肩上。要约稿，要复信，要阅稿。退稿不算，就是单单发表的稿子，每一篇稿子要读三遍。第一遍是初读，大体决定可用与否。第二遍是精读，间或修饰其文字，并计算其字数。在发稿之前，还要最后认真地读一遍。特别是通信，要做大标题小标题及文内子题，平均一篇通信，至少化费三小时始能编好。而最主要的，是编者不仅仅是主编这个刊物，实际上是主办这个刊物；我十分之六七以上的精力还是化费在事务方面。调度款项、核对账目、管理人事、购买纸张、兜拉广告、各种设计、校阅大样，以及对外一切有人事关系的事务，这些都是我的责任。

自从本刊创刊以来，我每日工作的时间，平均在十一小时左右，有时多至十三小时。半年以来，我们虽然心情宁静，意志坚定，但是身体疲乏，精神困顿，我们实已尽心尽力；而这一切显然是为了我们的理想，为了我们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编者已无余力构思，也无必须的时间以获取为撰写时评所必要的情报与根据。我们又不愿草率落笔，宁缺毋滥。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但我们腴腆地说，至少在第二卷中，我们还无法增设时评的一栏。

我们过去退掉的稿子很多。有前辈的，有多年友谊的朋友的，有股东的，有撰稿人的，有读者的。有第一篇用第二篇退者，或第一篇退而第二篇用者。有一次，有一位前辈，我们向他求了四五次稿，他确是爱护本刊，在忙中抽暇给我们写了一篇，而我们仍未能刊载。在人情上讲，退稿确是一件不甚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于稿件的取舍，绝无偏私；而且我们事实上稿子常感不敷，但是为了刊物，应退者还是要退。我们希望各方面能鉴谅我们。至于本刊篇幅，绝对公开，毫无门户之见。在第一卷中，在投稿中录用的文章，共为三十五篇，约占所刊文章总数百分之二十五（通信及尾页犹不在内）；第十四期新疆专辑就是投稿。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我们用稿绝无成见，

只要文章在水准以上，无不采用，特殊有价值的文字，甚至为之出一专辑，亦所不辞。

有许多人批评本刊每期的作者履历介绍，我们在此解释几句。一般刊物每期都可由编者写一编辑后记，编辑后记主要的目的在介绍本期作者。但这种介绍，时有失之“肉麻”或轻重不匀之弊。我们仅仅简单地刊出作者的身份或职业，实是一种比较大方的作风。有人以为有许多作者已经大家知道，无须介绍，或无须每次介绍。但其间包括几个问题：一、有一部分作者虽然大家知道，但也有一部分作者，读者对之尚不十分熟悉。何人应介绍，何人不应介绍，并无客观的标准，故我们一律介绍。二、京沪平津一带的读者，也许对于许多作者，均极熟悉，但大后方的读者，未必熟悉。本刊遍布全国，不能亦不应仅以东南一带的读者情形为标准。三、有人主张每一个作者第一次为本刊作文时，介绍一次，以后即不必再为介绍，但是在理论上，我们无法承认每一期的读者都是读过以前各期的。每期有每期的新读者，所以每期的作者均应介绍。四、在编辑技术上，假如只介绍第一次给本刊写稿的作者，则这一期也须只有一个新作者，而我们决不能在介绍作者的那个方框里冷冷落落地只排一行，稍有编辑经验的人，即知绝无此种做法。批评这一点的朋友，大都根据其自身的知识程度或社交地位而有这种意见，但我们当事人是从全盘着眼的。而且我们这样做至少并不“伤雅”，我们愿意让这个办法成为本刊的一种刊例。而且我们愿意再报告一点：这个办法对于我们的业务，未始无助；内行的朋友们甚至还赞赏着我们这种做法。

编辑部分需要报告或解释的，已如上述。我们愿意在此向所有为本刊写稿的先生及各地的特约记者表示最大最热烈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本刊未由获得为本刊所已获得的那些荣誉。我们要求各地的撰稿先生及特约记者，继续支持我们，源源以大稿见惠，充实本刊的生命。在编辑方面，伍启元吴世昌两先生给编者很多帮助。创刊以前一部分稿子是伍先生代约的。创刊时，伍先生正在上海候轮赴英，我们共同讨论最初几期的编辑计划，他并作许多有实质的协助。其后吴世昌先生复员东下，他经常提出建议，并在各方面协助，以迄于今。

自第二卷起，我们又增约了胡适之先生等几位为本刊撰稿人，均经函允担任，并此附告。

办 事

我们的办事基本精神是负责、迅速、公平。不过在中国社会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希望贯彻这种精神了。我们自己检讨，实在愧惭得很，一切还不能做到理想的地步。

先说我们和作者的相处。我们对于作者，都是最尊敬并最热诚的。我们向作者索稿，从来不写“八行”信，从来不叫人代笔。我们每次去信都是恳挚的，而且大都是长信。说实在话，有时一位作者给我们写四千字，但我们前前后后所给他的信，恐怕有时竟不止四千字。有些作者有时或者不免要感到我们追稿追得太厉害了，但是我们相信，当他一想到我们一切都是忠于一个刊物，或者会同情我们，原谅我们，而不加责怪。作者的来信，我们大都立刻作复。稿子来后，大都立刻汇奉稿费。当我在筹备时期，常常上午九时收到稿子，上午十一时就立刻跑到银行里去将稿费汇出了。那时也毕竟比较空闲，常常在收到信件的五分钟以内，就写了复信，立刻跑到邮局去。（当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行为，几乎近于疯狂！）现在事情一多，时间已不够用，但重要的信仍旧立刻作复，延搁的情形难免没有，大体上不多。对于稿费，我们相信为本刊撰稿的先生们，不甚关心，但在本刊一方面，我们必须时常顾到作者的利益，我们已提高过三次。就中国社会情形说，稿费的菲薄是最不合理最不公道的。我们自愧尚无力量作何改革，我们每次提高的数目，均极寒酸，我们仅仅只能使作者获有一种印象，即我们确是在认认真真的努力事业。

一般读者和我们的信函往还，可分两部分来说。一是写给编者的，一是关于定阅的。关于投稿，不用的稿子我们大都立即退回，甚少压搁。可用的，稿费亦提前汇出，只有可用而在最近一、二期中尚无刊出可能的，则稿费延至刊出后再寄出；此因本刊经济有限，稿费项的周转金数目不大，故未能无限止的一律先付。关于建议改善内容的信件，我们大都一一保留，供为参考。编者个人过去的习惯是“有信必复”，近来事实所限，无法一一遍复，所以凡无特殊需要者，即不再复。编者愿意在此对于过去惠函诸君，一并表示谢意。非一万或八千字不能毕辞，在这种情形下，编者实在无法答复，只好写一封短信去道歉。

关于定户的来信，本社也尽力查复或照办。定户的来信是本社同人目前最感繁重的一项工作。有的是改地址的，有的是改寄递方法的，有的是补购以前的刊物的，有的是中途未收到要求赠补的，有的是续定的，有的是托代购其他书籍的。每一定户，当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后，他当然希望我们立刻将他所嘱咐的事情办好。但一切困难都由于一个单纯的事实，即绝大多数的定户来信时，都不注明他的定单号码。续定刊物，必须知道他以前的订费至何期截止，始可前后衔接；补购刊物的须在他名下上账，至于更改地址或更改寄递方法，更须知道他的号码，以便寻觅签标。我们现在有二千七百余名定户，要在二千七百余名中去找寻一个人，何等困难。要是再写信去问，则往还需时，读者总觉得我们服务不周。现在我们有一个职员，专门负责答复读者来信之责，他有时整整一个下午只能复三封信！这真是不合理，不经济！有的读者来信，字迹潦草，甚至他们的签名及地址，无法辨识，以致无法答复，在读者是不满，在本社更是不安。有时读者从银行汇款订阅，常常不注明起寄期数及寄递方法，甚至根本不注明汇款人姓名及地址而又未另函通知者。（关于此点，也许是解款的银行将汇款人的附言单失落了。）以致读者久候无复信，而本社亦苦无法作复。有些读者的刊物中途间有邮失，或被他人擅取，来函责难，我们只好再补他一份。……像这类事情，日有数起。我们特为陈述，希望以后定户惠函查询，务须注明定单号码，如其定单遗失，可阅封套上所贴签条上的号码，以利查复。我们愿意为读者服务，并尽量提高服务的效率，谨请读者协力合作。

本社过去在办事上最弱的一环是发行课（定户课与发行课分开）。前已言及，协办发行的职员是兼任的，事实上未能全力灌注，因之各地同业来函，时有搁置不复之事。我们对此极感不安，已分函各地同业致歉，并说明正谋改善。现已另聘职员，专任办理，希望以后各地同业来函，能够随到随复。

关于本社同人福利，我们尽力顾到，自从去年八月成立以来，迄今为止，已调整过两次，（编者自己的薪水，从未调整，现在还是拿去年八月份数目）每次调整的数目虽然有限，但是因本社经济有限，一方面要顾到同人，一方面也不得不顾到本社。每次调整都是我们自动的，并非出于职员的要求。本社职员对于这个事业，有兴趣，有热忱，物质生活虽苦，精神生活

却很愉快。

关于我们对外应付的款项，从无拖欠或延搁之事。过去二十四期中的稿费，除有二三笔因去函作者询问汇款正确地址，尚未付出外，其余均已随时汇出。如有尚未收到者，请即函告，以便查理。纸张费，广告费，印刷费，都如期一一照付。承印本刊的印刷所老板，他说他做了二三十年印刷生意，还没有遇到像我们这样的顾客。我在任何忙碌的情形之下，总于应该付款的时候，在社里恭候他来取款。

此外，还有一件事，该在此报告，即在过去半年中，本人从未参加任何政治的集会或活动。此事包括着两个原则：一、一个刊物要维持他超然的地位，这个刊物的编者必须是真正绝对超然的，二、我们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的理想，这个刊物绝不应当成为编者个人活动的工具。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该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欲的目的。

尾 语

在这严冬的寒夜，我已费了整整两个通宵，向社会报告我们这半年来的经过。行文至此，东方微白，实已不胜倦困。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读者先生，让我们大家鼓舞起来，挺起我们的胸膛，睁开我们的眼睛，冷静我们的头脑，坚定我们的意志，来从事具有新理想的新社会事业。大家来鼓励我们，协助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愿在这儿毫不害羞地向广大的社会宣告：我们认为我们今日所做的一种工作，就是一种真正的“建国工作”！

三十六年二月一日

艰难·风险·沉着——本刊第二卷报告书

储安平

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宣布：本刊第二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息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第三卷第一期定八月三十日出版。

这半年是一段风暴的日子。无论经济环境或者政治环境，都使我们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只是我们虽然精殚力竭，然而心情却极宁静。我们认为只有以单纯始能应付复杂，以沉着始得克服困难。我们能够撑过这段日子，应归功于作者的支持，读者的爱护，和本社同人的合作。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这半年使我们最透不过气的，就是各种开支的激增，纸成为目前本刊最大的一笔支出，在每期成本中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在第一卷结束时，纸价尚未超过五万元一令，但到第二卷第一期付印时，纸价狂涨到每令十五万元左右；在短短的半个月内，纸价的上涨竟达三倍以上。二卷一期以后，纸价继续上涨，自十五万到二十万、二十五万、三十万，目前则在三十二万元左右；较之第一卷结束时，纸价上涨八倍。本刊是一个纯粹民营的刊物，既无政治集团在后指使，亦无经济集团在后支持，平时用纸都是向市上纸商零购的，因之纸价激涨，对于本刊实为一种难于忍受的打击。

排印工及装订工一再涨价，上涨的比率也不在纸价之下，其统计如下：

种类	二卷一期起	二卷十期起	二卷十五期起
五号字排工（千字）	一万八千元	二万四千元	四万三千元
六号字排工（千字）	二万一千元	二万八千元	五万元
印工（每令）	三万二千元	四万三千元	八万元
封面印工（千页）	一万一千元	一万五千元	二万七千元
订工（每册）	二卷一期起	四十九元三角	
	二卷六期起	五十九元	
	二卷十期起	七十八元五角	
	二卷十三期起	八十八元五角	
	二卷十七期起	一百十五元	
	二卷二十二起	一百卅一元六角	

本刊每期出版，例在上海《大公报》封面地位刊载广告一次。二卷一期出版时，《大公报》的广告费每行仅二万六千元，现在则涨到每行七万元。本刊稿费二卷一期时千字一万至一万二千元，现在提高到千字三万至四万元。本社同人的薪金，现在较之二卷一期出版时，亦提高至百分之二百以上。检查上列数字，本刊各种开支，二卷结束时较之二卷开始时，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而本刊的售价，二卷一期时为一千五百元，现在为三千元，仅增一倍。在第一卷中，我们还经常保持两页地位的广告，借以增加本社的收入。自第二卷起，因为要增加文字的容纳量，广告所占的篇幅，已自二页减为一页，甚至连一页也没有，所以本刊目前广告收入，已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

销 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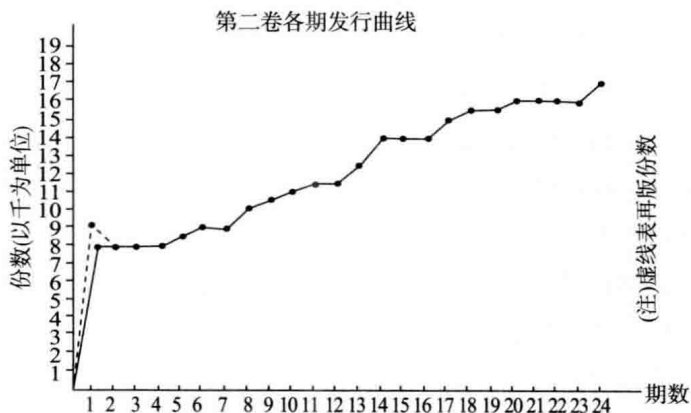
然而我们能够在这困难的情形下支持下去，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销路的增加。我在第一卷报告中曾经提到，当我们创刊号试印五千份时，即使是我们最关切的朋友，甚至亦怀疑本刊是否能够销行到三千份。当我们后来印到一万份时，在出版界中有经验的朋友们，一致承认我们单在这方面，已经是一种成功。因为照一般估计，像我们这样一种刊物，销行到一万份几已达到了它“可能的发行数”。我们自然希望销路向上加，但也不敢存太大的

希望。因为我们深切了解当前的环境太艰难，许多条件都是不利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刊物的发展的。从政治环境说，本刊是一个政论的刊物，许多意外的阻碍自在意料之中。就教育程度说，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自不能像软性刊物之那样易于吸引读者。就经济情形说，现在一般读者的购买力非常薄弱，特别是公教人员和学生，而本刊的读者，公教人员和学生占很大的比率。再从业务环境说，交通如此困难，邮资一再加价，都是影响刊物的发行。只是种种不利的情形虽如上述，而实际上，第二卷本刊的发行数，始终在很稳健的增加状态之中。本刊第一卷最高印到一万份，其后降到七千份，其中原因曾详第一卷报告书（一卷二十四期）。所以二卷一期出版时，我们很谨慎地只印八千份（其后再版一千份）。因为第一卷时期，各地同业拖欠的货款太多，所以自第二卷起，采用“现批”政策，不先汇款来的，即不发刊。又因为第一卷时期，印数与实销数常常脱节，故自第二卷起，严密管理，印数多少，纯视实际需要，决不多印，以减浪费。就在这样发行紧缩印刷紧缩中，本刊的发行额仍然逐步上升。到二卷十一期，已从八千份升至一万一千五百份。二卷十三期因有评论学潮的文字，我们放胆增印到一万二千五百份，二卷十四期印至一万四千份。实际上，我们虽然增印至一万四千份，但仍不敷市场上的需要。别处不详，单在上海二卷十三、十四两期，都是在出版后两天之内全市抢购一空的。二卷十四期后，发行数继续增加。至二卷二十期，增印至一万六千份。二卷二十一期发行时，一万六千份已不敷分配，但因邮资加价及售价加价的原因，我们采取保守态度，暂不增印，以覘外埠各地发行的反应。迄至本期，复增印至一万七千份。兹将第一卷各期再版数暨第二卷各期发行数列表如下：

第一卷	第一期	四版	八百份	第二期	五版	七百份
	第三期	四版	七百份	第四期	三版	六百份
	第五期	三版	六百份			
第二卷	第一期	初版	八千份	再版		一千份
	第二期		八千份	第三期		八千份
	第四期		八千份	第五期		八千五百份
	第六期		九千份	第七期		九千份

第八期	一万份	第九期	一万零五百份
第十期	一万一千份	第十一期	一万一千五百份
第十二期	一万一千五百份	第十三期	一万二千五百份
第十四期	一万四千份	第十五期	一万四千份
第十六期	一万四千份	第十七期	一万五千份
第十八期	一万五千五百份	第十九期	一万五千五百份
第二十期	一万六千份	第二十一期	一万六千份
第二十二期	一万六千份	第二十三期	一万六千份
第二十四期	一万七千份		

实际上，在发行方面，由于种种限制，我们并没有能够达到最大限度。第一，我们为稳扎稳打起见，采取“现批”政策，凡不先汇款来的，我们一律不批。或者汇款已完而未续汇的，我们即停止寄刊。此种办法，虽然稳，但亦势必因此放弃了一部分市场，第二，我们规定货是不能退的，因之各地同业实际可以销一百册者，也只愿批七十册或八十册，这个情形也大大减低了我们的发行数。第三，有少数地方的同业，高抬本刊售价。据我们所知，当本刊售出五百元时，贵阳昆明一带已售一千五百元，本刊售一千元时，贵阳售八千元一册。此种情形，对于当地的读者固为极大剥削，对于本刊的销路，也有不良影响。第四，在若干地方，本刊遭受不合理的压迫，如长沙、衡阳、芷江、济南、太原、三原、建瓯、沈阳等地，本刊均被禁售；对于本刊当然也是一种打击。



在发行上，本刊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分布普通，关于这一点，今日国内恐怕没有一个刊物甚至一个报纸，可以和本刊比拟，平津出版的刊物大都局促于华北东北一隅，上海一般刊物的发行，亦多以京沪东南一带为主要市场。我们很难相信兰州、成都、贵阳、昆明的读者能看到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有上海、天津、重庆三版，三版若合为一体，其分布之广，便约与本刊相似，但若三版各自分开，我们便难相信台湾的读者能看到重庆《大公报》，昆明的读者能要看到天津《大公报》，西安的读者能看到上海《大公报》，本刊虽在上海发行，但其分布并不限于东南一隅；以京沪杭为中心的东南一带，在本刊的发行额中，仅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都是分布在华北、华中、华南、及西南西北各地的。这是本刊在中国出版界中最特殊的一个情形。

定 户

直接定户是一个刊物最基本的读者，也是最忠实的读者。每一个刊物都希望获得更多的直接定户，在巩固刊物发行的基础。当本刊第一卷结束时，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征求定户的工作。我们的办法是，在平时不零零碎碎的征求定户，到每卷结束时，才征求一次。我们所以如此，一则本社同人平时很忙，已抽不出时间向此方面努力；二则零零碎碎的征求定户，看不出征求的成绩，集中一次做，容易看出征求的结果；三则旧的一卷业已结束，新的一卷即将开始，在心理上这个时期最适合征求定户。上次我们征求定户，大体上向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我们想经过本刊撰稿人的帮助，在各学校征求一批学生新定户，二是我们吁求本刊原有的直接定户，就他们的同学、同事、朋友、亲戚之中，替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我们最初对于前一方向怀有很大的期望，因为本刊撰稿人遍布国内各大学，他们对于本刊大都关切，假如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以为可以征求到一批新的学生定户。不料事实与理想相反，这一方向征求的结果，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惨败。无论在哪一个大学，我们都没有能够得到任何收获。这事实使我们第一次开始了解：今日一般学生是生活在何等贫穷之中。各方面的需信都说学生没有钱定阅刊物。那时我们定阅还只先收二万元。二万元在当时充其量只合到战前的一块钱。我们很难相信，在战前，大学的学生竟会拿不出一块钱。然而现在，大学生拿不出

二万元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这事实也深深影响了我，使我在五月学潮中对于学生抱持同情。这次我到北方来，我和学生接触的结果，使我相信，要他们拿出几万元来订一份刊物，已近乎一种奢望。可是第二方向，即吁求本刊原有的定户给我们介绍新定户，却又出乎意外地获得可观的成就。竟有不少读者，那样热情地无条件的支持我们，替我们分头介绍。他们真是尽心尽力，竭诚竭忠。有不少位读者附来长信，慷慨陈辞。他们认为，在平时，是我们在服务，他们在享受，而他们欣慰他们亦终于获得一个机会，让他们也能对《观察》尽一点力量。他们认为，假如一个人永远只是享受他人的努力，坐视他人的努力，那是一种不可恕的自私，因之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也有机会略尽一点义务。这些信件，使我们极度感动，并且获得更大的力量。我们深切感到：在这种混沌的，常常令人悲观的中国社会里，仍有公道的存在。我们并且认识：这一种无私的同情与援助，就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进步！

第一卷报告书中定户的号码是 2709（至一卷二十三期出版日止）现在则已增至 7682 号。各期定户的进度表则如下述：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出版日止	二八〇〇		
第二卷第一期出版日止	三三一—	第二期出版日止	三五四—
第三期出版日止	三八〇二	第四期出版日止	四〇〇五
第五期出版日止	四一五七	第六期出版日止	四二五八
第七期出版日止	四四二五	第八期出版日止	四六五六
第九期出版日止	四七九六	第十期出版日止	四九三四
第十一期出版日止	五〇五二	第十二期出版日止	五一九一
第十三期出版日止	五三六九	第十四期出版日止	五五五八
第十五期出版日止	五七五七	第十六期出版日止	六〇二五
第十七期出版日止	六二七六	第十八期出版日止	六五七二
第十九期出版日止	六八四二	第二十期出版日止	七〇九四
第二十一期出版日止	七二六九	第二十二期出版日止	七四八九
第二十三期出版日止	七六八二		

所以第二卷的定户，应为 $7682 - 2709 = 4973$ 名。这四千九百七十三名

直接定户，其地域及职业分布，我们援例统计制表如下：

4973名定户的職業分類



注：“其他”包括律師、醫生、教師等。本刊未曾向讀者調查職業，此項統計，系根據定單存根而制，故大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類。

4973名定戶的地域分佈



注：“華北”、包括冀、魯、晉、豫、綏、察、熱等省。“西北”包括陝、新、青、康、寧等省。“華中”包括湘、鄂、皖、贛四省。“華南”包括港、粵、閩、桂、台等地。

关于上列统计，有几点须加解释：（一）我们说第二卷的直接定户的数目是4973名，并非表示本刊现在拥有4973名直接定户。定户无论是新定户，或是旧定户来续订的，每次汇款来订时，我们都增加了一个新号码。据我们统计，凡是本刊旧定户，订费用罄时，大都是续订的；中止的为数很少。所以这4973名里，有许多都是业已满期的定户，本刊目前的实际定户，仅在二千五百名左右。（二）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两次报告的定户地域分布统计中，各地的百分比，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仅四川省，第二卷较第一卷为小。可能的解释是原有一部分定户已移到了东南或华北一带。西北及华南两地的百分比，第二卷较第一卷为大。可能的解释是本刊在西北一带的读者渐渐普遍，由于西北交通不便，许多地方的读者不一定能够买到本刊，所以直接定户的数目增加。至于在华南一带，我们在过去迄未推销，定户的增加亦足表示在华南各地，本刊渐次获得较多的读者。（三）职业分类中，第一第二两卷的统计，第二卷学界定户的百分比降低。第一卷统计学界定户占百分之二十三，第二卷统计仅占百分之十九。工商银行界定户的百分比增加，第一卷为百分之二十二，本卷为百分之二十五。这个变动最可能的解释是学生的购买力越来越薄弱，工商银行界的定户大体上尚未受到此方面的影响。（四）我们很抱歉定户职业分类表中的“不详”部分竟达百分之二十九，致

使此项统计的正确性大大减低。主要的原因是本刊初创，各事缺乏经验，我们过去始终没有举行过读者调查。此种统计大都是根据本社的定单存根制就的，但在定单存根上，有许多定户无从判断他们的职业。我们现已开始补救，在以后的定单上，都附有定户调查一栏。我们希望读者合作，于定阅时，顺便一填，以便我们在第三卷报告书中，对于定户的职业，能有比较正确的统计数字发表。

现在第二卷业已结束。我们援例在此向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新的定户。我们仍旧吁请本刊原有的定户，能替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我们并欢迎原有零购读者直接定阅，变成我们的定户读者。读者先生：我们在期待着你们的支持和合作。

编辑

关于编辑部分。第一卷结束时，我们打算自第二卷起，增加篇幅至三十二页。在我们的编辑计划上，自第二卷起，我们打算增辟《读者投书》、《观察文摘》和《观察漫画》三栏，并扩充《文艺》栏的篇幅。在此种计划下，原有的二十四页自然不敷分配。但就在第一卷出完，休息的两个星期中，金潮泛滥，百物齐涨，其中纸价的上涨最可骇人。在这种情形下，扩充篇幅的计划只得收起。但原定增辟的《投书》、《文摘》、《漫画》三栏，则决计使之实现，《文艺》篇幅无法扩充，而刊载学术理论文章的《特稿连载》一栏，不得不暂时取消。《尾页》也随之取消。并腾出一页广告地位以容纳读者投书。照目前情势看，恐怕我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无法考虑任何涉及增加篇幅的计划。

一般说来，第二卷的言论态度较第一卷为积极。“专论”部分，学理的文章减少，触及现实的文字增加。我们极愿保持这个趋向。“观察通信”亦较第一卷时期为能配合时事。“读者投书”据各方面报告，甚受欢迎，甚至本刊所刊的读者投书，并已成为其他刊物发表的论文中所引用的材料。本刊所刊“读者投书”所以广受欢迎，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短，二则因为大体上每封投书尚能言之有物。不过我们总觉读者投书，还是冗长的多，所发表的投书，大都要经过删节修饰的功夫。我们希望以后读者投书，尽量简短，即使仅有一句，亦无不可。“观察文摘”未能做得理想，总因人力有限，篇幅有

限，所以选摘的范围太狭，也无法每期都有。

稿子经常不宽裕。但稿子不宽裕是一件事，稿子选择的水准又是一件事；这两件事应该分开。照我们大约统计，全部来稿中，刊载的约占百分之四十，退还的约占百分之六十。我们自信我们用稿在大体上还能保持客观的标准，避免偏私。稿件用否与是否是“撰稿人”是否是“教授”并无必然关系；“撰稿人”中的稿件也有许多退还的，外来的投稿，只要重量够，我们极愿采用，并给以应有的地位。譬如二卷十期所刊钟伯平先生的《学潮平息以后的认识》，就是投稿；这篇文章应当刊第一篇，我们就给它排第一篇。我们十分欢迎全国作者读者惠稿，共同来充实本刊的内容。

本刊是一个政论刊物。刊物本身的性质注定了它是无法逃避现实的。因此环境越艰难，本刊所可能遭遇的风险也越大。在五月学潮的一段动荡环境中，我们几乎每一期都是处身于死亡的边缘上的。我们当然欣幸我们终于平安无事，但是来日大难，真正的困难恐怕还在后面。我们说过，我们愿以单纯应付复杂。我们将继续本乎我们的良知，发为言论。我们相信我们一切发言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愿意在此吁求政府当局，尽量放宽宽容的尺度，容许国内继续有无私的公正的言论。

本刊自第二卷起增加漫画一页，由孙方成先生执笔。读者对于本刊漫画的批评，我们还不甚清楚。相熟的朋友如钱钟书萧乾等先生都曾表示称赞。然而孙方成先生和本刊的合作，却近乎传奇。我们在第一卷中，曾经采用周东郊先生的投稿，并为之出了一个《新疆变乱记略》专辑。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用稿及对人都能尽力做到无所偏私。第二卷中类似的情形就是孙方成先生的漫画。在第一卷快结束时，我们收到孙先生投来的两帧漫画。那两帧画并不好，但其中略略有一点点“味道”。我就约他来谈，并请他将他过去所爱的画稿全部带来。他的通信处是由一个朋友转的。他并没有照约定的时间来，但终于在迟了几天以后来了。他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化学，毕业后曾在黄海化工研究所任实验工作五年。可是他忽而希望在漫画方面寻觅他的前途。他带了一点仅有的旅费便到上海来了。他说他在上海人生地疏，到上海后第一个给他同情的是西风社的黄嘉音先生。我检查他的画稿，大部分都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发现有两帧，造意和技巧都已够得上英美报纸上的漫画的标准。我考虑了一下，我便答应给他一页地位。我只说了一句话：

“我希望你能了解，像《观察》这样一个刊物，给你一页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很感动。他默默地说：“我了解这点。”最后他走时，我劝他，我希望他专心替《观察》画，不要再向别处投稿，因为“一个人的意思只有这末一点。一个人的精力应当集中，集中便有成就。”本刊所载的漫画不完全是成熟的。然而我知道孙先生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并尽量做得最好。我当初决定给他一页地位，仅仅是因为我在他的画里发见一种“希望”。我们在生命中奋斗了多少年，可是我们很少遇见有力量帮助我们的人，给我们热情，给我们鼓励。在这个社会上，不知有多少青年，仅仅因为无法得到一个机会让他一试，就此埋葬了他的天才！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坟墓，充满了冷酷，充满了阴沉，它只毁灭人，它不创造人！我是在这种情绪下毅然给这个漫画家一页地位，让他一试。而我所以在这篇报告书中化费这么多字记述这段经过，亦仅仅因为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凡有力量帮助他人的人们，能够对一切有希望的青年及其事业，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支持；至少给他们一试的机会。

本刊立场编制，大体上业已定型，我们在此已无新的事情需要报告。原定自第三卷起增辟的《观察一周》，经同人考虑后，决计展缓实现。但自第三卷起，将增设《书评》一栏，业已经约好几位先生分别担任。

事 务

一、一年以来，本刊各期幸能按期出版。无论是过新历年或旧历年，中秋节或端午节，印刷所及装订所尽管放假停工，我们总在事前作适当的布置，以免脱期。去年过旧历年时，印刷所放假至五日之久，但本刊亦未脱期。一切能在事前知道的问题，我们都设法解决；最困难的是临时突发的问題，有时使本社同人手脚无措，譬如自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上海的印刷业及装订业，经常在罢工状态之中。有时正巧我们要上印了，印刷所罢工了，或者正巧要送装订所了，装订所罢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本社同人只要有法可想，总是多方设法，以求按期出版。装订作送刊，经常分为三批，即星期四晚上送一批，星期五上午送一批，星期五下午送一批。有时星期四晚上的一批送了来，我们照例是先将直接定户的刊物漏夜封好，有余再将一部分外埠同业批销的包好。可是星期五突然接到通知，说装订作罢工了。以致定

户的刊物虽然全数发出，而同业批销的刊物却大部分不能发出。最不巧的，同一地点的同业，有一部分凑巧在星期四晚上打了包，其他一部分原定在星期五上午打包的，临时因装订作罢工，无法寄出，以致该地同业，一部分早收到，一部分迟收到，以致引起误会。这种情形虽属意外，确是遗憾。我们希望各地同业赐予体谅，我们并将努力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情形。我们愿意向读者及各地同业诚恳表示，在一切可能的环境下，我们必定竭尽我们的能力，总期各地读者及同业都能按期收到。

二、关于售价，本刊大体上要比其他刊物定得低些，并涨价涨得慢些。譬如别家售二千元时，本刊仍售一千五百元；别家售二千五百元或三千元时，本刊才增至二千元；现在有许多刊物已售四千元，本刊只售三千元。（本期篇幅增加，改售四千元。）即使有几家刊物日前售价仍与本刊相等，但因本刊广告篇幅少，六号字用得更多，本刊容纳的文字数量至少要比别的刊物多五分之一，我们亦仍然可说本刊的售价较他家为低。其实就开支说，本刊开支要比其他刊物略重，但因销路较大，所以售价虽低，亦能维持。我们认为办刊物不是做买卖。我们一方面要顾到本社的收支平衡，一方面也愿意顾到读者的负担。

三、关于稿费，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已调整过七次，自去年今日的千字四千元，提高到目前的千字四万元；增加十倍，约等于一年来一般物价的上涨比率。我们所以经常提高稿费，一方面希望借此使各方面获有一种印象，即我们确是当一件事业在办，另一方面也表示我们时常顾到作者的利益。我个人的办事性格是干脆明白。我平时最讨厌“稿酬从优”四字，因为“从优”两字并无明白的标准，稿子到了你手里，你爱给多少就给多少，这不是一种公道。所以我们的稿费虽然菲薄，但是向例公开宣布，而不半吞半吐不着边际的说“稿酬从优”。不过我们虽然经常在提高稿费，无奈物价跑得太快。自第三卷起，我们再将稿费提高到千字五万至六万元，以后当视实际情形随时调整。

四、定户的来信，仍然是我们事务上的一重负担。我们当努力在最快的效率下一一答复。我们要求读者来信时，姓名及地址的字迹务必不要过分潦草，我们有时收到读者的来信，因为字迹过分潦草，竟致无法复信。有的读者甚至连地址也不附。有时读者在信封上是一个名字，信纸上又是一个名

字，我们复信时不知究竟应写那一个名字。（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只好把两个名字都写上。）又，我们希望各地读者汇款订阅的，最好不要在各省的省立银行汇款，因为省立银行汇款时，他们常常不将读者的附言一并送来，以致尽管收到了款子，还是无法寄刊。有的省立银行甚至仅仅通知本社有款到，何人所汇，甚至款数多少，也不通知，要本社自己去认，符合的就付款，不符的就不付款。但订阅的读者又不一定另外来信，以致我们根本无法取款。目下本社尚存有这种汇款通知单好几笔，都搁在抽屉里。至于来函续订或更改地址而不附定单号码的仍旧很多，要使我们在七千几百号中去找出一个名字，确是一件难事，我们为补救这个缺陷起见，决定开始编制全部定户索引卡片。但是我们仍旧要求读者来函时，尽可能的体谅我们，将各种必要的事项都注明出来。

一 年

我们原定以一年为试办时期，现在一年匆匆过去，我们愿就一年来的经过，综合说明几点感想如下：

第一，本刊创刊之初，各方面纷作推测，或疑本刊与张三有关，或疑本刊与李四有关。今日中国一般社会，似乎一致假定：办一个刊物一定有背景，一定有什么人在出钱。这是一种成见。我们相信一年来本刊所发表的文字，足以证明本刊不仅是一个“无党”的刊物，并且也是一个“无派”的刊物。本刊确实是一个独立而无任何党派关系的民营刊物。在经济上，本刊的发行数足以证明本刊可以自给，无须仰求“外援”，因此我们认为，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给一切怀有成见的人们以新的认识：即办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贴，刊物本身是可以依赖发行收入自给的。

第二，目前一般社会虽然充满着混乱，到处是不合理现象，种种事迹令人悲观消沉，但是我们感觉：假如我们真能正正经经，认认真真，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我们仍旧可以获得若干成就。无论在那一方面，我们都可以以自己的意志、信念和力量，去开垦我们的前途。我们希望一般年青的朋友不要消极，我们一面争取更大的目标，一面在自身范围内切实奋斗。政治的改革是一个方面，社会的充实又是一个方面，两者是并行的，互为辅助的。我

们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大家鼓舞起来，沉住气，在本身的岗位上努力，以充实我们国家的生命。

三，一年来的经过使我深切认识一点：假如一个人他本身是持正的，他在无形中可以抗拒许多邪道的侵袭。我们过去常常听到许多传说，说什么人被“收买”了，或者给他官做，或者给了他钱。我们愿意在此向读者报告，一年以来，政府方面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直接或间接，明示或暗示，向我们有过任何接洽。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绝对维持本刊的超党派性和纯粹民营性。我们并愿在此附带报告，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对本刊施用过任何压力或干涉。

本刊草草，已出一年。在这一年中，本刊的立场、态度、编制、风格以及做人做事的一般原则，大体上已树立一个规模，我们愿意遵循这个传统及方向继续努力，为中国的前途奋斗！

三十六年八月一日 北平旅次

风浪·熬炼·撑住——《观察》第三卷报告书

储安平

经过这紧张的、困顿的、并且富于戏剧性的半年，我们欣幸我们终得向读者宣布：《观察》第三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刊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四卷第一期定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这半年真是一段熬炼人们灵魂的日子，既需要勇气，又需要忍耐。一面是政治性的危机，一面是经济性的压迫——后者尤较前者使我们疲惫吃力。但是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风险，经费如何艰难，我们的一贯方针是：撑住舵、沉住气、向前撑。我们相信，这还仅仅是遭遇困难的一个开始，更大的困难也许还在后面。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整个的局势愈来愈摇摆颠荡，反应在经济生活方面的，也必然是大家愈来愈困难。法币愈来愈不值钱，物价也就愈来愈跳得快。就本刊说，创刊号每份售五百元，一卷二十四期售一千元，在第一卷的半年之中售价只涨了一倍。二卷一期售一千五百元，二卷二十四期售三千元，在第二卷的半年之中，售价亦仅上涨一倍。三卷一期售三千元，三卷二十四期售一万元，在这一卷的半年之中，售价却涨了三倍多（如将发行数的增加和篇幅的减少两点一并算入，这半年间售价的上涨，并不止三倍多），这也可以反映最近半年来各种物价及工价激增的程度。在这一卷中，我们最感重压的就是“纸”的负担。我们曾在三卷九期和十九期上两次专文陈述此事，纸的问题确已成为目前国内文化界出版界最严重的问题。在三卷

一期时，纸价约为三十万左右一令，其后四十万、五十万、七十万、八十万、九十万、一百万、一百二十、一百五十、一百八十、二百，最高曾一度冲到二百三十万一令，在六个月内大概上涨百分之七百倍。现在本刊每期纸的成本，占到每期总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这半年来，我们几乎天天在为着纸的问题焦虑紧张。

排印工及装订工也一再涨价，兹将三卷一期和三卷二十四期各种价目比较起来如下：

种类	三卷一期	三卷二十四期
五号字排工（千字）	四万三千元	十三万二千元（日内又将加价）
六号字排工（千字）	五万元	十五万三千元
印工（每令）	八万元	二十六万元
封面印工（千页）	二万七千元	九万元
纸型（每页）	三万二千元	十万元
订工（每份）	一百三十一元六角	三百〇七元

根据上表，排印工及订工的上涨，在这半年中，约为百分之三百多倍。稿费三卷一期时为千字五万至六万元，现在提高为千字十五万至二十万元，亦约提高百分之三百左右。本社员工的薪金开支，在这半年中，增加的比例很大，在三十六年九月份（三卷一期时），每月员工薪金总额仅七百余万元，现在（三十七年一月份）已达五千万元，一方面薪金本身调整了，一方面业务上的需要，职员的人数也有增加，因此每个月的薪金开支，也成为本社目前一项不轻的负担。其他一切杂项的开支，都随着增加。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中，增加的比率当在百分之五百左右。但售价的增加则仅为百分之三百三十。因为第三卷的发行数，比较第二卷的发行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所以收支两方还勉可求得平衡。

销 路

本刊的发行数，第一卷约为八千份，第二卷一万六千份，第三卷二万五千份，增加的比例约为“一、二、三”之比例。本刊销路如此激增，我们自愧并无任何足堪重视的贡献；一切应归功于作者的支持和读者的爱护；同时也可以说，这充分反映今日国内对于这样一个真正没有背景的言论刊物的需要。

本刊第二卷临末各期发行一万六千份，（二卷二十四期发行一万七千份）。自第三卷起，另在北平出版“华北航空版”，委托北平新实书店代理发行，每期发行三千份。“华北航空版”发行后，在平、津、华北、东北一带，上海本社即停止寄发，但三卷一期，上海仍印一万六千份，沪平两地合为一万九千份；“华北航空版”的发行，使本刊自第三卷第一期起，发行数即从二卷二十四期的一万七千份跳到一万九千份。“华北航空版”在这半年之中，根据北平代理发行人新实书店的报告，迄为三千份，未能有何增加。这可能因为东北及华北各地的战火，使刊物的销路越来越狭，因之难望推广。上海方面的发行数则自三卷一期到三卷十一期，迄在上涨的趋势中，三卷十一期以后，发行数即停滞不前，逗留在二万四五千份左右。战火的蔓延，交通的阻隔，以及售价及邮资的增加，都足以影响刊物的销行。兹将第一卷第二卷各期再版数及第三卷发行数报告如下：

第一卷	第一期	五版	一二二〇份	第十期	再版	一〇一〇份
	第二期	六版	一二二〇份	第十一期	再版	一〇五〇份
	第三期	五版	一二二〇份	第十二期	再版	七三〇份
	第四期	四版	一一八〇份	第十四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五期	四版	一三〇〇份	第二十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六期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二十一期	再版	一二二〇份
	第七期	再版	一三〇〇份	第二十二期	再版	八一〇份
	第八期	再版	一一六〇份	第二十四期	再版	八三〇份
	第九期	再版	八二〇份			
第二卷	第一期	三版	一二〇〇份	第九期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二期	再版	一三三〇份	第十期	再版	九〇〇份
	第三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十一期	再版	一〇二〇份
	第四期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十二期	再版	六五〇份
	第五期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十三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六期	再版	一一六〇份	第十四期	再版	八〇〇份
	第七期	再版	一二五〇份	第十四期	三版	六〇〇份
	第八期	再版	一〇六〇份	第十五期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十六期	再版	九〇〇份	第二十四期	再版	五〇〇份
	第十七期	再版	八〇〇份			
第三卷	第一期		一九〇〇〇份	第十三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二期		一九五〇〇份	第十四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三期		二一〇〇〇份	第十五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四期		二一五〇〇份	第十六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五期		二一〇〇〇份	第十七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六期		二一〇〇〇份	第十八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七期		二二〇〇〇份	第十九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八期		二二〇〇〇份	第二十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九期		二三〇〇〇份	第二十一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十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二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十一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二十三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十二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四期		二五〇〇〇份

按照上表，本刊第三卷的发行情形，前半期是上升的，后半期是稳定的。但是本刊第四卷的发行数是否能够再向上增加，或者是否能够保持已有的数目，我们不作任何乐观的预期。主要的原因是战争使大家越来越穷，而普遍的贫穷使买得起书刊的人越来越少。一方面书刊本身的售价，由于成本的增加，势不能不一再调整，另一方面邮资的加价使书刊在发行上遭受极大的不利——后者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尤较前者为甚。售价的增加，在京沪东南一带比较说来还不发生任何太大的影响。即以本刊目前售价一万元一份来说，现在这一万元在一般都市人民的生活中已无任何重量。在上海，看一场电影连车钱就要花到五六万或七八万，吃一碗最起码的肉丝面连小账就要花到两万元，坐一次公共汽车也要一万元，三轮车夫或黄包车夫对于一万元的生意简直已经不感“兴趣”；说到后来还是刊物最便宜，花一万元买一份《观察》可以消磨一个宁静的周末。但是在远地，情形就不同。远地寄刊，势须航寄。定户航寄，航平每份就要四千多元，航挂每份要七千多元。同业批购，用航挂寄递，每份的邮资平均均合三千元左右。这一笔邮资的负担可观，而这笔负担最后当然仍落在读者头上。远地同业还要加上他们的利润，

这样一来，本刊在后方各城市的零购价格，亦就可观。后方的生活程度本较京沪一带为低，现在却要他们付出较京沪一带读者所付出的更高的代价购买书刊，这个情形所发生的困难，可以想见。本刊在发行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全国性。发行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散布在大后方各大小城市乡镇之间以及远边地区，因之邮资的加价对于本刊业务上所生的影响，大于仅仅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发行中心的其他刊物。因之我们一方面希望后方的读者尽可能的向本社直接订阅，同时我们也吁请全国各地同业，能和我们合作，尽各种方法以减低批购的成本，从而减低门售的价格。我们希望各地同业尽可能的用“航空图书小包”寄递而不用“航挂”寄递，因为“航空图书小包”的邮资只合到“航挂”邮资的三分之一。用“航空图书小包”寄，不一定比“航挂”慢。假如当地同业共同约好，都用“航空图书小包”，则大家仍都同时收到，亦不致增加业务上的竞争困难。此外各地同业在规定本地的门售价格时，我们亦希望他们尽量采取薄利多销主义。过去有些地方的同业利润定得太高，比如在贵阳昆明，本刊售五百元时，他们已售一千五百元或二千元；这样的情形，对于读者、经售书店及出版者三方面都是不利的。我们又希望各地同业对于本刊的门售价格有一个标准，不要把《观察》像一般商品似的有早晚市面不同的价格。譬如在台湾，就有这种现象。当我们售六千元一份时，最先到的一批《观察》，在市面有时喊到台币一百五十元一份（合国币一万四千元左右），过了几天，售价从一百五十元减为一百二十元，一百元，或八十元。这种情形也非我们所愿闻。其实当本刊售六千元时，在台湾售八十元台币，是比较合理的。我们平时一贯的方针是想尽可能的减轻读者的负担，我们要求各地同业在精神上能和我们配合合作。

自从“华北航空版”出版后，华西及华南的读者来函希望我们出华西航空版及华南航空版，以期减低内地读者的负担。在原则上，这不仅是我们愿意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但是出航空版有许多条件，不若想像中那样简单。本社目前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直接派人到各地去自己发行航空版的程度，航空版的发行势非委托当地书业代理不可。但我们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代理对象，代理对象最主要的条件是负责任，守信用，按期和我们结账。假如我们不能按期收回账款，而在各地出版航空版，这不啻是一种“自杀”。我们当然愿意随时留意并尽可能接洽此事，但至少目前还无任何好的消息可以宣布。不

仅没有好的消息，我们反而要向华北读者宣布：我们的华北航空版也终于只能出到三卷二十四期，自第四卷起，不拟继续发行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代理发行本刊华北航空版的北平新实书店未能履行契约，按期和我们清账，拖欠的数目在全部应付的账目中所占的比例太大，而且势必越欠越多。新实书店也有新实书店的困难：战火的蔓延使他们无法推广销路，收款的困难使他们周转不易，北方纸价的昂贵也加重他们的负担；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是同情的，了解的。但就新实书店和我们的“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讲，这样越欠越多的情形，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所以我们考虑结果，只得将华北航空版暂停发行；将来如有可能，再设法恢复。

定 户

关于定阅部分，第三卷中最大的改动是将“按期记账法”改为“硬性规定法”。以前是预收若干订费，一期一期的扣除，款尽通知续定。但定户对于这个办法，感觉不便，一致要求硬性规定：三个月多少钱，六个月多少钱。因为照以前的办法，定户都不容易知道自己的订费什么时候完，以致续定时常常中途脱节。况且硬性规定以后，刊物假如加价，读者即可不受加价的影响，多少可以得到一点保障。我们认为读者的要求非常合理，所以自三卷五期起，即改用硬性规定的办法。

定户在这半年中仍有增加。兹将过去三卷中增加的情形列表如下：

卷数	定单号码	定单数目	实际定户
第一卷	一至二七〇九	二七〇九	一千六百左右
第二卷	二七一〇至七六八二	四九七三	二千五百左右
第三卷	七六八三至一四四一四	六七三二	三千三百左右

根据上表，在第二卷的半年中，订单的数目约为第一卷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左右，在第三卷的半年中，又约为第二卷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左右；增加的比率稳定而有规律，与一二三三卷发行数的增加的比率大体近似。我们向例每一个读者来订，不论是新定户或旧定户续定，每次都给以一个新的定单。一卷有二十四期，但定户有定三个月十二期的，所以每卷的定单总数，并不表示就是每卷的实际定户数目，绝大部分的定户在半年中都占着两个定单号

码，因之我们在第一卷中，实际的定户大约在一千六百左右，第二卷的实际定户大约在二千五百左右，第三卷的实际定户约为三千三百左右。第三卷因有华北航空版的发行，华北的定户大都径向北平方面定阅，不再直接向上海定阅，其间减少了一部分可能的定户数目。

第三卷定户的地域以及职业分布我们援例统计制表如下：（见图）

6732 定户的职业分类



注：此项统计，系根据定单存根编制，故大部分定户职业，无法分类。

6732 名定户的地域分布



注：“华北”包括冀晋、鲁、晋、豫、绥、察热等省。“西北”包括甘、陕、青、宁、新、康等省。“华中”包括湘、鄂、皖、赣四省。“华南”包括港、粤、闽、桂、台等地。

关于征求定户的工作我们实在没有尽力去做，没有主动地去争取。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人手太少，没有专人负责设计推广的责任。我们仅仅在每一卷完了以后，向本刊的读者呼吁一次，希望读者帮我们介绍几个新定户。过去两次呼吁的结果，成绩很好。由于最近物价的波动，我们现在益觉有增加定户的切迫需要。本外埠同业和我们来往的虽然很多，但总不免有拖欠货款或延期付款的情形发生。譬如有些同业，特别是本埠的同业，总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算一次账，而结账时还要给我们“期票”。以目前物价的波动，上一个月的法币价值和下一个月的法币价值，相距极大。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非常吃亏：有时在账面上不赔，而在法币的实值上，等于赔了。这样做下去，我们的资金势必愈来愈小，而终有一天不易维持；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越来越感到周转的困难。因此在本刊一方面，只有设法增加直接定户，才足以保障我们的财务基础。至于在读者方面，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定阅总比零购为便宜。既可避免按期零购之烦，又可避免中间书店所增加的一层负担。譬如以台湾来说，以零购八期的代价，至少可以订阅十二期，定阅明明

比零购为合算，为什么不直接向本社定阅呢？汇款即使麻烦，每半年或三个月也只麻烦一次。我们对于直接定户的刊物，向例提前付邮，比较当地书店早日到达。特大号对于定户并不加价，售价涨了定户也不受影响，本社自三月底起，又将出版丛书，所有本刊定户，一律可享八折优待。我们在此特别向广大的读者呼吁，未直接定阅的，希望赶快向本社直接定阅，已经定阅的，希望再帮我们介绍几个新的定户。本刊的定价，大体上总比别的刊物便宜，就是涨价也比别家涨得慢，这就因为本刊销得多，成本合得轻。所以一个刊物的销路大，刊物与读者两方面都是有利的。帮助本刊增加销路，也就是间接减低自身的负担。一件社会事件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携手合作，大家合作于大家都有利，希望所有关切爱护本刊的朋友们，给我们帮助，自动的、出于本心的、尽可能的替我们多介绍几个新定户。

最近我们常常收到读者来信，建议我们接受读者捐款，以增加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对于这些热心的读者先生，心中不胜感激。但是我们总不敢接受这个建议。一方面，事实上我们到底还没有到非向读者呼吁捐款的地步，一方面我们平时一贯的做人原则是要求公道。“公道”之一，就是权利与义务必须平衡。在读者，无条件的捐助我们，固然是出乎一片热心，但在我们，则不免受之有愧。我们凭什么白白地收读者先生们的捐款呢？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公道，违背我们的良心。我们现在想起：一切愿意捐款帮助我们的朋友，与其用捐款的方式帮助我们，不如用介绍定户或赠送朋友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你们可以订阅几份，分送给你们的朋友亲戚，一方面我们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定户数量，一方面你们的朋友又可因你们的赠送而读到本刊，同时也就扩大了本刊言论的影响。中国还没有赠送刊物给朋友的风气，而这风气在欧美早已十分盛行，并可作为过年、过节或庆贺生日喜庆的馈赠礼品。现在正是阴历年关，订阅本刊赠送朋友最合时宜。一切愿意支助我们的读者先生，请考虑我们的建议。我们需要更多的定户！我们需要更多的定户！

编辑检讨

关于编辑部分，在内容上，大体说来，第三卷要较第一二两卷充实。假如拿第三卷和第一卷一比，印象就极明显：第一卷显得疏落，缺乏劲儿，第

三卷似乎紧凑得多，味儿浓一点。虽然自三卷十期起，我们因故不得不将篇幅自二十四页减为二十页，但自三卷一期起，我们即已一方面扩大版面，增加每页容纳的字数，特别是尽可能的多排六号字，另一方面我们除了封面一页以外，自第二页至第二十页，每一页都已充分利用，整整的十九页都是文章，没有一点浪费的地方。所以，平均讲来，本刊所容纳的文字数量，要比其他页数相同的刊物所容纳的文字数量多出百分之十至三十。我们每期平均总刊载十篇左右文章，有时候登到十三篇之多（读者投书不在内）。这种充分利用每一寸篇幅的结果，至少在数量上可以帮助刊物充实其内容。

《专论》部分是我们最感困难的一栏。说起来，每期三篇，一个月也只有十二篇，但是每期在编辑时，常感捉襟见肘之苦。稿件的不宽裕，一方面使编者不能就各篇的性质加以配搭，一方面多少影响专论栏的重量。我们自问还没有随便发稿填凑篇幅的行为。但是《专论》栏的不够结实，却是我们自己深深感觉到的。编刊物的工作，本来是一件“看人挑担不吃力”的工作，事实上，要期期精彩，篇篇精彩，也确是一件难事。但读者可以如此原谅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如此解释。我们应当再加努力，来增加《专论》栏的分量。

关于《观察通信》这一部分，成绩比一二两卷为佳。在第三卷中，大体上，每期的《观察通信》都还站得住。其中有若干通信相当出色。一三两期中的三篇有关魏德迈的通信，都包含若干特殊材料，特别三卷一期的第一篇，有许多都是根据原始材料——直接从魏德迈嘴里得来的材料写的。三卷七期的《刘伯承南下记》，博得广泛的重视和赞赏，三卷二十一期两篇沈阳通信和二十二期上的成都通信，也可算得好通信。而第三卷《观察通信》栏中最出色亦最受读者推崇的，当然要推本刊专稿关于战局分析的文字。我们希望本刊第四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三卷的标准，除了我们自己继续努力外，还希望全国读者源源惠稿，大家来充实本刊的内容。

国外通信第三卷远较第一二两卷为充实。在二十四期中一共登了十七篇国外通信，这个成绩不该算坏。除美、英、法三国本刊原有的通信网外，第三卷的通信网复伸展至印度的新德里和日本的东京。国外通信不若国内通信那样容易接洽，我们希望国外的朋友们继续帮忙。

外论选译这一卷只登了七篇，太少，希望自第四卷起，增加这方面的材

料。根据第二卷《读者意见书》的统计，读者对于这一栏都有热烈的要求。我们现在已约定专人分担这一部分的工作。

书评是第三卷开始的，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六篇，也不算少了。

关于科学与文艺，第三卷比较第一二两卷有显著的减少。这也是我们根据第二卷《读者意见书》的统计而决定的。读者大都不欢迎本刊刊载科学文字。关于文艺，也有许多读者希望减少，主张由其他文艺刊物负这一部分的责任，认为《观察》应当多腾出篇幅来登政论的文章。因之我们在第三卷上，即很少刊载科学文字，文艺则不规定每一期都有。文艺在第三卷中，平均每隔一期有一篇。同时我们乘此向读者表示：我们的确相当接受读者的意见，并见之于事实。

关于投稿的情形，我们也愿在此附带报告。一个言论刊物本来应该是为全国作者读者所共有的，我们极其诚恳的希望本刊能成为全国作者读者共同发表意见的园地。我们自问在取稿上并无成见，只要文章好，有分量，我们都登。这一卷中，在投稿中录用的很多，尤其是《观察通信》。我们现在发表统计如下：

栏别	第三卷所刊文章篇数	投稿录用篇数	百分比（约数）
《专论》	七十二	十七	百分之二十五
《观察通信》	八十	三十九	百分之五十
其他各栏	八十五	三十七	百分之四十五
共计	二百三十七	九十三	二百分之四十

《读者投书》一栏本来是供给一般读者发表意见的，但发表的意见应以与公共生活有关或有公共的意义者为限，纯然属于个人生活的诉苦，不在录取之列。提出的问题太限于地方性质的，我们也不一定能发表，因为投书很多，其间不得不有大小轻重之别。对于任何个人的批评，应以政治性质的批评为限，不应涉及法律性质的私人攻讦。最不能使我们同情的一种投书，就是不负责任的攻击任何机关或个人的投书，投书人既不署名，也无地址。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极其自私，极不公道。投书人如有必要，可以不署真名，但必须将真名及地址，让编者知道，投书人至少应对编者负责。这一点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接受。

政治危机

在第二卷《报告书》中，我们曾宣布：“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对本刊施用过任何压力或干涉。”三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我们第一次遭遇政治性的困难。毛病出在三卷九期所写的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上面。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物对于这篇文章，引起极大反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行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停止《观察》的发行。主管官署上海市社会局曾以公函召本刊发行人于十一月七日在社会局谈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秘书长于十月二十七日来访未遇，后来约期于十一月九日谈了一次。两次的谈话都没有什么严重。除此以外，则未有任何人（无论是否代表政府，代表国民党，或以朋友身份）和我们谈过有关《观察》的问题。正在社会局和市党部方面约我谈话的时候，听说中枢已有急电到沪，致吴国桢市长、方治主任委员、潘公展议长及吴开先局长四人，不主张查封本刊。这个案子似乎应该可以过去了，但十一月十一日的晚上，编者个人的安全发生困难，不得不被迫暂时离开原来的寓所。

新闻界有许多朋友对于本刊极其关切，上海市党部要求查封本刊的消息最初是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们的。南京的急电，不主张查封本刊的消息，也是另一位新闻界朋友告诉我们的。十一月七日，南京天津两地的报纸首先揭露本刊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其后上海、香港、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报纸陆续记载此事。新闻报道引起各地前辈、朋友以及读者的殷切的关怀。由于各方前辈朋友发乎内心的支持所形成的道德力量，使事件至十一月下旬渐渐地缓和了下来。

在这一个风浪时期，本社同人始终照常工作；编者虽然暂时离开寓所，但工作并未中断，因此本刊仍得照常按期出版。环境纵有波折，我们的心境始终宁静。在我们的心底里，我们有一种无可摇撼的信念：我们必须本着我们的良心，为祖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们一切都为了国家，除了国家，我们另无其他。请看今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终日，究为何事？争得脸红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是为了几张钞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经糟到这个地步，假如我们每个人还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盘、转念头、绞脑汁，我们的国家怎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谁管？我们

不敢妄自菲薄，随波逐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也有我们的勇气，向前迈进，义无所辞。人与人的相交，经久知心；刊物与社会的相交，亦复如此。只要我们自问无他，我们亦不需战战地顾虑他人有无误会？仅仅站在一党一派的利益上来打击我们的，那只是一种过失；国事糜烂，已至于此，我们还有何暇来计较这种过失！

我们今日所处的一个社会，是一个神经极度衰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谣言、曲解和没有根据的忧虑。各地既遍传本刊被封的消息，而又看到本刊仍旧按期出版，于是以为其中必有“道理”。这情形可以香港读者梁子奇君投书中所引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主办的香港《华商报》所刊的消息为代表。香港《华商报》的记载云：

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曾于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九期上刊载了储氏所作的一篇《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痛骂美帝国的援华是要变中国为美国的附庸，顺便骂了南京政府。……南京当局在十月十日左右就下令封闭《观察》。此时储安平就以“失踪”闻，但是《观察》并未停刊，反出了一个“言论出版自由”的奇迹。奇迹的出现，是因为储安平“失踪”到陈立夫李惟果公馆里请罪悔过，表示改变言论态度的结果。CC们所以能允储安平悔过自新，是因为《观察》已拥有三万个读者，是全国第一流的杂志，CC们如不加以利用，不是饭桶了吗？而储安平亦可利用已在读者中获得的“公正”态度，在观察上发表“偏私的不健康的”言论，以赎前愆。……

（按：本刊三卷九期的出版日为十月二十五日，不是九月二十五日。要求封闭本刊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是南京的中央党部。要求封闭本刊当在十一月初，不是十月十日左右。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纽约《华侨日报》也刊有与香港《华商报》同样的记载，文句一样，大概是同一来源。）

在通常情理之下，假如编者真的到过陈立夫李惟果公馆去“请罪悔过”，假如本刊真的出卖给什么人了，我们还居然刊载梁子奇君的投函并一字不改的转载香港《华商报》的记载，那我们假如不是天下的大奸雄，亦必为天下的大傻瓜。可惜我们既然才不及奸雄，自问亦不致愚如傻瓜。编者和李惟果先生是在最近一年中新识的，编者和陈立夫先生，至少到今日为止，无论在

私人酬应或公共集会上，还没有晤过一面。编者在那一个时期也没有去过南京。我们的一贯态度是我尽我心，不求人谅。打击来了，以宁静坚定应变，不以张皇失态应变。当十一月十一日夜晚十一点多钟，我因为无处可住，要到某处寻觅一宿，踽踽独行，经过外滩江边，想到这个地方白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何等热闹，而这时江水泊泊，大地如死，整个的人世被托在一片月色中，构成一幅凄凉的人生画图时，我心中亦仍宁静雍容，既不悲伤，亦无忧虑。意外的风浪竟然使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假期，利用难得的闲暇，整理学校的讲稿，写信和朋友叙旧，并获得机会在太阳中作时间较长的沐浴。好汉做事，来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也不急于辩护、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跟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刊物幸能继续存在，但许多人又说我们的态度已经“转变”了；这也是目前这个神经衰弱的社会中极易发生的心理状态。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评国民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左倾”了；要是你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右倾”了。整个的社会已陷入一种严重的神经错乱程度。譬如本刊第二卷第二十一期登了读者杨光时君等十位投来的一篇文章后，许多人便传说《观察》右倾了。这次查封之说既成过去，便有人以为《观察》转变了！我们对于这一切传说，素不作任何辩护，我们认为最好的解释与辩护就是每期《观察》的内容。举一例言之，当我们业已知道本刊已发生政治危机时，我们对于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来的关于民盟事件的宣言及董时进先生投来的对于民盟事件的评论，毫不犹豫的照常发稿，在心中绝无任何有关利害得失的考虑。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也不因此事而减少我们在理知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扇我们，我们不会

被人扇得动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其方向。

我们认为我们在第三卷中所遇的风浪是一个极寻常的风浪；大的风浪也许还在后面。我们在此感谢一切在此次风浪中，无论是出面的或不出面的前辈和朋友，他们的支持使本刊终得解危。我们同时感谢一切关切本刊的读者，他们的热心和同情增加我们努力的勇气！一切帮助本刊的朋友们，我愿我们的努力不致辜负你们的期待！

（三十七年二月一日上海）

政府利刃 指向《观察》

储安平

南京《新民报》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以后，连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闻界又盛传本刊将继《新民报》之后，遭受停刊处分。我们业已在多方面证实此项传说。听说当局最初想一口气“解决”几个在他们认为眼中之钉的报纸、杂志和通信社。其后因为《新民报》的查封令发表以后，各方反应不佳，所以第二个查封本刊的命令迟迟未下。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本刊命运，存亡难卜；我们愿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对政府公开说几句话。

一、政府现在自称“行宪”，并在“行宪”以前，大吹大擂，说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从此中国，就要换个局面。其实，上海人一句话，大舞台对面“天晓得”！我们希望政府当局，抚心自问，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人身之无保障如故，集会结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论之遭受摧残，只有变本加厉。即以本刊而论，虽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说一言难尽。或者禁售，或者检扣；经销《观察》的，受到威胁；阅读《观察》的，已成忌讳；甚至连本社出版的“观察丛书”，也已成为禁书，若干地方的邮检当局，一律加以扣留。读者申诉，日必数起，谅解我们的，把政府痛骂一阵；不明实情的，责怪我们何以款到而书不寄；每读来函，如坐针毡。此种情形，不仅《观察》一家，其他同业，亦有同样经历。我们创办刊物，献身言论，其目的无非想对国家有所贡献。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组织既极繁杂，其活动尤极错综，全赖所有分子，群策群力，各在岗位，有所建树；分而言之，各尽一己之献；合而言之，充实国家之命。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

吏，受民之托，出而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在朝执政和在野论政，其运用的形式虽异，其对国家的贡献则一。所以欧美民主国家，在国会里无不有与政府相对的反对党，在一般社会上，亦无不有健全的公共舆论：如无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见，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衔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舆论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髓所在。今兹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于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于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议政，务使一切民间报章杂志归于消灭，尤可谓糊涂太甚。抑有进者，批评政府与不忠国家绝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条，谓不得有“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记载，这种限制，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所谓“颠覆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让新的政府上台之谓也。以言英国，邱吉尔执政时，工党固无时无刻不处心积虑以求邱吉尔政府之颠覆，现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诋，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礼无罪也，今日之邱吉尔亦无罪也。再观美国，杜威华莱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鲁门之垮台乎，未闻有美人入杜威华莱士于颠覆政府之罪者。就说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现在则称为中华民国政府，此岂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颠覆，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谓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颠覆矣，然则亦有人蒙颠覆“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说来说去，实在说不通。但是我们的政府，一看见有人批评它，便脸红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颠覆”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无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无可更改者。拆穿了讲，毫无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拖下来，于是今天想封这家报馆，明天想封那个刊物，说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就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发言论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刊物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剥夺人民这种权利。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现在大家不满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静气的想想，你们

过去所作所为，对于国计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于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无不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叫大家不讲话，不出悲愤之言，这是做得到的事吗？在政府里供职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时一开口就希望我们多做建设性的建议，其动机固不能谓不善，但是请问，今日的时代是一个建设性的时代吗？今日政府又是一个建设性的政府吗？请问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坏性的工作，我们发为建设性的言论，政府能采纳吗？又能实行吗？我们一贯的态度是希望结束内战，这难道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我们这个建议吗？今日普天之下，皆无饭吃之民，无衣穿之民，无屋住之民，我们现在建议，请政府给无饭吃的人以饭吃，无衣穿的人以衣穿，无屋住的人以屋住，这不是又一个天下第一号的建设性的建议吗？然而政府能采纳之而一一见之于行吗？再退一万步说，就说本刊三卷十三期所刊陈之迈先生所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国内外读者广泛的重视，并誉为一极有建设性的文字，然而该文发表以来，已八阅月矣，政府果曾采纳实行吗？政府果能励精图治，做几件福国利民的事，则又何惧乎民间舆论之抨击；如果政府百事不为，只管自私，则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诟！今日大局日非，政权浮动，政府欲加紧其政治控制，取缔一切不利于政府的言论，就其自私之立场言之，固未尝不近情近理，但就解决国家之困难而言，固南辕北辙，无补实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会的动乱因而影响其政权，则政府应以有效方法，以苏民困。民困得苏，社会之动乱自平，此与封不封报纸杂志，风马牛毫不相关。重庆抢米，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宁波抢米，又是出于报纸杂志煽动的结果吗？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转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不相信封了一个《新民报》，再封一个《观察》，社会即能趋于安定。《文汇报》被封，业已一年，社会秩序又何尝因《文汇报》被封而稍改善。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了！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大家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一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是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吃重·苦斗·尽心——《观察》第四卷报告书

储安平

我们在一种既无幻想、亦不泄气的情境下宣布：《观察》第四卷业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刊两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五卷第一期定八月二十八日出版。

这半年是一个苦痛的半年。物价的高压，带有政治意味的中伤，以及当前政治环境的险恶，无不使我们在这半年中，身心交瘁，困惫不堪。然而我们在无比的忍耐和沉毅中，终于又苦斗了半年。照大势看，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写《观察》第五卷的卷终报告书，但是我们愿意向读者保证：只要本刊存在一天，我们必定努力一天。

开 支

我们仍旧先从业务方面说起。我们在第三卷报告书中，已经盛言物价波动和币值贬落的情形，可是在第四卷中所遭遇的困难，远较第三卷为甚。在第三卷的六个月中，支出方面，排印工及订工仅上涨百分之三百，稿费上涨百分之三百，员工薪金增加百分之七百，占支出中最大比例的纸，亦仅涨百分之七百，收入方面，售价上涨率为百分之三百三十。在第四卷中，情形大大不同，在第四卷的六个月中，各种支出，增加的比例，要较第三卷的六个月中所增加的比例，大上六七倍。现将各项数字列表于下：

种类	四卷一期时	四卷二十四期时	上涨百分比（约数）
纸（每令）	二百五十万	四千一百万	百分之一千六百
五号字排工（千字）	二十万	四百五十万	百分之二千二百
六号字排工（千字）	二十三万	五百三十万	百分之二千三百
印工（每令）	四十二万	九百五十万	百分之二千二百
纸型（每面）	七万五千	一百七十万	百分之二千三百
订工（每本）	三百〇八元	八千元	百分之二千六百
稿费（千字）	二十万	四百万元	百分之二千
员工薪津	五千余万（二月份）	十四亿（七月份）	百分之二千八百

上例开支，排印工及订工的价格，在六个月内一律上涨百分之二千二百以上（即二十二倍）。纸的上涨虽然仅达百分之一千六百（十六倍），但由于发行数的上升，纸在整个成本里所占的比率，愈来愈高，目前纸在每期全部成本中，已占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所以纸价的上跳，我们感受的压迫极大。稿费的调整，上涨率为百分之二千（二十倍）。员工薪金的增加，一方面包括待遇的调整，一方面也包括人员的增加：业务既繁，人手势须比例增添，所以薪工的总开支也跟着增加。至于其他杂项开支，如水、电、电话、煤气、房金、文具、车费等，上涨的百分比也很大。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之中，增加的百分比平均当在百分之二千倍以上。

销 路

本刊的售价，四卷一期是一万五千元，二十四期是二十万元，上涨的百分比是百分之一千三百强。本刊是一个民营刊物，平时全赖业务收入。但是开支在半年中上涨二十倍，而售价仅上涨十三倍，这个差额，就靠由于发行数急剧上升所增加的利润来弥补。本刊的发行数，第一卷平均为八千份，第二卷一万六千份，第三卷二万四千份，照过去三卷的比例，第四卷的理想发行数应为三万二千份。但是刊物的发行数越大，它的上升的可能比率越小，加之售价一再调整，所以我们从来就不敢希冀第四卷的发行数能够超过三万份。当四卷一期印二万四千份时，我们心中，以为假如在第四卷中，万一能够销到三万份，那就是很好的了。但是在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形下，本刊的发行数急剧上升，终于造成五万份的纪录。但是至少在编者自己，对于这种销

数急剧增加的情形是没有什么兴奋的；相反地，销路的急剧上升，只有增加我们的不安。我们平时一向愿意“向最好的目标去努力，向最坏的结果去着想”。我们愿意事业循序发展，不愿意一步跨得太快。至少上海的许多书报业同业可以证明，我们曾一再要求他们减少批数，因为我们并不愿意销路跳得这样快。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事业，我们应当求根基的牢固，不应当仅求表面的膨胀。爬得快的人跌得也快，膨胀得快的事业垮得也快。也许编者这种性格太“保守”了，但是对于一个务实重行的人，过分意外的膨胀，确不是他心理上所能骤然接受的。同时，销路的增加也增加了编者所担负的担子，而这种担子，事实上已超过了 he 所能负担的能力！销路越是增加，编者发稿的斤量越重，他深感每一篇文章，每一句句子，发到印刷所去，无形中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摆在编者面前的情形，常常使他深夜自省：他已经不适宜做这样一个五万份刊物的主编，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已经跟不上刊物的发展了。他常常在脑子里思索，有没有什么适当的人可以来主持这个刊物，他愿意做一个助手。这绝不是夸大的谦虚，编者的确常常为此惭愧，他觉得他已力竭智拙，有些对不住这个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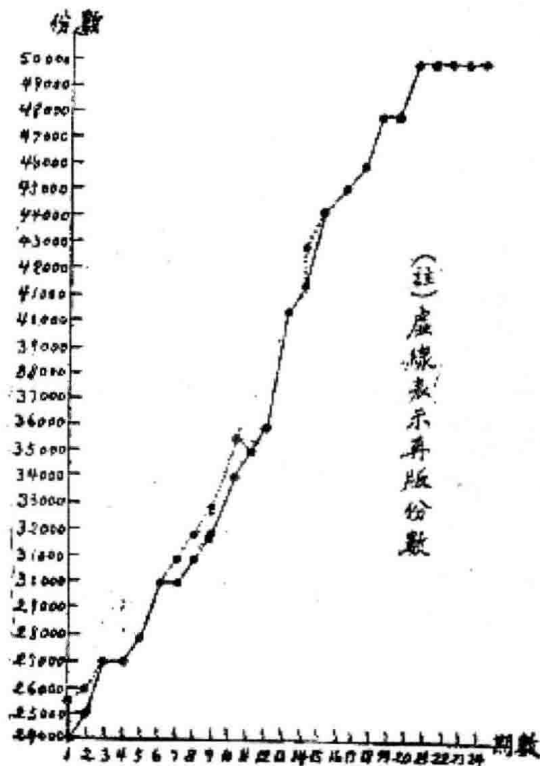
从另外一点来说，一般朋友都认为这个刊物确已打进了社会。本刊的主要读者约可分为三类：即青年学生（包括教育界人士）、公务员（包括军人）以及工商界人士，除这向来有的三种主要读者以外，这个刊物的影响已向多方面的放射出去。政府高级官员的阅读本刊，已极普遍。我们并不是说，政府高级官员阅读本刊，足以增加本刊的身价；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讲到后来，本刊究竟是一个政治性的刊物，本刊应当打进他们的阅读生活。军人方面看本刊的也越来越多，多到几乎要在本刊原有的三大类主要读者以外，成为另外独立的一类了。广大职业群众，这些群众平时甚至可说没有任何阅读习惯的，现亦接受本刊的影响。湖北沙市的一个香烟摊贩曾有读者投书寄来（未刊），台湾一个农夫，受了当地党政人员的压迫，也有投书寄来（未刊），南京一个印刷所排字工人也有文章寄来（刊四卷十九期），我们在上海亲自知道的，确有许多平时根本没有阅读习惯的群众，现在也要每星期买一本《观察》看看。去夏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招生，公民试题有“试评日常所阅读的日报及刊物”一题，绝大多百分比的投考中学生都阅读《观察》。我们两年来夜以继日的努力，总算收到了一点小小的效果，但是树

高招风，影响越大，招的忌讳也就越大，这也是无可避免的。

回到发行数上说，目前虽然销到五万份，但是由于航空邮资的一涨再涨，以及售价的期期提高，我们相信第五卷的本刊（假如不被查封的话），发行数是一定要下降的。在我们自己，我们希望回跌到三万份左右，假如我们能够稳定在三万份左右，我们就已经很满意的了。究竟如何，且看事实。现在将这半年来本刊各期印数及第四卷发行曲线表附刊如下：

第二卷	二十三期	再版	八六〇份
第三卷	第一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四期	再版	七五〇份
	第六期	再版	一一〇〇份
	第七期	再版	一一〇〇份
	第十期	再版	一一〇〇份
第四卷	第一期	初版	二四〇〇〇份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二期	初版	二五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三版	一五〇〇份
	第三期	初版	二七〇〇〇
	第四期		二七〇〇〇份
	第五期		二八〇〇〇份
	第六期		三〇〇〇〇份
	第七期		三〇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八期		三一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九期		三二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十期		三四〇〇〇份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十一期	三五〇〇〇份
第十二期	三六〇〇〇份
第十三期	四〇五〇〇份
第十四期	四一五〇〇份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十五期	四四五〇〇份
第十六期	四五〇〇〇份
第十七期	四六〇〇〇份
第十八期	四八〇〇〇份
第十九期	四八〇〇〇份
第二十期	五〇〇〇〇份
第二十一期	五〇〇〇〇份
第二十二期	五〇〇〇〇份
第二十三四期	五〇〇〇〇份



定 户

在第四卷中，定户也增加得很多。我们过去十分希望我们能实实在在有六千个甚或八千个定户，但是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定户和我们所希望的数目相差很多。第一卷中的实际定户约为一千六百名，第二卷约为二千五百名，第三卷约为三千三百名。我们在第三卷卷终征求定户的目标是八千名，由于许多读者的热烈支持，这个目标终得在第四卷中实现。在没有举办半价定户以前，定户数已接近七千五百名，半价定户举办后，定户的名额骤然增加了一千五百多定户，达到了九千名左右的纪录。在整个的发行数目中，定户数目在全部发行数中所占的比率，大体上亦甚稳定，兹列表如下：

卷数	定单号码	定单数目	实际定户	发行数	定户数在发行数中的百分比
一卷	1—2 709	2 709	1 600 左右	8 000 份	20%
二卷	2 710—7 682	4 973	2 500 左右	16 000 份	15.6%
三卷	7 683—14 414	6 732	3 300 左右	24 000 份	14.7%
四卷	14 415—28 940	16 086	9 000 左右	50 000 份	16%
半价本	1—1 554				

16 086 名定户地域分布表



16 086 名定户职业分类表



关于定户部分，这半年中最大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停收六个月的定户，一件是举办半价定户。停收六个月的定户，完全是因为物价波动得太厉害，为保障本刊的健康，不得不如此。举例言之，当四卷一期未出时，预定六个

月仅收二十万元，但现在一期就要售二十万元，读者可以想见，假如我们再继续接受六个月的定户，则本刊不知要赔累到什么地步，实际上，照最近物价这个样子的波动，我们连预定三个月都有些踌躇，不过为顾到读者的方便，不好意思再将三个月一定改为二个月一定罢了。（最近日报已决定半个月一定，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足见物价压力之深。）不过自四卷十八期起，我们也将过去“十二期收十期的钱”改为“十二期收十二期的钱”，借以略略弥补由于物价波动太烈而致蒙受的损失。凡此都是很不得已的，只好请定户原谅。

我们久想为清寒读者有一点服务，所以决计在福利金项下拨一部分款子出来举办“半价定户”。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半价定户自四卷十三期起举办。我们原定名额一千名，但事实上，超过了预定名额百分之五十，共计一千五百余名。“半价定户”，我们的本意是为清寒读者所设的，我们并希望以三分之一给予清寒的学生，三分之一给予清寒的公务员（包括军人在内），另以三分之一给后方小城市中的读者。但事实上很难作硬性的分配，而且，这一千五百名的半价定户中，是否个个都是“清寒”的读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证实，所以我们只好在增设半价定户的启事中，最后一条提出良心的呼吁，希望“如非经济极端困难者，幸勿占取‘半价定户’名额，以免剥夺真正经济困难的读者的权利。”但是“良心呼吁”在这个年头，到底有多少效果，实可怀疑。譬如上海一些商业公司里的职员，也来定“半价本”，照普通情形来说，以上海生活程度之高，又在商界供职，论理可以订阅普通本，不必订阅半价本。又如同济大学有一个寝室里倒有四个人来订阅四份“半价本”。照我们的意见，假如他们经济宽裕，便应各定普通本，假如经济困难，便应四人合定一份半价本。但是现在社会上，有便宜货便大家搨，既不尊重举办人的原意，也不顾到是否剥夺了他人的权利。这种情形都使我们伤心。此外，定阅“半价本”的，上海因为近水楼台，容易捷脚先登，所以这次的半价定户中，上海及上海附近的读者，占绝大多数。真正后方偏僻角落里的读者，能享受“半价本”权利的，反而寥寥。我们心为不平。我们现在决定，自第五卷起，仍旧继续举办“半价定户”一千五百名（额满截止，不再通融）。但为保障真正清寒读者的权利起见，过去那种自由写信来定，没有一点限制的办法，势须修正。我们现在业已印就一种表格，凡是清寒的

读者，希望享受“半价定户”的权利的，请先来函索取表格，填就寄下，由我们审查，通过后才给予订阅“半价本”的权利。这个新办法当然增加我们自己很多的麻烦，并亦增加我们的开支（如表格，复信，审查的人工等），但我们举办“半价定户”的目标既在使真正清寒的读者得到阅读的权利，所以我们亦不避麻烦，务使订阅半价本的读者，都是真正清寒的读者，同时使我们为真正清寒读者服务的初衷，亦得贯彻。

“观察丛书”

“观察丛书”虽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观察丛书”和《观察》周刊是配搭平行的，成为本社目前两大主要业务，并为一般读者共同关切，所以在此略作报告。我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周刊只能刊载短文，并且大都是有时间性的，所以我们另出丛书，以便容纳较有系统，字数亦较长的著作。（二）有许多作者，有著作物出版，而找不到比较合适的出版人。所谓合适的出版人，包括水准严谨，出书迅速，印校认真，版税正确等等条件。由于我们过去一年多来和各方作家的合作，他们对于我们业已建树良好的友谊和充分的信任，所以我们愿意来担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现在一般出版界都很消沉，大家都很少出书，《观察》周刊略有赢余，我们的目的既然不在谋利，愿意以周刊的赢余来帮助丛书的出版，使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并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已出九种，大体说来，各方对于我们的努力，批评良好。各位作者对于我们的出书迅速，印校认真，以及版税的迅速，一致表示满意；读者的反应可于各书预约之多及销行之畅见之。吴恩裕先生的《唯物史观精义》在十天之内销完初版三千册，现已出到四版。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载誉一时，现已出到四版。张东荪先生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一个月以内销完初再两版五千册，现已三版。其余各书大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再版。这些情形在目前的不景气的出版界中，都算是不多见的。

不过，“观察丛书”也不是没有缺点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新写的太少，大部分都是集子。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困难，由于环境的动荡和生活的不安，已很少人能够好好地坐下来写整部头的新书了，这也是一时之间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我们以后当尽力设法增加新写的数量。

此外，还有几件事要一提的：（一）通常出版人和著作人所签订的出版契约，都是由出版人一方面拟就印好的，开列了几十条，把保护出版人的利益的地方，想得周周到到，而著作人只有在印好的契约上签字盖章，毫无发言的余地，甚至契约签了，书隔了两年三年不出版，著作人也毫无办法。我们认为这种情形是不合理的。出版一本书，乃是著作人和出版人的一种合作，对于契约，应当双方都有发言机会，所以我们这次的契约，是由我们先起了草，寄张东荪、潘光旦、朱自清、费孝通四位先生，请他们发表意见，（就请他们四位代表后来的作者），然后才缮写签字的。（二）我们的版税最初规定是一年结算四次的，于三、六、九、十二四个月月底结算之。第一批六册是四月五月出版的，第二批是七月八月出版的。在通常情形下，第一批六册的第一次版税一定是在六月底付的，第二批四册的第一次版税是在九月底付的，但第一批六册的版税，我们在三月底就付了，第二批四册在七月里就付了，原因是因为各书发行预约，预约收入中的百分之十五应归作者所有，应归作者所有的，出版人不应搁下不发。在目下物价的情形下，假如应当三月底付的款子搁到六月底再发，那作者真是损失太大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信用及公道的问题，我们办事或做人，都应当 Fair。（三）不仅如此，关于版税的结算，我们鉴于六七两个月中物价上跳的情形，认为三个月一结还是太慢，作者吃的亏还得太大，因之，在七月底我们又进一步的，又一次为中国出版界创一个新的纪录，决定自八月份起，“观察丛书”的版税每月结算一次。我们希望我们这种努力能够对于中国的出版界有一点影响。（四）“观察丛书”出版后，我们收到许多书评，投寄《观察》周刊。但我们为避免嫌疑起见，我们已订下一个原则：《观察》周刊不刊观察社出版的任何书籍的书评。以上数事，都与整个出版界的风气有关，所以我们愿意提出报告。

最后，“观察丛书”是赔本的，即使销路如此好，也还是赔的。（因为纸价跳得太快了）。但是在业务上虽然是赔本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关于丛书的出版，我们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只是照目前的物价情形，我们简直不敢再在此地有所报告，举例言之，我们出版何永佶先生的这本《中国在戡盘上》，成本要用到二十五亿以上！事情真不好办！真是太难办了！

业务上的苦痛

业务上的苦痛，一言难尽，现在择要分述如下：

1. 照编者两年来的经验，纯粹就业务的观点说，上海出版事业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本地同业的结账办法。上海本地的习惯，是先将刊物或书拿去，隔若干时候再结账付款，在半年以前，我们要在出版以后一个月，甚至一个多月才收到钱。假如物价不跳，出入还小，现在物价波动得这样厉害，这种结账办法，就变成了我们的生存威胁了。举例言之，今年阴历年关一过，纸价陡然的从一百七八十万（一令）跳到五百万一令，在短短半个月中上涨三倍；六月里，纸价又在短短半个月中，从六百万跳到近二千万；七月初，又接连从二千万跳到四千万。物价这样一日三涨，要在十几天后才收到货款，在收到货款时，一块钱只值半块钱甚至只值三角钱了，所以在二月及六月的两次纸价大涨风中，本刊亏折很多。有一次《大公报》举办出版事业座谈会，文摘社的贾开基先生说：现在销路越大的刊物其危机越大，碰上涨风，赔得越多。这是内行的话，一点不假。在读者方面，他们都是按照刊物定价实付的，在我们的账面上，也是有利润的，但是实际上则赔了本，就因为在这十几天后才能收到货款，那时物价已涨了很多，收到的钱甚至补不进原来用去的纸张，以致不能维持再生产的程度。假如一直这样下去，刊物迟早要弄到关门的。所以这半年来，我们在这方面费尽口舌，力求改善。上海同业事实上也有他们的困难，我们也十分了解，所以我们愿意和他们一步一步改善，我们总期我们能够维持再生产的最低要求，因为假如这个最低要求不能达到，出版事业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2. 这半年来业务上第二件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有许多地方的定户，收不到刊物。最大的原因就是有许多地方已有出面或不出面的邮政检查制度，经常的或间或的检扣本刊。这种现象很普遍，其中以沈阳、天津、青岛、西安等地情形最严重。这些地方的定户纷纷来函责难，并要求补寄，但补寄的事实上仍旧不能收到。弄到后来在我们方面是复不胜数，补不胜补，在定户方面是责难四起，一片怨声。我们真是苦痛极了。除了“邮检”的原因以外，也有由于中途遗失或者被人误取，因而使定户不能收到本刊的。在读者方面，他们的观点很单纯，认为凡是收不到刊物，好像责任就得由我们

来负。又有些地方，竟会两期同日收到，甚至先收到下一期，后收到上一期的，在这种情形下，读者总疑心是我们没有准期出版。在九千份的定户管理中，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绝无错误或疏忽，假如真是由于我们的错误或疏忽，我们应该向定户道歉，并力求改善，但是假如把一切收不到，或者不能按合理的时间收到的责任都归之于本社，那是冤枉的。从本社发出到达定户手里，其中要经过许多路程和阶段，在这些路程和阶段中所发生的意外，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这样解释，目的非在推诿责任，我们仅仅希望定户能够了解事实并给予我们体谅。至于我们有错误或疏忽的地方，我们自当随时改正。

3. 定户的来信始终成为本社工作同人最大的负担。来信的内容很杂，最主要的两类就是查失索补和更改地址。刊物遗失的责任不完全在我们一方面，前已言之，但是除了像沈阳、天津、青岛、西安那种大批邮扣，无法补寄以外，其余零星的索补函件，我们大都体谅定户，设法补寄。不过我们愿意在此说明，关于补刊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苦恼的。不补吧，定户自然不满，而且他们残缺一期，定觉遗憾，补吧，不仅是刊物本身的成本，还要包括信袋和邮资，我们的损失是很重的。这个问题真是无法两全。

至于更改地址，我们当然应该照办。不过我们也要解释几句：一、我们每收到一个定户，就要给他一张定单，同时根据定单用蜡纸写成签条，然后油印。所以定户更改地址，我们必须重行写印，所需的人工、蜡纸、油墨、纸张，这笔额外的负担不轻。二、我们每次寄刊，虽于星期五付邮，但是由于定户太多，剪贴标签的工作，在星期一，甚至在上星期六，即须开始，标签剪下以后，即按平寄、挂号、航平、航挂四种分类，分类以后，要在几千个分散的标签中寻觅一个，就不容易了。所以，举例言之，即使在星期三收到一个定户的来信，要求更改地址，在这个定户自己，以为本星期六的一期必可照新地址改寄，而事实上，我们常要到下星期出版的一期，才能照改。定户不知实际困难，每多来函责难。三、有些定户，在定阅三个月中，要更改地址二次甚或三次的，我们虽然应当照办，但是对于我们确是一重负担。〔譬如在上个月（七月），由于学校放假了，平均每天都有二十个至三十个定户来函更改地址〕四、目下交通情形并不正常，刊物的改寄和定户本人的移动，有时不免要脱节，这种情形也只好请定户忍耐原谅，不要一味的责怪我们。

4. “复信问题”是最难使读者满意的一个问题。许多读者为了此事对本社表示不满，或者因为我们搁而不复，或者因为我们复得太迟。我们愿意说明几点：一、我们承认我们过去的复信工作没有做好。编者自己是最恨有信不复的，所以平时一再叮嘱本社同人：读者来函，务必答复。工作同人当然有他们实际上的困难，如来信太多，来不及复等。但是事实上有困难，应当设法解决困难，这是本社内务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内部的困难就将读者的来信搁置不复，（实在没有复的必要的信可以不复）因为假如复信工作做得不好，则无形中就等于在破坏本社的信誉，减低读者对于本社的信任，并抵消本社全体同人在其他方面的努力。所以我们从第五卷起，决定将复信工作，另派专人负责，以免延误。二、来信的太多，其中一部分责任仍应由我们负责，因为假如我们能改进我们的工作效率，如减少错误，避免疏忽，复信迅速等等，则亦可减少来信的数目，所以我们仍应在根本寻觅原因，以期减少来信的数量。（因为大部分的来信都是查询或质问的。）三、我们虽然尽我们的本分，力求改进，但同时也希望读者和我们合作，有许多信件可以不写的，最好不写，俾可节省双方的时间，现举两例说明：芜湖安徽学院有一位朱建纲先生，三月二十四日来函查问四卷四期为何没有收到（他是挂号的）。查四卷四期是三月二十日出版的，在目前的环境下，上海到芜湖的邮件，偶而不能在四天之内到达，也是一件很可能的事情（挂号本比平寄慢），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希望定户稍为等待一下，勿径函查询。（像这种信件，我们认为可以不复的）。又如，广州中山大学有一位定户，是新定户，当他看到广州市上已有《观察》出售，而他的一期尚未收到，便来信质问，实则广州市上出售的是航空寄去的，而他的一份是注明要挂号寄的，挂号的当然比航寄的慢。像这类自己没有弄清楚而即来信责难的，例子很多。至于因不注明定单或字迹潦草到无法认清，以致我们无法查或无法复的信件，为数尤多，凡此我们都希望定户体谅，能自行注意，俾间接增加我们的办事效率。四、我们虽然对于复信问题，力求改进，但我们也愿让读者知道，我们复一封复信，成本也是相当大的，平均言之，复一封信至少要化成本十五万元左右。假如以七月份为标准，一个职员月薪是一亿，则每天的薪金是三百三十万，一天平均复四十封信（因为不仅复，还要查），则每封信的人工成本就要八万元，再加上信封、信纸、邮资及收发人工，当在十五万元以

上。这样的负担也不算轻了！

最后我们自己也知道，在最近三四个月中，我们得罪了不少读者，这是我们极其苦痛，而又无法可想的。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物价的过度的波动，几乎使我们无法维持正常的营业，特别是购买丛书的，款到时，书价又涨了。假如买二本以上的，还可以以书款迁就书价，譬如本购五册的，给他买四册，本购四册的，给他买三册，购者虽然扫兴，但总算有一交代，最困难的是只购一册的，于是只好去函请其补款，可是购者并不立刻将款补来，搁上十天半月才补，补到时，书价又涨了！像这类情形，真是伤透脑筋。定户也是如此，由于物价变动太剧，本社登记定户，计算刊费，均照款到时订费为准，但由于订价变动太快，以致定户来款，常常不足，只好酌扣寄刊，读者每不了解，表示不满。

编辑检讨

关于编辑部分，这半年也是苦痛之至。先说专论。按理说，本刊是一个政论刊物，重心应当在专论部分。可是事实上呢，本刊的重心现在已移到《观察通信》上面去了。读者来信或朋友见面，都盛称《观察》通信的精彩，但是我们读了这种信，听到这种话，内心暗自惭愧。当然，我也愿意很公平地说：专论不像《观察通信》那样容易“讨好”读者，因为通信是雅俗共赏的，专论是硬性的、高级的，不容易使个个读者接受的。不过，本刊专论的不够充实，也是事实。一个原因是好文章本不易多得，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大家对于写政论文章，已经没有什么兴趣。编者在四卷二十期《政府利刃 指向〈观察〉》一文所说，现在大家都十分消沉，没有兴趣批评政府，这话确是实际情形。像我们这些办刊物的人，因为职责所在，不能不写，但是一般而论，现在许多人对于当前的局面，都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张东荪先生最近在《增产与革命》一文中开头有几句话，很可代表这一种趋向。张先生认为“时局严重已超过了说话的阶段”，而“向现实的当局说话”，则“自政协被破坏以后久已不做此想”。这一种趋向也多少影响到稿件来源。编者自然应当尽心尽力，应征佳稿，但是有无成就，不敢先说。

第四卷中比较满意的仍推《观察通信》一栏。编者在第三卷《报告书》中说：“我们希望第四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三卷的标准”。大体说来，这

点算是做到的。观察通信中最出色的当然是军事通信，也就是这些军事通信，使政府一再对《观察》表示不满，而企图加以封闭。据在政府供职的人说，为什么《观察》的军事通信写得那样好，又详细，又正确？他们说，假如《观察》的军事通信写得不那样正确，政府倒可以不必那样怀疑了！这个逻辑似乎是：政府认为一般社会上的人都是饭桶，只有共产党不是饭桶，所以《观察》的军事通信因为写得太好了，就不免要疑心到共产党一方面去了。其实真是天晓得！过去《观察》有几期军事通信对傅作义稍有颂扬时，左派的记者（《时代日报》）还公开的不负责任的说，说《观察》是傅作义的宣传机关呢。此话真是从何说起！

除《观察通信》外，第四卷中的《国外通信》和《外论选译》两栏，还算正常。国外通信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六篇，平均每三期中有两篇。《外论选译》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三篇，平均每二期中有一篇。我们希望第五卷中也能保持这个状态。

一般读者对于《书评》一栏的兴趣都不高，本卷二十四期中只登了六篇。

由于物价的高压，自四卷十九期起，篇幅减少，仅出十六面。减少篇幅的目的是为了不愿增加读者的负担，但是在编辑上，对此苦痛不堪，因为篇幅减少了，容纳的字数比例减少，文章不能多登，无形中使读者容易发生内容不够充实的感觉。有许多读者来信表示反对，愿意多负担售价，不愿我们减少篇幅。但是来信的读者大都是江浙一带的读者，不知后方的读者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如何？第五卷起，究竟恢复二十面或仍出十六面，我们希望读者表示意见，以供我们参考。

关于投稿录用篇数在全卷所刊文章中所占的百分比，大体上和第三卷差不多。我们愿意在此说明，《观察》的篇幅是绝对公开的，我们十分希望这个刊物能够真正成为全国读者所共有的刊物。我们不希望一个刊物仅仅只有少数的作者在写稿，而且为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公共舆论，也必须有广大的群众大家来参加，才能增加其力量，因之我们经常盼望有新的作者来参加这个写作的阵营。我们对于投稿，认真阅读，取舍绝无偏私，只要合乎水准的有重量的文章，我们无不乐于刊载。我们希望各地作者读者踊跃惠稿，共同来充实本刊的内容，第四卷中投稿录用数在全卷所刊文章中的百分比，现在

统计如下：

栏别	第三卷所刊文章篇数	投稿录用篇数	百分比（约数）
《专论》	六二	一八	30%
《观察通信》	七六	二九	40%
其他各栏	九十	四一	45%
共计	二三八	八八	40%

流言与警告

在政治上，这半年来我们始终蒙受不利的打击；大别言之，可分两类。一类是飘浮在空中的无根的流言，一类是当局对于本刊的警告，甚至有查封本刊的意图。先说谣言部分。谣言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笼统的怀疑我们和当局有什么“勾结”，一类则简直很具体的传说本刊已出卖给什么人什么人了。怀疑我们和政府有“勾结”的人的理由是：假如《观察》和政府当局没有“勾结”，为什么《观察》会出版到现在？特别是四月八日《大公报》登了《时与文》和《世界知识》被政府警告以后，这种怀疑格外普遍。因为《观察》不仅没有“问题”，甚至警告也没有，其中必有“花样”。其后我们又听到更为具体的谣言，谣言竟然肯定地说，说《观察》已经出卖给CC了。凡是一种谣言，向例当事人是不大容易听到，或者听到时也已传很久了，因为只有很好的朋友才愿意将这种谣言告诉当事人。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流言时，也只是淡然一笑，其后传说渐盛，有一位关切本刊的读者写了这样一封信来：

编者先生：最近好多人都纷纷地说《观察》月前曾经与CC派谈判过出项事宜，结果以CC只肯出价六十亿而未果。我倒不相信这些话，我只相信你的人格和脾气，但是，为了正如你所说的“这社会是一个神经极度衰弱的社会”，而且人言可畏，我劝你不要太对这种已经散布得颇广的恶意流言不理不睬。最好你能在四卷十三期中拿一小角来辟谣。

一高中学生 五月十七日

PS 记着，一定要辟谣啊！

我们读后，对于这位“高中学生”当然是很感激的，但是冷静考虑后，我们仍旧不愿有所表示。其后又有朋友自南京来函，文云：

久不晤教，近况何似，念念。近日道路流言，于先生颇为不利，金言贵刊因已得官价配纸，态度渐趋转变。先生之清操亮节，弟所深知，然啧啧烦言，三人成虎，亦不免于惶惑矣。弟于此事，至为关切，盼能以详情见示，用释鄙怀，忝在知交，当不以为渎也。

谣言是那一方面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也无意知道，假如是由配纸而起，则四月二十六日苏联方面在沪主办的《时代日报》的出版消息有下列一段记载：

《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日前赴京列席国大，已于日昨返沪。闻该刊自下月起，新增配纸一百八十令，合共三百令，故将在百物飞涨时维持旧价云。

编者曾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四卷九期上写过一篇《国大评论》。编者是想评论国大，曾去南京，借了朋友的来宾证，到国大会场旁听一次。就是中共办的《华商报》，也常刊南京通讯，所以到南京去采访新闻，想来不致被视为和政府有何勾结。编者在《国大评论》文中曾述及我曾到国大会场旁听过的话，故《时代日报》所刊编者赴京一节，仍系根据编者《国大评论》一文而来。但在普通常识上，旁听与“列席”有很大的分别，《时代日报》称我为“列席”，究系笔误，还是另有意味，我弄不清楚。至于配纸，众所周知，都是每季一配，向无每月一配之事。这半年来，我们向书业公会提过好几次抗议，就是六月二十五日，我们还去了一封信，说我们在四、五、六三个月中用了一千一百令纸（周刊及丛书），而他们仍给我们三百元配额，只够买六七十令，仅敷本社实际需要量的十六分之一。说到头来，自有配纸制度以后，截止今日为止，我们一共还只拿到一百三十令纸，（仅敷本刊半月之需）。假如《时代日报》该项记载，是一种恶意的中伤，那末我们承认，他们的确相当成功了，因为文化界中到处都在传说，说“《观察》配纸增加了，态度转变了。”最妙的是，天津《益世报》的上海记者，把《时代日报》这个全无根据的消息，全文照抄，打了一个电报到天津。我们曾分别正式去函《时代日报》及天津《益世报》更正，除此之外，我们无意作任

何辟谣的解释。我们还是一贯态度，如我们在第三卷《报告书》中所说的：“我们对于一切误会、传说、曲解，不急急于辩护、辟谣或解释。只要我们自己脚根站定，我们相信‘时间’终将替我们洗刷一切谣言。”

关于政府方面对于本刊的种种，编者不十分详细，兹谨就所知者，报告如下。三月二十日，编者接上海市政府新闻处来函，邀去一谈，当在上海市府新闻处看到了内政部给《观察》的警告，罪状是“言论偏激，歪曲事实，为匪张目”。这个公文是我亲眼看到的，不过有一个谜始终不能解答，即这个公文我们始终没有收到。当四月八日《大公报》载《时与文》和《世界知识》受到警告时，我们心中还暗自疑心，以为新闻登错了呢，因为内政部警告本刊的公文，是编者亲眼目睹的。不过我们后来也没有去查理此事。由于最近传说政府打算查封《观察》，我们才知道在二三月间，有人已想查封本刊，但内政部未将查封命发出，可能这就是那个警告令的来历。目前政府对于《观察》最伤脑筋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军事通信，据说在最近半年，政府中好几方面的高级会议，几次讨论到这个问题。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极其严重。我们的军事通信实际上也只是报导事实，但事实的发展，常于政府不利，所以政府认为我们这种暴露性的文字，颇足影响士气。最近南京《新民报》被封，政府曾公布一篇罪状，据传《观察》也有同样的一张单子，把过去我们所刊的文字，一一开列。对于封不封的问题，编者已在《政府利刃 指向〈观察〉》一文，表明态度，此处不赘。政府对于《观察》当然是讨厌的，也许从“军事通信”开刀，在技术上最为顺口。不过目前所有的刊物，大都刊有有关战局通信，假如因为刊载有关战局的通信而要查封，则恐怕将来所有的刊物，都只好被封大吉。我们不知政府对于这种情形，即每一个刊物都有战局通信这一情形，如何处理。至于本刊，这半年来，有人好几次劝我们不刊战事通信。我们的原则很简单：对或不对，那是政府的“权力”，但我们绝对不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我们在商标上标明 Nonparty 和 Independent 两字，Independent（独立）是我们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们所以如此者，就因为我们认为：要维持完整的人格，必须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时局分析

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

王芸生

我天天关心中国的时局，尤其时时在追究中国的前途。就目前所有的资料，以参证当前的大局，我以为中国的时局前途有三个去向。

（一）南北朝。这是中共所要做到的。在去年秋胜利到来之时，毛泽东先生应邀到重庆，国共谈判了四十多天，未曾谈得拢。其中距离最远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重划军区问题，另一个是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到最近马歇尔与司徒雷登的联合声明，使调人痛感棘手的，还是这两个问题。这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据国共双方于去年双十节签字的《会谈纪录要点》所载的第九项云：“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初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为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这里边重划军区的计划，实际可以说是一个江淮为界的南北朝。双十纪录发表之后，毛泽东由重庆飞返延安，中共的军事行动就转趋积极了。在江南的共军，迅速撤至江北。在广大的北方，打山西的上党区，打绥包，打同蒲东段，积极向山东扩张，大量向东北渗入。那时共军的高潮，大有不能取之于樽俎的，而必得之于疆场，以实力做到其所要的。绥包之败，山海关之挫，使这计划受到了一些阻挠。到今年一月停战令下，政治协商会议举行，衣裳之会，隐蔽着戎车行动。无论停战令下，或者政协协议，军事实未曾停。北

方一直在打，而东北更是阴云重重，这情形一直发展到夺长春，占滨江龙江，而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及至四平街决了战，共军连弃四平街、公主岭、长春三大据点，复趋低潮，于是停战运动大起。南京的谈判，宣布了东北停战十五天，又延长停战八天。这二十三天的停战都过去了，更是大打起来。半个中国，烽火连天，无论高潮低潮，紧打慢打，一个南北朝的运动，是在有力的进行着。这是中国时局前途的一个去向。

（二）十月革命。中共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主观力量还没有这么大；但是客观的条件却在赳赳进展着。一、政治搁浅到解体。今天国民政府治下的政治，一片搁浅现象，恹恹无生气。循良的公务员待遇低薄到无以维持肚皮，相对的就是贪污公行，滔滔天下，廉洁成了难能之事。再不振作，再不有为，则弄到政治解体，实非不可能。二、经济恐慌到崩溃。这问题更深刻了。今日中国的经济，一面倒的靠洋货输入；国家的财政，又一面倒的靠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工资奇昂，人民憔悴，工业窒息，独独发了官僚资本与买办阶级。政府天天在饮鸩吸毒，人民天天在挣扎呻吟，如此下去，则洪水到来，经济崩溃，已经不是太意外的事了。三、最后是军事。现在国民政府的声光，实际是靠着中上级军官对中共还有一股敌汽之气。但，这是不很可靠的。因为抗战既经胜利，中国人打中国人，实在不能持久维持士气，尤其士兵生活之苦，拖久了，难免要生变化。士兵一声撂枪，中国的十月革命马上出现，就是国家大乱。所以无论为政府计，或为国家计，都不能再打，都不能再拖了。再打再拖，必将更加重政治经济与军事三方面的危机，最后搞成国家大乱。这可能是中国时局前途的又一个去向。

（三）政协协议之路。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原是当前中国极理想而又很艺术的前进之路。一幅国是前进路线图，设计得原不甚差。不知怎的，刚刚签字的协议，墨沈未干，便你吵我闹，弄成一文不值，一条也不曾实行。第一步的改组政府未曾实行，至于开国民大会，议订宪法，更加谈不到了。政协的五项协议：一、改组政府；二、和平建国纲领；三、军事问题；四、国民大会问题；五、宪草修正原则。其中改组政府一项是要领。政治协议的政府改组，因为各党派都参加，是联合性的；用这个政府筹开国大，以制订宪法，然后实施宪政，举行民主大选，所以这个政府也是过渡性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

个去向。

以上三个去向，毫不踌躇的，我们希望能够走上政治协议的路线。

现在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加速度的向“国家大乱”疾趋。怎样避免大崩溃，大糜烂，而走上和平统一民主进步之路？我以为其中还有几个症结应该注意：

第一，国民政府先要力事清洁有效。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做到清洁有效，一切施政无例外的变质，富了官僚买办，苦了民生，则纵使有足够的武力，能否永久维护其政权，是有疑问的。

第二，国民党应该深刻了解民主宪政的路，是需要高度的宽容与高度的智慧的。国民党肯不肯接纳一部中央政府受立法节制及地方均权的民主宪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关键。

第三，美苏对立的形势，对中国现局最为不利，最好是解消这形势。我们所能为力的，是在外交政策上力维均衡，而莫一面倒。

第四，最后，需要中共将来甘心做一个民主政制下的宪政的党。

(八、二四、上海)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傅孟真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这句俗语正是今天中国的现状。“淤泥”是劳苦大众，虾米是公教人员，小鱼是小生意人，大鱼便是大资本家。

但，大鱼也分好多类，有三尺长的大鱼，不堪鲨鱼一击，有鲨鱼，不堪长鲸一击。今天长鲸有两个，皆凭借政治成就；在生长中的还有几个，要看后来政治是不是落在他手。大有水中一切皆入鲸鱼腹中之势。

“官僚资本”一个名词是抗战时候的产物，还是我的朋友某教授造的，当时的中心对象是孔祥熙，现在大家注意宋子文多些了，但也决不当忘了孔祥熙。现在我解释这名词一下。

现在必须分辨三件东西：第一，国家资本；国家资本的发达是走上计划经济、民生主义、温性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所以如果办得好，我是百分的赞成。这些年国家资本相当发达，但内容和表面大不相同。从表面说，铁路除中长为俄有外，几全是国有（除去宋家与洋人要修的成渝铁路等）；航业则招商局，压倒一切民航；航空号称民营，实是国家资本；主要的银行全是政府的（四行二局）；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

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英国现在工党所行的社会主义政纲，好多我们已经实行了，例如铁路、银行、主要工业之国有，我们都作了，然而结果不特愈弄得去社会主义愈远，而且去任何有效政体、像样社会也愈远，其故皆在人事，不在国家资本之基础观念上。

第二，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在中国真发达极了，上自权门，下至稍稍得意稍能经营的公务员，为数实在不少，这几乎包括中国的资本阶级及上等布尔乔亚。西洋的布尔乔亚总是投资在股票或债券上，中国工业不发达，已有者又破产，谁玩股票？债券是靠国家信用的，今天还说得上吗？中国过去官僚总是投资在田地，今天田地是个大累赘，谁肯？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

第三，权门资本。权门资本本是官僚资本之一类，然而其大无比，便应该分别看了。这些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 Sound Business 的，极肤浅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其效能与注重工业远不如三菱三井，而其支配力过之。

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以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但“世家”二字，我曾打听他的故人，如严庄监察使，那就真可发一笑了。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利则归己，害则归国者，例如某某几个私家银行，在战前不能支持了，由政府入官股维持，两三年前他准许这几家银行退还官股，以当时一元当战前一元！所有这些银行在收到官股后所获的利益都不算了，这简直是拿国家的利益直接的、毫无掩盖的送人；其实并不是送人，而是送己，因为其中某某几个银行他都有支配力。不幸事机不密，为若干参政员所知，于是参政会大闹几阵，“此说作罢”，但真正罢了未罢，以

后谁来查过？至于扒手之说，决不冤他，即如中央银行国库局案，人证物证齐全，虽说政治上使其搁着，因为已经“退还”（试问小偷强盗退还赃物，是不是就算了事），法律上并未完结，因为原告并未撤消。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言归正传，我们能知道多少呢？尤其我这与经济无关之人。办这样事，那有不严密的呢，然而八年参政会已经闹出那些事实来，铁幕也有漏缝之处，然而漏缝之处究竟所窥有限了。其实人既活着，即不留心，也不能无所见，请看扬子公司，进口那样好，他结外汇何以那么容易呢？资产遍中外，是他祖宗的钱吗？若说“久宦必富”（在天津因接收案被枪毙的故海军上校刘乃沂答辩的理由），我看，这些年来久宦，如何可以必富，尤其是满天的富，除非用某些某些办法。

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有时仿佛像是有政策的，战前也曾吸收过若干社会上认为可以有为之人。上海的“高等华人”战前有不少信服他。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国民党整天谈“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国营”，……宋子文做了国民党的沙赫特，尽管他相信他的 Sound business，也应该稍许有个样儿，然而完全与这些口号相反的。

不谈国有国营则已，要谈则第一件要国有国营的便是公用事业（public utilities），偏偏我们要“宋营”。现在全国电气事业，除冀北由资源委员会接收外，其余均非国营，而且走上了集中垄断的路。如戚墅堰电厂（垄断京沪之间），首都电厂，以及武汉之既济水电公司等，均为建设银公司所有之扬子电气公司经营。人人皆知建设银公司姓什么。

煤矿在原则上亦应由国家经营，因为他是动力的来源。中国煤矿除胜利后在东北及热河接收者外，皆非国营，北方的多为北洋军阀官僚所营，本是国民党北伐时打倒的呼声之一。现在扬子江东区之唯一大煤矿，即淮南煤矿，也是建设银公司所营。最近江西之鄱乐煤矿，又为建银所买到。四川某煤矿，又以另法支配。现在北方局面未平定，一经定了，北洋军阀多已破落倒出去，由谁买，是可想的。

说到这些事，煤矿，电厂，本由张静江先生之建设委员会而来，当时是

国营，因为建设委员会是等于政府一部的。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一下而入于中国银行，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这中间，也许有他的“合法”手续，凡创朝代都是合法的。

再说到建银，由一个美国人来华造计，原为吸收外资的，尤其是美资的，美资并未吸收着，定了一个不利的成渝铁路借款。本来是官股，许私人入股。现在我不知道还有几分官？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以上的这些，政府若对得起人民，该去清算的。

难道宋子文不谈国营吗？他是谈的，现在有他的资源委员会。办资委会的人，确也认真办事，绝不能说贪污，然而赚钱的事业既已“另有办法”，看看他的事业单子罢！东北工业，在那样情势中！抚顺毁坏，北票不安。铜，铁，电气材料，机器，无一不是无办法，或非赔钱不可的。所以这些国营，这是“国赔”而已。资源委员会也得设法自食其力，于是经营到台湾糖（专利），自行车，肥皂，蜡烛，……资源二字定义如此！

宋也“为国家”营了一件“赚钱”的事，就是中纺公司。那些反对他这事的，本也多是要白接收（“抗战工业或非工业家”）又请流动金的，并不可取，然而他营的成绩如何？号称去年一月一百亿归政府，今年一月三百亿，算是赚钱了罢？然而想想，一百五十万纱锭，全无代价，一切生财，是接收的，美棉用官价结，数目那样大，消耗外汇那样多，如是报效政府仅仅此数，真是得不偿失，这叫赚钱吗？说是平抑纱价吗？又不然，纱布价在生活必需品指数上为先锋。他又说了，中纺只占百分四十，商家涨了，他无法控制，这真左右前后均不能自完其说了。年底分红那么大，是有益于国？假如当年把这一百五十万锭卖了，不白送人，法币回拢，要比黄金政策多得多，纱价还不是一样高，反正他自己说他不能控制。还有一妙，因为“人民”为此事吵死，他又说，将来发股票卖给人。假如分开卖，有人买的。现在合成一个托辣斯，他捷足先登控制着，谁来买他，买就是捐款给他，这不又是自欺欺人之谈么？

这样说下去，多着呢，今天止于此。现在说结论。

豪门资本这样发达，中国几无国家的形象。三菱三井把日本弄到这样子，太惨了（虽说是日军阀作祸首，然财阀如不发达，军阀无能为力）。他们还是几代（从江户时）辛苦建立的，不像我们的这样“直接”，天下人怨

怒所集，如何下得去？今天欢迎孔宋当国者，只有一派人，即共产党和他的尾巴，因为二氏最可使中国紊乱的。我们不愿我们的国家成五胡十六国，成外蒙古，我们实在不能欢迎他。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垮，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

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在位者要负责的。他的自由买卖，彻底失败了。顶好的说，你总不能用甲思想作反甲思想的事，何况他的思想是由于他的 vested interest？

这还不能算完。今天我们要觉得晋惠帝不愚，因为他听到公园里蛤蟆声，他问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我们必须清算十年的事物，哪些是公而私的，哪些是私而公的。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我在参政会如此说过。有些报纸说我说，二家财产够国人过一年美国人生活水准，那是他们说的，说过与不及一样坏。）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到民国五十一年还他们本息，他们要的是黄金美钞，到那时都可以的。你们饶国家十五年，给一个喘息的机会罢。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致）通过。

有朋友问我，你说孔宋不好，张嘉璈何如？我说，何止张嘉璈，连那些“自由计划经济家”，无知低能的“民生主义哲学家”，等等都是愈弄愈糟的！我对于过去的万忍不住，对于将来，我并非^①“政治经济病菌学”专家。

这篇文章全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一卷七期八期）可与此文参看。（编者按：已见本刊本期《观察文摘》一栏）

^① 疑为“并不是”。——编者注

国民党往何处去？

杨人楩

孙中山先生建立三民主义及其组织国民党，目的在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三民主义、国民党与中国民众三者必须彼此配合：主义是理想，党是实现主义的工具，中国民众的福利才是主义与党之目的；离开了目的，主义与党都要失却其存在之理由。

国民党掌握中国政权已二十年，其成绩是功过互见的。正因有功，便该小心翼翼，不要弄到功为过掩。二十年来虽然有若干阻力使它不曾畅行其志，但一般而论，其政权是相当完整而自由的，二十年之时间亦不可谓不长，然其统治的结果却未能与中国民众的福利配合，和孙中山先生手创三民主义时所悬的标准，距离甚远。

拿政治上的贪污而论吧。“打倒贪官污吏”原是国民党所曾用过的口号；到了今日，政治上的贪污，已属司空见惯。贪污之声，我们已听得太熟了，熟到感觉麻木，麻木到忽略其为一切无办法之源。贪污，兵役才弄得怨声载道；贪污，物资才会感到人为的缺乏；贪污，交通才会陷于麻痹状态；贪污，鸦片才无根绝之可能；贪污，教育才会弄到退化而无进步；贪污，税收才弄到黑漆一团；贪污，才有所谓官僚资本，黄金的市价才有想象不到的波动。总之，贪污使一切无办法；什么新的政治方案与设计，都是白费气力。政治上如此贪污，该谁负责任呢？

今日政治上的各层机构，都操纵在国民党手中；这是事实。国民党党员的数目确实有多少，我们原不必去探究。民国十四年仅有五十几万党员的国民党，十五年便已增到六十几万，可见国民党自北伐以后，党员数目之增加

是很快的。第五届中委会颇注目于“吸收”党员的工作，六中全会报告半年中征求的结果达四四九四七七人，仍感不无缺憾，而七中全会则云征求党员的结果，“较六中全会以前大有进步”。一个政党的党员自然希望能够多，然而多则不免于滥，尤其是业经掌握政权的政党。

国民党的领导人物自始也顾虑到这一点。民十五年在长沙市党部，蒋介石先生曾指明党员“必须品行高尚，操守廉洁，为党尽忠，不愿做官发财，富有牺牲精神。”二十七年临全大会时，他又说明“党是党员组织而成的，机体不健全，当然是因为分子不健全”；更以严密党纪、唤醒党魂、发扬党德来指导党员。同时，他更指出党的缺点是组织松懈，纪律废弛；党员的缺点是生活松懈，工作懒散，“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闹私见”。这一类指导竟未能为党员所接受，因而他在五中全会指出党务之六大缺点，而说：“驯致党部渐渐的衙门化，党员变为官僚化。……以致外间刻薄一些的人，批评我们党员入党为‘靠党’、‘吃党’。……一般党员……往往不能尊重本党政府的法令，甚而至于凭借党的名义和地位，随便凌越干犯。……有责任互相推诿，有义务只求避免，甚至争名争利，对内磨擦，对外骄惰，自失地位，自损威信，不能够为一般民众的模范，反为社会所轻视。”二十八年正月，他又在中央党部说明党和主义不能离开的道理，更用党外人士的观感来警惕党员：“他们看我们党部就是衙门，看我们党部委员就是官僚，看我们一般党员当作特殊阶级，甚至视同亡清时代之旗下人。‘衙门’是什么？……就是一切昏庸腐败污秽罪恶的渊藪；‘官僚’是什么？……就是贪污偷惰敷衍虚伪的总名称；所谓特殊阶级与旗下人的意义又是什么？这就是说，不知振作，不能生产，脱离民众生活，倚赖特殊关系，以游惰为生的寄生分子。”五中全会闭幕时，他又指出了党员易受外界讥评的四大缺点：（一）生活不够刻苦，（二）态度不够谦虚，（三）取予之间不够谨严，（四）作事精神不够勇气。

根据上面所引的这些话看来，可见国民党领袖对于党员之指摘，并不亚于党外人士。国民党中何以会有这许多不健全分子呢？北伐以前加入的，多半是比较健全的，因为彼时有牺牲而无权利；然而也有不少党员变质。北伐后加入的，有些是笃信主义的后继生力军，有些是因入党而便于为国家尽力的事业家，同时也有不少希望从中取利的投机分子。国民党曾防范这些投机

分子，但他们主义背得烂熟，不但能突破种种防范，久之且可反客为主。党治下的政治机构，更刺激起他们的活动；中枢及地方各级官吏既有非党员不可之势，于是党员资格成了做官的先决条件。临全大会所决定的党政关系三原则，给他们一个做官的捷径，只要能透过党，便可走上宦途。政治上的贪污，也许只是这些投机分子的罪行，可是这笔债却写在整个国民党账上；在党治下的人民看来，国民党至少有失察、纵容甚至庇护之咎。纵容贪污的党治，与民众福利自不免背道而驰；五届三中全会开幕时，蒋先生曾谓党如不能为民众谋福利，“势必使民众对本党失去信仰，对革命发生厌恶；党若失了民众的基础，革命如没有民众的同情，党那里还能生存？”临全大会时，他又说：“因为这样，党在社会上生不起作用；各级党部的委员及一般党员，都不能接近民众，既不知道民众的疾苦，也不知道解决民众的疾苦，党与民众隔离得很远。……党在实际上不能帮助民众，当然不能够领导民众，民众感觉不到党的存在于他们有什么好处，不但对党冷淡，甚至要生反感。”

事实上，国民党已受过分子不健全的教训。自国民党完成为公开的政党以后，“热心革命者，固群然趋之，而慕势争权者，尤欲先登捷足，党员数量，骤然大增”（邹著《国民党史稿》页一三〇）；故袁世凯一经得势，“党员登报脱党者，尤日有所闻”（同上，页一四六）。十二年国民党改组宣言中，不能不提及“党员附逆，议员卖身”的往事；经过这次改组以后，国民党才因分子健全而健全，才能完成北伐事业。可是，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因为努力吸收党员，遂不易防止投机分子之乘虚而入。投机分子原具有无孔不入的本领，现行党政关系复使他们有可乘之机，加以党纪废弛，他们自然能为所欲为。关于党纪废弛，国民党也觉得是无可讳言的，故蒋先生在临全大会开幕时说：“在纪律方面说，党从没有纠正党员的错误，或行使制裁。”五中全会的决议案，也不得不承认：“征诸往事，每因人事与感情之牵制，而使纪律废弛，姑息者或不免缄口不言，执行者或不免丛怨嫌集，致党无整个纪律之表现。”

我们根据了国民党领袖的言论，知道了国民党的本身已是如何的不健全，党的纪律已是如何地废弛，党已是如何地与民众隔离。任何政党在既经取得政权以后，当然要竭力保全其政权；假使它不能在积极方面将其政纲兑现，不能因谋人民的福利而博得人民之同情与拥护，便只有在消极方面设

法：拿新的政令来恢复人民的信仰，拿宣传来减少人民的反感，拿恫吓来制止人民的抗议。这些方法或能收效于一时，终非治本之策：新的政令可能被人民视为一种政治手段，不兑现的次数太多，人民对之根本就会不存什么希望。宣传的本身就是笨拙的，“请来听我宣传”所能得到的答复便是“又在宣传”；其实，清明的政治就是执政党之最好的宣传，而口与笔原是反对党所当利用的武器。至于恫吓威胁一类的办法，其效用至多只等于苟延残喘的强心针，欲赖以恢复健康是绝对无望的。国民党应如何恢复其健康，原是国民党内部的事；可是，国民党在事实上最近是不会退出实际政治的，则其内部的决定，都能与全国人民福利有关。一个掌握政权的政党，既能自承“党无整个纪律之表现”，则其对于外间的意见，可能予以考虑。假使“旁观者清”一语的确有点道理，那么，我们愿就旁观者的立场，以友好的态度，向行将开幕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三点不妨加以考虑的意见：

第一，先须重整党纪，健全自身组织，使之成为真能与民众福利配合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时，陈英士先生致黄克强先生函中有云：“顾自斯党成立以来，旧日同志，颇滋訾议。以为多事变更，予人瑕隙，计之左者。不知同盟结会于秘密时代，辛亥以后，一变而为国民党。自形式上言，范围日见扩张，势力日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犹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操戈同室，人则何尤。是故欲免败群，须去害马；欲事更张，必贵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谅中山先生惨淡经营改组机关之苦衷否耶？”孙先生对国民党恳亲大会训词时亦云：“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为加入本党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党的分子，便非常复杂。……照本总理看起来，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时至今日，国民党是否有接受其前辈教训的勇气呢？清党运动时，它敢于排除已有严密组织的共产党分子，为什么要容忍这些“不良的分子”，而不敢将其淘汰呢？

第二，今后一阶段中的统治，应以获得人民的信仰为第一；一再否认而毕竟见诸实行的政令，一再强调而毕竟又不能实践的诺言，都是自损威信。唯有具体的事实表现，始可不烦宣传而使人民相信国民党是个可能为人民谋福利的党。这期间，千头万绪，是颇费抉择的；人民今日已经苦到这种地

步，有目共睹；如何使人民复苏，当然是其中之最迫切的一着。人民需要和平；和共产党斗争与其用武力，不如用政治；不如在政治上有显著的事实，表示其确为安定人民生活的清明政治。政治上果能一新耳目，则宣传与恫吓一类的拙劣手段，均可弃而不用，自易获得人民的信仰，因而取得人民的同情与拥护。

第三，国民党既已决定还政于民而实施宪政，便该调整今后的党政关系，以表示其具有领导民主运动的诚意的决心。依照三民主义的指示，国民党有领导民主运动的义务与责任；倘其不愿放弃这个领导权，便该立即放弃其“以党统政”及“党政融化”的原则。国民党既曾提出“国家至上”的口号，则国应高于党，而不应有“党国”之说；国与党的界限应有分别，国与党的功能不容混淆。例如教育是国家的事业，应无所谓“党化教育”；事实告诉我们，党的空气最浓厚的学校，往往不是办得最好的学校。国民党如能健全其组织，自易吸收青年党员，是则三青团一机构是否是多余的呢？如谓其目的在增进青年之修养，这无异是侵越了教育的功能；国家办学校之目的，岂非限于知识传授而已吗？国民党既已与民众隔离，则青年团亦可能与青年隔离。三青团常有不良分子杂入，其嚣张之气往往是和其他学生磨擦之源；而其侦伺教师之思想行动，妄行告密，尤使站在教师岗位上的人寒心！教育是国家的，其他若干事业也是国家的，凡是属于国家的事业，国民党要和普通人民一般予以尊重；国与党的界限分清，党员才能明白其所当努力的分际，才能真正领导人民实施民主政治。

目前是中国问题演变得最厉害的时代；在这演变中国国民党究应往何处去呢？途径也许很多，而目标却只有一个：不能离开中国民众。一个政党离开了民众，必将失却其存在之理由；国民党如欲施展其解决中国问题的抱负，只有针对着这个目标。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有促使执政党重视民众的责任；我们希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勿专注于枝节的议案而忽略了根本！

从世界潮流论中国出路

伍启元

对于最近国内“适应潮流”与“符合国情”的讨论，我们既不赞成单纯的“适应潮流”，也不赞成单纯的“符合国情”。我们认为“国情”必须符合，因为任何政治经济的措施都离不开客观的环境，离不开实际的情况。任何超时间超空间——即不合“国情”——的政策都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同时认为“潮流”必须适应，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一切不能不受世界潮流的影响，任何违反世界潮流趋向或“倒行逆施”的政策，也都是有害无益的。

但“国情”与“潮流”不是没有关系的。“国情”是指国家的客观情况，这些情况是随着世界潮流的变化而不同的。今日的“国情”与抗战期间的“国情”不同，与清末的“国情”也不同，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国情”更不同。在西洋人停留在封建制度的时候，闭关自守是符合国情的；但在西洋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至十九世纪中叶时，闭关自守便不再符合于国情了。同样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一年多的今日，许多在战前可以说是符合国情的政策，已经不能认为是符合国情了。从另一方面说，世界潮流的动向有时也不能不受中国情况的影响。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国情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世界潮流的动向的。

今日中国谈论“国情”的人，最大的错误是忽略了国情是不断变化，不断因世界潮流的转变而变化的一个事实。他们从没有虚心地去分析什么是国家的实际情况，他们只盲目地相信一切现状都是好的，任何改革都是“不合国情”的。这些所谓“国情论者”事实上是一些最不懂得国情的保守、落

后和反动的顽固分子。对于这种“国情论”，我们是坚决地反对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潮流的趋向，并根据世界潮流和中国国情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应有的路向。

* * * * *

什么是今日世界潮流的趋向？就我们的观察，两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个巨大的潮流，一是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是亚洲的民族主义。这两个巨流与十八和十九世纪所产生的民主主义，构成了今日世界社会经济秩序的三大主流。

先说欧洲的社会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思想与运动，当时从没有一个国家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苏联，但除了苏联外没有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制度虽有些接近苏联，但它的本质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今日整个的欧洲，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走上社会主义的途径。各国施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虽有不同，但方向则完全相同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行的程度最深，除了共产党外国内是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的。在东欧，社会主义实行的程度虽不如苏联，但社会主义的色彩已较任何西欧国家为浓厚。东欧和巴尔干的国家，目前仍然实行多党政治，但共产党始终占有显著的地位。在这些国家，政府大都是以共产党和社会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其主要经济政策是土地改革、重要生产国营和计划经济。波兰和捷克，就是最重要的例。这些国家都是由共产党、社会党与其他左派政党组织联合政府。无论政府首长（总统）和内阁总理是属于什么政党（无党派或社会党），共产党都是占有最主要的地位的。新大陆和西欧的国家常常认为东欧的国家没有公平的选举，认为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兴起不是选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批评虽然不能说是没有根据，但东欧必须走上左倾的路向，则任何方式的选举都无法变更的。在共产党和社会党等党派所组成的政府下，每个国家都依照苏联五年计划的模型，实行计划经济（如波兰的三年计划和捷克的两年计划）。但这些计划大都是过渡时期（由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的计划，其目的在弥补战争的伤痕，提高生产的效率，和增加生产的数量。在这些计划之外，东欧国家和巴尔干大部分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是扩大国营范围和实行土地改革。大体说来，东欧的经济已可算是属于苏联经济的体

系。如果苏联经济可以说是深红色的话，则东欧经济已经是红色了。

欧洲社会主义的兴起，最值得注意的是西欧方面。除了新大陆外，西欧至今还是世界工业化程度最深，生产力量最大，和在国际所占地位最重要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本来是资本主义力量最大最深的一个地域。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国家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途径。本来在第一次大战后，西欧社会主义的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和法国的社会党）都已先后抬头，并曾不只一度出而组阁（如英国工党的麦唐纳和法国社会党的勃鲁姆）。但这些政党在政治上始终不能占有稳定的地位，始终没有机会大规模地实施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在英国，邱吉尔首相以民族英雄和战时首相的声誉，也无法阻止工党的当选。结果于欧战结束后一九四五年七月大选中，英国工党以三九三席得到下议院的绝大多数（保守党二一二席，自由党十二席，其他十一席），出而组阁，实行工党的政策。在法国，从宪政会议至第四共和国的三度大选，共产党、社会党和天主教共和党（即人民共和党）始终占有领导的地位。这几个政党在外交和军事等方面虽有种种意见的差别，但在经济政策方面都是主张改革的。不只在英法，而且在西欧的其他部分，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政治的主流，无论愿意与否，是无法加以阻止的。即使将来社会主义的政党有时会落选，其他政党也无法阻止潮流的趋向的。当然，西欧的社会主义是与东欧不同。一方面西欧社会主义政党是依照十九世纪西方议会政治的常轨，用选举票的方式去获取实施社会主义的机会，因此与东欧不遵循议会政治的常轨的情形完全不同。另一方面西欧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是采取渐进和温和的方式，因此与东欧比较争进的办法又不同。如果我们说东欧的经济是红色的话，我们就应该说西欧是淡红色了。从基本的政策来说，英法等西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侧重于国有政策和社会安全。但西欧国有政策的实施范围，不及东欧那么广泛。在英国，目前国有政策除原有的邮政、广播等外，只包括中央银行、煤、电、交通等最基本的事业。法国等大陆国家的情形也相同。大约西欧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安全制度”，即使人人自出生至死亡，均能享有免除贫乏的权利。东欧的国家虽然也往这个方向走，但因生产力量和国家财力比较薄弱，目前还无法大规模采行社会安全的种种办法。在东欧，则土地改革的需要远较实行社会安全制度为迫切。西欧实行温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有经济计划，但

西欧经济计划的性质，与东欧是有相当差别的。这可以用英法的计划为例。在法国，解放后成立的“现代化计划委员会”于去年冬季提出了它的四年建设计划，即所谓孟纳特（Jean Monnet）——该委员会主席——计划。孟纳特计划的性质与苏联的五年计划不同：后者包括全部国民经济，而法国计划则集中于六种关键经济事业，即（一）煤、（二）动力、（三）钢、（四）建筑材料、（五）农业机器和（六）交通。法国计划的中心原则，是使这六种最基本的生产扩张到计划的程度，则其他不在计划范围内的生产也会跟着而发展。在英国，则工党于执政一年半后才于本年二月提出所谓“摩里逊（Morrison）计划”。这个计划完全是以人力为基础，所以是一个人力的预算而不是一个产品数量的预算。这两种计划的特点是保持个人经济活动以相当大的自由，而政府只在最基本处对经济计划与限制。这一种计划是西欧经济的特点。

就是战败的国家，也都先后走上左倾的路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无疑地是两个最有力的政党，其中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更大。在意大利，去年十一月各城市的选举，都充分表示“人民集团”（包括共产党、社会党等左倾政党）实具有很雄厚的力量。这些国家将来必然也走上社会主义的途上。目前在盟军统制之下，德国东部所实行的土地改革和英苏等区域所实行的大企业收归公有的政策，将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试验奠下一点基础。除了在很不重要的地区外，整个欧洲显然地已经舍弃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已经走上社会主义的途径。

在人类的历史中，魔鬼常常是福音的传播者。从某一个意义说，欧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希特勒战争的一个结果。没有疑问地，希特勒本身是反动的，他所发动的战争是野蛮和残酷的。但他的战争确使社会主义的兴起提前了若干时日。经过了这次大战后，无论愿意与否，社会主义已经是欧洲的主流了。

* * * * *

如果我们可以说希特勒的战争在欧洲传播了社会主义，则我们更可以说日本所发动的战争在亚洲传播了民族主义。自从十九世纪后半以来，民族主义已在亚洲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亚洲还仅有三个独立的国家（即中国、日本和泰国）。除了这三个国家外，民族主义在其他

国家（印度和菲律宾除外）是没有多大力量的。正如希特勒于反对社会主义中不自觉地传播了社会主义一样，日本是在实行帝国主义中不自觉地传播了民族主义。希特勒的企图是全盘失败了，但他却出乎意料地在欧洲经济发展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同样地，日本的企图是全盘失败了，但日本却出乎意料地在亚洲播下民族主义的种子。到了今日，菲律宾是如期独立了，印度是独立有期，缅甸正走上制宪的准备阶段，而安南、荷属东印和其他地区都发生了很有力量的民族主义运动。当然这些运动早晚总会大规模地发生的，但日本的战争确使这些运动提早若干时日，则是毫无疑问的。

* * * * *

除了欧亚两洲（非洲和海洋洲目前对世界潮流关系不大，可以不提）外，美洲的发展值得特别注意。至二十世纪初叶新大陆自从合众国成立以来，除了美国南北战争和南美若干战乱外，可以说是从未受过任何战争的威胁。在二十世纪的上半，美国虽两度参加战争，但美国国力不但不因战争而受到打击，而且反因战争而大为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生产有惊人的增加，她虽供给本国及盟军作战，但美国国内生活标准和消费数量从未降至战前之下。目前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已经变成世界生产力量最强，国富最大，生活水准最高，和唯一重要的债权国家。在今日世界中，无论战胜或战败的国家都在生产方面无法赶上美国。（原子能的重要发现，更增加了美国的物质力量。）因此美国的国策与动向，对世界潮流有极重要的影响。

美国目前的主要政策，显然是要维持民主主义。在两次战争中，美国的战时总统（威尔逊和罗斯福）都以维护民主主义作号召。但美国所维护的民主主义，是十九世纪式的民主主义，即在政治方面实行宪政与议会政治，而在经济方面实行资本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在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下，资本主义曾受到若干修正，但美国的主要倾向，还是维持（在若干修正下维持）资本主义。去年十一月的大选，更明白地表示美国选民是主张维持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议决大选使反对新政和主张自由企业的共和党在上下两院都取得过半议席，使主张改进的民主党遭受惨痛的失败。这是美国维持十九世纪式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明白表示。

美国维护民主主义的政策，在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影响。一方面“民主主义”或德漠克拉西一名词，已被全世界接受为应有的政治理想。大家都承

认民主政治是应有政治理想。但另一方面对民主主义的含义，则各国各有不同的解释。在欧洲（特别是在东欧），民主主义应以经济民主（即社会主义）为主；在亚洲，民主主义应以民族自由为第一要义。欧洲所侧重的经济民主是美国所不愿接受——或至少不愿全部接受——的；亚洲所侧重的民族自由是西欧等拥有属地的国家所不愿接受的。对“民主主义”解释的冲突，是今日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看法的不同，是美国与苏联不能调和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欧国家与亚洲国家意见冲突的根本原因。

* * * * *

东欧极端社会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冲突，是人类目前最不幸事件之一。这一个冲突能否调和，将决定今后若干世代人类的命运。

有人曾把今日美国的地位与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相比，认为今日美国资本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的冲突与十九世纪初叶英国资本主义与大陆封建主义的冲突相似，这种比较是不确切的。从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来说，今日美国的地位确与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相似：生产技术最进步、生产效率最高、生产数量最大。但从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来说，则二者有极大的不同。在拿破仑战争后，资本主义是最前进的经济制度，反封建是历史的主要课题。因此英国不但在生产方面是领导者，而且在社会制度方面也是领导者。今日的情形却不同，社会主义是前进的经济制度，而资本主义却是保守者。因此今日的领导地位，并不是集中于一个国家。一方面美国在生产方面占有领导的地位，一方面欧洲国家在经济制度方面占有前进的地位。生产方面的领导地位与社会制度的领导地位的分手，是今日世界不安的一个重要根源。当然，这两种领导地位的分与合，并不是偶然的。在由封建主义转变到资本主义时，生产技术的进步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社会制度的改变必先发生于生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但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时，分配的不均和贫乏的存在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社会制度的改变应先发生于比较贫乏的国家，而生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反因一般生活水准较高而没有改变的迫切的需要。

美国与苏联的冲突，虽有种种政治与军事的原因，但世界领导地位的争取，显然是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两个国家都希望其他国家依照自己的模型去改造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希望从制度的相似建立友谊与安全。同时这两个国家都不愿对方所实行的制度的势力过分膨胀，并且或多或少地认为对方威

胁自身的安全。这自然就引起了相互间的冲突。

除了美苏的冲突外，战后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的冲突，就是亚洲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冲突。目前在安南、在荷属东印和在若干地区，这些冲突已经演变成战争，已经引起无数的牺牲。这种冲突的严重性，绝不在美苏冲突之下。

* * * * *

在这种世界潮流之下，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呢？第一，中国至今还在建国的过程中。自从十九世纪中叶海禁大开以来，中国历史的主要课题是怎样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但在过去一百年间，这种根本工作进展十分迟慢。一方面技术革命还没有完成，至今生产能力还远落在美英苏，甚至法国和印度之后。一方面我们还有内战、贪污、通货膨胀……种种阻力的存在。

第二，无论中国的国力是多么弱小，中国在国际方面却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在名义上，中国今日为五强之一。在事实上，中国是今日亚洲的唯一大国。目前日本是战败了，今日除了中国外，亚洲还有哪一个独立的大国？而且在地理上中国一方面是界于美苏之间，在两大强国中处于桥梁的地位，一方面邻近亚洲各殖民地国家，在西方帝国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之间，也处于桥梁的地位。因此中国的动向，无疑地将有世界的意义。

第三，所有复古、排外和反动的主张，都是不合国情的。今日的中国，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世界一分子的中国，是无法反归闭关时代的一切的。不但如此，任何假借“国情”的美名去批评改革的主张，都仅是些符合一百年前的“国情”的思想，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合今日国情的落后思想。

* * * * *

根据世界潮流和中国国情，我们可以简单地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应有的路向：

（一）中国今日必须努力自强，这不仅是中国历史应有的课题，而且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责任。一个自立民主统一安定而强大的中国，是解决当前世界矛盾的必要条件。

（二）中国在亚洲方面，应成为美苏两强的桥梁。为着要达到这一点，中国应依照西欧英法两个国的模型，在政治方面采行民主政治，而在经济方面采行温和社会主义，并在外交方面超出于任何集团而为集体安全等理想而

努力。

（三）对于亚洲民族主义，中国应处于领导的地位。我们应不顾忌任何国家的邦交，对民族主义的兴起表示同情，并于必要时代替被压迫民族在联合国提出申诉。

（四）为着要达到上述的目的，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团结安定，并集中各党派各阶层的力量去迅速从事经济建设。根据中国的情形，经济应以扩大国营事业范围（但根除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并采行比较温和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为根本政策。

如果中国真的能往这个方向走，则不但中国本身可以有极光明的前途，而且对世界和平与安定，也必有极重要的贡献。

* * * * *

很痛惜地，中国目前的发展竟与应有的路向相背驰。团结各党派去从事建设的希望随着内战的扩大而消失，经济政治的改革在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之下也成为书生的“空想”，经济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一般人民一天比一天贫苦，我们已失去了领导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资格，我们已经不是美苏两强的桥梁。在这种情形下，岂但中国本身没有出路，中国并且加深了世界的主要矛盾，可能会引起许多不良的后果。如果这种趋向继续下去，我们真不敢想象会产生什么后果！

三月九日于伦敦

我们对于大局的看法与对策——正告美国

杨光时 叶毅 孟庆渊 陈序廷 叶蔚华
虞世兰 车 载 周 扬 吴奇策 吴文烈

我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关系的失调，以及紧张、对立，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苏联的体制自己成一类型，对于一部分人当然是非常不安的。全世界扰攘紧张的局面，也可说起因于各个自由主义分子间，对苏关系的许多不同主张，与不同看法。

华莱士以为战后的苏联需要安定与建设，一切美苏关系的恶化，完全起于自己的做法过分刺激苏联，更认为唯有全世界的繁荣与安定，始足以阻遏共产主义的发展；因此他主张“对苏和平”。杜鲁门总统则基于许多实际的经验，事实告诉他这一盟邦行止莫测，难能应付，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以及确保世界永久和平，不惜对国外反动政权大肆援助，以为这样才足以使苏联知所戒惧；这就是“对苏强硬”。

这两种看法都是危险的。在此时此地的局面下，侈谈“对苏和平”固属无济于事，且足以助长共产主义的气焰，但大量援助反动政权，加重法西斯气息，亦非所宜，徒引起全世界自由主义分子的反感，甚至逼上梁山，增厚共产主义实力；不但劳而无功，结果适得其反。

我们以为苏联欲谋共产主义的扩张，其形式也有两种：一是以自己国力直接扩张，换言之，就是希特勒式的侵略。一是培植全世界共产势力，造成各国内战与革命，从而取得政权，形成间接扩张。对于前者，我们认为苏联无此存心；莫洛托夫曾经主张裁军，以及史太林对小罗斯福、史达森等的谈话亦可表现。对于后者，最近苏联“世界革命临时委员会”的产生，无异是

战前“共产国际”的一种复员。实际上苏联的动向是不难测知的。

今后美苏直接冲突，或国际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其可能性甚少。各国内部“内战”的可能性加多。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许不是国际间的战争，而是“内战”的蔓延连成一片，变成全世界“普遍内战”的战争。“化国际战为内战”，使原子弹无法应用，这就是苏联造成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两大特色。

所以我们认为应付苏联的方法，一切公开指责，以及争辩、否决、给与，甚至援助反动政权，都是无效的。全世界的反动政权因了他的贪污腐败，促使“人民”与“政府”离心。帮助反动政权，就是与全世界人民敌对！我以为美国今后的外交使命，不仅是“国”与“国”间的正当外交关系，同时必须觅取一种“方式”，以促进美国政府与全世界自由主义分子及其政党间的联系。这种“方式”就是“民主国际”。唯有通过“民主国际”的方式，大量援助全世界自由主义分子及其政党，始足以真正解除共产主义的威胁。唯有“民主国际”的设立，始足以迅速地与“共产国际”对抗！

全世界的自由主义分子皆在穷困中，为了反抗贪污腐败的政权，不惜走上了左倾的道路。这是一股伟大的力量。美国政府如能觅致一种“方式”，以与这种“力量”相结合，则美国的政策就可以真正操纵全世界！

我相信没有“共产国际”的策动，中国二十余年前不会出现一个“共产党”。没有越飞、鲍罗廷的来华，中国不会产生一批有名的左倾人物。同样，没有“民主国际”的设立，中国暂时不可能苗起一个国共以外的强大政党。没有民主美国的经济支持，中国也暂时不可能出现一个司徒大使期待中的新革命运动！

从经济观点上说，青年党依附国民党，民主同盟依附共产党，是必然的。中国政党的经费已无从设法开源。孙中山先生昔日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完全依赖海外华侨的支持，然而二三十年来的后果，已使华侨对祖国的革命运动灰心！

诚如张东荪教授所说，只要美国不帮助反动政权，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向美国特别拉紧些是可能的。中国必需产生一个国共以外的新势力。我们相信只要获得美国的保证，一个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便可产生。

司徒大使屡次发表愿望说：中国必需再来一次新的革命运动。我们不应看作这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随便谈话，我们热烈的期待着它形成更具体的对华政策！

我们对于时局的几点认识

严仁赓

国府通缉毛泽东，颁总动员令，和平空气只见昙花一现，又被战云一扫而空。大杀砍开始，和平越走越遥远。这个时候，呼吁和平虽不免不识时务之讥，对于时局，我们却还不能不有几项认识：

—

过去的战局是以撕打争取较高的和平代价；而现在的战局，显然已成为长期的撕打了。第一，当初民青两党加入政府的时候，曾拿出“打通铁路之后即讲和”，作为加入的条件，人们对和平还存一线希望，受的刑罚总算是有期徒刑。而且自从参政会议席上发出一片和平声浪之后，民社党并此先决条件而欲废弃，便于随时讲和。改组以后的政府又是最倾向于对内和平的政府，大家咸寄以热望。然而不出一月，求和平的政府站起来领导“戡乱”，打通铁路云云抛出九霄云外，和平字样谁也不提了。有期徒刑变为无期徒刑。

第二，恢复了共产党十年以前的徽号，再加上通缉，再加上“实际上等于下令讨伐”的一切措施，想要挽回也不容易挽回了。名之为“匪”，自然是人民的公敌，全体民众应该群起而攻之，而且非全部消灭不能算完。名之为“匪”，政府也必须剿灭尽净，才算尽了政府的本分，对得起人民。即令有议和机会，怎奈堂堂政府，岂可降尊与“匪”讲和。

第三，内部纠纷牵连上国际关系。决心讨伐是因为共产党“丧心病狂勾结外力侵害国家”。既有外力支援，乌能轻轻松松的廓清。

平心静气的说，勾结外国，还是不逼它出此？能容于家室，又何必一定去引狼进来？更何况勾结外力也非一方面的事，彼此彼此。老实讲，为政府想，惟其因为它和外国有勾结，更不能小看它，势不可侮，就应趁早顺风转舵。不错，美国继续供给军火，非不可能，不过这边明着源源送来，那边未尝不可以暗着源源送过去。两位老板不露面，让一对傻小子拼命撕打。两败俱伤之外，还要各欠一屁股账。这一屁股账，那一方面的一笔，它的后台老板将来或许不和它计算，可是这一方面的后台老板却是锱铢必较的。在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在人家，军火商发财，工商恐慌危机安然渡过，特权潜势力的所得还在外。

内战国际化之后，和战全不由己。眼望欲穿的和平，何时方能降临人间？

二

总动员令颁后，孙副主席发表一番谈话，说反内战就是反政府，一只手掩住万万人之口，表示现在只有打，废话少说。

“戡乱”是执政三党的当前对内政策，反对执政党的政策诚然可以说是反对执政的政府。不过若人民因反内战成为反政府，因而构成罪名，累及身家，殊为政府所不取。

政府不好，该当反对；政府好，受人反对也满可不在乎。反正政府建立在人民上面，多数人民觉得它好，少数人反对也拉它不垮。甚至可说，有人反对政府，政府才不敢胡为，才有督策，才能进步。“没有共产党反对政府，政府比现在还要糟得多”，很多人这样觉得。“好政府让人推翻不怕，翻个身仍然可以爬上去。越怕让人推翻，越走向偏狭，越不求长进，便也越有被推翻的可能。”

展开历史，哪一个新朝代的开始不是因帝王昏聩残虐，人民才起而伐之。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古今中外道理相同，欧西的政制，台上的政党之外，还留下反对它的异党，专门和政府为难作对，整天想推翻它取而代之。即执政党在议会里面的代表，也并非专门为的捧政府的臭脚。到了反对呼号全然无效，就是动手也不为过的。“君子动口不动手”，话虽不错，怎奈说不动劝不听，动手的人也不一定都该杀头。辛亥革命，二十年前的北伐，哪一

次没动过手。中山先生不是也常称赞洪杨？有谁说国民党的革命和北伐不对？

政府的好坏，有客观的标准可作评断。我们的政府是好是坏，人民心中早有公正的评断。国民党中间有人愤慨的说：“从前我们革人家的命，现在我们竟成了人家革命的对象！”看来未尝无内愧。台上的人，表面镇静，背后也能和我们嘟囔几句：“政府是太坏了！要不是共产党太不行，不然真该换一台戏唱唱了。”站在台下看戏的人，自然格外看得清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裴斐教授（Prof-Nathaniel Peffer）说：“目前的中国政府，是近代中国最坏的一个政府，它也是目今世界上最坏的政府之一。”（见 *Close-up of China in Travail*,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4, 1947）。这话出于美国的左派作家之口，无足为奇；出于旅行远东几星期一两月，回去便大吹大擂高谈中国问题的新闻记者之口，也无足为奇。但是出之于一位素养甚深，又是远东问题权威的学者之口，应该够我们深思猛醒的了。

反对内战，或者反对政府的其他政策，被认为反对政府无妨；反对政府而获罪，甚至累及家室，那就表示政府没有进步的意向。口虽不言，心其谁服？

三

今年人称选举年。表现的是人民不关痛痒，党中各派四出活动。老百姓知识标准太低，完全不懂选举是怎末回事，无疑的，向来操纵地方的土劣以及各地党内人物，仍将操纵这次的选举。没有党作护符的人轮不上，即民青两党，资格浅，势力单薄，也难大显身手。这回选举的最后结果是早就看得出的。

萧公权先生也曾看到选举有被野心家操纵的可能（《世纪评论》二卷二期《论选举》），这是不错的，不过他认为挽救之道应由各合法政党提名，这主张我不赞成。诚然，美国的选举，许多地方确是规定由两党提名的。仅只这个，不能便认为有例可援。因为美国人非“民主”即“共和”，独立的和无党派的占少数。我们这里却是绝大多数不属于任何合法的政党。若是由参加的政党提名，求其公正的提出无党派关系的人，太不可能，近于玄想。结果不出两条路，不是给一个党造独揽的机会，便是造成三党分赃的局面。

这都不是还政于民，这是训政或不训之政的无限延长，我们不应同意。

萧先生又特别鼓励知识分子参加选举，这也是不错的。但是他特别寄望于地方上的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等等所谓“民众团体”，这又是错的。这些农会工会妇女会教育会等等，是训政的产物，人人知道它们的靠背是谁。让我们瞧一瞧，哪一次政府展开的运动，没有“民众团体”的响应。这一回的“戡乱救国大会”，各地方步伐之整齐划一，尤其令人生羨。几月之前，平津大学教授宣言，同情大学生反内战，不几日，北平市教育会便联合商会妇女会等团体，也发宣言，驳斥与戴帽子不一而足。这一类的民众团体，说它们代表教育界，代表知识分子，代表人民，谁信？习于听人指挥，自己没有灵魂。竞选开始，他们何所适从，是不消说的。这叫做实行宪政吗？

说句老实话，我对于实行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到今天还没十分热心。国民党开放政权本非自愿，是熟知的事实。知识分子迫促政府实行的宪政，举行的选举，一般老百姓始终蒙在鼓里，根本不懂是怎末回事，更谈不到去争民权争民主了。在他们，谁来做官都行，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只要让他们能活一天的官便是好官。内战以来，征兵征粮，破坏骚扰，弄得老百姓要活不成，死也不知葬身何外。民权云尔，选举云尔，这些捞什子有啥用处？我一直认为目前的中国，民生主义的提早实行，比民权主义的提早实行，不知道重要多少倍。人说国民党一贯实行的经济政策何尝是“民生主义”，简直是“民死主义”。这话近于谑，却是与事实不太远。把政权交到垂死的人手里，他们只好到了阎王殿再去争民主。民权云乎，民主云乎，下辈子见吧！当局徒垂涎金元，没法子不扩大政府基础，慌手忙脚的就实行宪政。把民生主义一骨脑摆在屁股后面。像这样似是而非半生不熟的民权主义，当此人民心理上理解上毫无宪政准备之日实行，作为点缀品则可，我却看不出它有甚么深长的意义。

四

缩短内战，都嫌经济不可收拾，何况长期打下去。事实上，内战不停，经济是绝无办法的。

许多人为想美国借款患着相思病。美国接济了一亿多粒子弹，跟着又谈借款，便认为军事已有把握，经济不成问题，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不反对借

外债，可是要懂得借债要连本带利偿还的，不能管前不顾后像败家子式的借法。借债用在建设上，还得考虑轻重缓急（《世纪评论》一卷三期《国营重工业之前途》一文，曾有说明），何况我们借了钱来，很可能胡花乱花，连带着大规模的破坏。张群院长上台之初，曾声明经济方面决定自力更生，不赖外援；纵有借款，也完全用在建设方面。我们固然希望这项诺言可以信守不渝，然而在内战持续的今日，这多少是一个奢想。即使借来的钱用在建设，今天建设一分，明天破坏十分，有何意义？借款绝对救不了经济。

另一个可能但又靠不住的财源，是近来喧嚷一时的临时财产税和征用国外的国人存款。这两个提议，似乎是针对着发了贪污财的官吏和发了国难财的商人们，一则以平民愤，再则以利战争。几大家族之成为大家族，是历史，不是今天的事。发国难财的商人多数也是抗战以前或抗战期间发了的。抗战的时候，人民为着民族的存亡，前方拼着死活，后方勒着裤带，唯有不肖官吏和商人却拼着命的扒钱。彼时，征收他们的钱财供给抗战，可以说理直气壮，名正言顺，但是政府偏偏不干，反放纵他们继续的为非作歹。抗战一停止，接收又造就一批新大家族。彼时，建国需款尤殷，也没听说政府要开他们的刀。好了，现在为了内战打不下去，人民再没有油水可榨，才想起这一大堆不义的钱财。我不免为这群贪官奸商们呼冤，早知今天，放着抗战时期为什么不乖乖的拿出若干分之一的财富，捐献国家，虽不名垂千古，至少臭名可以洗刷干净，中国人是最健忘的。此之不图，如今忍着痛叫人割下几块肉，说出去并没有甚么好听，老百姓有谁感激你们！

也许政府的决议，不过是决议罢了。真的实行，又岂容易。明知某人贪了多少财，压根儿没有财产登记，凭什么证据？抓不到他们财物，怎能征收？国外的存款更不用提了。民国三十年政府冻结国人在美存款之前，显要们和他们每人后台的银行大老板，早就得到风声，派专差到美国提现，转存南美加拿大或欧洲。本来冻结以后，小头目落网的还不少，一抓就是几个。无奈这个机会，政府也任它放过。好了，如今战事停止，存款解冻，再想征用，谈何容易！而且这两年，参政会和政府一直嚷着要征用国人的国外存款，机伶的，大数目的，早就变成南美的橡胶园，纽约市北的房产，各大公司的股票了。大凡贪官，都善经营，自己不愿管，还有得是喽。过去六七年，美国各种股票直线狂涨，一二十万的本钱，几个年头下来，一二百万易

如反掌。在纽约垣街和五十号街，街谈巷议人言啧啧，哪个不知中国某些人买卖多少股票，赚了多少钱。更精明如某某诸公，拉住美国几个第一流实际等于托拉斯的大工业家，仗着自己在国内的地位权势，联合起来垄断市场。

存款放在银行里没有利息，只有傻瓜才放在银行里不动它。所以征用国人的国外存款，对于大资产是根本征用不到。我敢保证，即令征用国人国外存款办得通，也只有几千元几百元的小户们会上钩，大户早就逃之夭夭了，何况在位者全是朋友，又全有份，谁愿意得罪朋友？

退一步说就是大户的财富完全可以征到，拿去打内战，也不大成话。阔老板们牺牲的不过几文肮脏钱，人民却是成千成万的跟着死。这些肮脏钱，哪一文不是人民的血，人民的汗，取于民不用于民反而加害于民，如何说得过去。财政能够平衡，并不是打内战就有理。打仗除去花钱之外，多少人还要陪着它去死，多少财产还要陪着它毁灭。这一个观念最不能不弄清楚，战争若只是化钱的事，我倒不必恨内战恨成这样。民初的内战，现在看来真像捉迷藏。发几个通电，放几响空炮，看局势不妙，撒开腿朝后跑，两下里没见面，战事便可完结。人民顶多出几个钱，没有什么人遭大殃。现在的内战则不然，首当其冲的是人民，彻底的“扫荡”，非家破人亡不止。

我们不必问谁是破坏的祸首，反正破坏是事实。而破坏却是内战的必然结果。

五

经济学者能够撇开政治，单独根决目前的经济问题吗？话已说够（见《经济评论》和《大公报》的两篇文章），不再啰嗦。近来人们不再说经济危机不是内战造成，却转过头来，去挑经济财政当局的眼。颇有“若不是你们搞得这样糟，何至有今日的经济危机。”不错，经济财政政策确曾犯了不小重大过失。然而没有内战，过失再重大几倍，经济又怎会搞成这个样儿。

人们抱怨政府不该把外汇汇价死钉住，应该跟随自然汇率随时调整，这话不错。但是汇率随时调整又焉能根本解救经济危机。物价仍不免扶摇直上，焉知没有人又大声疾呼的痛斥当局，不管汇价，任着物价跟在它后面跑。以往外汇松，进口松，大家骂政府戕贼产业，浪费外资；现在外汇紧，进口紧，大家也骂政府。上海食米限价，配米倒灌产地发生米荒，人们骂政

府不该管制；若是信着米价上腾，政府装作不见，挨的骂一定更凶。放款紧了，人们骂政府窒息生产；放款松了滥了，人们骂政府膨胀通货，刺激物价。低利政策说是给物价推波助澜；实行高利，工业更如何吃的消？配售黄金，本身没有大错；只是运用欠妥。等到一出乱子，便成众矢之的，甚且有人主张黄金国有，政府作价收买。发售公债罢，有谁来买？不膨胀通货，钱又从哪里来？

动辄得咎，一无是处，经济财政当局简直成了国民的公敌。其实他们何尝不想往好处做，做可得做得通，战乱的局势下，腐化的，毫无效率的政治基础上，任何好办法也办不好。政策穷虽变，可是越变越变不通。方法上换来换去，人事上换来换去，物价仍旧直线上飞。去病务须去其根，治标只能医其皮。一句话，内战不停，经济怎末搞得好的。

* * * * *

“戡乱”是政府的神圣使命。可是没等把乱戡平，人民的房子先砍平了，头先砍掉了。神圣的使命，注定了是要辱命的。当然，今日言和，岂是容易。但打，是无疑问一条死路。对政府它是一条死路，对人民更是一条死路。继续征兵征粮，无限膨胀通货，官吏趁火打劫，这些虐政都是内战之赐。大杀大砍之下，眼看这些虐政更要变本加厉。人民已在水火中，偏偏还在他们身上浇水、头上加油。固然内战不能单责一方，然而一个政府心肠中没有老百姓，眼看着国内遍地灾荒饥谨疾病死亡，不能有动于衷，也就不能再怪人民要动嘴要动手了。怨仇不管多深，举目看看，也该罢手了吧！释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大彻大悟的工夫，我们殷切的期待于执政的三党诸公。

七月二十三日 于武林紫竹禅林

国共问题何以不能和平解决的追索

陈彦

八年长期抗战以后，谁都想有个休养生息的机会，然而国共间却仍进行着大规模的战争。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不绝于耳，难道他们一点都不体谅人民生活的困难，大家硬要向残酷的路线去攒不成？我相信人总是有理性的。和谈为什么会没有结果？基本因素在哪里？

国共两党所以这样冰炭不相容，综合一般人的意见认为：第一是由于双方主义的冲突，第二是代表国际间两大集团的对立，第三是由于历史上的积恨。我们且依次来分析一下，看这些意见能不能算为基本因素？

由于主义的冲突吗？在理论上讲，政党的对立当然是由于主义或政策的差异。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其最高理想，共产党则以共产主义相号召，主义上的不同那是很显然的。但是国共两党的冲突就是由于主义上的不同？我们不必引证国共两党的文献来证明三民主义也曾为中共所承认。或则从理论上研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的地方，断定他们在主义上并没有冲突。甚或说在实现政治上国民党并没有依照三民主义去做，中共也不是完全实施共产主义，因而否认其主义上的差异。而我们认为国共两党纵然在主义上有不同，但又何必如此兵连祸结，硬要在战场上打个明白呢？世界各国政党的对立何止中国，自西欧以至新陆，哪个国家不是多党政治，他们对其本国政治的观点也都不相同，然而我们并没有听到他们的政争一定要在战场上决斗？由此可见，主义上的不同还不是国共两党冲突的基本因素。

其次谈到当前国际形势。当前国际局势是美苏两大集团的对抗，美苏的对抗也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换言之，是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没有

和谐的结果。中国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整个国家政治随时都受国际关系的影响，这是毋庸讳言的。不过说国共两党的冲突，一定就代表这两个世界的对立，我以为事实断不是如此简单。中国共产党之与苏联由于主义上的相同，思想与行动往往彼此很相似，因此彼此间相互发生同情作用，这一点我们不加否认。国民政府之与美国由于这次大战并肩作战，甘苦与共，因此美国对于中国愿以盟国的立场协助中国复兴，这也是情理之常。然而苏联是不是一定无条件支持中国共产党，美国也一定支持国民党，而使两方在中国成为对峙的政局，这却是大问题。先从美国的立场来说，它诚然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在政治上需要有外围基点来防止共产主义泛滥到新大陆去，在远东方面的外围基点最好当然是中国，不过形势转变的结果，防苏防共的责任今天已显然由中国移到日本去，今日中国的分量已远不如胜利后的情形。至于在经济上美国固然需要扩充远东商业市场，需要有个安定的中国，这个安定势力如果以中国共产党为重心，当然不如以中国国民党为重心，然而像今天政府对于政治一无进展，它是不是愿意投资到中国我们看美国借款的谈判就可了解。因此美国之与国民党的关系实在很难说。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一定得到苏联切实的支持？就苏联本身说，它在此次战争中牺牲相当严重，恢复元气尚无暇席，如欲以实力支持中共，其本身力量亦难许可，况且美苏关系尚未至剑拔弩张的时候，它出面支持中共也尚非其时，因此苏联之与中共其关系如何亦可想象。如果说国共双方的冲突是代表国际间两大集团的对立，倒不如说正因为美苏两国对于中国所下的棋子分量都不很重，因此国共两党才可以自由地干起来，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与援助，倒是实话。

至于说国共两党历史上的积恨吧：从宁汉分裂国民党举行清党开始，以至江西剿共，抗战后游击区内的倾轧，乃至胜利后或和或战迷藏式的斗争，这一切诚然都足以说明国共两党积不相容的情形。不过一个政党与另一政党的分裂与合作本来是很普通的事情，政党如果老是相互合作，在政治的改进上，或则在政治的制衡作用上，反而失去作用。因此国共间过去的分裂在理本无碍于今后的合作，而政党间的起伏更不应该有什么仇恨可言。何以国共间会超出一一般的情形，不是国民党想根灭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想打倒国民党？它们间斗争的情形完全不是起伏的争执，而是生灭的问题，这就值得我

们作进一步的研讨了！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见国共间的冲突实另有基本因素存在。照作者的观察，最基本的因素应该在两个党的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它们都自称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政党在本质上都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因为革命政党为实施其政策均系采取断然手段，在革命过程中它不容许有其他力量阻碍或变更其政策之实现。因此革命党的政治都采取一党专政办法，党自己有党军，党军是为本党主义而奋斗，它不是国家的部队。中国共产党虽然为争取民主而努力，然而他们的民主与我们所想象的民主显然两样，例如解放区内纵然没有检查新闻等机关，而实际上对于新闻的控制比政府所辖的区域更要厉害。苏联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祖国，在苏联除了共产党以外能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吗？在自由社会中能否实施经济民主今天还没有事实可以积极证明，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它革命的策略——暴力主义！至于中国国民党在其政治理想上固然是标榜着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并进，然其建国程序系采取由军政时期、训政时期而宪政时期，今天已经是施宪的前夕，事实上还是军政、训政并施。当前的形势也显然在加强革命的阵容。两个革命政党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以内，武力的冲突在本质上说就没有方法来避免，这是一点。

革命政党既然是采取暴力主义来改革政治，因此对于武力的培养与控制也必然是先决条件。今天国共两党都已有相当强大的部队存在，单从武力的本身来看，也就没有办法能以和平方式可以走到统一局面，二个以上武力的存在，欲使求到统一局面，在事实上只有一方力量打倒另一方时才可能，否则就是双方相互牵制成为分治局面。历史上杯酒释兵权那是在君臣名分下的佳话，而不是今天政党可以相互抗衡的场合。国共争端终至今天政府实施戡乱，基于上述二个武力不能调和的原因，也算是另一个基本因素。

此外，作者认为更应追溯到我们的传统思想。在这里特别是那种讲究名分的思想在作祟。乡村里两个氏族或绅士往往为了一点细故，双方诉讼经年，甚至于在原来的案件上已经吃了败诉，也要另外捏造事端再度兴讼，甚或聚集械斗，以至倾家荡产亦在所不惜，他们的目的是为争那一口气。固然这是民族坚韧性的表现，然而这种只讲个人或团体的门面，而不讲事件的合理处置的坏皮气，也真不知使我们民族文化的进步停滞了多少年！乡村里的

情形如此，今天国共间争执的拖长也未始没有这种成分夹杂在内。国家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决不是一个政党少数人的事情，然而今天的政党偏把国事算做政党少数人的事情来办，事情当然也就难以解决了！

以上的分析如果是不错的话，那么国共问题的局面，就国共两党自己的主张说必然是以主张武力斗争为主，和谈只有在对自己的党比用战争来克服对方还有利的条件下才可能。国共问题之所以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其症结我以为就在这里！

战争会成为国共间解决争端最后的手段，就国共两党内在于因素来说，那是逻辑上必然的结果。我们的政治家如何地领导国民超越党派的利益，使战争缩短时间，使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更需要有超越的理智！

动员·戡乱·行宪

楼邦彦

动员为的要戡乱，戡乱为的要行宪，行宪为的要还政——这是政府当前政策的三部曲，也正是今天政府一切行动的准则。

去年岁末，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并决定“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确定今年元旦为公布日期，复议决新《宪法》定于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此所以大家都说今年是选举年，明年便应该算是宪政年了，这也就是很多人热烈地在喊着要行宪的背景与根据。然而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国民大会原是在很特殊的环境下召集的，而由于中共的拒绝参加，造成了今天在法统一点上，一方坚持要如期实行新《宪法》和另一方根本否认它的僵局。同时，国共两方的武装斗争愈演愈烈，显然已经超越了理智的境域，于是在经过了一番极度的惨杀与苦战以后，政府毅然决然颁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共十八条，其目的在“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行宪政”。从此以后，如果用陈诚的话来说，国共所进行的不再是“黑市仗”，而是国民党政府又一度正式讨伐共产党，展开了所谓“剿匪工作”。虽然一切只是名义上的改弦更张，事实上“打”一个字仍旧可以包括并说明所有的行动，但是法律上的中共地位业已发生了变化，老百姓的处境也确实是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的局势无疑已混乱到极点，一方面为要“戡平共匪叛乱”，我们的人力物力应积极动员，另一方面“实施宪政及各项有关宪政之选举，均应依照规定，积极进行”，我们所不懂的是：这究竟是矛盾呢，还是奇迹？

中立的西洋学者说我们的政府是“无能，贪污，腐败”，虚心的中国人

似乎也都该承认这些形容词的真实性，是则以这样的政府来厉行全国总动员，实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从无论任何一方面来说，要做到真正的“动员”，必须有一个近代化的政府。一个不够格的政府，既无能，又贪污，又腐败，没有人会相信它能担当得起这个近代化的任务。抗战时的经验，已是有目共睹，现在又要“动员”，其结果不难预卜。我们敢说总动员令虽已颁布，理论上一切与戡乱有关的人力物力自应积极动员，但是那些有背景、有“关系”、有势力的官僚、豪门、富户，当然仍将逍遥法外，甚或还要变本加厉地在新环境的掩护下继续剥削并累积他们的利益与财富，最受到影响的恐怕仍旧是一般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终年在饥饿与疾病线上挣扎着的老百姓。这样的动员并不是动员，明眼人看得很了然，政府当局的内心也一定很明白，然而政府还是决定这样做，这正足以证明它到了今天确有“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之感。然而政府所得到的必定是一个相反的结果：政府将越显得无能、贪污、腐败，它的威信必更下降。假使政府作今天的决策是因为非动员不足以戡乱，那么我们姑且不论戡乱政策的当否，以及是否有获得戡乱成功的军事与政治上的种种条件，我们至少可以说，一个动不了员的政府，在逻辑上，也就必然是一个戡不了乱的政府。

关于政策上戡乱的当不当，以及能力上政府戡得了戡不了的问题，在目前的法令规定下，恐已超越公开讨论的范围。不过像目前这样一面动员戡乱一面完成宪政的情形，是任何一个政治意识尚在清醒状态中的国民所不能不关心的。这里我们可以分三点来解说：

第一，用法令的文字来说，动员戡乱纯是为的要“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现宪政”，这固然是光明正大的话，但细察之，其中实包含着极大的矛盾。眼看我们就快要实施宪政了，而政府为要扫除民主障碍，乃有动员戡乱之举，但是从总动员令颁布以后，全面的真正意义的动员，现状下的政府绝没有能力做到。说起来伤心，政府却因此而取得了法令或理论上的根据，用来便宜行事，为所欲为。动员纲要规定“除本纲要已有规定者外，为达成戡乱之目的，行政院得依国家总动员法之规定，随时发布必要之命令”，这确实是一个范围极其庞大的授权。我们原来就没有享有多少自由，从此以后，自由的一切保障将更丧失殆尽；我们的新《宪法》所设置的各种相当合乎宪政条件的制度，我们原来就没有建立多少基础，从此以后，这些基础将被毁灭

无遗了。在表面的逻辑上，动员戡乱确似乎是为的要扫除民主障碍，但是很明显的，即使动员戡乱可以扫除所谓“共匪叛乱”所造成的民主障碍，其本身却无异又产生了无数新的民主障碍，举其荦荦大者，例如征雇、征购、征用、限制个人自由……等，不一而足。究竟什么是民主障碍呢？政府的看法不一定与我们相同，老实说，在良心上，如果有人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指出目前的无能、贪污、腐败的整个政府本身便是最大的民主障碍，谁又能找得出更好更有力的理由来反驳它呢？

第二，再就目前的事实来讲，漫天的内战烽火愈烧愈旺，其影响所及的地区也一天比一天广阔，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谈选举，谈行宪，除非是别有用心，或是想趁火打劫，我们实在看不出有多少理由，得能辩护何以非要挑选这个在任何方面都绝对不合适的时期来实施宪政不可。过去也曾有若干人向政府当局提供意见，认为政府在东北以及冀鲁晋陕等省若干地区，不能在正常的情形下充分行使政权，于是各该地区的选举事宜应暂缓办理；也有若干人认为假使把中共所控制的范围并不小的区域全都抛弃于选区之外，当然是极不公平，于是若不延期行宪，只能让留在政府区域内的人民团体来代替中共以及内战区域的人民选举。虽然所谓暂缓办理和权宜的代替选举，恐不过是要弄手法来造成一个变相包办的骗局，但是事实上的困难与阻碍毫无疑问存在着，却是已被大家承认了。最近闻有国民大会驻粤代表张发奎罗卓英等四十余人联名上书国府蒋主席与孙副主席，列举多种理由反对今年进行选举，并建议政府从速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共同讨论决定行宪问题；我们此刻尚难推测国民党内这一部分重要人物有此举动的真相和动机，但函内有几句话确可证明他们对于当前事实的认识：“在此内乱外患交相煎迫之际，普选能否顺利进行，诚属疑问，倘事实上不能依法进行，而草率从事，违反民意，开选政恶例，影响宪政前途至大。”又：“在秩序尚未恢复之地区举行大选，最易予奸恶以利用机会，惹起地方上矛盾之争斗。”宪政的大厦决不能凭空建筑起来的，目前政府当局竟不顾一切客观情形而要行起宪来，我们实在百思不能了解它究竟行的是甚么“宪”。

第三，民主宪政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政治现象，而戡乱却相反的是一种以武力来对付政治异见者的举动（虽然我们承认所谓政治异见者也是一个武装的政治集团），要在武力至上的时候准备实施以理性为基础的宪政，无

疑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在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内，选举一方面是产生公职人员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又是对于一般人民的最好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之能否发生真正的作用，全要看一般人民对于选举所具有的态度。如果人民视选举为政府粉饰门面的勾当，或确认选举为政府耍弄欺骗的手段，那么不但选举制度的健全基础无从建立起来，民主宪政的前途也当然更没有把握了。本文不拟讨论如何解决国内两大武装力量冲突问题的途径，不过我们总以为在内战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以前，无论为暂时的情形计，或为比较长久的基础计，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它不应该作行宪的打算，而只可以间接地在各方面让一般人民多获得些学习民主的机会，以为将来真正作主人翁的训练与准备。退一万步说，即使政府以为非“戡乱”不足以“建国”，我们也要敬告政府，它似乎应该考虑如何以光明正大的态度，向全国人民宣告这一个基本大原则：唯统一和平后始能行宪。我们诚恳地奉劝政府千万不要利用做官心切的党派来造成协议分赃的民主骗局，人民是最聪明灵敏不过的，他们或可能糊涂一时，但必终而会投到真理的怀抱里去的。政府与其如此做，倒还不如延期行宪，而先在各地方试行类似新《宪法》中所规定的地方自治制度，一方面这是寓训练与学习于试行，另一方面这又表现了政府在还政前夕的高贵风度。政府要是行宪的决心，在今天的局势下，应该明白表示暂不作行宪的打算！

八月十七日 北平

论当前的政局和美国对华政策

吴世昌

—

当前中国的政局，由种种迹象看来，显然已经临到一个必须改变的关头。中国政局之需要改变，远在还都以前，《大公报》即已屡次呼吁：要变不要乱。迁延至今，还没有变好，而乱的形势则已摆定。以前是舆论认为政府不变不得了，今日则政府本身，执政党本身，已自动的感到非变不可了。促成这种政府自觉的改变，“剿共”军事当然为一主要原因，但国际方面的影响，和经济危机的迫切威胁，则是直接的近因。

上文种种迹象，是指下列各事：

- 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重要决议：党团合并及其他。
 - 二、国民党四中全会对于当前局势的正视、分析与对策。
 - 三、政府各方面对于魏德迈声明的反应和外交方面态度转变的朕兆。
 - 四、孙科最近谈话的改变以前论调。
- 兹就一、二及三、四各点分两部分讨论。

二

党团统一虽只是国民党一党内部之事，但截到目前为止，国民党既尚在训政时期，而且即使在行宪以后，国民党之必仍为执政党，说明了国民党与中国政局之不可分性，仍将长时期的继续下去。事实上，马歇尔早已说过，国民党与中国政府是很不容易分清的。因此国民党本身如有重要的改革，似

应连带的对于政局方面也有所改革；虽然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事实与理论往往不能如预期的一致。可是政府方面这几个月来既然费了很大的力气来合并党团，至少证明了国民党本身已感到一种预兆，非努力振作不可了。

党团之需要统一，从反面，也证明了过去党团之不统一及不统一的不利。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建立是抗战开始，政府撤退到汉口以后的事。那是一个伟大、光明的时期。尽管军事失利，但国内各党各派一致团结，设立名副其实的民意机构参政会。三民主义青年团之设立，名义上是党的外卫，事实上是准备注入新血液以代替党内的腐败分子，而使它起新陈代谢的作用。今日四十岁以上的人，大致还记得北伐开始国民党内有共产党，共产党内又有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C. P.”“C. Y.”之声，甚嚣尘上。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是否系仿昔日共产党之有“共产主义青年团”，不得而知。但至少“党的外卫”“预备党员”这些形式上是颇相似的。青年团的建立主要目的是在争取各校学生，故当时各大学校长及教育界稍有声名之士均被请为干事或指导员，似乎并不限于国民党员。当时入团的学生也颇有优秀分子；但不久在学校中变成了特权阶级。又由于党团自上而下的对立摩擦，争权之风逐渐明朗，使许多洁身自好的分子望望然去之。终于所谓新血液也者，不仅未能使国民党起新陈代谢的有机作用，反而自成集团，乃至因对立而抵消内部力量。青年团失去了青年性，简直和许多党员一样龙钟起来。这次党团统一在国民党四中全会中是一件大事，四中全会的宣言很缅怀也很自负过去北伐和领导抗战的光荣，而归功于上两次的重要改革，欲以这次的党团统一为另一新的改革，以完成“戡乱建国”的大业。世人所能见到的是国民党中常会中添了若干过去是青年团要人的名额。组织部长陈立夫的辞职，表示合并了青年团后的党务不像原先单纯了。陈雪屏之以教授出任青年部长，也算是向名流学者开放政权之一例。陈雪屏是退出了学校，但其工作的性质则无疑的将使党派更深入学校。国民党之设立青年部，重整青年的组训工作，自然将在学校里争取更多的党员。但国民党既与政府有着不可分性，如果政治本身没有进步的改革，而党团的合并只为选举时的统一指挥，则其在学校中所争取的青年的品质，仍是问题。荤菜放在素菜里可以使素菜变荤，素菜放在荤菜不能使荤菜变素。

但无论如何，这一件国民党内的重大事，表示政府确有决心要振作内部

了。这种决心的造因有三：第一，当然是共党势力的蔓延，“戡乱”军事的持久化，这点无须多说。第二，过去的学潮，依政府说为受共党鼓动。如果政府确如此相信，而不是作为镇压学生的借口，则共党潜在的统制思想实太可怕。第三，经济的枯竭，原希望美国能予以援助，但是从魏德迈调查以后的声明看来，从马歇尔援欧计划的搁浅看来，此种希望早已变成未知数，迫使政府不能不作万一失望后自力更生的准备。这次国民党的四中全会并不像以前各次全会一样提案多而漂亮，会期长而热闹，但从报上各种记载看来，至少有一点是比以前进步了：正视现实，承认缺点。正视现实则不敷衍门面，不硬充漂亮。承认缺点则不虚骄狂妄，不文过饰非。——这些缺点在以前几次全会中几乎每次都有的，但从未见坦白承认。四中全会的这一点进步，是国民党在这两年中经历无数忧患的教训，同时也是在国民党治下的人民以无限的血泪换来的。

国民党在四中全会中检讨本身的优点和缺点，分析共党的优点和弱点，相当坦白。党中的领导人物分析现实，承认共军的组织、纪律和宣传都很强，共党科学化，国民党缺乏这些，应该努力争取。但认为共党违反人性，破坏道德，毁灭中国的历史文化，必将为人民所弃而予以消灭。在国民党本身，则认为革命中民族民主主义已完成，民权主义则将以选举行宪为归依，现在要实现民生主义，其道亦不外“戡乱建国”云云。为了中国今日的局面，也表示了对于革命和抗战先烈的愧疚。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觉得往者已矣，今日一个政府最大的任务，毋宁是出斯民于水火而登诸衽席。李商隐咏贾谊诗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从实际政治者如果能多问苍生之事，其成功是可以预卜的。

三

至于魏德迈的离华声明，除了造成一种使政府对他不愉快的感觉之外，确也同时产生了一些忧惧的空气。这种忧惧，表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孙科的谈话。九月十六日他对合众社记者的谈话说：

“苏联欲使中国成为他的善邻，但不愿中国与其可能的敌国（指美国）成为联盟。……苏联对中国所以不快，由于中美关系过于密切。苏

联拒绝放弃大连及其在东北之行动，皆系其不愉快之表示。但此非苏联欲捣毁吾人之措施。盖苏联此种行动，系防止美国深入之抵制行动。

撇开孙氏六月间几次谈话不说，客观而单独地看，孙氏这种对苏联的分析是相当正确的；虽然这一番的目的，仍在继续他上月间的意思：如果美国不迅速而有效的支援国民政府，政府得考虑与苏联合作。孙氏以新任的国民政府副主席而屡次发表这样毫不含蓄的谈话，似乎不能说只是他私人的意见，而不代表政府。何况孙氏六月间的几次直率的要求美国表示对华态度的谈话，确是促成魏德迈来华调查事实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所要调查的“事实”，很明显地，亦即孙氏所谓“共军得有苏联军火支持”，“共军已占东北百分之八十五土地”，“共军中有‘韩共’‘日共’”等等。因为这才是美国真正关心的。因为果真如此则真有引起国际战争的可能。但魏德迈在华调查月余，自东北、粤、台返京以后，向人表示，“中国内战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除非内战双方均有别的国家支持。”（见《观察》三卷一期通信《魏德迈在中国所了解的、所烦恼的和可能建议的》一文）由这一句话，也可证明魏德迈并不认为共军有苏联支持，因为双方中的一方原已得美国支持，则魏德迈所谓“除非双方均有别国支持”，证明另一方尚未有别国支持也。魏氏这种意见，当然也曾向政府方面表示过。这可与这次孙氏的话相印证，孙氏说：“美苏均不致在最近发生公开冲突，双方皆在虚张声势。”这与他六月间所谓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云云，完全相反。而上文一转，却由六月间的中美共同防共（亦即防苏）论，改为中苏共同防日论：“中苏对于日本政治经济复活之恐惧，具有同样的观念。”六月间的谈话仅为美援的迟迟不来而对美提出中国可能亲苏的警告，对苏联是不惜指摘其支持中共的。这次，在魏德迈痛斥中国政治腐败以后，孙氏不仅再度警告美国，中国可能亲苏，而且预先铺好了中国同情苏联的道路，至少在对日问题上是如此。并且设身处地为苏联着想，为她找理由来解释（Rationalize）其所以不放弃大连之原因，而归之于美国势力之深入中国。

我在此地无意批评孙氏前后言论之不一致。一个从事于现实政治的人可能从国家的利害观点着眼，随局势之推移而改变其主张。我要指出与孙氏谈话有关的中国外交政策，也在“铜山东崩，洛钟西应”。当美国在数月前初

次提出对日和约由十一国会商，不用否决权而以三分之二通过时，我外交当局原已表示同意。虽经国内舆论反对，但直至魏德迈来华前后，外交当局并未表示更改此意。其他如对日贸易开放等等，可谓极尽媚美外交尾美外交的能事。但自王世杰飞美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已透露中国在对日和议时不放弃否决权之意。九月十九日王世杰在纽约接见合众社记者，则明白表示将与苏联一致行动，拒绝出席美国发起的十一国和会。建议将对日和约提交十一国远东委员会讨论，而该会程序，则明文规定须得四强一致同意。此在形式上用美国的十一国会议，而实质上支持苏联的四强一致同意。王氏发表这段谈话正在魏德迈飞返华盛顿的第二天，也即是魏氏将以建议书提交代理国务卿罗凡特的一天。而一般推测，魏氏建议继续以经济援助中国。美国的评论家对于孙氏的这次谈话仍认为是恫吓之词，实在是一种阿Q心理。

魏氏将怎样建议援华，其数量、性质、时期、条件如何，此时虽尚不可知，但魏氏的态度之劣，确是伤害了中国的自尊心，这比三十四年夏天中国官员在莫斯科商订中苏友好条约时所受的尊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呵！即使是抗战前的川樾茂，也不曾对中国政府有过这样的态度。美国直到现在，尚不知道中国是一个要面子的国家，真太蠢了。有钱借给人家就不给人面子，无论如何是幼稚的行为。中国今日政府是最注重现实的。自有这个政府以来，亲苏也不是新奇的事。在中国人民看来，这一年来美军在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南京种种奸淫杀戮的暴行，其恶感已远超过了三十五年春季苏军在东北的暴行。因为苏联暴行只在东北一地，而美军暴行则遍及全国各大都市；苏军暴行远道传闻，不知其详细及正确性，美军则到处公然继续为之；苏军暴行一经中国人民抗议立即悄然而退，美军则将继续在华，不知何时始撤；苏联还没有敢公然利用整个中国来作反美基地，美国则公然想把中国来作为反苏资本。所以中国政府果真如孙科所说，将考虑亲苏，在对日问题上与苏联采取一致行动以对付美国之培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余毒，中国人民是决不会反对的。美国不要自以为是中国的恩人，自以为中国人全体在感激他，这种错觉是要不得的。

四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附带讨论一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国内战的性质。

在日本投降以前，美国害怕打不倒日本，死人太多，在雅尔达会议中不惜牺牲中国主权以换苏联之参战。美国人的命是宝贵的，她忘记了在中国单独抗战时期以废铁供给日本制炸弹，使中国后方城市中的女子和婴孩的肢体炸得挂在电杆上。直到珍珠港第一次被日本用美制炸弹炸死三千海军，才觉悟到中国人已替他流了四年的血。但当她自己的血宝贵起来时，仍旧会牺牲中国给她的盟邦苏联。在刚胜利时，美国希望中国和平团结。马歇尔来华调停内战，我们是真心感谢的。虽然调停并不成功，但中国各方仍感激他的好意。中国的内战，虽然是自己的事，但不能说完全不受国际影响。美国在战后一味想争霸世界，制造秘密武器，和苏联争权夺利，把整个世界局势搅得这样坏，而中国内战之两造俨然分属于美苏两大势力范畴，自不容易协调。美国的政策，自己和苏联越搞越坏，而责备中国两党之不合作，实已十分矛盾。中国因为在政治形态上一般倾向于英美式的民主，在工业建设上待借重于美国的机械与技术，在抗战时期与美国有并肩御敌的患难友谊，中国政府和人民之亲近美国是很自然的。中国与苏联自抗战以来本无恶感，有之则根源于雅尔达密约，美国有造成之责。美国不但以雅尔达密约构成中苏的间隙，并且妄想利用为反苏基地以争霸世界，加重了中国内战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以及使中国政府因上述各种原因而引起不断的困难，直接间接助成中国的内战。如果美国自始不想以中国为反苏基地，中苏关系不会如今日的情形，所以我认为孙科最近的分析是正确的。最妙的是美国一面要利用中国为反苏基地，一面又劝导源于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合作，使这块反苏基地变成整个的而不是残破的。马歇尔以此抱负来调解中国内战，不成功则大骂双方。七十岁的老人竟全不想美国政策的本身与他的使命有着内在的矛盾！军人之对于政治是外行殆无分中外。美国如果真心希望中国和平团结，不必急得常常派特使来，只消自己和苏联的关系弄得好了，不但中国人自己会觅致和平，而且世界和平也有保障。如果美国自己继续反苏下去，而希望中国亲美亲苏的两党能合作，这样的政治逻辑，只有山姆阿叔才亏他想得通。如果美国索性不管中国的事，美军一起撤出中国，中国的情形要简单得多，国内问题也自有一个解决之道。中国这次如果能由在对日外交上的中苏一致，逐渐消弭中苏间隔阂，解决两国的悬案，则对于中共问题，也许反而容易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

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

周炳琳等

最近政府突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负责当局甚至谓将适用“处置后方共党临时办法”加以处理。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尤其在政府宣称积极行宪的前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此事业已引起社会注意，我们站在自由国民的立场诚有不能已于言者。

政府此举旨在消灭民盟，且不论其直接效果如何，实对民主宪政的前途留下极恶劣的影响。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今政府压迫民盟之举，实难免于“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诟病。充此而言，势必至于唯依附政府之政党始能活动，唯顺从当局之人士始得自由。一不合作，遂谓之“叛”，稍有批评，遽谓之“乱”，又且从而“戡”之。试问人民的权利何在？人民的自由何在？我们即使不为民盟不平，也不能不为国家前途，为人民安全，感到深切的忧虑。政府如简捷了当明白宣告不复实行民主宪政，我们即无一句话可说。政府既尚宣称维护民权保障自由，则我们还愿意郑重进其忠言：对于一个持异见的在野政团如民盟者横施压迫，强加摧残，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举动。

从法理的观点言，我们更愿指出几点。团体固为各个人所组成，但个人行为却不一定即团体意志的表现。政府所列举民盟某些分子的若干行为，即使确有其事，也不当影响其所属团体的合法地位。例如抗战期内各党分子或不免有附敌者，我们不应就认该党为卖国的党。此其一。团体而被解散，其组成分子之个人绝不应因团体而株连。民盟盟员个人倘无违法行为，绝不应因其身为民盟盟员而有罪。例如目前南京民盟人士之被监视是不当的，所传

强迫民盟分子依限登记是无理的。此其二。人民如有犯法之罪嫌，拘捕必须依法，审讯必须依法。至于政治罪嫌，尤应许其有公开申辩之机会。此乃法治国家之起码的条件，无待申论。这是说，近来各地层出不穷的“失踪”事件也都是破坏法治损害国家的现象。此其三。

据上所言，为民主宪政前途计，为人民基本权利保障计，我们愿以自由国民的立场，向政府严正陈言：（一）对于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一事，应当重作决定；（二）倘民盟竟被解散，其善后各事之处理必须照公平合理之原则，不得稍有蹂躏人权之举；（三）恢宏气度，责己容人，才是贤明执政的作风，政府于此尚须多加留意。义之所在，不容臧然，愿与全国人士共勉之。

周炳琳 金岳霖 赵紫宸 张 颐 朱光潜 朱自清 陈 达 赵承信
张雪岩 郑华炽 郑天挺 俞平伯 许德珩 吴之椿 邱 椿 王铁崖
楼邦彦 戴世光 孙云铸 邓以蛰 杨人楩 袁翰青 雷洁琼 钱伟长
余冠英 胡世华 樊 弘 容肇祖 严景耀 翁独健 冯 至 游国恩
费 青 任 华 黄 眉 郑 昕 李广田 孟庆基 张龙翔 陈振汉
孙楷第 许维通 沈 元 曹本熹 屠守锷 段学复 罗士华 王遵明

政治年度总结账

《观察》 特约记者

（《观察》南京通信）着笔写此通信，已是十二月初旬，距今年大除夕，不过二十几天了。今年这一年，真是不平凡的一年：由和谈而戡乱，由戡乱而准备行宪，办理普选。在政府的立场说，可以算是做了几件大事。本年年度开始后，张岳军以试行“责任内阁”的姿态上台。当时政府当局，表示今年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是“吃、打、选”；第一件是物价，第二件是戡乱，第三件是国大代表和立委的选举。到今天止，每一件事的发展，都深刻地受着客观环境的牵制。现在时令已是“风雨凄其，草木零落”，政治的形势也正配合着时令，“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了。粗略地看今年政治的成果：

军 事

东北地区，从熊式辉、杜聿明到陈辞修，其态势始终是政协破裂前夕的态势。不独未北渡，还把安东一地自动放弃。最近共方六次攻势，政府军仅止于保持沈阳长春几个据点，在这里吸住了三十万至五十万大军，形成一笔可观的负担。平汉线，上半年还略有进展，到上个月，竟轻轻地丢掉石门重镇，平津三角地带时时在敌势的威胁之下；算是这方面的成绩最坏。山东方面，费了五次攻势，付却李仙洲、张灵甫两兵团和其他零星部队牺牲的代价，拿下了烟台、控制了鲁东。关中军事，自攻克“赤都”之后，始终为贺龙彭德怀留置的武装力量纠缠。榆林三边，由于“马家军”的效忠，几次危而复安，这是一个相持之局。最麻烦的莫过于刘伯承的南甯大别山，陈赓的东渡黄河、进据豫西，和陈毅的突围打进津浦路、陇海路三角地带。在八九

月间，皖中名城迭陷，烽火几乎烧到江边。鄂东三黄全陷，九江武穴的江面一度断航，武汉戒严了好多天。这时山东地区的大军还未回击，西南的军队又远水不救近火，连首都这个神经中枢，都动荡不宁起来！说也可笑，神经过敏的有产或有权阶级，近日来颇有“台湾路线”之说，可想见自相惊扰的程度了。

经 济

政府对今年经济措施，第一是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案，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所颁布的经济改革方案。那是一篇八股，把各方对经济的观点，都罗列进去，避开现实，高谈根本，在经济界中，简直未生影响！因为所保证的如发展生产事业、增加生产等等都落了空；而现实的市场反应，却是发行无法遏止，物价继续上扬，枯竭的外汇无法增加，因此改定了外汇官价，随市调整，以官价追随黑市。可是问题又来了：第一是发行不断增加，法币随时贬值，持有外汇、美钞、黄金的人们，心理上总觉得财产是自己所有的安全，政府所给予的没有保障，因此官价反为黑市促进的力量。第二是华南走私。尽管把罗卓英换了宋子文，依然堵不住港九的漏洞，并且更加甚走私商人的借口，与特权阶级在此处的方便。走私一天存在，官价外汇便一天不能保持住稳定的价格。这期间还有一个新矛盾。年来倒宋倒孔和宋去张来，适足代表某一经济集团与另一经济集团力量的消长。宋孔是豪门资本，凭借着国家金融圈伸张其官僚资本网；现在的中央银行主人，却是民间资本的代表。前者要统制，要打击民间资本，才能垄断市场；后者则需要扶植，开放，以补偿几年来的损失。从外汇政策上，从工商贷款的政策上，都可以反映出来。为什么前些时头寸泛滥，助长物价，黑市金钞生意兴隆呢？明眼人可以窥知其间消息。经济的另一面是粮食。但今年的粮食政策还是继续抗战以来的路线，它的成功是建筑在：一、人民把劳力所得的三分之一以上贡献出来；二、各省县财政，受到极度剥削，以实物换低微的粮价，而把所有正当的开支，转嫁到良善的小工商业者和农民身上——摊派；三、是政府支出浩大的经费，约相等于所收粮食的价格数字的法币。有些地方，几乎收不敷支——这种支出，其实是养着大批粮官，和哺肥了若干交结官府的粮商。在这里更要注意的是，粮价迄今仍保持着领导物价的作用，并未以“征实”而

削弱其涨价的作用。另外一向领导物价上扬的公用事业，尤其是运输邮电等，在这一年内，尽管政府仍有补贴，而仍一再涨价。就中铁路的营业收入，一直未交国库，亦未交部统筹；乐死两路，饿死其他。有赢余的路，建筑、福利，式式具备；没有收入的路，一切缺乏，借债度日，还要担负若干不必要的人员的开支。如此而谈经济管制，岂非去题万里？

政 治

这方面最重要的是选举。国大代表是如期选举了——绥靖区除外。可是三党在选举中所表演的，都是令人啼笑皆非！从颁布的国代和立委等选举法看来，大抵是参考其他民主国家的办法而起草的。可是事实上，又是另外一套，种种问题都来了。首先是党内派系作祟。凡是党官——党内既成派系的人物，在选举会报中，差不多一律做候选人。非党官和无背景，无力量，而保有社会的信仰的党员，大吵大闹起来；闹到招待新闻记者，自己□自己的垃圾。这个问题好容易让“党纪”压倒，而民青两党提名要求保证的问题又来了。其实民青两党也太相信国民党的纪律了。国民党这些年来所维系党的团结的，毋宁说是历史与感情。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冲突时，便只有自己。在上年六全大会时，李文斋因为没有当选中委，愤然缴还党证；某女同志，痛哭流涕在大会场里骂陈立夫，便是一例。这次各地方候选人的竞选方式，首先利用党的关系来竞圈，圈不着时便回家玩“五百人”竞选。兼之地方政权，多与中央党权有矛盾：安徽某县，省政府支持的人未中圈，便指示县政府“依法选举”，即其一例。民青两党以绝对统制，期望国民党，无怪其失望而抱怨“友党保证多数落空”了！以此，国民党中央，遂运用压力到国选总所，可通过国选总所，悍然以政党提名为唯一途径，已当选的人士，不惜压迫令其退让。其作用只是维持“三党行宪之局”，以此为民主的象征，哀哉！

论不满现状

朱自清

哪一个时代事实上总有许多不满现状的人。现代以前，这些人怎样对付他们的“不满”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头。年头就是时代，世道由于气数，都是机械的必然；主要的还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这个世道里，这个年头上，怪谁呢！命也是机械的必然。这可以说是“怨天”，是一种定命论。命定了吃苦头，只好吃苦头，不吃也得吃。读书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强调那“时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叹，好像“人心不古”才“时世日非”的。这可以说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是“尤人”。人心为什么会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贤者不在位，统治者不好。这是一种唯心的人治论。可是贤者为什么不在位呢？人们也只会说“天实为之！”这就又归到定命论了，可是读书人比老百姓强，他们可以做隐士，啸傲山林，让老百姓养着；固然没有富贵荣华，却不至于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头。做隐士可以说是不和统治者合作，也可以说是扔下不管。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一般就是这个意思。既然“独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别人死活和天下兴亡了。于是老百姓不满现状而忍下去，读书人不满现状而避开去，结局是维持现状，让统治者稳坐江山。

但是读书人也要“达则兼善天下”。从前时代这种“达”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当然要多多少少改变那自己不满别人也不满的现状。可是所谓别人，还是些读书人；改变现状要以增加他们的利益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于只担个名儿。若是太多照顾到老百姓，分了读书人的利益，读书人会得更加不满，起来阻挠改变现状；他们这时候是宁可维持现状

的。宋朝王安石变法，引起了大反动，就是个显明的例子。有些读书人虽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辈子憧憬着有这么一天。到了既穷且老，眼看着不会有这么一天了，他们也要著书立说，希望后世还可以有那么一天，行他们的道，改变改变那不满人意的现状。但是后世太渺茫了，自然还是自己来办的好，哪怕只改变一点儿，甚至于只改变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况且能够著书立说的究竟不太多；著书立说诚然渺茫，还是一条出路，连这个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满向哪儿发泄呢！于是乎有了矢志之士或失意之士。这种读书人往往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政府不用他们，他们就去依附权门，依附地方政权，依附割据政权，甚至于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极端的甚至于甘心去做汉奸，像刘豫、张邦昌那些人。这种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贵荣华，没有原则，只求改变，甚至于只求破坏——他们好在混水里捞鱼。这种人往往少有才，挑拨离间，诡计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种权力，才能发生作用；他们只能做俗话说说的“军师”。统治者却又讨厌又怕这种人，他们是捣乱鬼！但是可能成为这种人的似乎越来越多，又杀不尽，于是只好给些闲差，给些干薪，来绥靖他们，吊着他们的口味。这叫做“养士”，为的正是维持现状，稳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力，这里面包括韧性和惰性，虽然很大，却也有个限度。“狗急跳墙”，何况是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涨，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了总有希望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是“造反”。农民是主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民变或造反并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给暂时的压下去了，统治阶级的史官往往只轻描淡写的带几句，甚至于削去不书，所以看来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汉明两代都是农民打出来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实是不可轻视的。不过汉明两代虽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来的，结局却依然是一家一姓稳坐江山；而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农民的面目，倒去跟读书人一鼻孔出气。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现状，可又复原了现状，改变是很少的。至于权臣用篡弑，军阀靠武力，夺了政权，换了朝代，那改变大概是更少了罢。

过去的时代以私人为中心，自己为中心，读书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来的天下还是归于一家一姓，落到读书人的老套里。从前虽然也常说“众擎易举”，“众怒难犯”，也常说“爱众”，“得众”，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庆，万众赖之”的，“天与人归”的政治局势，那“众”其实是“一盘散沙”而已。现在这时代可改变了。不论叫“群众”，“公众”，“民众”，“大众”，这个“众”的确已经表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前固然也潜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现在却强大起来，渐渐足以和统治阶级对抗了，而且还要一天比一天强大。大家内忧外患里增加了知识和经验，知道了“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渐渐在扬弃那机械的定命论，也渐渐在扬弃那唯心的人治论。一方面读书人也渐渐和统治阶级拆伙，变质为知识阶级。他们已经不能够找到一个角落去不闻理乱的隐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已经没有地方去做“军师”。他们又不甘心做那被人“养着”的“士”，而知识分子又已经太多，事实上也无法“养”着这么大量的“士”。他们只有凭自己的技能和工作来“养”着自己。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后改变成什么样子？这真是个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势，我们得提高警觉来应付的。

一个农业工作者的自白和意见

袁国弼

我是刚从一个小农业岗位上退下来的人。我本来是武昌湖北农学院的教员，三十五年秋，应朱怀冰先生之约，在湖北黄冈主持农林场以及赤壁公园的设计工作。最近离职，寓居乡间，偶读《观察》三卷三期留美同学李克佐等八位所作《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感想极多。李克佐君等文中所陈述的理想，如不支薪金、仅由农场供给食宿、竭力和农民接近，农场工作人员兼教附近农民子弟读书，以及和农业研究机关及学校密切合作从事部分研究如解决病虫害问题等等，我大体上都走过了。我们在黄冈时，同人中有许多都穿上草鞋，亲持锄头，而其待遇之低，仅及武汉同等底薪的三分之一，一百五十多亩的土地，生产收获，犹不足养活场内职工。兹愿自述过去经验，以供有志农事者的参考。

一、水利与肥料问题。这个问题看似平淡而极重要，因为它是影响作物生死存亡繁荣孱弱的基本条件。几十年来农业机关着重试验场的育种和推广，往往一种作物在试验场上是极优良的品种，可是推广到农家去，由于肥料的不足，往往生长情形反不如土种作物。笔者在黄冈虽试栽金大二九〇五大号小麦，即因为经费不足，不能充分使用肥料，不仅未能显示出它的优异，反而生长较差。笔者战时曾走遍西南各省，远及西康滇西，往往看见农民勤劳如恒，其他一切条件似均具备，而作物则仍萎疲，可怜，可见肥料问题若不解决，其他问题便无从谈起。至于水利，中国人向来吃尽了水灾旱灾的苦头。最妙是水利发生了困难或灾害时，学农的人一面只得徒唤奈何，一面却认为这是管理水利的人的事。可是管理水利的人却说，他们要做的事很

多，还管不到农作物上面来哩！于是所有中国的老百姓，今日还是和二千年前没有两样，仍然靠天吃饭！肥料和水利那大问题若不解决，则所谓“增产”，“扩大栽培面积”，都将成为不能兑现的空话。

二、工作效率问题，要增进工作效率，不外乎加强工作强度和改良工作工具，我们现在来看就现制度情势之下是否能加强工作强度和改良工作工具。大家知道，剥削制度在封建社会里较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更加严厉残酷。中国社会剥削的残酷是举世闻名的，在农村社会中为尤甚。黎明即起，既昏方息。如果逢到雨水不调，还要加开“夜车”，没有礼拜，也没有假期！这样还要加强工作强度，实在太不人道！当然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减少时间加紧工作呢？笔者也曾在黄冈农林场这样做过，但并无效果，实际上要增加工作的效率，还得在工作工具上想法。但根据过去国营金水农场使用曳引机等新式农具的结果，证明在中国还是人力便宜；机械最贵。现在虽然人工昂贵，但在经济情形没有基本的改变以前，这现象也依然不会改变。即使我们可以训练农场里的工作人员使用机械甚至自己驾驶修理，可以节省一部分费用，但不可节省的汽油（或柴油），机油，零件等，其费用仍将占农场总支出中极大的比例。因为中国这落后的农业国不比美国，处处需要用外汇去买。就这一点，已经注定了李克佐君等文中所说的生产农场必须紧靠近都市。不然费用更大，甚至机器还会“罢工”——发生故障而无法修理！（笔者在黄冈曾为了买几个螺丝钉而特去汉口。这岂是在美国即使是在上海的人所能想象！）但这并非说工作强度无可加强；或者农具不必改良。相反地，这两条途径都不失为增进工作效率应取的途径。只是其中困难太多罢了。尤其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式农具必须能适合当地使用。理修补充都要毫无问题。像救济者发给黄冈的农具，因为原来在澳洲美国，是用双畜（马）拖的。而在中国，一头水牛拖不动，两头水牛不会拖，水田尤其无法使用，因此几百架远涉重洋而来的洋农具只好堆在那里锈烂。

三、工作人员的态度和与农民接近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凡是决心下乡改进农民生活的人，他们应该对于工作具有高度的热忱，对于四周的农民应该谦和而竭力设法和他们接近。李克佐君等说：“我们要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种田，仅仅生产方式和技术不同而已。所以比较容易和农民接近，打成一片。”不过问题并不简单。李又说“工作人数因农场大小而

异，在六百市亩以下者，以两人为限：一人负农场责任，一人负工厂责任”。这一人负责自然是指职员一人负责。（没有提到工人，当然是尽量少用，同时职员工人没有界限，打成一片）。但依笔者在黄冈农林场的经验，认为工作热忱虽属必需的，但亦有其限度。一个农场（只要它堪称为一个农场）仅有一个能写能做的负责人是无法应付的。除了我们体力底不如人家会发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形之外，并常常会感到无法分身之苦。因为一个农场的杂务是相当繁琐的。如运输贩卖以及一切事务底接洽，委托一个目不识丁的或智识程度甚低的工人常常反而僨事。中国农村绝非美国农村所可比拟，其困难有时超出想象。如果这个生产农场除了示范作用以外，还想做点影响其周围的推广工作的话，那末一个具有农业常识“文武全材”的技术员兼推广员更是不可或缺的了！所以这个农场的工作人员，劳力者（工人）之多少视面积大小而定；劳心兼劳力者（职员）则无论如何除了主要负责人以外，必须有一个助手。因此就这一点，已经决定了这个农场的面积不能太小（不能小于五百亩）。否则农场负担太重，太不经济。至于要和农民接近，仅仅“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种田”显然是不够的。譬如黄冈农林场的工作人员就岂止“一样的种田”，连生产方式和技术也没有多大的不同。甚至农林场的农具杂物都不分彼此，和农民共用。可是我们并没有达到“和农民接近，打成一片”的理想境界。不错，我们相处甚洽，曾替他们教育子弟，解决一些小的疑难问题。然而他们最多也不过是把农场当作“贵宾”而已。这问题的基本原因是农场和农民的利害并不一致，而农场又不能解决农民切身的问题如水旱、肥料、田赋、税捐等等，所以形成漠不相关的状态。其实，把握住问题的重心，只要能谋取农场和农民的利害一致，替农民解决困难问题，使农民深知受惠而有休戚相关之感，那末农民自己都会来和农场接近的。否则，即使和农民相处得好，彼此也不过是相敬如宾而已；要是关系差一点的，不仅漠不相关，甚至还会因妒忌而敌视起来！

四、交通和治安问题。交通便利的程度和治安状况直接相关。无疑的，一个农场的位置最好是在城市不远的上游，而城市的大小一般也是和治安的好坏成正比的。所以就交通问题而言，这个农场最好在大城市而有一舟之便的近郊。固然大城市近郊的农村往往不足以反映整个的中国农村，但为了使这生产农场易于成功而不致中途夭折，开始的时候也管不了那许多了。这想

来是不会成多大问题的。成问题的是治安。治安问题主要的是土匪和军队的破坏和骚扰。讲到土匪，当然在现在烽火燃烧着的地方，遍地是匪不必说，就是在平时，在后方，土匪的威胁也是很严重的。笔者家里在战前就有七八百亩田地，在苏北运河东的碱土地带，那里作物生长得相当好，可是因为土匪的威胁，每年的收获竟没有一点把握。也许会有人想起美国当初开发西部的时候土匪也是很利害的，可是情形不尽相同。中国人口稠密，农村普遍破产，问题严重得多，如果组织自卫队或请政府派兵保护，那又不是几百亩的一个农场所能负担得了的。最好当然是场内人员都能武装自卫，虽不一定能确保安全（尤以洋机器最惹人耳目）但总比较行得通。那末开办费中不可不列一笔枪支弹药费了。其次讲到军队，李文中也曾提到“希望政府保障我们的工作不为军队破坏”。要政府保障？不成问题，政府一定会保障的。譬如用最高的机关出的最严重的布告，给当地政府和有关机关以命令严饬保护等等，凡是文字上所能尽的努力，政府绝对会竭诚尽到的。但实际负责的人切莫就此引以为足！不要忘记这个国度是一个公文政治的国度！这里举几个实例借以窥其概略：笔者五年前在贵阳一个公园里负责技术工作，因为不堪军队砍伐树木之扰（仅有几十株粗不及饭碗口的洋槐），向省政府取了一张吴主席（时兼滇黔绥靖副主任）的保护布告犹嫌不足，又设法弄到了一张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命令军队保护树木的布告，高高的挂在树上。可是还是来了十几个士兵，附有三四枝步枪护行。笔者当即上前请求停止砍伐，并指着布告解释说：“蒋委员长和吴主席都有命令军队须保护树木，不得任意砍伐”。其中一个武装同志立即大声喝道：“那你为什么不请蒋委员长和吴主席多发几个柴火费呢？不许多讲话！我们砍了这两根就走的！”当时受了一肚子闷气，心想“他们的理由也许是比我还充足呢？”又一个例，年前的黄冈是湖北的实验模范县，县长是曾经当过军长的中委朱怀冰，这件惹人注意的事，至少在湖北，真是谁人不晓！为了响应省政府绿化武汉、绿化湖北的号召，县政府在黄冈城内外也造了不少林。在城内部分，因与农林场毗连，故由农林场负责保护。为防患于未然计，除会同警察局共同保护外，并四处遍贴中委的布告。然而武装同志依然来找麻烦，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朱氏为政甚勤，有一次他到造林区域去巡视，正遇见一个士兵在砍树。他问那士兵：“谁叫你来砍的？”那士兵说：“因为柴火费不够，班长叫我来砍的！”朱氏

说：“下次再来砍，我先把你的脑壳砍下来！”那士兵吓得浑身发抖，抱头鼠窜而去。但朱氏不能天天去巡视，所以不愉快的事情还是接踵而至，终于在几个月以后，被一把火把所有的马尾松烧得干干净净！和这件事相隔不久，另外一部份有名的部队来了。他们把农林场的稻草全部拿去，我们说明这是公家的，稻草是准备冬季喂牛的，请求他们不要全部拿去。他们回答说：“公家，正好！我们也是公家呀！你们可以用，为什么我们不能用？”结果冬季两头牛只好挨饿。此外农林场准备做猪舍的木板杉木被全部拿去，留下了一张数目不足，不署名也不盖章的收条。这些事发生在曾任军长，现为中委做县长的小小的县城里，“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难题，但谁也没有想出的确妥善的应付办法来。

五、农场内附设小型工厂问题。这在为久远的中国农村着想，尤其是为中国的工业化着想是应该的——安顿农村过剩劳力，储备工业生力军。但不知这工厂的产品将是些什么东西？从李文中看起来，这工厂似乎是个训练技术的机械工厂。那末它绝不同于乡间的翻砂场打铁场是可断言的了。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农村底过于落后和生活水准出乎意料的低落！要知道中国农村是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的啊！不错，我们应该提高，应该改善，但必须注意那组织那机构是否的确能在农村里生根立足，否则也和以前一些要人先生们一样，心血来潮，发了愿心以救苦救难者的姿态到农村去，利用他们特殊的地位，广设些特殊的机构。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这些机构本来就没有能生根，等到他们一声“倦勤”，于是那些“德政”也随之“人亡政息”。中国的一些轻工业，尤其是小机械工厂，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像上海汉口那样大的大城市里。他们的产品像螺丝钉，铰链、风钩、洋锁等，也都是以城市为对象的产品，和农场根本不发生关系。所以一个机械工厂在农村并未机械化或生活水准尚未提高以前，它在农村里的生存条件是极其恶劣的。当然，我们不能等待“机械化”“生活水准提高”自天而降，可是为了使这个工厂能在农村里生根立足（供应农村的需要），又不失为训练技术的机构，这个工厂虽不同于翻砂场打铁场，然而他们的产品像犁头、锄、耙、锹、铲等则必须全部包罗，然后从改良品质着手，附带制造些供应城市需要而在训练技术方面所必需的产品。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受了钢铁等原料、工具、配件等底限制，这个工厂必须紧贴住大城市，其距离不得超出半日行程（一日往返）。

至于其他设立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原动力等，我们当然也应加以考虑。像黄冈县去年集中了巨大的财力和注意力去购买榨糖机，想设立机器榨糖厂，因为燃料昂贵又不能源源供应，和技术人员底缺乏，结果功败垂成，始终未能使机器转动起来。

农场的组织问题。本文中提到的是向政府或私人租地。土地是荒地或现成农场。经费是贷款。这就是说，这个生产农场和其他的民营农场在创办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希望政府保障工作，免除苛捐杂税，予以各种方便；希望社会人士鼓励，协助和合作而已。可以想象得到的这是一个由负责人办理的私立农场。这里很有商讨的余地。首先我们把私立农场和公立农场作一个概略的比较。私立农场须缴纳租税，不能保证工作人员避免兵役，贷款的限制较大，没有领取救济物品的方便（像黄冈的救济农具，种子等物资，虽说联总禁止贷放公家机关，实际全由县农场经手；联总虽已撤销，但救济种子，肥料等仍可能来华），没有公事上的方便和名义上或精神上底慰藉等等。这些缺点却正是公立农场所能占便宜的地方。公立农场的缺点呢？公事手续，尤以会计公文手续麻烦得等于浪费。经费、法令等的限制太多，影响工作效率；人事制度底不合理，不能放手做事；工作内容的限制等等。这都是公立农场的缺点。从上面这简略的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一个私立农场底不易经营和公立农场底不易见效了。在目前一些民营农场为了工作人员能够避免兵役，或因农贷底限制，不得不假借公家的名义，打出合作农场的招牌。一些公立农场为了要取得救济物资等，又不得不假充私人农场，甚至造些贫苦农家的册子。这种不伦不类令人不愉快的现象，虽然曾被外国人严厉地指责过，但中国始终是中国，这种“国粹”短期间恐怕还不会灭绝。现实是最冷酷的，我们就事论事，为了适应这恶劣的环境，要建立一个农场能集公私农场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最好是公家的名义而用私人农场经营的方法。这似乎不可能办到。那末退一步，公立农场的一切权利都应该尽量设法享受，不错，政府曾经几次三番地公布奖励垦荒，奖励开办农场，优先发放农贷等条例。实际上，因为没有保障，有志之士多裹足不前。垦荒办农场往往由一些外行或无以为生的人去干；农贷在农村里也多半没有产生它应得的效果，反而给了农村里一些土豪恶棍放高利贷的资本。这当然不是政府的本意，也更非国家之幸。现在李克佐等八位同学不愿意当教授，做工官农官，

诚如陈衡哲先生所说的，是“不常遇见的”。政府给以免赋的土地，免息的农贷，免除一切苛捐杂税，给予一切优待，是应该的也是义不容辞的。何况政府又曾经公布过奖励的条例。不过事实上尽管是公地，私人的投资恐怕是免不了的。那末李文中所说的“不取薪水，尽由农场供给食住”不免就显得“劳资合作”的合同订得含糊而有点感情用事了。这是不必要的！难道这农场只能生存于这五年的“牺牲”时期吗？中国人重人情，轻法理。这都是封建社会的特征。也就因为这种原因，很多事业无法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有规律而容易发展。多少从事农业工作的人抱了牺牲的决心去实地苦干，也为了这种原因，结果对公家，对“老板”都是吃力不讨好！一切都按照正常的规例办理好了！不必事前就掺杂着人情的成分而结果终于牺牲在“人情”之下！但是李文中所述的生产农场终究不是一个寻常的农场，它是以合作农场提高农民生活为其目标的。那末从基本上就应该与众不同，才符合“为中国农业试探一条出路”的初衷。因此，采取了资本主义的进步的耕作方法，又全盘接受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内容，尽管经营的结果是成功的，也不过是几个人赚了一点钱，发了一笔财而已。对于整个中国农业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也不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因为时代是不同了！中国这古老的国家，自然的环境，人文的条件，在在都不容许我们能像欧洲当初开发新大陆那样自由自在的了！我希望我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合作式的农场！这个农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姑且分为职员与工人）和投资人员让他们都是农场的主人，从这项原则去商讨它的细则。负责人既许以五年；一切的工作人员也必须以五年为期。投资人更不消说，五年之内是不能发生异议的（当然这不是说五年以后大家就散了）。这里值得提出的是一个农场在开发时的三五年以内是最艰苦也是报酬最少的阶段，经过这艰苦阶段以后步入平坦道路则报酬递加而困难减递。近年来办农场的呼声甚嚣尘上，然学农的自己办农场的人却并不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自己有钱有地的，不愿吃苦或“逐蝇头之利”，而做官或经商去了；无钱无地的，怕当伙计。因为多数投资的人都摆出一副老板的神气，这种例子极多，像重庆北碚附近某农场请了一位学农的替他经之营之两三年，规模粗具，一切上了轨道。主任嫌开销大了，派了他的儿子去“协助”，结果不到一年就把这位学农的解雇了。这种事太不公平也太令有志之士寒心了！我们相信响应八位同学的先生们一定是具有远见的开明之士，这

也许是些过虑的话。不过时代是不容情的！现在要想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生产总和，仅仅靠使用有效工具，加强工作管理，显然是落后的，并且有其一定的限度。要提高效率，增加生产，最有效的途径是促进工作兴趣。而促进工作兴趣最大的推动力就是给予工作人员以所有权，使得每个人都自觉他是农场的主人之一。这一点特别提出供有志出钱出地之士的参考！

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长沙

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楼邦彦

我一直认为动员戡乱与实施宪政绝对不能同时并行，因为动员戡乱是超乎理性的行动，实施宪政乃基于理性的制度，动员戡乱一天尚在进行着，也就是说内战倘一天未能获得合理的解决，实施宪政便终究是政府顾虑的招牌，或竟是政府玩花样的手法。今关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制定，更加强了我的看法的正确性。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系依照新《宪法》第一七十四条第一款的程序制定的，第一七十四条规定新《宪法》的修正程序，第一款是两种程序其中之一，即“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之提议，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决议”，修正新《宪法》，修正当然包括补充。《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显然并非严格的宪典修正，而是专为适用于所谓动员戡乱时期的临时补充条款。

《临时条款》制定前，有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背景。四月四日蒋主席于国民党中执委临全会致训，其大要是：“外界批评国民党无组织，无力量，无纪律，但如每一党员忠于纪律，即可发挥力量。我为国民党领袖，党员或不忠组织，我不能如此。党员或不守纪律，我不能如此。故有人希望我表示竞选总统态度，我认为应由党内决定。反之，自己表示即不忠组织，不守纪律。我们应该接受历史教训，民国元二年间，党的失败即因为党员不遵守总理之指示……个人认为当前局势严重之时，总统可由非国民党人竞选，个人虽不为总统副总统，仍可与共产党奋斗。”（载天津《益世报》）后经临全会根据常务委员的研究报告，经全场无异议通过拥护蒋主席竞选总统，蒋主席

大概为了忠组织，守纪律，也就接受了。此一插曲的真相或许永远不会弄得清楚，但是跟着便发生了修宪提案，不免令人联想到种种相关的问题。蒋主席一再向党员致训，不主张修宪，于是其他修宪提案都被搁在一旁，最后仅仅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紧接着便是四月十九日的总统选举投票，结果蒋主席以获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为总统，他即得以总统的地位，在动员戡乱时期享有《临时条款》所赋与的紧急处分权。

兹就《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本身，逐项来加以讨论：

第一，紧急处分权的范围。《临时条款》第一项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用无论任何观点看，像这样的紧急处分权的范围，可谓为庞大无比。根据新《宪法》第三十九条与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总统在非常时期得能行使的权力原已很大，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如下：

“总统依法宣布戒严，但须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决议移请总统解严。”

所谓“依法”，在现法制下，当然是指依《戒严法》。总统宣布戒严是由于战争或叛乱的发生，视情势的紧急与否由立法院事后追认或事前通过，但立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得请求总统解严。今《临时条款》既经制定，总统的宣布戒严权更进一步地可以随时便宜行使，第三十九条以及《戒严法》当然就成为具文了，而立法院在制度上可能发生的限制总统权力之行使的作用也就变成虚无了。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如下：

“国家遇有天然灾害疫，或国家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须为急速处分时，总统与立法院休会期间，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依紧急命令法发布紧急命令，为必要之处置，但须与发布命令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

这是新《宪法》赋与总统的紧急命令权，行使此种权力的场合是发生天然灾害疫或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而必须以急速处分来应付时，行使此种权力的条件是为必要处置而发布紧急命令，必须于命令发布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只要立法院表示不同意时，紧急命令便不能继续发生效力；一

切紧急命令的发布应依《紧急命令法》的规定。类似这种紧急命令权的规定，诚然不无相当危险，犹似德国威玛宪典第四十八条被运用的一段历史，但是在原则上，任何国家既不能避免危机的发生，而应付危急首须争取时间，不然将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那么发布紧急命令的办法自然是有其可辩护之处的。这不过是说明了紧急命令权的必要，它之能否被运用得成功，尚须视守法的精神与宪政的传统而为定，要没有这种精神与传统存在，任何权力，固不仅是紧急命令权而已，都是可畏的。今《临时条款》既经制定，总统的紧急处分权已远超过紧急命令权的范围，因为紧急命令在程序上尚须于发布后提交立法院追认，立法院并可对之表示不同意，反之，在《临时条款》之下，立法院所能发生的作用，几乎是丧失殆尽了。

所以根据《临时条款》，只要发生了紧急危难或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而在动员戡乱时期，随时随地都是紧急危难，随时随地都有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总统皆得不受《戒严法》与《紧急命令法》的约束，而为紧急处分，其仅有的程序上的限制是“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这在实际上恐怕并不过分重要，乃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紧急处分权的限制。《临时条款》第二项规定：“前项紧急处分，立法院得依宪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之程序，变更或废止之。”此项规定授权立法院可以变更或废止总统的紧急处分，其应采取的程序依新《宪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该款规定的程序，立法院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包括废止）它所不赞同的行政院的重要政策（适用于《临时条款》时便是指紧急处分），行政院并无非遵行不可的义务，经总统的核可，它得移请立法院加以复议，“复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这里可得注意者有两点，第一点是制度上的枝节问题，第二点是所以表明立法院予紧急处分权的有限的限制。（一）在制度上说，紧急处分仍由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因为表面上，紧急处分权的行使都是经行政院之决议的，但将来的行政院恐仍是总统的御用机关。（二）立法院的变更或废止紧急处分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行政院可以移请复议立法院关于变更或废止紧急处分的决议，复议时若未经三分之二出席立法委员维持原决议，紧急处分仍不失其效力，这就是说，自有绝对大多数的立法委员不赞同紧急处分时，该紧急处分始有失其效力的可能，即

使在理论上这也是相当困难的，而假令把现实的中国政治考虑在内，那是更不必说了。所以在实际的效用，《临时条款》第二项规定几乎全是具文。

第三，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临时条款》第三项规定两种终止动员戡乱时期的方式，一是“由总统宣告”，一是“由立法院咨请总统宣告”。此项规定，事实比法律尤为重要，因为仅是法律上的宣告不足以终止必须出诸动员戡乱的客观现象，换言之，内战的延长也就是紧急处分权的延长，内战一天不结束，动员戡乱时期便不会被宣告终止，宪政也只是借以骗骗人罢了。

第四，国大临时会的召集。《临时条款》第四项规定：“第一届国民大会，应由总统至迟于民国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召集临时会，讨论修改有关宪法各案，如届时动员戡乱时期尚未依前项规定宣告终止，国民大会临时会议决定临时条款应否延长或废止。”此项规定予人以不同的印象，一方面它似乎表示政府的乐观处，戡乱将在一年半以内可以完成，另一方面它又好像显露政府的悲观处，至迟于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集的国大临时会，将因届时动员戡乱时期尚未宣告终止而决定《临时条款》的延长问题。果真是后一种情形的话，我们实不敢想象到那时局势已演变到如何地步。关于召集国大临时会“讨论有关宪法各案”一点，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单纯的在平抑此次国大中主张修宪者的情绪，一是目前以《临时条款》来应付动员戡乱时期，日后再以修宪为手段来使既成事实合法化。后一打算，或许正是政府的本意。别的不说，我们在这里更看到了政府用心的真实面。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分析，已如上述，我的结论非常简单明了。为了趋尚时髦并迎合某几方面，政府以颁布一部宪典来打出一面民主宪政的漂亮旗子，并以之遮盖内战的严重性。但是宪典的条文对于权力的运用究竟是一大障碍，尤其是在这生死关键的动员戡乱时期，这就是《临时条款》的由来。《临时条款》的制定是十足表现了政府一双手颁布了宪典，另一双手又把它撕毁了。让我再重复地说，既抛弃了和平方法来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政府的行宪诚意是永远无以令人置信的。像目前这样的局面，尤其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制定以后，快要为人遗忘了的一九三三年以后的德国人民的遭遇与经历，又泛上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头。

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北平。

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

季羨林

国民大会还在进行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笑剧。里面原因当然很多，而且表演的人也不限于民社党和青年党；但最精彩的几幕，我们却不能不归功于民青两党。我不懂政治学，不知道在外国召开像国民大会这一类会议的时候是否也可以由一党或几党来分配代表的名额；但在中国，这次开国民大会的时候却确实是这样。倘若分配的技巧稍微高明一点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掩遮天下人的耳目；但这次分配的技巧却拙劣到万分，叫人不忍领教。于是跟着就来了一大串精彩的表演：抬棺进会场，国大代表坐在棺上让美国新闻记者照像，代表白天绝食夜里吃水果饼干请医生注射葡萄糖，遗书要跳江自杀却溜之乎也，等等。同时民社党和青年党因为没有得到事前分配到的位子，屡屡向国民党抗议，扬言要退出政府，自居所谓在野党，作出种种丑态，表演了种种嘴脸。于是闹得满国风雨，给在战火和饥饿中挣扎着的人民添了不少的笑（还是哭？）料；好奇的美国新闻记者也得到了许多比人猿泰山和其他充满了大腿和手枪的影片更精彩更惊心动魄的镜头。我想他们一定会伸出大拇指，高呼三声：“顶好”，然后满载而归，让美国人在试验原子弹和赚钱之余大笑几次。大笑以后，说不定脾气变好，把骂俄国的次数和激烈的程度减低一下，然后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但我们的民青两党的人士真不愧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在许多抗议、交涉、谈判、声明之后，虽然依然没能全盘如意；但在大会里的位子总算多得到了几个。他们于是就适可而止，率领了三军，昂然走进国民大会会场，为国宣劳，“代表”我们老百姓选举总统和副总统。他们甚至为了国家连嫌疑

都不避了。自己的亲戚，亲戚的亲戚都成了国大代表。青年党某要人的两位女公子也都被“选”为国大代表。于是新闻记者又有了好材料。我们常从报纸上的所谓“国大花絮”里读到“两位姊妹花”的消息，说她们怎样坐在一起低声谈家常，织毛衣。我想无论谁读到这消息都会不自觉的脸上浮起一片微笑，心情立刻轻松下来。让我们忘记了就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会场里代表我们民意的国大代表们正“代表”我们演着全武行，嘘声四起，掌鸣如雷，主席也许正在台上流着汗。她们仿佛是一片战场里的两朵小花，静静的寂寞的开在雷鸣的金鼓声中，挥动着的干戈丛里。让战士们和非战士们看了，紧张的心情立刻就平静了下来，仿佛做一个甜美的梦。这赐与真太大了。我们还能不衷心感谢这位青年党的要人吗？

但民青两党让我们脸上能浮起微笑的也就只是这“一对姊妹花”，其余的举动只能引起我们的厌恶。我一想到这两党同国民党交涉、谈判、讨价、还价的情形，浑身就有说不出的难过。他们同国民党争府委，争部长，争国大代表，争立法委员，争地方政府官吏，只要有官可作，有利可图，无一而不争。每次都是义形于色，非常坚决；但结果却是，只要国民党稍稍让一点，他们立刻就接受条件，宣言同国民党“合作”。这使我想到——请原谅我这个联想——一位大老爷的两位姨太太。当她们对老爷有所要求的时候，譬如想要一个钻石戒指或一身花衣服，她们就撒娇撒痴，扭屁股，抹眼泪，甚至寻死觅活，投河上吊。老爷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不愿意把这事情声张出去，于是一面恫吓，一面欺哄，终于让她的目的多多少少达到一点。她们也就嫣然破涕一笑，又到大老爷怀里去了。

这样的情形，我们看了只能作呕，而且表演的次数愈多，表演得愈精彩入神，催呕的程度也就愈大。然而最近我看报纸，立法委员位子分配又成了问题，民社党和青年党已经声明不参加立法院，他们又准备表演那一幕催呕的丑剧了。同以前一样，这次也是义形于色，非常坚决，将来的演变虽然还不可知；但我不妨在这里学一学星象家表演一下我的预言的天才。我敢预言：民社党和青年党将来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大老爷的怀里。

民社党和青年党也许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国民党并不见得怎样慷慨大方。他们事前答应的条件也许事后并不怎样高兴去履行。但民青两党一定也不乏明智之士，他们一定也可以看到，国民党之所以请他们参加政府完全想

利用他们作配角来演一出喜剧。国民党弄到今天这样地步，眼看众叛亲离，烽火遍地，一不小心，就会有全盘垮台的危险。唯一的救星就是太平洋对岸的山姆大叔；但山姆大叔偏偏不了解别人的苦处，不体谅别人的困难，硬要国民党民主，不然就不给钱。“民主”这一幕剧当然不是国民党一党可以表演得来的，别的党又没有意思参加。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民社党和青年党毛遂自荐，正如了国民党的意。配角既然找到了，国民党就毫不迟疑的以导演和主角的身份出场演起来。他们心目中的观众虽然并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而是隔洋的山姆大叔；但我们也沾了光，我们连续看到许多精彩的演出，大饱眼福，比上海戏院里演的X本火烧红莲寺还惊心动魄。

我从来不敢看不起配角。倘若民社党和青年党老老实实的演这配角的话，也许还能博得一片掌声；但我总有一个感觉，觉得他们现在已经轶出了他们配角的范围，演起丑角来了。倘若他们老老实实的演丑角，也还可以催人发笑，大有益于卫生，我也不敢看不起；但当一个丑角浑身严肃板起面孔来表演的时候，就不但不能让人发笑，只能让人作呕了。

这样的丑角我们小民已经看够了。我们不了解民社党和青年党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虽然也有很多年的历史；但这些历史回想起来只能增加人们的卑视。左倒右倒，今天同这个军阀合作，明天同那个军阀合作，这历史能算光荣吗？他们大概也有党员；但数目恐怕只有天知道，请原谅我没有见过世面，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民社党或青年党员，我只在报纸上读到过。多少年来活动的只是那几个要人。他们活动的目的也并不是争取党员，而是猎获高官。官到了手，然后再像钓鱼似的用官位来引诱别人入党。说到党纲，他们虽然也有；但民社党的党纲空疏不得要领，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作些什么，而且似乎是“发达”了以后经赶作成的。青年党的党纲同他们的“党格”一样，令人哭笑不得，或者啼笑全非。他们最有名的两句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二十年前，当我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已经听到这口号了。他们当时所谓“国贼”当然实实在在的指的某一个人，他们所谓“强权”也实实在在的指的某一个国家。但到了现在，多少年以后了，中国同世界的政局都有过惊人的变动，变动得几乎换了一个新中国，换了一个新世界；但青年党却“以不变应万变”，他们的口号仍然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我们在糊涂之余，禁不住要问：究竟谁是国贼，谁是强权？难

道他们现在所谓的国贼还是二十年前的国贼，现在他们所谓的强权还是二十年前的强权吗；这事实上恐怕不可能。既然不可能，那就表示，他们所说的“国贼”和“强权”可以随时变换，今天是甲，明天是乙。仿佛演代数一样，我们可以用 xy 来代替“国贼”和“强权”。 xy 所代表的虽不同；一个“国贼”和一个“强权”总须随时都存在才行，不然我们的青年党就无从“除”起，也无从“抗”起，让这两句有名的口号落了空，岂不大煞风景吗？我想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或者假定，中国永远有一个“国贼”，永远有一个“强权”。他们的用心虽苦，但我却替我们中国担忧起来。试问一个永远有一个国贼和一个强权的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样的政纲，倘若青年党员自己想一想的话，恐怕也会觉得滑稽。但连这滑稽的政纲他们也不宣传了。民社党根本什么都没有，无从宣传起。其实他们现在已经作上了官，恐怕他们自己觉得已经没有再宣传党纲的必要。反正没有党员依然可以成党，只要有党就会有人来垂青，来赏识，来利用。只要有人肯利用，就不愁没有官作，不愁没有肥分。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向国民党大老爷撒娇撒痴，争府委，争部长，争国大代表，争立法委员，争地方政府官吏。官争到手，就把自己的亲戚，亲戚的亲戚，亲戚的亲戚的亲戚一齐开上去，替新闻记者制造更多更精彩的“花絮”。他们甘心作配角，作丑角演这悲剧性的喜剧（tragicomedy）给山姆大叔瞧。他们没有想到，也根本不愿意去想，山姆大叔现在已经有点看穿了这出戏的后台，有点不大感兴趣了。

我对民社党和青年党从来没怀过什么希望。倘若他们自己对自己还怀着希望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走出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门，走向民间去。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九日写于北大，外面正有日蚀，
太阳被罗睺吃进去了一半，天地变色。

和真比战难么？

董时进

报载胡适之先生在北平讲演，认为中国的局势“和比战难，要难上千倍万倍，而和中共谈和平，根本是妄想”。这些话使一般渴望和平的老百姓见了，感觉十分扫兴与失望。打仗要动员无量数人力物力，牺牲生命财产，应该是最繁重，最困难的，所以说兵凶战危，任何国家非到万不得已，决不肯轻易打仗。至于和，乃是战之反，是消极的，只要不打便是和。不打，应该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何以反而是最困难的？假使说和平的实现，真有困难，也不过是因为双方的首领互不肯让步，但是，只要有一方面肯作比较重大的让步，和平也没有不能实现的道理。

胡先生认为与中共谈和平根本是妄想，这不啻首先关上和谈之门，而与一般人认为中国的战事任何一方面也不能歼灭对方，而最后必是一个和谈结局的意见恰正相反。胡先生大致是认为政府早晚必可以平服中共。但这究要等待何年何月，以及最后到底能否办到，恐怕一般人民很少与胡先生有同样的信心。就过去的事实而论，以往和谈之所以卒不成功，并不能归罪于中共一方面，这是一般人的公论。因此，我们实不能开首就一口咬定，和平根本不可能。

胡先生一方面认为和平万不可能，一方面似乎也承认战事亦不能解决目前的困难，所以主张“只有苦撑待变”。他说：“所谓待变，不一定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要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和平的生活方式）有信心，能撑住，那么，半年一年之后，大局不会没有转变。”不知道胡先生所期待的转变，究是什么样的转变，除了外援和第三次大战而外，不知尚可能

发生什么奇迹。胡先生说“不一定要爆发第三次大战”，可见第三次大战也是他所期待的转变的一种，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期待，我们都祝祷它不要爆发。

假使再苦撑半年一年之后，大局依旧没有转变，或变得更坏，又将如何？胡先生有何把握，能担保将来的转变“一定有利于我们”么？

依据我过去所得到的印象，胡先生对于时局的观察，与嗣后表现出来的事实大有出入。记得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前的那几年当中，全国人士痛恨日本步步侵掠，多认为非拼死抵抗不可，胡先生便是当时反战最力的一个人。他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同日本打，他说我们要度德量力，知己知彼，只有忍耐，等待五十年之后再说。想不到仗毕竟打了，而且胜利竟归了中国。在民国二十二年春，我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上了一篇主战的文章，胡先生即在他所主办的《独立评论》上把我痛斥了一番。我并非要同胡先生算旧账，不过他那篇反战的文章恰与这次反和的讲词相反，所以不能不令人要想引用一下。他在那篇文章里面曾说，他不能昧着他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的文章上有这样几句愤慨的话：“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胡先生说他的良心决不能容许他说这样的话，他说他“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接着他问道：“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样壮语主张作战！”

对于他的这一些问题，当时我曾经有答复，不在话下。不过现时再谈胡先生的这几句话，不能不有一些感慨。不知道胡先生是否认为现在的作战，也是“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不知道他是否仍愿说，情愿亡国，不愿主战的话。

他又说：“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

态度。”

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胡先生当时不曾把事情看准确，不过他的用心和上边的几句话是善良的。他不愿昧着良心去主战，主张处处存哀矜，这不能不说是仁者的用心。胡先生应该将那种哀矜之心拿在现时来应用。目前的战事，不但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规模是惊人的大，也是空前的惨酷。据政府派往徐州一带视察战事的邓文仪所发表的谈话，也说抗日战事也从来没有这样大的场面。被飞机轰炸起火的村庄，烟雾弥天的照片，印在报纸上，使人见了心惊胆寒，不胜浩叹。试闭目一思，那周围至少数百方里的人民，以及全国各战区无数的人民，流离失所，受饥受寒，房屋被烧了，父母儿女被打死了，或者鼓着眼睛看见他们的房子在燃烧，看见他们的父母儿女的血肉横飞，我们应不难明白，为什么一般人民不能跟着胡先生“苦撑待变”。这班人民根本没有生活，从何说得上什么生活方式，及民主自由，更何能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信心。胡先生既愿念几千万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现在正是拿出哀矜之心为他们谋幸福与除痛苦的时候。

一般人民没有愿意战的，将士愿意打仗的恐怕也很少，士气民心鼓动不起来，就是这个缘故。极少数人硬要驱使着，拖着这许多人去打仗，哪能不是一件难事？但是我敢说，只要一声和平出来，全国人民都一定会欢欣鼓舞的迎接，不用政府发命令，到处都会悬旗放鞭炮。战是悬的，越打越难，和是容易的，比战容易到千倍万倍。至于和平以后的问题，以及生活方式等，自须求得解决，不过这一切相信是终究可以解决的，并且相信以和平的方法求解决，比较以枪炮求解决容易得多，而且比较“于我们有利”。在和平的社会上，大家动口不动手的环境中，任何人也不能强使全中国人民奉行他们所不信仰的生活方式。

经济观点

论当前中国经济情势

伍启元

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情势，最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今日中国经济局势已濒于“崩溃”的境地；一种看法认为今日中国经济状况已经改善，已经好转。究竟这两种矛盾的看法谁是谁非？究竟当前中国的经济情势是怎么样呢？

对中国经济乐观的人，曾用下列几个理由，说明当前经济已经好转：（一）通货膨胀是中国经济主要病因之一。近数月至少从发钞的情形来说，已与过去不同：“自本年三月以后，法币的发行额就逐渐减少，到了七月发行额便没有增加了。”（二）近数月来财政的状况据说已有改善，税收逐月增加，本年内当可达到预算所规定的数字。（三）自从三月四日以来，外汇曾有五个半月的安定。据说在这个安定的汇率（即对美电汇二〇二〇的汇率）下，“对于预期的效果收获颇宏，已往五个月内输入物资数量既见增加，价格亦逐步低降。”（四）本年粮食丰收在望，这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将必发生良好的影响。（五）中纺公司的生产已上轨道，政府对衣料的价格已有控制的力量。（六）在若干区域以内，交通干线（如粤汉路）已全部恢复，交通工具已逐渐增加。财政、通货、物资、交通、物价、外汇等因素既然都有改善，则经济情势不是已经好转了吗？

我们的看法却与上述的乐观看法完全不同。我们承认由于征税区域的扩大，由于进口物资的增多，今年租税收入不用法币计算是大大为增加，即用实值来计算，或且对岁出的比例说，都远超过去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方面因为税收，一方面因为处理敌伪资产（只是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

理局每月便可拨二百亿元，中纺公司每月便可解库约一百亿元），一方面因为用低廉代价抛售国家的黄金与外汇（每月可能达数百亿），财政已不再是一种百分之八十强的岁出依靠发钞去应付的财政。国库收入增加以后，钞票的发行速率自然也跟着减少。抗战胜利最初的半年间，钞票增发额每月竟达上月百分之二十（复利）以上。自三月起钞票的增加速率已较缓和。但就整个财政情形来说，离财政安定的境地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财政收支绝不能说是已经“平衡”。如果敌伪资产处置完毕（包括中纺等公司都已售与私人），如果政府持有的黄金与外汇全部售完，政府不能再靠出售国有资产去渡日，则财政状况必陷入极恶劣的境地。不但如此，现在财政还是本着过去一贯的征课中下阶层和便利既得利益的作风。虽然在纸面上政府有许多征收由丰裕阶级负担的租税的决议和计划，但事实上今日的财政还是一种由中下阶层负担政费的财政。这种以出售国家资产及压迫中下阶层为中心的财政，即使能够做到收支平衡，也不能说是一种康健的财政。

关于钞票增发率减低一事，我们当然是表示欢迎的。但在这里有几点应保持保留态度的。（一）政府几个月曾把不少数量的军队运至东北，遣往东北的军队是用流通券去支付一切支出的，这自然会减轻了法币的负担。但这只是把通货膨胀的一部分重担由法币流通区域转嫁到流通券流通区域，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了问题。（二）即使把东北的支出除外，国库每月支出还有数千亿元。我们如把所有收入的估计计算起来，七月份的国库收入还与估计的支出相去颇远。因此政府所作七月发行额“没有增加”的声明，我们不很了解其真实含义。可能该月有若干收入（如出售敌伪资产收入）特别增多，可能该月有应该支项目已提前支付或延至八月始付款，可能该月出售美汇较多，所以吸收回笼的法币较多，可能还有其他特殊的理由，结果在账面上该月没有增加发行。但只是一个月没有增加发行还是不够的。如果政府能继续几个月都没有增加发行，则我们才能承认真是没有增加发行。

关于物资增加，我们也承认是重要的。本年各地的丰收，必然会对经济势情发生若干良好的作用。中纺公司纱布的生产，确加强了政府对衣料价格的控制。一月至六月份普通进口物资依国内市价计算达三千四百七十余亿元，同期输入救济物资超过一千亿元：这四千五百亿的输入物资对市场不会没有影响的。但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内战的扩大，由于民族工业的衰颓，由

于整个国内生产的困难，所谓“物资增加”的话必须加以许多保留与修正。

至于交通方面，则更没有多大的“改善”。一方面粤汉等铁路是修复了，长江和沿海的水道是通航了，但另一方面在内战的烽火中不知有多少铁路被破坏，不知有多少的交通被阻断，结果交通所受到的打击远超过交通所得到的改善。

要真正量衡财政预算、通货、物资、交通等因素究竟是否已经改善了我国的经济，最好是看物价是否继续上涨。如果财政真的已经平衡、通货真的已经停发、物资真的已经增加、交通真的已经改善，则物价必然会下跌，或至少会停止变通的。但事实上三月以来物价不只没有下跌，而且上涨甚猛。物价上涨率虽因地区及种类的不同而不同，但三月到七月的五个月间，各地物价上涨率平均总在月息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物价既作这么剧烈的变动，可见中国的经济情势并没有改善。

至于外汇方面，则无论三月四日以前，或三月四日以后，政府的政策可以说是整个错误的。这个政策结果（一）便利了外国消费物品大量向国内倾销、（二）阻止了中国土货出口、（三）打击了民族工业和国民生产、（四）消耗了国家的大量外币资金。这种政策绝不会改善国家的经济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见乐观的看法是没有多大事实上的根据的。笔者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相当悲观的。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是从表面上看，而是作深一层看，则当前中国经济是危机四伏，没有一点可以乐观的。这可以分开几方面来看：

首先，就各阶层的生活来说，今日中国经济是极不合理的。我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农民，目前一般农民因受战祸、灾荒、黑暗的政治、错误的经济政策和地主土劣层层压迫，生活早已在饥饿线上。至于战前的中层阶级（公教人员和薪水阶级），则早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沦为大贫。现在唯一得意的只有包括封建力量、贪官污吏、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全国中下阶层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正穷奢极侈地过着一种最新式、最贵族和最浪费的生活。今日中国“有”的阶级和“无”的阶级生活水准差别的程度，今日中国“无”的阶级生活痛苦的程度，已经超过法国革命前夕法国当时的程度。一个只居住在上海南京繁荣世界的人或者会自欺欺人地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改善了。但如一个人能同时见到上海的天堂般的生活

和广大农村与一般中下阶层人民的地狱般的生活，则他便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经济需要根本的革命了。

其次，就国民生产的情形来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局势确是十分严重。因为工业先天的不足、因为战争的影响，更因为外汇和其他政策的打击，今日中国的工业已濒于绝境。最近虽改变了汇率（由美汇二〇二〇提至三三五〇），但整个局势还是十分危险的。不但工业产生了危机，就是农业生产也受到重要的打击。所有出口物品都因外汇偏低的关系而濒于无法维持的境地。就是原料物品（如棉花等），也受到外货倾销的影响。岂但如此，在二〇二〇汇率改变以前，外国进口的牛奶比豆浆便宜，外国进口的罐头肉类比鲜肉便宜，外国进口的橘子比四川的广柑便宜，就是一般的农产品也无法长久维持。一个国家的生产事业全部陷入困境，这个国家的经济怎样能使人不悲观？

此外再加上物价不断的波动，内战所给予国民经济的致命打击，我们实不能不说中国经济已濒于崩溃之境了。

说到“经济崩溃”，这个名词是需要解释的。最近有些朋友常问“你看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几时会崩溃？”“你看中国货币会不会崩溃？几时崩溃？”我的答案总是：“这要看崩溃两字怎样解释”。如果“崩溃”是指“全部停顿”或“完全破产”，则我可以说中国经济是不会崩溃的。除了一个给原子弹全部炸毁的国家，经济（指生产消费等活动）是绝不会全部停止的。至于货币崩溃，则以中国目前战胜国的地位，以中国目前的外汇资源、及以中国目前的信用制度而言，中国的法币可能会贬值至万分之一、以至数十万分之一（或更小），但法币总不会停止做流通媒介的。但如“崩溃”两字作深一层的解释，如我们认为凡因经济政策或措施的失当，致使一国的经济分配不公违反社会正义，生产陷入困难境地，因而引起社会不安和政治纷乱，便是一种经济崩溃，则中国经济早已崩溃了。同样地，如我们认为一国的货币因币值变动过大，因而引起经济的崩溃，便是一种货币的崩溃，则中国的法币也早已崩溃了。

如果我们的分析是对的话，则在目前似和似战的局面中经济已早经崩溃，假使再有大规模的战乱，中国的经济又将要怎样恶化呢？

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

伍启元

从经济观点谈论今日中国的大局，则今日第一件大事莫如努力停止事实上已在进行中的大规模内战。内战所以可怕，不只因为内战本身是一种大的经济消耗，而且因为内战是一种加速经济崩溃，延误经济建设，和招致无穷灾祸的一种经济破坏与斗争。

今日如有内战，则内战的规模与性质必完全与过去的内战不同。当然，任何方式的国内战乱（无论你叫它做“内乱”、“内战”、“革命”），都有若干相同的地方。首先，它必然是一种经济消耗，因为它把许多可以从事农工及其他生产的得力人员，从生产的工作转移到作战的工作。其次，它必然会阻碍经济的正常活动，会增加交通的困难与危险，并给予生产以若干打击。但目前如有内战，则对物质的消耗和对经济的阻碍，其规模都必较过去任何内战为大。无论在辛亥革命时，或在北洋军阀内战时，在国民革命时，或在剿共的时期，双方动员的兵员不过以“万”——或最多以“十万”——为单位。今日如有内战，则动员的兵员必以“百万”为单位，其规模之大，可能会超过过去八年的中日战争。

内战所以严重，不只因为规模较大，而且因为内战的性质与过去完全不同。辛亥革命以来历次的内战，虽然确曾给予人民以若干痛苦，但它们都只是“军事战”而不是“经济战”，它们都对财富分配和国民生产的影响不大。过去即使在战争“最剧烈”的时候，除了战区以外，很少人会直接受到影响。今日如有内战，则情形完全不同：内战本身将是一种经济的斗争，而内战所采的战略将必是军事与经济并重。内战一变成“经济战”，则内战的

结果必然是民穷财尽，无论谁胜谁负，必会使中国经济遭受多年不易恢复元气的损失。

首先，我们认为内战本身将是一种“经济斗争”。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前共产党的战乱，虽然其间也含有若干反封建的成分，但那些内战主要还是一种以实现政治目的（如反帝制和民族主义等）为中心的战争。就是抗战前的共产党的武力行动，也是政治的意义多于经济的意义。八年抗战和一年“胜利”，情形完全改变了：这些改变使内战走进一个新的阶段，使内战变成一种反映“经济斗争”的军事行动，使内战的经济意义超过于政治意义。

要充分了解今日内战的性质，我们必须回溯过去九年间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经济措施。从原则上说，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是国民党最高经济指导原则；从事实上说，国民党极大多数的党员也希望能走上民生主义的路。但不幸因为种种关系，事实上所采取的政策恰好与主义所规定或党员所希望的政策完全相反。（我们甚至可以说：事实上实行的政策常常与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相背驰。）结果经过了九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社会财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变动，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贫富相距甚远和尖锐对立的经济。战前的中层阶级在通货膨胀和压低待遇双重压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团附庸的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沦为赤贫。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则在兵祸、匪祸、征粮、出丁、水旱天灾等重重压迫之下，已在饥饿线上作垂危的挣扎。在这绝大多数同胞无法生活的时候，通货膨胀等政策却扩大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结果在普遍的痛苦上面建筑了一个穷奢极侈的富裕阶层，这更鲜明地托衬出一般人民的痛苦。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无论有没有共产党，那能不发生内部的战乱？共产党力量所以膨胀，可以说是受这种经济政策之赐。

任何人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都会利用经济上贫富对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阶级的弱点，利用极大多数的贫穷的人，起而与政府抗争。在这种抗争中，如果政府继续过去偏袒富裕阶级的政策，那很自然地就会变成一种贫富阶级的经济斗争。

其次，内战本身既是一种“经济斗争”，那么内战所采的战略将必不会忽略了经济方面。如果不幸内战不能停止，共产党方面必会在分配和生产等方面努力增强自己的地位，和给予政府以打击。平心而论，今日在军事方面

政府的力量是远较共产党为强大的。共产党为补救军事的缺点，事实上在采取如次的经济措施：（一）利用土地革命的方式，使他们占有的区域财富分配平均，以加强他们的作战力量；（二）尽量破坏交通与生产，以削弱政府的经济力量；和（三）增加政府区域下的分配、生产及其他方面的经济矛盾与不安。政府方面，为应付共产党这种经济战略，可能会用封锁及破坏种种方式，以增加共产党区域的经济困难。

如果货币制度还是停留于银本位，则这种经济战争的影响已经十分严重。不幸我们的货币又是一种纸本位。在纸本位之下，则内战必增加了军费支出，从而增加了通货发行，结果必更加速了已经发展到可怕程度的财富重分配，必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社会必更不安定。

我们不愿推测内战（假如不能停止）在军事方面的结局，但在经济方面的结局是很显然的。内战的结果，除既得利益集团依照其过去去国难财和复员财的办法，继续“发内战财”外，一切的人都因内战规模空前的浩大和内战采取经济战的方式而一天比一天贫苦。即使内战能有终了的一天，也必演变到“民穷财尽”的地步了。

内战的经济影响既是这么严重，那么至少从经济的立场，内战实有从速停止的必要。

内战既然必须设法停止，但怎样才能避免内战呢？要避免内战，我们认为国共两党必须在根本态度上有一个认识，即大家必须理解今日的问题不应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而应是一个“你活我也活”的问题。如果大家拼个你死我活，结果即使一方是“死”了，“活”着的一方也必感到极大的困难和痛苦。与其两败俱伤，毋宁大家都尊重对方的生存较为得计。从政治和军事方面来实现“你活我也活”，虽然已经困难重重，但如大家真能使民主政治和整军（军队国家化）方案见诸实行，问题还算简单。要在经济方面做到“你活我也活”，则问题便更为复杂了。

在经济方面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曾指出，政府与共党是代表两种不同的利益：政府直至今日还是以维护或且增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为主要的经济政策，而共党则以维护农工阶级利益为其主要政策。如果大家的政策是“你死我活”，则政府是可以继续维护和增进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放任并鼓励这少数特殊阶层去吸取中下阶层的血液，或且用武力去压制中下阶层任何

反抗，结果使自身与既得利益集团成为革命的对象。在共产党方面，“你死我活”的政策是贯彻以贫苦农工为基础的武力革命，利用武力和其他方式逐渐地或急速地企图推翻现政府，走上苏联“十月革命”的路。如果要走“你活我也活”的路，则情形便完全不同：在政府方面，必须百分之百的实行民生主义，不但放弃现行维护既得利益的错误政策，并且强制他们负担从事和平建设的经费和支付实行民生主义的代价。政府应用种种方法，保障并改善中下阶层的生活。在共党方面，“你活我也活”的政策是指放弃武力革命的企图，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愿在宪政常轨下做一个宪政的党，并愿以推行民生主义为满足。用较显浅的话，如果大家是走“你死我活”的路，则一方面有钱的人用武力去维持并增加自己的钱，而没有钱的人则用武力去争夺有钱人的钱，用武力去解决究竟是谁死谁活。如果大家是走“你活我也活”的路，则有钱的人把他们的财产拿出一半或大半，仍保留一半或小半，而与所有的人快乐地共存共荣，同时没有钱的人因为有钱的人已拿出不少，也尊重他们的权益。

我们承认在经济方面要求既得利益集团让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这是避免内战的唯一康庄大道。就我们的观察，如果在经济方面不能实行民生主义，则无论政治军事方面如何妥协，内战终有爆发的一日。要停止内战，要根绝内战，实行民生主义（根本消除内战的经济原因）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最近政府常说对解决内战问题要采取主动。我们希望这种主动的工作能先从经济方面做起。中国国民党来自民间，其性质照理绝非一个维护富裕阶级的政党。它大多数的党员都是中下阶层的分子，他们都热烈地希望实行民生主义，百分之百的实行民生主义。如果国民党的负责人和政府的官吏能依照全国人民和大多数党员普遍的愿望，立即实行民生主义，强使富裕阶级作相当的牺牲，重建中层阶级的地位，和（特别重要的）努力提高广大农民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则大家都有饭吃，谁还会从事战乱革命？否则大多数人或者没有饭吃，或者无法吃饱，那就谁也没有方法阻止战乱的爆发了。

企业家与企业精神

简贯三

何谓企业家？有沛然莫之能御的“企业精神”，方足以称为企业家。但是如此时代如此中国的企业家，纵其根本精神，与近代西洋的企业家大致相似，而其活动的路线，却有不同。

经济学者桑马特所描绘近代西洋的企业精神是这样的：

“企业家是活跃进取的人，是忙迫不安的人，不是静观者，不是享乐者，不是出世者，不是否定现实者。这是一种勇武的精神，这是一种不安息的不疲倦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深入到一切方面，即在宗教上从事解放，在科学上从事阐扬，在技术上从事发明，在世界上从事发现。这同一精神，更打破了那种安逸自足的、自保自守的封建手工业的藩篱，将世人驱入营利主义的深渊中。”桑氏对于企业精神的描绘，固然有所烘托强调，可是就大体上看，抓着了它的轮廓。

这股精神发自欧洲，浸及世界，其所以能支配一百五十六年之久而不衰歇，并非一朝一夕之力，乃是由于“西洋历史的深处”相激相荡，形成出来的。

这个历史的深处，源于文艺复兴时代“人之发现”，“世界之发现”，使人们的个性光复，面临自然。继而宗教改革，使人们信心得以解救，与上帝境界发生往独来^①的直接关系。最后，法国革命，更如火山爆发似的激动人心，予中等阶层以“市民的精神”及“天赋的人权”。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孤往独来”或“独往独来”之误。——编者注

自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这几个划时代的运动都是构成企业精神的历史因缘与思想背景。至于陆克于十八世纪初叶把证券投机与哲学观念在心理的感觉上融会一起，亚当·斯密于一七七六年由他的《原富》宣布了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达尔文于一八五九年由他的《物种原始》，揭穿了动物与人类的生之秘密在自然竞争及天然淘汰……把企业精神的理论根据奠下以后，尤足以鼓励企业家们理直气壮的向前。

还有英国于一七七〇年至一八三〇年由近代历史的界石，所谓工业革命，踏上了新的途径。继而法国于一八三〇年，美国于一八五〇年，俄国于一八六〇年，德国于一八七〇年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又使企业精神于理论根据之外获得“技术的法宝”，那自然显出不可勒止的狂奔之势。

西洋的企业精神之起源与进展，既是如此的“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所以吹遍了天之涯，地之界，倏然成为一代的风尚。

近代中国的企业精神，从先天方面说，缺少这种有本有源的历史因缘，理论根据，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法宝；而且外受帝国主义的鲸吞，内受封建势力的侵蚀，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注定了它的坎坷命运。

中国大多数的企业家便在这种穿道夹缝之中，过了数十年的坎坷生活而不自觉。

有人谓：“现在不平等条约业已取消，八年抗战业已胜利，中国新式工业当可自由发达，而企业精神亦因之有所凭借，得以运用自如。”但是我以为不平等条约取消以后，虽对于工业上有些好处，但是我们的经济实力，一时尚难比上欧美，争取平等，获得完全自由发展的资格。因为战后各国的屯并（dumping）科打（quota）制度，不见得迅即裁废，予落后国家的工业以保护的机会。所以企业家们仍不可不以戒慎的，集体的，与民族同利的新观念，渡其来日的坎坷，求得事业的成功。

西洋的企业家，自始即系凭其永久不疲的毅力，精密的规划，再加上新奇的科学技术，才能有所成就。他们在过去的顺势中，尚且如此，我们在坎坷中，岂不是更应如此？然而现在有些以建设工业为名的人们，只知静悄悄的屯积原料成品，图一时之利，竟让机器技术在那里沉默腐锈，这简直成为民族的罪人，工业中的害群之马！

尤其是组织的精神，今后中国企业家们更应特别注意，以便通过组织，

发挥机器技术的作用。桑马特云：“谁要想组织，第一必须具备评判人们服务能力的才能，必须由大群的人中，找出那些适宜于一定目的的干材，使因共同活动而联合的人们，得组织成一个富于服务能力的整体。”而中国有些工厂，或其他企业组织，往往首脑人物把它当成衙门，所以引进的人员，多半来自“血缘”“地缘”的关系。如此不以事业为重的结果，何能免除松懈坍塌的后果？

中国有些企业家，不独对于群体缺乏组织的精神，即对于自己也少有紧张的、规律的、节约的生活方式。企业家的事业，既建设在机器上，那末，他的生活方式，便应如机器活动那样的紧张而有规律。还有从经济学理论来讲，“企业的成长，须假手于慎重的节约；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是一个良好的节约者。”抗战以来，假企业之名而发横财的人们，很多由“货倍而入必倍而出”的过程，度其骄奢淫靡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与企业家让机器在那里腐蚀，恰有同一的罪恶。

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除了前面所述的几种精神以外，还要有不重形式的创造精神。中国许多企业家因受封建时代官僚政治的薰染，往往以这种习气，处理他的事业。柏罗海玛（Beroezheimer）尝说“官僚政治的标帜，就是形式主义（额外的委用多数官吏，官样文章），办事麻烦笨重，缺乏自动力，缺乏创造力，重形式而不重事实。”这种精神，如何能够与现代企业中机器技术那种迅速准确的特性，配在一起呢？如若勉强相配，那也是相克相制，以致于无法善终。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就是企业的目的，固然在求利润；可是纯粹的个人主义，既已弊病百出，为世人所唾弃，则个人利益的目的，就必须与社会的利益互相联贯，才有真正的价值。狄骥云：“企业家的资产及遗产，只能在社会利益中，求得一个说明。……财产绝不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作为一种根据社会需要继续变迁的权利。”现在各国立法的条文及法院的判例，多少带点这种思想。

中国既以民生主义为经济建设的目标，尤应先引导企业利润与社会利益发生适应的关系，最后使企业里面的赚钱意识在新社会中转化升华，以期符合工业建设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的深意。

公教人员的待遇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伍启元

在人类的历史中，公教人员所受到的待遇，像中国公教人员过去几年那么微薄，是不多见的。关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重要性，笔者已再三的谈及。在这里，我们就实际上公教人员的待遇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一问题，提出讨论。

要对这个问题能有正确的解答，我们必先了解为甚么过去公教人员的待遇无法得到改善。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和两个技术原因。第一个基本原因是居高位的人根本不知一般守法公教人员的困苦；第二个基本原因是公教人员自身很少能够真正理解自身的利益。此外还有两个技术的原因：一是财政的原因，负行政责任的人总是不大愿意增加财政的支出，以免扩大财政的亏缺；一是物价的原因，在物价上涨当中，公教人员待遇如与物价赛跑，总是赶不上物价的。

关于第一个基本原因，是需要特别解释的。平心而论，居高位的人大都是希望做好，大都是希望大家能得到合理的待遇的。但由于四个原因，居高位的人虽有不少是“来自民间”，也不知道民间的疾苦。（一）今日负行政责任的各首长，无形的收入很多。他们住的地方有时是机关所准备的住所，一切陈设布置都由该机关的总务科或总司去代办；就是租用的房屋，据说租金也很低廉，到了抗战末期在重庆一所二层新式大洋房租金也仅每月数百元。他们行的工具，有由公家借给汽油的汽车，不只他们自己可以用，他们的家人也一样可以用。他们食的方面，柴米油盐有总务司科代用最低廉价格购进，而一切应酬都由公家代为支付。他们有时甚至衣料也有人送赠。这

样，则他们每月的开支不会很多的。他们的薪津收入大都能应付支出。他们自己的收入既足以应付支出，那就自然不会想到别人是没有无形的收入，薪津所得无法过活了。（二）今日院部会主管长官次官，有不少是兼任国私营公司和银行的董事等等，这一方面的收入常常较薪津为多。就是没有这些额外收入，也常有其他特殊收入的。有了这些补助，自然就不会想到一般公教人员的贫困了。（三）在今日的政治中，行政最高负责的人员常常不知道物价上涨到甚么程度。有些居高位的人每人家中开支已数百万元（或且数千万元），而在账面上他们的副官报告给他们的不过数千元（或仅数百元）。他们有时亲自出门买东西，希望能知“民间疾苦”，但商店的人因受到预先的警告，所索的价格远在市价之下（有时不及市价十分之一）。这样，他们自然不知道民间疾苦了。（四）今日在高位的人，每天时间大都花在接见宾客、出席会议、批阅公文和其他种种繁忙的事务上，自然就与一般人的实际情形发生距离。胜利以前，社会上传说某首长说他口袋里放了几百块钱，很多天都用不出去，可见几百块钱还是很值钱的。不久以前，社会上传说某首长估计一家四口每月有二万至三万元左右便够用。这些传说是否正确不得而知，但确可为行政长官不知民间疾苦的写照。由于这四个原因，居高位的人根本不理解一般守法公教人员的痛苦，自然不肯通过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提案了。

另一个基本原因是公教人员本身的无力与愚昧。任何国家的公教人员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严重的反抗。中国公教人员一方面是过于微弱，一方面是受“贫穷哲学”和“自私哲学”（独善其身）的影响，除了上海市大学教授曾罢教外，始终没有集体的行动。公教人员即使有集体的行动，负行政责任的人也会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根本加以忽视（例如行政首长对上海大学教授罢教的态度就是如此），何况公教人员本身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有所行动呢？政治上总是压迫抵抗能力最低的人，公教人员的抵抗能力既如此微弱，自然就只有生活困难了。在公教人员中，不少的人为着维持生活，走上贪污舞弊的途上。居高位的人对于贪污舞弊相当放任，这更助长了贪污舞弊的风气。贪污舞弊的人增多以后，公教人员的阵线便不一致，这也是公教人员无法作集体反抗的原因。公教人员自身既没有有力的反抗，他们的待遇自不易得到真正的改善了。

此外在技术方面，因政府不肯强使有钱的人出钱，结果财政收入过小，政府便不能不拒绝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同时政府又常借口调整待遇会刺激物价，因而对公教人员的待遇拒绝增加。

对于上述各原因的是非我们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强调的，即使公教人员的待遇能够真正得到调整与改善，则上列的原因必须消除或解决。

为着应付第一个基本原因，我们主张立法院应制定两种法案：一种法案是禁止各部会首长有任何的无形收入，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应按市价自行承担（如有优待则不得超过任何其他中小公教人员）；一种法案规定各部首长于就任时应将一切财产及薪津以外的所得（包括董事红利等等）全部由国家封存，在任内不得支用。这样才可以强使行政首长过一过一般公教人员的生活。如果监察院再尽力监督这两个法规的实施，则我们相信公教人员的待遇立刻就会得到改善。

为着应付第二个基本原因，我们主张组织“全国公教人员总工会”（因目前公教人员所得不如一般工人，只能组织工会），于必要时用集团罢工怠工等办法去要求改善待遇。只要这个“总工会”能够组织成立，则政府必不敢忽视公教人员的合理要求的。

为着应付财政，我们主张立法院另制定两种方案：一种限行政院于一个月内存富户捐并举办财产总登记；一种限制政府发钞最高额，以后未得立法院同意不得增加发钞额。前一种法案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使改善待遇能有财源；后一种法案使立法院得一武器以保障公教人员待遇——每次行政院要求提高发钞最高额，如公教人员待遇不同时作比例的调整，立法院即不予通过。

为着应付物价，我们主张政府或“全国公教人员总工会”应成立一专家委员会，加以研究，作成报告，使调整待遇的不良影响能够减少。

我们相信只要上述各点能够办到，则公教人员的待遇即可得到真正的改善。

中国经济危机的出路

笄移今

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严重，不仅中外经济学者感到可怕，连美国政府也认为“在中国各政党尚未成立协议组成联合政府以前，一部分经济援华措置，不能遽而中断。良以此际若不收最低限度之经济援助，必然招致经济崩溃之危险。”（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契生发表之援华政策声明）。因此在日寇投降后，美国政府租借与中国之物资及款项，已达二十二亿美元。最近又让售剩余物资，约重二百五十万吨，总值为八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而其实际价值，则在二十亿美元以上。此外尚有源源而来的大量商务物资（经过贸易关系而来的商货），走私物资，救济物资。同时中国政府于三月间开放外汇，八月间又再提高外汇，其用意亦在和缓经济危机。

可是，所有这些措施，对中国国民经济在基本上并未发生若何改善作用。“在都市，民族工业不但扩大再生产无望，多数中小工业已在中秋前后相继停业，连著名的无锡永泰丝厂也停工出租了。在农村，就东南各地的现状而论，虽然今年‘丰收’，但实际上在高利贷，及高额地租的剥削下，在苛捐杂税的压迫下，在农产品贱、日用品贵的交换方式中，农民生活不仅没有因丰收而好转，相反的愈益穷困。”（见九月三十日上海《中央日报》社论）。造成这种生产萎缩人民愈贫的由来，却不得不归之于外货倾销与通货膨胀。目前中国经济正是在外货与通货的夹攻中苟延残喘，这也就是现时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

抗战已经结束一年一个多月了，别的国家经济情形大都恢复了原状，或正在恢复的途中迈进，连战败国的日本经济也在欣欣向荣，独有战胜的中国

是江河日下。演成这样结果的最大原因，乃是我们还在进行大规模的内战，还是在执行战时经济政策，执行错误的经济政策。如果不悬崖勒马，放弃现行的政策，改变旧的政策，而任其继续执行下去，则中国经济前程，不是陷于不堪收拾的地步，就要走入殖民地经济的道路。今天在经济上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把战时经济政策，变为平时经济政策；要把依赖外货的政策，变为自主更生的政策；要把以财政支出为中心的政策，变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政策；要把方便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变为有利于勤劳大众的政策。只有依据这样的思想或目标订定出来的方案，才是反映人民意志的合理的经济政策，才能达到促进国民经济繁荣的目的。

为要安定民生，发展生产，必须切中时弊，针对全局，从多方面着手改革：

第一关于对外贸易，这是当前工商界最担心，且也是有关今后我国强盛抑是衰弱的一个基本问题。应以独立自主平等的精神与各国维持商务交易。对于输入物资，应以促进工业化为至上；对于输出物资，应以扩展国外市场为目的。合乎这个原则的措施，便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反之，即是有害于国家，有害于人民。所以：（一）进口物资应以生产工具为主，对于输入此项物资的厂家或商人，在请购外汇、货款、运输等方面须订颁优待办法，切实予以扶助。消费物品的进口，除必需品且又为国内缺乏者外，应该予以限制——尤其是本国能制造的货物，更不能放任外货与国货竞争，致削弱民族工业的成长。奢侈品应绝对禁止，纵有走私进口，政府亦须向出售商重征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二百的消费税。（二）在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曾以关税政策，为防止不合理进口的手段。我们虽是大西洋宪章签字国之一，但为发展我国生产，避免人民匮乏，而采取温和的保护关税，谅亦不致引起真正友邦的反对。现行关税税率，实有立予调整的必要时，实行差别保护关税，这在当前较之提高外汇更为切合实际。（三）在今后五年至十年的建国期间，物资输入量定是惊人。为了减少入超，力求国际收支平衡起见，必得全力鼓励外销物资的增产，开辟出口贸易的市场。目前主要出口物资的产量，远不及战前，生丝产量仅及战前的六分之一，茶叶产量仅及战前的二十分之一，桐油产量仅及战前的三分之一，手工业产品外销，战前每年达一亿元，现在则完全陷于停顿状态中，其他皮毛等出口，也是衰落异常。输入较之战前激

增，输出较之战前锐减，进出口贸易之反比例的发展，正是国力和国势低落的指标。要增加出口并使之大大地超过战前，主要须看政府扶助的程度如何为转移。对出口贸易，不仅要免征出口税，免征外销物资的货物税，而且要求彻底实施收购政策（按照成本加合法利润），立刻执行出口津贴政策；盖非如此，即不足以挽回颓势。（四）经过八年战争的灾难，在创痍满目的眼前，一部分物资仍感缺乏，对于外货来华，我们并不无原则的排挤，问题的焦点是要我们能控制外货，不使其压迫国货。达到这个目的最直径的办法，就是由政府与人民合作组织机构，掌握外货。换言之，外货运到中国以后，统由这个机构支配运销，按照各地实际情形，规定其市场价格，不使有碍国货之发展，并将丰厚的盈利，用之于推行贴补政策。

第二关于财政金融，宋子文氏于本月二日对上海工商请愿团说：“财政有办法，经济自然有办法；财政无办法，经济亦绝无办法”。这话有一大半对的，因为财政果真有办法，虽然不能根本解决今日经济危机，但确能和缓经济危机，确能改善经济现状。就我们看来，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也是极其简明：（一）在抗战期中，政府财政支出有百分之八十为军费。胜利后因内战绵延，本年一月至五月军费支出仍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六月以后战事扩大，军事费用的支出又达国家总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倘把目前军队裁去三分之二，军费支出即可减为百分之二十五。这既可解决财政困难，又可根绝内战，确是一举两得的事。在裁军的同时，对普通行政方面亦应裁撤不必要的机关，合并性质类似的单位，节省次要的开支，强化各级人事组织，尽量减少各部门工作人员，并以裁员所搏节下来的款项，全部用于提高在职人员的待遇。（二）除裁军减员而外，便是认真整饬吏治。据章乃器氏估计，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实际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却被贪官污吏中饱去了。六月八日财政部俞部长报告，本年一至五月的财政收入为二千五百亿元，假如没有贪污盗去三分之二，那么本年最初五个月的收入也该是七千五百亿元，即等于同一时期支出的二分之一，数目确是可观。抗战以来的官僚资本，有一部分就是在这种窃夺方式中肥胖起来的。（三）以上是着重节流，论到开源，首先就是改革租税。现行的租税政策，是以中下阶层为对象的，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应该使富裕阶级（包括国难财主胜利财主及地主）负担大部分的国家费用。依照累进税的原则，积极举办一般财产

税，并改进所得税，过分利得税，遗产税，土地增值税等直接税。此外还要改革间接税，开征奢侈品税，务期做到租税总收入，足供财政支出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的地步。（四）目前物价继续上涨，是由于币值不稳。稳定币值的主要手段是停止发行，只要实行停战裁兵，就可避免通货膨胀，就可逐渐稳定币值，从而物价也必随之趋于平稳。同时，为巩固人民对法币的信心，一方面政府手中所能控制的物资和公用事业，绝对不能领导涨价。另一方面也可考虑采行硬币，俟通货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的差异性失去时，再行改革币制，另订货币单位。不久以前，有以白银铸成银币作为辅币的传说，也不失为有安定币值作用的一种打算。在最近一两年过渡期内，倘不采行硬币流通，则目前抛售黄金，仍有继续施行的必要。虽然有人提出理由反对，但在今日险恶的经济环境下，如不借黄金来吸收一部分游资，金融市场必较现时更为混乱，投机活动必较现时更为猖獗。而且抛售黄金亦有和缓物价的作用，此次外汇调整后，若非政府压住金价，则物价必随金价狂升而激涨。（五）近来又有放长外汇的空气，在外货没有普遍下跌或狂跌，提高外汇，无异就是助涨物价，困扰生产。在三个月以前，多数人要求提高外汇，民族工业家胡厥文氏就指出：“主张提高外汇来保障国货，问题并不如此单纯。首先要问政府是否有稳定物价的力量？如果政府没有力量，这样做反为投机分子造成了机会；提高外汇不但工业界受不到丝毫好处，反要受累无穷。”外汇调整后的事实，正与胡氏的预料相符。所以我们不应轻易放长外汇，更不能作跳跃式的放长。倒是工商界建议的等级汇率，有采纳的价值；倒是以关税来防止外货倾销，有实行的必要。至于制止美钞黑市，应该做到下列三点：一是立即禁止美钞流通，并照官价收买；其实在开放外汇之同时，就应宣布这个办法。二是严缉外货进口走私，以企减少美钞现货之需要。三是由国家银行开办外币存款，因为法币不断贬值，轻法币重美金已成了普遍心理；举办外币存款，可以纠正追逐美钞的风气，可以防止资金逃避（最近几个月逃往香港之资金已达数百亿元），且亦有助于吸收游资。（六）利率太高亦为工商业衰落之一原因。对于较有希望而能发展之工商业，予以低利贷款，并扩大贷款范围，放宽押品种类，简化贷款手续。中央银行应履行“银行之银行”的任务，办理转抵押重贴现业务。这样，既可减低生产成本抑低售价，又可使获得低利贷款之厂商继续维持营业，职工不致失业，减轻社会

不安。有人认为低利贷款，易为少数人操纵用于投机，增加经济混乱。又有人认为扩大工贷，就是扩大信用，造成通货膨胀，刺激物价。对于前者，目前投机范围日缩，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不必过虑。对于后者，只要把贷款用之有利于生产事业，促进经济繁荣，纵有微量通货膨胀，对整个国家社会仍然是极有益处的，这比把巨款用之于内战自然有天壤之别。

第三关于发展生产，合理的对外贸易政策，进步的财政金融政策，是发展生产的前提条件。生产事业在获得这个有利的保证后，政府即应遵照和平建国纲领中的经济建设方针，实现下列事项：（一）重工业国营轻工业民营，这是当局在二年前宣布过的政策，政府须从速改变与民争利的作风，鼓励民营企业废止束缚生产力的种种管制。从速把由敌伪手中接收过来，无法使之开工而任其搁置的许多事业，尽量以出售或出租的方式，转让给民间经营，且须给后方厂商以优先购买或承租的权利，并降低价格，分期付款，借以弥补他们在战时所受的损失，这是政府应当给予的一种鼓励与安慰。虽说目前政府已注意到这些问题，逐渐使之实现，不过所规定的条件还很苛严，民间受惠甚少，无法顺利接办。有些人阻扰或反对敌产转让民营，不是出之故为官僚资本辩护，就是不了解在现阶段的民营事业是进步的经济行为。多一个工厂开工，就多增加一分国家实力，多一个民营企业，就多增强一分社会活力。（二）捐税太重与运输不便，也是生产界的困苦。减免捐税与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可以降低物品售价，可以推广物品销路，可以刺激扩大再生产。应按生产品的性质及其对国计民生关系之深浅，分级减税或免税，减低运费或免费。新近颁行的货物税，又是只图财政收入不顾生产死活的措置，更有修改的必要。（三）在挽救工业危机的运动中，不仅要注意大工业，而且要扶助中小工业，在经济落后国家，中小工业更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前途。即在美国全国十五万八千余工厂，有十五万三千单位是中小工厂。社会主义的苏联亦极注意鼓励中小工业的发展。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是由小而中而大，仅仅着重大工业而忽视中小工业，实在是危险倾向。中国工业建设如无中小工业的基础，大工业也就不容易建立起来，因此，对中小工业在贷款上应与大工业一视同仁。在技术改进上更须政府组织专门机构，协助中小工业改进设备及生产品质，使其逐渐发展成为大工业。（四）解决经济建设的巨额资金问题，无疑要靠大量吸收外资，欢迎外人合作。抗战未结束前英美

法德等国为其过剩的资金及机器谋出路，曾络绎来华考察，我国产业界提议种种贷款办法，均为友邦人士所接受。政府必须放弃歧视民营企业的态度，责由国家银行尽量代民营厂家作担保，国外资金便可源源而来。（五）中国生产品的市场，除外销特产而外，主要还是依靠国内。而扩展国内市场，首先就要提高百分之八十人口——农民——的购买力。要提高广大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又必须立即实行二五减租，实行土地改革——发行土地证券收购土地，分配给贫农耕种。盖农民生活不能提高，农民境遇不能改善，工业生产产品就要失去顾客，就会销路不畅，结果所谓工业化也就化不起来。同时，不实行二五减租，不实行土地改革，非但不能提高农村购买力，而且也不能鼓起农民的耕作热情，也不能增加农田生产，更不能进行粗放或集约生产，更谈不到农业技术改进与新式农具的普遍应用。在今天工业化与土地改革是有其不可分离之关连的，两者是相辅而行相因而成的，要谈发展生产，要谈工业化必须照顾到土地改革，兼顾到农民解放。不伴随土地改革的经济建设，在中国毕竟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在描绘解救危机的轮廓以后，必得郑重指出：要使这些改革原则见之于实现，尤须先要争取国内和平，争取政治进步。只有受人民指挥，为人民服务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勇气实行自尊自重而独立（不做外国附庸）的经济政策，才有决心执行裁兵减员洗刷贪污的建国方案。

然而，要希望这样的局面出现，要瞧见这样的新政推行，正还有待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尤其有待于工商阶层的觉醒。民族企业家应认清：破坏性的内战，潮水般的外货，封建气的土地关系，落后式的政治组织，乃是构成中国经济危机的总因，乃是阻碍生产发展的魔怪。工商家必须发挥自身的团结力量和奋斗不懈的精神，并学习西欧企业家在他们工业化中所表现的规范、风度、气魄，积极努力和平民主运动。这是今日工商界自救救国的大道！也是当前经济危机唯一正确的出路！

经济之改造（一）

胡先骕

管子云：“衣食足而后知礼义，仓廩实而后知荣辱”。任何国家与民族之发展与进步，大半系于国民经济之发达。在某一限度内唯物论家之主张，实具至理。故孔子有“富之”之主张，而“利用厚生”尤为我国先哲之古训。米梭波达米亚与埃及古代文明之产生，盖由于两地农产之发达，希腊文明则为古代海上商业发达之后果，中国古代文明之灿烂，亦由于黄河下游之华北平原，至为肥沃；初民获得丰裕之生活，遂能产生优美之文明。降至中古意大利各小邦之能产生伟大之文明，乃由于海上商业之发达，我国唐宋两代之文明迈越前代，亦由于海陆交通之发达；国际商业之兴隆，有以致之。征诸近代，靡不皆然。中国近代之衰败，固有多因，而鸦片战争之后，经济日趋于衰落，实为其主因；亦犹明代之衰亡，由于严重之饥荒，有以破坏社会之秩序也。今日之中华民族，承百年来祸乱衰敝之余，半殖民地式之经济形态，既已经斫丧元气殆死于前，而此次八年抗战，尤使精髓尽竭于后，若非我国得天独厚，资源丰富，而又可得国际之协助，则分崩离析之祸，将有不忍言者，民族复兴与改造，将河清难俟矣。

故今日中华民族当前之急务，厥为经济改造。开发固有富源，建立轻重工业，发展交通，振兴农业，扩张国际贸易，普遍提高人民之生活水准，在今日人人皆能言之。然经济改造，问题滋多，必须有卓越之眼光，确定之原则，精密之计划，方能有百利而无一弊，否则国民经济虽可增高，而财富分配不得其宜，流无穷之毒害于社会，徒长乱阶，难求救药。窃以为在谋经济改造之前，必须认定六项基本原则，兹特标举之于下：

(一) 经济改造必须普遍提高各级人民之生活水准与顾及各级人民之利益。

(二) 必须不妨害人性之发展，不引起民族之退化。

(三) 必须鼓励人民之创造性而不过于妨害其经济活动之目的。

(四) 必须顾及劳资及消费者三方之利益，使皆不受损失而得公平之分配。

(五) 必须与世界各民族互助合作以共谋人类之福利。

(六) 必须兼筹并顾国内之自给自足与国际贸易。

此六项原则实为中华民族经济改造之信条。一切经济设施，皆须以此为根据。每一国民，尤以从事政治工作或有志于国家之经济改造与经济建设者，皆须笃信与拥护履行之。尤须抛弃党派之成见，而不故意违背与丑诋之，则民族与国家方有复兴之望；否则为国家民族与全人类之罪人也。兹更申论之：

以各人之智能与职业之不同，在一广大社会中，无形中为若干不同之阶级。各阶级之利益，每每互相冲突。农民当然希望农产品价格高而工商品价格低，工人与商人则希望工业品价格高，经商之利益优厚，而农产品价廉。不事直接生产之官吏教师及自由职业者，则希望农工产品均价廉，而个人之薪给与收入优厚。因此总难得其平，而引起冲突。结果各阶级每每凭借其社会与政治力量，以压迫他人。如在苏俄之无产阶级专政，与工人阶级之压迫农民，与在美国农工两级之对立，皆其著例。通常工人以居于城市，智识较高，易于结合，故易获得政权。农民则散居乡间，难于团结，故每处于劣败地位。然在欧洲亦有所谓绿色革命运动，而在若干国家，农民党之势力亦不可侮。美国工会固有伟大之力量，然农民之力量，亦能左右政治。在中国古代谈政治者大半重农，而特别贱视商人阶级。甚至如孟子称之为“贱丈夫”，而在秦汉征遣戍卒，以贾人与赘婿为首选，历代之苛待商人，每每出乎情理之外，有如此者。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商人之势力，则又可垄断政治，而侵夺其他阶级之基本权益。凡此种种，皆违背自由平等与民主之精神，要当引为深戒。实则士农工商，皆为国家之公民。欲改造国家之经济，必须同时顾及各级人民之利益，不可畸轻畸重。当前之急务在普遍提高各级人民之生活水准。工业建设固属切要，农业现代化尤为当务之急。而如何大量生产，

使每一消费者均能获得充分之物质享受，则为经济改造之唯一目标。

经济改造固以增加生产为目的，但须知增加生产之目的，则为改善人民之生活；而人民之生活不仅包含物质条件，且包括其精神条件。故增加生产之方法，必须不致妨害人性之发展，不致引起民族之退化。各种职业中以农业与手工业，最不妨害人性之发展，以其富有创造性与美术性。农夫手胼足胝，终岁辛勤，所得或仅能果腹。然其工作可由彼自由计划与安排，其管理与创造之才能可以充分表现，虽贫为佃农，仍得为自身之主人。且工作有变换，有极勤劳之时，亦有极闲暇之时，三季辛勤之结果，满仓满箱，皆个人才智之代价。“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一饮一啄，皆自己所创造，且日与大自然相接，倍感精神上之愉快。苟收入不至过于鲜少，则农业实为最佳之职业。手工业则倚赖个人之技艺，及管理创造之能力，一件手工业品之完成，无论名贵如一名瓷一名表，或下贱如一马蹄铁或一溺器，终为一完整之创造品，而含有美术性。至如厨师之烹调，裁缝之缝纫，其悦口适体，为顾主所交誉，尤能增个人之自尊心。独地下之矿工，大工厂中专作一种工作之工人，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八小时，所作者专为一种极单调之工作。其工作之机械性，与其所运用之机械相若，无一毫之自由，无一毫之创造性美术性。除一定标准之熟练外，不能使用其分毫之聪明才智。其工作为一整体一部分，对于最后之成品，不能感觉其创造与美感之满足。此种职业之单调性最能妨碍个人之发展。无怪近日工业国家之工人，虽物质生活尚称优裕，然绝无精神生活之可言。鸡鸣而起，即以一日中最宝贵之时光，作最单调之工作，下工之后，只有饮酒赌博或追寻低级趣味之娱乐而已。既终身从事机械工作，则已变成一种活的机械，真所谓行尸走肉也。驱大半之国民变为行尸走肉，其民族未有不退化者，此乃近代文明最大之危机，而欲改造国民经济时，不得不深思熟虑以求预防其大患者也。

在一自由经济社会中，政府对于人民之经济活动，令其自由发展不加干涉，成功与失败，视个人之聪明才力为转移。如有特殊之创造力与企业力者，每每可由赤贫变为巨富，多数伟大之发明与企业，皆由此种经济活动而获得与养成。资本主义对于人类之重要贡献即在此。若在官僚主义完全控制之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则个人之创造能力与企业能力，每受重重束缚，而不得自由发展。虽云有创造能力之人在任何环境之下亦能创造，然苟不能获得

充分之自由，则其创造欲亦必因束缚与障碍而受打击。且一种新发明在未发明之前每被视为不可能。若在官僚制度之下，若一种试验经一权威学者认为不可能时，则青年科学家决不敢亦不能再作尝试。新发明遂于不能实现，此种前例，指不胜数。若在自由经济社会中，则一种尝试之成功失败，皆个人负责，无人干涉之，故每每能有出人意外之成就。自由经济，固有其必然之恶果，但其优点亦不能抹杀。在人类尚未能进至完全大公无我之前，吾人如欲改造一国家民族之经济，一面固须防止自由经济之流弊，一方面亦须鼓励人民对于经济之创造性，而不过于妨害其经济活动之自由。其实此种折中之办法，并非难能。只须政府与社会操有统制经济之权，一方面承认私人财产权，一方面亦承认社会有征用与统制私人财产之权，换言之即节制资本之权。凡矿产重工业交通与公用事业皆属于国家，农地使用权及轻工业，则付托与私人，任其自由经营，而以累进制之所得税与遗产税以节制资本，则一面可以鼓励人民之经济活动，一面亦可以防止资本主义之流弊矣。

人类社会中之经济活动，有三种要素：即资本劳工与消费三者是也。三者缺一，经济活动，必至停止。资本主义之错误，在仅认资本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之主体；但知顾及资本阶级之利益，而不顾及劳工阶级与消费者之利益。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之错误，在仅认劳力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之主体；但知顾及劳工阶级之利益，而不顾及资本阶级与消费者之利益。今日一切经济上之争论，皆集中在劳资之争。社会主义者斥责资本阶级之剥削劳工阶级之剩余价值，以为剩余价值完全为劳工之劳力所产生，与资本无与，故应尽为劳工所有。实则所谓剩余价值之获得有赖于多种因素；如机械之效能，交通之便利，市场之需要，发明机械与制造方法之发明家之贡献，消费者之嗜好，企业家之才智，管理人之效能等等不能以数字计算之因素，皆所以增减剩余价值者也。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如周转资金，厂房，机械，什物等及精神资本如发明家之贡献，与企业家之才智等）对于经济生产既有贡献，则不可抹杀资方应得之利益。至于劳方利益之必须顾及，则已为今日一般之信念，不必更事阐明矣。然消费既为经济活动三要素之一，则消费者之利益，自须顾及，否则亦不得其平。然在今日经济论争之中，常有忽略此点之倾向，此则大堪指摘者。所谓顾及消费者之利益，不外设法使生产量多而质精，价廉而物美。劳资两方面皆不可过求额外之利润，尽可能减低货物之价

格，增高货物之价值，尽量增加出产之数量，应用最新之发明；即尽可能为消费者之利益而生产，斯不失生产之意义，必如是方能达成经济改造最终之目的也。

在今日交通神速之世界，万里有若户庭，闭关自守，久已不可能，而至今益甚。九州万国，休戚相关，共存共荣，乃今后唯一之国策。故欲谋一国与一民之福利，必须兼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福利，亦即谋及人类全体之福利。故改造经济，首须与世界各民族互助合作，共同努力，方能达成最后之目的。此次战后，各国之政治家，对于此点，渐有正确之认识与信念。故世界粮食会议乃一致通过尽量增加生产之议案，过去为保持市场之价格，而焚烧过剩之小麦抛弃逾量之咖啡一类之荒谬愚妄举动，今日已尽人皆知非议之矣。今日占世界半数人口之亚洲民众，其生活水准只及美国人民生活水准十分之一，澳洲人民生活水准五分之一。如欲提高此世界半数人口之生活水准至澳洲人民之生活水准，则必须增加现在世界之消费生产十四倍，可见欲谋一国与一民族之繁荣，必须兼谋世界各国各民族之繁荣。故欲谋中华民族经济之改造，必须兼顾世界其他各民族经济之改造。在今日中国之经济，尚为落后，但在中国工业化之后，不出三十年，中国之经济地位，在东亚必居首位，则尤有与其他民族互助合作之需要，而对于提高亚洲人民之生活水准，尤属责无旁贷也。

过去对于一民族之经济政策，有两种不同之主张。第一种如英国所主张者，则为尽量发展国际间之自由贸易，而不求各区域之自足自给。此种政策之长处，在使各国能尽量发展其所长，而赖懋迁有无以补其不足。其短处则在使各区域之经济完全失去其独立性。如英国以人民尽量发展工商业，至使其本国农业日趋于衰落。又如南洋一带之农业，除稻米外，如橡皮椰子蔗糖，完全以外销为目的。如外国市场之需要酿减，则国内之经济基础立受影响。此种流弊在战时尤感严重。另一种主张则为求一国之经济自给自足，而绝不顾及国际贸易之情况。此种经济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风行。国国皆求自给自足，遂使国际贸易陷于全世界不景气之深渊而不能自拔，卒至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后国际间之经济关系，自宜一反此前辙，而积极鼓励国际贸易之发达，以求世界各国共存共荣之道。我国居世界四强之一之领导地位，自不能反对此种政策。但我国地大物博，各项富源几于无美不

备。除少数热带物产如橡皮奎宁椰子马尼刺麻不能自给外，大部分物产皆能自给。在战前广东省每年须输入洋米一万万元，此大非必要也。又全国需要输入印度黄麻所制之麻布袋值价一万万元，此尤非必要也。战前我国糖产至为衰弱，但现在台湾已回归祖国，则蔗糖已不假外求矣。海南岛之开发，橡皮奎宁亦可自产一部分矣。纸业发达，则殊无购买洋纸之必要。纺织业与棉业发达，则亦无购买外国棉织物之需要，且可以转供南洋与非洲之市场。故尽量改良，增加我国固有之生产，即可达成我国大部分自给自足之目的，而并不至有害于国际贸易。而我国之大量生产，适足以供应国际市场之消费也。

讨论经济改造原则竟，今更讨论经济改造之实际问题如下：（未完）

经济之改造（二）

胡先骕

一 土地政策

中国地大物博，以农立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以务农为生，故土地政策，实为全国经济之命脉；而重农主义，亦为我国之主要经济思潮。虽今后我国必须工业化，而工业化之后以农业技术之改进，人民务农之百分数，必须视今日减去三分之一或半数，然农业终为我国人民之主要职业，而土地政策终能影响我国过半数之人民，故谈经济改造必须从树立健全之土地制度入手。上古之时，土旷人稀，土地为社会所公有。私人在一种井田制或类似之授田制下，使用土地。此时期土地政策之特色，即在人人皆有平均使用土地之权，而无一夫不耕之叹。及至战国之世，人口大增，政制复杂；授田之制，不能维持，豪强兼并，已不能免。于是土地终归私有，地主下阶级肇兴。其时土地集中之情形，至为可骇。“民多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入汉以后，兼并且甚。萧何“强买民宅数千万”，张禹“多买田至数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秦扬以田农而甲一州”，武帝且公然置私田于民间至招谷永之极谏。此种颓风为有识之士所痛心，故董仲舒有限田之议，王莽创王田之法。然终以积重难返，议固不行，法亦颠覆。直到五胡乱华之后，杀戮相接，土地多荒。后魏孝文帝，乃创均给天下人田之制度，盖“丧乱多年，户口稀少，计口均给，不虞不给”也。此制一立，北齐北周下逮唐初均斟酌采用。然日久贵族之风又作，虽有禁令，不救世弊。均田之制，自此而夭。至宋时朱勔有田多至三十万亩，自是言改革者不能均田，但求均税。舍

本逐末，于兹可见。贾似道之收买公田，徒貽笑柄。元季献田赐田苛虐，明代之投献颁赐，至使土地集中勋戚之手。弘治中，徽、兴、岐、衡诸王田多至七千余顷。“福王封国河南，诏赐田二百万亩，跨山东湖广境”。而“畿辅皇庄五，为地万二千八百余顷”。皇室兼并土地至于此极，尤堪骇怪矣。入清则圈地以给旗兵，而亲王贵主亦各给园地自百余亩至千余亩不等。其余官吏莫不以购买土地为殖产计。至晚清如毅军将领之为皖北大地主，张作霖吴俊升辈之为东三省大地主，皆其著例。民国以来四川军阀竞买成都平原之田，赵恒惕在湖南买田万亩，湖南赣人某氏有湖田数万亩，则今日之大地主也。大地主之外，尚有无数之小地主，各有田数百亩至数千亩不等。此皆达官贵人土豪富商所置之永久产业，因土地集中于地主手中，故各省佃农额占全部人民百分之二二至六六不等，而每每占人口百分之一点五之地主占田亩至百分之四四以上。佃农则占人口百分之四五，而仅占有田亩百分之八八九。半佃农亦占人口百分之三五以上而仅占田亩百分之二一点五九。自耕农只占人口百分之七，共占田亩百分之二五。此种情形在土地兼并最剧之区如广东如成都平原殆尤甚焉。故以全国言之，百分之八十之人口为农民，其中之又半数即百分之四十之人口为农奴式之佃农。终年手胼足胝不能维持一最低之生活水准。全国经济问题之严重，殆未有逾于此者。

由于土地之兼并，尤以由于人口之众多与耕地之不足，因而产生一更严重之土地问题，即每人垦地之面积过小是也。美国人民平均垦地一九点三华亩，阿根廷三三点六华亩，加拿大四〇华亩，中国则仅有二点七七华亩，视波兰之一〇点二华亩，英领印度之八点一华亩，尚犹不及。总计农民占地在十亩以下者，几占全数百分之四十二，占地百亩以上者不过全数农民百分之六点六。每人所占耕地如此之少，使全为自耕农，亦无法维持一适当之生活水准。所以至此者，由于耕地少而人口多。亦由于我国风俗，一家中之产业，在其父母死后，诸子皆得平均分受，故每户之田不数代即减少至不能维持生活。自耕农所耕之田亩过少，反不如为耕有较多田亩之佃农或不能佃田之雇农，盖其所获与工资尚较持有不足之耕地之自耕农为多也。中国共产党一最无识之事，厥为将耕地分至极少，农人之拥有数十亩地者便名之为地主或富农而没收分割其田亩。此种耕者有其田之制度，不但不能解决农民之困苦，而徒酿成更严重之灾害，结果唯有使大部农田荒芜，与使人人均变为贫

农而已。

在今日中国农民尚有一极大痛苦，即税额之不均。自省而言，江南之田赋“甲于天下”，而四川之田赋特轻，一省之中，税又不均。过远不论，在北宋谏官王素即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大理寺丞郭谠亦曾将蔡州一县之田均其赋于民。王安石之方田法即求“验田色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均定税数”。其税额所以不均之故，一由于田之种类不同，有产田、官田、职田、学田、常平租课田，名色不一，其所纳之租亦轻重不同。而最大之弊则在“田不出税，税非在田”，“势家有田连阡陌而无税者”。元代亦感于“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出而税存”，而有经理之法。其法与吕惠卿之手实法今日之土地陈报相同，然利未尽见，弊且随之。在明初，太祖曾以极大力量造成鱼鳞册以正田之经界。然“日久漫漶，买卖推收，虚伪日滋，有实鬻田而留虚米者”。其弊有飞诡、隐射、养号、挂虚、过都、受献种种方法。于是豪民有田无粮，“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耳，天下额田，已减强半”。额田减少之弊，固有以使国家租税收入减少。“然田不出税，税非在田”之结果，乃以使贫民负有额外之负担。此种情形，亘宋、元、明、清以迄今日，一千余年犹未能除去。此所以经界乃土地政策之第一要务也。

农民之另一痛苦，则在佃租之过重。在浙东一带佃户一年之总收入须以半数还租，其余半数除农场资本及其他开销外，尚须供全家全年之生活费。尚有田主收租至六七成者，农民则尤无法担任此重负矣。通常田主与佃农之分配谷产有佃六业四者，有佃业对分者，而大熟之年，甚至有佃四业六者，每年由佃户邀请业主看禾议租。亦有不问丰歉包缴定额租量者。有纳现金者，有纳谷者，有重顶轻租者（即佃户于承种之前预纳押租银若干），有先付预租者，甚至除缴租外，尚须为田主服劳役者，有除正租外，尚须付管事人以百分之二十之小押租者，有除正租外，尚须付业主以租鸡、租鹅、人事、脚米、斛面等等额外需索者。又有地主用大斛大秤多取于佃户者。而中国小地主之剥削佃户，尤胜于外国之大地主。盖如孙总理所云：“我们这些小地主，终是孳孳为利，收起租来，一升一合，一文一毫，都是要计算，都是要刻薄的。”而地主同时又是高利贷者，对于贫痛的佃农，又多一层的剥削。故中国佃农之苦，殆尤甚于外国之农奴。

总观中国农民之生活状况，所见中国之土地政策包有四项要政：即限

田，均税，规定农田分割之极限与减租是也。授田之制，窒碍难行，自古已然，不必再论。即土地公有而用集体耕作之法，在苏俄虽能实行，在中国则不能推行。盖因苏俄土地平旷，农奴制改革未久，人民习于在大地主之农场上集体耕作，故能安之。而在中国除东三省与华北平原外，大半为水田，而在山区，则为梯田，不宜大规模集体耕作。尤以中国农民习于独立之小面积耕作，集体耕作，非其所愿，特难实行。故今日谈土地改革，以限田与厉行耕者有其田为第一义。斟酌国内外之情形，我国每人所占用之农田，应以一百华亩为限。即使再宽，限田亦不可过于二百华亩。以中国生活情形，二顷之家，可称小康；如在江浙广东，甚则可称为殷富矣。至于限田以外之田如欲收为公有，有两种方法。一为较激烈者，即政府可发行土地公债，以购回逾限之田。一为较缓和者，即政府不强迫收买逾限之田，而以累进遗产税之方式，征收逾限之田亩，至仅逾一或二顷而后已。政府所征收或以公债征购逾限之田亩，可以分期还款之法，价卖与农民或退伍军人，唯必以自行耕种为限，而分给之田亩至少不得在五十亩以下，如是则耕者有其田之目的达矣。若取更急进之办法，则凡不自耕种之田（自家经营雇人耕种亦可称为自耕农），政府尽行征购以分给农民。如此始能完全做到耕者有其田也。

均税之重要与限田相等。欲达到均税之目的，首须经界，经界以测量为惟一之方法。土地呈报，殊不可靠。航空测量曾经试验最为有效，可全国举行之，再徐徐以三角测量，为最后之参考。此项工作，固极繁重，但不可免。同时则须普查人口。土地与人口既经详细调查，则大户飞粮隐税等等弊端，皆可杜绝。此外则仍有两项极繁重之工作，即如何根据各省之经济状况，修定各省之税额，使各省畸轻畸重之税额，可以调整而划一之；与如何察勘土壤之肥瘠，水旱之情形，将土田之美恶分为五等而定税额之多寡，此必动员多数之土壤学家与农学家精心勘究，非寻常研究地政者所能贸然从事者。

耕地面积过小，则不能维持一适当之生活水准，此习农业经济者皆能言之。中国以诸子平分家产之习俗，遂使耕地之分割漫无限制，此为中国土地政策上一严重问题，故须以法律规定土地分割之最小极限，过此则不能再侵害，而由长子继承之土地面积之最小极限不能少过三十亩。此制施行必遭逢极大之阻力，甚或引起社会上严重问题。但必以大无畏之精神克服此种困

难。如能将此极限提高至五十亩则尤佳。如是则农村有田之家，必至每有一部分子女，不能承袭父母之遗产，此种无产之人，政府应为代谋生活。然苟在国家经济繁荣之时，此亦非甚难之事。甚至农民不愿耕作三十或五十亩小面积之农田，亦未可知。同时政府应以种种方法使小农得以增购农田至限田法最大之限额，必如是方能养成多数小康之农民。

减租之必要，久为谈农政者所知。今政府重申实行二五减租之决心，此乃今日之要政。但普遍之二五减租，尚嫌不足，必也规定田租之普遍最高额，再减去其十分之二五，方为平允。而一切附带之超额征收如小租、租鸡、租鹅、力役等，概须禁绝。又收租须以实物为根据，庶能视年成而得公平之分配，征银包租等陋习，皆须严禁。必如是则佃农方有来苏之望。然减租不过为过渡时代之办法，若最后能完全做到耕者有其田，则无租可减矣。

经济之改造（三）

胡先骕

二 农业增产

我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对于农业确有惊人之成绩。如利用粪肥而能保持地力至数千年而不竭，久为国外农学家所赞美。我国农田每亩之收获量恰等于印度农田每亩产量之二倍，即其明证。又我国利用植物富源，远胜任何其他之民族。据美国农部之研究，欧美人食用植物约一千余种，中国之食用植物则有二千余种。此亦中华民族足以自豪者。然以科学不发达，农业全凭经验，故农产品质与量皆非欧美甚或日本之比；而我国动植物资源尚未能完全应用；能输入栽培之外国农作物与畜产，亦未能尽量输入；农产品工业化之工作；亦未能积极以科学方法促成之。每年病虫害对于农产品之损失亦极浩大。故欲尽量增加农业生产，则尚须利用科学方法，自多方面努力，方能奏效，约略言之约有下列诸端：

（一）发展农田水利 中国古代农业最重沟洫制度，故水利工程，殆为周秦两代物质文明之最高表现，郑国渠都江堰皆为秦代最伟大之水利工程。民国以来最重要之泾惠渠水利工程，即所以恢复郑国渠，而都江堰工程迄今二千余年尚完好如故，此中华民族值得引以自豪者也。然近代之水利事业，除陕西开渠及导淮两项工程外，尚少其他之大规模计划，黄河与扬子江水利多年失修，浙江海塘且有崩溃之忧。而在西北各省，地下水尚日趋于下降，沙漠日渐南侵，隐忧之大莫此为甚。而在若干地区如吉林，其池沼地尚待疏泄。至于内地各小河川之待疏浚与筑蓄水池以利灌溉，其待修水利工程之多

则尤不可胜述。又如扬子江口外，暗沙之面积极大，如兴建大规模之海塘排水工程，则不但崇明岛可与大陆相连，且可增加数县面积之膏腴之地；其经济价值，难以亿计。故以后改造中国之经济，必须积极兴修水利。水利若修，则黄河扬子江之水灾可免。耕地之面积可以大增，西北行将变为沙漠之区，可供农耕之用。若干接近水源之地区，可将旱田改为水田，而倍增单位面积之农产量。在扬子江流域因蓄水池之兴建，每年一熟之稻田，可改为二熟。若遇早年，旱灾可免。凡此种种，百废待兴，治河导淮与兴建宜昌水闸，不过其荦荦数大端而已。此等工程之重要，不在兴建重工业之下也。

（二）保土与增加肥料 保土研究起于美国十余年前大旱灾之后。利用森林以保持土壤，固属农林科学之常识，利用地形耕作及分条耕作种种方法，则为近年之发明。在中国西北各省有大规模推行之需要。又国人虽知利用粪肥以保存地利，但以处理粪便不得其法，氮肥之损失不可亿计。是宜以土壤学家最近发明处理粪便之方法推广于农村，方足弥补一部分肥料之不足。而大规模制造化学肥料，尤为农业政策之急务而有待于工业建设者也。

（三）改良及改种作物之品种 中国农家所用之作物品种固有颇佳者，现已由国内之育种专家搜求试验而推广于农家，已收得若干之成绩。但以中国土地之广袤，搜采尚未周密，且非每种作物之品种均曾加以周密之搜采。如苏俄曾成立一大豆研究所，所搜集中国产之大豆品种不下五千余，而在中国，对于大豆则尚未曾为此种大规模之搜集研究。积极改良各种作物之品种而推广之，乃今日谈农业建设之最要工作。然改良品种之方法，除正规之育种法外，如用各种植物膺碱与用放射线原子能以引起新突变之发生，亦为植物学家与育种学家所宜从事者，不可过于墨守故常。而完全改种不同之品种，有时尤能产生农艺上之大革命。如宋代之引种占城早稻即其已往之著例。今我国各省十九种植籼稻，但如改种粳稻，则不但产量可以大增，而稻之品质与价值亦将大培。又如贵州全省多山，粮食不足，但英国之春麦在贵州可以大量种植，而足供全省粮食之需要。又如四川松潘理番及西康等高寒之处，粮食不足，即寻常之马铃薯亦不能种植，但可输入南美洲安得斯高山区之野生耐寒马铃薯种以杂交法改良马铃薯之品种，使能生长高寒之区，而供给此区人民之粮食。诸如此类之研究，皆宜以卓越之眼光与方法以从事，不可故步自封，但知为刻板之工作。至于果品蔬菜，则各省每有特异之嘉种

如甘肃之醉梨，新疆之哈密瓜，山东之肥城桃等，以及可以栽植之野生品种，皆宜广为搜罗繁殖改良推广，使佳种随地皆有，则为农人造福多矣。此外则外国之优良作物果品蔬菜之品种，亦宜尽量移植，于此亦可增加农家之财富，此种工作，今日农业机关，尚未积极进行，以视欧美各邦，大有愧色。是宜添设经济植物研究所一类研究机关，专司其事，以补救农业实验所之不及。

（四）农业工业化，农业工业化为农业增产一种最重要之工作。是宜分两层论之。一为食品之工业化，使之增加其贮藏性，或改变其形式而增加其价值，前者如以著名之果品、蔬菜、水产、肉类、乳品、粮食，制成罐头腌腊干菜早餐品冰冻鲜品等；后者如制果酒果汁，制酱油，制假乳油，假猪油，代咖啡，咖喱粉，人造蛋，人造肉等。近来美国在战时对此有惊人之进步。我国宜急起直追，以求后来居上。如我国东九省素以产大豆著名，而除榨油磨豆腐外，剩余之豆饼，仅用以肥田与饲牲畜，殊属可惜。此种豆饼含蛋白质极富，若加以精制，可成为最佳之食品。即桐油饼，若以化学方法，除去其所含之剩余桐油，其中所含无毒之蛋白质，至少亦可用以饲牲畜。茶油饼，花生油饼，棉油饼，莫不皆然。又如热带产之参茨，在中国云南、广东、广西等省皆有种植，而可制成珍珠粉（Tapioca），其他可制珍珠粉之植物淀粉如何首乌粉天花粉等尚夥。如能加工制造，即可行销于海外市场。又如最近有人以桃金娘之果酿成代葡萄酒，尤为出色，是能在华南创一新实业。此种研究与加工，可以增加农产价值不少。一为加工精制工业用之农产品。如利用脱脂苧麻以织成麻纱，可行销欧洲以争取亚麻麻纱之市场。如以桐油制油漆，以豆饼制可型物人造羊毛，以蒟蒻粉制雨衣布，以柏油制肥皂，及利用竹木草秆等等以制造纸张玻璃纸人造丝可型物等等，皆所以使廉价之工业用植物，一变而为高价之工业品。此种工业可以增加国富不少。是在工业家之努力焉。

（五）林产之利用 森林之重要尽人皆知。林政之荦荦大端不外保护原有之森林，及在无森林之地造林，以及森林保护等。唯中国森林富源之调查，尚未普遍。如在云南南部即曾发现面积数百万方里之伟大楮栎及锥栗林，又如贵州梵净山脉闽赣交界之武夷山脉等等未经探讨之区域尚夥，如详为采集研究，必能发现伟大之森林宝藏。又中国森林中富有经济植物，为其

他温带国家所望尘莫及。油桐油茶乌柏竹类，即其著者。而其他未经广为利用者尤夥。如竹柏白檀（*symplocos* □□p.）之出产食用油，即其一例，是宜广为调查研究利用之。他种森林利用之研究在中国亦仅在萌芽时期，若锐意研求，大量工业化，必能裨益国民经济不少。

（六）畜牧业与渔业 中国西北及内蒙康藏一带，雨量不足，实为理想之畜牧地带。将此区之牧地垦作农田，适足以促成沙漠之增加与牧地之减缩，乃最不智之农业措施。在西北广大西域，如何归还牧地，乃今日农政之要图，是有赖于政府之贤明之畜牧政策。此项政策，包括繁殖并改良肉用牲畜。发达乳牛业，改良乳牛种及以科学方法制造罐头炼乳乳粉及乳油乳饼等，如处置得宜，大可增加人民用乳类食物之数量，于国民经济国民健康皆有莫大之裨益。而毛革工业之改良，尤有裨于国民经济。

我国海岸北起渤海，南迄南海，绵亘数千里。水产极富，我国渔民，至为坚苦耐劳，以其渔捞法之粗放，每年水产之出产，尚有大量，若能以现代之渔捞工具以改良其渔捞之方法，则产量必可大增。若能大量制成罐头，改良腌制及冷藏之法，则可大增海产之销路，尤与国民健康大有裨益，又中国数大河流及各大湖沼，均富于水产，若改良渔捞与繁殖制罐冷藏各方法亦可以增加生产与销路。又人工养鱼，尤其是稻田养鱼之方法，若能推广，亦可增加人民食肉之量数。是赖有专家与经费主持此项研究事业耳。

以上六项为农林畜牧增产之卓卓要务。至于改良仓库之建筑，防治仓谷害虫及其他病虫害，以减少农产之损失，其功用与增产相若，亦农业政策中之要目也。

三 农业合作与农业金融

今日农业政策之要图，合作事业实居首位。农民最大之痛苦约有二端，即（一）需款时无法借到薄利之贷款，必以重利息借于土豪劣绅，或预卖青苗，横遭剥削；（二）收获之时不能存储以待善价而不得不贱卖。故农政当务之急为积极推进合作组织，同时扩充农业贷款；使农民得以合作社社员之资格向农业银行以低利贷款以应急需，以及改良农业之用；又须大量组织合作仓库，使农民所收获之农产品可由合作仓库代为存储，并得善价出卖，而不至为牙行市侩所剥削，则嘉惠农民者大矣。复次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

十五，是为全国最大之消费阶级。故欲为消费者谋福利，首须为农民谋消费之福利，则农民消费合作社，必须尽量扩广，使之遍布于全国。务使农民在消费方面，能得到最多之利益，而受到最少之剥削。终期进一步由消费合作社组织生产机关，使为消费而生产，则农民受惠愈大，此尤为农民政策中之要政也。

经济之改造（四）

胡先骕

四 工业建设

计划工业建设，首须拟定国家工业建设之基本政策。此项政策以民生主义为出发点，是工业建设之目的即为供给民生之需要。故必须尽速建立轻工业以求人民得以充分享受日用之物质。

但重工业如钢铁铜铝等金属之冶金，煤矿石油矿之开采，水电厂、日光动力厂、机械工厂、酸碱工厂、水泥工厂之筹设，以及一切公用事业如铁路轮船航空公路之经营，电灯电话无线电飞机造船制汽车等厂之建立，或直接与民生日用有关，或为轻工业之基础，自须与轻工业同时建设，不可畏难而苟安，倚赖舶来品以解决目前之需要。好在利用外资，久成国策，而重工业国营轻工业民营，本为民生主义所许。故可公私并进，期收速效，不必效法苏俄一切工业均须国营，以至私人不能发挥其企业才能，而国家财力不能兼筹并顾，反生丛脞之病。至于节制资本，可借政府立法，以建立统制监察之机构与法规，使资本主义之流弊，得以避免，则中国将能步英国与瑞士之后尘，收效反在苏俄之上矣。

建立工业中心为今后中国工业建设之要政。程孝刚先生曾主张建立四个重工业中心区，即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区。东北区以沈阳为中心，西北区以迪化为中心，东南区以株洲为中心，西南区以乐山为中心。此盖就中国之地理及资源而有此项主张。但以今日国防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需要，似不宜将重工业集中于四个中心，宜尽可能分散于多区，庶可免轰炸摧毁之危险。而尤

要者厥在尽量避免建立一百万以上人口之都市。盖为中华民族之精神福利起见，小工业都市之建立，远在大工业都市之上，此言经济建设工业建设所倍宜提撕警觉者。以中国幅员之广资源之富，尤以将来动力资源，可以今日不能思议之方法增加，则在中国，重工中心之建立应以百计，轻工业都市则应以千计，谋国者其念之！

今日为大量生产之时代。机器愈形复杂而巧妙，则工人之动作愈形简单，愈形单调，愈不须工人用脑力。工作遂变为一种机器所不能代替之活机器。工人既变为机器，其动作既全变为机械化，则年深月久其人格亦逐渐丧失，而真变为机器矣。此种弊病在社会改造中，当更详论之。但此处所须指明者，即工业之机械化，并不须至于此极。即在各国，工业分化之程度与工厂组织之情形，亦非尽同。在欧洲各国，机械之复杂性与自动性即较在美国为少，在日本亦然，换言之即工人动作之机械化亦较少。又大工业家如亨利福特亦尽力使各工厂改组为甚小之单位，而使此项工厂单位家庭化，以求保存工人之人格。故我国今后建立工业——至少在轻工业——必须尽量使机械简化，使工人能多作有意义之工作，则工人受惠多矣。

复次在使用机械外，尚宜尽量提倡手工业。务使二者同时发展，提倡手工业之宗旨，与其谓经济的，无宁谓为社会的与教育的。盖手工制品之佳处，即在其具有个性与美术性。固有多数工业产品不必用手工制造，但亦有不少轻工业产品以手工制者为特佳。如美术瓷器、刺绣品、花瓣、草帽、皮件、女衣等等，即其著例。此种手工制品，不但可使工人有精神上之寄托，亦可成为经济建设中之要素。

五 积极奖励利用科学新发明以改造经济

近年来科学新发明，日新月异。每一种新发明即足使日常生活感受异常巨大之影响。但以政治家之无远识，与资本家不欲轻于改革以至动摇其私人经济基础，故每每漠视甚至抑制新发明使之不得应用。大公司购得发明人之专利权，而不制造应用，乃习见之事。平常新发明自完成至于大规模应用，平均须历时二十五年之久，如此则人民受损失多矣。重要新发明影响人生最巨者，莫如原子能之利用。苟原子能可应用为一般机动力，则人类之整个生活将发生空前剧烈之变化；国民经济亦须彻底调整。届时煤与汽油或将

不复用作燃料，而异常价廉之动力将使交通制造一切事业突飞猛进。不但原子能之利用，有如此大影响，即日光热能之利用亦然。利用日光之研究，亦有相当之成功，一具小型聚日光热能之器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已足使一家庭终年可得免费之电灯热水与厨间所需之热能。若在不远之将来大规模之日光动能机械研究制造完成，其功用将不在水力发电厂之下。则我国蒙古与新疆之大沙漠区域，以及非洲之撒哈拉大沙漠，及美国西部之沙漠区域，皆将变为动力资源区，其价值且将远在油田之上。又如农作物水养栽培法（Hydroponics），在或种地区或能引起农业之革命。锯屑制糖，糖浆制人造肉方法之大规模应用，亦将引起农林畜牧业之革命。红外线灯泡之应用可使家庭中取暖方法获得划时代之改革，火箭式飞机或能使吾人往月球旅行。凡此日新月异之发明，政府宜尽力奖励，而争先引用，以谋国民经济之增进，不可事事落人之后，必待他人已大规模应用方始追随其后，此亦工业政策之要项也。

六 积极提倡合作事业与组织消费者组合

在论经济改造之基本原则中予已指明资本劳工与消费为经济活动之三要素，在论农民政策中，又复阐明合作事业为要图。盖资本与劳工之利益虽不免有时对立，而尽人皆为消费者，故言经济改造而欲为全民谋福利者则必以为消费者谋福利为第一义。消费合作社即为谋消费者之福利之组织，今日在各机关中组织消费合作社者尚有之，而一般市民所组织之消费合作社，则殊未之见。是宜广为宣传与提倡，此可以数种方式以组成之。一为各行会之消费合作社。一般市民类皆有职业，有职业斯有行会。以同行而组织消费合作社，必易于号召。又国人素重乡谊，故又可组织同乡会之消费合作社，又或可组织一都市中之各区消费合作社以及自动组合之消费合作社，进而联合各种各地之消费合作社而成为全国性之消费者组合，如全国之总商会然。消费合作社之单位既多，会员自众，若组织得法而有杰出之人士主持之，即可形成一种伟大之政治与经济力量，而足以左右资本与劳工两阶级，使之皆不能垄断而牺牲消费者之利益。如近日美国消费者罢购运动之足以抑平物价，即其著例也。美国之消费者组合曾有大规模之组织并附有试验室以调查检验全国之商品，而与以公平正确之估价。凡一会员皆可自组合获得每月之报告

列举各种货品之评价，俾消费者不致受欺。此种报告不但可以取缔劣货，亦可为货真价实之商品做宣传，苟此组合之势力遍及全国，则社会普遍受其益，工商业作伪之风气可以矫正，各业之广告费亦可以节省，因而减低其成本，亦所以减少消费者之负担也。再进则由消费者组合集合消费者之资金而从事生产事业，使为消费而生产之经济最终目的，可以达到，则资本家与商人垄断之弊害可减至最小程度，而不流血之经济革命亦可达成。英国在战前消费者所组成之生产事业资金达数千万磅，此种事业苟经营得法，自可无限发展，国人其勉之！

七 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

在今后之世界，九州万国，等于一体，世界联邦，乃吾人政治最终之目的。世界经济合作，亦为吾人经济最终之目的。此次战后世界经济合作之需要，已由学理上之认识而见诸实施。如美国之租借与同盟国之物资，国际善后总署与国际银行之建立，世界粮食会议之决定尽量增加粮食之生产，皆为划时代之建树而非战前所能梦见者。然尚未完全达成国际经济合作最高之目的。盖因主权国家之存在，民族经济之观念尚未能完全消除也。以言经济之改造，对于世界之经济，必须抱一车同轨书同文之大一统精神，必须有世界银行，世界币制，世界经济局，以统一世界之金融与币制，与统一世界之经济计划与行政。世界之资源与技术，皆须共有共享，务使全世界人民之生活水准，趋于相等，皆能享受富强康乐之生活，斯方可谓已完成经济改造之目的也。（完）

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

陈志让

资本主义从何时开始？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能准确答复的问题。不过我们一般所谓的资本主义系指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而经济的十九世纪又从滑铁卢之战以后开始。

从一八一五到今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约略地可以分作三个阶段——从一八一五拿破仑第一的失败到一九七〇拿破仑第三的失败；从一八七一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到一九二九世界大恐慌开始；从一九二九的大恐慌到现在。

在第一个阶段中，个人享有最大的经济自由——消费、就业、投资与储蓄的自由。国家理财以经济简单为原则，以财政收支平衡为铁律，不干涉国民的经济生活，甚至不帮助国民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则充满了自由的气氛，贸易的阻碍逐渐清除，国际金本位终于成立。无论国内国外，经济的波动是有的，但并不剧烈，影响也不太严重。经济的进步很快，同时大体上整个制度还相当安定。这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称之为自由的或竞争的资本主义。一八六〇的科布登条约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峰。

在第二个阶段中，因为新的技术和金融工业的结合，独占事业逐渐兴起；因为私人间彼此破坏性的竞争及其不良的结果，以及经济波动的加剧，国家的干涉日渐发展。因为国际间市场的竞争与幼稚工业的培养，国际的保护主义慢慢抬头。独占的趋势与政府的干涉保护是这时期主要的特征；而促成这两个趋势的是经济失去了安定，失业渐渐变作严重的问题。这时期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之为独占的资本主义。

在第三个阶段中，独占事业愈更发展，个人经济自由的领域愈更缩小；

国家理财不再以收支平衡为原则，而以赤字预算为准绳：其目的在以政府的支出弥补个人支出之不足，以免除消费不足或生产过剩的现象，以救济失业。在国际间更自关税的保护进而采用量的保护政策。经济制度本身的不稳定性愈更明显，而医治的办法多半是组织代替自由，使经济本身的刚性愈来愈增加。一切的经济措施其目的都在稳定经济。这应当叫作 Guided Capitalism。

这一百三十年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是从自由到组织的发展过程。在这一个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一个重要的附产物——劳工阶级，和一种重要的思潮——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潮自何时开始，本文不欲讨论。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自然是一八四八年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深恨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理想。他所重视的是组织而非自由；是平等，是进步，是经济的安定，绝不仅是生产的增加。要调和进步与安定的矛盾，他以为私有财产必代之以财产的公有；无政府状态的生产必代之以经济的计划。只有这样才能增进国民的经济幸福，免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缺点。马氏的理想自一九二八年苏联第一次五年计划以来始付诸实现。

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这两种复杂的制度，很难有一双确切的定义。大体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是财产的私有（特别指生产工具的私有），利润的追求，经济的自由（投资、储蓄、消费与就业的自由）与合理的计算——用一个合理的单位计算如何的最小成本获致最大的利润。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则是财产的公有（特别指生产工具的公有），经济幸福的追求，相当的经济平等与全面的经济计划。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合理的经济——用一个合理的计算单位，计算如何以最小的牺牲获致最大的满足。

但问题的基本在于这两种制度的运行。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只“冥冥中的手”（An “invisible hand”）——价格机构。每一个人在消费，在生产，在就业，在投资的时候，他总假定价格不变，或假定现在和将来的价格已知，这样他才能决定如何消费，生产，就业或投资。举凡生产数量与生产的种类，消费数量与消费的方向，就业的数量与职业的选择，投资的数量与投资的部门，莫不受价格机构的指导。而价格本身又能反应出市场上买者的心理与卖

者的情况。所以这种制度既能受此一机构之指导而圆滑地运行，并且是一种合理的经济。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此一机构局部或全部地消失。至少资本和生产用品已经不再有市场价格。这时成本如何计算？价格如何决定？所决定的价格又是否合理？如不合理，又是否会使经济社会陷于无秩序的状态中？

对这些问题我们只有一个正面的答案。社会主义的计划当局可以本着过去的经验与过去市场的情形决定一个计账的价格。这一个价格在决定生产消费就业的行为时，可以也一定被生产者、消费者和劳工当作不变的价格或指标，从而决定其生产消费之数量与方向。这一个计账的价格机构将取价格机构的地位而代之。如果计账价格之间发生失调的现象，则计账价格过低的物品一定感觉不足，而过高者一定有余，计划当局重新调整，用尝试错误的方法，达到合理的计账价格。经济行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表面上受计划当局的指导，实际上基本的指导者是设计机构所订立的计账价格。受此一机构的指导，经济行为仍然可以合理地运行。

这两种制度的合理运行既无问题，则两者的选择就在于两者的优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优点在能使经济进步，在能享受经济自由，也在能使生活多样；但其缺点则为不平等与不安定。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点在能使经济进步，在能享受经济的安定以及经济的平等；但其缺点则为单调与不自由。从经济制度方面看来，自由与平等无疑是两个互相排斥的观念。爱好自由的人不妨选择资本主义经济；而偏好平等的人至少已经倾向于社会主义了。

事实上，没有一种制度中无其他制度的因子。特别是在组织与政府的控制逐渐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中，计划与公有财产的成分慢慢增多，这也许正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路。但基本的关键还在于企业秘密的消除。能消除企业的秘密，才能消除经济现象间的失调与经济的循环变动；也才能稳定经济。到了那一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是否尚有重要的区别将是我们必须重新考量的问题。

卅五年十一月北平

现代财政动向与中国财政政策

伍启元

从地理发现和现代国家兴起到现在，世界财政政策和财政理论，曾起了几次重大的变化。一九一四年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世界财政的理论、政策、措施、制度，都有新的变动和发展。中国今天已是世界的中国，我们的一切都与世界息息相关。因此我国的财政政策，亦应追随世界的潮流，而不应孤立地违反现代财政的动向。在这里，我们先将现代世界财政动向作简单的分析，然后指陈中国今后应有的财政政策。

在没有分析一九一四年以后世界财政动向以前，我们首先简单叙述十八世纪中叶至一九一四年（以后简称十九世纪）西洋社会财政的特征。那个时期的财政，是与重商主义时期的财政完全不同的。在重商主义时期（由地理发现至十八世纪中叶），财政是经理君主收支的“私人财政”，其根本原则是“量入为出”，财政收入是以官产收入和特权收入为主，财政支出则注意于富国强兵，在收支不相抵时君王亦常作私人的借贷（但没有现代意义的公债），同时理财者是很注意贵金属的积聚的。十九世纪的西洋财政便完全不同。十九世纪西洋社会有两个特点，一是民主主义的发展，一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在这双重影响之下，产生了以英国亚丹·斯密及李嘉图等的学说为代表的经典学派。经典学派的财政理论和当时西洋的财政政策，具有如此的特征：

（一）公共财政——所谓公共财政，就是财政公共化或国家化。无论就法律上或就理论上说，财政的收支都是为公共或整个国家的，国家财政断非一党一派或当权者个人所能私行使用、擅自支配的。

(二) 人民控制——即国家的收支，应一律由民意机关控制，一切公开，一切取决人民。此为民主财政的重要原则。甚至战时财政，亦须公开，亦须受民意机关的控制。例如英美以至日本，她们在战时财政收支亦是按时公布，并由国会审查的。

(三) 量出为入——公共财政的原则是“量出为入”，与过去的“量入为出”相反。原因是这样的：在民主国家，财政或预算是人民控制政府工具。人民行使政权的方法，第一就是控制国家预算案。大凡政务推行无有不花钱的。人民控制着预算，决定该花多少钱，该给多少钱，就等于控制了施政的方针。因此在民主国家里，民意机关先决定行政计划，然后根据施政计划决定财政支出，最后才根据财政支出决定财政收入。

(四) 缩减支出——十九世纪西洋国家因为认为国家活动应减削到最低限度，认为国家行政是一种消费或且浪费，应该尽量减少，所以认为财政支出，也应尽量节省。

(五) 收入依受益原则——支出既不多，则收入亦不宜太多。经典学派认为租税征课首应依照受益原则，只向受益者征收。其次，经典学派十分注重财务行政中如明确、便利和经济等原则，认为租税应符合这些原则。此外十九世纪认为租税应以财政收入为目的，而不应以推行经济政策为目的。在这些原则之下，十九世纪侧重于间接税和反对直接税。例如，一八五三年英政治家格兰斯敦竞选时即主张完全取消一切直接税。他们主张财政不能做推进任何经济政策的工具，财政只是为财政而财政。

(六) 收支平衡——经典学派以收支相抵或预算平衡为美德。

(七) 不同意发行公债——认为公债增加将来的负担，所以应该尽力减少。

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都起了重大的变迁。这两次世界大战，其社会经济的意义非常重大。本来任何一次大战对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拿破仑战争就是由封建经济转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国社会经济，现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财政政策，亦起了新的变化。

从一九一四年到现在，有三种历史事件使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起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是战争本身。在这两次战争，战时财政使大家对财政的看法完全不同，这对于下列五点特别明显：

(一) 支出——财政支出在这两次大战中都十分庞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等国的战费竟达她们国民收入三分之二，日本等国家还要超过，这使大家知道如果有必要，一个国家的支出可以增加至多大的程度。不但如此，在这种巨大支出中，因能维持完全就业并增加生产，结果大家了解可以利用财政支出去达到这两个积极的目标。

(二) 租税——由于战争的需要，租税上由“能力原则”，代替了“受益原则”，而租税的积极目标，代替了单纯的行政的原则。不但如此，租税并且被看作一种重要推行经济政策的工具。在这些影响之下，各作战国家直接租税均大为增长进步，其范围之广税率之高可谓空前。这是很自然的，大战需要消耗大量金钱。当然应向有能力负担的（亦即富有阶层）抽税，这就是直接税。这次欧美士兵作战的口号是：“吾人非为百万富翁而战”，“亦不为制造百万富翁而战”，这是值得注意的。

(三) 收支关系——这两次大战明白表示出任何国家的财政收支都可以不必平衡。只要这种不平衡不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则赤字财政不一定有害。

(四) 公债——根据两次大战的经验（特别是第二次大战），公债可以大量增发。从前的人认为公债是增加后世子孙的负担，现在则认为不过改变一下未来财物分配的状况而已。

(五) 通货膨胀——两次大战，使大家对通货膨胀影响的认识加深，从这一次世界大战，战后通货和此次大战中国及其他通货膨胀，使大家了解赤字财政如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则必会引起无穷的灾祸。

一九一四年以后的第二个重要事件是一九三一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不景气，也使财政政策作极大的转变。在救济恐慌政策影响之下，发生了如次的财政政策的转变：

(一) 财政应该为施行经济政策的工具，支出不只是为执行政务，更是推进积极的政策。欲救济失业，增进社会繁荣，只有增加支出，兴办公共工程。

(二) 租税收入亦以推行经济政策和增进社会繁荣，为主要目的。

(三) 收支关系则一反过去经典学派所主张的收支平衡，而主张支出可以超过收入。大量公债亦可于有计划的政策下举办。多花钱可以增加社会繁荣，必要时温和而非猛烈的通货膨胀也是有益无害的。

一九一四年以来第三种重大事件，是社会主义或社会改革运动的兴起，

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抬头，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安全政策。这个趋向承认人人有满足生活欲望的权利，每一个人由出生至死亡，若有失业饥饿，均应由国家负责。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财政支出因国家要发儿童津贴，要发失业救济金，要发疾病津贴，以至年老退休金等等，不能不大为增大。今日先进国家既要将贫穷这个字由字典中剔去，就不能不增加了财政的支出。不但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之下，财政更要负担许多新的责任，其中最重要的是创造国家资本和发展公有事业。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财政收入与支出，去平衡社会财富和国民收支的分配。

综合言之，最近世界各种社会经济变动，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影响到各国财政政策，使一反过去的观念。

在世界财政已有如此大的变动时，战后中国应有的财政政策是什么呢？在过去数年间，一直到现在，中国实在没有什么财政政策，只是相机应付而已。我们认为今后这种办法必须纠正。我们愿意提出八点，作为今后中国财政政策的基本原则：

（一）实现财政的公开。财政要国家化，由人民实行控制。

（二）必须“量出为人”。现在我国还是“量入为出”，国家审核预算，尚无精密计划。

（三）支出方面，应利用财政支出去推进一定政策，并维持经济繁荣。支出必须适合建国的需要：

（甲）除维持一般政务外，应能顾及推进经济建设。

（乙）支出要以实现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为目的，中国过去情形是与民生主义背道而驰。

（四）完成直接税体系（指真正现代化的直接税体系），达到分配的平衡。

（五）收支不必平衡，最要紧的是要有整个的补救计划。

（六）大量发行公债。在这个政策实施以前，应先树立政府业已失去的信用。

（七）大量发展公营事业，而以其收入来支持财政支出。

（八）由立法机关控制钞票的发行，停止目前在进行中的恶性通货膨胀，并由立法机关控制发钞，以阻止将来可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但同时也应许可温和通货膨胀。因温和通货膨胀，有时是必要而且是有益无害的。

从黄金风潮论经济对策

庄智焕

一 金潮的成因

这次金潮的泛滥，与其说是少数人投机操纵的结果，无宁说是过去各种错误措置的总的暴露。战事结束后，中国的黄金和外汇政策，在表面上虽有若干修正，但在本质上仍是战时那一套。先就外汇政策说：三十五年二月间公布的《开放外汇市场案》，仍然是依循过去的路线。此项措施所发生的最大弊害，可以纳为二点：其一，外汇买卖价格和国内生产成本的差距更形扩大，以致外货可以有利地源源流入，不但扼杀了国内生产事业，而且消耗了大量外汇资源。汇价的呆定不变更加深了此种趋势。原外汇办法虽没有规定二〇二〇对一的固定汇率，但在执行时，则完全根据此一水准；直至去年八月，始行调整。由于汇率的呆定不变，汇价与物价的距离益远。其二，照外汇办法曾规定非三个月内所能输入的商品，概不结汇。此项规定的原意，虽在防止资金的变相逃避，但呆板执行的结果，徒然便利了国外市场现货的奢侈品及消费品的输入，而使在国外必需定货的资本品的进口陷于断绝。去年八月十九日，政府始将美汇改订三三五〇元，同时采行输入许可办法。但实施成绩亦难令人满意。因自八月改订汇率以后，国内物价波动益烈。法定汇价和物价的距离仍继续不断的扩大。我们依国内物价和国外物价标准计算的真实汇价，应在法定汇价（三三五〇）的四倍左右。法定汇价既已丧失其真实意义，终使合法的输出贸易大量减低，非法的输出数量骤增。结果黑市外汇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黑市汇率亦自然随着上升。在这种情势下，资金

的逃避和侨汇的流入黑市，也就无法作有效的制止。及至本年二月，政府鉴于情势恶劣，又颁布进口附加税和出口津贴办法。这次办法的公布，失败得更快也更惨。差不多在办法公布同日，出口货币价立刻上涨一倍，完全冲掉了原办法的利益。不顾农业国家的产品有季节性，只问商业利益而定的办法，失败是当然结果。另一方面，反引起美国的恶劣反响，考虑到要援用十年前所订定以对付“纳粹”倾销的关税条例，以对中国出口货加征进口特税。所以这次办法的公布，不但无补于平衡国际贸易，而且更刺激国内经济，并促成此次金钞风潮的爆发。

抗战期内，黄金本来已和物价脱离直接联系。在战争末期，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又恢复了其中间的联系。胜利后，政府更变更抛售期货，改为现金买卖，扩大黄金政策的施行。自去年三月八日开始抛售黄金以来，大概可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三月九日至四月廿七日止，是采用钉住政策，始终以一百六十万元一条配售。第二阶段是从四月廿七日起，改取随市卖出政策。这在技术上虽为进步，但抛售黄金的基本理论实有问题。黄金政策的运用，虽可吸收一部分的购买力，缓和物价的上升，但它的运用必需具有若干条件。第一，唯有在金价与物价水准趋向平衡的条件下，黄金政策方能收到合理的效用。我们根据经济统计，可知黄金价格常常随着物价变动。但金价的剧烈波动，则势必形成人民的恐慌心理，转而刺激物价的飞涨。所以黄金政策的运用目的，决不是过度抑低金价，而应使黄金与物价的水准渐趋平衡；并依同一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定要硬压金价，以求物价的稳定，不但徒劳无功，且有横决的一天。这次的金潮，正是最现实的说明。其二，唯有在财政赤字不太大的条件下，黄金才能有吸水纸吸收余水的功用。我们必须认识，黄金政策的运用，不但有其必要条件，而且有其一定限度。目前财政赤字日益扩大，两年来通货增发达三万亿元。财政部严厉管制金融业，不许国家银行提高利率以吸收存款，却使绝大部分的现钞变成不经正规银行钱庄的游资。我们如果不从减少赤字，利导游资作根本的治疗，则黄金政策迟早要失败。据政府公布，本年岁出预算为九万三千余亿，收入为七万亿。假定收入项目可靠，每月不敷亦在二千亿元以上。又依中央银行配售黄金数字作一估计，去年十二月及本年一月共约配售黄金四万条，连同暗中出售共约六万条。假定每两售价平均为四十万元，共计国币二千四百亿元。依靠这样计

算，则政府抛售黄金所得，约为收付差数的六成。但是，政府到底有几个四万条可抛呢？

我们从各国金融史上看，如果某一国家在贸易上陷于逆势，就只有贬低币值，以促进输出，减少输入。我国却死钉住硬性的汇率，不特陷工商业于绝境，而且杜塞了侨汇和外来的投资。再则，如果一国在财政上无法平衡，就只有停止兑现，以减少金融的波动。而我国却以藏金奇绌的国家，实行无限制的抛售，以求通货的收缩。由此可知，我国的黄金和外汇政策，实在和近代的金融原理完全背驰。它的失败当然是无可避免的结果。

这次金潮的成因约有下列数端：（一）由于政府当局假定去年年底前，国内可以完成和平，故偏重注意力于财政收支，而忽视国内生产之必需尽力增加，致对外收支失衡，国内经济趋于崩溃。（二）由于政治的缺乏综合性能，使政府机关各单位，各行其是。尤其是政治与经济的脱节，使行政无力，政策落空。（三）由于汇价，金价和物价的重大脱节，以致输出减少输入激增，激成了黄金和外汇的猛烈跳动。（四）由于财政赤字的庞大，促成了游资的泛滥，不仅使黄金和外汇市场遭受重大的压力，而且引起投机的心理和行为。

二 我们的对策

这次黄金暴涨，引起物价大波动的教训，已激动整个政府及社会。我们，应该作一全面的检讨。现在我们拟定对策，自然要依据前段所说的病源。这次金潮的成因既属不一，那末对策的拟订也必须是整个的，全面的。任何支节的或局部的办法，都不能产生圆满的效果。第一，我们必须设法消除外汇和物价间的差距，使之趋向于同一水准，以谋对外均衡的重建，消减投机的客观因素。我们要尽可能减缩黄金的活动范围，使其不致影响物价。第二，我们必须设法利导游资，或减少游资所加于黄金和外汇的压力。第三，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物价政策，以求国内经济的稳定。

货币是交换的媒介品，其本身在国家经济立场上说，并不是财富。黄金亦是媒介品之一，在法币政策施行十余年之后，为什么人民还不能信法币而信黄金？政府的名器、勋章、货币，本来是人为的荣誉或价格中准。施政的最要原则，在使人民信服此项中准，而遵守之。所以名器、勋章，都不可

滥，货币尤不可滥。其他各国或有因温和的通货膨胀而获收平衡国际收支的利益，我国则感年来只有膨胀之害。原因就在我国战时生产萎缩，出口减至最少限度，战后生产机构崩溃加剧，国际贸易入超额更巨。治本的方案，在增加生产，尽量增加生产。这中间当然要赖金融扶助方法的改进，税收制度的纠正。然而国家的政策，原应该是整个的，不容许经济财政及金融机关各行其是的；而配合运用的责任则应由行政院肩任。

在黄金美钞领导物价的今日，我们首先要使金钞脱离物价的联系。二月十七日政府公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其要点为：一、禁止黄金买卖及外币流通。二、调整外汇的美金挂牌为一万二千元。三、取消出口补助及进口附加办法。四、标售敌伪及剩余物资以裕财政收入。五、稳定工资，规定以本年一月份生活指数为准。六、配售民生必需品。这方案，在表面上虽甚周密，但其实际效果，还待事实说明。人类的智识本来是经验的累积。可是太囿于过去的经验而不能自拔，亦易失败。我们现在依据抗战期内管制物价的经验，来重行规定《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其结果恐难完全乐观。

过去管制物价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为下列各端：一、因户籍人口之乏缺正确统计，我国不能有效的实行定量配给或采用“点数制度”。二、行政干部，尤其基层干部能力低弱；且常思借机贪污。三、行政手续繁冗，不能适应机变。四、政府所能控制的物资数量太少，无法“以量控价”，发生平抑作用。五、各同业公会对同业控制力量薄弱，无法使市场配合政府之要求。六、游资充斥，且大都盲目蜂从，促进物价之跃涨。这些因素目前依然存在，或且加甚。同时，在各种物价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往往会引起争竞；而工价与物价更会互相竞赛，趋向上涨。结果最倒霉的是薪水阶级的公教人员，因为薪津调整远落在物价竞赛之后。当前的命题，是如何使各项物价及工价从速达到平衡线上。最低限度也应使薪水、工资、及物价作平头的上涨。我国要发展国际贸易，整理通货，从事建设，都必需这个前提的解决。做法，首在充实物资，不论这些物资是如何来的。我们的紧急方案，除了尽量辅助生产外，应该是：

一、取消进口管制办法，从价征税。因为我国统计资料不具备，到底何种东西必需进口，某种东西应该进口多少数量，均缺乏依据。在管制进口时，几万张申请书因无正确的审核尺度，准驳为难，结果只好因人而施，其

事甚不合理；社会的消费量是有其饱和点的。去年一月至十月，物价涨势相当平稳，其时的进口货多实为重要原因之一。许多奢侈品，如“玻璃”制品、香烟、洋酒等，进口商曾经有因到货太多而亏本的。至于资源品进口，对于缺乏物资的现阶段我国，更是利多害少。为保护本国工业，可暂时依赖征税的税则。现在我国工业，其原料与工作机大部依赖舶来。而且现行的成品机器免税，而原料征税的办法，更足陷一部分工业于困境。故取消进口管制，反多裨益。

二、政府所有外汇，一概留作建设、交通、水利等用途；不与人民以申请。胜利以后，我国已耗费了几亿美元。然而真正用于建设的百分比，却不甚高。这等于建设资本的浪费。政府今后对于外汇的用途，应限于促进生产的间接用途，不用于直接生产的国营工业，以免与民争利，而使国营民营的工业站在不平等的立场上竞争。人民所需求的外汇，自然会取之于黑市，而且也唯有这样才能使存在美国的三亿余美元认为有利可图而换成物资输入国内。我们实在怀疑政府一纸命令真能使富商达官们的美国外汇前来登记，换取法币或公债。只有“利”才能诱好利的人来。富人不怕钱多，愈富者愈好钱，此乃古今中外的定律。或者有人以为这样是鼓励黑市的存在，然而在管制进口的情形下，黑市外汇也一定仍然存在。最少限度，一批走私客是需要黑市外汇的，而我国现状下，走私是无法根绝的。这理由很明白，用不到解释。此外，一部分进口商自然会取得所需外汇于出口，而形成进口的自然连锁。

三、政府为维持其外汇头寸计，可尽量输出。我国的输出物资不是金属矿砂如钨、锑、锡、汞，就是农产品的桐油、茶、丝、猪鬃、肠衣、皮革等。这些输出物资，一部分现在仍是有利可图，一部分也许因国内生产费用高昂而须赔钱。然为政府计，譬如补贴出口。为平衡国际贸易计；亏本亦无所谓。这正合近代国家的财政原理；鼓励出口正是鼓励农矿的生产，亦有益于广大的农村与荒芜的矿区。

四、公教人员的日用必需品由政府定量供给，进一步谋公务员的公给制。在物价波动下的艰苦的公教人员，其米、油、煤、布、盐、糖及住宅等均应由政府实物供应。今日一般人的收入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化费在食住两项上的。政府如果能为他们解决食住，则薪给微薄的痛苦也减轻了。进一步

政府可办公共食堂、公共洗衣、子女学校等等。其中的教职员即可由各机关的职员或其眷属担任。公务员公给正可试验新社会组织。不过在日用品供给的阶段中，政府一定要避免现行行政机关的习惯，减省不必要的手续与表格。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责成每一机关的总务单位或合作社，自行包办其本机关的必需品的领取与分配，而不必层层报告，由中央的主管的大机关来审核。如果必要，不妨由监察院随时巡回抽查考察，以明了其人数与物品的数量是否配合即可。

五、政府指定机构控制大量的米、煤、油、盐、糖等物资，并向衣料、肥皂、纸张、火柴等工业放款，收购其产品；除供应公教人员外，并用于平定市场物价。我们认为行政命令对于经济行为的效用是有限度的。经济的问题一定要用经济的方法去解决。要平定物价必需“以量控价”。政府以低利贷款扶助日用品工业，同时即作为产品的定金。这样就取缔了中间商之操纵，对于金融与工业均有裨益；对于稳定市面更能有效。

六、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以渐逐减低利率。目前黑市利率在一角三分至一角八分，而银行存息只二分至八分。“为渊驱鱼”，结果社会上最大部分的资金均不在正规的银行钱庄进出。许多人民且因地下钱庄或商铺的倒闭而本利两失。然而，利之所在，法不能禁。政府应该为大多数缺乏法律常识的人着想。为开辟正当途径，如果将国家银行存款利率提高至八分，商业行庄存款到角二分，则人民为保障其积蓄起见，自然会将存放于黑市的钱转入正规行庄。等到黑市大致消灭后，行庄的存息亦可逐步减低，达到战前的状态。至于工贷利率，仍暂以四五分为准。国家银行存在放款利率之差额，应由国库支拨。其实为减少发行起见，这样赔贴亦不是无利。因为其差额不过三四分，政府约二十个月将人民存款加一倍，其发行额却可减少了。

总之，我中国经济现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歧途。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拿出魄力，一扫过去支离破碎的事后补救，而追求全面的根本解决。最后我们必须认识，黄金和物价问题只是经济问题的一环。我们在企求解决物价和黄金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其他各种最有关系的因素。财政赤字和游资问题，实是今后经济稳定的最大症结。但游资和赤字问题又和国内政治密切联系。任何片面的解决，都不能发生真正的效用。所以和平与行政效率的提高，还是政治与经济改革方案的两大基础要素。

经济正义与社会安全

郑林庄

在一百五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人人可以看得出来，经济不公和社会不安是它的两大病症。自从一九二九年发生世界经济大恐慌以后，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普遍地受到打击，到处都闹着“物价暴跌，生产停顿，失业日众，民生益困”的病象。当时唯一一个未受影响的国家，只有一个立国不久而实行社会主义的苏联。那里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享受，虽然还有许多地方，仍然赶不上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她们的人民大体都能安居乐业，而社会秩序也能相当安定。在这种对照之下，一般人就开始去思索问题的所在，一方面去探究资本主义的症结，一方面又去研究社会主义进步和安定的原因。经过这一番研讨之后，他们发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不仅在机构上和组织上有着表面的区别，而且在精神上更有基本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虽有经济的自由，却无经济的正义；而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则正因为有了经济正义，才能让社会安定。

所谓经济正义，实在含有两点内容：其一是工作权（即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的保证，其二是生存权（即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权利）的保证。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必须有一个生产不断扩充而分配相当合理的社会机构。这些条件只有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里才能具备。至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除非把自由企业的原则加以变更，否则是不易实现的。不过自由企业乃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自由企业的精神受到了限制，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就有了改变。于是如何一面维持自由企业的制度，而一面又复能实现经济正义以促进社会的安全，使变成资本主义的兴衰存亡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真不知费了多少经济学者的心血。自从凯恩斯指出欲避免经济萧条必须维持充分的就业数量之后，“充分就业”一词就变成一般社会改造家的口头禅，同时也变成许多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所追求的目标。到了第二次大战时，这更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维持战后繁荣的中心政策。美前总统罗斯福氏，于其一九四三年一月致国会的咨文里，即曾提到：“当战事结束我们的战士复员之后，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邻居，不但需要一个永久的和平，而且也需要一个稳定的职业。”他这一番话，实则指着应在战后维持充分就业的水准而言。在英国，也有类似的主张。在一九四一年，工党就曾主张对其国家的生产贸易和投资加以控制，以便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繁荣的达到。不只官方有这样的主张，就是企业界也做如此的看法，至于学术界则呼号尤烈。一九四二年五月，英国商会联合会在一本《战后工业建设报告书》里说：“维持联合帝国人民的充分就业，实是世界复兴的基本因素。”美国的商业巨擘福特氏也说：“在战后的世界里，我们应为越来越多的人口获得充分就业，因是而使他们能够大量地购买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感吃力。多少年来，我都在提醒工业界的人士……我们的市场是由工资造成的——这是一件不易让人了解的事实。”诸如此类的说法，真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这□□，都表示充分就业是挽救资本主义厄运的灵符。如果不使资本主义在这次战后再蹈第一次大战以后的覆辙，充分就业的理想是必须实现的。

就目前所知，达到充分就业的方法很多，我不想在这里讨论。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依然保持自由企业制度的社会里，不论维持充分就业的方案是怎样的周密，经济循环的病态恐怕不是可以完全消灭的。有见及此，于是又有人提出另一种看法，那就是社会安全的计划。说到社会安全，当以比维里治（Beveridge）的社会安全计划为圭臬。他指出失业固为社会罪恶的渊藪，但疾病残弱与老年亦足使生产资源不得充分的利用。因是他把战前英国所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加以扩充，成为一个更周密更完整的社会安全计划。关于比维里治计划的内容，我也不想在这里叙述，但要说明的是，经过这次大战之后，社会安全也变成大家追寻的理想之一，而社会安全计划的推行亦有助于充分就业的维持。根据前一点来说，我们不妨把社会安全当做一种人民的权利。这是一种免于因老年、匮乏、孤寡、疾病、失业与伤残而生之恐惧的

权利。根据后一点来说，则社会安全实是达到充分就业之过程中的一种预防治疗，因为只有像社会安全计划规定的那样，使各家在生活不足或发生意外时，仍能自公共机关领取津贴，社会上的购买力才不致低落，产业界对劳力的需求才不致下降，而充分就业的水准才可以长远维持。

充分就业的维持固然可使工作权得到保证，社会安全计划的推行固然可使这种保证维系不坠，但未必一定能保障这个社会人人都有合理的生活。因是又有人提出保障最低生活程度的理想。如果人人都有最低生活程度的保障，则前面所说的生存权就有了保证。按照这一理想，凡有工作意志的人，不论其能否工作，都应有最低的收入，使他将享适当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和生息待养的生活，惟其目的较之充分就业与社会安全的要求更为基本，更为重大。用英国经济学家格罗索尔（Geoffrey Growther）的话来说，最低生活程度的要求实应称之为“人民的宪章”。正如政治给予人民各种人权的保障，一个经济民主也应该给予人民一种合理生活的保障。在经济的民主里，一个人应该得到充足的食料来维持健康，得到最低限度的衣、住、燃料来保持温暖，得到充分与平等的教育机会来发展自己，得到休息与享受的便利，得到避免因失业、疾病和老年而引起的危险的保护，而最重要的，更不能让他因为生儿育女而沦于穷困悲苦，做父母的既不以子女为累赘，做子女的也不必受无理的虐待。这一切实是一个现代公民所应有的基本权利。照这样说起来，如果这一理想得以实现，不但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可诅咒的名词，即这一个时代也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代盛世了。

充分就业、社会安全和最低生活程度这三个理想，虽在战前早就有人提到，但却是大战方酣的五十年代的开端才有热烈的讨论和严密的思考。那时一切关于战后重建的计划，简直没有一个不以此为讨论的中心，人人都希望在战事结束之后，可以实现这些理想，以增进人类的幸福。现在距战争正式告终已一年有余，虽然美国在去年通过了一条充分就业的法案，而英国也在逐步把比维里治的计划付诸实行，但去当时的理想实还很远。所以我们能否终于实现这些理想，实有待于这一时代的人们来努力。不过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要实现这些理想须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就一个国家来说，它至少要有一个能够处处为人民打算的政府和一个不为特殊权势谋利益的计划。尽管资本主义的国家是怎样不甘于让自由企业的精神受挫折，可是要实现上述这些

理想，政府的协助和干涉是终难避免的。再从国际的关系来说，在现在一个痛痒相关唇齿相依的世界里，如果没有国际间的密切合作，共同来开发世界的资源，让各国的生产可以彼此交换而无阻，这些理想也是不易实现的。但是我们环顾今日的国际形势，我们实不能免于若干惶惑之感。至于讲到我们自己，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经过极度的战争苦难的国家，可是现在不但毫无建设改进的希望，甚且大家还在朝着破坏与崩溃的边缘赛跑。是则在战后其他国家所露的一丝曙光，反而变成我们心向往之的美景。我们相信，经济正义和社会安全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潮。同时我们更相信，凡是赶不上潮流的，终必被时代所淘汰。试翻阅一下古今的历史，似乎还没有一个民族能逃得掉这一个社会发展的铁则！

现代经济思潮的趋势

吴元黎

充分就业与社会安全

——一九三零年以后，——以德奥为开始的经济不景气，波及英美，遍及全球。它在各地为害的程度容有差异，但失业的众多，以及工商业的衰颓，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皆属不可抹煞的事实。许多经济学者在这期间，目睹商业循环对社会秩序和生活水准的影响，乃竞求解释工商业带有规律性的盛衰的理论，俾作将来的对策。英美两国，工商业既极发达，对制止商业不振的防范方法与救济措施，自然特感兴趣。英美经济思想，素有渊源，所以贡献甚多，对于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因亦特大。综观各种庞杂交错的发展，有两点可以特别注意：

第一：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在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在充分就业的暗含假定下），是有储蓄而后可以有投资；新兴的凯恩斯学派则谓在任何一个期间投资与储蓄数量必定相等。若计划中的储蓄总额有超过投资总额的趋势，其结果必致经济活动减低而产生失业。反之，若能提高投资率，经济活动即可增加，失业者亦可复业，国民所得上涨之后，储蓄总额亦相偕增加，卒与投资总额相等。在商业循环中，工商业的衰落即由于投资率的过低。因此若能对一个长时期中的投资率预为设计，辅以国家公用建设（Public works），定能避免大量的失业。美国故罗斯福总统所创的“新政”（New Deal），其一部分理论根据即近乎此。所谓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亦即以此成为各国政党、舆论以及当局注视的中心。

第二：充分就业虽为最理想的状态，但短期失业仍为在无论何种经济制度之下所不能免者。而且失业之外，尚有其他情形足使当事人感受痛苦或危害及其生活；疾病、高年、伤害、产儿等皆与失业有类似的影响，而后者在失业者众多时有益形尖锐化的趋势。如何建树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安全制度，使之与充分就业政策互相配合，因此在最近十几年中成为经济学者中的一个主要研究标的。尤其英国，在二十世纪初叶，即已有各种社会保险的设施，此次战争期间，复以民众的要求，识者的呼吁，工党的积极鼓吹，而长足进步。贝维瑞吉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哄动一时的社会保险计划，便是这方面发展的结晶，而较之更形完善的社会安全法案，现在亦已在工党执政之下经由议会通过。

充分就业与社会安全，不但现在已为英国长期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同时在美国民主党执政之下，亦是联邦政府所积极注意的事情。虽然这两个目标之如何实现，以及其已实现的程度与已采取的步骤，在英美欧陆和其他国家，参差不同，但二者对于经济思潮趋势之形成，影响之深远广阔，已不容置疑。经济思想与经济体制是有密切关系的，后者更有决定人民一般生活方式的影响。即就我国而言，目前经济的混乱和衰颓，一旦整理有了眉目之后，将来仍不免要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加以注视。所以我们应首将充分就业和社会安全这两个观念的含义，分析清楚。

自由式社会中“平等”观念之意义

充分就业与社会安全，在经济发展已臻登峰造极的英美——所以能够成为经济政策的目标和经济思想的中心，其近因已如上节；此外，还有一个潜伏不易查觉的远因，成为产生此种经济思想的条件。

兹以英国为例。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但亦是民主政治实行完善的国家。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初期，人民最主要的要求是政治自由。政治自由的含义甚广，其中包括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虽然起初要求这种权利的时候，不一定有任何普遍性的经济动机，然而在权利已取得，运用上已有若干经验之后，万一有普遍在经济紊乱或衰颓发生，试问一般受苦痛的人民是否会咬紧牙根，一语不发？在民主政体之下，亦可称为“自由式的社会”，每一个选民有一张选票，每一张选票有一分力量和作用。在点票数（亦即所谓点人

头 Counting heads) 的观念下, 人与人在政治上的平等, 便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原则。从政治平等进而经济平等, 犹如五十步至百步; 在一般人心目中, 是没有任何性质上的改变的, 只是一个发展的程度问题。但是在一个政治平等的社会里, 人们势不能坐视多数人因生活的压迫而不能实际享受其应有的权利。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经济思潮趋势中“充分就业”和“社会安全”二者与“平等”观念的联带关系。充分就业和社会安全的综合观念是经济稳定 (Economic stability)。经济稳定之成为最新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鹄的, 其在这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 影响殊大。但是经济稳定观念之基本原因是“平等”; 后者复为自由式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产品。

但是经济稳定, 在现代经济组织之中, 既非个人单独所能达到, 便不得不采取集体式行动。于是个人经济环境, 生活之有无保障, 过去本在个人的责任和劳力范围之内, 而现在竟成为国家功能的一部分, 政府是国家行政的机构。因为上述人民思想的发展, 配合上客观的需要, 于是一方面责任加多, 另一方面权力亦同时增长。过去所谓“无治即系善政”或“无为为治” (Good government is least government) 的观念, 乃从此打消。产生于“平等”观念的思想, 竟引起增强政府力量的需要, 表面上虽似牵强附会, 实际上乃系极逻辑的发展, 这又是自由式社会的一个特征, 在一定情形之下, 也可能影响到这类社会本身存在。

经济稳定与经济“平等”

如何达到经济稳定这个目的,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 不限于在已定的社会制度下, 采取种种最适当的方法, 而牵涉及经济制度本身的改革。凯恩斯学派将投资对经济活跃水准影响的重要性提高后, 有人便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能维持长期充分就业的能力, 发生怀疑。美经济学家汉森氏 (Hansen) 甚至于凯恩斯本人, 即有所谓“投资机会消灭” (Vanish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y) 的学说, 认为投资机会逐渐减少, 私人投资将因无利可求, 而陷于长期的不振。在长期经济停滞 (Economic stagnation) 的情况之上, 国家投资必须逐步增加, 终且取私人投资而代之。换句话说, 资本主义社会日趋末路, 是不可挽回的定数。

上述理论，逻辑与事实两方面，究竟成立与否，不能在此处讨论；它不过是一种预测。此外还有与“平等”观念关系更密切直接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应当继续存在。这自然是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在最近的西欧，英国，甚至于美国，从之者为数甚多。他们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社会亦即自由式经济制度，虽然标榜自由，但是实际上经济极不平等，所谓自由乃少数人之自由。在自由经济制度之下，欲求充分就业与社会安全，无异舍本逐末，因为根本的弊病是资本社会中的求利动机（Profit motive）。唯一的挽救办法，亦只有废除这个自私的动机，而代以中央设计制度，以集体的力量来建树经济上的平等；后者即时下所称的“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至于中央设计制度，对于生产效能之增进，事实上有何影响，则认为其结果必定圆满，不必置疑。更有指苏联之五年计划为明例者，认为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防力量充实之表现，足资证明计划经济之成功。至于在经济平等之下，尚能保存生产者及消费者，自由与否，和若经济自由不能存在，政治民主是否能单独发扬，这些在上述一般人眼光中，都认为次要。因为他们的立场是“经济民主”第一。

由“平等”观念产生的充分就业和社会安全两个目标，引导出自由式社会的改革问题。因为失业须要防范，于是中央设计制度乃发生极大之号召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再加上社会主义的理论，自由式社会的存在价值，便发生了动摇，“平等”有取“自由”而代之的趋势。

新自由主义

美故罗斯福总统首将“免于匮乏之自由”（Freedom from want）列为人类四大自由之一，其对平等之基本观念，于斯可见。罗氏的意见亦可以代表其他人的意见。然而他们绝不愿意在“平等”的旗帜之下，消灭了几十百年中争取的自由。他们认为“经济民主”不是真的民主。

罗氏曾说过“竞争式的经济体系（The competitive economy 即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失败，实在是还没有认真地开始。”这句话可以代表反对社会主义与反对中央设计制度一般人的态度。英名经济学家海约克氏（Hayek）的主张，即可为例。

造成经济自由者的态度，现在已非十九世纪的放任主义。亚当·斯密的

“暗中驭御”（the invisible hand）亦已被“有意识的设计”（Conscious control）和“经济法治”（Rule of law）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依据这类意见，虽有改革的需要，但既无自动没落的必然趋势，也不可率意取消。因为唯有在自由式经济制度之下，才可以保全政治自由；而政治上人权的保障，乃人类精神生存之寄托。否则生不如死，只顾目前饭碗，不计自由，人类尊严势必全失。

自然，“竞争式社会”必须保持竞争，才可以达到目的。所以生产垄断与其他方式的经济势力集中（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必需在法治轮廓之中，妥为防范与抑制。大规模失业和生活威胁，亦必须设法避免；经济上之不平等，亦应逐渐使之减少。但是，无论如何，社会组织的目的是自由；自由的两大部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又是不能分离的。至于达到经济上完全平等，乃根本不可能。反之，亦惟有减少不平等，自由式的基础才能巩固。

上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对于近年来经济学者对充分就业和社会安全之着重，有过犹不及之感。盖经济稳定仅为应采取的目标之一，“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的重要性则更大。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波动乃所不免。尽量减低波动，或缓和其不良影响为一事，维持已得现状，又属一事。

所谓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与英国工党已行的政策，极其相近。但是与其说它是一种变态的社会主义，毋宁说它是改善了的新资本主义，因为它建基于根深蒂固的私产制度上，以私产及合法之自由支配为政治及经济自由之最后保障。它复承袭西欧自由思想与人文主义的精神。至于英国工党在其传统之政治民主体系中，是否会始终采取折衷缓进的方式，抑或因不能放弃主义立场，终趋极端，则为本文中所不能详细讨论者。

“极端”与“中庸”

上节中所谓新自由主义不主张放任一切，听其自然，也许会使读者误会。因为主张全部放任的人不是没有，尤其在战后的美国，共和党卷土重来，已在国会中拥有多数。他们提倡自由，暗含放纵之意。这样的主张，与以“平等”为号召的“经济民主”论，各趋极端；万一得势，必定会形成

对立的局面。

放纵主义，流弊丛生，反对自由式社会者对资本主义之攻讦，若以放纵主义为鹄的，其言而当者甚多。然而以“平等”为前题者，则未免有将“平等”看得过于机械化之嫌。试问“经济平等”是每人所得相等，还是同等工作，同样报酬？是机会均等呢？还是“平头”呢？在民主政体之下，以自由讨论与协议而产生政策，试问哪一种“经济平等”的定义，在加以严格解释与充分明了其含义之后，能为大多数人自愿接受？反之，要铲除不平等，抵制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以及诱导均富的设施，这是大多数人所能赞同的。

一个社会组织的中心目标，必须能为多数人所接受，也必须能容少数异议的存在。所谓“agree to differ”乃演进的条件。因此，经济自由与经济进步，应当作为经济制度的组成原则，经济平等或减少不平等，则可视作一种必须的方法，借以维持制度本身的稳定。若将方法目的倒置，或将方法认作目的之一，那就有两面脱落的危险。

在决定我国经济制度之前，上述各种问题，似甚可予以缜密之考虑。在二大极端与“中庸”三条路线中，我们必须选择一条。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拉斯基教授（Laski）的一句话：“不明确选择一条路，也是一种选择。”

中国当前的经济祸患应由既得利益阶级负责

杨西孟

中国经济演变到今天的地步，不管在言词上绕什么弯子，在措施上变什么戏法，都是无益的。中国人必须正视当前经济的现实，不容躲避。

当前我国经济已走到什么一个地步呢？简单一句话是：经济的若干方面已在崩溃中，并且还在加速的进展着。这可从下列几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通货膨胀已深入崩溃期，接近于货币的最后崩溃。我国通货膨胀，从抗战算起，约有十年历史。在这十年的进程中，通货膨胀的初期在抗战方为时约两年半，以后自廿九年起便进入通货膨胀的后期，其中主要特征之一为物价上涨率超过通货增加率。在后期中，又有显著的几个分段。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约自卅年起，我国货币进入崩溃期，也就是说，卅年以后，后方人民对法币逐渐失去信仰，大家快快用出纸币并且尽量避免使用纸币；此时以后，钞票流通的表面数额尽管加大，其实在价值却是缩小，接近于一个最低限度。卅二年起，后方货币崩溃的各种现象更为加剧，而且市场利率跳涨起来追逐物价上涨率，这表示离货币的最后崩溃不远了。

幸而胜利来临，解救了当时后方货币和经济的危局。胜利后，后方物价曾反跌一下，随后略又回涨并再保持大体平稳或微涨，为时共约一年又一月，算是得到了一段喘息时间。在收复区，胜利后物价水准，以法币计，甚为低下，接着便猛涨起来，很快便与内地物价水准略近平齐。

在去年，沿海城市物价上涨还不算太剧（例如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在去年十二月不过为前年十二月的四倍半）。但是约从去年十月以来，内地的

物价跟着沿海都市上涨起来，成了战后全国性物价上涨的开始。内地既曾到过货币崩溃的后段，而沿海各地在沦陷期间亦曾经过更剧烈的通货膨胀，所以约自去年十月以来，可说是经过战后一段休息和调整期间之后，全国接演胜利前货币崩溃的后段。今年物价的两度暴涨，以及暴涨中市场的混乱情形等，主要是货币深入崩溃期的表现。特别是购买者急求以纸币换实物，而出售者拒卖，是表现人们对纸币的信任益加丧失。此外，有许多交易是以外币或实物计算，而外币流通的禁止近亦形同取消；甚至政府财政的收支亦早有一部分用实物，而发行债券亦以美金作标准。这些都表示大家对法币的信任已丧失殆尽。

现在发钞仍在大量的进行着，那末，货币最后崩溃是不会太远了。

第二，我国财政现亦入危险的崩溃境地。这可由下列几点看出：

(a) 财政上的主要办法既为发钞，到了货币深入崩溃期的今天，愈发钞则发钞所得的实值愈小，结果财政支出的实值将大为缩小。

(b) 凡征收货币的租税，在货币深入崩溃期后，所得的实值亦将缩小。这也使财政支出的实值缩小。

(c) 经过十年的通货膨胀，社会财富发生重分配，一方面中下阶层已经穷苦不堪，而他方面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它掌握权势，控制国家财政经济。这样，贫穷的中上阶层是再负担不起国家财政的重负，而特殊和富裕阶级是握有权势，能拒绝对国家财政作负担。那末，国家财政还有谁负担呢？

(d) 过去把大量的外汇和黄金浪费虚掷——以极度廉价的方式大部转移到特殊和富裕阶级手里——到现在，外汇准备快耗光了，而国外贷款却不易得，于是对外支付和物资输入发生问题。这对于国家财政与国民经济再加上一层压力。

由以上几点看来，当前财政到了什么境地，是很显然的。

第三，就物资的情形来说，今年恐怕是抗战以来最严重的一年。这是根据于下列几项事实：

首先，在抗战八年中，我国若干地区的农村和沿海的工业受到甚大的破坏。据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初步估计的数字，抗战中我国直接损失即达三百余亿美元之巨（东北各省及共军占领区的损失尚未计算在内），其中农业、工

业、交通的有形资本的破坏必占甚大的数字。胜利后虽经善后救济的帮助和敌伪资产的补偿，但对整个的损失和破坏显然相距甚远。也就是说，我国战前的生产力远未恢复。

其次，由于通货膨胀及管制失当对价格关系的扰乱，由于财富集中少数人之手而一般贫穷，由于政府压低外汇与大量外货的倾销，由于豪门巨室垄断若干行业，我国民族工业，以工厂关闭的数目计，去年已崩溃四分之三以上。甚至由敌伪接收过来的工矿等事业（例如在东北方面），亦受战争、财政、通货膨胀、缺乏计划等影响，多任其停顿与败坏。

其次，交通的破坏、梗阻，及运输工具的不能多供民用，也很妨碍生产及物资的有效利用。此外，长江以南若干省区的盗匪猖獗，对于当前国民经济的影响亦不小。

复次，今年天时恐将给我们以甚大的旱灾。例如“绥远数月未曾落雨，麦苗多已枯萎，灾象已成”（见五月廿六日北平《平明日报》）。又据报载，河北省主席与临参会议长日前（五月廿七日）至函行总工作视察团，有云：“河北省境自入春以来，数月缺雨，麦收无望，秋苗亦未能及时播种，目前全省旱象已成，粮源奇缺，粮价飞涨，人心恐慌，达于极点，……省政府现在控制五十八个县市，平均每县市二十万人，在本身秋收以前，五个月间，其中非救不活者，即以七成估计，至少当有八百一十二万人。”这些是何等惊心的景象！

再次，过去国家大量的外汇既已浪掷殆尽，出口业和侨汇亦因压低外汇率而受到甚大的打击，并且大量国外贷款和援助亦不易再得，所以从国外运入物资也不能太存奢望。

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继续进行。兵争的地区必然是惨遭破坏（尤惨的事，是兵争地区也正是旱灾地带）。就是远离兵争的各省，亦将因战争对国力的重大消耗，而负担痛切的剥取和扰害。庐舍为墟，一片荒凉的惨象，在华北若干战场已经实现了。就在远离战区的省份和若干大城市中，亦眼见许多人活不下去。饥饿、疾病、自杀、犯罪、铤而走险……已经是随处可见。若战争、灾荒以及社会经济其他方面再恶化下去，中国将成何种景象！

★ ★ ★ ★

以上是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当前经济的实况和可能的更加恶化。现在我们从另一观点——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当前经济。

试把抗战以来，约十年间，我国财政经济上的实际措施胪列起来，切实考察一番，看看各色各样的措施，有哪一样不是维护富裕和特殊阶级的利益的？财政上的负担，不管是发行国币公债，外币公债；不管是征收间接税，直接税，或田赋征实；不管是直接发钞或变相发钞；不管是对人民的有形征取，或无形征取，法以内的征取，或法以外的剥削；也不管是负担上的归着或转嫁——有哪一样不是实际上维护一个特殊和富裕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其他阶层的？再从外汇和黄金的运用来说，在一贯的低廉价格之下，已经把巨额的外汇准备耗费光了，结果是若干特殊人物的国外资产大为增涨。再看通货膨胀下低利的贷款，实际上肥了什么样的人？物价管制和取缔囤积居奇，何曾摸动过真有势力的人？许多的管制和禁令，实际上哪一样不成了特殊人物的上下其手的机会或攫取暴利的手段？多次的重大案件，一时虽亦表示要惩治大贪污，但哪一次打着过大虎？更特别的，若干拥有雄厚势力企业，实质上说不清是国营或民营，而是特殊人物控制下的特种经营。这一切，就阶级利益看，是很一致的，也很鲜明的。

实际的措施之外，还有一些口头上和措施上的敷衍、支吾和幻术。例如动用国人外币资产，几年以来，始终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样子，实际没有动得分毫。又如举办财产税，也仅于应付某种会议时提出来表示有了办法，事后便摆在一边，遇有质询时再找些话来搪塞便罢了。至于措施上假名变质的办法则颇能迷惑一般的人。例如今年发行短期库券与美金公债，既订明可作抵押和保证准备金，则结果很容易转变为法币和信用的膨胀。像抗战初期的国币公债转变为通货膨胀一样。这即是说，这样发行公债和库券以收缩通货，是虚幻的，实际上还是通货膨胀。又如出卖国有资产，由国家银行承购，而发行大量通货，表面上是财政上有了出卖资产的大额收入，而实际上仅是国家的资产由政府的这本账转到那本账，归终还是增发通货。这些敷衍和戏法，是做场面，实际对既得利益阶级是不侵动丝毫的。

特殊阶级的利益梗阻着国家财政经济的改革，这已为国人逐渐认识。现在引最近参政会中对财政的一些坦率的质询，以见一斑。“今日我国之官僚

资本家，即法国革命前夕之贵族政府。应以强制手段让孔宋二家拿出钱来，解救国家之危机。”“财产税未举办之原因，恐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阶级利益关系。”“建议由监察院组财政金融积案清查委员，调查孔宋豪门资本活动情形。”“当局曾有令，调查孔宋所办之中孚扬子公司情形，调查结果如何？又在限制进口办法公布后，中孚公司尚购进吉普车千辆及冰箱无线电器材等无算，其外汇何来？”“不举办财产税是向豪门资本投降。”以上各项质询和抨击，系根据五月廿四日上海《大公报》所载前一日参政会中余楠秋、伍纯武、王孟邻、黄宇人、张潜华诸位参政员的言词和主张。

不过这些抨击仍然不会发生实效；特殊阶级凭借其权势仍然是强横，紧紧的扼着国家财政经济的命脉。

这个特殊阶级的权势既如此强大，它已使中国社会的结构成一畸形，而且一切制度都要以这一阶级的利益为中心而加以解释与运用。例如在抗战期中，由于富裕阶级不负担战费所引起的高度通货膨胀，曾经陷我国于危险的境地，当时几位朋友和笔者曾联名发表文字，主张拟定富户名单向富户强迫借款并举办财产税；其时政府方面不肯接受，而且由负责管制物价的最高机构——国家总动员会议——的代理秘书长发表声明（见卅三年五月廿一日重庆《大公报》），认为我们的主张不合“民主精神”。再看今年五月廿三日现在财政当局答参政会的质询时说的“民主时代，财部无权自由征税，有钱者之头上无字，财部不能任意向人要钱，不出钱者不能拘捕。”（见五月廿四日北平《世界日报》）。这里又提出“民主”来。原来“民主”是作如此解释，如此运用的。那末，何不明令公布民主二字的定义，定为：凡合于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的事情就是民主，否则为不民主？不然，大量发钞便是一种苛烈的征税手段，财部何以又有权无限制的使用？岂不是因为这一个手段是伤害中下阶层（特别是薪饷收入者），而于特殊阶级有利无害吗？至于乡村农民和小本经营者所负担的苛捐杂税，摊派剥削，压榨他们到生存线下，他们头上何尝有字，何以向他们要钱、要物、甚至要命，都做到了呢？对他们就不谈民主了吗？民主二字如此，其他如“国营”，“民营”，“民生”，……等等名词又何尝不是做类似的解释和运用呢？

这个既得利益阶级对于国家财政经济的控制，是很显然的；他们的贪婪与残忍，比之兵祸和天灾，是具有同样的真实性的。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必

须正视这一个大现实，不容躲避。

在前面第一段中，我们从整个国家的观点，指陈当前我国经济在若干方面已在崩溃的阶段中。就中如通货膨胀已深入崩溃期，财政亦入危险的崩溃境地，而物资的情形是抗战以来从未有的严重情形。若任当前情形继续恶化下去，将有千百万人活不下去了！

在前面第二段中，我们从阶级利益的观点，指明既得利益阶级控制着国家的财政经济，他们的贪婪与残忍，比之兵祸与天灾，具有同样的真实性。

从这两个观点所见到的经济现实，好像是两种现象，但实际上两者有大部分是相结合的。例如政府财政之走到今日的危险境地，主要原因是富裕阶级不负担政府的费用和贪官污吏的中饱营私。又通货膨胀之深入崩溃期，主要也是由于自抗战以来富有阶级不负担战费和政费所引起。再国家外汇的虚掷浪费，民族工业的倒闭，以及由于通货膨胀和财富集中等所引致的种种社会经济不良现象，也直接或间接大部应归咎于既得利益阶级的作祟。就是今日国内的分裂和战争，从经济的观点看，也可说是既得利益阶级的无限贪婪有密切的关系。试观今日的世界，有哪一个国家不为贫苦大众谋福利，让大家能活下去？而且各种程度的社会主义正在这个世界（特别在欧洲）抬头和实施。独有在贫穷的中国，竟让少数人积聚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而绝大多数的人沦为赤贫。在这样的国度里，从何保持统一与和平？

既得利益阶级对于当前中国的祸患，是要负很大部分的责任的。只有抗战所给予中国经济的伤害和天时给予农村的灾荒，可说与既得利益阶级无关。但是那个阶级的自私，既陷抗战时的中国于危境，则抗战中直接或间接的损害也就因此而超过其应有的地步。并且那一阶级既套取大量国家的外汇，则因缺乏外汇而难以向国外购买大量粮食与其他必需物资，势必使救荒，救穷，以及恢复生产等事发生困难。这样说来，既得利益阶级，对于中国经济的各种祸患与困难，几乎无一处能完全脱掉干系。

打破既得利益阶级对国家财政经济的控制，没收贪官污吏的财产，并重征富裕阶级的租税，便可以停止通货膨胀，挽救财政，平稳物价，并转变人心。这样可使救灾与实现国内和平较为容易。若能先实现和平，再谋经济的改革，亦是一途，但恐不很切实。至若一任事态的流变，让经济继续败坏下

去，则将有千百万的人民（特别在华北）活不下去，而且国家的元气还要大伤，贻后代以莫大的负担。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必须拿出勇气，正视当前险恶的经济现实，图一番割治（对既得利益），消弭（对国内战争），和补养（对灾荒及经济上的各种伤害）。

六月四日于北平

论中国土地改革

施若霖

一 中国要工业化先要解决土地问题

封建的土地制度如不能改革，中国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一定的社会阶段的生产关系是应该适应其某一种生产力的。这一种生产力不断地发展的结果，它会和这生产关系不相调和而引起冲突，必然要求解脱后者底束缚而起改变作用。

我们要建立一个民族资本的工业社会，必须将原来的落后封建社会底束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加以扬弃。我们应该理会工业社会的生产力是机械工业，它否定了过去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手工业资本。它底生产是大量的商品，这里必须具备着足以消纳的广大市场。因而构成广大市场的广大农民，他们底商品购买力自非提高不可。如果这些农民仍旧为超经济的剥削所束缚而不足以自存——他们无法去解除封建土地关系，则工业商品运输关系因无购买力之故也无由确立，虽然有着良好的新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因这个落后的社会制度的阻碍，而无法运用。

其次，工业化的生产，需要巨量的品质统一的原料，和农民可以自由选择其农作对象，以适应市场。这就是一个土地制度的问题，它必须适应于生产大量品质一致的原料以满足工业饱和的要求，而现实的土地制度便是不能如此自由提供的。

这现象的存在，其咎实应归之中国的小农经济制度，每家农户的耕地面积，抗战前平均不过零点二五公顷，农场的条块划分，不啻于欧洲的中古条

土制度，战后的情形则更为惨然。另外，地权的急剧地集中于地主，自耕农大量丧失着耕地，更使土地问题愈趋严重。

复次，工业化需要资本集中，足供有强大的生产资本的累积，过去即使现在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地租的超经济的掠夺，只造成了农村经济闲歇期的崩溃，谈不到什么工业化的资金。在官僚买办的政策中，只有单独借外债发洋财的一个手面，以为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发展工业的其他途径。

我们承认傅斯年的呼吁，如：“某某等官僚资本，以每一家族单位底财产而论，已足够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年的舒适生活而有余”等的说法，这些官僚底财富单位都是以美金计算的，他们只投资于南美橡胶园咖啡园豫备作下野度其寓公的张本；即使他们可能纯以民族资本的姿态出现着，家社会的财富只集中于二三个豪门大家庭，这样的寡头资本政治是否于老百姓有利？何况他们这些豪门都是民族资本家底死冤家；近顷输入管委会对于本年第二季输入限额的公布，依然扼压着工业界生存的咽喉，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就是小小的例子。

事实上是：这几年来，欢迎外资、外国原料而引起的不良成果，只促使中国陷入真正殖民地的道路；而我们所要建立的工业经济，是独立的民族经济，绝对不是殖民地经济。不论某一个国家愿意大量投资，我们也不能无条件全数地接受，因而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贻祸于中华子孙。政府抗战八年的人力和经费，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农村，在今日，我们如要提供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来源，也非自广大的农村不可，非自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同胞不可。

在这里，我们决不是依然运用封建的佃租关系来剥削榨取农民，我们的要求，必须是合理的——那是根本的适应时代洪流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封建社会跃入到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一个唯一的大前提，舍此而凭空大谈其改善土壤，消灭害虫，改良种籽等等，实无异于隔靴搔痒，舍本逐末。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已达二十个年代，他们两党关于土地问题的斗争，迄今已到达非常尖锐的阶段。诚然，大部的农民利益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在这广大的农村的杀伐的战场中，他们也无非要获得广大农民的同情和拥护。

在这里，谁最能彻底实行土地改革，便是谁最能获得广大农民的同情和拥护，而因之获得在农村中的战斗胜利。我们很中立而无庸讳言地说，中共

在逐步的土地改革上，是相当坚强了他们底经济和军事基础的，在激烈的内战炮火下，中共能够与国民政府分庭相抗，未尝不是农村人民之力。他们为了最后胜利，实践了土地改革。国民党则为了他们一部分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对于土地改革总是因循姑息，迟迟其行。

土地改革实在是彼此竞争的目标，内战的双方胜败实系于此。广大农民的利益，无疑地必由农民群来做取舍的选择；在此千钧一发时期，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已在呼喊着“实行土地改革之时机业已来临”了。政府长此拖战下去，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军事上既无绝对把握，经济上政治上几乎已节节败退下来，弄得千疮百孔，民怨沸腾，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争民主”即使在都市中已有燎原之势，更已博得了市民层甚至上层分子的同情，这种崩溃的危机将是一触即发，当局决不能剜肉补疮或徒事高压便可以安度难关，除非他们根本改变了一成不易的官僚买办政策。

作为一个外国的中间人物弥却尔·林德赛所作刊于美国基督教的刊物《基督教与危难》上的《中国问题能解决吗》一文，有着这样一节：

“中国共产党自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是具有恒心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信只有等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化社会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这一时期的来临，至少要再过几十年的发展，而且在这发展过程中，自由企业该发生重要作用。在目前的经济政纲中，共产党比官派国民党政策所给予自由企业活动的范围更为宽广，使有效的合作成为可能的；另一因素是在大部分的中共政策中能觅到的反官僚主义的倾向。……中共在接近政治组织这一点上总是从底层开始的——建立起群众的组织，建立起选举出来的村议会和县政府，用村自卫队（它保证了地方权力的真正转移）来代替了昔日的警察和宪兵，以及其他措施……这种通过群众组织和地方人民控制的方法是很有效的。革新的措施真正地被实行了，政府是忠诚的，而且就中国水准来说，是很有效率的，农民中政治觉醒心也很快地成长了……国民党官方的政策，原则上也承认地方自治政府、土地改革等等，但是他们以行政统一性和执行法律等等作进行这些改革的先决条件。就某一限度说，也可认为是一种保护既得利益的说明。……”

林氏语重心长，倒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宜为一些勇于内战者来“攻我之错”的。

二 中国土地应该怎样改革

中国的土地改革，实在是一个悠长而艰苦的行程，我们体味所谓土地改革，好像必须连带所谓激烈的革命方式；然而依据客观的现实，不论共产党也罢，国民党也罢，中国的土地改革，确实已严肃地放在现实之前必须予以迅速解决，再也不能因循姑息，拖泥带水的了；否则，将必是拖带到一条历史的灭亡的泥涂之中去，要是某一个当局昧于理智不敢正视的话。

我们承认，对于这个中国土地问题，不是一蹴而几便可迎刃而解的。它也不纯然是个武力革命问题，也不是一种强暴专制所可屈服，最后，也不纯是一个被作为党争消长的悬的（在农民本身利益上讲，这是必然的历史课题）；而是关系于整个中国之命运的一个大大的问题。

中国土地应该怎样来改革呢？笔者以为必须按照下列几个步骤做去，才能有效；一个力求生存发扬光大的政党统治团体，当了困难的面，决不能畏葸逃避故意歪曲而自以为得计的。

（一）火速停止这个消解国力的内战；政治力求民主，打倒一切的改革障碍——日前抢救教育危机的各地学潮已澎湃澎湃，如火如荼，他们已喊出了国人的要求，免于恐惧，饥饿，不虞匮乏，反内战，真民主。这种垂亡的呐喊必然跟着政府危机的深刻化而更广大普遍；这运动的引长必然会引起了抢救经济危机，抢救职工危机，抢救企业家危机，抢救一切的中国危机，……更泛滥的抢救运动，使全国民众团结了起来向着一个目标前进。那时候的政府怎么办？还不是乘早来个釜底抽薪，迎接了老百姓的要求的好：“和平”！简单得很！应该剩余些力量来和异党作着政策上的竞争才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和平之后，才是国民抗战八年后真正的安定养息，一切田赋征实，征借，抽丁，拉夫，苛捐杂税，通货膨胀，经济危机，才能统统解除消灭；起码条件所谓安居乐业才能在农村和都市中实现。否则随便怎样的政府改组，锦囊妙计，都是不可靠的扬汤止沸，饮鸩止渴。凯末尔是一代英雄，与他底民众毕竟呼吸相通，订定国民约章，驱逐他们的敌人于小亚细亚之外。他固然获得友邦的帮助，但他终是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领袖，领导土耳

其走向复兴的大道。他懂得自己国家是一座国际和平的桥梁，而不是双方杀伐的堡垒。在内战及将来的国际战中重重牺牲，他便熄灭战火提倡文教，使土耳其大放灿烂之光。

我们中国当然不一定要效颦这属于历史范畴的土耳其革命，但反观自己连加拿大甚至战败后的日本都万分不及，他们对于基本的土地政策倒已比较满意的解决了；二次大战后的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他们这些小国家的本来社会经济与中国很多相似，迩来都已普遍实施土地改革。我们不可以学学他们吗？还是得让别人家强迫改革着？

（二）先要建立最合理的中国农村佃租关系——第一步就要真正的减租减息。封建的地租是一种超经济的剥削，投资土地的利润，超过了正常的工商业的收获，商业资本只与高利贷结合，这是国家的致命伤，只有在封建社会及殖民地社会才有此现象。农民在高利贷与高地租高农料的压迫下，甚至无法维持农家必须的最低生活；即使有一些剩余的农产品流入市场，也只得被中间的商业经营者以低价垄断收买了去，农民实在无法进一步来享受工业市场的工业制成品。所以不得不实行减租减息来保障农民，使其生活合理化，以求繁荣社会。所谓二五减租只是一个现实的初步要求。（政府的“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有过去欠租一律不得追偿，今后租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的条文，但看实现了没有？土地一待收复，地主们都追随在军队之后重新播下阶级仇恨的种子，各地区的报章通讯可以复按；而且这些命令只公布于所谓绥靖区，难道还是收复后的绥靖应付的权宜之计吗？）

同时，进一步必须使劳苦功高的农民生活趋于安定，应将“永佃权”予以确定和限制；同时，还要强制固定地租率使之不得任意加租；由此可让佃农安心于制作，埋头改良佃耕，与土地打成一片。（绥靖区中地主往往没收佃农的佃权，甚至侵占他们一部分所有的自耕地。）

（三）施行耕者有其田的彻底改革——要解决土地问题，最彻底的办法，只有将土地重新分配与直接耕种者；减租减息不过是权宜之计，耕者有其田才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不仅仅属于扶植自耕农的范畴，它应该超越了这种范畴的单纯的意义，即凡是自己不耕而保有领得耕地“永业权”的自耕农，也在禁止之例；自耕农拥有广大的耕地，从事工业化的生产，那只蹈入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覆辙，因此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否

定了自耕农个体的扩大，对于美国农业资本制度有很严厉的指责。

这种土地改革的理想，实在是实行经济民主的基本条件，它把封建的超经济剥削所依附的基础整个地推翻了。

地主阶级所有权的基石是年代悠远而不易动摇，要实行这个方策，当局必须运用极度坚强的手腕与缜密的步骤来处置。二次战后，欧洲较落后的一些国家，甚至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已有许多土地改革方法可资借镜。

（四）改革农业经营方式，建立农业产销合作制度趋向集体化——由于土地所有的集中和土地使用的分割，这种封建土地形态，造成了小农经营生产方式的悲剧；它限制了农业技术的革新，不能从事于机械化的集体农业，走向工业化生产和再生产的道路。这劳动力过度的疲乏的运用，使之十分黏着于一定的土地上，只便于封建地租超经济的剥削，而形成了高额的地租；正因为如此的生产关系，就限制了生产力的进展，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程。现实的要求是：只有用集体的农业工业化经营方式代替小农经营，生产才趋于合理化，封建的土地形态才由此而解体。在这里，更要进一步地从事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改进，对于地大物博的垦荒问题应予研究解决。

至于确立农业产销合作制度，这是由个体农业经济趋向集体农场生产的桥梁，使保守的耕地工作者团结一致，有组织地从事于生产与消费合作，基于自发自动的要求，一切的农业技术改进都有把握，理想计划易于实施，农业的生产方式一切趋向合理化；在过渡中可避免生产的盲目、不规则、市场垄断和再生产资本不够累积、运输不便利等等的弊病。这里要注意的是乡村自治机构的推动助力和本身的健全，合作农场组织力和教育工作的普遍，也是重要的一环，要这一环能够坚固，才不致为土豪劣绅与中间商所假借和再行得势。

（五）实施平均地权的极致——土地公有——所谓平均地权，就是凡是人民都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权利；大地上的利益，人人都可凭借他底劳力而得均沾收益，这是中山先生底土地政策的精华，（耕者有其田也属于这个范畴）而出之以和平的手段假之以一定的期限，蔚为大成的。

至于由此进一步的要求，则为土地公有。它是一切土地政策的极致，也是中山主义的远大目标，它同时必须以土地公营作为内容，配合着中国的政治条件和技术形态才有实现的可能。在这里，必须顾到公共的利益和农业工

作者对于土地耕种利益的热心。

政府在这场合，一方面把土地公营事业尽力发开，另一方面则须由国家土地金融机构尽力统制自耕农集体农场，领导着走向合作经营的道路上去；这种集体农场，正是一个土地公有的桥梁，保持了自耕农不致闹成耕者有其田与一切公有的冲突的苦闷。

另一方面，必须由上而下地防制官僚机关的形成，免得一般土劣官僚假公济私，创造出新的特殊阶级来。

上面所叙述的关于土地改革的一些设施，实在并不是一种空中楼阁的理想，它应该是个历史的必然的课题；假使在现实的环境里还是一种奢望的话，那末这个现实倒是一个悲剧。

卅六年五月廿四日

论经济与政治——对于目前几种经济急救方案的一点批评之一

陈振汉

近来许多经济学者为挽救目前的经济危机，曾先后提出了不少方案。就比较为一般人所注意的来说，计有举办物价指数公债，发行临时性货币，征收财产税以及输入国外粮食等办法。这些方案的内容各异，但有一共同的特点：即是都不涉及政治。换言之，每一方案的拟议者大概都以为在政局如旧，内战持续的情形下，他的方案，即使不能立刻平衡财政收支，复兴生产事业，也至少能使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速度减低，使整个经济局面逐渐趋于稳定。

但现在一般人的观念是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不能离开政治以求解决。因此这种企图避开政治，专就经济以言经济的态度，往往受人非议；而我们现在要适切的认识与批评这些方案，也就不但应着眼于它们的内容，实须对它们所取的政治态度，首先予以注意。

从有些方面来看，经济学者讳言政治，只就经济以言经济，实有他们的正当理由。这些理由可以归纳为下列三点：第一是他们厌恶政治，因此不愿对目前政局表示意见；他们也不属于任何党派，因此只愿作一个中立性的专家或技术人员，可为任何当政者所驱策。第二，社会现象本极错综复杂，个人才智学识有限，要想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只能各从自己的专门范围入手。第三，在社会现象之中，经济现象比较最有独立特殊的规律，也最需要合乎规律的政策方案。

这些理由之中，第一第二两点一方面代表目前这些经济学者的社会责任观念，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分工的必要。第三点是对于各种社会现象与其相互

关系的认识。先就一二两点来说，如果这只是表示他们自己的立身行动态度，则各人应有自由，我们诚不能赞一词。但如果认为这是今日有专门训练的人所应同具的态度，则我们实不敢苟同。我们认为普遍的社会分工与专家不过问政治的风气，在承平时代，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组织下——社会分子具有相当共同的信守，立于相当稳定的社会关系，政府能够代表并且有效的实现人民共同利益——有其可能也有其好处。在这种情形下，专门人才可以依据共同接受的目标或政府的指示就他的专门范围拟具某一部门的方案，然后交与政府抉择配合，淘芜取精。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专家始可以不必耗精力于目标的选择，始可以集中精力于专门方案的制作，整个社会也能收集思广益分工合作的效果。

但在我们现在这种狂风暴雨时代，整个世界在新旧潮流的冲突之中，旧的社会理想与社会关系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而新的秩序与理想复未建立，我们失去了共同的信守，没有确定具体的全民福利观念，我们失去了大家依傍的社会关系，没有一个得全民拥戴，能代表全民福利的政党或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任何部门的专门人才，实在需要先行决定目标或大前提，然后才能就自己的小范围拟订改革方案，否则，他所拟成的所谓方案，实将等于无的放矢。用比较具体的事例来说：现在全国人民所最迫切希望的是和平与安定，或者我们可以说，获致和平是今日的国是，然而国内的两大政党却正进行着空前猛烈的内战，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不惜一切总动员以“戡乱”，要用武力用战争来导致祥和，另一方面共产党也在不惜一切用“清算”“斗争”来实现与保卫“民主”。尽管双方所标榜的最终目标仍是全民“福利”，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福利，供鹰啄犬噬的福利，显然不是人民所仰望的。谁也知道目前的党争内战，泰半是以人民福利为代价，以国家财富资源作牺牲的权利、私仇与宿冤之争，不是多数人民所需要与拥护的对外抗战。所以在中国今日，既不像在正统经济学发达与成长时期的英国十九世纪，在国泰民安歌舞升平之中，一切经济讨论的目标，当然的，无待述说的，是人民福利，也不像在近两次的世界大战之中，全国全世界都沉浸在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战争之中，一切人力物力也可以毫无疑问的动员作战制胜上去。我们的经济学者，似不能不在拟议方案之前，预为考虑他的方案到底为的是什么或为的是谁——人民福利呢，还是军事需要呢？全体人民呢，还是

某一集团呢？如果为人民福利，在烽火燎天总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以戡乱的局面下，还有多少余地，可供以增加人民福利为目的的方案运用？如果是为战争需要，又是谁愿意内战，战事能否速决，以战能止战吗？

其次，如果没有一个为全民拥戴的政治组织，能从全民福利着眼来选择配合各种专门方案，而只有割据一方的战时政体，各种专家如果只是客观的（实际是盲目的）自由的（听命运摆布或依据他们自己一时的高兴）参加不同的阵营，根据每一阵营的目标拟出不同的方案，再如果每一行的专家的本领不相上下，则很可想象，从全民的立场来说，这些方案在实行时是否正好彼此冲突，实行以后的实际效果恰好互相抵消而等于零？也就是说，对于老百姓，这些方案的纯效果，只是延长战争时间，扩大战争规模，增加他们的苦痛与牺牲？

在中国现在，政治既然还不是一般老百姓的，而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所谓专家既是知识分子，那么现在这种社会动乱国势飘摇的时代，对于他们，特别是学社会科学的人，似乎还不是可以高踞于象牙之塔，只以“专家”的姿态出现的时候。

现在更就上述第三点理由来说，经济学者在分析问题考虑对策的时候，为方便计，不妨把社会因素分为经济的与非经济的，各别的予以处理。实际上，社会现象本身自然是整个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经济演变本身虽循一定规律，但并不受外力干涉，亦并非与其他因素绝缘。一种经济改革方案，在拟议者虽不希望涉及政治军事，在一经实施之后，其影响纵有大小不同，但决非及身而止，而必逐渐蔓延渗透及于社会全体。上述这些经济方案，除非预先承认只是一种思考上的游戏，当然希望即付实施，而且行之有效：所以任何人为某一方面献替一种策略，至少他自己应认为必将有利于此一方面的战局，或能延续此一方面的政治生命，然而这岂不是等于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的中立与超然地位吗？

所以归结起来，从这些经济专家的政治态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他们不是没有认识在现在的中国，作一社会的有识分子要比作一专家来得重要，便是有意无意自欺欺人的在偏袒一方。

论征用豪门富室在外国的资产及征用的技术问题

韩德培

毫无疑问的，我们的政府现在是在闹穷。八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紧接着又是空前惨烈的“戡乱”战争。国家的财源既日形枯竭，于是政府的财政也就渐渐走近罗掘俱穷的地步。现在政府汲汲于乞援美国，希望美国快快给我们若干借款，原自有其苦衷。这次魏德迈将军来华考察，所到之处，政府的重要人员那样地侍候唯谨，奉若神明，也就是看在“钱”的情分。虽然魏氏临行时曾将政府奚落了一番，但政府还是力图辩解自饰，以待好音。其实政府如要从开源方面解决当前的闹穷问题，纵不乞援美国，也并非全无办法。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便是征用豪门富室在外国的资产。

报载全国经济委员会顷已决定征课一种所谓“建国特捐”。这虽不失为办法之一，但截至笔者执笔时为止，据报纸所透露的简单消息看来，这种特捐似乎并不“特”到怎样了不起的程度；而且征课对象，还仅仅以自然人为限，而不及“法人”（例如公司），似乎又是故意开了一个“特”大的后门。这种特捐，对于所谓“豪门资本”，将不致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影响，实在不足以满足今日国民的普遍要求。而以目前府库之空虚，国用之浩繁，单靠征课一点特捐，也恐怕不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据八月二十三日合众社电，魏德迈将军曾在蒋主席官邸的一次茶会上表示说：中国私人在美国的资产总额，达美金十五亿元之巨。这是仅指在美国一国的中国私人财产而言。若将在其他外国的中国私人财产合并计算，其总额当还不止此数。这些资产中的绝大部分，必为豪门富室所有，殆可断言。记得傅孟真先生曾经说过：如将豪门资产没收充分，足敷稳定民国三十七年

全国金融之用。这决非夸大其词。如果政府认真从这一笔巨大的资产上痛下决心，依照本文后面所建议的方式予以征用，其所得必大有可观，当属无疑，尚何须向外国求援，仰人家鼻息，看人家颜色？

近年舆论界对豪门资本的作恶多端，已开始作公开的抨击，而在国民党的中全会，国民参政会，立法院院会，以及最近全国经济委员会所主持的座谈会中，也曾先后有人提出对付豪门资本尤其在国外的豪门资本的种种办法。然而，政府对于此点，至今尚未拿出任何切实有力的措施。是政府没有决心？还是技术上尚待研究？

政府如征用豪门富室在外国的资产，自然是一件轰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大事。要做这样一件大事，就非具有极大的决心不可。根据以下的种种理由，笔者觉得政府应该具有这个决心：（一）过去我们总惯说：中国人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在过去，这可说是事实。然而经过这八年的抗战和战后继续的混乱与不安，现在的中国人，已不再是大贫与小贫，而却已形成豪富与赤贫的鲜明对照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现象，但却也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抗战前的大学教授们，可说属于社会的中上阶层，而现在却是：“食难充饥，衣不蔽体。本身营养不足，妻儿啼饥号寒。”（北大清华教职员最近对教部朱部长之沉痛表示，见八月廿五日上海《大公报》社评）大学教授们的生活是如此，其他比这些教授们的生活更苦更惨的人，在全国尚不知有多少。这些人现在对国家所能奉献的，就只剩有“营养不足”或瘦骨嶙峋的一条老命了；至于说到对国家经济财政上的负担，他们自然无能为力了。政府既需财孔亟，尤其需要大量外汇，难道不应当专从那些在外国有资产的豪门富室身上去打主意？（二）现在政府所实行的粮食“征实”和“征借”办法，完全是以农民为对象，要农民来负担，以“征实”与“征借”合并来说，他们在一年之内，便应出两年的负担。以稻谷计算，他们今后一年之内应缴解的食粮，约八千万担，约占预计中今年全国秋季稻谷产量的百分之八强。再加上地方的征派，官吏的盘剥，及公粮在缴解过程中的种种损耗和用费，农民的真实负担，事实上总不致低于全国稻谷产量的百分之十二（参阅八月廿一日上海《大公报》社评）。在农村普遍凋敝的今日，这是一副多么沉重的负担！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在外国有资产的豪门富室，究竟负担了一些什么？为什么不应当强迫他们多多负担，而偏在贫苦无告呻吟待毙的农民

身上抽筋括血？再说这年头，通货继续膨胀，各种各样的“物”也都在继续涨价，唯有这“万物之灵”的“人”，却不但不会涨价，而且还在天天贬值。靠薪水维生的公教人员，眼看着每月薪水所能购买的“物”一天天在减少，而无可如何。毋怪北大教授周炳琳先生最近在招待朱部长的茶会上很愤慨地说：现在“戡乱”戡到我们身上来了。在今日的“戡乱”政策之下，“物”的涨价，“人”的贬值，就是无形中加重了一般国民尤其薪水阶级对国家的负担。但是那些豪门富室却有他们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国外资产听其调度，为其生利，供其挥霍。他们对国家的负担又在那里？为什么不可以特别加重他们的负担，而却让他们逍遥自在，享受国家特殊的优待？（三）抗战八年中，多少善良的老百姓，死亡的死亡，失踪的失踪，纵然侥幸未死，也都妻儿离散，田园残破，衣服用物几乎典卖精光；抗战结束后，由于国家多故，疮痍遍地，大都仍是孑然一身，别无长物，靠着自己的血汗，辛勤劳作，艰苦度日。但是请问有几家豪门富室受过这同样的灾害？抗战中不但受害最少以至绝无、而且还乘机大发国难财的，还不是那些神通广大的豪门富室？试看抗战后举国上下，除了他们以外，有几个人能操纵金融，左右物价，并曾在不久的过去，一度掀风作浪，使全国国民的生活都受到极度剧烈的震动？所以过去的抗战，可以说对于这些豪门富室，最为有利。今日的“戡乱”，也不妨作如是观。将来“戡”胜了，照样还是他们最占便宜。现在全国的一般老百姓，在征兵征粮之下，连他们仅有的一点人力和物力都要供奉出来，为什么不可以由政府把这些豪门富室在外国的资产拿出，以济国用？（四）这些豪门富室的资产，可说都是来路不正，或来路不明。中国尚非一个工业国家，新式工业，寥落可怜。这些资产，有多少不是他们利用特殊的权势，从巧取豪夺或贪赃枉法中来？我们如将他们历年的正常收入计算一下，他们的资产总一定有限，决不会有如现在引起中外注目之巨大数字。他们现既拥有如许资产，这就足够证明它的来路大有疑问，大不光明，用不着另举什么证据。如要一定举证，这个举证的责任应该由他们负起，就是由他们负责证明他们现有的巨额资产是从合法正当的收入积聚而来。假如他们举不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则政府征用他们的这些非分之财，岂得谓为过分？（五）从前军阀括地皮，括来括去，他们所括的民脂民膏，都还是放在国内，决不送到国外，所以还可算是中国人自家的东西，转来转去，老

百姓还多少可沾点油水。现在这班豪门富室精明厉害多了。全国老百姓的脂膏，被他们少数人括去以后，就一古脑儿换成外汇，送往国外，托庇于洋人的治下，倚仗着洋人的保护。不但中国的老百姓沾不到一点油水，就是中国政府也属无权控制，奈他不得。像这样将全国的大量财富窃为己有，再私行运送国外，使国家丧失了一大宗可以运用的资产，简直可视为一种叛国行为。政府如对此等资产予以征用，谁曰不宜？从以上诸种理由看来，假如今天我们能举行一个真正可靠的民意测验，恐怕不赞成征用豪门富室在国外的资产的人，为数决不会很多。政府如果不是一个专为维护豪门富室的利益而存在的政府，实在无须有所顾忌，而应拿出最大的决心，对豪门富室在国外的资产首先予以征用。

有了上述的决心，才应讨论到征用的技术问题。关于本文所说的征用资产，有几点必须先行略加解释。（一）所谓征用是指由政府征发自用，并无补偿。如将它和“征兵”“征粮”相提并论，大可简捷称之为“征资”或“征财”。（二）征用的对象，自以国内一般公认的豪门富室为限，但决不仅限于自然人。凡豪门富室以法人或其他团体的名义享有某种资产者，亦一律包括在内。（三）征用的对象，决不限于现金或存款，他如股票、公债股或其他有价证券、房屋、土地、林矿等等一切可以变为资金的动产及不动产，也都包括在内。（四）征用的标准，如依美金计算，可即以五千元为征用的起点。五千元以下者，免于征用。超过五千元者，第一个五千元（免征之五千元除外不算）或不足五千元者，征用其百分之五十；第二个五千元或者不足五千元者，征用其百分之六十；第三个五千元或不足五千元者，征用其百分之七十。如此依次递增，从第六个五千元或不足五千元者向后计算，就都是征用百分之一百了。因此每人的资产，无论多至若干，经征用后所剩余的最高额，便决不会超过一万二千五百元。这一万二千五百元是“酌留家属生活必需费”之意。

要征用豪门富室在外国的资产，在技术方面，可能采取的方式约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当事人自愿的方式，就是由豪门富室将他们在国外的资产总额，自动坦白地向政府申报，并听由政府加以征用。但是，谁敢相信，并担保他们能这样慷慨？这种方式，不啻与虎谋皮，事实上决难奏效。所以这种方

式，殊不足取。

第二是外交的方式，就是由我国政府请求外国政府协助，将豪门富室在该国的资产，代为征取，再转移给我国政府。假如这在事实上可以做到，定可省却不少的麻烦。无如在事实上，这却是万难做到的。一般人都明白，我国豪门富室的资产，现在多系集中于美国一国。而美国这个国家，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又极为周密。美国联邦宪法修正部分第五条和第十四条，都曾以明文规定：任何人的财产非“依法”即依所谓 *due process of law*（此词含义甚广，照美国法院的解释，不仅指正当的法律程序问题而言，且兼及正当的法律内容或实体问题，故勉强笼统地译为“依法”）不得加以剥夺。假设美国政府徇中国政府之请，贸然做去，美国政府的行为，便足以构成违法行为。不但有关系的美国国民，可向美国法院起诉控告，就是有切身利害的中国豪门富室，也同样可向美国法院起诉控告，受法律上与美国国民相同的保障。因此我们可以推想，美国政府决不致接受中国政府的这种请求。所以这种方式也不足取。

第三是司法的方式。这又可再分为两种方式来说：一种方式是由政府以追索应纳的税捐为理由，把豪门富室当被告，去向美国法院起诉。然依美国法院的判例，这种涉及执行外国即中国征税法律问题的案件，它们是不予受理的。所以这第一种方式是行不通的。另一种方式是由政府先依司法程序从国内法院取得一个判决，然后再持此判决请美国法院予以执行。但美国法院也可能根据种种理由而予以拒绝。它们可以说这是涉及执行中国即中国征税法律问题的判决，所以不予执行。它们也可以说中国政府征用资产的这种办法，是违背美国法院所在地的所谓公共秩序（*Public policy*），所以不予执行。它们甚至还可根据美国法院对管辖权（*jurisdiction*）的观念，说中国法院无管辖权，而不予执行。所以这第二种方式，也是很难行通的。可见这种司法方式，也不合宜。

第四是政府强制的方式。上面所举的三种方式，或须赖豪门富室当事人的自愿，或须赖外国政府或法院的协助，都属难于采用，已如上述。至于这第四种方式，却主要有赖于中国政府自己行使其强制的力量。这种方式着重于以下几点：（一）首先由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协商冻结国人在外国的一切资金，并宣告冻结之日起，他们所有关于在外国资产的一切权利转让行为，

须经中国政府核准，始生效力，如此庶可防止豪门富室的资产发生隐匿或逃避情事。(二) 迅速开始调查国人在外国的资产实况，而对于豪门富室用别名或他人名义所存的存款及购置的产业，尤须特别严密查察；并须用重金悬赏的方法，奖励中外人士的告密。(三) 公布调查所知的豪门富室的姓名及其在外国的资产数额，限期命其依征用标准如数缴纳；允许其在规定时期内提供真实可靠的反证，以证明其资产的来源为合法与正当。(四) 严禁上述的豪门富室当事人出国，必要时得加以看管。其已出国者，须限期令其回国。如无正当理由而逾期不回者，即吊销其出国护照，或于可能情形之下，委托外国政府遣送回国。凡可能为其财产继续人之亲属，亦同；因恐万一当事人死亡，其继承人仍可能在国外依外国国际私法上之规定，而安然享有其继承之财产。(五) 凡抗命不于规定期限内，依政府所定的征用标准，缴纳其应缴纳之资产数额者，以严刑处罚，并得处以极刑。如此始足以儆戒其余，而使其闻风就范。

这最后一种方式的主要特点，便在将豪门富室的当事人，严禁于国境之内，再用政府的强制力量，逼迫他不得不把他在外国的资产自行拿出，听受政府的征用。傅孟真先生论及他所痛恨的豪门富室时，曾主张“摒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对于傅先生嫉恶如仇态度，笔者是十分赞赏的，但对于这种迹近“放生”的办法，却不敢附和。这第四种方式，是一种以人为质的方式，实施起来，较诸其他三种方式，应该易于生效。

政府目前似乎尚无征用豪门富室在外国的资产的决心。笔者无已，倒颇属望于今年年底的国民大会。这一个代表国民的伟大集会，如果真为国民和国家的前途着想，除了通过宪法而外，有两件最大的事极值得努力去做：一是迅速地切实设法免致全国的和平，二便是坚决地主张征用豪门富室在外国的资产，并严密地监督其实施。假如这两件事能因此一并实现，则征用所得的这笔巨资，可以不致再送入枪膛炮口里去，而可用诸经济及文化事业的积极建设方面，那就是我们国民和国家的无上幸运了。

(八月卅日)

中国经济问题

赵迺抃讲 扬子记投

编者按：这篇稿子是北大一位同学投来的，是北大经济系主任赵迺抃先生讲演的记录。编者曾将此文送请赵先生过目，赵先生复信说：“大体正确，惟数字稍有小异”。赵先生因系他人文字，未允作任何修改。（编者）

“中国经济问题”，这个题目很大，也最为人关心，很多人要我谈，但我得先声明，所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问题，研究起来，有几个困难。第一，不能十分正确：因为社会现象无法实验，也无法有适当的数字，可以衡量。第二，社会各方面的现象是变动不息的。书本上的理论与事实不会太相符因为理论是静态的，而应用起来，却是动态的。第三，我们去研究的人，本身是在社会中的一分子，研究社会诸问题时，不免有偏见。难得客观。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可分为四点来解释。

（甲）中国经济的病态

第一，半殖民地的经济，战前不必说，东北是日俄的侵略范围，华北是日本的，华中是英美的，华南是英法的，那时候中国是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外国资金的投资市场，战后不平等条约虽经取消，但是很多地方还要求人家帮助，因此处处受限制，仍是半殖民地的经济。第二，地不大物不博，以前人们以为中国地大物博，其实，地虽大，可耕种的却不多。譬如英国平均用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的土地是二亩半，美国是四亩半，而我们中国只有一亩或半亩。至于物，也不博，工业化中所需的基本原料很缺乏。第三，脑

充血的经济：今日中国财富分配不均，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战前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显明，八年抗战的结果，豪门与官僚资本操纵了一切。大多数人贫苦，财富集中少数人手上，因此说是脑充血的经济，脑充血是要致人中风半身不遂的。第四，显微镜的经济：只看到近处，而没有远大规模的企业组织。第五，部落思想、藩镇割据、区域观念的经济：各省之间互相限制，有多余粮食的省份不肯把粮食运去接济缺粮的省份，区域互相隔绝，使全面经济政策无法推行。

（乙）中国经济建设的远景

先谈（一）理论方面：我可以先用两句成语来说明，那便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经济建设应该远大，我盼望能做到三点。第一，点的建设：那便是航空建设的发达。昆明与沈阳之间，一飞即至，可以联系得很紧。第二，线的建设：如铁路线两旁的建设，譬如平津铁路沿线各地可以联系好。第三，面的建设：如水利，电气工程的成功，惠及好多省，譬如长江水利计划，如果成功利益可及十多省。综合这三点，将来经济建设的远景应是很美的。其次可以用另外两句成语，来说明经济建设的理想那便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经济计划应为子孙后世着想，要使将来的国民工资所得，依他们的劳力和贡献而有合理的分配、各种生产应有平均的发展，生产要素需按需要平均发展。个人所得平均了，生产建设也平均发展了。我们的子孙才能有饭吃有衣穿。（二）经济建设的政策：我们应采资本主义呢？还是社会主义呢？不可讳言的，资本主义已过时了，社会主义正在抬头。然而二者中间的界限很不容易分。今日纯资本主义国家很少，英美制度中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苏联制度中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英国有位大经济学家说：“在资本主义的大海中，可以看见社会主义的小岛；在社会主义的大陆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湖泊。”我常爱说笑话，我说资本主义是白色的，社会主义是红色的，而事实上现世界是粉红色的，是桃红色的。

（丙）中国经济近景

第一，物价上涨：军事政治，社会人心都很受物价的影响，一般人重物质不重精神。物价上涨，原因很多。如交通不便、生产不够、奸商操纵等，

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通货膨胀。战前法币发行数为十四亿元。胜利后，三十四年据我估计是一万亿元，三十五年十二月时，估计为四万亿。今年，经过二月间的金潮后，四月时的估计为七万亿。现在，卅六年十二月，估计法币发行额已超过十万亿。通货膨胀，购买力就小了。说到通货膨胀，可分几个阶段：（一）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这时候法币发行额多，而物价涨得少，因那时生产力尚未十分破坏，法币流通率平稳，大家还愿意让法币在家里停留一些日子。（二）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生产力被破坏得很大，人民对法币信心渐小，法币流通率大，物价上涨率赶上了，而且超过了法币的发行量。（三）胜利初期，三十四年九月至十二月，后方城市如昆明重庆的人们对国家建国前途具有希望，因此物价下落了，落到仅为战前物价的二千倍。那时上海一带的“收复区”中物价本来只到战前的三百倍，但因法币与伪币的比率订错了，订成了二百与一之比，因此，三个月中，上海物价上涨到一千三百倍，此后又普遍涨到八千倍。三十六年二月金潮后，物价上涨到三万倍，十一月时，上海物价已涨到十二万倍。物价上涨就是法币贬值。最初法币发行量比物价上涨数大，现在物价抢了先，目今钞票增加为一万倍，物价的上涨则为十万倍。人人对法币没有了信心，因此非改革币制不可。有人认为非先使财政平衡，不能改革币制，有人认为须□国借款成功，有了大批基金才能改革币制，我认为平衡财政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内战不会停，而美援仍迟迟不来，美国的态度也没有决定。然而改革币制与预算平衡成了恶性循环，总得打破一个才行。我以为改革币制，主要的应先改变人民的心理，人民对将来，对国家，对政府没有信心，币制是无法改革的。外国朋友常说：“美国与加拿大节衣缩食送来中国的救济物资，老百姓得不到，太不公平。而且中国的豪门巨富有一大笔钱存在南美，为什么要盼美援？”抗战以来，黄金六万两，外汇九亿元，都浪费在宋子文手上。现在应该改用金本位了，但仍用法币，以黄金作基金。每月新币的发行应该严格管制，决定发行数的机构应该有政府特权阶级以外的人士参加，而且发行新币的数量应该公开，币制问题解决后，才能解决物价问题。第二，说到财政平衡：历来政府所公布的预算都成了具文，总是不够得很多，而后追加若干，因此讲到财政平衡，我们应注意两点：一为数量问题，一为实在价值问题。这两件事是应该分开看的。二十六七年时，预算的数字增加，实在价值也同时增加，因为那

时法币的购买力还大。到二十八年以后，数量增加，实在价值反而减小了，预算中的绝对数增加，相对价值减小。三十五年，据政府宣布，支出为九万亿，收入只有七万亿，差额二万亿，这从那里去弥补呢？其实这个数目字是不确实的，三十六年四月，紧急经济处置案中俞鸿钧部长再三说财政困难，八月，政府宣布三十六年将支出二十万亿，最近报上说三十七年的预算为九十万亿。按政府的办法是下一年预算以前年决算的一倍为准，因此，等于政府在宣布三十六年已用去四十五万亿元。由此可知，我们的预算不平衡得厉害。其次，预算太不民主，支出方面，钱用在老百姓身上的太少，据政府宣布的预算看，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的支出，不过百分之二十。收入方面也不民主。有钱者不出钱，无钱者多出钱。三十六年的收入据政府宣布，三万亿为税收，而间接税比直接多税了一倍。间接税是税收中最不好的。我们应该有革命的财政，打倒特权阶级利益，多从民众福利着想。在现在的情形下，我希望有两个预算，一个文预算，一个武预算。打仗的钱由豪门资本去担当，他们在南美的存款大概可以再支持两年。文的预算专为老百姓的福利着想，这些钱可以由老百姓担当。这样把打仗的预算与福利的预算分开，可以让老百姓吐一口气。其次政府应严惩贪污，今日有吏皆贪，无官不污，要多来几个武松，多打几只老虎，这对老百姓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影响。临时财产税也应多征，因为在道义上说，发国难财者应在今日国家危难时多出钱，从财政观点说，钱多者负担应重些。还有社会的理由，富人多出钱，老百姓的气可以因此平一平。我有个小小建议，现在要行宪了：我建议国大代表们在开会的那一天，全体捐出他们每个人的财产的一部来，这对人心会有很大很好的影响。

（丁）三十六年年终结账

最后，三十六年过去了，我们来为政府这一年的经济政策算算账。这是笔流水账：（一）黄金问题。无疑的，黄金政策是大大的失败了。宋子文的法宝是抛出黄金、美钞，取得外国物资，用来平抑物价。这个抛金引物的政策，结果是金尽而物不来，外汇率订得太低，黄金美钞都到了豪门资本手上。同时，所来的物品，都是奢侈品，民生日用品没有，黄金政策一失败，就掀起了二月间的滔天大金潮。（二）物价政策：限价政策的结果，是物价

越涨越厉害。(三) 外汇政策：二年来徘徊不定，首先采放任政策，后来放任政策不行了，又采管理政策，于是美钞兑换率由二千二百元到了一万二千元。八月后，更来一个市价，外汇定得离平价太远，故意想压低，于是逼出了黑市。其次，走私太厉害，香港成了大本营，走私与黑市无法取缔，外汇政策因此失败。(四) 贷款政策：工贷农贷用意原来很好，但是事实上普通农民借不到钱，仍须受层层剥削。工贷呢，普通人也借不到，借得到的是有特殊关系的人，他们拿了钱不去生产，反而到市场去囤积操纵，投机把持，因此贷款政策也失败了。(五) 贴补政策：用意本也很好，但是政府补贴不住，公用事业反而成了领导物价上涨的东西，而且补贴航空公司，这与多数老百姓福利没有好处。贴补政策也是失败的。(六) 节约政策：节约不是节约消费，而是节约浪费。老百姓的消费已很低了，地无法再节，要节约的是豪门巨富的浪费，而且政府自己浪费外汇太多，也该节约。但事实上没有做到，节约政策也失败了。

算完三十六年经济政策的流水账后，我们可以总结地说，经济要恢复，须政治上轨道，今日中国的经济成了政治的牺牲品。现在要行宪了，希望那“七分政治”好好的干，政治与经济是不可分的。政治没有经济便没有内容，经济没有政治是行不通的。

从“新经济学”谈到凯因斯和马克思

张培刚

最近十几年来，谈经济学的人，或讲经济政策的人，大都听说过凯因斯（J. M. Keynes）及凯因斯学派（The Keynesian School）。无疑的，在资本主义已发达到高级并且已经或快要走下坡路的国家，如英国、美国以及少数欧洲大陆的国家，凯因斯确是一位风头人物。不仅如此，在这些国家的眼观中，凯因斯爵士简直是一位济世良医，他的诊单和药方被有些人看作百宝丹，万应散。甚且在中国，即令病人是患的另一种病，也有人想把这位“神医”的药经整套搬过来。

平心而论，凯因斯在正统学派和新正统学派一脉相传的系统中，确实算得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与世长辞后，更被看作天才。他虽是一位经济学者，但对于哲学、数学的素养也很好；他的《或然率理论》，在数学界仍是一本标准以上的书。他不但是一位经济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实行家：他主管过剑桥大学的财务，非常成功；做过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开过农场。他当了很久的英国财部的顾问，对于英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贡献很大；建议并起草过“国际货币基金”及“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的组织，那时，他是英国的首席代表，后来被派作该两种组织的总裁，不幸两月后即因劳瘁而谢世。生前他酷嗜艺术，开了一个戏院；讨了一位“足趾舞”（Ballet）皇后做太太；当过英国全国艺术学会的主席。他不但长期的主编了闻名的《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而且还主编过《民族》（*The Nation*）及《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他的兴趣和活动可算是多方面的了。

本文所要介绍的《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一书，小标题为：凯因斯对于理论和政策的影响（*Keynes Influence on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是哈佛大学赫利斯（S. E. Harris）教授主编的，出版于一九四七年，出版者为 Alfred A. Knopf, New York。全书六百余页，虽然内容略嫌杂乱，但到现在为止，还要算是讨论凯因斯学说最完善的一本书。执笔者包括英、美及欧洲大陆的经济学者，从保守的执教于哈佛大学的哈伯勒教授（Haberler）到比较激进的马克思派的理论者史维慈（Paul Sweezy），还有博学多能的熊彼德教授（Schumpeter），荷兰独树一帜的丁伯根教授（Tinbergen）及所谓“美国凯因斯”的汉森教授（Hansen）。这些执笔者，有些是所谓死硬派的人，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凯因斯或任何人所倡导的缓性改革；有些是凯因斯学派的健将，把凯因斯的学说，发扬光大；有些是缓和的社会主义学者，所得到的结论，可谓和凯因斯“殊途同归”；有些是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学者，认为凯因斯的学说和政策，还不够彻底，也不能解决基本的经济问题。

在正统学派及新正统学派的眼光中，凯因斯直是一个叛徒。但是客观的讲起来，因为凯因斯是从新正统学派的气味中熏陶出来的，“孙悟空跳不出佛爷的巴掌心”，所以凯因斯到头仍跳不出修正性的缓和改革的圈子。凯因斯的学说，在有些地方，固然得自并近似马克思，但根本上两人分野很大，这里我们只想简单的谈一谈。

首先，我们要认清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方面的影响，恐怕没有任何经济学者比得上；更重要的，他的这种影响还在继续传布和发展之中。论及博学和素养，马克思不仅可以比美，甚且在有些方面还要胜过凯因斯。马克思对于哲学、数学、法律、历史各方面，造诣极深。其观察之深刻，叙述事实之锐利，有人说在正统学派里，只有李加图（Ricardo）可勉强相与比拟，至与凯因斯相较，则马克思关于历史方面的知识和看法，尤非凯因斯所能望其项背的了。

在分析方法上，凯因斯和马克思都采用所谓“整体分析法”（Aggregative Approach），即以经济社会现象的总体，作为分析的对象。但是凯因斯不着重“时间”的因素，而马克思的学说则以历史的发展为基础。

关于暴露资本主义的弱点，分析经济恐慌，以及反对传统的“珊依法则”（Say's Law），凯因斯和马克思很有点“异曲同工”。所谓珊依法则，是

正统学派整套理论结构的一个中心支柱。照这个法则的说法，“供给本身可制造需要”，因之社会上从来不会发生生产过剩，普通对于经济恐慌的忧虑乃是莫须有的。所以在正统学派的作品里，我们很少看到详尽讨论恐慌和失业的文字，因为他们大都假定着恐慌不会发生（即令偶而发生了，本诸“自动调节”的原则，过些时会恢复常态的），并且假定着充分就业的存在。他们的分析，在逻辑上是无隙可击的，只是作为分析支柱的假定却大有问题。马克思早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就很激烈的抨击过珊依法则。可是在正统学派的系统下，直到反叛的凯因斯出来，才算把这个法则根本推翻了。

凯因斯的学说，完全是对着经济衰落而发的，所以他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代表作《一般就业理论》一书，又被称为《衰落经济学》。凯因斯认为传统所假定的“充分就业”，只是许多可能情形中之一，所以在他的代表作里，他特别着重未达充分就业时的种种现象，分析不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状态。凯因斯受了瑞典学派的影响，把收入变动这个因素导入了他的分析里，并将货币变动和整个经济现象联系起来。他以“流动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解释利息，以“倍率”（Multiplier）测量总投资对于总所得的影响。他在政策上主张提高消费，扩大投资，增加收入。这些都是凯因斯学说的主干。

可是凯因斯的学说，如以《一般就业理论》为代表的话，亦大有其缺点和应用上的限制。他的整个分析没有渗进“时间”这个因素。他忽视了“生产技术”以及新的生产技术所引起的失业问题。他忽视了独占以及独占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他引进了“收入”这个因素，但忽视了社会分配制度以及分配制度对于收入、储蓄和投资等现象的限制。因为他的分析是“瞬息的”（Instantaneous），没有“时间”，所以不能用以解释长期的经济变动，不能用以解释经济的演进和发展，总之，凯因斯归根还是一个忠实的资本主义的信徒。只是他和旁的信徒不同：一来他不讳疾忌医，二来他一生是在苦心诣旨的要把这个病将不治的人医好。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根本上就是长期演进性的，他的《资本论》是一部资本主义长成、发展、衰退及转型的理论。马克思对于正统学派的学说也很有修养，他深知他们理论的破绽，以及其假定的牵强和不合于事实。就反抗死硬的正统学派而言，马克思和凯因斯是站在一条线上；但是对于资本主义

的前途和归宿，则两人的看法，根本异趣。凯因斯在《放任主义的末日》一书中，虽痛陈自由放任的流弊，但他归根究底，还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在《一般就业理论》中，他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弱点——经济恐慌，但是他还想用尽方法，把这些病象治好。马克思则不然。在他的分析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归结是必然崩溃的。他着重“时间”这个因素，也着重“生产技术”和“生产力”这个因素。独占在他的《资本论》中更有着重要的地位：劳工的剥削，不等价的交换，都是以生产工具的独占和市场的独占为其前题。不均等的收入分配和资本累积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市场的开发和争夺，直接关系着投资的出路，终极更关系着资本主义的存亡。这些方面，现在一天一天的在显露着资本主义的内在的矛盾。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些内在的矛盾，必将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灭亡。

最近有一位缓和的经济学者熊彼德氏，曾以“创新学说”（Theory of Innovation）见晓于世，亦谓资本主义制度将因创新机会日少（现已开端）而终趋灭亡。究竟如何，终有事实来作证明的一天；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物价狂涨！物价狂涨！

刘滌源

物价不断的狂烈上涨，而且速度在一天天加大，这已成了全国朝野焦虑的中心课题；这也就是士气不振，前线失利，小民生活困苦，后方扰攘不安的最基本的症结之所在。物价狂涨，前线士气低落，与整个后方的混乱，三者是互为因果，循环推演的。但笔者认为这一个循环圈中，物价波动不已实可视为原始的发动力；到了通货膨胀的后期，情形尤其如此。假若物价安定的话，则军事、政治、社会诸方面的下坡速度，绝不会如当今之大。当“政协”不绝如缕，和战问题有待最后决定时，好战的死硬军人，何尝曾梦想到今日这样残破不堪而且岌岌可危的情势。在当时，他们心目中只有军队和装备的数字，以此种数字去和对方相关的数字作单纯而机械的比较，而不考虑到其他有关政治、经济的基本问题，即造成了当今进退维谷的局面。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以物价不断上涨的扰乱作用为主干，更配合其他许多因素，使整个军事、政治、社会诸机构加速的自己趋于腐败。一个政权犹如一座建筑物：假如它的基础深厚，结构坚牢，则准能屹立不移，经得起风吹雨打；假如它原来的基础本就不够深厚，结构本就不够强固，今更自己和自己捣蛋，把基础挖坏，把结构弄得轻弛无比，到处脱节，则纵没有风雨的震撼，最后也会要自己趋于崩溃。一方面，自身加速的腐败而减少其抵抗力量，另一方面，相对的，使对方力量更容易增加与发展。所以，通货膨胀实不啻为一种慢性的自杀政策。

时间使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扰乱作用，和对其扰乱作用的程度，增加了认识。在抗战期中，尤其是抗战的前半期中，许多人都不曾意识到通货膨胀

对于国计民生的破坏力量。当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反对政府采通货膨胀政策以筹措战费，主张征收资本税，使有钱者出钱来支持抗战时，多少人曾嗤之以鼻，认定系马氏故意和政府为难；更有些人臆测马氏的动机在于对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之意气作用。时至今日，通货膨胀的弊害已路人皆知，不仅是过去为政府辩护通货膨胀政策的在野人士，已醒悟过来；即政府中人也再讳言通货膨胀的失策了。

自从通货膨胀的问题发展以来，国内朝野人士先后有各种富有趣味的议论，为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作辩护。概括起来，可将这些辩护状分四大类：

第一，根本否认有通货膨胀之存在。这是抗战最初二三年中的事。当时物价上涨极为温和，洋货涨价较多，国内产品的物价上涨的程度甚为微小。此时通货膨胀的现象不甚明显，有些经济学者即着重物资的供求关系，去解释当时的物价变动。马寅初先生反对通货膨胀时，政府只是“请”马氏赴外地“考察”经济，而对通货膨胀是否存在未曾作明白的答辩。在抗战初期的参政会中，许多参政员对通货膨胀提出质询，政府答辩时，每不承认有通货膨胀的事。到提出质问的参政员追问得无法再否认时，政府中人即以“通货膨胀增加容或有之，通货膨胀则未也”的官话来搪塞。这自然是企图以似是而非的诡辩方式，来逃避通货膨胀存在的证实。

第二，承认物价上涨主要由于通货膨胀所引起，但认定物价上涨之速度与程度并不大，因而认定通货膨胀对于国计民生并无多大的损害。这是抗战中期的事。这期中，通货膨胀的现象已非常明显，再也无法加以否认，但物价上涨尚相当温和，故有此种辩护论调之出现。此种辩护方法——低估通货膨胀之扰乱作用，又可分为两种：（一）认定通货膨胀所招致的物价上涨，对中国的农工大众没有损害，相反的，农工大众反得了些利益；并举四川乡下的农民及街上的车夫等比过去穿得好些吃得好些，来作通货膨胀可以改善劳苦大众生活的实证。他们认定通货膨胀仅足以影响公教人员的实际收入，使公教人员受了些损失。但是，这批人员吃些苦头，对国计、民生没有多大关系，理由是：一来公教人员过去的生活较劳苦大众者为佳，现在要他们吃些苦头，并非有失公平原则。二来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粮食、布匹和其他物质在手中，政府有力量来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三来这批人员的命运与现在政府之存续发了一种“不可分”的依存关系，政府倒了，对他们没有好

处；而且他们为文弱书生，“秀才造反，三日不成”，故这批人员不足以构成社会治安及政权稳固之威胁。四来这批人员的数目，在整个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并不算大，即使有什么异动，政府也有力量去镇压。这样推理之下，自然而然的得到结论，即通货膨胀并无多大弊害，反对通货膨胀者把它视同洪水猛兽，实不免有夸大狂的嫌疑。当时抱此种看法的人很多，低估通货膨胀对于公教人员之损害，所偏重的理由也殊不一致。（二）中国经济学会在北碚举行年会时，（大概是民国三十二年，我记不清楚了。）前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先生提出一篇关于通货膨胀的“论文”，在会场中宣读。叶氏早年也是学经济的，听说对 Cassel 及 Marshall 等的著作曾用过工夫。他以下列两个假定为出发点：（1）各物品的价格可以作同方向同速度的上涨，（2）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彼此均可与物价变动作同方向同速度的调整，于是演绎出一个口号式的结论：“你涨我也涨，要高大家高”。当时会场中发生激烈的辩论，马寅初氏亦在内，站在反对者的立场加以抨击。叶氏以“经济学者”的资格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时，采空中楼阁的幻想办法，作如此与经济现实完全相反的假定，实令人难解。时至今日，我们回味此一篇大作，仿佛如读童话故事然，犹有一种莫名其妙之感。

第三，承认通货膨胀之有害于国计民生，但认为政府所以出此一策，实由于不得已，可以加以原谅，此种为通货膨胀作辩护的论调，也可以分为两种理由：（一）由于我国太穷，物资不够丰富，而须支援全面抗战达八九年之久，故政府不得不采行通货膨胀政策。这种说法是以物资为论点的基础，因物资不够多，故流入通货膨胀一途。（二）认我国物资足够应付这次抗战，但因我国财政制度战前未上轨道，抗战时沦陷区域日广，政府收入日益减少，而开辟新税及发行公债又有困难，故政府只有采用通货膨胀政策，以图弥补。这种说法是以财政收支无法平衡为论点的基础。这两种说法直到现在还在流行着。不仅政府中如此说，即在野人士也有不少抱此种态度者。这两种说法，笔者均不能同意，尤其是前一种说法，实与事实不符。抗战是过去了，这长期抗战是由人力物力之支持而度过的。那么，足见人力物力是够的，足够支持这拖住日本而坚持到底的长期抗战。货币只是一种外幕（Veil），支持抗战的实为人与物力。战时政府因沦陷区之扩大，财政收入减少，但通货膨胀的增发钞票实不啻为一种租税，

以新增钞票去吸收民间的人力物力，来支持抗战。所以，笔者坚定地认为：（1）我国人力物力是够支持这长期抗战的；（2）这人力与物力来自民间；（3）这人力物力主要系由“通货膨胀税”去吸取而来，而非用公平的租税及公债所筹得的战费而来；（4）“通货膨胀税”的负税人主要为固定收入阶级，富豪阶级可以逃避出钱的责任——不仅如此，富豪阶级更可以借物价暴涨而大发其国难财。总之，这两种说法均不足证明我国所行通货膨胀政策为应当的。不能强制有钱者出钱来支持抗战，这是政府所以在战时采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症结。

上面是指对外作战而言，至于对内作战，主要是两种经济制度之争斗，也就是代表经济利益的两个壁垒的争斗，则更义不容辞的应由有钱者出钱来支持战争。但对内战祸发动以来，政府仍以印钞机为摇钱树，以“通货膨胀税”来吸取人力物力支持战争，这实在太不公平。为保持现有的经济制度而战，战胜的利益全在富有者所享受；那末富有者就应该出力出钱来支持。今不如此，富有阶级实在太自私了。

第四，政府屡次宣布法币准备金非常充足，法币发行数额绝不如外间所传之庞大，因而自己认定法币基础非常稳固。此种辩护的代表作，恐须推本年四月九日政府向国民大会的军事经济报告。内中关于货币金融的部分，扼要摘述如次：

“截至上月底为止，我们法币发行总额不到七十万亿元，然而我们政府现存有的白银黄金总值……，中央银行及其他国家行局所存外汇……，两项合计约为美金二亿九千万元。……而政府资产拨交中央银行，随时可以变价的总数约为四亿元，两者合计已有七亿美元。如照目前牌价即可法币发行总额三倍以上，而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贷款，尚不在内。由此可知我们法币的准备金非常充足，金融基础非常巩固。……现在人心惶惶，以为经济即将趋于崩溃，这完全是受了共匪及其工具宣传的影响。”

这种辩护方法是与货币学原理相违反的。货币价值与现金准备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现金准备中金、银，或外币之有无价值，及其价值之高低，与货币价值之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准备数额之大小，与货币价值之大小

也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准备只有通过发行数量，而后可以间接的影响货币价值。故直接影响货币价值者，非现金准备，而为发行数量。（请参阅拙作《发行准备与货币价值》，《经济评论》，三卷五期）所以，以现代货币学理的眼光看，以准备金之充足来辩护法币基础之稳固，实属文不对题的欺人之谈。

以上四种辩护通货膨胀的论调中，前两种早已消声敛迹；后两种则现在尚流行着，因牵涉到货币理论，一般人殊难认识其错误之所在。

通货膨胀的最后结局如何？物价长此疯狂地上涨下去，货币制度是否会要趋于崩溃呢？经济学界人士对此有两种相反的看法：有些人主张尽管通货膨胀继续进行，货币机构仍不会崩溃；另一些人主张如果没有有效办法及早阻止通货膨胀，则最后结果即为货币机构之崩溃。日后究竟如何演变，时间会告诉我们。在这两种看法中，笔者属于后者，兹将德国第一次大战后物价指数录后，借资参考：

德国第一次大战后物价指数 (1913 = 1)

1914	十二月	1.25	1923	一月	2 785
1915	十二月	1.49		二月	5 585
1916	十二月	1.51		三月	4 883
1917	十二月	2.03		四月	5 212
1918	十二月	2.45		五月	8 170
1919	十二月	8.03		六月	19 385
1920	十二月	14.4		七月	74 784
1921	十二月	34.9		八月	944 041
1922	六月	70.3		九月	239 (百万)
	十二月	1 475		十月	7 095 (百万)
				十一月	7 260 (万万)
				十二月	12 620 (万万)

(见 C. Bresciani-Turroni, *The Economics of Inflation*, P. 442)

德国一九二三年物价上涨之疯狂程度，实足令吾人咋舌，在十二个月中，由二千七百余倍（以一九一三年为准）胀到一二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倍，经济生活被扰乱到无法继续下去的境界。假若通货膨胀不及早截住，而任其继续加速度的进行下去，物价上涨是没有底止的。当时德国国内没有战争，尚能由政府从容准备与布置货币制度之重建。我国当今战祸弥漫，势难如德国当时之顺利改革币制。这是当前政府一个最难解的结子。

新政府成立后，物价在狂涨。许多人都骂新内阁之无能。实际上，通货膨胀是十年来政府的一贯政策，当今的物价水准的高度是过去通货增加积累的结果。过去的财政当局早已种下了祸根，而且祸毒已烧发到不可收拾的程度，现在要责成新内阁对狂涨的物价立刻作有效的平抑，实在是不可能的事。

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

笱移今

通货加速膨胀，物价不断狂涨，法币丧尽信用。华南已成港币世界，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确已走入崩溃的阶段。法币在今日还能继续勉强使用，未被人民完全拒绝，主要是由于它还保有法律上的独尊地位和公开身份。这种名存而实亡的残破的货币制度，乃是中国经济危机的产物之一。

现行通货不能适应经济生活，自然须要改革，这是无人反对的。不过究竟要在什么时候改革，大致有三种人的意见：（一）官方代言人——主张立刻改革币制，认为在改革之后，物价可得稳定，经济可以好转，财政收支可得平衡，“戡乱”力量随之增加，提早结束战争，实现统一建设。（二）金融业代言人——在理论上虽认财政收支平衡，国际贸易平衡，生产与消费平衡为实施币制改革的三个条件。可是事实上，如果前线能支持得住，并能从美国获得足够的援助，或于一般财政援助之外，再取得一笔改革币制的专款，还是赞同立刻改革的。（三）贫苦人民代言人——从生产过程来观察问题，强调在现势下改革币制，绝对不能成功，至多也只不过像法币兑换伪币一样，徒使人民多受一次突变式的损失。他们始终认为中国币制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不能单独求得解决。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有计划的合理的来全盘处理经济问题。

几年来政府在众议纷纭中犹豫、徘徊，从未有过肯定的表示。但自今年

一月下旬以来，对币制问题的态度，显然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一月二十四日行政院长张群告路透社记者：“政府在考虑中的改币计划有两个以上。”二月十二日又对《中央日报》记者说：“如求币制问题妥善解决，最好能获得一笔专用于改革币制的基金。”三月四日全国经济委员会主脑陈立夫对联合社记者表示：“任何援华计划，必须包括一可以实行之改革币制方案在内，中国必须改革币制，俾可获得六个月之喘息时期，使全国经济纳入正轨……任何外援，若不包括适当之币制改革，均不免浪费；改革以后，可使国军获得适当之薪饷，士气振作，不难解决共匪叛乱问题。”六月二日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在新闻记者招待会称：“政府早有币制改革之计划，惟此项计划，将于何时实施，目前尚难奉告。”（中央社）六月七日行宪的新任行政院长翁文灏出席国民党总理纪念周暨国民党籍立委联合谈话会说：“对于改革币制，正与有关方面缜密研究中，俾便实施。”（《金融日报》）六月十一日翁院长向立法院作首次施政报告：“挽救财政危机之根本办法，仍在改革币制，而如何有效改革，则尚待研究。”（中央社）就这些言论看来，政府对改革币制，似乎已有相当准备和决心，大有不达目的绝不中止之势。

目前国内大势，比之过去更是江河日下，有利于改币的条件更不存在。而政府偏要在兵荒马乱之际，积极筹谋改革币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第一是为了稳定政权：最近立法委员富静岩等在改革币制提案内，说得很明白：“共匪叛乱，军事不得复员；戡乱军费支出有增无已，通货增发数额，已达惊人数字。物价飞腾，生活不安，社会政治经济，均形成最严重之危机。民心彷徨，士气不振，军事困难，有增无减，政治前途，尤多隐忧。对现行币制，倘不速谋改革，一旦崩溃，不仅社会经济堪虞，复足影响政权安危。币制败坏，足以倾覆政权，中外史实，不乏先例，勿庸枚举。兹为挽救当前社会经济及政治军事重大危机，实应立谋币制改革，不可借准备未完，条件不足，或时机尚未成熟等理由，再事拖延。设再迟疑延缓，势将铸成噬脐莫及之遗憾，国家民族亦将蒙受难于预测之损失。”（六月八日《中央日报》）当局已感到币制对政权威胁的可怕，看到人心思变的迫切，觉得“变”总要比不变好些，不得不对改币有所打算。

第二是为了解救财政危难：战前国家税收，约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七十。嗣后兵祸连结，税收逐年递减，支出却与年俱增。弥补财政赤字的一办

法，就是增发通货，每年发行额，约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七十。现在工商业衰落不堪，共军占领地区扩大，税源日枯，税区日缩。支出则因军费浩繁，仍靠增发通货应付，财政问题愈趋严重。照政府说发行数字，截至本年三月底止，总额为七十万亿，四五六月份从低估计，至少七十万亿，合计一百四十万亿，为战前发行额的十万倍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黄元彬根据十年来之统计，在三十六年六月以前，大抵通货数量增加一倍，物价上升四倍至六倍，十二月可涨至八九倍。”（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中央社）依此类推，现今通货增加一倍，物价至少须涨至十五六倍。以十万乘十六，则六月底的上海物价应该在一百五十万倍以上。发行再膨胀，流通速度再加大，年底物价当在一千五百万倍左右。到了那个时期，人心和社会变成什么样子，真叫人不敢想象。记得一九二三年初，德国物价为战前十万倍，十个月之后即达一兆二千亿倍，马克遂告崩溃。为防止这个危难的来到，政府也只有求之于改币和美援。

第三是为了避免金融恐慌：由于时局不稳，生产萎缩，国内资金已在总动员逃向海外。单就流往香港而言，去年一年约有三亿港币，逃向美洲各地更不知要超过此数若干倍，今年以来逃风尤为可怕。大资产阶级（包括豪门、官僚）对前途失去信心，以各种各样方式，使资金变成外汇，退藏到国外。中小之家因资力薄弱，够不上外逃资格，为保存价值起见，大事购买黄金美钞。去年由澳门输华黄金为一百一十万盎斯，由香港输入亦有九十万盎斯左右。以每盎斯作五十美元计算，共合一亿美元。这以人民血汗向国外换来的金块，有大部分是被中小之家购藏起来了。巨额资金脱离生产，被诱逃到海外，被金钞所吸引，使金价自五月初以来，即超过一般物价，为十年来仅有的反常现象，正是金融将要发生恐慌的征兆。因为资金从工商营运中，退逃到相当限度，流通过程就要发生周转不灵的巨变。再从银行存款方面看，战前通货发行总数为十四亿元，全国商业行庄存款总数为十八亿元。后因长期战争，商业行庄力量逐渐削弱。三十五年底全国商业行庄存款，以物价计算，其实际资力尚及战前百分之四。今年三月底全国商业行庄存款总数为九万五千亿元，以当时四十四万倍物价计算，其实际资力仅及战前百分之一二。根据全国行庄存款增加的速度，和目前物价的涨势，估计六月底的存款总数，大约只有战前一千二三百万元的购买力，即其实际资力仅及战前

千分之七左右。这样的继续递减下去，商业行庄的业务，或许有无法维持的一天，这也是一个可虑的隐忧。在政府看来，改变轻币重货的观念，阻止资金逃亡和退藏，以稳定金融，似乎除了改革币制，亦无他途可寻。

第四是为了配合美援计划：政府核心人物，不讳言将要改革币制，还是一月十四日贝祖诒氏赴美以后的事，那次确是带去了两个以上币制计划到美国。但因“稳定币制的基金，据美国专家的意见，需要很大的数量。而这种基金，在目前内战正在进行之时，大半将为浪费。”（见马歇尔二月二十日在众院外委会发表之证词）其实美国不给改币贷款，倒不是因为内战正在进行，而是担心“戡乱”政府的无能。“长江以北的交通，除沿海航行外，几已不存在。地方政府往往腐败得很，对于救济措施的管理，不能有何帮助。根深蒂固集团的政治控制，实是恢复中国经济稳定所需克服的重大困难。”（同上）又说：“虽然如此，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目前的严重局势，必须予以援助，以协助阻止其经济的迅速败坏，从而使其获得喘息的机会，而令中国政府可以发动必要步骤，以求达成比较稳定的经济。”（见同上）二月十八日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援华咨文：“吾人希望中国之环境，能使美国援助，得以有效用于建设及复兴方面。吾人所期望之环境，迄未形成，故只能于现在之情形下，就其最适当者办理之。”这就是说，现在只能暂先贷给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赶快趁此喘息机会，采取必要步骤，扩大政府基础，吸收自由分子，洗刷顽固势力，阻止军事逆转，布置和平攻势，这大概就是美国所期望的适当环境。如能符合美国要求，它为巩固并伸展在华军事政治经济势力，当然希望中国有稳定的货币制度，协助中国解决币制问题。如果说翁文灏组阁陈立夫出国，是希图转换美国观感，那么贝祖诒之再度赴美，就不能说不与改革币制有重大关系。

此外，从历史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整理币制的途径有三：一是英日意等国所采取的方法，即以种种手段，紧缩通货，减少发行，使币值恢复于战前的水准。二是法比等国所采取的方法，即努力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国内物价与国外汇价，使币值安定于战后的水准，不使再趋跌落。三是德奥俄等国所采取的方法，即发行新币，收回旧币，并充实准备，以巩固新币信用。第一个办法，在中国根本行不通，第二个办法，政府确已用过不少力量，诸如紧缩工贷，限制汇款，抛售物资，禁止支票当日抵用等，都没有达

到稳定币值的效果，以后也不会想出更好的对策。所以现在只有走第三条路——改发新币了。有人说，政府正在赶印一万二万元美金及五十万一百万元大钞，还看不出有改币的模样。我们的看法与此不同：愈要实行改革币制，愈有增发大钞的可能。一则可用以向民间大量抢购物资；二则可使法币价值惨跌，俾以最低代价收回旧币。浦立德去年夏天说，收回全部法币只需二亿五千万美元，目前恐怕只需六七千万美元，再过几个月，大概只需一千万甚至几百万美元就可把全部法币收回来了。

政府对改革币制既有非行不可之势，然则究应采取什么本位？这是近来大家最关心、最感兴趣的一件事。

金本位吗？我国不出产黄金，也没有财力向国外购进大宗黄金作为铸币之用。而且硬币制度，已经陈旧，不能适合时代需要。所以主张金本位，在今日已失去现实意义，欧美各国多已放弃此种制度，我们无须多费唇舌，斤斤于此。

银本位吗？更是落伍的想法，中国也不出产白银。两年多来，上海《字林西报》一再鼓吹恢复银本位，美国舆论亦认为中国人民对银币信念甚深，银本位必受欢迎，所需白银可向美国及产银国家借用，西部各州议员尤赞同此说。因此，中国也有不少人力主恢复银本位。银本位不好，除了它是倒退的措施和本国缺银而外，主要是因为近十多年来，世界白银产量逐渐减少，工业用途日广，银价有看涨趋势。采用此种本位，不能使中国经济稳定，足以妨害工商业发展。同时，美国白银虽只能借给一亿九千万盎司，其产量虽次于墨西哥，但美国资本却支配了世界白银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六。要想借到大宗白银，势难逃出美国的掌握，势必失去货币自主权。果尔，作为一国经济命脉的货币，任人操纵摆布，后患实在不堪想象。

金汇兑本位吗？也许可能。据我们猜想，向美国借到黄金美元作为改币的准备金更好，否则白银也很欢迎，以之铸造银元充作辅币，并发行与银币等值的银纸币，同时流通市面。对外则发不兑现金币，与外汇联系，专作国际支付及结算之用；并规定新金币与银币比率，以新金币的对外价值，来稳定银币的对内价值。一俟物价稳定，经济好转，再把银币收归国有，禁止使用，以策金融安定。当局对改币的如意算盘，恐怕不外如此。

以上系就实际情形，对当前币制问题的一个简略分析。至于究竟在何时

改，如何改，虽说“唯有中国政府本身方能采取必要步骤”（杜鲁门语），但谁也看得出，改革货币的最后决定权，不在南京而在华盛顿。

法币已陷在解体的过程中，当局也在准备为它料理后事。然而币制改革之后，中国经济是否就可随之好转？我可以干脆地回答：绝无可能。首先，中国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是现存的生产关系，摧毁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货膨胀是生产失去均衡的结果，消费超过生产，通货膨胀就无法避免，所以增发纸币的必然性，乃是由于生产不足发生的。一个国家的政治措施，妨害了生产发展，使资本感到不安，这个国家的通货，就要丧失它的购买力。此时，纵有金银及外汇准备，纵然改换新币，亦必不能稳定币值。

其次，促进通货膨胀最显著的事象，是由于财政支绌。财政支绌，是由于应付庞大的内战军费。内战是要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同时战争又在大量消耗物资和人力。在现状不变的情况下，支出无法消减，收入无法增加（税源枯竭），公债无法推销。财政不平衡，并不因改革币制而能改善。纵有美援，或能挹注一时，决不能长期使币值稳定。所以改革币制后，财政支出，依然要靠发行，币值终必再度跌落，人民又必轻币重货，物价又再狂涨。恶劣情形，当较币制未改之前尤坏、尤糟，反造成以后正式改革币制的更多困难。

再次，在实行改革之初，资金呆滞，信用紧缩，投机减少，物价下跌。此在平时，只要政府辅导得法，熬过短期的苦难，即可步入稳定和繁荣之境。可是，目前专靠涨价与投机来维持的工商业，经受了八年抗战及三年内战，正像晚秋的树叶，在炮火连天，政治失效的环境下，不易忍受得了改革币制的风霜，尤其中小工商业很有破产的可能。

更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也纷纷实行改革币制，据庄智焕氏由国外考查归来说：“除比捷改革措施，确曾获得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外，希腊与匈牙利却是百分之二百的失败，荷南波等国也百分之百的落空。”（二月二日《大公报》）这些国家（希腊不算）没有内战，政治财政条件皆好过中国，其结果尚且如此。那么中国骤行改币的成败，也就不卜而知了。

这样说来，改革币制不能轻试，难道当局不懂得这些理由吗？懂得的，懂得比我们更清楚。只因为中国经济财政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改革币制是最后的一张王牌。“法币只有一条路可走，改得好，当然要改；改不好也

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让人民能够喘过一口气来。”（朱偁语——《观察》三卷十期）把改革币制这件大事当作儿戏，我们不敢苟同。在一致再改的过程中，吃苦受难的是中小工商业家和靠薪工生活的知识分子及工人，“能够喘过一口气来”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个与人民对立的制度。

因此，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认为今天不是改革币制的时候。纵然改革也不过是变换通货的计算单位，无异是发行名称不同的新钞，对正在加速败坏中的经济，不仅无益，而且是苛扰。打开中国经济僵局的关键，不是美援和改币，而是改变生产关系，提高生产能力。

六月十八深夜

平抑物价乎？管制收益乎？

罗坚白

今日经济濒于崩溃，政府与人民皆皇皇然不可终日，大家认物价狂涨为崩溃之要因，乃一致呼吁平抑物价。然平抑物价工作，政府非未努力，现在甚至竟欲乞灵武力，作平价政策之后盾，不惜借恐怖手段，阻遏涨风。

物价之涨，所以成为经济之威胁，乃因人民收益，有与物价成正比例者，亦有与物价成反比例者，遂促使社会财富再分配，而其分配又无秩序可资遵守，等于一种杀人不流血之掠夺，全国竞事掠夺，不事生产，经济焉能不趋崩溃。假使虽然物价上涨，而掠夺并不随之风行，即人民收益与物价之比例，正则大体同率俱正，反则大体同率俱反，物价不被利用作掠夺工具，则纵因物资缺乏而物价上涨，最恶场合，亦不过使人民享用，一律较从前有某种程度之降低，不致毁及社会财富分配之秩序，于经济之基础无伤。

作者尝困心横虑以思之：物价因何能被利用作掠夺工具？则以现行货币交易制度，纯由掌握物资之卖方私定价格。买方迫于需要，在物资缺乏时，固不得不任其取求，即在物资丰盛时，买方得自选择廉价，然所谓廉价，实亦不过多数握有物资者所示各种价格中较廉之一种，其决定权仍在卖方。买方既不能与赞一辞，国家社会亦无从干涉，乃任凭地位坚强之卖方，专从个人收益观点，控制交易，此实人类分配制度之病根，其症状今已发作于全世界，而在中国为尤烈。

按人类合法经济生活之一般程序，在交易制度以前，只有“勤劳”“生产”“享用”三个阶段。在交易制度以后，货币制度以前，演变为“勤劳”“生产”“换取”“享用”四个阶段。在货币交易制度以后，再演变为“勤

劳”“生产”“收益”“换取”“享用”五个阶段。程序愈繁复，生活愈方便，然弊害却随方便以俱来。即交易制度发明“换取”，予人类以换取非自己生产物资之方便，同时贻以投机取巧，执少换多，执劣换良之弊害。货币制度发明“收益”，予人类以收益轻灵货币，控制笨重物资之方便，同时贻以扩大投机取巧追求一本万利之弊害。遂致人类反将勤劳与生产置诸等闲，甚至虽欲勤劳生产，亦难乎为继。于是经济变成无本之水，此乃中国经济之现状。

作者计划使人类经济生活，仍能保存货币交易制度之方便，而除去其弊害，爰主张管制收益。其要旨在由国家社会干涉卖方索价，而授权买方监督实行。即由政府站在国家社会立场，估计人民各个勤劳所值，而核定其收益之极限，务使任何人不能超过此限有所收益，并将卖方所掌握物资之成本，由政府一一加以证实，绝不容其过分抬价以图幸得。其具体办法如下：

以现在货币作为“需币”，其意义相当于“享用许可证”，使代表物资。另外发行一种具有“收益许可证”意义而代表勤劳之“供币”，其单位一如现行货币，有元角分等。在交易中，卖方以物资换取需币，同时须将与需币相等额之供币，连同交付买方。各种劳力劳心工作人员领受薪给，亦须以等额供币换取需币。

此项供币，由政府按照人民所从事职业对于国家社会所需要之轻重缓急，参酌其个人学修程度之高下浅深，并其过去成就之有无多寡，分作若干等级。每一等级，规定其应有之收益极限额。政府每年在上年底，铨审每一成年人民全年收益极限额一次。每月于上月底，发给每人平均一个月份收益极限额之供币一次。自第二年初，政府令每一人民，每月缴还发行满一年后之供币，其数相当于上年度每月领取额之半。满二年后之供币，只许有新增产业之人民，连同产业目录，向政府登记存储，至必要时，请求换发新币。满三年后之供币，一律作废。

初行供币时，凡财产转让，准向政府申请特发供币，但同一财产如再转让，政府不再特发。又因国际贸易，从不行供币之外国输入物资，亦得于入口后向政府申请特发供币。至从本国输出物资赴不行供币之外国，则政府应在其出口前，缴收其多余之供币。政府在登记存储新增产业所保有作废前之供币，及特发转让财产所需供币时，均须考虑各该产业或财产对于国家社会

之影响，而课以税捐，以资调节。

在此种货币交易制度之下，凡接受需币者，除政府向人民征取税捐以外，均须以等额之供币付与对方。人无供币，纵有自己生产之物资，但不能收益需币，即不能换取自己需要之物资。故在交易中，任何人不肯牺牲其索取供币之权。因此国家社会干涉卖方索价办法，得有人民普遍而自然之监督，不难彻底实行。社会上不勤劳而享受之分子，只有坐待淘汰。至于肯勤劳而能力优越者，仍得享受特别丰厚之生活，俾社会各尽其能，各取所值。此种制度，因供币与需币相辅而行，可名之曰双币交易制度。

例如有经营织布业者于此，以需币三百万元设置厂房及机械以百万元购入棉纱及其他原料，以五十万元支付动力运输职工薪给并杂费，在一个月中，产布十万匹。此经营者之收益极限额若为全年二十四万元，则此一个月中，可由政府领得供币二万元。此厂房连同机械若可耐用十年，则设置时所得供币三百万元，可提用二万五千元于此一个月中，故此人手中现有供币，为原料百万元，加各种支付五十万元，加本人收益二万元，加厂房折旧二万五千元，共一百五十四万五千元。以十万匹布除之，每匹布之价格，应为十五元四角五分。此人纵欲以十五元五角之价出售，亦不可得。盖此人既无每匹五分十万匹五千元之额外多余供币，而买布者亦无人肯损让此每匹五分十万匹五千元之分内应得供币。

此人如必欲高抬卖价，只有将设置厂械时所得供币过分挪用之。然在登记存储以后，挪用既不可能。登记存储以前虽能挪用，然将来若欲将厂械转让于人，必来供币之不足，则反减削厂械之价值，无异剜食本身血肉以果一时口腹，岂非愚之甚者。

如此则营织布者之收益，仍不过每月应得之二万元，无异受雇于人每月领取薪给，谁肯出资以营织布？不知彼如不自营织布，亦不受雇于人，则虽有每月二万元之供币，只好静候过期作废，不能获得需币一分一毫。且每人虽有收益极限额，并非事实上均能达到极限，而自营确较受雇达到极限之可能为多，故能自营者，何乐而不自营？

然营织布者，可直接以布换取彼所需要之物资，而将其余者以过分高价卖出之，则如之何？曰：物物，直接交换，数量若小，影响有限，数量若大，则不便殊多，政府乘其不便，固不难严厉禁绝之。

然彼如囤布不卖，将如之何？曰：一种物资，既超过自用量，亦不能直接换取其他物资，若又不卖出，则等于珍藏泥土，在经济上毫无价值。且囤物过久，不仅不如过去能待取善价，原有随物收进之供币，不向政府登记存储；则过期作废。登记存储，则政府有机会查究其历久不卖之理由，亦不难严厉禁绝之。

然彼如利用布荒，于卖时强迫买者不要供币，否则不卖以挟制之，又将如之何？曰：此更不足虑。盖法律本可准许买者或旁观任何人，于事后控诉在交易中不付供币之卖方，而加以制裁，且买者若知卖方终不能囤布不卖，且知不要供币乃自己之损失，当无肯接受其强迫与挟制者。此则关系政府宣传效果如何，在初行供币时，尤宜注意。

然彼若以经营得当，所织之布，视他家物美而价廉，则政府可于次年适当提高其收益极限额。彼若能进一步，在国内市场驱逐外布，或更进一步在海外市场与外布相角逐，为国家填塞漏卮，争取挹注，则自应更予提高，以报酬其功绩。

上举虽仅经营工厂者之一例，然经营农场商店者，其所获利润，最多亦不过相当于其本人所有收益极限额。至于公教人员及雇工雇农，其收益原受政府或聘雇雇主之限制，供币发行后，政府代替一切聘雇雇主，且真有自由为公平而合理之管制，社会上又已不再见不流血之掠夺，其凄惨之生活，必大有所改善，均可举一而反三。总之，全国人民如欲增高其收益，只有加倍努力贡献于国家社会，而待次年被铨审提高收益极限额，投机取巧，自然绝迹。然此并非全国人民，均将如现在公教人员及雇农雇工，在每日延颈待望提高生活指数中，不得不忍受极端贫乏之谓。只须其勤劳之功绩，能被认为特别优异，政府尽可代表国家社会，使其收益公然凌驾今日最大之投机奸商。

或问供币何以须要过期作废？曰：供币发出以后，有两种场合须要作废。一为领有者坐食而不参加生产，或其生产成果，事实上不能达到收益之极限，致满二年犹未一度用出，是为未曾生产之供币。一为购买享用所需消费物资而收进者，原与俱来之物资虽已无存，但仍可使凭附其他物资，起重复换取需币之作用，是为已经享用之供币。

按供币之任务，本为随伴物资，而代表该物资所经历之勤劳，在交易

中，卖价之数字，等于卖方所持有供币之数字。即被交易之物资，自生产以迄归于卖者掌握，其在途程上曾蒙受人类勤劳之恩惠，一一表现于卖者所持有供币之数字中。故能使卖方不得借口成本之高，以图抬价幸得。若供币之未曾生产及已经享用者混杂其间，将使物价中含有非勤劳成分，则与发行供币之本来目的相违，故两者均应作废。

关于供币作废之期限，在规定前，应有两种考虑。

一为生产品之完成。在生产完成以前，供币在勤劳者手中，可能有一时期之蛰藏不动，而蛰藏期如以农民为标准，应估计为一年，即应将供币之流通期限定为一年。盖农民终岁勤劳，可能仅于收获后一度使用供币。然现在工业生产程序，自购料以至出品，倘不分工，可能延长若干年。兹姑以农业生产完成期间之两倍，作为供币之最长蛰藏期，而将其流通期限，定为两年。

次为生产品之销售。就整个国家社会言之，一年内之生产，通例以足够次年之享用为最低目标。故本年内之生产，在原则上，应维持整个国家社会消费至次年底，犹有剩余。故生产品至次年底，销售应犹未尽，在生产时，因各种支付而收入之供币，不得不仍令流通。此又为规定两年为供币流通期限之另一理由。

或又问供币何以须要于两年流通期满后登记存储？曰：供币经领有者一度用出后，辗转授受，不知底止。收进者均有其正当之来由，用出时却须等待适宜之机会。若用出之机会未至，而流通之期限已满，则执有供币者，难免蒙受损失，而供币将因剩余流通期限之长短，而伸缩其价值，自不得不设法加以补救。按执有供币而需要长时间等待用出机会者，莫如投资于生产事业而保有产业——即生产财如厂房机械等——之人民。此项产房机械，如能耐用十年，则购置时所得供币，应分期随伴生产品之售卖而用出，其最终用出且应在第十年。故流通满两年后之供币，特准保有产业者向政府登记，至其产业所值，可听自报。因课税关系，不必过虑浮报。此项供币，政府应暂予冻结作为存储，俟其售卖生产品，或转让厂械时，换发新币。惟已登记之产业，不准重复登记，故被登记之资格，限于新增之产业。

或又问人民照收益极限额领得供币后，何以须于次年将其半额缴还政府？曰：按上述一年生产两年享用之原则，人民个人每年所享用者，应为其

一年收益之半额，故满一年后应有相当于此半额之供币，系上年度购买生活必需品所收进，余存每一成年人民手中。此项供币，即为已经享用之供币，原与俱来之物资既已化为乌有，若不将其缴销，难免被反复利用，使其他物资之价格，加入非勤劳成分，即使卖方得将自己享用之负担，转嫁于买方。

或又问人民收益极限额，系每年铨定一次，何以供币之发给与缴还，却须分月实施？曰：以普通月薪阶级为标准，若每年一次，将全年收益极限额之供币发给之，则供币之流通期限，在十二月用出者，实际上只等于在一月用出者十二分之一，亦将影响供币价值之稳定。又一次使人民缴销全年应缴之供币，倘在年初行之，可能因供币之一时紧迫，使其分内之收益停顿或减少。倘在年底行之，又可能因供币之累月积余，将予以转嫁自己享用负担于他人之机会。

或又问人民以其省俭积蓄之需币，借贷于人，或投资于农工商业，可否亦准收取相当之利息？曰可。盖省俭所需要牺牲精神及努力，实不亚于勤劳工作，有时甚或过之。且积蓄成为资本，苟善用之，当有贡献于国家社会，故准其另获收益，亦属合理。惟政府为国家社会繁荣计，应豫筹全国农工商业在当年内共需要若干新资金以图发展，而规定其适宜之利率，并准人民于收取利息时申请特发供币。然有时农工商业已达繁荣顶点，如再发展，将引起经济恐慌，甚或逼使国家对外冒险，则政府亦可借减发或停发收益利息所需之供币，以节制之。

或又问人民若以需币直接收购供币，将听之乎？曰听之。盖供币在流通期内，若等值而购之，购者无所得，必贬其值。贬值为售者之损失，然彼不肯勤劳，或虽肯勤劳而能力不够收益极限额之水准，始有供币之余剩，其损失不值同情。此虽在购售双方皆为一种幸得，然常人虽余剩供币，当无巨额，有相当巨额余剩，而肯出售者，其惟过去在业务上有功绩之人民，现在或因种种意外，不得已而为之。此种幸得，在售者为基于过去努力之余荫，在购者亦可视为代国家社会救济过去有功绩者之报偿，似幸亦实非幸。况供币经逐月缴销逐年冻结以后，其游离待售者，为数应不甚宽绰。又当政府停发或减发收益利息所需之供币时，只供需两币均有余积之人，独能借贷投资生息，是供币之游离者，亦并非绝无出路。若直接以售诸人，虽贬值不能太甚，可见购售双方之幸得，均极有限。

供币通行以后，有许多附带收获，为始料所不及。例如新增产业之登记，可使过去在中国横遭障碍而不能实行之新税制，如利得税、土地增值稅、财产稅，可以推行无阻。因登记时产业所有者，以少报多，则自强加负担。以多报少，又只有坐待供币之作废。

又如政府征收稅捐不给供币，可使稅捐之负担，不被转嫁于他人。因納稅者未曾收得供币，无法将所缴纳取偿于卖价之中。

又如初行供币时，财产之转让，及从外国输入物资之出售，均须特别仰给供币于政府，可使遺產稅及關稅之漏报一扫而空。因无供币不能售出，漏报则特给之供币少，而售价亦随之小，通常稅率不过从价几分之几，价之損失，当然大于稅之損失数倍或数十百倍，实属得不偿失。

此外尚有一种附带收获，其意义之重大，不让于根绝奸商投机；即现在中国文官浮报开支，及武官吃缺截餉之恶弊，均可不禁自止。盖需币付出，皆应换得等额之供币，若非真已付出，则报销时缴还供币，无法足额，即为浮报开支及吃缺截餉之确证，即可加以罪刑。

作者主张创行管制收益之双币制度，本为夙昔研究社会分配问题所得私案之一。自今日观之，似亦可用为挽救经济危机之一别途。且当此人心皆如溺者待援之际，实行该项新制所遇阻力，应较平时为小。是以忍不住将久蓄胸中之私案提出，以商榷于国人。明知此案仅具雏型，必多缺漏，但鄙意以为尚可供今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而绝望于平抑物价者之参考。譬如痼疾已革，群医束手，与其坐以待毙，何如且试新药。幸海内外方家，叱而教之。

金圆券能够稳定物价吗？

樊 弘

在物价上涨的状态下，人人无不希望政府所发行的新币，金圆券，能够稳定物价，但政府所发行的金圆券是否便能稳定物价呢？

政府所发行的金圆券是否能够稳定物价，要看金圆券是否能够根治物价上涨的原因，如果能够在根本上消灭物价上涨的原因，那么金圆券便将能有稳定物价的功效。如果不能，那么物价便将继续往上飞涨，而不听政府的命令了。但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呢？

谁都知道，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外在一一定的时隔里面，抢购物资的货币的增加大于物资供应的增加。试问金圆券发行之后，是否能使抢购物资的货币的增加相对的减少呢？这个便要看金圆券的发行数量将来是否还要继续的增加，同时，并要看金圆券发行之后，在每一时隔里面，它出来买货的次数是否还要继续增加。在他方面，并要看每一时隔里面物资的供应是否会因金圆券的发行而增加。须知他们究竟是否增加或减少，都绝对不由政府的威力决定，而系由现在的政府所控制不了的经济的因素决定。何以说物价上涨的因素绝非政府的威力所能直接控制呢？犹记在三十一年的时候，政府曾有抛售美金储蓄券的办法平抑物价，到了三十二年时两亿美金储蓄券都抛售完了，但物价平抑了没有？后来政府因见抛售美金储蓄券的方法不行，改用抛售黄金的办法，共耗费价值二亿美元的黄金（约五百七十万两）用来平抑物价，但物价平抑了么？在三十二年八月政府眼见抛售黄金的政策又失败了，再采用黄金存款的办法来平抑物价，但平抑了没有？三十六年二月廿一日，政府忽又异想天开，颁布所谓经济紧急措施方

案，由抛售黄金和抛售美金储蓄券的平抑物价的政策，转而采用取缔黄金买卖和禁止外币流通的方法，结果不料更糟。由此可见，在过去六年之内，单凭政府的一纸命令的威严必是不能够平抑物价的了。过去不说了，且问，现在怎么样呢？

骤看起来，政府现在决然放弃法币而采用金圆券货币而名之曰金圆券，它是何等价值的东西，必比银元要高贵得多。在抗战以前，银元比金元不如，尚可相对的平抑物价，何况金元呢？而且依据政府的金圆券发行办法第一条，金圆券每元之法定含金量为纯金零点二二二一七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金圆券十足流通行使。——第八条金圆券之发行采十足准备，前项发行准备中，必须有百分之四十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之国有事业资产充之。这点明白表示金圆券是有十足的准备金的。因为政府既然规定每发一张金圆券，都要有四角的金银与美钞和六角由政府资产，那末，在政府金银美钞与国营的资产无法增加以前，便当绝对不会增加发行，而物价便将稳定了。可是，我们假如略一反审，立即便可明白，这种想法是天真的。

于此笔者应该特别强调，即金圆券的发行是绝对用不着准备金的。金圆券既不能自由兑换黄金、白银与美钞，而且在中华民国境内且不许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流通、买卖或持有，那么，拿这笔黄金美钞白银存在那里做什么？存在那里根本没有用，然而却又必须存在那里，并不许移作别用，这岂不是把国家的资源来滥费么？凡有银行学的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用作发行金圆券的黄金美钞和白银是绝对不可以移作别用的。移作别用便是犯法。并不可以其一元移作兑换金圆券之用，否则，便是犯法。因为政府的法令既然规定金圆券的发行必须有百分之四十的现金，那么，假如政府以一元的现金兑换金圆券，而不是以四角去兑换它，那么，经此兑换之后，其他的金圆券的百分之四十的现金发行准备，便不足了。不足便是违法，欲不违法便须一元也不能用以兑换金圆券，所以这笔现金的准备不但不能移作别用，而且也绝对不能移作兑换金圆券之用，即根本没有用。现金的准备既然存在那里根本没有用，然而却又必须存在那里作幌子，这岂不是资源的滥费么？特别的是在中国如此需要外币黄金与白银来购买外国货物的今日，即以现存的全部的金银和美钞来购买外国货尚还不足，而须有待于美国的贷款。

今更把此有限的黄金、白银和美钞拿出一部分来作发行的准备，由急用化为无用，这岂不是资源的浪费是什么？

谁都知道，金圆券的购买力或价值，在其他的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是与金圆券的发行额为相反方向的变动的。假令货物的供应没有增加，或信用的状态没有变迁，金圆券的价值且将与它的数量成反比例的。一件货物两个钱买与一个钱买，在两个钱买的时候物价便是两元，在一个钱买的时候便是一元。一物而卖两元比较一物而卖一元是钱的价值低落一半，这岂不是金圆券增加一倍，它的价值便低落一半么？反之，如果发行减少一倍，金圆券的价值便当增加一倍。金圆券的价值既然与其发行的数量成反比例，那么，为提高金圆券的价值起见政府只要叫印钞机少转动几次就行了，何必又要现金准备做什么？现金的准备金既不可以用来作兑现之用，而又不可以移作别用，我们何必要用它呢？“割鸡焉用牛刀”，减少发行金圆券尽可不必一定要用黄金美钞和白银来作准备。

然则为什么政府不叫印钞机少转动几次呢？亦就是说，政府为什么不信赖政府自己，偏要信赖黄金、美钞与白银呢？是不是说，由黄金美钞与白银所作成的发行准备更可以制止政府的通货膨胀么？须知政府的支出全靠他的收入来维系。在收入不符支出之际，除了向人民负债而外，就只有发钞之一法。任何发行的准备也都把它奈何不得的。政府能够在入不敷出之际，静听让政府的官员饿死以图维持金准备么？这个问题容易解答得很。在很早很早以前，中国发钞的金准备便是百分之六〇了。民国廿五年政府改用法币仍然维持百分之六〇的比例，即白银占百分之二十五，外国货币占百分之三十五，合为百分之六〇。法币的现金准备的比例高至百分之六〇，尚不足限制法币的增发，百分之四〇，行么？除了政府的国库的开支能以税收与公债来弥补外，单凭现金准备的比例，是绝对不足以阻止金圆券不再继续增发的！

金圆券的现金准备的比例既不足以保证通货的膨胀不继续，或不足以阻止物价的飞升，然则它是否可以延续货币流通的速度呢？假如可以减少它的流通的速度，物价亦当不涨。可是这又要看金圆券是否可以作为保存价值的工具。现在一般人民的心里不相信纸，而相信金。金圆券不但不能兑换金，且要收括市面的存金，它不但不是纸，而且比纸更坏，试问人民如何能够把

它拿来作为保存价值的工具呢？似此，则是人民对于金圆券还是不把它当作金圆券，而把它当成一种美金券看待了。除非人民是傻子，否则在金圆券发行之后，人民还是不欲保存金圆券而要保存货物，结果金圆券的流通速度，势不能够减少。金圆券的发行的数量，既不能因十足的发行准备而减少，且亦不能因为它而使它的流通速度不增加，然则金圆券的发行条例又有什么理由使物价不再上升呢？

固然金圆券可以兑换美钞，即四元金圆券可以兑换美钞一元。可是，我们莫要忘记了，法币不是亦可以兑换美圆的吗？法币，在政府的允许之下，亦是是可以兑换美圆的，金圆券亦须在政府的同样允许之下，始能兑换美圆。金圆券兑换美圆的能力，既不比法币高，我们似亦看不出金圆券的价值为什么要比法币更高。

现在我们可以进而考虑第三个问题了，即金圆券发行之后，物资的供应是否能增加。在内战的烟火到处弥漫的今天，国内生产的物资必是无法增加的。如欲物资有增加，单看外货的倾销的程度怎么样？且看外货输入的程度是否能抵得上国货减少的程度。这更要看中国人在国外的外汇存款或其他的资产是否能够因为政府一纸的法令，赶快便把他们来买货物输入到中国内地来。可是政府今又限制输入，而且他们恐亦不愿以他们的外国资产来换成金圆券或债券。由此可见，这一条路亦是很渺茫的！

现在我们转而研究政府发行金圆券的能力。依据金圆券发行办法第九条，金元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我们可以假定现在法币总额约为二百万亿元。一元金圆券合法币三百万元，二百万亿法币只要发行六亿点七的金圆券便收回来了。二十万亿中除了六亿点七，尚余十三亿点三的金圆券发行的能力。这即是说，政府如欲收回现存的法币只要发行六亿点七的金圆券就行了。在物资未增加，和美汇黄金与白银均极感缺乏之时，政府如欲稳定物价我看六亿点七已就足够了。其余的十三亿点四的金圆券，莫说十三亿点三，连一元我看，也用不着啊，然则政府又何必规定廿亿金元为发行的最高额呢？

归根结底一句话，金圆券是否能够稳定物价仍须视政府国库的收入与公债是否足够以符支出，和国内物资的生产是否能够增加以为断。单靠金圆券的发行办法本身，是不足以有为的啊！但政府的收入与公债是否能维持支出

呢？正如财政部长王云五先生所说，“在岁入方面，固有赖立法院之支持，与各方之努力，在岁出方面，便须政府各部门充分合作，尤以军费开支，占岁出之最大部分，当特别核实与节约。”这当然都是最要紧的。

民卅七，八，廿。于北京大学

改革币制已届成败关头

刘大中

——政府应立下决心去“停放封存”并应立即发行物价指数债券

币制改革已经过了两个星期，物价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但是在最近的三四天内，市面上银根松泛已经到了表面化的程度，物价已显反涨趋势。有许多物品已经涨到限价的水准；更有少数物品的价格，因为政府禁止超过限价的登载，报纸只能用空格去代表。在这种险象丛生的状态下，政府并没有拿出我们一向所主张的“停放封存”办法来；不但如此，政府反而在增资的办法上，对行庄大大让步。

改革币制现在已到成败的关头。这次若再失败，我们在文化界服务的寒士、一般公教人员以及一切靠月薪度日的平民大众，就要将濒绝境。关于这一次改革法案的全盘检讨，笔者已在《新路周刊》第十六期著文讨论；鉴于现在形势的危险，我们不能不就最主要的成败关键，再作呼吁。

本文共分三节。第一节说明以往十数日内暂时稳定的原因，及其不可靠性。第二节讨论目前祸源之所在。在第三节中，我们把应付目前危险状态的紧急办法，具体的提出来。

一、以往暂时的稳定及其不可靠性

过去十几天中的小康局面，绝不容乐观。实际上，这种暂时的稳定，完全是建筑在下列这三个脆弱的基础上；而在这几天内，这三个基础已显出不稳的征象；

（一）“警察力量”的震慑：

在过去这十几天内，政府对于基本的祸源不过加以皮毛的管制，反置全力于市场和限价的检查和监督。这种发动军警宪和特派“督导”大员到各处监督的办法，我们统称之为“警察力量”。凡是指望用“警察力量”去推行一种政策的，结果总难成功；对于经济方面的事情尤其如此。

在起初时，商人还摸不着头绪，不敢妄动，政府的监察也特别严，所以一般物价都未超过限价。但是，银根的松动和利率的降低是物价“看长”最可靠的信号，利之所在，商人们岂能经久按兵不动，这就是近几天来报纸上“空格”物价出现的原因。超过限价的情形加多以后，政府有多少警察能去个别监督？

（二）人民心理反应的影响：

金圆券的发行，正在物价急剧上增之后，人民望治心切，对于这一新耳目的新币自然乐于接受。加以八月二十及二十一两日银钱业休假，以及国家行局暂时停止贷款，银根因之抽紧，物价得到几天的平疲，人民随时以现币争购物资的风气一时大戢，现钞流动的速率因而大减。

但是，人民多少年来被政府膨胀政策逼迫出来的争购物资习惯，万不是用一个类似“障眼法”的设施所能戒除的。报纸上“空格”物价增多以后，一般人民为保护他们辛苦所得的实值，就必又会使现钞流通的速率加快起来。

（三）国行收购金钞价格的提高：

黄金美钞（和后期中的银元）的黑市价格，以往是物价激涨的先锋。这一次改币时所定的金钞收购价格，一般的说，较当时的黑市价格为高，因此在头几天内，往国行兑换的人相当的踊跃，金钞黑市因之消灭。物价涨势中失去了这样一个急先锋，对于维持小康局面不无小补。但是，黄金美钞是人民过去用来保护他们财富实值的工具之一。在报上“空格”价格越来越多的时候，金钞黑市是否又会出现呢？是否已经出现呢？在当局厉行“掩耳”政策之下，报纸不敢讲金钞黑市是否业已出现；但是当局自己心里应当是明白的。

这三个脆弱的稳定基础，受不住现实力量的冲击，已显摇摇欲坠之势。这些力量来自何处，我们在下节中讨论。

二、目前祸源之所在

战事的继续，自然是经济不能稳定的基本原因。但是假如战费能由赋税收入来支付，负担落在有钱人的身上，价物并没有上涨的必然性，至少不会像过去涨的那样快。政府现时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够高的行政效率去执行高度累进所得税，但是对于增加税收的重要性自然也是明白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政府知道，在物价继续激涨的过程中，开支一天一天的与物价同比例增加，但是税收却远远的落在后面（例如五月份应收的税，到七月份收齐，已经值不到三分之一了）。这样的下去，总有一天，税收完全不值什么，开支全靠发行；所以政府这次才有毅然改币的决心。

这次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理论是很简单的。据王云五氏估计，在币制改革以后，政府的总支出约为三十六亿金圆，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约为二十五亿，赤字约为十一亿。出售美援物资应可抵补赤字的一半左右，所余的数量不大，即或不能完全用公债去支付，困难也就不太严重。问题是：税率按战前标准调整后，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征收到手的（两个月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但是支出却不能等待。假如在调整税收所需的期内，物价继续增加，开支的数目也必与物价等比增加，一切岂不都成泡影？

在调整税收所需的两个月内，物价是否继续增加，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政府纸币的发行，在同期内是否增加。这个问题的答案异常简单：在税收正在调整而未有增加以前，政府仍将依靠发行纸币去应付支出，支出既不能较改币前减少，纸币增发的速率自然也就与改币前相同，不但如此，金、钞、银元的兑换，实际上使金圆券发行的增加速率，超过旧日法币增发的速率以上。据政府自己说，法币的发行总数用六千万美元即可全部收回；而在改币后的一周内，政府已兑入价值二千七百万美元的金钞银元（中央社八月三十日电）；换言之，在这一周内，通货的发行总数已因兑换金、钞、银元增加了几将一半，因例行的收支不抵而增发的数量还并不在内，这是何等危险的事！在这样纸币增发的冲击力量之下，上节中所说的那三个脆弱的稳定基础，如何能够站的住？

三、紧急的应付办法

在金圆券大量增发的冲击之下，一般平民的经济生命已如一发千钧，人民有权要求政府立即执行下列三种办法，直到税收能增加到预期中的数量时为止。其实，政府在发行金圆券之初，若能就这样办理，现时的情况当不致如此严重；当时未能这样去作，无论是有意避免，还是无意的疏忽，都是人民所不能原宥的。

(甲) 停止全体行庄的放款，封冻所有存款。

任何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决定物价高低的因素有下列四种：(一) 纸币发行的数量；(二) 纸币流通的速率；(三) 银钱业信用款项的数量；(四) 银钱业信用款项流通的速率。如上节所说，第一项现正在大量增加。对于第二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办法能去“管制”它。政府对于第一、二两项既无控制的能力，若再不停止行庄放款和封冻存款，用以抵消第一项因素的增加，物价如何会能不涨？这样简单的一个算术，还能有人不懂么？

尤其在政府现时极力抑低利率的政策下，行庄的放款对囤积商人已不啻是最大的引诱，何况各行庄还正在卑躬屈节，一反过去骄傲的态度，四下里“哀求”商人动用一些款项呢？

放款停止后，存款必须加以封冻，这理由是很简单的。假设张三与某行庄很有交情，在某行庄账上有一笔存款（实际上完全是某行庄本身的款项，或是与张三共有的）。这个行庄用张三的图章签发一张支票。注意，这在名义上是提取存款，而不是行庄放款；但是谁又知道这不是某行庄借与李四去购货囤积的？

“停放封存”对于工商业自然是极“不方便”的。但是这正是压迫奸商出囤的不二灵方。对于工业的正当需要，政府可用(乙)条办法去应付。

(乙) 恢复购货贷款，同时严格检查工厂仓库。

现在上海仓库的检查，似还仅限于银行仓库和普通货栈。这在第一次实行时，可能而确已有效。笔者风闻现在已有许多商人把存货搬运到熟识的工厂里去了。政府自应同时检查工厂内的存货。对于工厂正当的黄金需要，按下列原则由中央银行直接贷放：

一、工厂存货过限度者，不得申请贷款。

二、对于领到贷款的工厂，按下列方法办理：

1. 恢复去年年底实行的购货贷款；贷款到期时，由政府收购其成品，在市场上抛售。或：

2. 由工厂直接售与趸售商人，但须呈报所售数量及价值（同时由政府检查该厂与该商之仓库存货），用为政府征收该厂及该商营业税及所得税的参考。

（丙）发行物价指数债券：

为吸收行庄以外的游资，政府应即发行物价指数债券。在改革币制以后，发行物价指数债券之利是远过于弊的。关于发行这种债券的办法和益处，蒋硕杰和李崇淮先生等以前都曾著文详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三十七年九月六日于清华园

政治力量安能稳定物价！

严仁赓

—

这次币制改革，最初政府标榜是以“稳定物价”“安定民生”为目的。（见王云五氏谈话）。旧的币制，早已丧失“稳定物价”与“安定民生”的功用能力，所以此次政府毅然改革，很显然，“稳定物价”“安定民生”为其必须奋力以赴而又为必须达到的目标。然而仅仅目标正确犹嫌不足，所采的手段方法尤贵精当，方不至一切落空。否则产生的效果可等于零，甚至成为负数。不幸一月来政府所作所为，处处正表示方法错误与步伐凌乱，眼见不堪设想的结局随时随地可以演成事实。吾人焉得而不忧！

二

战时的美国，在罗斯福总统治理下，管制物价颇收一些成效。但等战争停止，冻结物价的法令取消，物价乃作无止境的上腾。本来，美国联邦政府的收支，不仅战时，就在备战时期以及备战以前的若干年度，一直是超支的，然而这段期间，物价却维持着相当程度的稳定。不料最近的两年，虽然联邦收支出现余额，偏偏物价却发生巨大的波动。这现象很特殊，费人索解。粗心的观察家见于这种特殊现象，曾经误认为这不过是限价存在或撤消的原故，证明政治权威能使物价就范，一纸文令也可以充分发挥管制物价的效能。其实大谬不然。战后物价腾涨，是因为补贴政策，原料管制政策，以及定量分配制度的全盘取消，与所得税率的降低免额的提高。一纸取消限价

的文令焉能产生偌大的力量。单独废除限价，既不可即刻促使物价上升；反之，单独冻结物价，也不能有保持物价稳定的绝对力量。管制物价必须利用政治以外的方法先消除物价上涨的根因，然后再辅之以政治的力量，如是管制物价才可以收到确效。如果仅凭政治力量而不在其他方策上面设法，纵有些许效果，这效果也只能是一时的。必欲执行，不是造成黑市，便是造成无市。此种成例数见不鲜，以前重庆的肉类限价就有过这样的经验。

先进国家战时实施限价或顶价（price ceiling），无有不与控制人民购买力的其他方法一同实施的，盖政治力量的实效究难持久。即令如此，黑市尚不易完全绝迹。例如美国在战时有一度肉类、砂糖、咖啡、香烟都不容易买到，也都有黑市。英国虽多数消费物品仰仗国外进口，政府便于控制来源，战时物价管制得比美国好，不过听人说黑市还是没有绝对的消灭。诚因政治力量，终难胜过多方面而来的经济压力。警察只是懂得如何维持社会秩序，会抓小偷会捉赌鬼，但是他却没有法子抹杀一切的经济法则。举世之间，连所谓“警察国家”管理物价，尚未敢纯然依赖政治力量，经济的方法与手段仍是重要的，何况组织散漫贪污敲诈相沿成风的国家。管制物价单靠政治力量，完全不足为恃。

三

战时如何方能有效的管制物价？请以美国的方法为例。美国在参战之前的一九三九年，国内物价已因备战而开始上涨。至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一日，她设立“物价物资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ian Supply），方才开始管制物价。一九四一年底参战以后，于次年一月三十日颁布《物价管制法案》（Price Control Act），当年十月二日又成立《经济稳定法案》（Stabilization Act）。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八日乃又冻结一切物价。自开始管制时起，先后颁布几项法案，逐次充实改善直至制度渐臻完善之后才实行最后一项冻结物价的办法。全部制度可说是多方面顾到了的。所以，自备战开始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国内物价虽见增涨，但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实行钉住物价的政策以后，物价即异常平稳；只有到战争停止前后，物价才开始蠕动。而共和党全面击毁物价管制后，物价乃直线上升。

美国实施冻结物价政策有所谓“扯线命令”（Hold the Line Order）的一

项办法，表面看来，它好像就是我们这次《紧急处分令》里面那个全面冻结物价的办法。其实内容和含义全然不同。最不同之点，是人家除去实施顶价之外，同时又有金融的财政的和经济的其他手段，付之实施，以封闭和吸收人民手中多余的购买力，保障冻结物价确收实效。她将生产原料的价格予以管制，如是生产成本易于计算控制，从根上摘除物价上涨的祸源；她又将原料的分配改采优先制（priority system），防止厂商竞购物资，刺激物价；她又将售价不敷成本的货品（尤其关系民生的必需品）予以津贴，务令物价站定；她并曾提高所得税税率，推销胜利公债胜利印花，去吸收另一部分的购买力。一面并实施限额配售制（rationing），防止对于制成品的抢购，保障货物的长期供应；一面又奖励储蓄和奖励节约。检查和告密只不过是辅助的工具，并不是统制物价中的重要手段。在这一个完密制度下，虽然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国民所得已有一倍以上的增加，物价却只有比较轻微的波动，这完全是各种办法相互配合之功。联邦政府的税收，从年五十五亿元递增为年三百五十八亿元；私人储蓄总额，自一百四十一亿元增为五百二十七亿元。仅此两项成就，已为统制物价帮忙不小。除此，她在生产方面同期间也曾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虽然一部分是军事生产，但是消费品的产量却也有百分之二十的增加，尤为可贵。开始定价之后物价能够维持相当长时期的平稳者，是各种政策配合的结果，绝不是凭空仗着政府的一纸文令就能收到这样的结果的。

试看改革币制后我政府采用的办法为如何？军事支出并未因改革币制而停止创造新的货币。这新创的货币，政府也并未设法去收拾它，反而另一方面强迫着人民再把收藏的金银外币通通兑换新货币，一路拥入市场。因此短短一月间，货币实际增加的数量至少已有八亿金圆之多。（根据中央社的一项不完全的统计，自八月二十三日开始收兑金银外币至九月十八日止，因收兑金银外币的新增发行，已达五亿六千万元。如此，则截至九月二十三日止的一个整月，全部数额无疑已超过六亿元。过去一个月的财政赤字，据估计至少亦已有二亿金圆。）连流通的旧法币折合金圆综计起来，今日全部市面流通的货币，最起码也已合到十亿金圆了。在这短短一月期间，货币的流通数量增加了四倍，发行竟已达到法定最高发行额的半数，宁不可惊！对于物价，这将是如何大的威胁！本年的七八月，法币增发率每月尚不过百分之五

十以内，至多不足一倍，业已酿成市场上的巨大波澜；如今一个月内货币即增加四倍之多，然而物价却只有温和的上涨，不能说不是金圆慑于政治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之故。不过货币已存在于民间，一旦政治力量松弛，斗争不过经济的力量，它是就要冲入市场的。到那时，如果没有其他控制购买力的办法在实施，一月之内物价上涨十倍八倍是不难想象的事。

政府对于这个新的危机，事前事后都像是没有什么准备。在新制度下，我们还没有实施限额配售制，我们又没有实行分配原料，我们更没有办法统制一切货物的来源。控制生产成本没有实施，奖励储蓄鼓励生产也没有有效的方法，公债虽欲发行，不比对外战争时期之易于激动人民的热情；在全国节约声中，京沪达官富贾一次观潮所消耗的汽油足够一个大学一个月的全部开支，还谈什么节约！政府采用一切应付物价的方法和手段，不惟不是管制物价应采取的正当方策，反而多数违背着管制物价所应采取的正当方策。举个例子：别的国家，战时为维持货物的长期供应一定要严格的限制人民购买货物的数量的，唯恐保不稳货物的存底。我们如何？我们不仅对消费者购买的数量不加限制，且进一步的检查仓库，没收货物，唯恐商人不把货物全部抛出。它只图一时的快意，只顾一时的效果，只为博取人们的齐声喝彩，不望远处想，货物出清以后，如何供应市面完全不管。商品售价只知一味的抑压，成本则不闻不问，这种不合理的物价管制，摧残生产则有余，岂尚能鼓励生产？政府只凭借政治力量，没有一点经济上可以控制物价的办法和把握，而欲强使物价稳然不动，如何能够？

新币制不幸失败，绝不是人民不守法，更不是人民不信任政府和它所发行的新币，其罪在政府之无知无能，强欲以政治的力量抹杀一切的经济法则。自始，我就曾反对在这个当口上强迫收兑金银外币。谁知直到如今，尚有人沾沾自喜，庆贺收兑金银外币之意外成功，却不知来日大难已经临头！

百孔千疮的物价管制

刘滌源

在本刊第五卷第六期《论物价的局部管制》一文中，笔者曾明白指出：局部物价管制中各种破绽的严重性，势必与时俱增。时逾兼旬，现在，物价硬性管制在全国各城市出了大乱子，已到了百孔千疮的境地。事态的发展已极为严重：由物价的高低问题，变成市场中物资的有无问题；如这种严重局面继续下去而不及早改善，则会变成人民生活能否维持的问题。

从上海抢购风潮发生以来，全国其他各大城市几乎都被抢购狂潮所侵袭，受到极大的扰乱，形成我国十年通货膨胀史中最混乱的状态。现在，上海成了物资的“真空”地带，其他各大城市也都陷入了半身不遂的瘫痪境界。以武汉市场为例，一周来，市面上买不到米、肉、油等日用品，市民生活马上感到莫大的威胁。许多学校伙食团有断炊之虑；即使勉强开伙，也是上餐接不到下餐。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由于抢购的结果，物价更拼命的上涨，如上等米在一周以前只卖二十余元一担，现在已涨逾百元大关；银洋黑市早已存在，但旬日以前与官价相差尚不十分遥远，现在则已超过米价的上涨程度了。在偷偷摸摸的交易中，卖者漫天叫价，买者急不暇择，恐惧与侥幸的心理交织着，人都失却了理性，近乎疯狂了。影响所及，黑市价格直线的更往上飞跃。

毫无疑问的，币制改革的物价硬性管制，已收到了许多无法补偿的反效果。本文拟将这些问题作一概要的分析。

物价管制所应具备的条件

许多迷信政治力量及枪杆力量，对经济方面的复杂现象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人，向往于英、美、苏联及德国等战时物价统制的成功，坚信把硬性限价的法宝搬到中国来，就可以使十年通货膨胀的重痼霍然而愈。事实证明这种信念是错误的，他们只见到了上述诸国物价管制成功的结果，而没有见到其所以成功之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所具备的基础。

上述诸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机构尽管各不相同，但促使物价管制成功的基本条件或基本原则是大体一致的。他们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所以能成功；我们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得一个完全相反的结果。兹将这些基本条件加以概括，并作比较如下：

(1) 在社会组织方面：他们全国人口调查办得很完善；基层组织很严密；政府对人民的管理强而有力。所以，物价管制推行时，在政治及社会等方面之阻力较小。而我们呢？连人口总数究有多少，也是一笔糊涂账。各地方均有些特殊势力，基层组织松弛达于极点。中央政府一道命令，逐层承转，到地方政府即成了具文。物价管制尤其如此。如此，物价管制成了管大城市而不管小城市，管城中而不管乡村的残破局面。

(2) 在经济结构方面：英美苏德都是高度工业化，采取大规模企业经营方式的国家；尤其是苏联，许多生产事业都控制在政府手中；英国的许多日用必需品主要要从国外输入，政府紧握此一物资供应之来源。惟其是采取大规模方式的企业组织，物资供应比较的集中，比较的容易估算，容易管制；而不致有零碎杂乱之病。以面包一项为例，政府控制国内的面包厂及面粉厂，是比较容易的。我国经济结构则完全不同。产业经营方式是小规模的，分散的，管制最不容易。以食米为例，产户分散于各地农村，统制其供应自不容易。

(3) 在物资需求方面：英美苏德诸国实施物价政策时，必定同时严格限制全体国民的购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述诸国中许多日用品都在配给之列，而且消费量都限制得非常之小。反观我国，全国人口总数都无法确定，遑论以全国为范围的计口配给制呢？人口调查残缺不全，自然无法估算出某种货物的全国消费量；更自然谈不上物资需求方面的管制。

(4) 在财政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以增发钞票为筹措战费的主要方法，饱尝了通货膨胀的恶劣后果。在第二次大战中，大体说来，英美苏德都不再采此种慢性自杀的财政政策。新钞增发数量有限，社会中不致凭空增加许多新的购买力。如此，只要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不变，物价纵全不管制，也不会暴烈上涨。我国呢？八·一九以前不用说；就在八·一九以后，也在大量的增发钞票。据政府公告：在币制改革后迄九月底止，金券发行额即达九万五千余万元；内中收回法币及东北流通券约计五千万，则新钞增加纯额即逾九亿元。十月份的发行增加纯额谅也不在少数，今后还要继续增发。市场中凭空增加如此大量的筹码，怎能硬性的不许物价上涨呢？

(5) 在剩余购买力的吸收方面：人民所得中，除供消费外，尚有剩余。这种剩余的购买力，需要正当的出路，然后才不致在物价上作祟。英美苏德诸国在战时都大量发行战时公债，加以吸取。同时，一方面极力保持债信，另一方面人民对政府也很信任，所以，战时公债推销甚为畅顺。政府即可将这笔剩余购买力去应战费。这样，在消极方面可免游资对物价增加压力，在积极方面可诱导剩余购买力作有益的活动。我国情形，根本不同。币制以前的情形不必再追溯。币制改革后，出售国营事业股份成效极微，发行短期库券销路不佳，出售剩余物资及敌伪产业则或杯水车薪，或缓不济急。而因大局不安定，及管制不合理，生产事业萎缩，游资更难导入生产事业中去。这样，游资在市场中泛滥，大家提心吊胆生怕多存纸币，于是大量抢购物资。这次各大城市中抢购风潮中的疯狂程度，即可说明剩余购买力没有正当出路的危险性。

(6) 在顺应营利心理方面：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工商活动是以追求利润为动机的。英美德三国的经济统制中，都顾不及了这一点。希特勒政府在开战以前即实行统制经济，曾明白规定股息（dividend）为6%。至于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了鼓励生产者努力增加生产，准许其将对政府供应数量以外之部分，另以市场价格在普通商店出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唯一方面顾及并保障工商业的合法利润，另一方面禁止过分利得，才能使物资之生产与运销，得以长时期的圆滑进行。反观我国，不问八·一九的各种物价是否合理，一律以是日价格作死硬的限价标准。蒋经国氏更明白承认，物价管制中须有些人占便宜，有些人吃亏。这样要使物资之生产与供应照常进行，

自然是不可能的事。

此外，英美苏德人民的守法精神、道德水准与教育程度，都已臻于相当高的境界，实对经济统制与物价管理有极大的助力。我国在这方面都有逊色。

总之，唯有具备上述诸项前提条件，才足以保证物价管制之成功。假若条件全未具备，或残缺不全，而政府要对物价作硬性的规定，不许上涨，其必然的唯一结果即为招致混乱，促使物价的更加暴烈上涨。

适得其反的恶劣效果

在立法院物价检讨会中，王云五氏列举下列四项补救办法，即（1）增加生产，（2）节约消费，（3）疏导物资，及（4）控制游资。（见十月十九日上海《大公报》）这四点，算是面面俱到。但是，这是我国十年通货膨胀史中，政府屡次宣告而无具体成就的四大问题；而且通货膨胀的程度愈增加，即愈难解决的四大问题。这十年来，国人对这四项口号式的原则，已听腻了。这次币制改革，原也寓有这些方面逐渐改善的希望在内；由于物价管制的适当及其他许多原因，使这些希望都一一消逝。物价管制的原意在求物价之安定，进而求整个经济之安定；但结果适得其反。兹将这些事与愿违的恶劣效果，分析如后：

（1）在增加生产方面：政府屡次宣布要增加生产，但这次物价硬性管制使国内工业生产差不多到了空前的不景气状态。主要工业如纺织业、面粉业、橡胶业、钢铁业等，无不发生减工现象。目前工业生产主要困难有二，一为原料缺乏，二为限价不敷成本。前者主要由于限价太低，而原料产地价涨，致来源阻塞；后者自为硬性限价政策之直接的恶劣效果。当局答应对于原料困难没法解决，拟实施原料配给制度，但现尚未开始。至限价不敷成本一点，以上海区情形言，则蒋经国氏要大家牺牲自己以成全自己，忍痛继续生产。但牺牲总是有限度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大环境下，不计及生产者之利润，其必然的结果为生产紧缩，物资减少。希特勒实施统制经济时，犹顾及此点；我国物价管制者能有比希特勒更大的魔力吗？此种硬性限价的办法如长期继续下去，将使受限价之各种工业逐渐萎缩下去，终至完全关闭。对我国民族资本之发展，当为一大损失。

(2) 在输入生产器材方面：增加国内生产，需要从国外输入大量的生产器材及原料。政府的盘算据说是如此的，币制改革后收兑的金银外币，移充发行准备，不提充输入必需物资之用；至生产所需之生产器材及原料，则由民间移存金银外汇来输入。输入限额自第七季起，以第五第六两季标准，再核减至少四分之一。但是，在限价的规定下，以外汇市价计算，输入国外物资将大亏其本，致走私进口近来也大见减少。所以，在限价政策之下，人民自备外汇输入生产器材及原料，已差不多陷于绝望了。

(3) 在增加输出方面：政府是极希望增加输出，以增多外汇头寸的。但我国输出主要以农产品为大宗，如桐油、茶叶、猪鬃等等，产地分散于各乡村。限价政策在乡村毫无效验，照常的自由涨价。这样，出口产地价高，而官定汇率不变，输出业者以高价从各地购收产品，输出后依官价汇率结得金元，即须赔本。所以，这种区域的限价政策推行到尽头，将使我国正常输出完全趋于停止。

(4) 在节约消费方面：政府三令五申要厉行节约，更推行各种方式的节约运动。但事实上，在消费方面，限价政策刚好发生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通货数量增加，市场中凭空增加了许多新的钞票。在这种情形之下，如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不变，物价应任其与货币数量之增加依同一比例而上涨，才不致使人民对物资的购买力有所增加。现在，政府一方面增加发行数量，另一方面又将物价冻结，则人民将原已发行与新近发行的钞票总量，依限价购买物资，自然可将各商店的物资抢购一空。在限价及抢购声中，自然会发生货物退藏的现象。这种货物退藏暂时不卖，在某意义上讲，倒有保留一部分物资以调节时间上供需的作用。而当局却又执行了严格检查存货的办法，所有认为超过合法数量的存货，都强令出售。此种措施因为取缔囤积减少物价上涨压力，但其结果会使已有一点物资提前卖完，加速经济危机之来临。这种只管物价不管人民手中钞票数量的办法，将使市场上的物资，加速的被人民的新增钞票抢购净尽；推其极，将使整个市场完全停摆。

(5) 在疏导游资方面：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疏导游资，而事实上适得其反。币制改革以来，游资大量增加。其主要来源（自然尚有其他次要来源）不能不归诸因收兑金银外币而发行的通货。截止九月底止，此项发行增加额约为六亿元（见第二次检查公告）。这数目不为不大。而限价政策使生产萎

缩，则游资自难与生产事业发生关联。这样，政府一方面因收兑金银外币及国库开支放出巨大的筹码；另一方面一般工商业因出售货物后不能立刻补进必需原料及同样制品，手头所积存的现款也就壅积于市场。政府只注重金银外币之可贵，而不知大量增加游资之可畏。政府只注重限价之必须贯彻到底，而不知在硬性限价下，游资更无出路，更无法加以疏导。

(6) 在补贴公共事业及都市配给方面：政府原希望币制改革后能减少在这些补赔方面的开支。现在，在维持限价的前提下，政府失却了过去随时调整公用事业价格的根据，使各公用事业亏累不堪。同时，都市配给制继续存在，补贴自然仍须国库负责。以上海为例，据说已大批派员赴各地收购米、油等日用品，产地价格远较上海限价为高，这差额自然只有由政府负担。限价愈持久，两者价差愈大，补赔额也愈大。

(7) 在各市场间物资交流方面：币制改革前，全国各地物价水准高低不一。币制改革实施之初，采行全国划一的办法，结果物价高的地区大体保持原来状态，物价低的地区则一律依金银兑换率，向高的水准看齐。到限价政策出现破绽以后，各地管制当局采取物资禁运——一种最原始的经济管制措施，把全国各地市场用人为力量加以支解与分割，遮断各市场间物资的自由交流作用。管制愈认真的区域，此种遮断政策也愈彻底，区域的经济孤立所产生的恶果也愈严重。

(8) 在价格安定方面：限价政策原在求全国物价安定，但事实上，在物价问题本身方面的结果是这样的：第一，在广大的乡村与小城市，物价涨落完全自由。第二，在限价政策执行比较彻底的上海，检查存货认真，物资被迫依限价卖光，全市成为物资的“真空”城市；管制当局比较有权力与财力，可向产地收购日用品，来填补城市的食用。第三，在限价实施而无法彻底的其他大城市，如武汉等地，抢购风潮中，物资退藏起来，日用品如米、油、肉等均买不到；当局权力及财力远较上海区者为小，差不多束手无策。报载武昌湖北省立中学无米开伙，去请省政府帮忙，结果省府也是爱莫能助。即此一例，可见其他。在日用物资与银洋的争购中，卖者漫天喊价，买者不问货色，不问价格，欣然接受。这种半公开的涨价较政府明白承认其涨价，在程度上犹远过之。

总括的说，限价政策实收到适得其反的恶劣效果。在币制改革以前，只

有物价高低问题；现在则变成物资有无的问题。限价政策之本意在求经济安定，其结果足以扰乱经济，而且扰乱程度之大，为我国十年通货膨胀史中所仅见。由物价问题，演变到城市人民能不能继续生活的问题。影响所及，将使经济崩溃提早降临。十年来采行通货膨胀政策而不严厉管制物价，是一种慢性的经济自杀政策；现在，通货膨胀的程度并未改善，而又推行“局部的”物价限制，使经济急转直下的恶化，实为一种急性的经济自杀政府！

三七、十、二十、珞珈山

评最近官方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

施复亮

十一月二日南京立法院开会，行政院长翁文灏氏曾出席“报告经济紧急处分令及补充办法的拟订和执行情形”，公开承认除了“中央银行收进金钞共计达一亿九千万美元”，“可说有了相当的成效”以外，其余如“关于收支平衡”、“抑制商利贷”、“增加银行存款”、“吸收外币外汇存款”、“关于制止资金逃避”、“关于稳定市场价格”、“关于增加生产”、“关于吸收侨汇”和“提高输出贸易”，统统“不行”、“失败”或“完全失败”了。自从币制改革以来，所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金圆券以及以限价政策为中心的经济管制，仅仅施行了两个多月，终于因为没有具备根本的条件以及办法本身的不合理和执行人员的鲁莽从事而迅速地宣告彻底的失败了。

立法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于十月二十八日开会时，有人认为“币制改革，对稳定物价平衡预算两点均未做到，新币之失败是理所当然”；“现在大家的感觉是政府在用纸来骗他们的金银外币，但现在结果通货还是膨胀”。（十月二十九日《大公报》）这已经指明通货膨胀是这次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失败的根本原因，其责任在政府自己，决不在人民。恰恰相反，在政府控制区域内的一切人民（不仅上海“五百多万市民”）“都给庸医做试验的工具”，而这种试验的结果是“中下产阶层被解决”，“真真苦了绝大多数的勤劳贫苦的大众”，“实在已经威胁到了人民的生活”。

根据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第三次检查公告：“自八月二十三日起到十月三十一日止，共计十五亿九千五百三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元，其中十月份计发行六亿三千八百六十三万四千一百九十六元六角”。这个发行数

字约等于过去十一年所发行的法币总额的八倍，平均每十天金圆券的发行额便与过去十一年法币发行总额相等，以短短七十天的时间便超过过去十一年的总额至七倍之多，以这样空前无比的重大压力压到市场上来，怎能使物价不涨，金圆券的信用不变？再加上未收回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尚有大量在市场上流通，金圆券的流通区域又因军事形势的恶化而逐渐缩小，更使金圆券加重对于物价的压力。这还是单从经济方面来说，若再计及政治的和心理的因素，更可明了事态的严重程度，已非我们所能想象。

对于这样严重的事态，政府有什么对策呢？据翁氏说，我们计划中有下列几点：（一）尽量减少贴补；（二）以积极而有效办法大量收回游资；（三）以“实在有效方法扶助生产及出口贸易”；还有“如何节省开支来使收支平衡”。“至于怎样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则因为他“已经要求辞职了”，只“希望负责革新的会有更好的办法拿出来”。老实说，上述的计划和目的，除了“尽量减少贴补”一点以外，在现政权之下都是无法“达到”的，任何“负责革新”的人都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拿出来”，这一点用不着事先讨论。

现在我们且来看一看他们已经提出来的“补救”办法。十月三十一日行政院通过一个“补充办法”，其要点如下：

（一）取消限价，实行议价，即所谓“核本定价”。“纱布糖煤盐，由中央主管机关核本定价，统筹调节；其他重要物品，包括民生日用品及工业原料，授权地方政府，参酌供应情形，依核本定价之原则，加以管理。”这一办法，根本无法实行；其不合经济法则，与限价相同。第一，商品的成本价格，固然依商品的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非所谓“合法利润”）来决定；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还要由市场的需供关系来决定，绝非“一成不变”的。主张“核本定价”的人，根本不懂成本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区别。第二，在币值稳定的情形之下，计算成本尚须请相当高明的成本会计员平时作正确的记录，定期作正确的计算；在币值变动的时候，账面上的成本记录，根本不能作为计算实际成本的正确根据。货币有充当价值尺度的机能：如今货币本身天天在变动，在贬值，如何还能充当正确的价值尺度？昨天的一元已不是今天的一元，今天的一元也不是明天的一元。过去等于一元银圆的法币，这次被贬值到三百万分之一，就是最明显的事实。同样，今天的一元金圆券，已

不是币制改革初期的一元金圆券了。这次行政院调整台币汇率，“从金圆券一元折合台币一千八百三十五元，改为金圆券一元折合台币一千元”，就是证明政府自己也已经“公开承认金圆券贬值”了。第三，商品的成本价格是依再生产或再购买（或再运销）所化的成本再加上平均利润来决定的，并不是依据那生产或购买它本身所化的成本来决定的。手工业制品经不起机器生产品的打击，其原因就在这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里，各工厂必须不断采用新的机器和新的技术，其原因也在这里，主张限价和议价的先生们，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才会说“存货不能照新价，以后新的进货才可照新价出售”；“核本定价，只能算以前的本，不能算新补进的原料或新进货的成本”。假使真的由这些先生以这样的头脑来“核本定价”，我敢断言：这次受了限价的极大痛苦和极大损失的工商业者，将来还要受多次议价的极大痛苦和极大损失。不然，议价只有跟着黑市跑，根本宣告“核本定价”的失败，跟抗战时期在后方各地所经验过的一样。

（二）开放粮食交易，禁止阻关阻运。“粮食依照市价交易，自由运销”。“地方妨碍粮食及其他货物流通之措施，未经行政院核准者，一律禁止。其有擅自阻关阻运者，从严惩办”。这次经济管制，除了硬性限价以外，最荒谬的办法就是各地一律阻运货物出境，而开其端者却是上海。想不到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竟会出现这种荒谬绝伦的怪现象。各地阻运货物出境的结果，竟会使无锡、芜湖这样有名的米市场和台湾这样有名的产米区的人民普遍地买不到米，像上海这样的大消费区更不消说了。其威胁人民生活之严重，是任何麻木的人都感觉到了。假使还要这样蛮干下去，那简直不知自己之死活了。这是环境逼出来的，算是当局还有点聪明。但这只是恢复限价以前的原状，而且还须经过相当的时间，算不得挽救当前经济危机的办法。

（三）“六大都市配售粮食，仍由政府继续办理”。这是旧办法，并不是新办法；只能缓和粮食问题，不能解决粮食问题，更不能解救经济危机。局部的配售政策的不合理，我已有另文评论，这里不必重复。我只想在这里指明一点；上海十月份的配售粮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配齐，十一月份更是未见消息；北平、天津和青岛，恐怕问题更多，更无把握。这里最困难的事，是如何掌握六大都市所需要的粮食。万一政府得不到所需要的配售粮

食，而人民又无法在别处购买，其情形是异常严重的。那时，有无问题和贵贱问题一定同时逼来。何况这还跟军事形势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呢。

（四）取缔投机黑市。“对于市场投机囤积行为及黑市买卖，继续严格取缔”。这也是一种老办法，倘使不流于官样文章，阳奉阴违，便一定弊端百出，病民扰民。

（五）调整税收。“关于货物税及其他从价征收之税捐，应依税法参照物价，调整征收”。这也是一种老办法，实行的结果只有加重一般人民的负担，减少一般人民的购买力，但仍不能弥补财政上的亏空。

（六）公用及交通事业涨价。“公用及交通事业，应核计成本，由主管官署核定调整价格”。翁氏所谓“尽量减少贴补”，就是指此而言的。但这也只是把负担转嫁，使某些消费者增加负担，既不能解救财政危机，更不能解救经济危机。

（七）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及工资。“文武职公教人员待遇，参照生活之必需，酌予调整”。“工资参照维持工人生活之需要，酌予调整”。前者将使公教人员的生活继续降低和不安，既赶不上物价的高涨，又得不到最低的保障。后者将使工人降低生产情绪，不断为增加工资而斗争。自从限价取消后，黑市变为明市，上海物价少则比限价上涨二三倍，多则上涨五六倍，甚至有超过十倍的，普通在四五倍之间。其他各地的情形，也与上海差不多，甚至还有比上海涨得更凶的。这种情形，今后只有更恶化下去。

立法院里有人说，“八一九以前的是条绝路。”可是我们细细研究了上述的“补充办法”，发现政府又回到这条“绝路”了。翁氏说“这一个办法当然是不够的，继续的还有一套计划”。政府手里还有一套什么计划，我们无从推测；不过有一点却敢断言：只要“戡乱”政策还继续执行下去，决不能有什么“活路”的计划。

立法院里颇有几位委员，要想找出一些“活路”的计划或“根本政策”。在十一月一日立法院财政金融委员会里曾经有人各别提出四种办法：（一）“发行硬币”；（二）“把金圆券与几种日用必需品如米煤盐订定一个比价”；（三）“发行物价指数储蓄券或存款”；（四）“充分把握必需的物资”。他们打算“根据政府的经济管制办法，参照各委员的意见，研拟一个具体的改善经济补充办法”。（十一月二日《大公报》）在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所研拟

的“具体的改善经济补充办法”以前，姑且先来检讨一下这四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发行硬币”。据说“发行硬币可以增强金圆券的信用，即使有黄牛党抢购，但至少可以使人民觉得纸票子还有些价值。我觉得硬币发行以后，至少又可以维持五六个月，到那时军事上也许会有转机”。这位委员的话，实在有点天真得可爱。第一，他承认不兑现的“纸票子”是“一文不值”的，只有“发行硬币”跟它兑换才会“使人民觉得纸票子还有些价值”。第二，他不怕“硬币发行以后”“有黄牛党抢购”，不知道他准备发行多少硬币，也不知道这些硬币的原料从哪里来，还是天上掉下来呢，还是美国人会源源不断地送来。第三，他主张“发行硬币”只要“维持五六个月”，以待“那时军事上也许会有转机”，不知道“转机”以后是否还要继续“发行硬币”，万一没有“转机”或有相反的“转机”又该怎么办。其实，纸币的有无信用，与“发行硬币”无关，与兑现与否无关。抗战以前的法币，既不是硬币，也不能兑现，一样地有信用。可见金圆券的信用不好，原因另有所在。而且这种建议，根本不懂得政府这次的币制改革是为了财政的目的，预定等于旧法币十倍的发行额就是最好的证明。假使“发行硬币”，就绝对不能达到这种财政的目的，而且会使政府的财政立即陷于绝境。

第二个办法是“把金圆券与几种日用必需品如米煤盐订定一个比价”，这也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第一，“金圆券的价值”要维持一个“不动的标准”，对外必须维持一定的外汇率（即所谓“对外价值”），对内必须维持一定的发行量——即不超过流通过程所必需的发行量。在今天，还要有一个和平的局面和信用良好的政府。如今金圆券对台币的汇率尚不能维持，自然更不能维持对其他国家的汇率。外汇率的变更是必然的；不然，将使出口断绝，进口商人获得暴利，或因缺少外汇而根本无法进口。至于发行量早已超过流通过程所必需的数额，那是更不消说了。金圆券早已贬值，限价政策的失败就是最有力的证据。除非大量地收缩通货，金圆券绝对无法恢复原来的“价值”，甚至要维持一个“不动的标准”也不可。而收缩通货在今天绝对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二，倘若把金圆券与米煤盐等日用必需品订定一个不变的比价，姑且不去讨论这种办法的不合理和不可能，也要以掌握大量的米煤盐等日用必需品为前提，允许用金圆券无限制地购买这些日用必需品，试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老实说，倘若金圆券的“价值”稳定，就不必跟这些东西

订定不变的比价；倘若金圆券的“价值”不稳定，就不可能跟这些东西订定不变的比价。金圆券跟台币的比价尚且不能固定，何况跟这些东西的比价？第三，倘若金圆券不断贬值，其他商品的价格都跟着上涨，只有跟金圆券订有固定比价的这些东西（即限价的东西）不能涨价，那结果一定是大家都来抢购这些东西，而生产或贩卖这些东西的人也就再不愿意生产或贩卖这些东西了。那时我们还能得到日用必需品吗？

第三个办法是“发行物价指数储蓄券或存款，吸收通货回笼”。好像有几位有名的正统派经济学者也老早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我很怀疑这些先生是否懂得通货膨胀的意义，或者还要更进一步地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把政府的一切负担都要转嫁到多数穷苦人民的身上。我们要知道，通货膨胀就是一种变相的税收政策，它使每个人都要通过收受通货或使用通货而受到损失，即负担国家的经费。征税和募债，还有人可以逃避；通货膨胀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即老幼残废和叫化子也不能逃避。绝大多数人民自生活日趋恶化，就是受通货膨胀之赐。工商业的“虚盈实亏”，也是受通货膨胀之赐。如今有人不想法子去根绝通货膨胀而只想“发行物价指数储蓄券或存款”来保全少数有“储蓄或存款”能力的人的利益，根本是不对的。这些人不应受通货膨胀的损失，那末谁应该命定地受这种损失呢？再则，一再失信于人民的非民主的政府，谁又能够保证它将来一定会按照物价指数偿还储蓄或存款呢？这些先生的目的，是不是只要把人民手里的钱骗上了手就算了呢？过去买过法币公债或有过法币储蓄和黄金储蓄的人，一定能够答复这个问题。《观察》五卷五期及五卷十期的两篇读者投书《魔术》和《一笔账》，就是最好的参考资料。

第四个办法就是“充分把握必需的物资”。这里只有采用两个方法，一个是用政治的力量向人民去征收或摊派，例如田赋征实、随赋带购（虽有所谓“粮食库券”，实际仍与征收无异）以及各式各样的实物摊派；另一个是“用纸来骗他们的金银外币”和各种物资，就是以成本很轻的金圆券去掉换各种“必需的物资”，主要是向农民身上去搜刮。由于政府采取这样的办法，才会使“现在社会已真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使穷的人更穷了”。这不但不能解救当前的经济危机，而且只有加深经济危机，使它早日爆发出来。

从以上所说的种种看来，我们可以知道：无论号称“责任内阁”的行政

院或号称“民意机关”的立法院，对于当前的经济危机，都没有切实有效的挽救办法。他们说来说去，都没有触到问题的核心，发现问题的症结。翁文灏氏知道新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收支不敷，差额太大”，但他始终不愿或不敢说出“收支不敷，差额太大”的原因（翁氏是绝对不会不知道这个原因的）。立法院里也没有人敢于说出这个原因，而只是空喊“绝对不能再发金圆券”。请问委员先生：政府收支不敷，不发金圆券，有什么好办法？你们衮衮诸公能够提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吗？你们说“最好的办法是叫豪门拿出钱来”。不错，大多数老百姓都会赞成。可是有谁能够“叫豪门拿出钱来”呢？有人认为“只要蒋总统一纸命令就可以办得到”。不知你们是否考虑过：蒋总统为什么不下这“一纸命令”呢？有谁能够叫蒋总统下这“一纸命令”？你们对豪门尚且没有办法，怎么能够对那地位比豪门更高的蒋总统有办法呢？可见问题不是那末简单的吧。

很显然地，政府收支不敷是由于打仗或“戡乱”。战争需要支出庞大的经费，消耗大量的物资，同时还要直接间接地阻碍生产，破坏生产，更使物资缺乏，货运不畅。这是当前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只要内战继续一天，这种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但无法挽救，而且只有更加恶化。内战不停，限价和管制固然是绝路，议价和自由涨价也一样是绝路。今后通货膨胀的速度必然会超过过去的任何时期，物价上涨的速度也必然会超过过去的任何时期，多数人民所受的损失和痛苦也只有日益加甚。要挽救这一悲惨的厄运，只有赶快以多数人民的力量去谋结束内战，恢复和平，实行真正民主，进行经济建设。此外，再没有挽救经济危机的方法。

三十七年十一月四日

理念探讨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吴世昌

民主国家这个名词，近来喊得十分响亮，中国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也随大战结束而更加迫切。现在的所谓民主国家，一般指英、美、苏、法几个联合国中的大国。中国也算五强之一，也被人指为民主国家，实则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尝过民主的味道，现在尚在梦想颠倒，涕泣以求的过程之中。至于中国要求现代化的民主，远在五四时代。五四运动的目标有二；一为学术的，要求科学化，一为政治的，要求民主化。当然，科学化与民主化这二个名词，在五四以后很久才被提出来的。当时的学者，只提出科学与民主两大目标，梁任公所谓赛先生（Science）与德先生（Democracy）。说来惭愧，五四运动是二十七年前发生的，那时中国早已是中华“民”国。“民”国是中山先生手创的，而创造了八年，中国人中才有少数知识分子发现这个国家并不民主，才要提倡德谟克拉西。而提倡是提倡，事实是事实，直到民国十七年，中国一直是中华“党”国。一军一党，平分了三十年天下。中山先生革命了四十年，发觉他所手创的国家，完全不合他本来的理想。十三年改组国民党，重行北伐，分订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训政时期应该有多久，他并没有明文规定。但他遗嘱要求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内召集，而国民会议以后应该开始宪政，则训政时期在中山先生的理想中，决不会太长。但是今日之国民党，一经训政，便欲罢不能。英国历史家威尔斯（H. G. Wells）批评英国政治说，“英国人本来没有别人想象那样坏，但吞下了印度，便弄坏了胃口”，一般中国人对国民党也有此感，只要把“吞下了印度”改成“尝到了训政的味道”。

但是，国民党的“训政”，名词虽然与慈禧太后所用“垂帘‘训政’”的“训政”相同，却不是国粹，而是舶来品，俄国的大革命，虽比中国推翻满清要迟几年，但因为从马列主义之中发明了一党专政这件法宝，冲破古往今来一切专制或民主政体的樊笼，才能肃清帝俄政治上的余毒，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国民党推翻满清之后，因为未能肃清旧时代留下来的余毒，革命势力逐渐被压迫到南方一隅，复辟，帝制等余孽，反能兴风作浪，北洋军阀依然割据混战，弄成民初中华“军”国的局面。北伐以后的一党专政，以及其他许多政制，都是模仿苏联的。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不必讳言，也不必举现在的政制作为证例。所不同者，苏联的农工专政，并未规定期限，说专到何时或某阶段以后为止。国民党则规定训政以后即为宪政，训政是过程而非终极目的。虽然训政太久，甜头太多，也会忘其所以的变成目的。由此，可知国民党本意并不如共产党之想永久专政。至于国民党理想中的宪政，虽不一定如英美之宪政，也并不如苏联的农工专政。国民党理想中的宪政，本来是民主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现在大家都认为她是民主国家之一。其实这个观念是最近才有的。而且在一般英美派民主人士——即共产主义者所谓布尔乔亚——心目中，也依然有问题，在争论。不过以前为了对德作战，现在为了联合国的前途，大家姑且承认她是民主国家。在苏联初建国时，全世界各国都目之为洪水猛兽，有的甚至不惜派军队去包围她，阻碍她，倒是中国的中山先生却老早就承认列宁理想的伟大，政策之正确，寄以深厚的同情与祝望；而苏联之所以报中国者亦不薄，首先自动废止不平等条约退还庚子赔款等等。直到苏德宣战以前，英美系统的国家，无不对苏联深怀疑惧。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之敷衍意大利，扶植德国，都有暗中拒抗苏联的作用。但彼时苏联埋头建设，决无侵略他国之野心。只有共产主义的传播是很快的。英美对苏联的疑惧拒抗，无它，只不过因为苏联是农工专政国家，不是民主政治的国家。

但在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面目完全暴露以后：英法开始觉得苏联友谊之可贵了。而疑惧的心理则仍未尽除。直到一九四〇年德国向苏宣战，邱吉尔立即宣布英国将与苏并肩作战，英美两国均以军火供给苏联。世人公认这一战是民主国家与轴心国家作战。由于德义之太不民主，大家才承

认苏联虽然也是一党专政，毕竟是与民主国家站在一条阵线上的，这样，在全部作战过程中，苏联一直被世人公认为民主国家。

在去年旧金山联合国会议时，德国刚投降，换句话说，在欧洲英、美、苏、法共同战胜的战争刚结束。在旧金山会议中有许多问题，例如波兰政府问题，牵涉到民主化的观念，英、美与苏联的代表就争执起来，有人感觉到国际间缺少一本解释正确的字典，因为民主这一个名词，在各国代表之间歧义太多了。这当然是笑话，因为各国代表各依其本国的政治观念来解释，没有一国代表会自己承认其本国政治是不民主的。因此，也可见得战后民主的趋势，各国代表均以不民主为可耻。只有中国的官僚，可以厚着脸皮说：“什么民主不民主！根本不理那一套！”

但是，苏联究竟民主不民主呢？我没有去过苏联，不能举实例作证。许多到过苏联的人，纷纷举实例来证明苏联人民如何丰衣足食，物价低廉，政治修明，科学发达，文艺优美，看来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政治是否民主，却似乎很少人提到，仿佛有意回避这个问题，或者虽到苏联而摸不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也许在了解这个问题之先，我们还得先把什么叫作民主这个定义弄清楚。

民主的定义，在英美国家，已经很清楚。英美民主政治的方式，中国人大都耳熟能详。但是不幸得很，也许是由于我的寡陋，竟没有见到苏联所谓民主的清楚的定义，或苏联所谓民主异于英美所谓民主者何在。若照英美的定义，则人民可以自由批评政府的政策及施政情形；人民可以用暴力以外的方法，更换政府；凡是公民，都可以用自由结合的方式，组织政党，用竞争选举的方式参加政府。这几点，即使是中国的共产党员，大概也不能不承认是民主的条件。但是苏联是不是这样的呢？

模仿苏联的国家，更正确点说，模仿一党专政的国家，本来还有以前的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这些国家，都发展成为独裁国家，终于因侵略而招致灭亡。苏联当然和轴心国家不同，其不同之点，照同情苏联的英国政治理论家拉斯基的说法，“共产主义如果没有了理想，就会变成法西斯主义”。这个理想，据我看，大概即所谓经济民主。

在许多到过苏联的中国人，回来很少谈到苏联的政治民主等问题。只有郭沫若在访苏以后，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许多人认为苏联人民没英美式的政

治民主，这也许是对的；但是苏联人民有经济民主，人人丰衣足食，决没有英美资本家拥资百万而失业者得不到面包的现象。（大意如此，见去年《新华日报》副刊。）好了，现在问题似乎有了着落：英美有政治民主而无或缺经济民主，苏联有经济民主而无或缺政治民主。这个说法，大致不会偏袒一方。再说得粗浅一点，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权，而利则不足；苏联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权则不足。

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这个“众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人民要求政治民主，即要求管自己乃至众人之事。要求管自己，或同意别人（不是别人以暴力挟制）管自己的事，是不愿意做奴隶。要求管众人或同意别人管众人的事，是相信自己或别人有能力，管得好。这也不是强迫众人做奴隶。所以政治本身，自有其必然的民主性，自己丰衣足食而无权管自己的事，却大有问题了。丰衣足食是好的，但也有阔人的奴隶，照样丰衣足食，还能享受科学设备，听戏看画等等。但问题就在听人指挥，不能管自己乃至众人的事。孔子论孝，曾有一个很妙的譬喻，他说：

“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有能养。不敬，何以别乎？”

他说，当时的人以为只要能使父母丰衣足食，便尽了孝道。阔人家的犬马不是也能吃得饱饱，身披文绣吗？问题就在敬不敬。庄子论自由，他用一个乌龟来作譬喻，认为做梁国的宰臣，犹如披文绣以入太庙的龟，一个自由人却是曳尾涂中之龟，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似乎不只是被人养得胖胖的可以满足，自由意志，不受暴力压制而能自由发展的意志似乎比丰衣足食更可贵些。“一箪食，一瓢饮，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路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弗受”。人总是人，除了动物性的机能与要求以外，毕竟还多了一些自由之类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承认，自由之类是可以用教育方式来改变的。正如同动物都有眼睛，而无光的水底也有盲目之鱼。反过来说，如果根本不能得到衣食，濒于饿死的境地，像目前中国的灾民一般，当然也谈不到民主自由之类。但从政治的观点而论，也许正惟衣食不足，所以更有民主自由的必要。但如果说，只要衣食丰足，即使政治民主不充分也不在乎，人类的脑筋似乎并不如此简单。

中国人民目前正渴求民主。大体说来，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所要求的是

英美式的民主，青年人则多希望苏联式的民主。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界线，也许应该说，偏于保守者希望英美式的民主，思想前进者希望苏联式的民主，但如果说，青年或前进者只要丰衣足食，中年或保守者只要自由参政，则二者恐皆不肯承认。足见不论青年或中年，前进或保守，都有他们的理想。而今日中国的政治，所谓民主也者，还在各阶层人民争取之中，设计之中，中国不幸，枉有三十五年“民”国之号，而到今日，人民对于民主的消息，还在晨占鹊喜，夕卜灯花；民主的图样，还在画虎类犬，刻鹄似鹜。但世界是在进步，不民主的局面，终于要被消灭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也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别人家的短处，我们并没有必须抄袭的义务。中国人需要丰衣足食是天经地义，而自由则更可贵。我们现在只有根深蒂固的不民主，却还没有根深蒂固的政治民主或经济民主。二者可以得兼，必须为兼。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

杨人楩

马歇尔在其离华前所发表的声明中，曾强调今后中国的政治应由“自由分子”来领导。有人以为这是暗示美政府将支持自由主义者所领导的中国政府；虽然我们无法断定他所指的“自由分子”就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近年来已成了相当时髦的东西，至少是一件美观而可活用的装饰品；一方面可能有人因它而遭受迫害，一方面也将有人利用它来做猎官的工具。这种矛盾的事实，足以妨碍我们对于自由主义的认识。我们不能不探究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从而明白自由主义者应往何处去。

要探究自由主义的根源，可能追溯到很早。一般而论，它可说是近代思想的产物，其功能在指示一种生活态度，尤其是有关政治生活的态度。要说明它和近代政治的关系，必须追述整个近代史，当非本文可尽；我们只能根据历史来分析其内容。

自由主义之目的在于要求自由，因为自由是人类进化所必需的条件。人类对于自由的要求是依时地而不同的，在穴居野处的初民时代，急切地要求躲避风雨和野兽侵害的自由；在不知利用轮船火车的时代，自不会想到要有空中运输的自由。自由的要求既受时空的限制，那么，听见“自由”二字就感觉战栗不安的人，大可放心。人类所要求的自由每每是走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前面，即此种自由在当时还不曾获得而有待于追求。时代进一步，所欲追求的自由跟着进一步，故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力。进步必有赖于创造，故自由具有创造性。进步与创造在于改变现有的情况，故自由是反现状的。满足于现状是保守，保守之目的在于使现状成为一种不变的静态，故

保守的生活态度不能有创造，因而不能有进步。自由和保守是对立的，它要使现状不固着于静态；要变化则不能有阻遏变化的力量，故自由是反干涉的。保守及干涉的势力，必然存在，要改变现状必须克服此一势力，故自由具有斗争性。在此类斗争中，自由可能暂时失败；失败的暂时，便是固着于某一现状而无进步的时代。此一现状终久是会改变的，终久会变成另一现状，这就表明前一现状中的自由要求毕竟达到其改变的目的。人类对于自由的要求是由人类自身决定的，并非由于人类以外的力量，定命论不足以限制这种决定，故自由是反定命论的。人类要求何种自由，是根据现状而决定的；先须认识现状始能考虑到进一步的要求。现状是综合已往历史的结果，根据现状就是根据历史，故任何时代的自由要求仍然是历史的继续，而非切断历史，更非超出历史。考虑进一步的要求，有赖于思想作用；思想不能离开历史而凭空起作用，思想与历史配合才产生理想主义。唯理想主义始能指示出人类所当追求的自由，否则便是教条、定命论或无法追求的空想。

自由主义是要实现自由的理想主义，故具有自由之一切属性。自由主义的要求也是常变的。英国是自由主义的老家，其自由主义者在已往曾要求工商业的自由来改变以地主为本位的静态，在今日则要求劳苦大众的生存自由来改变以资本家为本位的静态。英国有争自由的历史传统，可是近代英国自由主义的进展，并非只是此一传统之继续，仍有赖于思想家之领导。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力量最发达，因其富有历史的传统，同时也富有思想家的领导。在历史传统较少的国家中，则更有待于思想家之努力，如在法国。历史传统愈少，则有待于思想家之努力者愈多，如在意大利。在任何国家中，自由主义者总是不满足于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所以自由主义者每每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要凭借反对派的岗位来发挥其创造力量。自由主义者固然也能掌握政权，但在其掌握政权以后，仍须时时谋现状之改进；倘与现状妥协，便违反了自由主义的精神，而不再是自由主义者。英国自由党不曾始终坚持其自由主义的精神，因而不能始终发挥其创造力，遂不免丧失其反现状求改进的领导权，可见以自由命名的政党，不一定是贯彻自由主义的政党。现状之维持有赖于干涉，干涉不但阻遏进步，且可造成使用暴力的罪行；自由主义反干涉，尤反使用暴力的罪行，故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命。要完成此种使命，必不免于斗争；在此类斗争中，自由主义者可能暂时

为暴力所打击。斗争失败并非自由主义本身的失败，因此现状尽早要朝着自由主义所指示的途径去改变；唯有放弃斗争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唯有屈服与妥协的态度，才是背叛自由主义的态度。自由主义者须具有不屈服与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始可发挥自由主义的创造力；不能坚持此种精神，不但是自掘坟墓，并且要助长反自由主义的极权政治之自信。日本、俄国和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原非毫无能力，只因自愿屈服、妥协、放弃斗争、以至于投降，故变成了极权政治的帮凶。日本的自由主义者缺乏斗争精神，于是做了军阀的工具。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不曾具有领导改革的力量，于是成了暴力政治的牺牲者。德国自由主义之失败，自由主义者所负的责任更为重大；他们原具有领导改进的勇气与力量，徒以未能坚持其斗争精神，故反而变成了极权政治之真实使徒。他们放弃斗争以后，逐渐为俾斯麦的功业所迷惑，以至于投身于反自由主义的势力之下，俾斯麦固然缢死了自由主义，倘使自由主义者不自愿上其圈套，则自由主义在德国的力量决不会如此薄弱。日、俄、德三国自由主义者失败的情形虽彼此不同，但他们同样犯着一大错误：忽视了自由主义的教育意义。自由主义者可能毕生是失败的，他们之所以能毕竟争得胜利，在于能教育下一代来继续斗争。决心放弃斗争的人，不会考虑到下一代；决心放弃斗争的自由主义者，无异于宣布其已不再是自由主义者。

所谓“进步”，是可能有争论的。可能有人说，反自由主义也是促成进步的力量，日、苏、德就是比较进步的国家。甚至有人说，唯有意志集中的极权政治始可促成进步。从理论上讲，极权政治之目的在于保持现状，它虽可能有所改革，但其改革之目的仍然在于保持现状，故极权政治天然是反进步的。从事实上看，日、苏、德诸国之所谓进步是偏于物质的，其本质非常脆弱。坚甲利兵不能代表历史的进步。日本和德国已经是战败了；我们决不是“以成败论英雄”，早在战前，甚至在第一次大战以前，已有识者指明德日的极权政治必然使德日崩溃。所谓进步，是指人类中有更多的人能增高其文化水准，能自由发挥其创制力，能普遍地感觉到生活的愉快与自由而不受暴力的干涉。根据这个意义来看，则原子能是进步的，而原子弹是反进步的；自由主义所欲追求的进步，不是多多地制造原子弹，而是充分利用原子能来增进人类生活的自由。

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其目的在于促成人类的进步，而限于某一民族

的进步。战争是个阻止进步的力量，所以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战争，尤反对内战。假使说，人类关系演变到非战争不足以消灭反进步力量的时候，这便是自由主义者最感矛盾与苦闷的时候。他们固然要支持此类战争，但他们更有预先消灭造成此类战争之因素的责任。在已往，由于各国自由主义者力量之薄弱及其未能坚持其斗争精神，致使此类战争一再发生。此后，自由主义者必须重视自由主义的世界性，先在各个国家中扑灭其足以造成战争的因素，始可避免支持战争的矛盾。

自由主义既具有世界性，故可深入任何一国，当然也可以深入中国。它的要求既然是依时依地而不同，既然是历史与思想配合的结果，那么，不合国情之说对于它显然是不适用的。自由主义之在中国，事实上至少已有半世纪的历史，半世纪以来，在火药气味所笼罩下的中国之仍能有点进步，便是得力于它。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事实上就是个自由主义的运动。半世纪以来的中国进步分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吻合。不过近年来始有人正式揭举自由主义的旗帜而已。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坚守自由主义的基本条件，假使在不国情情的借口之下来摈弃其某一条件，便不成其为自由主义者。为确定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认识起见，我们不能不将前面已分析过的再来综结一下：自由主义是个创造的力量，因创造而求进步，要进步必须反静态，反静态即反现状，反现状必须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于斗争，斗争的持续有待于教育，斗争可能暂时失败而教育不会失败，唯不妥协的精神始可发挥斗争之教育意义，而达到所当追求的进步。中国自由主义者所能特异之处，只在其所悬的进步之标准而已。根据现状，他们至少要提出下列的标准：停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治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尚宽容以提高文化水准——三者概括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及精神生活，三者缺一便不能构成进步而完全的生活态度，即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

究竟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敢于肯定回答说：唯有不满于现状而欲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此类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所认为“小市民”与“小资产阶级”的人，可是此类讥刺并不足以动摇他们的领导力量。任何当权的政党都说尊重民意；其实，拿枪杆编成的篱笆自始就隔绝了民意。在人民知识不够水准的借口之下，我们始终不曾有过真正的选举，也不曾有过真正的民意测验，又怎能知道民意的向背？在共

产党的统治之下，由于其党之纪律和其干部之幼稚左倾狂，更使民意无从表达。被讥为“小市民”的知识分子，反而与劳苦大众没有多少距离；抗战以来的穷苦生活，更使他们和劳苦大众打成一片。真能了解人民且能代表人民的，只有这批穷苦的知识分子，唯有他们始可根据人民的需要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且愿为此要求而斗争。即使他们不自承是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他们已是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人民知识诚然不够水准，但人民有决定好恶向背的良心；自由主义的进步标准之决定，必须根据此种良心的判断。唯有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始能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准而增强其判断力量，这种教育的功能便是自由主义者所当完成的功能。由此可见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曾构成一个有力的组织而已；反之，自命是“自由分子”的人未必一定就是自由主义者。根据上述诸义，我们只能承认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可能有进步分子，但不能有自由主义者；因为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即欲固着于静态，以干涉的力量来对抗反静态的力量；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若一旦变为自由主义者，即不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纵使今后国民党可能接受自由主义，然而国民党仍然不会是自由主义者，除非他们能不固着于其信仰中所能产生的任何静态。为国民党着想，自由主义者应当是他们所最需要的：在其取得政权以前，由于其能与自由主义者并行合作，所以才构成一个最有力量的反对派；取得政权以后，由于其未能容许自由主义者之并行，顿使国民党失去了一个诤友而逐渐与民众隔离；在今后，果能容许自由主义之存在，自由主义者至少是国民党政权所需要的反对派，国民党必须靠此一反对派之批评，以探求接近民众之道。

中国自由主义者自来是无组织的；他们既不受经典与教条的约束，则见仁见智，彼此大有出入。如何才能将他们结集在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中，是个颇费推敲的问题，而且是若干自由主义者所不愿推敲的问题，因为他们只想以超党派的态度来斗争。“小组织大联合”固不失为一个可能的途径，但目前尚未显出此种迹象，虽然小组织似乎已不少。可是，自由主义者并非一定要凭借组织始能表现其力量；五四运动就不是受某一组织之推动而发生的。自由主义者所赖以斗争的武器是口与笔，所赖以见重于人的是一种不屈不移的坚强人格；果能坚守此人格而不辞口笔之劳，自能表现其力量。自由主

义者可以无组织，但为追求进步之故，却有几个不容忽略的共同之点：

第一，自由主义者如欲畅行其志，当然希望能掌握政权；可是，不能畅行其志的政权，必致举棋不定而搅乱自己的步调。趁机会分享权位，必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始则须降低斗争精神，继而可变成反进步势力的工具，终则自掘坟墓。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原是大有可为的；只因误解了机会主义而破坏了自己的步调，卒被俾斯麦利用做极权政治的工具，做打击天主教士及社会党的武器，最后使自由主义在德国政治上起不了丝毫作用；他们为机会而牺牲了原则，卒至放弃了他们所应负荷之历史的使命。自由主义者要参加实际政权，必须坚持一个最起码的条件：议会能发挥其所应发挥的权力——在人权尚无保障的时期，是否能有把握办到这一着呢？多党训政之说，尚属莫测高深，就原则上讲，却是自由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自由主义的教育意义，是寄托在现实政治的自然演变中；先制好模子再硬把人民塞进去的办法，是自由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办法。根据经验，所谓训政仍然是固着于现状；多党训政可能是一个多党所要固着的现状，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根本冲突的。

其次，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必须掌握政权始可起作用”的观念，是个绝对错误的观念；反之，自由主义者之促成进步，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权，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单就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各国之所以有进步，多半是得力于在野的自由主义者之努力。在中国亦如此，中国近百年中的几度大变革，哪一次不是由于自由主义者的推动呢？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始终不曾掌握政权，然而对于实际政治已起了很大的作用。回顾已往：满清政府之被推翻，北洋军阀之被打倒，抗日战争之能发动与能支持，哪一次不是自由主义者走在前面呢？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划时代的运动，就在于其领导者之不曾掌握政权。目前，在全国人民要真正民主的运动中，自由主义者的责任不但要领导人民，而且要教育人民；唯有以在野的地位，始易于尽到此种责任。中国果能出现一个由人民自由选举而产生的议会，则在政府未能完全接受自由主义的领导以前，自由主义者与其分享政权，还不如形成议会中的反对派之更有力量。

最后，中国的政治果能进步到自由主义者掌握政权的一天，则政权在握的自由主义者千万不能忘本，始可保全自由主义的创造力。自由主义的政治必须有长时间的传统做基础，如在英国；基础不固，则其生命是很不可靠

的，如在意大利。然而意大利的加富尔，却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他掌握着皮尔德蒙——意大利的政权十余年，但他始终不曾忘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议会的反对派一再使他感受困难，政治经验却使他知道议会政治确有若干好处，所以他说：“反对派有时使我不耐烦，使我要竭力来说服他们；继而一想，幸亏有他们，因为他们迫着我把我的主张解释得更明白，使我要加倍努力来获得舆论之赞助。专制的总理只有命令，宪政的总理为着要人服从必须去说服——我愿意说到人家相信我是不错的。”当意大利独立事业将近完成时，有人劝他独裁，他坚决地表示意大利不能因完成独立而牺牲自由；假使意大利要选择一位独裁者，则被选人是加里波的而不是他。他说：“我不能忘本而否认我终生的原则。我是自由之产物，我这一切是得力于自由。假使要在自由像上罩一块布，不当由我来罩。”这些话表现加富尔之可爱，同时也表现真正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之可爱。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一问题，我们已这么答复了。在结束本文之时，我们觉得必须附带地提醒今后的执政者：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由主义。第一，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唯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全静态，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活动在当时是成功的，正因其成功而残害了民族的创造力，致使盛极一时的西班牙几百年来始终停留在落伍的阶段。第四，民族创制力如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更无力量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德国人民即因此而无力阻止第一次大战之发动，在战败的灾难以后仍不能恢复其自信而任希特勒辈来牵着鼻子走，以致要遭受第二次的灾难。德国人民今后需要再教育。假使再教育不能培植其自由主义的力量，不能恢复其人民之自发的创制力，则今后之德国倘非陷于混乱，必不免于再做希特勒辈的工具。自由主义可能是件使执政者感觉头痛的东西，然而，为着保全民族的创制力与自信心，为着促进民族文化，为着消灭暴力，稍有眼光的执政者，必须忍受着这一点点头痛，而容许自由主义之存在。

释“左”与“右”

严仁赓

一

左，右，左倾右倾，向左向右，左翼右翼，左派右派，……这一串名词，任凭您翻开一张当天报纸，一份时事杂志，或是一本政治经济的期刊，随处触目的皆是。茶余酒后聊聊天，人前背后议论议论国家大事世界大势，这许多名词也能随地随时有意无意的进人口。然而究竟“左”为何义，“右”何所指，认真的问起人来，却又言人人殊。我想名词中，人之不求甚解，不加思索，遂即贸然脱口，率尔落笔，揉杂着主观的感情的成分，任凭着一己的意气去使用解释或曲解，恐怕没有再比“左”和“右”为甚的了。

事实上这古怪现象却也不限中国。我们翻读国外的报章杂志，谛聆人家的批评议论，可以发见混乱的情形不比我们清楚多少。甚至在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之下，和在另外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之下，可能还有参差以至全然相反的解释。

二

在中国一般人的观念中，对于“左”和“右”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有一种人，认为“右”派就是正人君子 and 循轨蹈矩的一些人物。于是把左派便比作洪水猛兽的思想，和杀人越货穷凶极恶的暴徒。提起左派，可以吓得语声发颤；提起右派，也可以作出咬牙切齿得之而后甘的神情。“右”与“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善”与“恶”的变名而已。这些人充分中

了宣传的流毒。

另外有一种人，却认为左就是共产党，右就是国民党。于是乎，偏共产党的人如民主同盟一类的人物自然是偏左的；偏国民党的人如民青两党一类的人物自然是偏右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人物因而是左也不右的。在国内，对左右作如是观者，相信占绝大多数。即如《观察》编者征询读者对其所持态度的意见时，便也毫无迟疑的把他的征询对象，全部放在这第二种人里面。

第三种看法，认为左是民主国家，或多党政治，或是政权寄在多数人手里的政体；右是独裁的，极权的，或一党专政的政府。与此平行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左是共产主义和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右是资本主义和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介乎期间，不左不右。

第五种解释认为右是一批满意现状并且想维持现状的人，而左则是一批不满现状而欲打破现状的人。近于此的第六种解释则认为政治上一切缓和的，保守的，或反动的思想或行动是右的，一切前进的，急躁的是左的。

不幸上举常人对于左和右的几个认识和了解，不是仅只抓到左和右的一条腿，就是仅只抓住左和右的一支臂，没有一个了解能够概括全体的意义，能够解释一切的现象，全都是偏狭，笼统，甚至于武断。因为左和右并不能仅以某主义某政党作为代表。关于第一个解释，我已说过受了宣传的流毒，用不着驳它，因为理论和事实，全讲不通。可是这毒中得真也不轻，而且数十年如一日，至今还在为人不停的灌输。第二个解释流行最广，但也是牵强附会的。因为虽说国民党的政策绝对的右倾，但是国民党的政纲尚是相当的左；同时，共产党的行径并非尽左，有时且极右，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间政党，只有模棱两可的政纲，专以斡旋为能事，政策之有所偏，只好说它偏共或偏国，不好说它偏左或偏右。并且左和右还只是主观见解或者行动的两个方向，没有道义观念存在其间，所以观点容或不左不右至多可说是中立的，无所谓公平或否。

名民主国家为左，极权国家为右，或名共产主义国家为左，资本主义国家为右，有一部分的真理。然而如美国这民主国家，却正有不少的人骂她右骂她反动；而苏联这个极权的国家，人民偏又说她是左。同样，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设施诚然是右的，但是我们能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高度的累进

课税和一切的福利设施也是右的吗？很多人批评美国的共和党人为右派，为反动分子。而这些共和党人却又喜欢骂希特勒、墨索里尼、骂佛朗哥、骂二陈为右，为反动。真假难辨，谁是谁非，简直摸不清头脑。总之，左和右是很难拿表面的某种政治制度或某种经济制度作为代表的。

欲保持现状之为右，欲打破现状之为左，若以今日欧陆若干国家的情形，以目今东南亚若干殖民地国家的情形，或以中国的现状而论，诚然不错。大体上，在位者或统治者都想维持现状，一律向右；在野者或被统治者都想打破现状，一律向左。不过这解释也还不能概括一切。例如在位的英国工党政策反而向左，在野的英国保守党政策反而向右。又如美国自罗斯福死后，杜鲁门把老罗手下一批“新政”者（New Dealers）一个个排挤下去，政策倒转头来往保守上走。这虽是他不满于现状而欲改换现状，然而批评他的人说他向右，没有人说他向左。这趋势，去冬共和党抓到议会之后，更为明显。他们处处想打破现状，扫除“新政”，这更不是向左，是大大的右，是走的回头路。

第六种看法在多数场合之下确是可以应用。准此原则而言，则认英国的保守党为右，英国的工党共党为左；认美国的共和党为右，美国的民主党略左；或是认中国的国民党为右，中国的共产党为左，都不能算错。不过，什么叫做保守？怎样才可称为前进？用什么标准或原则可以测度衡量？都还是些没有答案的题目。

这六项解释还有两个共同的缺点：其一，左和右不仅可以解释一国的对内政策，同时它一样可以用来解释一国的对外政策；其二，左和右不仅可以解释政策，同时它一样可以解释思想。

最古怪，尽管六个解释没有一个可以认为恰当，可令我们放心应用，倒是人人竟也毫不在意不加思索的随便使用；尽管人人毫不在意不加思索的随便使用，竟也没有几个人认真的问过自己或旁人，到底左与右的真义何在。

三

丢开以上的六种解释，我来另外替左右两词找出一种新的释义和新的解释原则。这新的释义和解释的原则，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什么主义或什么政党名称也不能代表，是些啰嗦的说明。不过我却希望这新的释义和原则，能

够概括的说明一切社会现象；希望这新的释义和原则，可以用来分析当前或任何时代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而不流于偏颇或笼统。以下我分开：一政治的，二经济的，三对内的，四对外的，一共四项，作为评判一事左右的几项原则：

甲、政治的对内政策

一个政府和它所行的政策，如果承认政治上人人平等，承认人人得以过问政治，批评政治，参加政治，能够尊重所有的人的意见，能够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个样的政府和它行的政策，我们称它是左向的。反过来说，一个政府和它所行的政策，把政治视为少数个人少数民族或一个阶层一个党派的专利，不顾民意，一意孤行，抹杀人民在政治上的权利，这个样的政府和它行的政策，我们称其向右。一种思想，它鼓吹政治大众化，开明化，否认阶级权益，打破地域和种族的偏见，这种思想是政治的左派思想；这种思想见之于行动，就又是左向的运动。相反的，一种思想或运动，认为政治乃少数人之事，以为人皆愚我独智，所以国家应由我来管，或是鼓吹鼓动阶级利益，一党一派利益，某一种族某一地方的利益，所以役人而不欲役于人，这种思想或行动又全都是右向的。

用以上这命义，似乎无意间已把左比为民主政体，把右比为独裁政体，却又不然。因民主政体中仍有右，专制政体也可有左，而且政制和年代并不能拘束它的使用范围。

乙、政治的对外政策

一个国家和她所行的政策，如果把自己和世上所有国家能够同摆在一条水平上，一视同仁，均等机会，破除大小强弱和自尊自卑的观念，许身于增进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幸福，合作共济，促进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在国际之间更肯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一国的政府如此，我们称她为左倾的政府，一国人民具此观念，我们称她的人民左倾。思想如此，是思想的左倾，行动如此，是行动的向左。反之，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她的人民的观念或思想，偏向于只顾本身的利益，不顾他国利益，甚而至于恃强凌弱，卑侮文化国力不如己的国家，或为强划地域，造成对峙局面，以便操纵世界政治，行霸道不讲王道，到处利己损人。类此的政策思想以至行动，统统属于右的下面。

依着这个解释，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一部分的国家主义，民族自决运动，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大同主义，“天下一家”的思想，乌托邦的幻想，世界语运动，以及近年倡行的世界公民运动（World Citizenship Movement），都可说是左倾的。帝国主义，老牌的殖民地政策，国际强权政治，均衡主义，以至国际孤立主义，都可说是右倾的。过去的国际联盟，目今的联合国组织，虽仍不脱强权政治的意味和色彩，也还认为倾左。

丙、经济的对内政策

从经济一方面说，某一政府存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注意到社会上每个阶层的福利，令全国人民的财富和所得一致提高，使人人平均享受生产的果实，用以提高教育的水准，提高消费的质和量，它以消除巨富赤贫，防止人与人间的榨取剥削为己任，不让垄断掠夺现象的存在，这都是由上而下的倾左。如果有些人的思想或行动，注重互利互助（即西人所谓的 mutual advantage and mutual help），注重共存共荣，提倡或促进经济机会之均等，矫正财富所得之不公。这又都是由下而上的倾左。

反之，在位者只替少数人一个阶级一个党或一部分人的经济利益设想，忘掉大众。所行的政策，足以鼓励经济机会以及财富和所得之不均，或足以放纵少数个人吮吸大众的膏血，形成社会上苦乐不均贫富悬殊的现象而不思加以矫正，这是右的表露。人民间，有一部分人，只图本身利益，抹杀大众利益，或是鼓吹既得权益的维持，或是阻挠政府左倾政策的实施，都是右倾的。

对内政策的右倾，近于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十九世纪以后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已慢慢转向。对内政策的左倾，近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不过对内的左与右，范围远较这四个主义和制度为泛，而且远在四个主义和制度成形之前，早已发生。

丁、经济的对外政策

从国际一方面讲，一个国家如果，消极的：提倡经济机会均等，各国间一视同仁，以共存共荣为目的，以国际经济合作为工具，相偕改进国与国间货物的流通，改良货物的运销和互换，以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准，顾及本身利益之外，还处处顾到不损及他人；积极的，以本国的资金原料和技术，尽力帮助生产和实业都落后的国家，提高其生活程度，并在国与国间主持正

义，纠正榨取和利用的行径。这些都是政策向左的表现。思想或行动的走向这个方向，也是思想或行动的左倾。

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消极的只顾本身利害，不顾他人利害；积极的且乘人之危，去侵害别人的权益，遂其一己的欲望。为人救苦救难，还打着沾人便宜的算盘，或是借着自身经济的优势，榨取掠夺，或要求经济特权的让与，或径开发弱小国家的资源引为己用，诸强之间你争我夺或互商分赃，这全是右。关闭政策，经济国家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帝国互惠，经济壁垒经济门户以及经济集团之建立等，均属之。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左和右应用的范围为如何宽广。它的精神，既可以寄在执政者，也可以藏之于民间；既可以产生于国内，也可以发扬于国外；既可以由上而下，也可以由下而上；既可以表现为政治的方略，也可以表现为经济的政策；大可应用于国与国间的关系，小可应用于人与人间的关系；可以寓之于思想，可以见之于行动。从时间上看，左和右更不是近代的产物。可以这样说：从有了政府有了政治的那一天开始，便就有了向左向右的思想和政策。再从大处说，往远里看，还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公私的观念以后，思想中便已有左和右的存在，初不以政治与经济为限。政治和经济的思想和政策不过构成左和右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简单的说，中国的一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包括消极的左；西洋一句成语“己所欲，施于人”（“Do unto others as you wish others do unto you”），可以包括积极的左。“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为也”，是消极的右；然若自己不拔毛，反跑去拔人家的毛，那就是积极的右，更抽象以论之，左和右，不过是人类的处世待人之一态度了。社会上每个人一切行为的动机，全都可以拿左和右来解释。

五

时间的前进，无论对内或对外政策，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大的趋势一律都是向左走的。对内言，国内政治或经济政策牢守于右，足以造成国内的不宁和流血；对外言，国际间政治和经济政策之停留于右，足以造成国

际间的不宁和流血。换句话说，国内政策的左向，是国内和平安定的唯一保证；国际政策的趋左，又是世界和平安定唯一的保证。欲获致并维持一国内外的和平，对内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向左，是它唯一的途径；欲获致并维持世界的和平，对外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向左，也是它唯一的途径。

政治和经济之间，依我个人主观的看法，还觉得经济远较政治为重要。偷盗抢劫杀人越货凶殴暴动革命流血，社会上一切的动乱不宁，起因多一半是经济的。国际间的战争，多一半也不是纯由于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经济的原因作为导火线，已为大家公认。若干历史学者甚至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历史上国与国间若干次的战争，也都推源于经济。一国政府压榨盘剥，不让人民活下去，人民会得叛乱；同样，断绝一个国家的生机，她也会动起手来打人。分赃不均，你抢我夺，又往往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

许多人又说，有了政治的自由，才能获得经济的自由；没有政治自由，如果躐等以求经济的自由，这种经济自由往往落空，既得之也不能持久。这个说法，事实上并没有根据。从历史上看，民权运动往往是由崛起的中产阶级发动，为自身的经济权益去找保障。民权发展之后，资本主义随以勃兴，这趋势，政治上说来，是趋左的；而经济方面看上去，本质没有大变，财富偏在尤甚，还是向右的。就拿真正的民主国家来说，政治自由开放了几百年，果真经济的自由得到实现，则劳资关系的对立与矛盾，财富分配之不均现象，应该早就泯灭无遗了。实际上没有。

九月三日 杭州

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

李孝友

读了《观察》三卷十期杨人榭先生的《关于中共往何处去》一文，一方面感到杨先生的若干论点我们不能完全同意，一方面又觉得杨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须要加以阐发与引申。本来杨先生那封信的目的只是在说明文章不能交卷的原因，但附带的谈到了自由主义者在目前对于中共应取的态度问题。杨先生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原是有距离的，自由主义者彼此见解既不相同，此距离之长度亦因之而不同，其中有同情中共者，有反对中共者……”综观全文，杨先生似乎以倾向后者自居；目前他之所以保留批评者，乃恐被人曲解作为“帮闲”的工具。本文的目的即在度量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中间的一般距离，并讨论在中国此距离是否可以缩短至最小可能。

自由主义是一种人生观，是对于社会的一种态度，因其所处之社会背景与时代背景之不同，其态度与特性因之而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任何时代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基于个性的自觉和价值 and 企求个性得到完美的自由发展为出发的。所以对于任何抑压个性的社会制度，自由主义者必挺身反对。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敢于反抗权威的叛逆精神，在整个人类进化史上有着极其辉煌的伟绩。古希腊雅典的自由主义者曾两度反抗贵族与财阀的专制，促成梭伦（Solon）与克利西尼（Cleisthenes）先后的改革。中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更揭起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两面光辉的大旗。研究过近世史的人，更可以从洛克、卢梭、伏尔太、潘恩……这一串响亮的名字里，看出其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自由主义之渊源甚长，我们不必从希腊诡辩学派（Sophist）主张“人是万物尺度”的毕达哥拉斯（Protagoras）一一算起，因为对于后世，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深厚广博的影响的是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大体分为两派：一是以法国卢梭为创始者的天赋人权论者，一是以英国亚当·斯密斯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前者激起了波澜壮阔的近世民主洪流，后者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进展和成熟。亚当·斯密斯的学说，因资本主义的春蚕丝尽与弊端百出而受到了扬弃。但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至今仍光芒四射，深入人心。

本来整个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为了个人人格完美的发展进而追求每个人人格都能完美的发展的打抱不平精神，所以每当一个社会制度僵化，妨碍了多数人生存的时候，自由主义者辄吹起了改革的号角。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每一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恒身为先驱，与新兴的改革势力站在一起。但到十九世纪的末期及二十世纪以来，共产主义的思潮奔腾澎湃。人们除了要求选票以外，又有要求足够的面包的呼声，使自由主义者开始处于最尴尬的局面。

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我们不妨用恩格斯在一八八三年马克思葬埋时所发表的演说作为最简短的注释：“马克思发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人类有了衣食住行以后，才能对政治发生兴趣；这就是说：那种直接维持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是政治制度及法律关系的基础。”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中描写出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攫取生产工具之后，商品的生产就宣告结束。生产产品就不受生产者的操纵，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被有意识的计划组织所代替。个人竞争生存时代的阶段从此即告结束。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才得最后脱离了禽兽生存的世界，而进入真正的人类世界……”但是如何达到这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呢？《共产主义宣言》上说得明白：残酷的阶级斗争与流血革命之后，再继以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虽说毫无悖于自由主义者的公道正义精神，但对于其手段的粗暴，自由主义者似乎是不能容忍的。出身中产阶级有着温饱生活的自由主义者，不能了解无产阶级，正如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不能了解一群饥寒交迫的囚徒为什么要用暴力冲出牢狱的铁门一样。

自由主义者对于一切事物态度，固然是出于个性的自觉，但这种个性的

自觉却具有双重的特性。一方面具有个人功利性，一方面又具有社会性与正义性。基于前者，所以自由主义者对于极权主义富于干涉性的共产主义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的改观与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能同意；基于后者，每一个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目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罪恶又不能不对这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一群，寄以深湛的同情。这时造成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与“平等”的歧途上选择的彷徨，而另一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在开始殚精竭虑的探讨二者是否有协调的可能。这些自由主义者以“不虞匮乏的自由”，更具体的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内容，同时努力进行一种抑强扶弱的渐进的阶级水平运动。这是世界上整个自由主义者的趋势；英国工党的执政便是这种趋势的最显明的象征。同时西欧国家中如法比等的共产党接受了议会政体，取决于选票的多寡。法共领袖多列士更坦白的说：“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只莫斯科一条”。这似乎是证明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矛盾，有协调之可能。

什么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与使命呢？正如以上所述，自由主义是对社会的一种态度，自然随社会的变迁而易其形态。如果脱离中国空间与时间的背景，未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而欲论列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与使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的社会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去年贺昌群教授于《大公报》上《中国政治社会的大矛盾》一文中阐述甚详）此已为不争之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使命就是摧毁这个封建的社会，完成一世纪以前法兰西自由主义者所完成的相同的工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确也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属于小市民阶层与知识分子，但其中坚力量组织比较严密的，表现比较凸出的仍然是青年学生。所以我们不妨将从提出科学与民主的“五四”运动起，到“五二〇”的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止这一段的学运，视为自由主义的要求改革现状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三十多年过去了，固然这种运动对社会对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本质，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却未能动其毫末。这不能说不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自由主义者温和的甘草二花失效之余，中国共产党遂乘机投之以猛烈的虎狼之剂。而这剂“革命”之药，却已使整个的封建势力战栗不已。

在这里我们不免要检讨以往自由主义者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者未能伸根于广大的人民、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中去；仅仅是斤斤于注意个人

的自由，而忽略了多数人的福利。更未能根本了解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的觉醒与土地的改革。唯有农民觉醒与土地改革后，封建势力始能无所附丽。土地改革虽然不是摧毁封建社会的充分条件，但是它是必要条件。

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遭遇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受全世界的两大潮流“自由”“平等”的激荡，一方面中国又有着特殊的国情。历史所交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一是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一个工作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并非格格不入，但后一个工作则二者见解悬殊，互异其趣。这便是自由主义者苦恼的渊源。杨先生所谓自由主义始终不能接受共产主义是事实，但谓二者无法妥协则似乎未免言之过早。

我所谓之“妥协”是指促使中共造成承认异己尊重异己的民主风度，与发扬个性冲淡党性的温和气氛。但这种“促使”工作的进行是须要真正的和平到来以后。大半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中共，我相信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者善意的批评，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有这种希望，同时也应当有这种信心。如果说仅仅是为了中共对个人自由有“威胁”的可能，而像杨先生所说，“某些自由分子嚷着要消灭中共”，准备与腐朽的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最多也不过使历史倒退几十年罢了，但是历史决不可能倒退的。在目前与其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始能显自由主义者的面目，不如说自由主义与封建社会对立更能显露其特性与使命。虽然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须要对立，但须要在二者共同的“敌人”封建社会摧毁或却步以后，这种对立始有可能。

但是事实上，正像杨先生所说，每一个自由主义者无法赞同内战。因为内战的本身所造成全民破产的后果，及炮火所刻画出来的那幅凄惨绝伦的图画，使每一个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忍受。虽然一方面为了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由“动员”而“戡乱”，但整个的政治却已病人膏肓，已到非变不可的阶段。然而国脉民命，悬于一丝。如果“中共具有终止或缩短内战的权力”，我们不能不诚恳的期望中共的领袖念人民痛苦之日增，及本身干部因革命而牺牲的惨重，善于运用此一权力，在适当时期，重新回到政协的轨道里来！当前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期望于中共的，就是在摧毁中国封建社会的共同工作上，不到最后绝望关头，不必诉诸武力。

我们对于争取学术独立的意见

国立中山大学研究所同学会

国立中央大学研究所同学会

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同学会

国立武汉大学研究所同学会

国立浙江大学研究所同学会

国立清华大学研究所同学会

国立复旦大学研究所同学会

自从胡适之先生《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发表以后，沉寂已久的中国教育界，一时掀起了新的波澜，尽管学者名流的意见侧重各有不同，而要求学术独立的意见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在战云弥漫的局面中，真是可喜的现象。我们撇开地区学校的争辩不谈，有两个一般同意的原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第一，学术独立最主要的条件，是国内有设备完善的研究机关，和从事专门研究的人才，今后我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提高国内学术研究的风气。第二，建设国内的研究院与留学政策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学术原来没有什么国界，主张留学的人并非就认定中国学术永远委为外国的附庸；而反对留学的人也不是说中国可以关闭孤立，固步自封，舆论所一致责难的只是今日教育当局所奉行的留学政策，以留学为训练高级人材的不二法门，不但失诸偏废，而且又漫无目标，殊非明智的措施。

我们并不反对有计划的派遣留学生。但是，既谈学术独立，要使中国学术从接受与批评的地位，走向独立创造的途径，则其根本就在建设国内大学的研究院，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相信，如果国内教育制度不加改良，如果

国内大学研究院的设备不予充实，则中国纵有千万留学生，还是无法达到学术独立的目的。中国派遣留学生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以数额而论，简直可以称雄世界；但学术落后，却依然如故，此中原因虽多，而教育当局的无计划无目标，是难辞其咎的。只知道迷信外国大学，而对国内大学研究院所从不作积极的建设，使之名存实亡；所谓提高学术研究，不外是欺骗国人的口号而已！显然的，国内如无设备充实制度完善的研究院，使留学归国的专家能继续研究工作，他们在外国学来的知识，最多只有几年新鲜，不久便又落伍了。这不但是学者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要提高学术研究的风气，达到学术独立的目的，首须有合理的研究制度，完善的研究设备。其次须使研究人员的生活，能有切实的保障。如果这两个最起码的条件办不到，徒托空言，究与实际无补。我们都是国立大学的研究生，深知目前研究所制度，离上述的标准太远。我们身受政府扼杀学术之痛，尤不顾国运所系的研究机关，任令因循敷衍，未成先毁。特将各大学研究所现况，作一忠实的报导，并提出几点建议，盼与社会人士共同研讨，为抢救学术而努力。

三十五年十二月间教部明令废止《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另订《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经过这次改制，从此研究所附属于大学院系中，便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了。现在研究所经费每学期不过五百万至一千四百万元，除了购买信封信纸而外，就只好订几份报纸，什么参考室实验室，是既空洞又凄凉。研究生想钻研专题，几致无从着手，这种现象是绝对不许继续存在的。我们希望政府立即指拨巨款，有计划的添置研究设备，并聘请国内外名学者为专任指导教授，然后研究的效率，才有增进的可能。

现在一般人都在谈重点教育问题，认为先要集中国家力量培植几个第一流大学。但是因此又引起了地区学校之争，而选择的标准也很难确定，其实，学术独立计划既以发展研究院为中心，则重点教育的争论自可迎刃而解。现教育部核准设立的研究所都在一般认为师资设备，各项条件均较优良的大学中，研究所的数量并不多，只要有适当的经费，便可建立合乎标准的规模，而且在现行制度下，研究所与院系的关系本极密切；因此，所的发展也就是院系的发展，二者相互配合，普遍的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准，第一流大学自然由此产生。集中国家力量建设研究院，可说是一条排难解纷，不偏不

倚的途径，而时下名流却斤斤于地区学校之争，很少想到这个办法，我们深引为憾。

其次，谈到我们的生活，真是每况愈下，战前各大学研究生的生活补助费，每月自四十元至六十元不等，相当于助教薪津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借之可以安定生活专心研究，这个合理的制度行之有年，深为各方所推许，不幸自抗战发生以后因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助教薪津随公教人员待遇调整而增加，而研究生的补助费因教部向持不闻不问态度，迄未作合理的调整，遂令良好的制度，完全破坏。试以南京为例，三十六年五月间助教待遇已提高到四十余万元时，研究生除领有公费外，仅得补助费五千元；十二月间助教待遇全部约合二百一十万元，而研究生的补助费仅二万元，加上公费折合现金不过二十万元，还不及十分之一，后经研究生代表一再请愿，生活补助费始渐由十万元增至二十万元，然与往日实得助教待遇四分之三的比率，仍相差太远，如此类似讽刺的增加补助费要想侈说安定生活，简直是痴人说梦了。

中国学术落后，政府应如何奖学崇才，转移风气，自不待论，今日中产之家多濒破产，有志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非有政府的特别奖掖，实难专心研究，不幸政府的措施，却恰好相反。补助费徒具虚名，研究所空无一物，研究生历次请求改善，教部总是拿经费困难搪塞。但是，据调查所得，三十五年度，教部登记之公自费留学生，总数达四〇二三人。自费留学生每年照官价一万二千元结汇美金一八〇〇元，若按目前牌价八〇五一〇元计算两种汇价之差额，每一自费留学生实得政府补助费一亿余元，公费生全部津贴则约达二亿元。回观国内研究生每年仅得政府补助四百万元，相去不啻天壤。舆论中有主张完全移用这笔外汇津贴建设国内研究院的，所论虽嫌极端，殆亦有感而发，政府愿以巨额外汇津贴留学生，而对国内研究生（总数不过三百人）竟刻薄如此，我们真不知道这种贱内贵外，本末颠倒的措施，是由于苟且敷衍？还是出自私人的偏见？古人说：“政者正也”，为政就怕不公平，就怕存私见，任何漂亮话，掩不住天下人的耳目。我们不敢有过高的要求，我们的要求只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制度的建立。

默察今日舆论，我们在最近两年来的呼吁已深得社会的同情，即胜利前国民参政会及高等教育会议，均有充实研究设备改善研究生待遇的决议。教

育部视同具文，始终未见实行；而我们屡次向教育部请愿所得结果总是推、拖、骗。教育是国家百年大计，而学术与国运同盛衰，我们迫切希望教育当局能改弦易辙、尊重舆论，争取学术独立的主张，迅速拟定具体办法，建立合理的研究制度，发展研究院，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研究生的生活。政府是否重视学术，这是一个最好的考验。我们尤其希望社会人士，能予热烈支持，使国内学术研究的幼芽，不致半途夭折！

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

施复亮

最近香港方面的一些左倾朋友对于我所主张的“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又加以任意的曲解和“不停地抨击”，但我还是保持缄默的态度。原因正如杨人榘先生所说：“在这力量强弱之争代表了理论是非之争之时，就是不信赖强力而只看重理论的言论，也宜暂时保留为好；否则，理论一经曲解，便容易被利用为助长内战的工具”。（《观察》三卷十期杨人榘：《关于中共往何处去？》）

然而正如杨先生所说：“我们要活，同时也想到一切的人要活，我们不能缄默，我们要在两面不讨好的情况之下来争取和平”。（同上文）人人“要活”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怎样才能活得成？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严正考虑和答复的问题。

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一问题的答复是“戡乱”，中共对于它的答复是“革命”；因此，它们双方的道路都很明显，而且形成强烈的对照，绝无被人误认的危险。假定说道路只有这两条，那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被迫选择一条。

可是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答复，似乎并不那么简单，似乎还不想作一决定性的选择。最近杨人榘先生的《关于中共往何处去？》李孝友先生的《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观察》三卷十九期），《大公报》一月八日的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以及其他许多同性质的论文（例如最近樊弘先生与张东荪、梁漱溟两先生在《观察》上所讨论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也牵涉到这一点），都是这种心理的表现。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那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

假使他无法阻止内战，至少不应助长内战”。（杨先生语）

在这内战已经全面化和持久化的局势之下，自由主义者还应不应该有自己的道路？能不能走自己的道路？我个人认为应该有自己的道路，而且能够走这条道路。

说到这里，首先我们要了解何谓“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关于这一问题，杨人榘先生在他的《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观察》二卷十一期）一文里有过很好的说明。他说：“自由主义是个创造的力量，因创造而求进步，要进步必须反静态，反静态即反现状，反现状必须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于斗争，斗争的持续有待于教育，斗争可能暂时失败而教育不会失败，唯不妥协的精神始可发挥斗争之教育意义，而达到所当追求的进行。……根据现状，他们至少要提出下列的标准：停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治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尚宽容以提高文化水准。”“唯有不满于现状而欲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换句话说，今日中国的“现状”是违反上述的三个进步标准的，“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以‘不妥协的精神’跟这种反‘进步’的‘现状’‘斗争’”。这就是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这种道路，不但需要，而且可能；因为它是“根据现状”的，而“现状是综合已往历史的结果，根据现状就是根据历史”。（杨先生语）

从表面上看，今天在国际上有“美苏对立”，在国内有“国共对立”，好像“非此即彼”，再没有别的道路。自由主义者倘若要在这两条道路以外，走一条自己所愿意走的道路，那就要难免被人斥为“空想”，“梦呓”或“逃避现实”。这在某一定的具体条件之下自然是对立的，但不能说在任何时间和空间都可以适用。在复杂的阶级社会，即使同属被压迫的阶级，其政治要求和斗争方式也不一定完全相同；两个目标相同的政治集团，其采取的政治路线也不一定完全相同。这是政治史上和革命史上的常识，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假使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个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那末自由主义者自然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疑。可是从当前国际和国内的情势看来，上述的第一个前途固然绝无实现的机会，而第二个前途也还很少有实现的可能；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实现的前途，恐怕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

资本主义的经济。这正是“今日中国自由主义者”所要走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的实现，自由主义者要负极大的责任。只要自由主义者坚决地向着这条道路走去，我相信今天讥评或抨击自由主义的人，明天必然会改变他的态度。

不错，内战是残酷的现实，自由主义者必须正视并应付这种现实。无论如何，自由主义者决不应支持这种内战，必须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设法结束或缩短这个内战。在这一点，必须“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大公报》语）一个人是否配称为自由主义者，这是一个最好的考验。

然而事实上，内战并不因自由主义者的反对而终止，甚至有些自由主义者被迫去参加内战的一方。这也是自由主义者被人讥评的一个原因。可是我们要知道：假使大多数人民厌恶内战，反对内战，则自由主义者所号召的反战主张，迟早会获得多数人民的支持，会变成一种终止战争的伟大力量。自由主义者要有这种信念，也要有这种勇气。

自由主义者自己所走的道路，不但不排斥别人同路，而且极端欢迎别人同路。自由主义者必须认识自己所走的道路，只有获得广大人民的同意和支持，才能完全实现。因此，自由主义者必须跟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分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样，自由主义者的目光才会看到多数人的自由，不止看到少数人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必须以自由的性质、种类、范围，以及获得自由的人数的多寡，来衡量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自由程度。在国共两党统治之下，哪一个区域自由比较多些或者更不自由些，也要拿这种标准来衡量。自由主义者不但不能满意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现状”，也一样不能满意共产党统治区域的“现状”。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也要有勇气争取“自由”；但他所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

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之下，自由主义者也许永远不能掌握政权，甚至不一定能参加政权。“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不一定是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尤其如此。自由主义者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气度，只须努力耕耘，不必希

望收获一定属于自己。自由主义者应当努力促成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实现，但不一定要在自己手里实现，自由主义者所应争的是实际的工作，不是表面的功绩。因此，不能以夺取政权或参加政权与否来判定自由主义者的成败。

自由主义者往往过分高估知识或理性的作用，重视“理论是非之争”，轻视“力量强弱之争”。这也许就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原来政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两句话，的确道破了政治上的秘密。昨天的“王”，可能变成今天的“寇”；今天的“寇”，也可能变成明天的“王”。古今中外的全部政治史，都证明这一点。今天被人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过去被满清政府诬称为“寇”或“匪”的一人。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自由主义者不是不知道，不过总不大愿意这样做，又不大愿意跟别人去做“力量强弱之争”。这在政治上虽然是自由主义者的弱点，但在教育上未始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优点。现在是人民逐渐觉醒而且逐渐获得解放的时代，“力量强弱之争”必然要与“理论是非之争”连结在一起，而且“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是”的“理论”迟早会变成一种“强”的“力量”。假使现在“力量”“强”的一方站在“非”的方面，终有一天会被那“是”而“弱”的一方所打倒。假使斗争双方都站在“非”的方面，纵令今天它们都异常强大，也会有一天被一个新的“是”的方面所战胜，近代历史的发展，早已证明这一个真理。所以认识或理性，在近代政治斗争中，依然有它不可轻视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应当善尽这一个作用，帮助“是”的一方，打击“非”的一方。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看来，获得自由的人数的多寡和自由的实际内容（从人身自由起到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止）是判断“是非”的最好标准。标准应当客观，不可由个人任意规定。

统治者剥夺或侵害人民的自由，自由主义者便要毅然决然地站起来反对统治者，为人民争取自由，所以在人民的政权不曾建立起来或人民的自由不曾获得切实保障以前，自由主义者必然要跟广大人民站在一条阵线上去反对统治者。自由主义者多半希望采用渐进的改良的方法去求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但当他发见了统治者顽固反动，绝无改良希望的时候，他也会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法国革命和辛亥革命的历史，都是最好的证明。孙中山先生在上书李鸿章不见反应以后才决心投身革命，也是一个最好

的证明。这样的事实，不仅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即在眼前也到处可以遇见。自由主义者固然希望避免流血的革命，但他更痛恨顽固的反动。革命是反动的结果，不是反动的原因，假使要反对结果，首先要消灭原因。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即使不去参加或同情革命，至少也不应当站在反动方面去反对革命——即反对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争取自由的人民。

自由主义者始终要求进步，不断从变革现状中求取进步。进步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没有进步，就没有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由”，只有在进步的环境中才能实现。所谓“进步”，就是更多的人民获得更多的“自由”。反动派侵害人民的自由，也即阻碍社会或国家的进步。所以自由主义者要反对反动派。革命虽然要流血，为自由主义者所不欢迎；但它可能产生进步，也就不应为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决不可因为害怕明天可能遇到的个人的某些不自由而就容忍或助长今天多数人民所身受的种种不自由。假使明天得到自由的人多于今天，也就是一种进步。追求这种自由的力量，也就是一种进步。追求这种自由的力量，就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这种进步的力量，也许比自由主义者更进步，其斗争的方法也许非自由主义者所能赞同，但也不可加以敌视。杨人榘先生说：“进步的力量不应彼此抵消。……假使进步的力量彼此抵消，便只有使在困难中的中国，永远停留在现阶段而无法逃出困难。”（《观察》三卷十期）我很同意他这种看法和态度。团结进步的力量，联合进步的力量，推动中国走上进步的道路，这应该是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我们常常听见人说：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人民固然没有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民也不见得自由，甚至更不自由。或者有人说：国民党固然不肯给我们自由，共产党也不见得肯给我们自由。二十多年来，我所居的都是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其实际的情形我是知道的。至于中共统治区域的实际情形，因为一则我没有到过，二则反共的宣传我不敢相信，三则共方的报导似乎又说得太好，而且我所能看到的也不多，所以无从完全了解，也就无从作一客观的评判。不过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两点：第一，中国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我们不可用完全欧美政党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这两个政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当前的事实。第二，在内战时期，尤其在战争区域，为了军事的目

的，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也不会真正的实现民主。在这时期，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要实现真的广泛的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的各种自由，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恢复以后。

自由和民主，是要人民自己用力量去争取的，不是任何人所能恩赐的。老实说，不仅国民党不能赐给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就是共产党也不能赐给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只有到了一国的政权真正被掌握在多数人民的手里，由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国的政策，才算真正实现了民主，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永远跟人民站在一道，也就能够跟人民一同争取并保障自由和民主。自由主义者倘若能够跟广大的人民共同争取自由和民主，能够在民主运动中表现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也就必然能够保障自己和广大人民的自由。我以为保障人民的自由要靠人民自己，保障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也要靠自由主义者自己。而且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要是用来保障广大人民的自由的，不仅是用来保障自己的自由的，倘使自由主义者能够这样来利用自己的自由，那就一定能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争取自由的正确道路。

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这是第三种力量，也是一种民主力量。这一力量的动向。对于中国前途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正是这一力量所要求的前途，也是自由主义者所应走的道路。自由主义者必须首先认清自己的道路，然后才能根据这个来衡量国共两党的道路，知道谁跟自己接近，谁跟自己相背。我之一再说明中间派应有自己的政治路线，也就是这种意思。这样的一种政治路线，当然是一种民主路线，决不能被曲解为站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或以外的一种政治路线。

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主义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

自由主义者不相信“路只有一条”，他相信有他自己的道路。一个自由主义者，只要他肯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的中间，始终“反静态”，“反现状”，“反干涉”，“求进步”，求“创造”，跟特权者（即压迫者）“斗争”，我相信必然会有他光明的前途；即使因此而被牺牲了性命，也会获得他应有的代价。

只要自己的道路是正确，便不妨坚定地勇敢地走向自己的道路！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张东荪

近来大家对于自由主义大感兴趣，都来作热烈的讨论。我惭愧的很，《大公报》上有几篇文章未曾拜读，因为近来已不订阅《大公报》了。杂志与日报都很有好文章；只可惜现在的人财力有限，实难遍购。所以我所见到的大都是赠阅的。我的见闻虽有限，然而在直觉上似乎自由主义已成目前争论中问题的焦点了。就我个人论，在拙书中虽再三强调主张自由在文化与政治上之重要，但却从未自居为自由主义者。因为在我看来，自由与自由主义在涵义上不是完全相同。其他别种主义者亦并没有否定自由，甚且亦很强调自由之重要，但却不称其主义为自由主义。可见自由与自由主义，这两个名词并不完全相同。根据这一点，我现在亦来凑热闹一讨论自由主义。恕我先把自由主义分为两种：即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我并不是主张两者绝不相关联，不过在看法上我们确应得有些区别。

我向来写文章喜欢先把结论列在上头，然后再加以说明。现在我亦用这个方式。关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我的结论是如下：

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今天廿世纪已是过去了。

在上文已说过，自由主义与自由并非一件事，则我们当知现在说政治的自由主义已成过去却丝毫不含有否定自由的意思在内。所谓政治的自由主义就是单纯的自由主义，亦可以称之为旧式的自由主义。这种主张如在中国求其实例，则莫适当于民初的宪政论。民初时代的政治意识大家或许不会完全忘却，似乎不劳我在此短文中详举。这种民国初年的宪政主义决不足为今天战后立国与建设之方针。梁漱溟先生那篇文章的要点为我所同意的就在于他

能毅然揭穿这个缘故，说明宪政主义式的自由主义不足为今后立国建国之依据，至于他还有正面文章，说到中国文化的特质，那是他个人的见解，与我完全不相干。我们必须承认他在消极方面说穿民初的宪政主义在今天又复活起来是不行的，这一点确有价值。我为文表示共鸣亦只注重在这一方面。我把选举与飞机铁路视为同样的例证。同是西方文化上的好东西，一到中国来便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我却并没有主张不要这些东西进来。我只说明其故不在这些东西本身而在于中国有个压迫人民的统治上特殊势力。倘这些东西一进来而不为这样的特殊势力所独占，则依然是好东西。据有人告诉我有某大学教授看了我那篇文章，立刻作文反驳，说飞机铁路不可反对。好像在今天的中国知道西方文化之重要的只有该文作者一个；好像用复古的罪名就可轻轻把替人民诉苦的呼声抵消。立言虽巧，总不免有替特殊势力维护的痕迹的嫌疑。我起初颇相信自由主义总不致有何流弊；乃近来愈看所谓自由主义者（即自称自由主义者）的行为，使我不得不承认这其中确有一点儿问题。

原来自由主义是欧洲十八世纪几个学者所提倡的一些原理原则。这些原理原则用之于文化，用之于政治，遂形成现在的西方民主国家。这种自由主义之要点在于建立个人价值，成为个人主义的文化（其详我另有一文已投《中国建设》月刊），个人主义在于养成个人的责任心与自尊心，在原则上绝对与平等无冲突。须知从封建社会把个人解放出来却非用这种个人主义不可。所以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从历史上看，乃是一件空前的功劳。其价值真可谓与日月同光。所不幸的只在于后来由经济方面发生了漏洞。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盛行时，在经济方面当然是放任。须知放任政策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确有功劳。因为能够助长生产，使资本主义得以形成。而初期的资本主义又确能增加财富，不会引起人们的反对。不料就因为这个放任经济的缘故遂致资本主义长成了，资本主义愈长愈大，其弊乃见。对内愈见贫富不均；对外愈趋于侵略。政治离不了经济；经济或反为政治的主干。于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就为放任的经济之故，演至今天，已百孔千疮了。

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在推车撞壁之时，而谓中国犹能如西方在十八世纪时一样，实行政治的自由主义，岂非太不了解时代么？所以我说自由主义如专就政治方面（经济当然包括在内）来讲，已是过去了。我常说中国是错过

了文化阶段。假定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实行宪政，提倡这样单纯的自由主义，实在是太好了。事实既不然，则我们便应另有打算。但须知我并不是以为自由主义不好，乃只是说仅这个还是不够。现在西方人们有些提倡自由的社会主义；有些提倡社会的民主主义，足见单纯的自由主义已经不够了。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关于政治的自由主义似乎不必多说，请即接着来讲文化的自由主义。讲完以后，再将二者联合在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文化的自由主义，我亦愿先提出结论如下：

文化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学术思想的生命线。中国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进一步要对于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更不能不特别注重这个自由。

所谓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却和政治的自由主义很有不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可以形成一个党，或名为自由党，或名为民主党。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何种学说或思想，只要由严格的逻辑推出，有充分的事实为证据，换言之，是由于科学方法而成，则可为文化的自由主义者所承认。现在大学中只讲正统派的思想而置其他思想于不顾，这不是文化的自由主义之精神。反之，假定推翻了现行制度，而如果对于正统各种思想加以摒弃，这依然违反了文化自由。所以文化的自由只是一个批评的精神与一个容忍的态度。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不可以批评。牛顿的定律在五十年前是金科玉律；倘若阻止人们对之有所怀疑，则相对论便无由发明了。今天相对论修改牛顿，正是文化自由的灿烂成果。同时，亦没有一个学说或思想不可以容忍。只要言之成理都应得加以承认。总之，在文化自由上根本不能有“邪说”，亦不能有“一尊”。只有研究的所得而无开始的信仰。无一前提不可转为研究的对象。这样的精神确是西方文化在人类上的唯一优点。中国在未与西方文化接触以前就没有这个优点。现在既与西方文化接触了，虽然有些传染，但终嫌尚未十分接受。今后中国如果要想在文化上立足则非大大向这一方面推进不可。

于是我们应得合并在一起讨论了。现在的论坛上总是争论什么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之关系；有的说二者有冲突；有的说二者本相一致。在我看来，都没有鞭辟近里。他们只用自由与平等二个范畴。殊不知还有第三个范畴，

是“生产”，却必须加入在内。无论如何讲自由，讲平等，若与生产发生冲突，换言之，即使生产反而降低，则决不能成功。而况在现在正值大战以后，各国都有迅速增加生产之要求。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中国决不能例外。所以在自由与平等的打算中必须把生产列为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这不仅现在为然；历史亦给我们以教训。欧洲近百余年以来社会主义的实验不止一次，或用革命的方法，或用立法的方式，凡读历史者当可知之。我们可以说百余年来欧洲社会主义的排演是一部悲惨的历史。这个悲惨经验所给人们的教训是：凡社会改革（或革命）而能使生产增长的就能站得住；反之，使生产降低则必会被反革命所推翻。苏联的经过尤为显明：革命之初的战时共产制就因为不能满足增产的要求以致维持不下去了，乃不得不改为新经济政策。如新经济政策永久下去，则革命虽成而社会主义却失败了。幸而有计划经济。可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换言之，即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乃得到新的生路。须知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资本主义亦可有计划经济。法西斯亦有计划经济。可见不是所有的计划经济都是进步的。对于经济加以计划要看用什么原则去计划。资本主义的后期亦在那里讲计划，但却依然用着资本主义的原则。所有必须用社会主义为原则以作计划方能成为进步的计划经济。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之贡献。苏联的成功即在于使增产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已往社会主义种种试验都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只注重于平等而忘了生产的重要。

中国今后必须采用计划经济，恐怕已为大家所公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大量增产。但为了增产必须先排除其障碍。官僚资本，豪门资本，是障碍之一。地主与放高利贷的是障碍之一。所以废除这些，不完全是从平等着眼。如果专从平等来看而忘了增产上的需要，这是错误的。尤其是在产业落后的国家，不把这些封建残余势力去掉是无法使产业发达的。（不过中国还有一个特别情形：即除上述两种人以外尚有一种人，即流氓是也。普通所谓无产者是指无财产而从事于生产之人，如佃农与雇工之类。中国的流氓确是无产者，但却不从事于生产，以敲诈为生。这种人只要求在享用上得平等。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所以如果不把这种人加以改变，其为增产之障碍亦与上述者相同。因为本文不在讨论这些问题，故只在括弧中附带言之。）至于

如何制定计划务使在其中保存尽量自由与相当的平等，那是制定者的事，非本文所能详论。

说到此，我们便见到问题的中心了。为了生产既须用计划经济，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等等。所以，就因为经济的计划性必须把全社会亦成为有计划性的。我们为便利起见，可称之为计划的社会。在这样的计划社会中，试问自由有无限制，平等是否损害？我以为论者们主张经济平等必使政治自由有亏，固然是只知二五不知一十之言，但说经济平等了以后自由更可增加，亦非探本之论。老实说，一谈计划，如社会有计划性，则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计划是以增加生产，使全体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为目的的，则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论者以为自由平等本身有问题是错误的；须知问题只在产业不发达的民族必须把生产加入于自由平等之中。一班刊物上有流行的说法，说什么英美有政治的民主而无经济的民主，苏联有经济的民主而无政治的民主，都由于不明白这个情形。还有人说中国应该二者都要。其实这只是一句漂亮话，根本没有用过一番分析工夫。

根据上述的话，应知自由在今后的中国确有问題。平等更然。我希望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不要看得太简单。我对于这个问题却有一个答案。我尝说，就人类言，最理想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个人主义的陶养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可惜世界上没有那么一回事。我又尝说，中国没有经过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养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现在不必说这些空话。就实际来说，中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当然无法追究既往，亦没有法子倒退。不过亦未必是丝毫无办法。现在用一个不十分切合的比喻。譬如入大学最好是中学毕业。无如有一个人，中学未毕业，而现在竟在大学中勉强读书了。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他把大学的功课少选一些，留下一点儿时间来补习中学的必修科目。我用此比喻来说明中国今后的情势。中国为了增产必须采用计划经济，尤其必须采取进步的计划经济，但经济方面一有计划势必不能让其他方面仍留为无政府状态的绝对自由。就中以教育一项而论，就不能不大加改变以与计划相配合。政治经济教育等全体如有了计划性，则我们今天放任惯了的人必会感到很不便。这一点恐怕我们在心理上应得准备

自愿牺牲一些不入格的自由方好。这即是我用大学功课来作比喻的。至于补习中学一说，即是我所说的文化上绝对自由。须知在计划社会中政治经济等是没有绝对自由了，但我们还不能不要绝对的自由。这个绝对的自由应该在文化与思想方面。如果社会因具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边。老实说，社会的计划性只是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改。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乃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中国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方面。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在西方亦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决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所以使这二者（即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患将来没有更进步的制度出现。

话几乎说完了，不妨再向所谓自由主义者进一言。大家如认定上述的分析是对的，便应力争计划内的自由与平等，但不可仍留恋于未入计划以前的自由平等。如实在真爱绝对的自由，则应向文化方面努力。我说这些话，主旨在把这个问题中的几个关键弄清楚。其实这些话并不是现在想起来的，乃是久已想到的，至于说出来以后，任何一方面认为是不入耳之言，那我就不管了。

二月四日

本文写完以后，忽觉我在前文《关于中国出路看法》（《观察》三卷二十三期）有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不得已在本文之末追加声明几句：即我所谓东欧式几个民主国家并不是严格言之，照类型来说，其实瑞典至少应该在內。所以严格分为东与西，是不对的。瑞典最近发表战后劳动计划宣言，尤其富有所谓这样的彻底民主之精神。总之，这些小国颇能利用别国以往的成功或失败的教训。中国有其特殊的国情自不待言，但对于利用他国的教训与经验一点，却不妨以这些小国为师。这便是我的真意所在。千望樊先生与读者不可误会。

读《自由主义宣言》

潘光旦

快一年以前的事了。去年四月九日至十三日，欧洲若干国家爱好自由的人士假英国牛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自由主义大会，发表了一个《自由主义宣言》，成立了一个“自由国际”。参加大会的人士的国籍有英、法、比、挪、匈、意、土、奥、捷、芬、德、瑞士、瑞典、南非、西班牙、加拿大等，美国没有参加的人，但大会鉴于它是自由主义的国家，战后的地位又特别的重要，所以在闭会前推举的一个临时执委会里特别为它保留了一席。中国也没有人正式出席，但有两位记者被邀到场旁听，一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英办事处的朱抚松氏，一是《大公报》伦敦特派员黎秀石氏。我们最初知道这一回事，还是由于黎氏去年五月九日在《大公报》上的一番报导。

用了自由的题目来号召，来集会讨论，来成立一种组织，来发布一个宣言，以前在国家范围以内是常有的事，其根据自由的理论而有政党组织的国家，更可以说是比较常川的事，但国际性的这一类的活动，此番大概是第一遭，不由我们不加注意。国际自由主义大会，《自由主义宣言》，“自由国际”合成一个三部曲，其中最主要的一部自是宣言。宣言的文字并不长，只寥寥数百言，大体说来，是够得上“言简意赅”的四字评语的。全文自有其章节，章节间并无小标题，大致可分为如下的层次：引语、人权与人性、社会的基础、各种基本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经济、国际关系与合作和结语。结语自然是相当于“凡吾同志，盍兴乎来”的一个呼吁。

引言中说（引文均据黎秀石氏），“我们深信，世界之所以到这个地步（指混乱、贫乏、饥荒、恐惧），大部分的原因是自由主义的被人抛弃，因此

在这宣言中重申我们的信仰。”重申两字是与事实不符的。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谓之重申。在这宣言里，真正重申的话至多只有一半，其余是修正与补充的话，重申、修正与补充的对象，不用说，是十八世纪末叶以来的传统的自由主义了。

修正与补充的例子是不一而足的。例如，说到社会的真正基础，个人而外，又添上家庭，这显然是得力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部分社会学者与人文思想者的结论。又如，说到种种基本自由，于若干“自由”的觅取外，又兼顾到若干“不自由”的避免或革除；这很容易教我们联想到罗斯福总统所提出的四大自由。又如，工具论的国家观虽不算新鲜，此番宣言里至少曾经予以强调，强调与重申并不一样。宣言里说，“国家组织只是社会的工具，它的权力不可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抵触，也不得违反负责和有创造性的生活所必需的条件”，所谓必需的条件就指各种自由的获得与不自由的祛除。又如在关于经济民主的各节里，一部分的话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绝对不说而社会主义者常说的，另一部分则是修正社会主义者的话：例如第一节说，“经济自由如受压迫，政治自由必随之消灭。我们反对这种压迫，无论来自国营事业、政府统制或是个人垄断、企业联合或托拉斯。”这里面有采自社会主义的成分，也有修改社会主义的成分。最后，国际关系与合作的若干节里也有一部分的话是比较有新颖的，例如涉及所谓弱小与落后民族的一两节。自由与民主要不出三方面，一是政治的，二是经济的，三是民族的；经济的自由民主至少应包括“免于匮乏”一层，而民族的自由民主则指自决与独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有人很俏皮的说，根据这三方面的说法，世间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与民主的国家，英国有其一二而无其三，美国有其一三而无其二，苏联有其二三而无其一。两年以来，局势已颇有改易，这话适用的程度也随而变动，三国之中，比较有进步的要算英国，近顷印度的自治与缅甸的独立证明它在第三方面也有了几分成就；这次大会选定英国做会场，真不妨说是人地两宜。无论如何，大会宣言所申说的自由主义，关于政治的三之一是旧的重申，而关于经济与民主的三之二是新的补正；理论与实际的需要毕竟与十九世纪的不同了。

二十世纪版的自由主义比十九世纪的一版固然是订正了不少，但犹有未足。我们愿就下列的几点再加商榷。

一、第一点值得提出的是主义两字的名称。普通说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我一向以为不如说自由思想与民主生活（后者包括民主政治，民主经济及生活的其他方面）。理由是主义二字教服膺的人易于趋于武断，而其内容易于成为教条。思想与生活标准的领域里，主义的称谓倒并不是绝对的不可用，不过要有两个条件，就思想说，这条件是纯理论的探讨，就生活标准说，这条件是信仰与服膺必须是个人的，由个人自动的抉择为起点，以个人行为的修饰为归宿。在就生活标准说教的人应恪守的原则是：说不说由我，信不信由你。但说到自由与民主，这两个条件都不容易具备，特别是在这个一切要讲求社会化与团体行动的时代。严格的说，纯理论的思想是没有的，但自由思想更不能以纯理论的范围来限制，它势须影响我们对于日常事务的看法。完全个人的信仰也是没有的，但民主的信仰更富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势须影响我们日常行为的做法。唯其与日常的看法做法不可分离，所以武断、教条与硬性组织的成分应力求其减少，而主义的名词的避免便是减少的第一步。否则，执中无权，事同执一，也无非是在目前已有的种种深沟高垒之外，又添上一道深沟，一座高垒，徒使纷争之局，增益其扰攘的程度而已。

不用主义的字样，即所以避免所服膺的理论的偶像化，凡百事物之中，唯有偶像化的强制性最大与最牢不可破，而强制与自由是两个相反的东西；由强制的方法来反抗强制，其过程与结果依然是不自由、不民主、是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用这眼光来评议自由主义者的集会与“自由国际”的创立，我们的毁誉是参半的。黎秀石氏在报导里说，“自由国际这个名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共产国际或社会主义国际，但事实上……不同。它没有煽动国际革命野心，也不是各国政党的大同盟。在牛津会议，各代表大都主张自由国际必须成为一个超党派的团体，它的野心不是直接争取政权，而是谋求自由思想的复活。自由国际，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团体，不如说是一种思想运动，较为正确。”这是值得赞同的。但黎氏也报导到：“参与牛津会议的代表们无不激烈抨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共产与社会两主义都是集体的洪水猛兽，直接违反个人自由。”这就有问题了。大凡激烈抨击一种东西的人，自己必有另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要打倒别人的偶像的人，自己必另有其偶像，自己必受此偶像的支配，自己必也不自由。我可以想象，这一班参加大会的人，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自由思想者，是民主主义

者，而不是民主生活者，自己是大禹皋陶一般的圣人，自己的信仰是天经地义，别人与其信仰才成为洪水猛兽，否则又何至于如其深恶痛绝呢？西文 Liberalism 一字的尾间，即我们所称主义也者，虽若比较平凡，其所得于情操的渲染者也不若我们的译名的浓厚，但绳以大会中这一类的表示，也可知其已经日即于不平凡了。应该平凡的也不平凡起来，是时代的一个悲哀。

二、出席大会的人以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为的是它们直接违反个人自由。这就引进到我们要商讨的第二点。宣言全文中没有提到个人主义，一次都没有，是妥善的，也未始不是对于传统的自由思想的一个修正。宣言中又曾有“社会全体福利至高无上”的话，这话本身的说法是否完全妥善，固然待考（另见下文），但由此可知个人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那也是妥善的，与称个人而不称个人主义同样的妥善。但宣言在开始时既有尊重个人——是“社会的真正基础”的话，而大会讨论时，代表们又曾为了个人自由，对共产与社会主义，大肆攻击，可知至少在这些代表的心目中，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还是分不开的，以至于于一而二与二而一的。这一层非再加检讨不可。

共产与社会主义，从个人主义的立场看，是洪水猛兽；个人主义，从共产与社会主义的立场看，又何尝不是？惟其彼此以洪水猛兽相视，我们的世界才演成了今日的局面。自由思想者是根据了既明且恕的原则来养成他的看法与做法的，把别人，别的人群，或别人所拳拳服膺的事物当做洪水猛兽，总是一种不明不恕的举动，充其极势必造成一个不两立的局面，天下虽大，只能有我而不能有你。说尊重个人，是不错的，但所以尊重之者，并不单单因为他是一个人，与别的人有些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意义与价值，而也是因为他同时有一个做人的共性，能与别人相通，于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能共营共享，能对大家的福利凑上一分，初不问这一分的精粗大小，方才所称个性的意义与价值指的也就是这一分。所以与其说尊重“个人”，不如说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人格的概念有其独特性，也有其社会性；人格的格字，如作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的品性格局讲，指的便是独特性，如作他应该努力上达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做人的标准或资格讲，指的便是社会性。二者缺一，所发生的不是人格完整不完整的问题，而是人格的根本存在的问题。没有了人我之异，就没有人格，没有了人我之同，以衬出人我之所以异来，也就没有人格。通性之间与个性之异，社会的需要与个人的需要，对于人格的树立与

发展，好比轻气与养气之于水，缺一不可。这原是极单纯的常识，要不是因为近代个人观与社会观的各自成为主义，以至两不相能，是犯不着在此反复申说的。总之，宣言中在此方面的说法，应当改正为“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作为社会的真正基体”。基体的解释见下文。

三、宣言说到社会的真正基础时也曾经把家庭列入。这是我们可以同意的，上文已稍有说明。不过与其说基础，不如说基体，基体等于单位，或严几道先生所创译的么匿。基础两字失诸范统，其间可以包括许多别的东西，例如地理环境、物产资源、国情民性、文化遗业之类。大凡一种有系统的东西必有其所由组织的基体，好比砖片石块之于一座建筑。社会所由构成的基体，上文所说的人格而外，就要算家庭了。同样的承认人格与家庭是社会的基体，大抵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所特别注意的是人格，而社会学者自孔德与勒泊莱以降则是家庭。以哲学家的资格，而特别属意到家庭的，依我所知，只有英国的人文思想家席雷一人。希雷鉴于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纷呶不已，曾经郑重的把家庭提出来，认为它才是人群生活的真正基体，同时他和许多社会学者一样，也认定唯有健全的家庭才可以把人格的特独性与社会性的发展，兼筹并顾，从而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减轻其冲突，增益其协和。于此我们应该注意，这些作家所提出的是家庭，不是家庭主义，因为他们充分了解，一称主义，便成至上，结果是家庭制度的发展日趋畸形，不至把个人与社会吞噬以尽不止，即，兼筹成为统筹，并顾成为包荒，有如二千年来中国的形势。这些我认为自由思想者都不难同意，我个人历年来也曾再三加以论列。至此更不妨指出，人格与家庭两种基体是不冲突的，分别注重它们的人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大抵他们都看到，人格之所以为基体者同时也是社会与文化生活的的一个最终目的，即每一个人的得以各自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而家庭之所以为基体者则属于手段或过程一方面，个性的辨识与发展，社会性的启迪与传授，场合与步骤虽多，家庭无疑的是第一而最能生效的一个。

四、宣言中强调国家只是一个工具，我们在上文也说到了。但我以为还不够清楚，同时工具论的适用只限于国家一事物，这还不足以把自由思想的精神充分发挥出来。说“国家组织只是社会的工具”，那社会两字便有问题。我们应当说，国家是人或人格的工具，在人格发展的总目的之下，国家、家庭、文化的种种方面，包括宗教在内，全是工具。个人的种切，包括

一切身心品性，社会的种种，包括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无往而不是所以完成每一个人的工具。若说国家是社会的工具，则社会自身岂不是成为目的，成为至高无上，那参加大会的许多朋友又何必对社会主义大肆其抨击呢？社会主义不就是以社会抬做目的的么？因此，我不能不疑心这一班朋友在思辨上还很欠工夫，思辨既欠明白于先，斯交代不够清楚于后。自由思想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就是每一个人格的充分发展，其他宇宙间的一切扫数是工具，所以供人运用而达成此目的的。这班朋友不了解这个，所以在宣言里，一则曰国家是社会的工具，再则曰，“社会全体福利至高无上”（见论经济民主部分，上文亦曾一度引过）。殊不知所谓社会全体也者，好比全民、大众一类名词，是最不可捉摸的，凡属不可捉摸的名词必容易被人利用，成为口实，古今中外，有得几个野心家或野心的少数人不挟社会、全民、大众之名以行其威福之实的呢？

工具论的适用只提出了国家的一种，显然的是过于自画。如果这一次集会、宣言与国际组织的目的端在重申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念，那还说得过去，但事实并不如此，这一番举动的目的不止是民主政治，更是民主的一般生活，以至于更广泛的自由的思辨，言论和整个人生态度。目的即如其广泛，则工具之论的适用，便应有一番包罗得更多的提示，有如我们上文所论。读者于此，不妨参看英籍俄人宗教思想家贝蒂也夫所著的《自由与奴役》一书（Nicolas Berdyaev. *Freedom and Slavery*），以资补充。贝氏以人格为主，为目的，以身外的一切事物，连同上帝与教会在内，为宾，为工具，进而把所有的工具逐一分析，以示其反客为主与奴役人格之所在；在喧嚣攘夺而人格被车裂的今日，读去大有清凉一剂之感。

五、自由不宜称为主义，上文已加论列。但一面倡导自由，而另一面，不作一番访闲的措施，即在人格发展的过程中，一个人应如何努力，不作一番剴切的指示，则自由依然可以走样，而变成放纵与散漫一类的表示。工业革命以后欧美资本主义下的经济生活与其反响，不就是最大的一个教训吗？草拟宣言的朋友们似乎没有充分的接受这番教训。宣言中为了访闲自由的趋于自肆，只在经济民主的最后一段话里说到：“自由与服务必须相辅而行。有权利；便有相对的责任。如要自由的社会组织成功，每一个公民对他的同情都要有一种道德的责任感，并要积极参加公众事业”。

我认为这话一半是错的，一半是空口白说的。人格的自由，或自由的人格，决不是权利与义务的概念所能绳墨的，若定要加以绳墨，则我们也只能说，它是权利，也是义务，决不能单单看做权利。自由的人格是一个理想，不是一件现成的货物；一件分有应得而偏偏有人靳而不与的货物可以看做一种权利，但势须痛下工夫、方能希望达成的一个理想，却很清楚的是一种义务，为了一己，必须尽此义务，为了别人，为了社会，也同样的必须。看重权利，原是个人主义时代的一个通病，如今这一班朋友完全把自由看成了权利，足见个人主义的流毒未尽，而我在上文所下的评语，说他们把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混为一谈，是并非故入人罪了。这所论是说错了的一半。

深怕自由成为放肆，他们提出的对策是“服务”，是“对同侪要有道德的责任感”。我认为这一半是空话，是呵热气的话，于事完全无补。基督教在西方，讲了两千年的爱、服务与对同侪的道德的责任感，究属有得几许成效，我们不知道；但近百年来，它对于政治与经济方面种种强凌弱、众暴寡、富抑贫、大加小的事实，未尝有一筹之展，我们是知道的。不讲权利、但讲义务、痛绝自私、昌言博爱的宗教的感召，所得即等于零，何况一无凭借的口头禅语呢？生前聚敛，死后捐钱，一面做强盗，一面发善心的“服务”与“责任感”，以前有，以后也不会完全没有，但我们相信它和这一类的道学的劝告无干，而这在当事人看来，以至于草拟这次宣言的人看来，应该还无害其为自由。

我说这种劝善之言为一无凭借而与自由人格的招致不生关系，为的是想引进到本文中对“自由主义宣言”最主要的一个评论，就是，它根本没有谈到教育。在列叙各种自由权利时，宣言固然也说道“不论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尽其才能受各种教育的机会”。但这是老调，此其所谓教育并不一定包括自由思想者所了解的那一种教育。西洋自希腊时代起，便已揭櫫过从自由思想出发的两大教育原则，一是认识你自己，一是任何事物不宜太多，在太阳神阿普罗的神龛上，勒为铭文，垂作明训。说认识你自己，目的自是在控制你自己，希腊人是认定知行合一，能知即能行的；说任何事物不宜太多，指的自是和你生活有关的一切事物，你的欲望，你的情感，你的思考，你的理想，你的信仰。把两个原则合起来，就等于说，你能控制你自己和你因生活而发出的种种乞求与欲念，则所求与所得不至于逾量、过火，转而是你自

已被它们所束缚控制。不受束缚控制，就是自由。我不明白为什么草布宣言的朋友们连这一番明训都忘记了。如果不忘记，而转从这方面有所提示，使蔚为一种教育的新风气，则所得的人格自由便是真正的自由，亦即无烦访闲、无须对策的自由。有了这种教育的作风，再进一步而讲求达人与亲民之道，即从淑身的生理与心理的学术进而致力于淑世的社会的学术，则不必侈谈服务与责任感，而服务与责任感的效果不求而自至。

六、最后还有不妨指出而一时无须详论的一点，就是，宣言中抽象的提示多而具体的主张少。黎秀石氏在报导里也评论到这一层，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在大多数人缺乏面包的今日，少数人侈言自由的理论，而拿不出免于匮乏的切实的保证来，全部宣言即等于空口说白话，初不限于劝人发挥正义感与努力服务一端而已。充分的生产与适当的分配固然为任何经济主张所不可缺少，但欲望的各自控制也是健全的经济主张所必须所具备的一个条件。生产与分配属于外缘，欲望的控制系乎内发，欲望无限，而物力有穷，终须外内并力，两相调协，经济生活才有底定的一日。关于欲望的内发的控制，近代的经济学，不论其为传统的或革命的，是几乎完全不加论议的，自由思想者，根据自由生活的需要，有如上节所论，便应出而加以郑重的补正。此外，自由思想者前途，也必须供给一个关于人口的主张，而这又须和经济主张相提并论。物力之生产供应有限，而人口的增殖无涯，人口之中，对于一己欲望自动裁节的能力，自亦大有不齐，则此种主张，于注意人口的数量以外，更须顾到人口的质地，其于贪得无厌、噬人自肥的分子，势须运用社会的力量加以约制，不能任其孳长。一种宗教的主张也有它的重要的地位，西洋的自由思想者既从一种有组织的宗教的积威之下解放了出来，他自不愿意看到后起的各种思潮信仰，包括自由思想本身在内，趋向于过度的组织化而俨然形成各式的新教条与新教会。他不但应主张信仰自由，更须主张信仰的返归于个人化，使其成为充实人格的一种工具，与哲学文学、音乐、艺术等人文学科属于同似的范畴。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希望消除壁垒，增辟平阳，使自由的人格有位育的余地。第四种具体的主张是教育的，上文已有申说。四者之中，最基本的是教育的，因为，一则自由思想者自身要站稳，必须先经历一番自我认识与自我克服的培养工夫，再则，要使种种主张发人深省，作为见诸行事的张本，也总须以教育为入手之方。

释 Liberal · Liberalism

郑慎山

近来大家讨论自由主义，我总觉得“自由主义”这个名词的本身有问题。我现在把我的意见写在下面。

有许多外国名词，意义非常空泛（loose）；在一字之后，加上了ism的语尾，并不一定成为一种“主义”。Liberalism一字即是这一类；他并没有中文“自由主义”那样严重。依我的看法，他并不是一种严格的“主义”。我想起章行严先生从前提倡过的音译；如果我们把Liberalism一字译音而不译为“自由主义”，则一切的误解，殆可避免不少。Liberalism这个字，是从Liberal得来的。Liberal这个形容词，译作“自由”，根本错误。我随手查了英国的《牛津字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和美国的《标准字典》（*Standard Dictionary*），没有看见把这个字释作“自由”的简单意义。这个字的要义有下列数种：

第一是度量大，胸襟大（《标准字典》译为 having a generous heart, broad……，《牛津字典》译为 open-handed），自然包括容忍的意思在内。第二是不偏狭（free from narrowness 见《标准字典》），无偏见（unprejudiced 见《牛津字典》）。第三是进步的，独立的（均见《标准字典》）。因此，凡抱 liberal 态度的人在政治上总是赞成民主《标准字典》，主张民主的改革和废除特权《牛津字典》，在宗教上也不偏持成见，为教义所拘束《标准字典》。总之 liberal 的反面，是度量小、偏狭、有偏见、顽固、死硬、保守等。

读者或以为上面所述太粗浅了，可是有许多无谓的议论和错误的思想，都在那极粗浅的地方没有弄清楚的结果。误认 liberal 为“自由”，而对于

“自由主义”的译名，就望文生义，则讨论愈多，离题愈远。我们明白了上述的意义，就知道英美人对于 liberal 这个字的用法了。例如英国有所谓“自由保守派”（liberal conservative）者，即指对于改革不生恶感之保守党员而言。马歇尔离华声明中所指国共两党都有 liberals，即是指国共两党中都有度量、能容忍、不偏狭、无偏见之人而言；他们正是与国共两党的死硬派（diehards）相对照，马歇尔所说的国共两党的 liberals，绝不是指国共两党中有放弃其党义党纲的人而言。马歇尔声明中所指国共两党以外的 liberals，也是指那些度量、能容忍、不偏狭、无偏见之人而言。因此，马歇尔声明中所用的 liberals，并无严重的特殊意义；他不过是本着英文的习惯，用了一个与死硬派相对的名词而已。

本来我是从 liberal 这个形容词说起的，上面引到马歇尔声明所用的 liberals，乃已转入名词了。Liberal 当名词用（依俗译，即是自由派或自由主义派），其意义是由形容词引伸而来，例如我刚才对马歇尔所用的 liberals 一字的解释，自信大体不错。这可说是 liberal 当名词用的广义解释。Liberal 当名词用的狭义解释，就是指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或行动自由的人或是指反对保守主义而并非激烈派的人，（见《标准字典》）。只有在这个狭义的解释上，liberal 一字，方可勉强译为“自由派”或“自由主义者”。

由 Liberal 引伸出来的 liberalism 一字，是指那种度量、能容忍、不偏狭、无偏见、重改革的态度而言；这种态度固然尊重思想言论的自由，然其意义，并不侧重在自由一方面。我们通称为“自由主义”，实在是勉强而又勉强的。照这样讲，所谓“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对人对事的态度。态度宽大和进步一点的人，即是“自由主义者”。所以“自由主义”一名词的本身，并不像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等名词有一定的内容，乃是说明一种态度而已。我们若硬把“自由主义”当着一种“主义”去讨论，未免有点文不对题。

最近张东荪先生发表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见《观察》第四卷第一期），我看了有几点意见，顺便提出，就正于张先生。

张先生说：“自由与自由主义，在涵义上不是完全相同。”我不仅同意，并且愿意更进一步说：自由（指 freedom, liberty 而言，张先生的意思亦复如

此，因为他说：“其他别种主义者亦并没有否定自由”)与自由主义简直是两件事。因为据我在前面的分析，自由主义并不是专谈自由的一种主义。至于张先生把自由主义分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我不敢苟同。因为自由主义，依我前面所述，是度量大、能容忍、不偏狭、无偏见、重改革的态度，既系如此，即无所谓政治上的或文化上的自由主义。我们只能说自由主义在政治的态度或主张怎样，在文化上的态度或主张怎样。张先生因为各国政党中有自由党或民主党，就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有“固定的内容”和“具体的主张”，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没有这些，“只是一种态度”。殊不知自由主义是一事，自由党或民主党又是一事。世界上固然有根据自由主义的自由党（如英国的自由党是），也有根据保守主义的自由党（如今日日本的自由党是）。所谓“具体的主张”，大概是指自由党的政策而言。至于“固定的内容”，就自由党而言，并不固定。以前英国自由党的政策，与今日英国保守党的政策差不多；今日英国自由党的政策，与以前英国劳工党的政策也很接近，依张先生所说，美国的民主党，原是代表自由主义的，然而现在美国代表自由主义的政党，乃是华莱士一派反民主党的人所组织的新党。我不很同意张先生的关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的这个分类。

此外，张先生说：“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今天二十世纪已是过去了。”这话我也不同意。这是因为张先生把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二字看做 freedom, liberty, 而没有把它看做 liberal。所以他说：“所谓政治的自由主义，就是单纯的自由主义，亦可以称之为旧式的自由主义。”究竟“单纯的自由主义”或“旧式的自由主义”又是什么，张先生没有说明。就他论欧洲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一段看，张先生大概是指个人主义而言。不知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虽不无连带关系，然究竟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今日稍有常识的人的确都知道“个人主义”早已过去了；至于自由主义，实在没有过去。例如去年英国牛津大学还举行一次国际自由主义大会，并发表一篇自由主义宣言。美国华莱士一派人还在组织政党。张先生虽说“政治的自由主义已成过去”，然同时极力推崇“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张先生这一个矛盾，是由于将“自由主义”的“自由”二字，认为普通的自由二字了。至于其他论者之望文生义，更无待论。例如有些人以为中国今日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必倡民主

政治，在经济上必倡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者应赞成民主政治，是无待言的；至于自由主义者是否必赞成社会主义，就成问题了。赞成中国采行社会主义是一件事；自由主义者是否必赞成之，是另一件事。我以为凡赞成社会主义者，就应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不必再挂自由主义的招牌了。

写到这里，读了潘光旦先生的《读〈自由主义宣言〉》（《观察》第四卷第三期），我觉得这篇文章是近来论自由主义的一篇比较有价值的文章。因潘先生论到“主义”两字的名称，并说：“西文 liberalism 一字的尾闾即我所称主义也者，虽若比较平凡，其所得于情操的渲染者，也不若我们的译名的浓厚。”这与我前面所说 liberalism 没有中文“自由主义”那样严重的意思相同。总之，我认为 liberalism 一字的普通意义，不过是指度量宽、能容忍、不偏狭、无偏见、重改革的态度而已。本文的目的，仅在说明这一点，至于其他的问题，如民主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等，都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了。

一八四八·一九四八——历史的两个转折点

严仁赓

岁暮天寒，一九四八年即将告终。一九四八年颇不是一个平凡之年：无论国内、国外、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曾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可为追述。这一年，两大壁垒界限愈见鲜明了，铁幕下垂，东西绝隔。冷战虽然时紧时弛，但在这一一年中间却只有间歇的停止，战线且愈拉愈长，从西欧一直战到远东。东方在这一年里不仅有冷战的交绥，且又加上热战。一年之中，更是愈打愈凶猛，遍地硝烟，几乎已找不到一方干净地土。一方面，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北大西洋公约由磋商而具体；政治、经济、军事，三管齐下，咄咄逼人。对方倒也未尝示弱，它有东欧集团、莫洛托夫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彼此互为呼应，与之针锋相对，各有千秋。倒是苦透了夹在中间的人们。赶上今年是美国大选之年，她的对外政策和国内竞选竟又搭上紧密关系。为了竞选，诸如审奸捉妖一类的事竟可以闹得满国风雨；且不惜和对方抓破颜面，公开的对骂，在外交上这也是空前的。记得在珍珠港事变发生顷刻之前，美国国内虽也追缉德日的敌谍，却尚绝未如今日之丝毫不留情面的硬干，怎不令人胆寒。这一年，英国和她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裂痕扩大，欲收拢已感乏力，大英帝国形将解体。尤其在亚洲各地，普遍的已燃起争取政治独立的火光。旧日帝国主义者相继没落，新兴的帝国主义者又一一在制造与蔓生。整个世界是在一个大动乱的局面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甫闭幕，人们本最需要的是将息与养创，不幸举首四望，却又是满目疮痍。大多数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流离逃散饥寒悲惨的环境中，不见改善，而且每况愈下。虽然远隔重洋在新大陆上居住的人

们正过着登峰造极空前繁荣的生活，虽然她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今岁又创出史无前例的高峰，然而恐慌失业的阴影和恐惧，则亦与时俱增。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旧有的秩序不能维持，新兴的秩序尚未建立；以至局面混沌，思想庞乱。正像是一个大灾大难之年。

* * * * *

距今以前刚好百年的一八四八年也不曾是一个十分平凡之年。这一年，欧洲各国多数也是在战争与混乱中度过。是年发生于法国的革命曾掀起全欧各地的振荡不安，德丹战争亦开始于这一年头。欧陆上起自西南的西班牙以迄东北的波兰，不是对外有战争，就是国内有纠纷，几乎无一处幸免。大陆情形如此，隔海的英国，这一年也是在惊风骇浪中度过的。在当时，相互冲突的两个意识形态，一个是以法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思想，另一个乃是以帝俄为中心的保守势力，相互间演成一个自由与专制的闹争，俨如两个壁垒。新大陆上的美国，在这一年里结束她对墨西哥的战争，争得沿海西岸加里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二州的全部土地，结束了她西陲疆土角逐的争夺战，完成建国的基础和她的四十八州的完整领土。亚洲各国被迫的和欧西各国打开了关系，帝国主义者正为争夺殖民地展开了征服战争以及彼此之间的战争。继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复对中国开始蚕食。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里，旧的秩序已经被打破，人类正在为社会的纷扰寻找出路。社会俶扰不宁，人民充满不满的情绪。对于当前感到失望；对于未来世界和前途，怀有恐惧。意见分歧，主张各异。其情形与百年以后的一九四八年多甚仿佛。

再从经济的大事上讲去，一八四八年也不是一个平凡的年度。继产业革命之后，一八四八年开始第二个经济现象中盛衰大循环的起点。铁路正在开始大量兴建。虽在十八世纪铁轨已代木轨，十九世纪初年机车亦已代替马车，但是起初机车速度不及马车，未能推广。迨至几度改良之后，火车方崭露头角。所以无论在英、美、德、法各国，大规模的兴建铁路还都是一八四〇年以后之事。此时开始，经济界进入一个所谓“铁路世纪”（Railway Era）。更由于其时银行采行低利政策，鼓励了铁路的大举投资和铁路证券的大量投机，发展的“筑路热狂”（Railway Mania），由此而牵引起经济界相关各部门的连带急速发展。英国从一八四四年实施管理金融的“毕鲁法案”以后，一八四七年又曾发生金融风潮，银行法案且一度停止。次年开始，金融经济逐

渐走上正轨。又自此时起，英国开始她的经济自由政策，格莱斯登逐步的削减关税，国际间贸易渐渐的发达与通畅。在法国，经过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后，银行制度显露破绽，私有银行不能立足，法兰西银行乃挺身而出，着手建立她的健全金融基础。贸易和生产也都迅速的增加。正值此时，新大陆的西海岸发现金山，淘金热（Gold Rush）进入高潮。世界握有的黄金，本自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四七年数量甚为平稳无甚增减，但从一八四八年起始大量增加。这一增加，对于物价和经济整个趋势的发展，也曾发生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几种因素的合并，于是遂发为一八四九至一八七三间二十四年在盛衰大循环（Kondratieff Curve）中的空前繁荣。由几方面看去，一八四八年无疑在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枢纽年。

但是，这一年中，比起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转变更为重要的一件新发展，乃是在经济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分歧。正统派的密勒以其一部重要著作（*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于是年问世；同时，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和盎格斯亦以其重要的《共产主义者宣言》正式和世人谋面。前者为继承前人之衣钵的工作，后者则为开辟新疆土的工作，所以后者远较前者为重要。在一百年以前的今日，一个流亡英国仅仅二十九岁的年青犹太人，凭借他如炬的目光和尖锐的脑力，正当资本主义制度发扬光大的时候，即已对社会提出警告；正当资本主义制度一帆风顺所遇无阻的时候，他已揭示了它在制度上的破绽，它的潜伏着的危机，以及未来的经济制度社会发展必须采取和抉择的方向与途径。马克思和盎格斯在这一本除去《圣经》以外被翻译为最多种文字的一个文件里面曾作出种种预言，他们预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经济的力量和资本必将日趋于集中；独占的势力亦将逐渐强大，且在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制度之下，并将无可避免的发生商业循环和经济的一盛一衰，制造大规模的与周期性的失业。在经济衰落与发生大批失业的期间，人们对产品虽有殷切需要，生产出来的消费品虽亦尚有过剩，但是徒因购买能力削弱，以致产品山积不易推销，而多数的人却又在冻馁交迫之中讨生活。这就是所谓“丰年而有饥馑”的现象（poverty amidst abundance）。所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虽为人类造下物质生活方面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它却又为社会带来祸根。制度的本身既有先天的缺陷，加上人谋不臧，终将引其走向崩溃，其后，代之而兴者将为共产的或社会主义的社会。这许多的预言，经过过去一

百年的体验，已经充分证明它一无虚妄。在《共产主义者宣言》里面马盂的十大主张之中，例如主张设立国家银行，集中由国家管理货币与信用；例如主张一切交通事业由国家集中管理；例如主张人人有工作，工农有工会的组织；例如主张农村与城市须和衷共济，避免城乡的对立；又例如主张扩充政府经营工业及握有生产工具的范围，改良土壤开辟荒地等诸项，大部分都已是今日欲实行社会主义者所必欲达成的目标了。其余例如主张实行加速累进的所得税；例如主张取消个人的遗承权利；例如主张实施义务教育等诸项，就是在近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面，也已一部分或全部的实现了。这一部经济思潮上的重要文献影响之大实是可惊的。此一文献的出世，更无疑使一八四八年成为一个历史上重要的枢纽之年。

* * * * *

惟一九四八年的动乱革命，尚和一八四八年者异趣。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主要是一个政治的革命浪潮；然而一九四八年的革命，则主要是一个经济的革命浪潮。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一项统一与民主运动的爆发；然而一九四八年的革命，则是“民族革命”（民族争取独立自主）和“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向既得权益的统治挑战）的两项运动的合流。这乃是新时代革命运动的特色。一八四八年以法国为中心而掀起的革命运动，历史家曾留给它两个重要的课题去做，其一是：经革命统一与民主之后的各个民主国家，究竟能不能和平共处？另一是：政治民主之后，可否即能由政治民主之引导而获得社会的和经济的民主？这两个课题，经过百年试验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都还没有答到够上及格的分。一百年不是一个短时期，在这一百年中间，人类的经济生活不是没有改进，但是到了今日，纯靠政治以实现经济平等已显然是力量脆弱途程辽远；而且，在自由制度的下面，经济的动荡不定和多数失业更苦无法解除，社会已殷切的需要另外一个革命运动来补充它和改造它。一八四八年的《共产主义者宣言》，虽则是吹醒社会迷梦的一支角号，但是《共产主义者宣言》并没有在当时发生若何具有真实性的作用；它并没有参加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它更没有对那次的革命发生什么易见的影响。虽则《共产主义者宣言》德文原本不久便已传播到欧陆各国并被译为各种文字，但是正式的英译本却是迟至四十年以后方才印行。因而，这一项革命思潮对于世界真正发生作用，还是到

了本世纪方才开始，更可以说，直到一九四八年它才确实的浸假而成为一个革命的巨潮。如今，巨潮的一个大浪已冲向大西洋边，它的另一个大浪，亦已打到太平洋岸，仍在向外伸展中。这个新的革命运动，既不需斯太林或莫洛托夫也不需“国际第五纵队”更不需各地的共产党武力去促成它。没有苏联，没有斯太林莫洛托夫，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主义，如今日的这个革命的巨浪，仍将波及全球，所向披靡。亦犹之在一八四八年，即使没有法国革命作为导引线，政治革命仍将迟早发生者相同。这是因为它已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节目，它是人类历史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一段历程。不管你喜欢它或不喜欢它（“like it or not”）都没有关系，它是终将临到人的头上的。或许，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发生（我不同意今日许多人的意见认为第三次大战短期内定将爆发的看法）。然而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战后的局势也不会再向回头走，它只有更加速的走向这个已定的方向，不容你不硬着头皮的去迎接它。

有的人也许要担着心思，唯恐“经济的民主”加到头上之后，不免要牺牲一部分的“政治的民主”，甚至“政治的民主”全部被其剥夺。这种担心是不必需的，因为政治的自由和经济的平等本来就不是生就的不能两全。马克思的真正信徒不仅主张实现“经济的民主”，他们尤其迷恋于“政治的民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依然为所珍惜。在《宣言》中马克思和盎格斯曾经说：“……我们不是那些共产主义者之必欲毁灭个人的自由……我们没有为获得平等而牺牲自由的愿望。……”他们虽然鼓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们所愿见的农工阶级，仍然需要有“自尊感”和“独立意识”。“自尊感”和“独立意识”认为比“日常生活必需的面包还来得重要些”。故而他们自命其革命运动为一个“赢得民主的战争”，不为无因。甚且，他们认为采取和平手段以达到社会主义，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亦并非绝不可能之事。战事只有在反动势力压制下方能产生，正如逆流与主流之冲荡方激为浪花一般；否则战争并不是达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所必经的道路。

* * * * *

生为这一个时代中的人们，可谓生不逢辰逢到这样的灾难与苦痛。我们一面觉得不幸，但是人人在这时候，却应该一则以惧，亦一则以喜。因为幸

而你不被时代的巨浪所卷去，你便可以亲眼目睹的瞧着时代的巨轮更转进一个新的世纪。在惊风狂浪之中，我们需要特别镇定的冷静的，去迎接这一新的时代降临人间。它将要普被苍生降福于全人类呢？或是将为全人类带来更多的灾害苦难？我们无法预知，不便妄测。不如留待百年以后，让那时的历史家们再来替我们下断语好了。

领土问题

琉球应归还中国

万 光

琉球是中国的失土，依照开罗宣言的原则，应当归还中国。最近日本竟希望和美国共管琉球。现在美国建议于八月十九日召开对日和约的初步会议，琉球归属问题势将在会中讨论，时机已经这样的迫切，我们不应忽视这问题。

一 琉球在中国国防上的地位

琉球群岛是分布在日本九州和台湾之间一长串岛屿的总称。分北中南三部：北部有种子群岛，土噶刺群岛，奄美群岛；中部为冲绳群岛；南部为先岛群岛。大小共计四七三岛，总面积二三八六方公里。各岛地势险峻而少平原。热带森林掩着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重要农产只有甘蔗和甘薯，后者是琉球人的主要粮食。粮食不能自给。水产比较丰富。没有重要的矿产，地瘠人多，生活很苦。

所以琉球对于中国，经济上毫无利益，而反是琉球要依赖内地经济的帮助。明清以来，琉球藩属中国的虔诚，也一半为着这原因，而中国对于琉球一向是取少而予多。今后收回琉球，也不能改变这形势。但是在国防地位上看，琉球实在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国大陆的东面缘海，为九州、琉球、台湾所包围，是封闭性的缘海。中国失去台湾和琉球，东南沿海就失掉了国防前哨，海岸暴露，极易受敌人海陆空的袭击。而且周围都被别国势力所环绕，中国就没有通入太平洋的门户，即使中国建立海空军，也缺乏海上犄角声援的据点，处于显著劣势的地

位。战时我国的海岸线，极易被敌人封锁，这次中日战争中，我们已经受够这种惨痛教训。现在台湾收回，形势较好，但是通入太平洋的门户仍嫌太小。琉球群岛的陆地面积，虽然远不及台湾，但是散布海面之广，五倍于台湾，我们必须收回琉球，才可以策划国防上的安全。如果说台湾和海南岛是中国海疆上的两只眼睛，那末琉球群岛和西南沙群岛就是中国海疆上的两个触角，都是不可少的。

况且历史告诉我们，日本侵略台湾，最先侵占琉球，然后夺我台湾。琉球群岛中最西南的岛屿，距台湾只有七十余英里。琉球是日本侵略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跳板。我们如果失去琉球，那末台湾孤悬海外，随时感受严重威胁，一旦海上有事，必然极难防守。现在日本又想保有琉球，并且要求移民台湾，显然没有忘掉战前侵略的野心，想要卷土重来，我们是曾经吃过这苦头的，殷鉴还宛然如在目前，尤其不能忽视。

因此从中国国防安全上说，以及为防止日本侵略势力的再起，和保障东亚的和平，中国必须收回琉球。外国公正人士的看法也是一样。例如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 Cressy）教授在他所著的《亚洲之地与人》一书中说：“中国军略地理之对外关系，应注意者有四……四为台湾与琉球之占领，以策军事上之安全。”（见中译本一三九页）

二 琉球归属中国的历史

琉球的名称，初见于《隋书·流求传》。隋炀帝大业三年（西历六〇七），令羽骑尉朱宽和海师何蛮往琉球。据琉球人自己著的《中山世鉴》说：朱宽见琉球的地形像虬龙骑水中，所以叫它做流虬。明洪武五年改为琉球。可见这群岛屿的名称，本是中国人题的。从大业三年至今，已经一千三百四十一年了。

琉球的正式藩属中国，始于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直至清光绪五年（一八七九）被日本吞并为止，琉球继续藩属中国五百〇八年。在此五百〇八年中，中国政府绝未对琉球用兵，他们的藩属中国，完全出于自动，奉行中国的正朔，而且朝贡甚勤，甚至一年朝贡二三次，中国规定他两年朝贡一次，他还一再请求准许每年进朝贡。每逢中山王（即琉球王）卒，嗣君称世子权理国事，一面向中国告丧请封，等待册封天使到琉球，行过册封典礼

后，才正式即位称中山王。明清两代共计册封中山王二十三次，兹列为简表如下：

年代	西历	册封王名	册封正使	副使
洪武五年	一三七二	察度	杨载	(无)
永乐二年	一四〇四	武宁	时中	(无)
洪熙元年	一四二五	尚巴志	柴山	(无)
正统七年	一四四二	尚忠	俞忭	刘逊
正统十三年	一四四八	尚思达	陈传	万祥
景泰二年	一四五—	尚金福	乔毅	童守宏
景泰六年	一四五六	尚泰久	严诚	刘俭
天顺六年	一四六二	尚德	潘荣	蔡哲
成化七年	一四七一	尚圆	管荣	韩文
成化十四年	一四七八	尚真	董旻	张祥
嘉靖十一年	一五三二	尚清	陈侃	高澄
嘉靖四十一年	一五六二	尚元	郭汝霖	李际春
万历四年	一五七六	尚永	萧崇业	谢杰
万历二十九年	一六〇一	尚宁	夏子阳	王士禎
崇祯二年	一六二九	尚丰	杜三策	杨伦
顺治十年	一六五三	尚质	张学礼	王垓
康熙二十一年	一六八二	尚贞	汪楫	林麟焄
康熙五十七年	一七一八	尚敬	海宝	徐葆光
乾隆二十年	一七五五	尚穆	全魁	周煌
嘉庆四年	一七九九	尚温	赵文楷	李鼎元
嘉庆十二年	一八〇七	尚灏	齐鲲	费赐章
道光十七年	一八三七	尚育	林鸿年	高人鉴
同治五年	一八六六	尚泰	(待考)	(待考)

(附注) 上表大体根据《明史》及《清史稿》，参以李鼎元《使琉球记》所载琉球天使馆敷命堂后明清两代册封使题名榜。道光十七年册封使姓名，由清代《实录》查出补列。同治五年册封使姓名，《实录》失载，待考。表中年代以明清两史所记遣使之年为准，与上述册封使题名榜不尽同。

历次册封使到琉球，琉球总是举国欢迎，万人空巷。处处流露出琉球对中国的尊敬和情谊。

日本第一次侵略琉球，是在万历三十七年（一六〇七），掳中山王尚宁，

三年后释归。琉球北部诸岛，即在这次被日本侵占，以之隶属鹿儿岛县。

到了清末，中国衰弱，而日本正值明治维新，开始采取帝国主义，侵略邻国。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有琉球船遭风漂到台湾，被生蕃劫杀五十四人，日本就借口进兵台湾，并且说琉球是日本的领土。次年，乘琉球使节赴日的时候，强迫琉球为藩属，封中山王尚泰为藩王。但琉球朝野都反对，一面仍继续朝贡中国。光绪五年（一八七九），日本进兵灭琉球，夷为冲绳县。虏其王尚泰及世子。是时琉球使臣因滞留福建，没有及时赶到北京，以致琉球亡于日本，痛不欲生。稍后又有琉球人到天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泣诉求援（详见清《续通考》）。中国也因为日本侵占我领土，屡次向日本抗议，曾经美国总统格兰特（U. S. Grant）从中排解，日本政府且曾遣全权大臣来华协商，提议由中日国共管琉球，中国政府始终没有答应。

从以上的叙述，可见琉球从明初以来五百余年，一向归属中国，中国的宗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日本用武力强占琉球，琉球人绝对不愿意，中国也没有承认。所以英国麦唐纳爵士于去年四月间，在下院提出琉球未来地位问题时曾说，琉球是中国在压力下让与日本的。美国葛德石教授也说：“上海之东有琉球群岛，原为中国之藩属，晚在十九世纪始为日本摄取。……中国、台湾^①、琉球，既有如此之历史关系，要求恢复，自属当然。”（见《亚洲地与人》中译本一三八页）

三 琉球的中国文化

琉球的土著人种，或许和南洋的马来人相近，外来的大都是汉人的后裔。汉族本是一些民族混合同化而成的，它的主要特征在文化。琉球藩属中国这样久，心向中朝，汉人去的人数又多，所以受中国文化的陶冶已经很深，就广义的文化观点讲，琉球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琉球王室姓尚，其都城首里的向翁毛马四大姓，都是汉姓。琉球很看重久米村人，久米人完全是汉族后裔，主要是明太祖时所赐闽人三十六姓的子孙，万历又续赐阮毛二姓，还有不少汉人在那里寄籍起家。琉球国王所用的官吏中就有很多汉人。例如《明史》载：永乐九年“中山遗国相子及塞官

^① 应是中国台湾。——编者注

子入国学，因言右长史王茂，辅翼有年，请擢为国相，左长史朱复，本江西镜州人，辅臣祖察度四十余年不懈，今年逾八十，请令致仕还乡，从之。”而且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洪武五年始封察度为中山王，从洪武五年到永乐九年还只四十年，而朱复已经辅佐中山王四十余年，可见朱复在琉球做官还在琉球藩属中国之前，琉球必然早已有不少中国人在那里，而且已经在政治文化上有相当的贡献。

琉球藩属中国以后，不断遣送子弟来中国求学。直到日本并吞琉球时，还有四人在北京国子监读书。琉球有孔庙，两庑收藏很多经书；傍有明伦堂，久米子弟在其中读书。又有国学和乡学，选择久米人做教师。秀才考试，出四书题和作诗一首。琉球人家中挂的字轴，上写四书五经的句子。琉球人程顺则家藏有宋朝朱子墨迹。国王尚温曾亲笔楷书寿屏十二幅，送册封副使李鼎元，以贺李母孟太夫人寿辰，书法得松雪笔意。琉球人用中文著的书也不少。

琉球的官制，也仿效中国，分为九品。此外如祠庙方面，除孔庙外，还有天妃宫，关帝神堂，土地庙；建筑方面，天使馆像中国官署，王宫像中国宫殿；风俗方面，一样有端午竞渡，中秋赏月。琉球陶冶于中国文化之深，真是不胜枚举。

所以日本内藤虎博士在他所著的《清朝史通论》里，也不得不承认琉球文化是由中国福州传去的。路透社记者战时随美军在琉球登陆，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自冲绳发电称：处处皆见“以中国文化为主的民族”。

四 结论

从以上所说，可见不论历史、人种或文化方面，琉球和中国的关系，决不是日本所能望其项背的。日本绝不能用这几点作为希望共管琉球的理由。日本大抵也自知不能和中国争琉球的宗主权，所以运用巧妙辞令，希望任何国家均不得取得琉球的主权，以遂其共管之私。须知开罗宣言明白规定日本所夺取于中国之领土归还中国，琉球理应在归还之列。日本没有资格要求变更。

我国政府以至今没有公开表示要收回琉球，或许是因为美国想要长期占领琉球。其实美国无此必要，美国占领横须贺以控制日本，比占领琉球好得

多。至于太平洋上的防务，多一琉球不过是锦上添花，然而因此伤及中国人民的心，实属得不偿失。而且我们所最不放心的是：如果美国长期占领琉球，可能为着节省人力物力，只控制若干战略性的岛屿或据点，其余部分允许和日本共管；那末日本就可以暗中布置侵略中国和南进的基地了。这一点我们尤其要特别注意警惕，不可放松收回琉球的决心。我们把这些实情告诉美国，不见得就会损伤中美友谊。方今国家多难，东北、新疆、旅大等问题自然比琉球问题还要迫切严重得多。但是一国的对外关系原是多方面的，燃眉之急要应付，未来祸患也须预防。政府应当早声明，并且准备切实的资料和方案，以便在未来和会上提出，正式收回琉球。

近来有人以为可以放弃琉球（见七月九日《大公报》刘子健的《准备对日和约》），不但自己先泄气，也过于忽视了琉球在中国国防上的重要性。从种种方面看，琉球应当归还中国，中国必须收回琉球。希望国人群起呼吁。

七月十九日于南京

论琉球归属问题——及可能纠纷的日本领土

李纯青

中国朝野几乎一致的主张要收回琉球。用的字眼是“归还”。理由大概是：“琉球不论历史上，地理上，都应该是中国的。”琉球革命同志曾也要求琉球重归中国。另方面，在日本也有六十余名琉球人在要求日本参议院讨论争回琉球。现任日本外相芦田均说：“日本要参加共管琉球。”又说：“琉球在北方有些岛屿本属日本，应划入日本版图。”今年六月廿六日麦克阿瑟在东京对美国记者团谈话也曾提到：“美国必定保留琉球。由该岛的空军基地，保护或监督日本。”据说，苏联也表示过要托治琉球。总之，至少现已有四国（日本在内）对琉球有占取之意。将来和会对处分日本领土，最纠纷的怕就是琉球问题了。

琉球以外的日本领土

大问题都解决了。

（一）根据开罗宣言：“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二）根据波茨坦宣言：“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其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我们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三）根据雅尔达协议：“南库页岛及其毗连之各岛应归还苏联。”“千岛群岛应割与苏联。”

以上三个应为和约根据的文条，已解决了日本领土的范围，（只有“其他小岛”一点未解决。）在这范围以外，“满洲”台湾澎湖解决了，朝鲜解

决了，南库页岛及千岛解决了。未解决的只有：（一）琉球。（二）马绍尔、马利亚纳，及加罗林三群岛。（三）小笠原及硫黄群岛。但（二）（三）两地，事实在美军占领下，没有第二国出面要求，其将归美国托管，已成定局。故未来领土争执实际只有两个问题：（一）如何决定归属日本的“其他小岛”？（二）如何处置琉球？日本利用未决定的，

“其他小岛”

一项，争千岛的一部分小岛，争琉球北部小岛，并和朝鲜纠纷。伊豆七岛与小笠原群岛也有一些纠纷，但麦帅于去年三月二十二日有指令：“伊豆七岛及北纬三十度以南的孀归岩划入日本行政以内。”这方面问题可算解决了。

关于千岛

千岛本属俄领。一八七二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与帝俄谈判，先是要求购买北纬五十度以北的库页岛，俄国不肯；副岛乃建议：“日本放弃库页岛，领有得抚、国后、择捉三岛。”直到一八七五年五月才谈判成功，签订条约，日本放弃库页岛，换得千岛十八个岛屿（北起占守岛，南至国后岛）。这段历史，可为千岛与北海道划界的根据，很自然，也很合理，日本不应该横生枝节。

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小岛，日本海里的郁林岛、竹岛及朝鲜半岛以南的济州岛，当归朝鲜；这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麦帅指令里已予确定——在日本政府行使政权之外，应已没有问题。将来问题是：

对 马

对马是一个小国，与日本离合无定，和朝鲜关系很深。尤以镰仓时代，由少貳氏，阿比留氏，至宗重尚氏国内屡经篡夺，有时朝贡日本，有时也服从朝鲜。一四四三年对马藩主宗贞盛就与朝鲜约，每年遗船五十支。但现在对马问题是战略的，不是领土的。苏联有一本普里波依著的著名小说，以“对马”为名，描写日俄战争时波罗的海舰队在対马海峡东被乡舰队歼灭。苏联念念不忘于对马海战。在日本神功皇后及丰臣秀吉前后二次征朝鲜时，

在蒙古远征日本时，每次战役都通过对马。对马地位冲要，锁钥日本海，连系日本与大陆，不啻远东的达达内尔（Dardanelles）海峡。为监视日本复起侵略，扼住其“大陆政策”的咽喉，我们应使对马离开日本，交由联合国（似以苏联为适宜）托管。

以下说琉球问题，先说：

琉球的地理范围

日本的冲绳（Okinawa）县，并不等于琉球。一六〇九年足利时代，将军岛津家久发兵三千讨琉球，生擒其王，并吞了琉球的大岛、喜界岛、冲永良部岛、舆论岛。此拦腰一斩，夺去琉球约三分之一土地。所夺诸岛在一八七一年废藩改县时，置于鹿儿岛县下，直到日本投降止，还属鹿儿岛县大岛支厅管辖。现在日本要争的就是说这些岛原属日本，不属琉球。这要求当然是不合理的。我们应使其合浦还珠，恢复琉球的完整。麦帅指令规定“琉球群岛中北纬三十度以南各岛（包括口之岛）”在日本行政以外，即将一六〇九年岛津的剥夺归还琉球，如此措置，极合情理。

这样，所谓琉球应指自口之岛起，向西南蜿蜒到与那国岛止，计大小岛七十余个，面积三三八九方公里。人口，琉球人约六十万。（一九三〇年调查是五七七五〇八人）在大岛郡（大岛支厅）内有二十万日本人是九州岛来的移民，应请其乔迁故土。若依大岛郡为界，口之岛以北的硫黄岛、口永良部岛也应归属琉球，那是吐噶喇火山群岛的一部分。只有屋元岛种子岛是属熊毛支厅的，那没有问题应入日本版图。

琉球归属问题的解决，在战时联合国所有文献与协议，都不能找到根据。那是“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开罗宣言），日本必须吐出，吐出之后，就不知应给谁了。联合国对领土有个消极的原则，即：（一）大西洋宪章“不得自行扩张势力或领域其他。”（二）开罗宣言“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这个原则就是：不是你的领土，你不能扩张。若任何国都不该领有，又不该让“敌国”继续占领，则其解决之道不外独立或托管。前者像朝鲜，后者像太平洋前日本代管岛。因此讨论琉球问题可假定有三条路：归还，独立或托管。

我们主张“归还”在法理上站得住吗？

领土的取得，在国际法上，有先占、割让、买卖及赠与等。但自第一次大战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以来，最重要也最合理的是根据这个原则，尊重民族的自由意志。但战胜国可以禁止战败国对某国某地不得合并。例如《凡尔赛和约》就规定了德奥两国不得合并。我们对琉球，无疑的，有权不许琉球公民投票归日本统治。除了日本，琉球和中国关系最深。

有史为证

琉球的名称有琉求、流球、瑠求、流虬等。始见于《隋书·东夷传》，《宋史》《元史》也有记载，但当时海上情形不明，所谓“琉球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澎湖，烟火相望。”或误指台湾，或包括台湾在内。到明朝，则已完全明白，明太祖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遣杨载使琉球，诏云：“……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邦播造朕意，使者所至称臣入贡，唯尔瑠求在中国东南，远处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遣使数次未达，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三）琉球首里按司始受封为“琉球国中山王”，随后还有“山北王”“山南王”受封，当时琉球三分为“三山”，三山内讧，明主辄为调解。初送闽人十八氏入琉球，任通译，永乐年间增加到有“闽族三十六姓”，由是琉球风靡了中国文化。三王也各遣子弟入明留学。尚巴志统一“三山”以后，亦为中国藩属。明亡清兴，琉球再受册封，二年一贡。其间岛津家久战胜琉球，并剥夺了奄美群岛，但日本船到那霸各地通商，极怕中国知道，琉球政府必下令：“（一）使船到时，凡日本年号日本人名书集及此外所有惹动人目者，该船主可各自藏避。（二）日本歌日本语言，或与人以日语对谈，皆为不宜。（三）不可现出日本的风仪。”明英宗正统四年（一四三九）在福州南台外设蕃使馆，专管琉球事务。后改为琉球馆。直到一八七三年琉球王尚泰被迫向明治进“王政维新”的贺表，明治诏封尚泰为藩王，列入华族，正式并吞琉球，福州琉球馆事务，乃移转到厦门日本领事馆。但这件事：（一）没有获得琉球官民的同意。他们始终不听命令。一八七九年日本废“琉球藩”，改冲绳县。命尚泰“上京”（东京），尚泰图谋反抗，后来日本是用军警力量解决的。（二）中国始终没有承认。一八七九年美国卸任总统格兰顿来游远东，曾出面为琉球问题斡旋，中国建议割岛分隶，因受日本反

对而无结果。一八七四年西乡从道侵略台湾，就是借口保护琉球人民的（因有琉球人五十四名被台湾生番杀害）。清廷昏庸，先谓“生番化外之民”，继与日本定约偿付抚恤银十万两。此事虽有精神上默认琉球与日本的关系，但中国无明文放弃琉球。（三）在日本并吞琉球时，琉球已与美法荷三国订有通商条约。法国军舰最先于一八四四年到那霸，英国次之（一八四六年）。美国最先于一八五三年与琉球订约，法国继之（一八五四年），荷兰是一八八八年和琉球订约的。一八七三年美国因日本占领琉球曾照会日本政府，谓“应任琉球维持条约义务”。日本答复照办。实际上，欧美各国也没有承认日本并吞琉球。总之，琉球平白入日本版图，任何方面都是一笔糊涂账。

上叙史实说明：（一）琉球为中国藩属，历数世纪之久。没有一国比得上中国和琉球的关系。（二）琉球有自己的政府及国王，长期维持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论“归还”无疑归还中国。但我们要求归还会碰到一个难题——民族。琉球只是中国的藩属，不是中国直接统治的本土。中国对朝鲜，对越南，也有过这种藩属关系，然而民族不同。基于民族的自由意志，民族自决原则，他们可以加入中国，但也可以独立。

琉球民族

是混合的。据加藤三吾著《琉球研究》一书称：“琉球人种有：（一）马来眼，方颜、广鼻无须的。此系乃从菲律宾台湾北上者。（二）蒙古眼，狭颜，隆鼻的。此系乃从九州南下者。（三）久米村一部落，是闽族三十六姓的后裔。（四）原始住民是倭奴系。”琉球革命同志会谓：“现在琉球人六十万里头，闽族三十六姓占六分之三，北方系统六分之一，南方系统六分之一，杂系六分之一。”在琉球民族里面，有中国人的血统，但请注意，三十六姓有许多是赐姓的。其语言也混杂着中国语日本语，有些地方则混杂着倭奴语和马来语。其风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久米村有孔庙，崇元寺有下马碑，瑞泉有很多中国人刻石题字，端午节有龙舟竞渡等；但同时马来与日本习俗也到处存在，琉球有自己的历史，诗歌，戏剧等等。看这一切，我们实不能说琉球民族和那一国的民族绝对相同。自然，也不能说是中国民族。关于三十六姓是后来去的，居客卿地位，已归化琉球，既不是征服民族的统治者，也不是一支有独立意识可以左右及领导琉球的多数民族。

依民族自决原则，琉球人民可以要求加入中国，那是他们的自由权利。反过来说，中国似不能强迫琉球归还中国。假使琉球人民的自由意志选择的是独立、解放，他们希望恢复他们的国度，愿意重树三巴国旗，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加以赞助，好像赞助朝鲜独立一样，赞助琉球独立比要求归还琉球实在要漂亮得多。假使琉球历史是往独立解放的路上走的，那么，

托治

就不过是权宜处置了。为占领琉球，美军对日军恶战八十三天，双方死伤十余万人。美第十军长巴克纳，第九十六师副师长伊斯利，且以身殉。凭这壮烈的牺牲与战功，无疑美国最有承受托治琉球的资格。中国也有资格。但和约应规定：琉球托治是暂时的，其性质与朝鲜相若，经过相当时期，应让琉球自由独立解放，不可把琉球看成太平洋代管岛那样决定，作永久或半永久的托治，永久托治对琉球违背民族自决原则，也违背联合国信誓旦旦“不扩张领土”的宣言。因此，我想我们对琉球的健全主张似应为：

（一）首先让琉球人民投票愿不愿意加入中国。

（二）如其不愿，则实行有期限的托治，扶助琉球民族自由独立。托治形式，可交一国或数国共管。

（三）托治国不得有久占琉球的企图或设施，并不得利用琉球作战，除非为对付日本。

（四）联合国保证琉球永远脱离对日本的从属关系，并保证其永不受侵略。

以上所论完全站在法理立场，排脱利害及自私的观念，并不以主张当作一种手段或宣传。将来琉球问题怎样解决，未可逆睹。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及现在人们都忽略了琉球民族，许多写殖民地历史及写日本殖民地历史的书籍，独缺琉球一章。我们强调了民族问题。琉球虽然弱小，我们不能不尊重其有过独立与斗争的民族自由意志。

各地通信

宋子文的政绩·政策·作风·资本

本刊特约记者

他控制着全国的金融、粮食、衣料、物资
他可以无视党内党外的意见，独行其是

（本刊特约南京通信）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院长的职务，早已超过一年了。在这一年中，他享有很大的权力。除了蒋委员长兼任院长的时候外，从没有一个院长有宋那么大的权力。他像白宫中美国总统那样，在内阁阁议（行政院院会）时总是坐着说话，而其他阁员（部长）都必须站起来发表他们的意见。他控制着各省市政府和各部会的预算，这就等于间接地控制着他们的工作。他重新掌握他曾一度失去的中国银行，他经由贝总裁的手又掌握着中央银行，他对黄金外汇以至证券交易所等比较次要的金融问题，都直接发号施令，决定政策。他经由徐堪部长控制了粮食，经由中纺公司控制了衣料，经由刘攻芸局长控制了敌伪的物资，并经由刘鸿生执行长控制了善后救济的物资。他的经济力量伸张到进出口和其他事业。在他直接指挥之下，成立了“最高经济委员会”，控制全国经济的机构。至少就经济而言，他的权力是十分巨大的。不但如此，他现在是在得着蒋主席的充分支持。过去蒋宋之间虽然曾有许多误会，但自孔氏在中外舆论攻击下下台以后，蒋宋之间的关系却显得密切和友好了。在蒋主席无条件支持之下，宋是有恃无恐的。他可以拒绝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参政会的邀请，不出席作口头的报告。他可以忽视党内党外的舆论，推行他所认为应推行的政策。除了蒋委员长自兼行政院长外，哪一个行政院长曾有过他这么大的权力？

他的权力虽大，但也不是没有限制的。他不能过问军事。在军事方面他是要尊重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的意见的。他也没有过问国共的政治商谈。除了最近他曾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外，他对各党各派的政治协商是完全不过问的。记得去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陪都开会时，他除了为欢迎马歇尔将军一度返渝外，全部时间都在收复区工作。他的兴趣似乎是集中于经济，所以自从国府还都南京后，他在上海的时间超过他在南京的时间。因此对于宋院长的活动，住在上海的人或较住在首都的人为亲切。编者要记者就南京的观察对宋院长一年多的工作作一通讯，其实南京的消息或者反不如上海那么迅速与准确。因为宋院长与其说是属于南京的，毋宁说是属于上海的。

声望的低落

宋氏是在日本请降前夕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当时宋氏的威望甚大，各方对他的期望甚深。他就任以后，却来了一连串的引人反感的措施。当然，引起反感的措施不一定是错误的措施。但引起反感太多，自然就会减低了他的声誉。

在各种引起反感的措施中，下列几点是比较严重的：第一是黄金存款强迫捐献四成。黄户应否捐献，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宋院长的办法是赞成黄户捐献的人，也承认有两个毛病：（一）这个办法不公平。因为在别的人没有捐献时，单独强迫黄户捐献是不公平的。在黄户本身，一两的存户不要捐献而二两的便要捐，也不能算是公平。（二）最严重的是这个办法使政府丧失信用。孔祥熙氏的十多年的财政部长，虽然有极多可以批评的地方，但也有一个——事实上恐也只有这一个——收获。他的收获是替国家树立了信用。在过去十几年中，凡政府在财政方面所答允的事，政府都是百分之百兑现的。甚至在抗战初期，政府为着维持信用，还归还了不少的钱给日本国！这种经十几年才树立起来的信誉，宋院长轻轻地便把它毁灭了。第二是把伪钞折换法币比率定为二百比一，这等于对收复区来一个突然的通货膨胀，使整个中层阶级都受到严重的打击，使收复区物价，不能不作跳跃式的上涨。在这个比率决定以前，陪都各报对这个问题都不主张定在二百比一（据说伍启元氏主张定在一百比一，谷春帆氏主

张定在五十比一，没有人主张定在二百比一)，而宋院长决定了二百比一的比率。这个比率的后果，大家都很明了，用不着记者多说了。第三是接收敌伪物资时的种种不法行为。这虽不是宋院长所能负责，但他既是院长，则也免不了要受批评。第四是压低公务人员待遇，而对公教人员提高待遇的要求，缺乏同情的考虑。这曾引起立法、监察、司法三院的联合攻击。第五是对民族工业者缺乏同情的援助，结果引起民族工业者的公开的抨击。第六是对金融界也没有多大的同情，六月底金融潮中便有不少的人对宋院长有不满的怨言。第七是对出口业缺乏及时和有效的援助。宋院长从来对农工是没有关系的。过去宋的主要支持者出自中层阶级、公教人员、购买公债和黄金存款的储蓄者、民族工商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等。但在短短一年间，宋院长把所有这些人都开罪了。今日至少就首都而言，宋氏的声誉真是一落千丈了。

宋氏的政策

许多批评宋院长的人，常谓宋无政策。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宋自始至终，对国家财政经济有一贯的看法，有一贯的政策。宋的看法有二：一为今日中国基本问题为物价高涨，而物价高涨之原因在通货膨胀，在财政收支失衡，并在物资缺乏。二为今日中国工业过于幼稚，不足重视，而商业与金融亦然。基于前一种看法，宋有三个基本政策：一为财政收入愈多愈好；二为财政支出愈少愈好；三为物资供给愈多愈好。他的黄金捐献政策，他的许多开罪工商界的政策，都是第一个基本政策的结果。他的二百比一的比率，他的压低公教人员待遇的政策，他对农工商出口金融等业缺乏援助，都是第二个基本政策的结果。他的低外汇政策，他听任外贸倾销，都是第三个基本政策的结果。由于他轻视工商业的看法，他对工商业界的责难，是不予重视的。

宋氏的资本

宋院长上述的政策在今日还是行政院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是否正确，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最近宋氏认为他的政策已经成功了，七月份法币没有增加发行，就是最好的证据。宋氏对国事最近一点没有放松，他是十分积极

的。无论各方对他有甚么批评，他却有他的支持者。在政治上，他原有三种资本：一是美国人的交谊，一是蒋主席的支持，一是他自己的强大金融商业集团。不久以前，此间盛传他因为要加强自己的地位，可能与某集团发生密切的合作。最近因他曾与周恩来晤谈，此间又传他正在采取种种措施，使万—“联合政府”成立，他能成为“联合政府”的首任内阁总理。

(九月六日自南京寄)

从中国乡村看中国政治——一个政府简任官吏的回乡见闻

本刊特约记者

丰收医治不了乡村的残破和创伤
征丁不知葬送了多少青年和家庭
乡长保长甲长只知要钱要粮要命
剥削又剥削，农民尽变成了赤贫

（本刊特约皖中通信）八月的乡村，在江淮地区，正是收获季节。今年又是丰收，一望无垠的黄稻，倒卧在田中，等候着刈割，一筐一担地被运到新打平的“场基”上。这时度着一年辛苦生活的农民，在枯黄的面庞上，才透出这一丝笑容。“大概今年可以舒一口气吧!?”这是他们对道旁人询问的答复。

我偶然得到一个旅行的机会，地区是合肥舒城几县，都是皖中地带，也正是江淮区域里的“谷仓”。四年未回去看一看的故乡，也凑巧在这个区域内。旅途经过了十几天，在故乡又耽搁了八九天，这才完成了“深入民间”之行。从老百姓的生活和言谈当中，体验到各方面，尤其是政治措施在乡村的反应，真是最接近事实的说明了。

从芜湖搭内河小轮到巢县，再换汽车到合肥，这是淮南铁路拆毁后唯一的交通线。在我们刚要离开芜湖的时候，曾得到汽车在含山境内被劫的消息，为着安全起见，才改走水路到巢县。船上饱听船客们说着几天来劫车的新闻，据说暴客们很有礼貌，在劫搜旅客的行李法币以后，还集合失主演讲一番，说明他们并不是绿林出身，这样做是酬答当局的整编盛意。这时如果

有身穿制服类似军工人员，那便不客气地饱以一弹。这在他们也有理由，他们说“一碗饭大家吃，吃不成，咱们便拼。”这是何等愤激的刻画!?

今年虽丰收 农妇仍多愁

从合肥出城，一百二十里到舒城，中间交界处有两个大乡镇，一是花子岗，一是桃溪镇。前者属合肥，后者属舒城。合肥的西南乡，还不能算是瘠苦的地方，可是干旱连年，胜利前受着敌伪长期的扰乱，游击队伍的游击，胜利后散兵零匪的骚扰，虽然是丰收有望，依然医不了村落残破的创伤。我们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车，五里或十里，总要休息一下。休息地方，只有几家所谓“店子”的茶棚饭店，水是黄得成了泥沙的化合物，入口咸苦，饭是糙米，在桌上蝇虫横集的一两盘咸菜，那便是可口的佳肴。妇女是黄肿的面孔，蹒跚的脚步拖着正在乳哺的婴儿。一两个赤足泥垢的孩子们，正伸手向行客讨钱。老太婆们以待死的眼光，望着路人，可以看出她们都是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的线上。不要忘记，这还是未受内战炮火的乡村啊!

胜利带灾殃 极目尽凄凉

桃溪镇，这山环水绕的市镇，在战前，是米和山货的吐纳地。六安霍山一带的生产品，经过这里运到三河，从巢湖出口运到芜湖。可是八年烽火，敌我的拉锯，把这—个丰裕的市镇，也变成了疮痍满目。胜利带来的灾难，土货滞销，手工业奄无生气，这街上几家土烟厂，也都关着门叹气！在暮色苍茫中，旅行者进入口街镇，触目的都是“剿匪”的国军，几几乎要望门投止。

收租客一到 佃户命完了

桃溪的茶馆，还是不改当年，一早上便挤满了。茶客多半是收租客，面对着赤脚泥腿的佃农，大谈其今年田租的折扣成数。“今年是丰收了，东家也实在过不去，二五减租，只有在陈欠上扣了。”收租客这样地主张。“可是我们今年是外面好看呀！将临秋收一场连阴雨，外滩的田亩，都变成湖泊。先生，你刚才过渡来的地方，正是我们的田地呀！只有再息情了！”佃户这样地哀求。旁边人说话了：“大户余粮，还未了结，委购军粮，你们府上还欠的很多，不问你们东佃怎样讲盘子，这点手续，请你老哥清掉罢。”像无

情的钻子，楔入不幸者一群的中间。旅行者不能等着他们谈判结束，只好继续登程。

地皆地主有 农民直如牛

从桃溪到舒城，这个荒僻的小县，只有以舒席著名。城墙拆成了马路，城内人家不到二百户，可是环城绿树，风景清幽，绕城的土地，都是种着烟叶和靛青，农村副产品的收入，每每超过正项收获所得。可是在那里，没有看见农民的经济组织，没有看见乡村任何建设，原因是土地全属于地主——城内的绅士阶级，留在乡村的都是佃农，不想也不能做点有意义的事业。

出舒城进到庐江的境界，经过的都是些圩田，正是秋水初泛的季节，道路被水冲坏的很多，一两处桥涵冲断，也没有济渡，便只有解衣渡河的一法。走到了柏神庙，算是大镇，街上像止水一般的静。少数商铺在半开门的状态中，原因是正在农忙，无人上街。街上的病人很多，只有一个自称西医的走方郎中，忙着为病人打针。打过针的人，手臂上多半溃烂，大概是针不消毒的原因。谁还知道他正是掌握人民生死大权的人呢？——其实乡村里都是这样，并不止此一处。

无人怕当兵 只怕绑与病

乡村最使人感动的是农民的朴素坦白，他们的感情最容易表露，对环境的反应也最快，最直率。所可惜的是做政治考察的人不能和他们之间，建树真诚的了解；作为一个还乡游子而又沿途访问的我，便突破了这些障碍，在他们和她们之间，进行自由坦白的说话。

首先他们倾吐对“征壮丁”的回忆。他们把征兵叫“拉壮丁”。说在去年以前还拉壮丁的时候，保长、甲长老爷是真忙呀！今天张家请，明天李家请，只要不上册子，什么条件都可以，哪个愿意去当兵？为什么呢？他们会说，并不是怕当兵，而是怕捆绑虐待。王家庄子的王老大被拉去逃了回来，一个精强力壮的壮丁，变成满身疥疮既疲且黑的病鬼。许多人关在一起，六月炎天，不让他们洗澡，一天两顿稀饭，睡倒还要用绳子穿在一起。谁愿意下这个活地狱呢？保长甲长的威风，在这方面最能表现，真是予取予求，葬送了若干有为的青年，使他们学会骄奢淫逸，失业之后没有办法生活。同时也

破坏了若干良善的家庭。在胜利后征兵停止一年，农民离村的现象减少，今年收割期才消除劳力缺乏的恐慌！但是“自愿壮丁”，又似乎是在奉令征集了。

乡间多衙门 治安无人问

乡村的组织，较战前不同了，从前只有保甲长和绅董式的联保主任，在今天，新县制实行了，连保长也有了办公处。乡公所更是个像样子的衙门，民政、文化、经济、警卫各股之外，还有所谓乡警——其实是从前民团乡勇的变相。此外还有乡丁保丁俨然是变相的差役，农民对于这些……只有一个印象，就是“要粮、要兵、要费款”。事实上，这些机关和人民的关系，也只有这几件事，其他的自治事业，在乡村未看见也未听见。天天喊着严密保甲，可是户口的正确数字，乡公所里依旧没有。保甲长之流，也并不曾逐层递查。乡村里治安还是依自然季节的情形而不同；收获季节，土匪或偷窃较少，可是去冬今春，暴客们便常常光顾。我们一个本家，本来家道小康，就是经过不断的抢劫而穷的精光。乡下人说的好，只有靠穷、跑两字应付。因为穷，无可供给，暴客们对之不感兴趣；能跑，更不致受到无理的敲打。每到有匪警时候，乡公所的乡警，总是“保卫第一”，不敢下乡，但捐费的征集则荷枪实弹而来。

七娘八老子 征实祸又至

谈到抗战期间征粮的故事，那更一言难尽。乡下人也报不出名目，真所谓“七娘八老子”——不知从哪一件说起。上年胜利后委购军粮，当时的官价和市值并不甚远，可是一再勒索，乡保长压在手中，不肯放出，只是无穷尽地逼迫人民交粮。各处粮价平地涨起，原来的官价不敷更甚，更无人愿意承购，来交的只是些无权力，无地位之平民阶层。现在中央停购了，省级清理此事，出粮尚未拿钱，已收粮而又卖出，便宜了乡保长，也增加了纠纷诉讼；这只是一个例。前几年省政府在立煌，有一次为敌寇攻陷，各乡已存之粮曾命令散给人民领用，到胜利后，政费无出，重又追索。在广江县前任县长某君，因为挪用一笔经费，（好像是县级公粮超支），竟异想天开地摊派下去，把已追的疏散粮扣用，抵到人民头上，以至于胜利后一年的今天，乡里还在催“疏散粮”。像这一类的缠夹帐，乡里人怎能了解？又加之乡保长新

陈交替，交代不清，更没有办法来澄清这一笔糊涂帐。政府贾怨，人民受害，归结起来，还是“征实”的德政！因此乡下人听到今年仍要征实，真是惶惶然如大祸之将至！

造产不造 造产捐倒要

自从抗战以来，政府就在推行新县制，最注重的地方事业，便是乡镇造产。立法的人确是“以仁心行仁政”。安徽并曾宣布过某一年度做造产年，县预算上列入造产赢余，舒城一县即列收一亿余元。可是在乡村看不出造产的痕迹。问保长，他回答你收益分存在民间。其实按照预算或计划所列的数字，秋季按户摊筹，冬耕的麦子收益如此，鱼塘也是如此。总而言之，摊派而已！所以乡下人只知道是“造产捐”，而不知有造产，这真是我们推行新政的一面镜子！

剥削又剥削 殷实成赤贫

连带着说到乡村里的摊派问题，又发现保甲长先生的筹款妙法。原来他们摊派索取，常趁着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乡下人应缴的费款，可以按照当时米价，作成实物，再加利息，变作借贷方式，由保甲长代垫，到秋间照收新谷。许多殷实人家，都因此破产，而乡保长非法的所得，也只能供给应酬浪费，农村财富，日渐消耗，渐渐只有富豪和赤贫两类人对立在乡村中，正是政治压迫配合经济扰乱的结果！

整个农村病 一言难以尽

这些积极的摧残之外，我们看看乡村里旧时的水利事业，和勤朴的风俗，都渐渐变态！塘堤已经是十几年未修了，圩堤也只是东填西补，县城里所谓建设科长，并不下乡，只是坐在衙门里，办点文书工作。风俗呢，却因为保甲长容易发财，数量又大，引诱坏了多少青年？农民财富无保障，也不肯勤劳工作，节俭储蓄。游手好闲的分子，日有增加，赌博竟成了公开的娱乐。教育者，没有注意，也没有多少教育工作，虽然是标榜着“保一校”。

且看秉政者 如何谋改革

上面这一套，皆是实在见闻，未加丝毫藻饰。于此得到几点感想：

第一，中国的乡村，还是二十年前“贫愚弱”的状态，而我们的政治建设能力却更退化，今天以后，还需要从头做起。

第二，乡村在没有战争烽火的地方，犹且如此，那末正在战争的地方，又当怎样？中国实在需要和平，实在需要建设！

第三，人民不了解政治，而又没有权力过问政治，才酿出今天基层政治贪污的现象。民主政治，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亟需普遍地实现了。

第四，农村的经济，到了枯竭状态，高利贷的魔手，控制住整个乡村，而正当负农贷责任的银行，走遍两三县，未见一处。战前稍有规模的合作事业，也在农村里退却出来，尽管土地改革论者主张怎样改进农村土地制度，可是高利贷的现象不消灭，无论地主佃农（当然大地主挟有资本者在外）皆要同归于尽！这实在值得农业金融的主管当局慎重考虑的。

第五，治安不良，固由于经济枯竭，而大量整编军队，编余的官兵，不能消纳在工商业的部门，任他们自寻生活，不止是地方秩序之隐忧，也是国家的大患。明末的裁驿站，曾引起遍地流寇，现在又岂容忽视？

浙江的征丁征税

本刊特约记者

（本刊特约杭州通信）浙江各县现在正在忙着征兵，征粮，征税。

目前全国，除京沪区以外，突然来一个临时征兵，浙江当然不能例外，于是各保各甲办公地址，门庭如市，先是由各保将保内所有二十岁至三十五岁年龄的壮丁名单公布，再由各壮丁于二星期内，办理免缓役或免缓召之申请或更正有无错误等情。二星期后，即由保民大会代表如保甲长小学校长或区分部书记或地方士绅等，会合审查申请是否合格，免缓征召是否可以准许等等，再抽签编号，排定壮丁名次，以保为单位送交县政府，会合各乡镇长及民意代表等当众抽签。就原送各保之号次，抽选应抽各县派额之壮丁；比如嘉兴县要抽七百名壮丁，而嘉兴共有七百保，那么就是每保抽一名。虽说每保一名，实际却要抽二名，以便补递第一号签之缺额。抽签的办法是以最多号次之保的号数为准；抽出第一签如果是七三号，那么每一保的第七三号都是第一号签，第二号若是四十九号，那么每一保的第四十九号签全是第二号签。后来，再拿第七十三号去对各保的第七十三号，一共是有七百名；这七百名壮丁被集中到新兵征集所，再由各县转交给各新兵接收的师管区接收，再在各县就地加以军事训练。

兵从前门进 丁从后门逃

兵守前后门 壮丁上屋了

但是在浙江的征兵有它特殊的现象，比如听说在某县是各保壮丁愿意拿出三五百万元买一名壮丁去应征，不论你抽的是第十三号为第一签亦好，第

一号为第一签亦好，它本人总可以不去应征，而去应征的是买出来的“丁贩子”去“替征”。这位丁贩子拿了三五百万元之后，当然要去应征，但是它的本领神通特别广大，一到征集所，它就会溜之大吉，或者是钱能通神，皆大欢喜的堂而皇之的出来。而征集所报他一个“死亡”，简直是死无对证。而“丁贩子”又可以去做另一笔替丁生意。有时征集所也会报他一个逃丁，那么就要三令五申通令全省捉拿，而这位逃丁只要回到本地无人检举的话，它的名字就一笔勾销。假如这位逃丁捉不回来，那么第二号就补上去。反正我们国民身份证亦没有，更无从对照起，同时只要上下都行官样文章“捉拿逃丁”，那么就让它去文章一下，亦无所谓。总之为了抽丁，竟弄得鸡飞狗上屋，比如半夜里征集令一到，那么这些壮丁就等于是犯了法的犯人，要毫不留情地被押起来。但这些壮丁却往往要像逃日本人时代捉爱国犯那样的逃法，“兵从前门进，丁从后门逃，兵守前后门，壮丁上屋了。”在一阵搜查之后，一无结果，兵回去了，壮丁亦回家了。这是一位亲自下令捉过壮丁的×县长所亲口告诉记者的一幕活生生的描写。

大员来点名 赶快找替丁
点完且应酬 民隐丢脑后

关于训练壮丁，过去在浙江××县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上级派大员先来点名，而这个训练所就要事先闻报以后，临时雇了几名“老百姓”去替充。先要叫他改名换姓，乡下佬实在亦太笨，连自己的姓名都弄不清，要改名换姓，就比毕业考试入学考试时的学生还难做。结果点到了“张得标”忽然有两个人同时举起手来，还高叫了一声“有”。要么，一双手亦没有举起来，要第二次点“张得标”时，才有一位忠实脸相的老农慢吞吞的举起一双正在田里做过活的手来，叫一声“有”。大员们点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对负责的连排长望一望，简直有啼笑皆非之慨。最后是训话一次，训过话还要问一声“你们懂不懂？”大家一定要一齐高呼“懂！”于是队伍散了，每名发五十元临时饷，各人仍回庄家去做活。大员们则照例去聚餐。聚餐时一定又请了民意机关的代表、党团首长、县长专员等作陪；同时在席间一定要问“这个部队纪律好吗？”全席说“好”“好”。有一次记者亦在座，有一位老先生说壮丁如何痛苦，饭吃不饱，衣穿不暖，纪律如何不好，管理人员如何限制壮丁

吃一碗饭而不许吃第二碗饭，以及排长如何打壮丁，壮丁在中途步行的时候就倒在地上死去了的惨剧……这位大员过意不去地推脱说“我给你转陈上去”。结果这位老先生在散席以后就有军官警告他不许乱说，否则就要给它颜色看了。所以以后有同类情形，大家便同声说“好好好”以免多事。

田主怕有田 佃农怕耕田
从此田芜荒 肥田亦无粮

浙江各县市，目前新设立了两个机关。一、就是田粮管理处，机关属省，经费由中央直拨，而驻县征粮。二、为县税稽征处，机关属省，经收省县税，而经费由县负担。前者虽然经费由中央负担，但是中央至今未到分文，而粮却要即刻开始，即或粮票的承印费都要县府借垫。人员的开支要副处长自己想法筹。目前浙江受了秋季台风以后，田禾损失极大，要民间负担简直要送他们的老命。所以地主为了征粮及二五减租，不愿再有田产。有一位有一百亩田的地主只收到八担稻子。佃农为了征丁，亦不愿再种田耕地，去流而为匪的亦有。结果为了逃丁逃粮，耕地便乏人照料；壮年农民改业，肥饶的土地亦只好让它荒芜。至于税务处的编制和田粮处的编制，是远在县政府本身之上。比如浙江的甲种县人员连县长是七十人左右，而稽征处田粮处两处人员总计要在二百名左右。六等小县县政府人员只有四十余人，要它负责管理全县的一切民、财、建、教、社、军六大课三大室会计军法人事，再加一切上行下行的公事，而平均每课室连科长只有三个人一课；至于稽征处只管一些税收，它的组织却在五十人左右。所以田粮处和稽征处是安插冗员的机关，和要人民性命的组织。最有趣是中央明明要废除苛捐杂税，但是到县里，简直是对教育经费，可以用任何方法摊派。同时还有一种叫做“因地制宜税”，更是就可以由各县随时因地去制宜而加以课税了。

县级人员苦 仍有钻门路
街都无力扫 一切不了了

目前浙江各县财政极感艰苦，县级人员的收入，平均一人只有三五万元，县长只有二十余万至三十余万元。这样的待遇如何教它养廉，连养自己的必需三餐和一家五口都过不去。最近有一位县长新从中央调过来，据他告

诉别人说，“我在中央亦有四百元一月，照京沪区倍数计算亦不算少，这薪金，亦可以算中级了；但因为想做县长，设法弄到一封大八行，介绍给省主席，结果县长发表了，到了任，接手以后，至今已三月有余，简直日夜未安过，日里忙征粮征丁，夜间要担心盗案匪案，但是每月收入只有廿万元。家庭亲友都以为我做了县长了不起，你亦介绍，我亦介绍，有一位亲戚在上海某商店做事，月可十余万，拟请以科员任职，结果回封信告诉他，本府科员月薪一共收入不过三五万元，君如愿屈就，不妨一试，结果，别人多不相信，何以浙江待遇如此菲薄，但是在如此待遇之下，还是一样的过去。”还是一样的有许多想当县长。

据说距浙江某县的江苏和安徽省一县，就有天壤之别。苏皖的特点是“薪饷要从下面发”——就是“以甲养保，以保养乡，以乡养县”。这样什么都有办法。所以相距不到五十里的二三个省的县长，一则马裤呢大衣，一则青布制服。县是自治的单位，一个县的经费收入要用在稽征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县，那么县政是不会有人亦不致有人愿意去办的。现在办县政无非是安插些人。什么建设，水利，民生，简直是幻想中之幻灭。所以有一位县长说：“我宁愿稽征处取消，让民众少负担点！其余的百分之二十五的捐税，由县政府另外交由参议会拿出办法来捐一些，即可以维持，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至于，在政治学里读到的市县政府的工作是建筑道路，开办学校，设立工厂……在今日中国的县政里亦不必想它一想。就是要把城里街道经常打扫清洁，都没有经费。还谈什么经费呢？还是少说话多推脱，安分守己做个县长吧！浙江过去有个县长，做了三十年没有处分一次，据说是以坐在衙门养身修性的办法来做县长的。同时大家还目之为示范县长。”

西安的面荒

本刊特约记者

铁路不运煤 煤面一齐涨
政府要管制 管制还是涨
征粮火急催 面价格外涨
花样虽然多 民食永远涨

(本刊西安通信) 一年以来, 西安的面价始终是很平稳的, 截至去年九月初, 每袋最好的面粉只售一万三千元。九月十日前后, 陇海路局忽然宣布, 因为军运繁忙暂停煤炭的运输, 这样一来, 煤价飞涨, 面价也就跟着上升。不过这时涨风还很缓和, 每袋上涨不过一两千元。

跟随着煤粮的涨价, 省政府又宣布恢复管制政策, 粉业公会首先响应, 每袋定价一万四千九百元, 普遍供应, 居民们可以凭身份证到各承销店去购买。但到了十月中旬, 情势忽然恶化, 市面上的面粉忽然像变戏法一样全都不见了, 偌多面粉承销店竟然看不到一袋面粉。黑市价格扶摇直上, 每袋竟达两万四千元之数。城内到处检查囤积, 面粉纷纷下乡避难。机粉固然买不到, 连土粉也不敢进城来了。这时苦了一般公教人员, 黑市面价既高又不好买, 商人们都不敢和他们做买卖, 因为害怕被检举。在那几天, 大家见了面, 差不多总要问问: “怎么样, 买面有办法吗?”

十一月三日在西安一条相当热闹的街上——南院门——发生了抢面的趣剧, 下手者多属知识分子, 把面抢完之后, 大家都按照“平价”付款。粉主突然遭此意外, 竟瞠目结舌, 不知所措。警察跑来干涉, 这些抢面者都掏出了他

们的身份证，向警察大喊：“我们拿着身份证，等了一个多礼拜，买不到一袋面粉，难道叫我们都饿死不成？……”这一幕“抢案”，遂不了了之。

这时，本年度田赋开始征收。据田粮处发表的数字，本省征实额为二百万石，并预计在三个月内收齐。乡间麦价，经这一征，便如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制止，每市斗由四千而五千，而六千，而七千。面粉厂商岂肯失此良机，于是经过“评议”，每袋加至两万零四百元。事实上这是官价，普通人并买不到。黑市商人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在城外大批囤积面粉，然后化整为零，改头换面，外加麻袋伪装，混运入城，每袋要卖三万余元。

到了十一月初，政府又决定“加强管制”了，办法是取消以前的承销商，而在全市设二十个供应站，每一供应站每天可分销一百五十到二百袋面粉。市民可以凭身份证去购买，每人每月限购一袋。第一期供应规定为七天。为什么只规定七天而不常川供应呢？一般人的猜测是七天以后还要加价。就在这种恐慌的心理下，西安市上，又发生了新的面粉抢购战。每天，天刚亮，供应站的门口已经黑压压的挤满了人，警察们用皮带，用棒子，抽，打，然后整理成一条“一字长蛇阵”。他们——这伙可怜的居民——耐心的在那里等候，不敢抽身去吃一口饭，喝一口水，等着，等着，还不知道能不能轮到自己买一袋面！

第一期供应期满后只停了一天，第二期就又开始。出人意料之外的，并没有加价。这项措施对市民心理影响颇大，供应站前已不如以前那么拥挤，外县的土粉也源源运来，价钱也开始下跌，由每斤七百元除至五百元，而且还有续跌之势。一般人都觉得危机已过，从此可以松一口气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机粉价格突然又经过“评议”而上涨了，每袋“官价”两万五。加价之后，舆情大哗，认为评议诸公举措蹊跷，不啻与虎谋皮，置五十万市民生活于不顾。其实，所谓“评议会”者，巨商富贾们之组合也，其中不乏粉业巨子，评定面价，岂能像教堂里出卖《圣经》一样，一味“克己从廉”。省政府方面对此亦有解释，说：“物价之调整，并非由政府管制，而系由民意机构与各厂商合组之评议会所商讨决定。”这样一来，岂仅推托责任，且无异正式宣布政府放弃管制，从此粉厂涨价更可肆无忌惮了。

面价突涨后，各厂商多额手称庆。十一月廿三日华峰面粉公司协理陈某在西安的大饭店之一——西安食堂——大宴宾客，席间并征女伶齐艳云齐冬岩姊妹侑酒。杯筹交错，笑声扬溢户外，狂欢之下，丑态毕露。

这时，西安城里在热烈的抢购面粉，外县和乡间也在热烈的进行着另外一桩事，就是征粮。粮食部还特别派来了一位督粮委员，由省田管处处长陪伴着到各县去督收。据报纸上发表的消息说，西安市赋粮的征收已突破“万石大关”，成绩是相当令人满意的。然而同时，小麦的价钱也就涨到了市斗九千余，听说这几日也已突破“万元大关”了。处此局势下，粉厂岂肯缄默，于是又涨。这次就来得干脆，也没经过评议会，直接由同业公会出牌，提为三万五，与黑市价钱看齐。

粉价再涨之后，一般小民除了哀天怨地之外尚有何法？这时忽然平地一声雷，“张恒忻律师为民请命，向法院告发粉厂。”张氏为本市名律师，又是市参议员，这次就以他参议员的身份代表市民向法院告状，说粉厂以扩大生产为名，向银行低利借款，拿来大批囤积小麦，磨出的面则善价而沽。尤其在放弃管制后，十天之内涨价两次，于理于法均有不合，所以特为检举，以求遏止。张氏这一炮放出后人心大快，然而有识之士就知道不是好兆头，不知要闯一个什么祸。果真，粉厂“职工”说：张氏意图买面未遂，挟私报怨，歪曲事实，侮辱了抗战八载贡献至巨之粉业从业员，因而全体罢工。这一罢不打紧，市面上的面粉又全不见了，有人说那两天的黑市到了五万元，真是骇人听闻！其实面粉涨价收益者是粉厂老板，张氏控告的也是老板，与职工又有何干？然而他们竟“自动的”罢工了！后来总算由于地方当局的调解，粉厂又复了工，而且宣布照常供给面粉。实际上现在想按三万五的价钱买到面粉仍然是不可能的事，铺子里能吃的面粉全不见了，只有几袋比麸皮稍强的所谓“通粉”放在那里，从来也无人问津，黑市价钱仍然要四万元。

老百姓们还有一线希望，就是政府出售赋粮，以求平抑粮价。据省政府负责人宣布，收来赋粮的一部分，是拨充省县经费，这部赋粮，仍然要出售的，所以对于粮价的平抑，当有极大作用。出场的办法也公布了，许多经济学家也为这问题发表了不少的意见，然而正是所谓：“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直到如今市面上还没有见到一颗出售的赋粮。而且就是出售，在省县经费如此拮据的今日，在连善后救济都要懂得做买卖的今日，赋粮岂肯自贬身份而作“平价麦”乎？这一线希望，实在也微弱的很。

（熙·一月十二日寄自西安）

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

王 水

这次学运是谁发动的？

（《观察》天津通信）这次学运，弥漫全国，震惊世界。这种历史性的运动，不免有人要问，是怎样引起的？谁是第一个发动者？关于北平这次的学运，我曾遍询平津各校，除却由于各别原因已在罢课中的学校外，这次学运的主流发源地，已归结到清华大学。清华的办法，向例是由提议者张贴布告，然后征询同学意见，反对者太多，或无人响应时，就作罢论，反之，支持者若风起云涌，即交到系级代表会商讨，就可能成为一个全体性的决议。这里面颇有舆论领导行动的意味。此次第一个贴布告的，已证实是土木系三年级班会，再问第一个倡导人时，对方则笑而不答。“土三”在清华，向有标准班之称，平素集体寝居，二三十人混如一体，所以也可能思想一致。同时清华北大南开三校一脉，南开因远在天津，故有事时总要迟一天，而清华北大两校，则同时举行，惯例向是如此。至于是否有共党在主使问题，我们愿拿常识来判断，若说北方各校完全无共党分子，自难令人置信，若说他们能操纵整个学潮，指挥几万万大中学生，威力如此，则早不会再像今日这样局处一隅了。所以发动者首应归到西南联大，此其一。王芸生“旷工北归”，十五、十六、十七三日在清华、北大、燕京作时事讲演，十七日北大、清华决议罢课，同日津版《大公报》破例以二版特号字首条标出，原地连刊三日，并作论响应支援，此其二。张群内阁托人在沪遍询和平资料，有张、傅（泾波）密谈，司徒北飞晤周、许、钱，而有三参政员的和平呼声，而有全国性学生运动的促成，蛛丝马迹，不无可寻，此

其三。南方的学运已先走一着，最初虽然是局部的，但在精神上及心理上，也间接燃烧着北方同学的情绪，此其四。反内战，反饥饿，是人民一致要求，无论何人，登高一呼，自会万众响应，群起支援，这是很自然的趋势，此其五。

天津《大公报》的态度

在我们比较读完月来津沪两版《大公报》后，深深感到津版《大公报》有划时期的进展。以“总管”制著称的《大公报》，此次一反其“抄社论”作风，大刀阔斧，纵横捭阖，津沪两版，在表理上截然不同。

统计天津《大公报》在此次学潮中所卖力气；计在十八天中，发表与学潮有关社论十一篇：《我们需要普遍安定》，《活与和》，《现阶段学潮》，《这仗不能再打了》，《论各地学潮》，《和以求安》，《南京不幸事件》，《演变中的学潮》，《这是人民的声音》，《理智、容忍、智慧》，《大学教授和平运动》。另外有专论三篇：《我看学潮》，《论学潮》，《时局与学潮》；三篇特写：《五月的一天》（记南大游行），《因饥饿内战而自杀的警察》，另一篇忘记。另外各地通讯也尽量容纳学潮消息，《时代青年》的副刊几乎成了学潮专页，《大公园地》也出现了学潮文字。除此外，在十七日清华北大罢课首日起，即连将此类消息，刊于二版头条三日，三版头条十五日（津市消息，亦由本市版取出归并），这样一直到恢复新闻检查后的六月四日，无学潮消息可载时为止。其显著的标题有《群情要求，和平安定，呼吁停战，改善员生生活》，《恍如五四重演》。并且在罢课首日（十七日），即于社论中说：“我们愿在今天揭橛这个全国争取安定运动……和平须停战，停战而和平，而统一……切望文化经济各界人士，团结呼吁。”这种作法，对智识文化界的影响，是可想见的。北方学潮之风起云涌，《大公报》不为无力。另外一点是，除该报的文字号召外，王芸生的口头宣传，得力尤大，他在天津公开讲演凡六次，其中两次为对记联的专题讲演，其余均与国事有关，他的“我对国事看法”，简直与学生论调一致，无怪要大博掌声，倍受欢迎。王氏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演时，学潮已开始，他对往邀者问：“我去有没有煽动学潮之嫌”。然而在他讲毕休息，同学问他学运的第二步骤时，他却率直答称：“自然应深入工商界，五四运动即如是！”王氏留津时，曾对编辑部同人讲话两次，面授机宜，内容秘不外泄，主要的态度为“居中而偏左”。王氏态度

对于天津《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者，显有极大影响。

严惩与缓治

北平五二〇万人游行，得以顺利完成，据说是完全为了坐镇北方的一文一武两大员——胡适李宗仁力争所致。两大员不顾“手令”，不顾“秩序法”，彻夜疏通了各机关，取消了预定埋伏，由此才有了翌日的成绩。天津则不然，飞起了石子、木棍，出动了暴徒、爱国大游行，结果南开、北洋两股主流分别遭“毁”，而不能汇合。这也正说明了地方当局意见的对立。李宗仁、陈继承（十一战区副长官）的斗法，五二〇事，李主疏导，陈主严惩，两人为此，几致勃谿，北平在行辕脚下，自然得给李主任留一点面子，而天津市的指挥决策者，是上官云相（十一战区天津指挥所主任），虽然短短二百四十里，却不免有天高皇帝远之感，李主任当亦有鞭长莫及之叹了。

六二日，时势演进，环境变迁，已是大不如昔，南京分谕平津地方当局“手令”五条（据云其中有宣布戒严，捕人，鸣枪等），付与处理学潮以全权，因此六一在北平行辕开会时，主“缓治”者，仅李一人，大势所趋，自难相强，何况地方官既有凭借，自无所惧。但究竟北平略胜一筹，没有像天津那样戒严，恢复新闻检查，五十辆军用卡车满载士兵，荷枪实弹在游行。现在“李宗仁”三字，在北平是叫响了，大大小小，没一个不表爱戴。

沉默非失败

华北学联的决议，五二〇游行是因为是日参政会开幕，计划六二，是因为参政会的闭幕期，虽然知道这个“明知其不可恃而恃”的民意机构不足为力，但死马当活马，也愿碰一碰，给政府诸公，参政大员们一点“感觉”，给真正主和的参政员打打气，仅此而已，学生还有什么力量！不幸得很，这个六二与中共的什么日子不谋而合，于是就成了政府唯一转移人民视线采取强硬手段的借口了。各地层出不穷的逮捕、开枪事件，已提高了学生的警惕性，胡适，梅贻琦破例走进华北学联的会议室，对六二游行作最后的规劝，更证明了时局的严重性；教授签名连署劝止函，如雪片飞来，这一些，终于阻止了平津几万学生的游行，减少了多少人的流血、牺牲。我想胡适在赞誉学联作了一项“不时髦决议”，而称之以“有政治家风度”时，不知究竟是

作何感想？然而，六二并非如想象中的安静，朝阳、辅仁、华北学院均都有捕人事件发生，两辆满载士兵卡车撞破北大西斋大门时已开始了行动：不是胡适、何思源巡视来此，真不知后果如何。清华不是梅校长以“中委”身份拒捕同学，结果恐更难想象。五十辆军车在天津南大思源堂前示威时，军官一枪未射中企图照像的同学，省却多少麻烦！所以大体说来，北方六二，在当局的极度高压下，在沉默、安静中度过了。有人说：沉默才是最大的抗议。停止游行，不过是战略上的撤退，这并不等于失败！更非工作的停止！

这次的收获

再有一个月，便是学期考试。无疑的，学生们要暂时回到岗位上去，所以反战运动，如果不再发生新事件，也要暂时沉寂。同时，学生自身的安全，无形中更成了目前最重要的课题。在这情形下，自有其必然趋势。但促成运动本身的因素不取消，运动仍会随时发生，所以现欲图根治学运，唯有一途，停止内战！但在此次学运中，除掉反内战主要任务外，却发现不少其他收获。钱瑞升先生所述三点（见《观察》二卷十四期储文所引），自是最主要的，但另外尚有需要特别提出者：（一）保守学校的开始活动和无所谓人士的参加工作。前者如北平辅仁，天津工商等，都是二三十年来未尝参与任何校外活动的教会学校，这次竟也毅然与北大南开等采取了同一步伐！后者如学校中一部分无所谓的同学，这次也鉴于国事日非，不容再行颓废萎靡，而体行力争，这足证时代的巨流，已袭到了每个人的头上，是非生死歧途，青年们已开始了明快的抉择。（二）师生的合作，尤其是这次运动中主要表现之一，同学应该做的，教授们毫不犹疑的鼓励勸勉，不应该做的则毅然制止，师生感情融融洩洩，为前所未有的。（三）运动已普及到整个社会各角落，以天津南大来论，十天内每日平均收到近百万的自动捐款，数十封慰问奖励函件，而且都是素不相识的，这能给同学多么大的鼓励！同时，这更证明：运动已获得了整个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援，他不是孤立的，他是配合人民需要而展开的，惟其如是，运动才不会夭折，才不会中止。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运动的工作，都是艰巨的。但是，越是经过迂回难至的道路，才越会使他的本身基础稳定、健全。这是执行着历史任务的青年们一点起码的认识！

在内战最前线

何 彭

（《观察》保定通信）保定，这历史上的军事重镇，在满清时代，李鸿章袁世凯充直隶总督时，都在此间驻节。保定军官学校，更是驰名全国。民国以来，煊赫一时的大军人，由此发迹的，不知有多少；现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连国民政府蒋主席，也曾一度是那里的学生。但保定由于先天不足，物产交通等条件不够，自始就没有怎样繁荣过。北伐以后，北平不再是中国发号施令的京都，作为北京大门的保定，越发日趋萧条。初次来保定的人，没有不为它的萧条而感觉意外的。保定人口本来只有八万，年来外县斗争清算，地主富人纷纷逃来，人口增加到十三万；这座小城更是拥挤不堪，房荒十分严重。别看保定城小，掌握河北全省命运的首脑机关和领袖人物，现在都聚集在这里。保定绥靖公署，河北省政府，省党部，省团部，省参议会，各种机关，应有尽有，正是麻雀虽小，五官俱全。

保定虽是河北军事政治的中枢，若以现在政府控制区和交通而论，却是最前线。保定以南，除石家庄及其附近据点，孤悬在三百余里以外，再没有一个县城，作为省会的屏障；东西两侧，二十里外尽是解放区；只有通往北平一条时断时续的铁路，作为和大后方连系的纽带。

破坏科学化

保定唯一的生命线，是平保段的铁路。这铁路一年来被大破坏三次；每次破坏百余里，修复时间须一两个月。铁轨被抬往数十里外，埋藏起来；枕

木架起来烧成灰烬；铁桥被炸塌，残骸躺在河心里；钢骨水泥的桥脚，连根铲平；路基只挖半边，而且这段挖左边，那段挖右边；如此交互破坏，人力可省一半；等到修复后，新旧土半边软半边硬，火车走起来左右摇摆，时常出轨倾倒。建设固不容易，破坏也需要相当技术，来往旅客，触目惊心，叹息不已。共军主力退去，路局加紧抢修，抢修列车还不时受到民兵的袭扰，地雷的威胁；储存的铁路器材用光了，尽量拆除不必要的支路叉道，挖肉补疮；没有枕木，由军队掩护，县长率领人马，到铁路两旁一二十里外去伐树。老百姓哭着，抱着树不让砍伐，军事第一，也顾不了那许多。现在铁轨罗掘俱尽，枕木愈来愈难，下次再来一次大破坏，保定势将变成孤岛。

委而去之

为了维护交通，保持点线，沿铁路驻有重兵，但处处防御，处处薄弱，攻击者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马其诺防线尚且没有大作用，谁又敢担保阵地能万勿一失！更何况还有像孟老夫子说的，“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的情形呢。据说正定失守，由于一部守军，夤夜用绳索把共军缢上城去，然后大开城门，迎接敌人；师长侯某被撤职查办，至今还押在绥署。望都县被围时，县长上城巡查，几乎被未打一枪而爬上城墙的共军俘去；原来守城团队有一部自动下城，躲在一个庵里，等候缴枪；他们说“八路军共财主的产，却叫穷人来拼命”！守定兴的一营国军，不听指挥，不肯作战，营长无奈，拔枪自杀；士兵目睹他们的长官，壮烈殉职，毫不动心，把手中的美械装备，缴给敌人了。正当前方吃紧，需用子弹急如星火的时候，那些在后方的运输兵，却慢条斯理的磨阳光；官长催促他们“快点走”，所得的回答是“忙啥子么？”，一个四川兵说，“他们爱打仗，就去打罢，打死了活该，谁教他们官儿迷！”

老乡回去罢

国军死守点线，不时的吃个小亏，一团一营的被消灭。当然，击毙的共军也不在少数，不过每次作战，战场上几乎见不得敌人的伤兵和死尸，他们尽可能全抢回去了。既然尸体都被拖走，国军对上不妨随便报个数目，比方说打死五万或者一万人罢，都全凭一时高兴。既然没有一个一个数过，数目

虽不实在，良心上也不至受到任何谴责，更不曾犯什么谎报战果欺蒙长官的大罪。有位军官感慨的说，“从前和日本人作战，他们不遗留尸体和伤兵，我们说日本人的运输便利；现在共匪也是这样，他们有什么运输上的便利呢？火车汽车不都在我们手里吗？”国军一作战，死的不用说，伤兵遗弃的可算不少。共军俘去后，给他们敷上药，扎上绷带，派人抬到国军防地附近，说一声，“回去罢，老乡”！这样老乡们呻吟着回来了，可是以前脑子里被印上的“共匪”的残暴面孔，也丢的精光了。

共军对俘虏

共军对待俘虏，有着不同的花样。不搜腰包，还要优待；壮年留着当兵，老弱都放回来；带兵官不论大小，第一步先进说词，请加入共军给他们干，说服不动的，听凭各人志愿，送他们出来；但是那些伪军改成国军的大头目，多半要吃点苦头。比如沧县保警总队长刘佩忱，在敌伪时代，文职是道尹，武职是剿共军司令；胜利后摇身一变，依然八面威风，鱼肉乡民；省政府收到告他的状子，拢总将近一尺厚。告状由他告状，好官我自为之，小百姓其奈他何！然而八路军却不客气，沧县失守后，有人看见他铁丝穿着鼻子，肩上背着两袋面粉，变成驮面的“人牛”。其次，当县长的多半也要遭到悲惨的命运，他们还须经过一次“人民审判”用以决定生呢还是死。

前线的县长

提起县长来，这年头不是好干的；既要能文，又要能武。除带兵打仗外，勇敢些的，还亲自于夜间下乡，捕捉“村干”。村干是共党的基层组织，一二人就可以指挥全村男女老幼，做共党政府赋予他们的一切任务。这样的人当然一经捉住，立地枪决。县长也是军队的办差官，征柴草，征民夫，挖沟修路；无论县长多么辛苦，也难讨得军队说一声“好”。派粮派款也是县长重要工作之一。县长所能控制的面积和人口，只是全县的一小部分，然而县政府所属人员武力，其人数较平时要大数倍。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的生活，都要老百姓负担。尤其拉锯的地方，更是民不聊生。俗语说：“阎王不嫌鬼瘦”，谁若不忍心，谁就别干县长。可不是吗，省府各厅处科长秘书视察等，就都不愿出去。有一次省政府向长官部要县长，去了一些编余失业和

副官谍报员之流。民政厅长也慨叹县长品质的低落，缺乏人才。全省一百卅四县市，只有四十余县有县长；其中还有十余县进不了县城。一年以来殉职和被俘的县长，已超过卅人。但是县长也有好处，水混才好摸鱼，干上一年半载，就可到平津去享下半世的清福了；法币虽不值钱，当不住数目多呀。

惩贪诗

县长的喽啰是还乡队保警队，这些人大半是敌伪时代的特务。他们打八路是多年的老经验，对现在的主人和对从前的主人是同样的忠心。他们之中的领袖，以剿匪有功，升了县长和司令的也大有人在。也有少数分子是家产被斗争光了的的地主，他们有仇有恨，杀“村干”尤其表现得英勇。毕竟是阶级斗争，还管什么同类相残。乡村里斗争清算，多少富人失去家产，多少地主变成贫农，但也有一部分“村干”，以斗争起家。所以正和国民党整天吵着惩治贪污一样，共产党也在举行反斗争。凡以斗争致富的，在反斗争时，所吞的赃物，都要吐出来。发财发财，一场春梦而已。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一首“惩贪诗”，诗曰：

竟把贪来惩，
如何不惩贪？
有贪皆须惩，
无惩不口贪；
惩自随他惩，
贪还由我贪，
试看惩贪者，
人亦惩其贪！

“你们都好”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当今盛世，文官爱钱而又怕死，武官怕死还要爱钱，天下之不平，不能说不合逻辑。文也爱钱，武也爱钱，老百姓如果还爱命，就得拿出钱来。“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古

已有之，于今为甚。有些地方团队，每次出发，满载而归，老百姓敢不给吗，谁戴得起“通匪”的帽子！他们一回来，小市上立刻热闹起来；举凡粮食，布匹，牛马，器具，以至旧衣旧鞋，莫不应有尽有。你要整顿军纪吗，他们说：“叫我们拼命，就得叫我们活着，公家待遇太不够了。”你若解散他们，谁来保护你的政权呢，去年《大公报》时常大声疾呼“莫失尽人心”！现在此调久已不弹；人心到底怎样了？华北普遍流行着一个故事：国军问老百姓，“我们好呢，八路军好？”那人回答，“你们都好，就是我们百姓不好！”人心就是如此。

船与水

在以前边谈边打的时候，只有小冲突，没有大进退。军调部撤销后，随即大打出手；冀东十余县完全克复，县政府一个个进入县城，一时大家眉飞色舞，都说有办法了。不幸县政府是建筑在水上的，水一起波涛，船就翻了，好局面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近数月来平津保三角地带和平汉路两侧，国军不时扫荡；报纸上热闹起来，这县那县都收复了。有些流落在外的人们，看报后不远千里的跑来，想回到离别多年的故乡，和父母妻子团聚；到省时一问，家乡仍是解放区，真是咫尺天涯，只好望洋兴叹。国军每到一地只住三五天，国军转移，县政府也溜之大吉。试想国军占领点线，已感兵力不敷，共军占领广大面积，兵力如何能够控制；但它在河北已有长久历史，力量深入农村，政治基础已有相当巩固。故国军打入共区，犹如船在大海，船行一过，海水依然。军方说，政治不能配合军事；政方却说，军事没有摧毁共军主力，所以行政不能立足；互相埋怨，聚讼纷纭。

赶麻雀战术

国共两军碰不上时，就推磨转圈，有时又像捉迷藏。共军在于他不利的场合，远走高飞，看准有利时，就猛然一击；运动灵活，变化无穷，是他们的特长。国军装备精良，弹药充足，集中力量时，却也锐不可当。有时国军小部队出去扫荡，为了免得和共军民兵，纠缠不清，未进村子先放一阵大炮，击走他们就算了。直击得老百姓跑来说：“这村子没有一个匪，请进来罢！再放炮我们的房子都打平了”。然后才放心大胆的进去。如果老百姓胆

子小，吓跑了时；对不起，匪跑了，东西跑不了，麦子衣服都成为胜利品。八路军有所谓“麻雀战术”，国军这种战法，正好起个名儿，叫“赶麻雀战术”。

民生一般

打仗的结果是民不聊生。外县乡村最为痛苦，河北首善之区的保定，生活也很艰难。商店门可罗雀，歇业罢，有损市容，碍难照准，只好勉强支撑门面。公教人员不分中央和地方，曾联合签名要求加薪，事关通案，也无结果。城外加挖两道外壕，动员民众作工，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可以雇人代作；正值暑假，中等以上学校的穷学生，三三两两，肩荷铁锹，挨户去问：“雇小工吗？”最初每天一万五千元，后来涨到二万五。这些知识青年发现挨户去问，不是办法，就大家组织起来干包工，按方丈算钱，免得跑冤枉路，耽误宝贵的光阴。新闻记者求生活的本领，尤其高明；他们请一个公家剧团，演了三天“救助清寒同业”的义务戏，每券十万元，向各机关和商号派票。可怜的保定新闻界，只有四开小型报一家——《保定日报》，加上中央社和津沪几家大报的特约记者，总算起来不到十个人，这一笔收入，可真不无小补。二个月前，街上贴满河北省政府政工大队的石印标语，其中一条是“东北察绥平津冀东和沧县的老百姓都已安居乐业了”；然而那时报纸上却正登着四平街激战，沧县失守的消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据说这标语是去冬印的，没有用完，现在该队办理结束，所以全贴出来。即使在去冬，那些地方的老百姓，又何尝安居乐业过！

保定，这河北的盲肠，它将发炎而毁灭生命呢，还是牺牲于外科大夫的剪刀之下呢？

从数字看江西

王克浪

人口打了六折

（《观察》南昌通信）抗战以来的近十年间，江西的人口总数，减少了二百四十余万，历年累减的情形，有如下表：

年份	人口总数
二六年	一五一八五二四〇
二七年	一四二三六二四九
二八年	一三六六七九二〇
二九年	一三四六四八五六
三十年	一四三六七二九九
三一年	一四二一六九四三
三二年	一三七六一〇五一
三三年	一三四三一—一五三
三四年	一三四七五〇二四
三五年	一二七三五四二七
三六年	一二七〇五八六〇

备考

上表历年人口数多是递减，只有三十、三十一两年呈现显著的上升，因自廿九年起全国物价开始大波动，江西当时物价最低，生活较安定，外省人多迁来居住，或者不无关系。

江西人口，从前号称三千万，清末也还保有二千三百多万，自民元以迄民二十六年，这十六年间，由于北伐剿共诸役，水旱瘟疫等灾祸，减少了七百多万，从廿六年到现在，直接间接牺牲于抗战的，又达二百四十万。所以目前江西人口，如以最早的三千万计，减少了十分之六，如以清末的二千三百万计，也减少了十分之四以上。

一个反比例

近三十余年来，中国人口的普遍激减，乃是无容讳言的。除开水旱、瘟疫之灾不谈，三十余年来，从革命起义，到军阀混战，到抗战，到前后两次剿共，我们就没有过一天没有枪声的日子，每一次战乱所糟蹋的生命，总是数以万计。江西是中国的一角，江西人口的激减，自然不足为奇了。

人口激减的最大原因是战祸，而因战祸而死伤牺牲的，大部都是民族的英雄——壮丁。中国的社会，尚停滞在落后的小农经济阶段，农民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亦即是主要的生产者。农民一批一批的从农村征发出去了，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农村劳力呈现极度的缺乏。就江西言，在抗战八年中，有一百多万的壮丁，脱离了他们的家庭与土地，影响所及，不但造成农村壮丁的十室九空，也造成农村耕地的普遍抛荒。举一个例吧：南昌县属第六区地方，战前已耕面积共九四四〇〇亩，现在则有六八一九四亩抛了荒，占了已耕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从南昌县的一区看江西，再从江西一省看全国，我们的人口打了大折扣，我们的生产力也打了大折扣。

劳力激减了，土地抛荒了，但人民所支付给国家的一切征课，却并没有比例的照减。譬如今年即将开征的田赋征实征借，江西全省的总额是五八五万石（比去年减少了十一万石），以一千二百多万人口来平均分配，从刚刚出生的婴儿，到快要进棺材的老公公老婆婆，每人要负担四斗五升，如果是清末（按二千三百万人口计算），每人就只要负担二斗五升。我们且不谈其他各式各样的征课，以及巧立名目的地方苛杂，单拿口赋一项来说，人口的递减，与人民负担的加重，就恰好成了一个反比例。

人民穷，政府也穷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向人民竭泽而渔的结果，人民穷了，政府也还是

一样的穷，一样的收入远远赶不上支出。江西今年的预算，全部收入计二一三九九二七五〇〇〇元，全部支出则需四一四〇四九一六〇〇〇元，收入仅达支出的一半。但据财政厅在省参议会报告，这个预算还是根据去年十二月以前的物价指数编列的，从那时到现在公务员待遇调整了三次，物价上涨平均超过了五倍，所以实际上入不敷出之数，将达七百亿元，也就等于预算上全部收入的三倍半。

收支数字为什么这样悬殊呢？目前中央政府最大的支出是军费，地方政府的情形亦复如此。在本年度的江西预算中，保安团队经费，占了百分之三十六，亦即超过了全部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上。有一次参议会开会时，不少的参议员认为这个数字不合理，财政厅也承认这个数字不合理，不过他说：“不合理是自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的。”

如此巨大的差额，究竟如何弥补呢？一个办法是朝上看，靠中央补助，但中央鉴于来自地方的田赋、营业等税，得不偿失，最近又有改订财政收支系统之拟议，将不要地方的税收，也不再补助地方；另一个办法是朝下看，向县有的收入去打主意。去年度的县田赋，省就拿去了百分之四十，这种割肉补疮的办法，省虽不无帮助，县又如何吃得消呢？再一个办法，那就只好裁员了。反正目前中央改革省政的办法，也是着眼于简化机构，节省开支，既可以平衡收支，消减财政赤字，又符合了国策，在最近的将来，预料这一办法，是一定会见诸实行的。

肥的只是少数吸血鬼

其实，人民不应该穷到今天这个地步，政府也不应该穷到今天这个地步。人民穷，政府穷，只不过养肥了少数的吸血鬼而已。

譬如创立于战时的江西兴业公司，这是一个省方与中央合资经营的企业机构，战时单位曾达四五十个之多。到了战事结束时，散的散，关的关，无形中限于停顿状态。直到今年春天，省府才又重振旗鼓，把它的业务恢复了一部分。究竟这个公司过去的盈亏情形如何？公司改组了将近一年，而账目则始终“尚待核算”。远在去年春间，就盛传有五亿元（以当时的币估计）的盈余没有了去处。

又如另一个省营事业的省银行，在去年秋间改组以前的前任经理经营的

三四年间，闹过几次的美金公债和美金储券的失窃案，也闹过负出纳之责的职员卷巨款潜逃案，有人以目前的币值估计这些损失，数字当在一百亿以上，至今省行改组了一年多；这笔数字差不多已经被大家忘怀了。

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如次的一个数字。自三十年省县财政划分以后，到去年为止，地方收支由县自理的结果，前后任县长交代未清的，财务部分达一百三十六任，计七十县；田粮部分达八十六任，计五十县。根据省府所列的一张清单，同一县份，交代未清的县长，有达四五任之多；也有同一县长，由甲县调至乙县丙县，连续未清亦有达四五县之多的。这些县长有的物故了，或者，找不到去处了，有的却还是安稳地坐着县太爷高椅或竟升官了，这些县长固然不必人人贪污，但因贪污才无法交代清楚的，毕竟要占多数。假定这两百多任县长有一半贪污，又假定以目前币值计每一任仅搜刮二三亿，其数就达二三百多亿。其实决不会止于这个数目！两百多任交代不清的县长，“彻查”了一年，到最近才查清了几位田粮部分的，予以记过等方式的处分。这个百里侯的味儿，难怪不少的人要趋之若鹜了。据最近的一个统计，在南昌静候县长肥缺的，总数达一百八十多位呢！

淮上血泪

梁 马

（《观察》淮南通讯）淮河横贯皖北，流经安徽省霍邱、寿县、凤台、怀远、凤阳、盱眙诸县，入洪泽湖。淮北支流错综，西北而东南，朝宗于淮。淮南湖沼，星罗棋布。两淮通称“淮上”，地形复杂。人民直朴无华，耐劳苦，重然诺，有燕赵悲歌之风，是历史上健儿的崛起地带。

“淮上”是富饶的。俗谚云：“走千走万，不胜淮河两岸”；又云：“大湾熟三年，黄狗也给裤子穿”。两淮的“大湾”，习指淮河边旁的甬道。宽广数十里，河水冲积的沃壤。出产大麦、小麦、绿豆、黄豆、高粱、芝麻……。往年有三年收成，农家余粮，堆积如山。收三年，便指望淹一年。因为不施肥料，淹一年可以恢复土地的肥沃，预卜来岁的丰收。历史上的太平日月，正是说不尽的富庶，说不尽的风流。

“乱世”不如“太平犬”，中国的天灾人祸，写成整本大书，也描不完农村的挣扎，人民的呻吟。沿门托钵的花鼓女郎唱过：“说凤阳，话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正说出两淮人民九年来在天灾人祸倾轧中的哀音。抗战军兴，廿七年花园口黄河决堤。黄水入淮，两淮膏腴，尽成黄泛区。每年夏季涨起的黄水，淹没田园房屋，吞噬去二麦高粱。冬日水落，残屋已危危欲倒，土地里未萌芽的种子，腐烂在黄沙里。那为人民歌颂过的富庶的“大湾”，盖上一溜一溜淤积的黄沙。薄的尺把深，厚的几尺深。极目望去，黄沙无口，童山濯濯，沃土变成沙漠的瀚海，谷仓已成灾难相乘的荒凉地带了。

今年，花园口合拢了。新的消息带来新的希望。余生的农民，回到生活

源泉的大地。借来远方亲友的耕牛，辛辛苦苦犁开沙磧，点上一颗颗自己舍不得吃的豆种。（淮南大亩，一亩地合江南三亩多。黄豆一亩须豆种一斗二升。乡间一斗黄豆值四万元，十亩地种子须五十万元。农民中上人家，每日仅有二餐高粱粉所制的蜀粟粥充饥，此项口粮系到霍山，正阳关一带采购。因高粱磨碎煮吃，味劣难于下咽，可以节约经食，所以采为主食）。久淤的沙地，种子不易萌发。过量的雨水，又淹死了新芽。今年有的农家，屡播屡毁，已经播了第三次种子。地主可以卖出一部土地，换钱来买种子。自耕农除了典质衣物，只有乞援于月息三分以上的高利贷。佃农无力买种子，多由地主贷给。农历六月初，地里的黄豆已长到一尺多高，农民耐着腹里的饥肠，守望着地里的收获。天气连阴，上游大雨，山洪爆发，淮水陡涨。三五天内，未设堤防的岸，河水漫上，泛滥地区，宽数十里。寿县、凤台、怀远、凤阳、盱眙诸县均成广泛的灾区。



善后救济分署原有拨济面粉，以工代赈，建筑淮河堤防的打算。北岸堤坊，农历新正开工，五月间竣事，此次幸告保全。南岸则迄未着手，更有重要特殊的障碍。例如怀远县属河南的上窑地区，有一道支流窑河。历年被黄水倒灌淤塞，五月间善救署雇工开浚，上层硬土挖去后，下层淤泥深烂，无法着手。工程师计划绕道西侧干地；重开一段新道，并便筑堤。但新道须经过本省国大代表孙××私地，约四五顷。虽地方人士渴望兴工，该代表以一己之私，横加阻挠，活动当局停办。山洪来时，淮水浸岸南流，窑河来洪，泛滥北流，这两股洪水，淹没了大湾的万亩农田。可作为天灾夹杂人祸的典

型范例。如今淮南各地的洪水，淹没了淮南绵长甬道的洼地。临淮关一带，路侧的农田，高粱杆一半插在水中，黄豆都淹完了，种子随流水漂去。农民今年的希望，已经完结，空留下一身债务，不知怎样活到明年。

乡间重重的摊派，重重的苛杂，并未为洪水带去。地上毫无收获的农民，还要偿付急如星火，繁杂如麻的征款。地方政府职员，薪津微薄，不敷生活。县府经常以“公务员生活补助费”名义，开派公款。专署不时也有摊派。再加上频繁的过往军队，大量的摊草（麦秸）摊粮（绿豆、大麦、高粱用作马干）。乡镇公所有所谓“职员及枪兵生活费”，“办公费”，“招待费”……。除县级平均额不大，过军供应流动性大，无法统计外，单单乡级公款，有地的农民，平均每月每亩地摊到法币两万元。所谓“招待费”，乡公所拿来送往迎来官长，联络本方士绅。公所里大鱼大肉，盛宴三日两开。士绅们，既沾油水，本身又不出费子，乐得睁眼闭眼。乡下人罗掘俱穷，收款的乡丁，在农民家里搜不出一粒粮，一根草；便把人带去“看炮楼子”，关在碉堡里，一饿二打。家属找到士绅说情，放出来限日交清。哪怕是“丢锅卖铁”，也要还清这“阎王账”。

近来适应军事需要的征壮丁，各乡保多行花户筹款买游民抵充的办法。每名壮丁时价约五百万元。征集一次壮丁，每家花户要推出十余万元。这些买的壮丁验收了，经手人又常常得壮丁家属的钱买放。再到乡间任意去抓替罪羊，弄得乡间鸡飞狗跳，人心惶恐。如今淮南农村多少穷人，不敢在家存身。一把铁将军，锁住了破门，阖家走上流亡的路。或是到淮南煤矿去做工。男子下坑挖煤，女子洗衣烧饭，小孩子拾碎煤。估计淮南农村因水灾、摊派、抽丁，因而弃家出走的约占农村人口三分之一强。

即是素称富裕的中上地主，例如怀远县的宫宋杨林四大家族，平年每房都有千把石粮食地租的收入。如今灾荒连接灾荒，土地八九年没有收成。政府的征粮征实，并未因而停止。地主只得卖地筹款，购粮完征。兼营商业的地主，境遇较好。不接近权势的地主，依然无法逃避巨额的摊派。多少地主在靠零卖田地，来完捐纳税，购买口粮和种子。今日淮南农村的地权转移，土地兼并，无声地急剧进行。这些无生产的黄泛地，全靠眼光远大的新兴人物，来廉价收买大量兼并。今年泛地地价约每亩十六万元，花园口合龙后，曾涨至每亩四十万元。买地的新兴人物，多是淮南煤矿的经理、职员、工头

们；乃至九龙冈（矿区所在地）一带发了国难财的商人。（淮南经理张子晏近年已置产数千亩，是一卓例。）当然还有旅外的军人和官僚。老的地主阶层已经没落，新兴的“暴发户”在内地社会崛起。

提到淮南煤矿，位在怀远县属的九龙冈，原有民营大通与国营淮南两矿场。胜利后，据闻“某院长派人接收私营，经接收清查团发觉，交政府再接收。据称原接收时，整理矿务，资方垫款甚多。国库一时无款拨还归垫，现今出租给中国银行经营。”正说明了国营事业的荷包原是套在官僚资本的大荷包里。

淮南煤矿，开支浩繁。职员待遇不薄，生活优裕。享用有小洋房，每人一具摇头电风扇，和冰箱等近代设备。当地土著有“上有天堂，下有矿场”之谚，足见对该矿职员生活的欣羡。有一官君，是该矿聘请的本地顾问，终日无所事事，每月净得公司送给净值四百万元的煤炭，作为伏马费用。该矿高级人员的收入，可窥见一斑。

淮南除二矿外，近在寿县的观音山，开辟一处新矿。日本人在田家庙建筑的大电灯厂亦被该矿接收合并，规模更为宏大。两淮无以为食的农民，除却流亡异乡求生活者外；很多到淮南，当下坑挖矿的“煤黑子”。这里劳动力供过于求，低廉的工资，尚须经过工头的剥削。矿山下坑工人，日夜两班，每班约万余人。在地下平坑道挖煤，每工工资八千元，工头仅只发给六千元。下窑洞“掏天梯”（即向上挖的）每工工资一万二千元，工头仅只发一万元。工人领工资，须经工头主持的“大柜”发放，在这里工资经工头扣成。照人数估计，每天工头们剥削所得约四千万。这骇人的数字，一部分孝敬了上司，点缀了职员。这说明了那些工头购田置产豪阔。例如工头乔宝山，二年来即在洛河镇一区，置产已有两百亩之多。新工须孝敬工头礼物，方得入矿工作，平时更须善体工头颜色，稍有不驯，随时可被开革。所以对这种惊人剥削，知者亦不敢言。深达数十丈的窑洞，更常有出口坍塌，封闭坑道，活埋矿工的惨剧演出；殉难矿工，一次多至数十人。公司给一薄材殓葬，有家属的可领二三十万元抚恤费。

淮南所出烟煤，大部经淮南铁路，津浦铁路联运南下。淮南路有两段地区：一在蚌埠西十余里处，一在蚌埠东“门台子”附近，当地流氓与路工勾结，有所谓“煤狗子”的组织。车过地头，“煤狗子”的领袖，与火车司

机，打一招呼。火车驶行渐缓，数十携空麻袋的“煤狗子”一跃登车。装满麻袋里的煤炭，跳车而下，呼啸以去。这种“煤狗子”组织，并备有武器，司机不敢忤逆，车上人避免吃眼前亏，宁与勾结，尚可分润利益，已成公开的默契行为。据一该车压车人谈：“淮南煤列车到下关，每节车皮约蚀耗煤炭三吨之谱”。这也是今日求生不得的人们所创造的新的求生方式。

（编者按：此稿系八月中旬收到，因通信稿挤，至本期始能刊出。今日淮上，恐较作者撰文时，又更多一番血泪矣）

苏北实地视察录

乡 少

（《观察》苏北通信）秋天过去了，严冬正降临人间。一千几百万的苏北同胞，在国共双方的军事行动之下，田园荒芜，庐舍为墟，就和这时序一样，正步上大地玄冰边土惨烈的隆冬季节了。

假如处于承平的岁月，苏北自然还算作很好的地方，她虽没有江南的繁华烟景，但也可称为“鱼米之乡”。元末的朱（元璋）张（士诚）之战，清季的洪杨之役，和这次的中日大战，江南人民，为避兵祸，成千成万的渡江而北。五百年来，苏北没有经过大的屠杀浩劫。士宦之家，欢喜用“江左人文”的春联，升斗小民则在墙上贴满了“四季平安，丁财两旺”经济的报条。总而言之，无论就生活、社会思想和人民心理哪一方面而言，苏北是和平的，静止的，朴质的。

前秋胜利时，全境两个省辖市，三十三个县份，除了通、扬、泰、徐四州外，共军可算完成了一统之局。大规模的国共内战自去年七月开始，国军使用了十五万兵力，到冬天把全部县市拿到手了。淮阴是共军华中的首府，并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就给国军收复了。今年春夏之交，是国军的鼎盛时期，县府入境，难民还乡，靖黄、扬泰、镇扬、通如、泰泰各线水陆交通，次第恢复，共军如、泰、泰、靖四县独立团，为李天霞的一百师击垮，泰兴县长张鹏举，生俘不降而死。国军在点线以及附近地带，总算能够维持着一个小康之局。

但是这个可喜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得多久，人们平安地度过端午节，略带忧惧的度过立夏节，忧心忡忡地度过中秋节，今天连绥靖司令部所在的南通

城，清剿指挥部所在的兴化城，富户巨商们都忙着搬家了，各地小据点不是自动撤走，就是为共军一扫而光。过去反共激烈的乡保长，还乡团员，现在又秘密的找寻关系，向共军悔罪自首，要做个“两面通”了。

政府指示剿共工作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今天无论是军事，政治，都是建筑在流沙上面的，流沙是经不起地层的振动，军事政治也面临解体的危机了。

下面是我的综合性的报导：

“自首自新”

本来，不能拿枪的共方分子，或共方的外围分子，于去夏大战的前夕，已经分批集中，北入山东了。遗留下来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烧光了房子我手里有短枪”（共军反清乡歌词）的硬汉，这就是武装的“土共”，一种是从从来没有抛头露面的地下人员。这两种人是共军坚持原地斗争的骨干，和一旦有机缘就成燎原之势的火种。官绅们虽恨入骨髓，但又不是容易抓得来“自首”“自新”的。倒楣的是那批不相干的一群，譬如曾经跟在共军后面摇旗呐喊过的，曾经是工会、农会、商会、妇女会的小头目的，自由职业性质如教师医生的，甚至什么也说不上善良人民。

共军在苏北有七年历史，政府、议会、学校、医院、银行、商店……无不毕具。她又是相信组织运用群众的政党，工农商学，男女老幼，人人都有个必须隶属的组织，这些组织里面的组长、干事、理事、委员……便成为官绅抓得来“自首”“自新”的对象。一个乡镇公所，关闭着七八十个自首分子，一个区公所，关闭着二三百个自首分子，这是毫不稀奇的事。说起自首手续来，认为麻烦固属麻烦，认为简单也极简单。写悔过书，具连环保，这不用说，主要的还是所谓“献枪运动”，一个人起码要献一枝步枪。哪里来的枪呢？一两黄金的代价就算一枝步枪，（法币下跌，故以黄金代替）“钱到，公事了”，就极其简单。“钱不到，公事不了”，也就极其麻烦。这种做法，在南面的五六个县份，已成公开的秘密了。

这笔庞大的“自首财”，真正用在自卫武装上面的还不足十分之二三，其余大部分，或者酌量分配，皆大欢喜。或者“先小人，后君子”，谈妥条件。如、泰两县的几个区就是取用的“二·四·六”制，县长六成，区长四

成，乡长二成，至于拨出多少来孝敬上司，恩赐僚属，那是各人自己的事了。

自首分子真是世界上的至可怜至可悲之人，“献枪”不足可以死，“策反”无功可以死，局势恶化可以死，国军吃败仗可以死，共军反攻进来以“反动派”论罪可以死，无缘无故被作为内战英雄们的“祭旗品”可以死；死的方式有枪毙、杀头、刀刚、抛河、活埋……应用得最普遍的方式是黑夜活埋，人不知，鬼不觉，枪不响，刀不动，极为简便省力。对上也用不着陈报，假如需要陈报的话，有“失踪”，“逃跑”，“图谋暴动，当场格毙”，“情况恶劣，不及捉走”……听凭主其事者选择一个最适宜的字眼。古云：“成则五鼎烹，败则五鼎食”，现在的确应验了。

目前共军也聪明起来，不以自首分子为敌了，并且到处展开政治攻势：“自首不自新，再当新四军”，“没有破坏行为，我们决不加罪”，把自首分子捉了去，客客气气，殷勤招待一下又放回来。如皋县属的周家庄自首分子一百多人，在共军秘密煽动下，把区公所枪枝缴光，还屠杀地主家属和政府干部七十余人，一方面宣泄自己久被压抑的愤懑，一方面使共军信赖，以图自存。

地方政府骇怕起来，但从没有想到“宽大”与“教育”着手，善后的办法是加倍的压迫，加倍的惨杀。泰兴四区的一个乡公所，一夜间枪杀了十二个自首分子，天明了，乡长召集死者家属谈话：“你们过去都是帮奸匪忙的，现在奸匪把你们的人杀光了，谁友谁敌，现在总该明白了吧。”事后，有人问起县党部书记长，书记长说：“杀得有什么不对？不过乡长的技巧欠佳，教老百姓容易识破是我们搞的。”

现在局势危殆，地方当局更加猜忌毒辣，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都像患着怔忡之症了。靖江的自卫队长把一个自首的民兵组长砍下了脑袋之后，挖出心来指着骂道：“人娘的！看你现在还能不自新（心）吗？”杀之愈凶，逃之愈众，逃之愈众，杀之愈凶。本来是共产党的，一声呼啸，“老兵归队”（这是共军发动的运动）。本来不是共产党的，事势所趋，“逼上梁山”。说句公平话，共产党倒应该感谢这批反共英雄，只有他们，才真真能替共产党制造出有生的力量。

算“算账”，倒“倒租”，“三三”章程收田赋

“地方协进会”，“收租委员会”，这是地主集团的两大组织，前者是豪绅的衙门，后者是大地主的“花厅”，他们带着自卫队，延门挨户的去算“算账”，倒“倒租”，共产党的“算账运动”是追溯到百十年前往事，他们的算“算账”也是点滴必较，分毫不让。这些地主们有一个“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枉为人”的头脑，以往本来也吃了些共产党和泥脑子的苦头，此时不报，更待何时？起初农民还听到一点中央的宽大政策，信以为真，但经过现实的教训后，观感便变了。见到地主下乡，年青的彪悍的就成群结队的狂奔远走，软弱的怯懦的不及逃走的也成群结队的俯伏求饶。“土顽”（共军称地主和自卫队）比“洋顽”（共军称国军和省保安队）更加不留情的，举凡食粮、木料、猪只、鸡鸭……值钱的好吃的东西，一抢精光，对于俯伏求饶的，还客气一点，对于狂奔远走的，往往什么也不留下，连锅、瓢、碗、盏也用大车装回据点去了。如皋十三区卢家庄的某大地主愤愤的说：“这班穷狗入的！又可怜，又可厌，我要不是进的‘道院’（苏北迷信组织），看在‘老祖’（道院的始祖）的面上，真要一把火把他们统统烧光的！”

中央和省府的命令，苏北的田赋，从今年度开征，以往积欠，一律豁免。命令是堂皇的，一到地方政府的手里，面目全非，性质全变。有些县份，擅自订定了新章程，所谓“田赋三三制”，根据田亩的正产收获总量，佃农得三分之一，地主得三分之一，政府得三分之一，自耕农得三分之二。有些县份是派兵跟着地主去收租的，所得米麦，地主得三分之一，乡公所和自卫队得三分之一，县政府得三分之一，这是另一种意义的“三三制”，比前者对佃农客气点了。今秋苏北歉收，中等田亩只收到八九斗黄豆，政府和地主闭着眼睛昧着良心估计得多多的，佃农所得，实在不敷种子、肥料、人工和农具的耗费。共军的粮赋一亩十二市斤，夏季征麦，秋季征米，现在不但要征收秋季的，而且补征夏季的，她的“武装工作队”一直活跃在南通城外，谁还敢不给呢？有些中小据点里的居民，也偷偷地去缴钱完粮，唯恐共军打进来了要“清算”“斗争”。“化钱求安”，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思想。

老百姓还有一项难以统计的财富损失。六年来，共军的“江淮银行”、“华中银行”、“盐阜支行”和“苏中支行”，发出了无数的“抗币”，伪币

法币，一度绝迹。现在“抗币”等于废纸了，废纸尚可糊窗子，揩屁股，派一点用处，“抗币”即使放在家里也可能惹起不可测度的祸事，市场的使用当然不必说了。八年的抗战，耗尽了所有的国民积蓄，透支了未来的国民所得，但是二年的内战，将遗祸害于我们下一代的子孙了！

清剿工作和军队纪律

整个苏北的清剿工作，划归徐州绥署负责的，北部属彭雷中的清剿指挥部，驻节兴化；南部属李默庵的第一区绥靖司令部，驻节南通，南部同时又受国防部直接指挥。过去南部的清剿军，是李天霞的一百师，王铁汉的四十九师，李部配备精良，军纪较佳，战斗力也很强盛。常以精锐营团、编成机动部队，夜行昼伏，四出游击，共军每闻风远扬。春夏之交的小康局面，得力于李部者最大。后来李调山东，全师覆没，李本人羁押于国防部待审，最近报载已无罪开释。王亦调东北，苏北南部的能征惯战部队全走掉了。目前南部的绥靖工作，由毕书文二十三师负责，毕师原系郝鹏举伪军，日寇投降时，郝部“还军于民”（投降共军改称“民主联军”），今春才“还军于国”，郝死毕继，调来苏北。毕部有几个特点，教人啼笑皆非的。第一，调至如泰泰靖后，立即下令将据点四周的民房限期拆光，时届隆冬，民无归所，老幼啼哭，惨不忍睹。第二，据副官处长讲，中央对他们歧视颇深，经费从来不及其他的师，因此军需粮秣，求之地方，稍不如意，自县区乡长以下，举手就打，开口就骂，对于老百姓的态度，更不用提了。第三，平日深居简出，难得出动，偶而到附近地方走走，他们自己说是“清乡”，老百姓私下说是“清箱”，连小孩子的撒尿布也给他们“清”掉了。第四，对于保安队，自卫队，甚至自家的部队，坐看共军袭击，虽近在咫尺，从不救援。地方机关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们请出来了，打胜仗要慰劳，打败仗要赔偿，共军事先跑掉没有接火，说你谎报军情，要“严惩不贷”，而且真的“严惩”了，好多乡长就被吊起来拷打过。大家都知道二十三师是俗语所说的：“聋子的耳朵——牌子账”。第五，驻在泰兴县属黄桥镇的旅部，不准人家称过去的“和平军”为“伪军”，也不准人家称今天的共军为“匪军”，他们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件件有份的。北部的情形尤为糟糕，战略据点的盐城，一度失守。现在连淮阴五里内的据点，也给打掉了。李堡，斜

角，拼茶……这些南北联系的要点，前几天宣告失守。现在整个苏北是支离瘫痪，寸寸肠断。目前共军管文蔚（军区司令）梁灵光（行政专员）施亚夫（十二纵队司令）诸部，正由东海边向腹地及沿江地带渗透，如皋泰州兴化诸城遭受围攻。如皋县长说：“我真的要变成以前的两位吗？”（如皋第一任县长就职三日，城陷被俘。第二任县长尚未进入县城，即与职员一百余一齐被俘）泰州县党部委员的母亲，在家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我家世代忠良，你总要保佑，不要有什么恶报”，泰兴县政府的机要文件，也搬到兵舰上去了。

四五个团的省保安队，简直没有起什么作用。备配最差，待遇最低，到今天连士兵的冬衣还没有发得完全。前一些时候，共军独立团进攻黄家市自卫队，省保安队与自卫队的防地仅一水之隔，坐看自卫队被共军解决了。共军独立团的政治指导员和碉堡里的保安队的对话，值得记载：

“老乡！对不起得很，打扰你们的睡眠了。我们这次是来找黄家市区长镇长和自卫队的，和你们无涉，请老乡不必过问。”

“同志！你我都是混混的，往日无怨，今日无仇，我们为啥要管别人家瓦上的霜？但你们总得给我们留上点面子，才好对上司交待啊！”

“可以，可以，假如我们在两个钟头里不能解决，一定自动撤走，请你们佯装追击就是了。”

“就这么办。来日方长，见面的时候还多，以后请多多的照顾。”

“当然当然，有空请到敝团部玩玩，不妨事。再见。”

共军开始攻击了，解决了三个碉堡，镇长和自卫队的大部分被俘。只剩下最后的一个碉堡，区长在顽强的抵抗着。但是两个钟点的时间到了，共军也居然践约，下令撤走。保安队看见他们去得远远的，从碉堡上跳下来，涉河而追，无目标的乱打了一顿机枪了事。后来保安队长召集部属训话：“家有父母妻子，谁值得去送条性命？变个人也是千难万难的，但是谁要把这消息传开出去，我立即就砍谁的脑袋。”

三四月间，还有地主富商回家后依旧造屋买田，预备重整家园的，还有原在外地服务，辞职还乡和共产党一拼的，现在看到这种腐败的军事情形，一个个愁眉苦脸，悔不刮点现金，再度逃难。王主席开完六省联防会议回来了，李司令彭指挥也请示机宜回来了，参议员代民请兵，得着一点“口惠”也回来了，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有人眼光远一点，把希望寄托在白宫身上。

泪眼看东北

高超

（《观察》沈阳通信）腊尽冬残，苦难的东北，并没因春天的降临而获得片刻喘息；在震天撼地的砍杀声中，东北依然在呜咽啜泣，像一个遇人不淑的少妇，在怨恚着自己底命运。

东北早就有中国“煤铁之乡”及“粮食仓库”的称号，所以我们惨胜之余，“头可断，血可流，东北不可丢”“抗战即为收复东北”，等等悦耳动听的口号，又弄得人眼花缭乱了。但是胜利两年多以来，作为“我国生命线”的东北，究竟落得一番什么模样呢？我们底“煤库”“粮库”看守得如何呢？说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在“建设东北”这讽刺性的口号下，我们高高在上的庙堂之士，只不过用这韧性的“生命线”勒紧了自己底脖颈而已。

胜利后，东北的工矿，即成了接受大员们的追逐目标，因此有许多厂矿，在苏军搬运拆卸之余，便又遭受了“接收劫”。我们试从资委会的六大矿说起：所谓六大矿系指抚顺、阜新、北票、西安、本溪、烟台而言。其中西安、北票二矿，在共军五次攻势时，即已被攻陷（同时弃守的还有营城子煤矿），损失数目，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抚顺矿在五次攻势之初，便又遭受了一次“内战劫”；那时抚顺成了战区，当地驻军为修筑碉堡，矿上的器材如钢板、洋灰、铁筋等被征用一空，损失当时估计在流通券七十亿以上。抚顺矿在五次攻势前每日产量已达五千余吨，它拥有远东最大的露天矿，本来年底可达万吨的计划，但是经驻军的“洗劫”后，去年六月间每日的产量须降至一千吨，仅够维持发电厂所需用，比起日寇统制时期的最高产量四万吨来，真不可以道里计，所以当时有人说，共军没来，抚顺矿便已摇摇欲坠

了，要是没有护矿的驻军，也许还能维持得长久点呢。那时的矿当局只是忙于撤退眷属，谁还管他娘的什么工作？此后抚顺矿便一直走上了下坡路，不但产量老在三千吨左右打圈子，就是开采也不按正当的规则了。譬如露天矿，在日寇投降时的一二年以及苏军占领期间，已经不顾矿的剥离工作，（即将煤层上的岩石层剥离，油页岩层是压榨汽油的原料）仅以多产为目标，日久之后，便只能采出矿坑附近的煤，广大蕴藏的煤层，便没法开采了，接收之后，本想先从事矿的整理，完成剥离工作，但是由于局势日甚一日的飘摇，正常的工作，早没人顾及了。现在抚顺大部的矿井，陷于完全停顿，仅仰仗着露天矿的出产支撑局面，目下虽然抚顺是东北各矿中唯一开采的煤矿，但是在风雨飘摇的局面下，它已濒临危境。

阜新煤矿是六矿中产量最多，煤质最好的一个矿，其埋藏量为十四亿吨。卅五年十月由资委会接收后，预计本年底恢复日产八千吨，占东北用煤量的百分之四十。去年十月被围，该矿规模最大的新邱矿毁于炮火。于是产量减少了五分之二。其后新立屯鏖战，局势日紧，在四面楚歌中，生产陷于完全停顿，由于电力缺乏，矿井大半被水浸没，这个在东北首屈一指的大矿，就这样急遽地倒塌了。十二月中旬该矿的总经理郭象豫跑到锦州，搭船到天津，想办法撤出了矿上的大批职员，“他说矿上尽管不能工作，账目还是要继续作的。”（见一月十六日《大公报》），至于账目要作多久，外人不得而知。

本溪煤矿，虽没遭破坏，但是早就陷在重围之中与外界隔绝了。沈阳本溪间的铁路，自十二月后时通时断，像是换了气喘病。职员一部撤退到沈阳，生产早就停顿。距沈阳近在咫尺的烟台煤矿，在共军六次攻势之初，便被卷入炮火的漩涡中，出人不意的突袭，将烟台矿的职员们逐回沈阳。治安当局虽在报上大吹大擂的说是商讨护矿方策，但只是“公事”而已。实际上，沈南十五公里的苏家屯都成了炮兵阵地，烟台矿在昏迷中早成了共军的囊中物。

远东首屈一指的鞍山钢铁公司，也随着满城的再度弃守，辽阳的失陷，而陷于孤立。这名著中外的炼钢厂，在日寇统治时代日产钢铁一万余吨，接收后，降至一到三千吨的日产量。及至六次攻势的烽火烧遍东北，铁路寸断，辽南煤无来源，电力不足，炼钢厂已采停工保管措施，万余员工将裁去

三千，并打算以成品五千吨作抵押，借款二二四亿流通券，以便发遣散费。日来鞍山情势告急，它势如累卵的命运，更岌岌可危。

以上陷于重围的阜新、本溪、烟台、鞍山诸矿厂，空投流通券成了唯一的活命剂。同时资委会在东北的其他单位，亦莫不在动荡不定的局面下塌了台。如营口造纸厂在共军五次攻势之初，就自动解散。日产十五万吨木造纸的大凌河纸厂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被焚毁。杨家杖子钼矿，锦西炼油厂，水泥厂都遭破坏，沈阳化工厂、辽宁纸浆厂先后停了工。所以十二月间陪同钱昌照到东北视察各工矿的孙越崎回到北平之后，便悲痛陈词，力竭声嘶地疾呼东北工矿的危运。他说：“东北工业已至经济破产，工程危险的阶段。陈总长有心确保东北工矿，但共军之不要前方的战法，零星突击，使若干单位全陷重围。……今天所谓拆迁东北工矿，问题已全成过去，人都撤不出来，还能谈得到机器。没有战线，没有前方，这种零星的战斗，使我们要准备也无从准备起。他们问我什么是最后阶段，我也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说才好，这真是工业家最艰重的时代。看着工业幼儿，一个继一个的夭折。”（十二月廿六日天津《大公报》）由这一番话里，我们看出这个工业家的手足无措来了。

资委会自十二月底起始撤退各厂矿的眷属，之后更陆续撤退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当时沈阳四面楚歌，眼看着资委会的人员个个凌空而去，颇有烦言，然而飞的仍飞走了。在撤退之不暇中，“工业建设”的挖苦话，已没有那么不识趣的人再喊了。我们试打开资委会东北各单位的老流水，一年多以来，东北资源究竟开发了多少呢？六大矿于卅五年接收后，卅六年四月份最高产量是四十四万吨，五次攻势后各矿的产量锐减，六次攻势后，全部产量为十八万吨，比起日寇压榨下每月平均二百三十万吨左右的产量来，其情形之惨，真不可以道里计。东北经过共军每有间歇的攻势，工矿事业早注定了坍塌的厄运。因为自五次攻势后，各矿没遭共军攻占的，如抚顺、阜新、鞍山等地，反遭护矿驻军借修筑防线工事为名，强征器材，碉堡没见筑好，许多器材，在市上却都有了行市，销售上海天津等地。同时小丰满至抚顺长春的输电线均遭破坏，各地普遍的闹着电荒，小丰满的电却只有往水中输送。所以沈阳只有仰赖着抚顺发电厂的火电，取得些微的光明，熬过漫漫的冬夜。

作为中国生命线的东北工矿，两年来便落得这么一副支离破碎的惨象。共军的长期疲劳攻势，使得当初兴致洋洋的接收大员们，愁眉苦脸的又飞回关里去了。资委会撤退眷属员工的飞机是向行总空运大队包的，据说每人合九十万流通券一个座位。我们真不知胜利后东北工矿的生产数量，是否能够负担正常的开支，以及历次的撤退遣散的费用？现在身负开发东北资源的资委会，已决定仅维持煤、电、机车三项工作了；然而所谓煤矿也不过仅指抚顺一处而已。但是这硕果仅存的一处，也早已半死不活的奄奄一息了。

所以号称煤铁之乡的东北，去冬普遍的闹着煤荒。就以沈阳一地而论，去抚顺烟台、本溪各煤矿，都仅有火车两小时的路程，然而东北物调会却派员不辞劳苦的到开滦去洽购煤斤，甚至还有“将空运来沈”的笑话，真令人啼笑皆非。

东北的老百姓瘪着肚子苦熬过又黑又冷的冬天，今春如何度过，更使人煞费脑筋。因为这“谷仓”地区，不但少煤无电，粮食缺乏成了最大威胁。吃了今天没明天，有了上顿没下顿，成了普遍的现象。国军控制下的产粮区，是辽河平原的大部，和松江平原的一部。六次攻势后这两块地区是主要战场，“抢粮”是共军六次攻势的一大目标。国军看透了共军的战术后，也来对抢，老百姓在夹壁墙里奔命，不但粮食被抢劫一空，就连留的种子，也都没有了。就是幸而埋在地里的，也都躲不过搜查的巨爪。农具则卖的卖，毁的毁，牲畜大部被征，在家里养不住，卖也没人要，于是便宰来吃。庄稼人都想开了，年月不忌，今儿不知明天死活，吃了花了是赚的。

在共军围困大据点的战术下，沈阳外围的村庄，莫不住满了军队。如沈北五十里的新城子，家家都住着军队，真成了兵农一家？一冬来，高粱米吃光了，吃玉米。小米光了，拿大豆换高粱。老百姓担心明年青黄不接时，没法活命，操着南方口音的老总们大喊“吃勿消”。有的人也说两句公道话：“我们知道不该跟老百姓要，可是不要叫我们饿死么？”距城市愈远，则情形越惨，新民附近地区的农村，除了老弱看守家园外，壮丁大都逃亡在外，在国共两军的鏖战之后，两下里都鸣金收军，这种地区便成了两不管的真空地带。老百姓们刚要长吁一口气，然而盗匪如毛，长期的拉锯战之后，还要来一次清扫，所以新民到打虎山沟帮子一带的农村，徒剩四壁，野狗成群，真是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流落四方，去冬已成了饿殍载道的惨象，今春行将到

来的大饥荒，更使人不敢想象了。

政府虽看透了面临的农村危机，然而在遍地烽火中，救济农村，是不折不扣的纸上谈兵。东北行辕曾呈准要发放百亿农贷，这点钱能否真到了农民手里已属疑问，何况还只是干打雷不下雨呢？所以东北的老百姓已走投无路了。在乡间没法活命，逃到城市里，依然是死路。沈阳的粮价现在虽居全国的最高峰，然而涨风仍炽，目前的苦难只是一个开始，煎熬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国大·总统·宪法

《观察》特约记者

大会的进展

（《观察》南京通信）国民大会于三月二十九日开幕以来，以七日的时间，六次预备会议，复经过立法院的修改国大组织法，始产生一庞大的，由二十五人增加至八十五人的主席团。正式会议复以四日时间，通过议事规程。九日上午大会上，蒋主席出席作施政报告。主席团预定的议事日程，至十三日止，均为时局讨论。

时局讨论和修宪，是大会开幕以来酝酿最烈的两大主题。关于修宪问题，有两种主张，一为广泛的修改，企图恢复五五宪草的精神。一为狭义的修改，限于提高国民大会职权，设立驻会委员会之类主张。官方即民青两党均不同意前项广泛修改。至于狭义的修改，大会若激烈坚持，可能有小的变动。时局讨论问题，最初发动的是上海方面代表。因为有潘公展，徐恩曾等领导主张，有人怀疑这是CC发动打击政学系的运动。后来又有北方各省市代表联署提案，建议检讨时局，追究军事责任，改善华北经济状况。这个运动可以这样解释：上海方面代表，都是工商实业界的领导人，今天腐败无能的政治和危机日益深刻的经济，使他们切身利益感到威胁。北方代表，也都是实业界分子和代表地主的绅士，北方局势的沉重，使他们有幻灭之感。不久之前的华北和东北请愿团，呼吁的结果并不能满足愿望。现在许惠东等身为代表，自然想在会场上，继续前此未完成的工作。两方面力量无形中汇合，促成了大会的检讨时局。这不是任何人所能发动。但如果有人能在会场

上作有计划的控制，也可能把一部分不满情绪转移来攻击政敌。

大会还有一个迄未解决的签署国代的纠纷问题。大会开幕前二日，蒋主席为解决选举纠纷，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正式宣布一原则，即国民党内以得票多者当选，对友党必须遵守协议而退让。所有应让两党的签署当选人均被拒绝发给当选证。二十八日晚，应退让的签署当选人混进大会堂二楼开会后，即留十人绝食以表示抗议。此十人随被移至第五招待所。其中又有二人获得代表资格退出绝食团体。其余八人，继续绝食。大会无党派代表胡适、于斌、莫德惠等奔走调停。最初建议签署当选人列席大会，唯被拒绝。最近又建议以妇女职业团体代表缺额给与签署当选人，能否实行，尚在商讨中。会场内签署当选代表联署千余人，自八日起发动攻势，要求增加名额，解决此一纠纷。

民青两党虽获得胜利，但所得名额，仍不足保证当选额数。民社党应得二六〇名，已当选及获让者一三〇名，青年党情形相同。经三党与开幕前一日之下午临时会商决定，居然以东北及绥靖区四十七名缺额弥补民社党，另以若干名弥补青年党。前者共得二〇二席，后者约二三〇席，三党协议任务乃告完成。

总统选举的决定

日来大会正在争论时局讨论究竟在选举总统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放在选举后，也就失去意义。以大会的情绪来判断，先讨论时局再进行选举的主张占多数。

总统副总统人选及提名方式，原决定由临中全会于开幕前一日开会决定。彼时因党政要员以全副精神应付大会及选举纠纷，且有若干中执委尚未到达，会议乃延至四月四日举行。副总统五竞选人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及莫德惠五人，除莫氏与党无关外，其余四人在会前积极活动。孙科主张由政党提名，陈立夫等加以支持。因为由党提名，大总统候选人必然是蒋主席，副总统候选人，以党内地位，实力声望与才能而论，任何人都难占孙科之先。因此，于李程三人在会前联合一致，要求自由竞选，三日深夜，三人连袂谒蒋主席，一再请求。四日会议上，蒋主席宣布因时间不及，暂准本届副总统自由竞选。一般看法，认为孙氏如能公开表明放弃立法院长的意

图，即在自由竞选中，声势亦并不弱。

蒋主席于首次临中全会表示：“余不欲担任大总统之职。……余可在新政府内担任军职……”并对来日之大总统列举五项条件。（此一说明，颇出于一般看法之外，并使国际舆论发生迷惑，纷纷对胡适加以揣测。）当时主席态度极坚决，并非谦逊表示。在场全体中委起立要求接受总统之候选。随即展开辩论，黄宇人何浩若等主张遵照蒋主席意思。其他多数中执会则坚持蒋主席须竞选总统。最后决定交中常会研究再交全会讨论。

蒋主席这一表示，事先曾召集高级负责人详加研究，认为（一）大总统仅为元首，并无实权。（二）行宪以后，戡乱军事仍高于一切，必须由蒋主席主持实际军务。（三）行宪后政院受制于立院，国民党内任何人出长政院，国民党立委不能统一，政院亦必朝夕更迭，形成政局的不安。蒋主席如出长政院，占极大多数的国民党立委决不能对其总裁投不信任票。如此，蒋主席将以政府内多数党领袖身份，总揽军政大权，而以得力人员为佐，充任政院副院长，这样，对于战乱将更为有利。此事《观察》四卷四期早已有所透露。可是五日中常会研究的结果，决定仍请蒋主席出任大总统。因为蒋主席今日已为国内及国际上信赖的中心，不能由他人来代替。至于前述三点实际问题。就宪法规定而言，总统既有提名行政、司法、考试三院长之权，即可指导政务。对于军事上，宪法第三十六条：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统率二字，可以解释为一般国家元首之遥领名义，亦可以解释为实际指挥。至于如何统率，宪法并无规定。其余如安定政局等，都可以用其他方式解决。六日临中全会上，乃根据中常会决定的结果，提请蒋主席出任总统候选人。

宪法的活用

临中全会既决人选以后，剩余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宪法？充实总统权力，为研究安定政局的方法。自五日以来，法学权威王宠惠博士数度奉蒋主席召见。十日报上已透露王氏奉命根据宪法，研究一新政府机构运用之配合草案。一句话，是在根据需要制订解释。

这个草案的重心将在军事方面。宪法仅空泛的规定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而对于总统在军事上名义，并无规定。总统能不能用陆海空军大元帅名义，成立统帅部呢？既无明白规定不可，当然也就可以设立。再就基本国策

章国防节首条的条文：“国防之组织，以法律定之。”这里所谓以法律定之，可以保存现政府的国防制度，也可以由新政府另定国防制度。新政府可以根据这一权力，设立统帅部为国防最高机构。这样大总统就可以实际掌握军权。

关于政治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行政和立法院的关系。照宪法来看，中国立法院的特点为国家无上院控制力，而总统或行政长官又无解散立法院权力。这样，立法院多数派可以用不断倒阁的方式，控制政局。新政府成立后，不管立法院长是谁，陈立夫氏将为院内多数派领袖，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未来的行政院长，除非获有陈氏的支持，将无法避免内阁的短命。

根据宪法作为解释，调和未来两院关系的可能性有二。（一）仿照英国例，由立院多数派出组内阁。这一办法虽与宪法规定立委不得兼任官吏的条文抵触，但可能解释为“不得兼事务官，而可以兼政务官”。行政院长，部部长及不管部会政务委员均为政务官而非事务官，可以由立委出任。（二）照宪法上说行政院长等于内阁制总理，而副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均为院长所提名。但在五十七条中，规定立法院投不信任票时，行政院长应“接受该决议或辞职”，并未规定内阁必须总辞职，亦无说明行政院长是否连本身政务委员身份一并辞去。这样，行政院长辞职，总统可以提副院长或政务委员出任院长，另一方面，辞职的行政院长还可以政委身份，协助推行原来政策，而整个行政院无须更动，仅仅院长一人进退而已。无论内阁更迭如何频繁，各部会长不变更，政局也就不会呈不安定现象。

人民对于内战的负担

《观察》特约记者

匪来如梳，
兵来如篦，
官儿来了一头荆。

——民谣

（《观察》北平通信）在“通货膨胀”成为国策之下，物价问题天天在翻滚。城市中人看到国家财政及省财政在那里吵得凶，但在乡村中，看不见的。无言人民的摊派却更加逼得紧。越是城市中视纸币轻如鸿毛的时候，政权者在乡村中对物资的把握也越发不能放松。一池子浑水已然搅得无法澄清，野火联接起来已成为一片火海，这种经济上的煎熬是无孔不入地把对立中的城与镇又分化与过滤了一番。

随着内战的加大，乡村中的摊派一天比一天多了，数字一天比一天大了，而且也把农村的负担派到都市的肩头上。从七月起，平津两市就要分担河北省的马干费用，照六月初的官价，每匹马的月费是一百五十万元，但为了每天二斤细粮二斤粗粮及十几斤谷草，地方上要负担差额九百八十万元，因此到七月份，冀平津每一单位分担的马干费要到二千六百亿元。

三角地带一个标本

北方的地方当局强烈地表示一个信念，“乡下人民并不怕负担重，只怕分配不均。”并且跟着就举例，指出十区专员王凤岗治下的地方，老百姓从

不说重，就是他能办到平均。但王凤岗的有成绩，是因为王氏的政治在平津保三角地带生了根呢，还是由于这个地带的生产富庶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呢？但王凤岗只有一个，就像宛西只有一个别廷芳一样，别廷芳死了，他的宛西民团在新的指挥者下面已然蜕变为一个新的个体，而王凤岗的第十区，假如有一天客观局面变化了，王凤岗式的成就一样也会烟消雾散的。因为环境并不能产生一个全体性的地方政权。

战争与生产是反比例地发展着，人民对于战争的负担又怎能不越来越发加重。只因新城县是仅有的一个富庶而完整的县份，十年来这里的秩序没有变更，历史传统的地主经济没有破坏，利用阶级的仇恨所编组的民团有战斗力，而王凤岗能运用他参加伪军及共党所学习的一套技术，以游击对付游击，在那几个不十分完整的七个县内竟有七个保安团，再加上有铁路线上的高碑店，能够得到外来的武器补给，于是新城县人王凤岗和他的同乡们“以乡治乡”，一直守卫到今天，仍然完整无缺。但物资缺乏，已很显著。

在“统收统支”的大原则下，十区所辖的其他各县不能与新城比肩。定兴县的最大负担是因为有平汉路的北河大桥，那里经常有几师兵力，工事没有个完，供应也没有准数，人民的担负没有一点标准，队伍来了就要，不给就打，工事是一作再作，主管人在中间要得好处，人民的劳力等于虚掷，至于供应因为没有数字，总数缴了多少，也从没有人知道。

统收与统支

为了供应庞大的战费支出，新城、定兴、雄县、霸县、固安、新镇、容城，都是每亩地每月缴十五斤玉米，有的地方也可比例折征小米，或小麦。地方的收入不够一个月的支出，实行统收统支，平时由摊派而来的占百分之八十，军队过境便只有临时加派。地主应当缴的粮款，也不准逃避，如果地主逃亡了，佃户可以把应缴的粮款给当地县政府，得一个收条，由县府和地主来算账。

在北方的太湖流域——白洋淀，及保定天津运河流域内，本是盛产鱼虾、芦苇及麦棉的丰饶的土地。前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及厅长施奎龄、时得霖、高文伯、张爱松都是这湖边雄县的人，这些地主们都逃到平津来过日子，孙前主席曾说，他们孙家是一个大族，但都逃到外地来，他也不想回家

了。前年八月六日以前，雄县还有七个乡镇，如今又剩了两个，每月仍可收到二十三万斤小米，县长拿着省政核准的薪水八折，每月补贴六百八十斤小米，秘书五百二十斤，雇员三百八十斤，每一个士兵也都得到定额粮食实物。

霸县、容城及新镇的县政府都在打游击，县城可以失掉也可以再收复，霸县城北的治安比较好，新县长上任正遇到敌人来袭，于是什么都丢了，流亡的县印及收的捐税带在身边随时跑。霸县城已经没有了，商号变成了摊子，十天一个集，营业税只好向小摊子收，每月也能收到千万元。容城县早在流亡，也是据有一点边沿，没有展开。新镇县本是一个最小的县，如今大部都非所有，人民对政府没有负担，每月向共区抢个一二万斤玉米，大家度日。不够时候，只有请专署来补贴，这就叫统收与统支。

从“摊”到“抢”

平汉北段的终点省会清苑县四百零二个乡村，如今只剩了七十八个，五十三万亩耕地只剩了六万亩，能控制的只有两万亩。为了每月六十斤麦，最近发动各地人民向共区抢粮把飞机场改为打麦场。满城县政府只有十五个人，没有用会计，月用二千万，大半是供应军队，这里的县长每月只能领到一百多万元，二百五十斤玉米，乡村连树都没有了，驻军还是要征发木头，壮丁都逃亡了，还是抓兵，不然就要人头。徐水只剩了一个县城，没有存粮，没有商业，新县长到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请流亡者还县。并在车站征猪税。

涞水县的治安忽好忽坏，十一个乡镇现剩了四个，能控制的耕地只有六万亩，去年虽然免收田赋，但每亩却摊派二斤小米，一次征收八个月的，计每月可分得十三万斤，平均人民的负担每亩却要出到四十斤，涞水的马干差价无法统计。县长级每月除薪水外可以得到小米四百斤，秘书三五〇斤，雇员三百斤，商号已全部关了门。

涿县三一乡镇现有二十四，经费过去分为四季摊派，本年因手续太繁，改为一年二次，今年共需四百三十万斤小麦，上半年收到一百五十四万斤，人民正式的每亩约负担十三斤上下，为军民合作站负担到二百三十亿，每亩要出十一万元。城内的商号每月税收可得三亿元，本年四月因为棉花牲

畜从那里过路加强征收到三十二亿，于是县级人员改按六万五千倍发薪了。

良乡与房山都是距离北平百里的县城，但在环山中却是涂满了荒村凄凉的阴影。良乡与房山的摊款都占到百分之八十，良乡土地完整，房山有十分之七的山地，地方自卫力量三千人，能控制的土地有三分之一。每月需要五十二万斤小米，十分之七养了兵，每亩地除了摊十七斤小米外，还要摊工、摊木，供应军需，及琉璃河长辛店两大车沿的兵差。从本年起也学王凤岗的办法统收统支，分土地为五等，不再零碎摊派，有了钱就围面围布，决不存现钱。这是一个产煤区，捐税由于煤炭不能输出的数不大，对于地主也是不客气，只要有地就要缴粮，地主不在地，谁种这块地谁就缴这份粮。

在平汉线上，土地改革只有涿县想试办二五减租，清苑在范庄试办累进的摊派制度，第一级，三亩出一亩的粮，第二级一亩纳一亩的粮，第三级一亩纳二亩的粮。流亡地主说：“这不是摊，而是抢！”

“人心思汉”

靠煤炭生活的除了开滦煤矿所在地唐山与滦县之外，还有北平近郊的门头沟，这就是过去所谓畿辅重地宛平县，县府在矿区坐收灰煤捐，在这种不景气的时候，每十天可以收到十二亿，为县支出的二分之一。县级工作人员除了薪水以外，利用征实所得，在雇员以上每人可以得到八十斤小麦。

宛平县有十分之三的土地，据县府人员说，“摊派自然势所不免，有一些连县政府也不知道，大概什么样子的都有，自卫大队部每月向老百姓每亩派十五斤玉米，别的也就可想而知。”

靠近都市的县份，大地主问题特别严重，这群人身在都市，却向乡村吸血。任何负担不肯出，有什么事都表示可以到衙内和县长直接算账。宛平县的地主活动还没有“正式呈报”，但大兴县（北平是跨在这两县之间）三十六年一百四十八亿的预算，只收到三十亿，其余支出全靠了摊派。乡村缺乏粮食，三月到六月的春荒中，上级月借一百斤玉米，中下级月借六十斤。他们是在用金碗讨饭吃，因为面对海子中七千亩稻田，这是大地主的特殊区域。

大兴县有八个乡镇，能控制的有七个，南苑区就占了一半，这里是皇帝的围猎场所，在大红门围墙以内有全中国豪富者的代表人影，三十几年来的

北京名宦都在这里买下满清的军用土地，如今最大的地主是段祺瑞的家族。连飞机场在内。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几乎全部不喜守法，所以有负担都是加在那半数的纯良百姓身上，如鹿圈村，有半数以上的最好土地都是不纳租，县长派人追租到北平城内，都被大地主的豪奴打出去。

供应北平银铜及粮食的漕运中心，通县，现有三分之二的完整，这通冀东的大据点，又是一个驻兵所在地，因为是交通要道，又丰产棉花，所以四月份税收达到五十四亿，原本可以维持县政经费平衡。士兵及行政人员以三十元底薪得三百斤玉米为标准，每加一元，加给一斤半，科长级可以得到粮食五百斤，这粮食出自每亩每季七斤的摊派上。但是物价在飞涨，县预算每每超过了百分之百，而供应军队的附加超过商家原有的营业税二十倍。军民合作站长被打后，更使人心思汉（汉奸），多少人说：“我们最好过的日子是殷汝耕时候……”

北平的北面

北平以北，在长城脚下，国军能控制的，还有顺义、怀柔、密云、昌平，分别依附着平绥与平古两条铁路干线，一条到热河，一条到察哈尔。（这是一个蒙古名字，是皇城近郊的意思。）

顺义县是粮仓，但地主大半都逃亡了，捐税方面以营业税多，以契税最少。地方上设立公粮经理委员会，从事于摊派粮食，维持行政人员及自卫武力，创立了粮食保护特捐，可以从过境的三十万担粮食中，收捐六百至七百亿。

怀柔县有一百多村子，只收复了二十多个。县城内原有五六十家商号，由于生活艰难，已关了四十多家，即使开着大门，也没有货物。各种税收，今年五个月来，共收了二十五亿，支出了二十一亿，在数字上有盈余，但这些牙行，营业牌照等税的包商，因为治安大坏，法币太毛，都已不愿继续包了，县府也不敢自办，还是婉求包商继续维持下去。为了公粮，地方也成立了经理委员会主持摊派，县级人员每人今春得到六十斤玉米的贴补，去年有粮食的时候则可以得一百五十斤小米。

平绥铁路线上的昌平县从四月份起就大军云集，县内的大卖买一天有十几起歇业，为了供应军需，按着各商店的营业税附加饷粮，工事费的费用占

县收入百分之七十。于是大商店都宁愿破产，改为摆摊生活，县府一看不好，乃决定管理摊贩，对于流动商人一样地来收税。

昌平县的行政人员原定按照基数八万五千倍发薪，因为没有收入，曾经欠薪三个月。后来以三十斤玉米折价一百万元作办公费，组织督征组下乡征粮，才算把欠款欠粮整齐，县府的开支才算比较充裕了一些。而大军也就到了，在南口站附近每天要负担二百斤马料，不吃高粱非要黄白玉米不可，而当地的玉米早已连人都轮不到吃了。至于某某小村驻了两师人，不仅没有粮食，连人都没有了一个。这村子也许就此成为历史的名字。

无定河畔

御赐无定河为“永定河”以后，这河仍是一个不走正路的败家子。这混浊的河水从宛平经安次，武清到天津的海河入海，是与平津铁路公路都成平行的一条水道，可是安次与武清两县都不大得到水利，而得到的是水弊。只有天津的海河，由于二十九年大兴安次两县之交的梁格庄决口，九年以来，决减少了入海河的泥土量。

已经九年了，平津铁路，在落岱站两侧年年都是一片汪洋，过去的敌伪不动心，今天的权贵依然不动心，城市统治者是用怎样一种心肠来对付乡村，真是明如日月。安次县有二十八个乡镇，只能控制十一个单位，地方上对水患没有办法，水直接威胁粮食生产。摊派不如愿，决计征收牲畜过境税与货物出境税来弥补赤字。

武清县还有三分之二的土地，也是随时在受混水的威胁，生产全靠天，水能早退了便可抢种一季。县级收入永远不够维持支出，每月摊派额定九百石粮食时只能收到七百石，如今规定为一千一百石了，也就可以收到一千石，城市里面也没有了商店。也是在加强摊贩的管理。武清的邻县香河二十八个乡镇也只剩了六个。摊派粮款也都是用在城防武力及弹械上。

天津县沾了天津市的光，一部碱地，一部菜地，有鱼盐之利，在自有二分之一地面上，自称二年以来没有向地方摊派什么。由于税收看旺，税率每月增收百分之二十。过站的猪每头征特捐一万元，可是火车常常不能等到收了税再开车。天津县政府人员薪给在全省是例外地随物价而调整，三月以前八万五千倍，四月十七万倍，五月二十八万倍，六月三十五万倍。天津是半

城化的大县，对于小站稻区的征派却一样没有办法。

津浦线在静海县还有一小段，三十六个乡镇中还控有二十五个乡镇，上半年税收六十亿支出五十亿。薪给按三千六百倍发，一般外给粮食二五〇斤。因为摊派苛扰百姓，决定实施一次缴齐的七七公粮征收办法，上地每亩收四四斤中地收三四斤，下地收二四斤，（小麦）有些商人从青县与共区作商业往来，但这是一件有利而危险事，不少人在途中被检查的队伍所活埋了。最近一面摊款，一面动员全县十三万人，修建一条防匪的马奇诺线。

海滨的呜咽

北戴河八百所房子的主人没有来，山海依旧，人事已非。冀东烽火越烧越大。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是沿海走的，这样的定线全是为了英人主持的开滦的利益。宁河县是有渔盐之利的第一大县，每月收支有十六亿，政府只能控制铁路线的三分之一土地。县级工作人员补助一百四十斤小麦，但按玉米折价。民众负担很重，由军民合作站去办理，收支虽有，就是缺少一本账簿。

丰润县的摊派，每亩地要出到七十二斤，才能应付。县政府自治捐税，去年一共收到三亿，如今一月就要二亿多，科长级薪水九百万元，另有三百斤粮，士兵除薪饷外，也可拿到一七〇斤粮食。

滦县虽有唐山负担一大笔战费，但县民对于保卫滦河大桥，也有不少的支出。这里从三十五年就地震，陆续达到二年之久，但地震的破坏却不如这次战争的搜刮，战士们从每一家的屋顶到地下的砖都查过了一遍。滦宁是战后新设的县，有三十多个村庄，既无壮丁，又无食粮，县长是由保安第五团团长兼任，摊派不够，便到共区抢粮度日。乐亭县去年十二月撤到县境上，只有九个保十三个甲，也和滦宁一样地靠“突击”来生活。

昌黎县二十二个乡镇不完整，城内逃空了，每月的公粮要六十六万斤，摊派也到了最高度。住商不多，捐税加重在摊贩身上。当地特产有张庄产砂捐每吨四万元，萤石捐二十万元，已然无大输出，为了开源，要收粮食自治捐百分之五，卖方出百分之二，买方出百分之三，今夏想给果品加税才准外销。这都是杀鸡取卵的办法。

抚宁县只有十分之一的地区了，在北戴河站五个月只收了九亿元，屠宰

税最多，粮食却极困难。沈阳乃是一个产猪鬃驰名的新县，田赋不因粮少而减少，摊派每亩到一百斤，今年上半年已出到五十斤。城内猪鬃店四十四家，有五千工人，工人每日最高可得八十万工资。税收月入三十亿，支出二十九亿，这又是一个例外的区域。

山海关下的临榆县又是一个兵站，每天的过境招待费要到二千万，多半是摊派而来。二十四个乡镇还有十九个，东北的难民过境，造成了当地的极度繁荣。旅店中一度征收变相的人头税，县府月用粮食十二万斤，职员补助一五〇斤，兵工一百斤。

全河北找不出第二个像唐山市一样的都市，这是全国煤炭供应中心，这里每月收入是一百亿元，这里虽有对内战最大的支出，也有最大的收入。

羔羊与榨取

这是民穷财尽的全貌，这是流民图，这是屠场的羔羊，但羔羊被迫会战斗的，去年河北的秋收不好也不坏，平均每亩可以产杂粮一百斤，假如有几处地方摊派到了八十斤，军队及县级工作人员得活，那么老百姓便只有等死。内战的负担，是一种“玉石俱焚”的趋势，不这样就无法维持这空前的战争。

从这一角落看全体，人民的负担是用到了最后一颗粮米，因此，为了今年的战费的筑基——田赋征实征购，便不能不先宣传北方有“二十年未有”的“大丰收”了。然而这丰收也是负担不了今年这更大的内战支出的。

金圆券与政治的延续

《观察》特约记者

不许一些新的经济势力自由成长

（《观察》南京通信）秋高马不肥的时候，军事上方告小小的停顿，而经济战线便开辟了。“八一九”以来的这一个月内，经济新闻成为头条新闻。前方的战事不是在城防线外捉土匪，而是在城圈以内打老虎；城外的战争是“两个不同生活方式的战争”，城内的战争，捉“匪谍”与“奸商”同时进行，显然是为延续“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同命运。

惨胜以来的局面，民族英雄难再复原为流氓无产阶级，民族资本家想要还原为买办资本家，也并不全属可能。这个鸡鸣不已的大时代，哪个不在徘徊，哪个不在彷徨？像少女怀春一样的，哪个既得利益者不为个人利益而战斗？后浪推着前浪，新人代替了旧人，发抗战财、发胜利财、发接收财、发戡乱财，这中间生长了一批新的“势力”，像小蝎子从母体中蜕化出来，他们必须吃尽母体才能长大。本是某一“家族”的自家犬，如今则已羽丰毛长。这个新的“势力”不可轻视，国大会场上的白衣新贵，立法院内的八方娇客，有不少轰轰烈烈的自发表演，吓坏了多少牵线人，就是因为他们已因有了实力，在变为一个新的“势力”，他们不能完全听着单一方面的指挥。

美国园艺家们或多或少地要对这些新芽们寄托不少的幻想，但是他们可能跟着要失望。石田上任你加了多少肥料，都不能得到良好的生长；小股的淡水，流入汪洋大海，也无法恢复原来的清流。新的“既得利益”者手中的

“既得利益”到达了某一个阶段，他们便不愿意暴风雨吹去了满树的鲜红苹果，他们要求安定，要求保守，要求资本主义的成长。而战争与安定对消了，全民无法就业；哪里会有资本主义的成长？于是这种类型的一群，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便更徘徊了，更彷徨了！

城与乡的对立中，如今正各自要整肃自己的营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细流，有时突破一个大堤防。有眼光者都不会忽视于这个问题的演化，于是当局虽然并未全得美国园艺家的承认，他们便毅然走上了第一次大战后德国变旧马克为“仁登马克”（Renten Mark）的老路，也顾不得我们还算是一个惨胜的国家，而学习的却是一个惨败的国家；甚至那一个本身也在通货膨胀与饥饿中的日本，也在触目惊心高地高叫“援助中国”！中国，真是有些挺不住了！

这也许就是总体战的表现，既然一切为了战争，大家的利益应当纠缠在一起，干脆不允许一头齐中再有例外。尤其更不允许初离母体的新势力自由地徘徊与彷徨下去。过去曾特别宽容的胜利财、接收财、戡乱财的既得利益者，如今好了，都一齐再让他万源归宗，重新回到了“母体”。封建的家长，也可以重演慈禧太后在政变结束后对光绪皇帝的那几句话：

“傻孩子，你想想看没有了我，还能够有了你吗？”

经济是政治的延续。到了必要的时期虽然明知道政治未必能干涉经济，却一定用政治来干涉经济的，城市经济再编组，携手在一起戡下去。

走上改革币制的道路

历史虽是曲线的，中国和德国的恶性通货史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抗战经济管制史上早已经历过平价、评价、议价与限价四阶段，特别是限价，从三十一年起一直限了四个年头才到了胜利。这中间物价的变动，是从几百倍涨到几万倍，黑市却也始终屹立不倒。当时一位经济学家说：

“不是等比，不是等差，而是加速度的上涨。”

到了三十二年下半年，预算等于没有，通货膨胀的具体现象就是一切都靠着发行。也许正如又一位名人所说，“戡乱是抗战的延续”，这么一个农业古国，到了第四个年头也就不能支持，也就非有一个改革，于是才有了“八

一九”的改革。

德国的恶性膨胀有时还不如目前中国的触目惊心。一九二三年七月初美金一元可换十六万马克，到月底可换一百万马克，八月间一元可换五百万马克了，十一月在柏林可换二万五千亿马克，而中国一九四八年一月面粉每袋不过二十万元，到“八一九”早已超过二千万了。八月限价以前的东北长春的高粱米市价是到了三千万元流通券一斤，指数是战前的七十五亿倍。德国一九二三年十月的指数仅到战前的七十亿倍。沈阳的限价高粱米是六十万流通券一斤，指数是一亿五千万亿，也比德国九月间的粗粮价格为高。维持着沈阳的一个人的费用，在南京却可以养活一百个人。

那时候，德国史上写着他们只有走上一条改革的路，但不是革命的路：

“一个理财家和一个银行行长，奉命施行从经济上拔出深渊的奇迹。不值钱的纸马克，银行停止印行了，一个特殊的仁登银行开始出现了，这个银行开始发行一种新的临时通货，称作仁登马克。指定的票面价格，等于大战时的金马克，以德国的全部农业和工业的财富为抵押担保品。仁登马克与纸马克相辅而行，比率为一比一万亿。这样，无中生有就产生了一种新的钱币。”

换变币制却不是一种儿戏，他是一种不得已的惨酷行为，把千千万万人民手中的财富以一纸命令变为废纸。小有产者一夜而变为赤贫。美国资本家不能忍受德国人民全成为无产阶级，使马克思主义早日还乡，所以战败的赔款减少了，公务人员辞退了，公家的借款都停付了，再加上外国来了借款和鲁尔撤兵，使德国的处境已比过去为乐观。慢慢地当预算平衡及通货膨胀停止的两大目标局部地达到时，新的国家银行才创立起来，而新铸的国家马克（Reichs Mark）才代替了仁登马克。虽然又毁灭了一批中小资产阶级，但巩固了希特勒政权。

那时候，惨败的德国只有一点可以骄傲，就是政治家们彼此对立，但是没有引起了战争，虽然贫困，没有死亡。

中国这一次改币中的环象

这一次随着改革币制明令的公布，在滨海的三个经济中心区域设了三个

经济改革督导员，上海南京区以蒋经国为主，广州区以宋子文为主，北平天津区以张厉生为主。西南方面由于镍币起了风潮，徐堪于十一日飞到重庆，从事于一个新设区域的稳定。

中国的金融力量随地区分布，已经根深蒂固，各成一个经济王国。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行对立的，在北方有所谓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小四行，有名的是金城的周作民，盐业的吴鼎昌，前者最盛时有分行一百三十余处，控制了北方的棉花市场，从事对日贸易，后者主持上海国际饭店，业务似收缩而实在开展。江浙财阀则把持了中国腹地经济的核心。如李铭之于浙江兴业银行，杜月笙之于四明银行，陈光甫之于上海银行，各有各的卫星群。广东方面由于宋子文兄弟及孙科的抬头，再加上广东省银行的活动，另是一个系统。四川的银团在抗战中间壮大了，刘航琛、康心如、吴晋航、杨晓波，各有其企业与金融的势力圈。此外，山西孔祥熙的势力并不普遍，一部分票号改的银号已经衰落，云南以缪嘉铭与陆子安为中心的两大中心势力，依靠了地方的政治势力在拖延。抗战以后新起来一个安徽帮的中孚银行系统，这一批美国留学生拉跟了洛克费罗等美国财阀却又卷土重来了。他们各有其金银准备，特别是辛苦得来的外汇。

政府这回派出的大员似乎相当有斟酌。宋子文坐镇广东，本是他的势力圈，霍宝树也是中国银行系统的人，自然唯 TV 之命是从。张厉生等于衣锦还乡，他过去曾为河北人所不满，这次表示得特别“温和”，给大北方父老以好感。只有蒋经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打虎将，把赣州专员的一套拿到上海滩，仅仅小试身手，便枪毙了戚再玉，逮捕了杜月笙儿子杜维屏、杜的表侄黄以聪、申新总经理荣鸿元、布业世子吴锡麟、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煤业公会理事长潘以山、中国信托公司副理戴家驹、大通纱厂胡国樑以及“徐百齐泄露改币机密案”在上海有关的一行人氏。初步业已压制了上海滩上的涨风，在那告密的信还在纷至沓来中，他还要打下去。

怎样解决失业与生产？

形势战胜了人。德国要在花旗旗下重新再建，第一次大战后主持币制改革的战犯沙赫特被判为无罪。日本也正在同一旗帜下复兴。中国怎样呢？同路还是不同路？

“胜者以拯救败者为荣”。在美军主持的东京审判法庭上，东条成为了英雄。东条说“日本是被迫作战的，是自卫，是为日本民族国家，为七千万人民的生存而战，日本有此权利。”中央社东京电称：“若对东条处极刑，盟军撤退时，多数人民即将以鲜花至东条坟头凭吊”，东条必能戴罪立功了。

至于纳粹头等战犯沙赫特在无罪以后，外讯还未传出他的表示是什么，但在第一次大战后，他得美国资本家帮助之后，曾经表示一个强国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四千万人口，二是要有两个气温地带的资源。他当政以后，帮助希特勒拟定了四年计划，在柏林和鲁尔的边沿上举办了两个大工程博览会，显示德国的工业力量，加强美国资本家及德人的信心。这个老魔术师今天又自由了，他一样也会戴罪立功的。

从上次大战后，看一个国家的能否复兴，要看他对这两个事有没有办法！一是失业问题能不能够解决，怎样能使全民就业？一是经济问题与金融问题的配合，如何能诱导游资走到生产建设的途径！这两件事也就是一件事，没有生产建设的物质基础，就不能维持全民就业。而全民不就业也就无从得到社会秩序的恢复。中国已走了半步，对于前面的课题作如何打算？

正站在十字路口上的国家太多了，一边是法西斯主义，一边是共产主义。希特勒登台以后，逐渐解决了四百万失业人口的职业问题，他巩固了法西斯的政权，把德意志从共产主义的怀抱中抢夺出来。日本内阁承认去年十月起通货膨胀到了恶性的程度，直到今年二月才缓了一口气，以后利用美国的输血才算把最艰难的时期拖过了。天皇仍旧是偶像，在军阀的指挥刀下，日本共产党的势力也中落下来。

中国这个惨胜的国家亦如那些惨败的国家，同样徘徊在十字路口。据新闻局十四日发表，政府控制内有五千万难民，有二十一年以来重演的大水灾，又有亘古以来所未有的“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战争。而城与乡之间的对立也到了空前的局面，纵然我们自信在一个农业国家，时间会有办法解决失业人口问题，可是也不能忘记，在三年中两次币制改革下，人民已经失掉了“重整家园”的力量。——胜利以后，中央先以二百元对一收兑中储券，“八一九”再以三百万元对一收兑法币，中小资产者的普遍无产阶级化，假如仅仅逮捕几名“老虎”而不能再生产，这有什么用？“生产能力的恢复，

即生命的恢复”，不保有生命一切的努力又为了什么？

经济是政治的延续。当局用改革币制希望稳定了经济的基础，进一步重订外交方针，再稳定了政治的基础。但这一切的前提是秩序必恢复，预算必平衡，是失业问题必解决，是游资必要走上生产的路，是安定局面的必实现。

（九月十七日）

我逃出了长春

陶永芳

从吉林撤守说起

本年三月九日，吉林弃守，笔者在春天夜里仓惶随军撤退离吉，三昼夜未进饮食，三百华里不眠不休。途中目睹美式重装备以及近百部的卡车，都成了共军的战利品。由于共军狙击，多少随军撤退公务人员和商民，惨遭伤亡，或被俘回吉。近十万军民狼狈撤退的行列，历时两日，断断续续的进入长春。据闻吉林撤退命令是郑洞国在八日上午十一时飞吉传达，夜间行动，消息极秘。驻军因时间匆促，大量弹药物资未及销毁。九日晨三时起，吉市成了无政府混乱状态，二十四万市民能走的都随军撤退，留吉的商民则接受暴民整整三天抢劫的洗礼。由于撤退消息秘密迅速，共军只能调集一团多兵力沿途截击，几次硬仗，我们实不胜其落花流水。但是有些人还夸称这次的撤退为“陆上敦克尔克撤退”，真是可笑。

吉林弃守，四平又告失陷，孤点的长春凭空增加了近十万从吉林撤退的军民，吉长兵力集中了，长春的防务亦得稍为巩固。不过食粮却增大消耗，就一般情形来看，食粮求过于供，粮价自会刺激物价的上涨。然而事实出人意外，至少在当时，粮价平稳，一般物价且有下泻的趋势。三月中旬，长市高粱米每斤东北流通券一千五百元，大米每斤三千元，豆油每斤一千六百元，黄金黑市价每两三百万元。当时因为长春市民看到吉林撤守的惨状，深恐长春重演吉林第二，于是高官巨贾，纷纷抛出囤存，无力吞进。同时军队及中央机关眷属，集体包机撤退，有权势的，假借公务名义，变相飞去，有

财力的奸商巨富，黄金万能，南返的飞机，座满为患。空军站前车水马龙，门庭如市。大批无力乘空飞去的老百姓，把一切家私变卖，一家老幼，赁车南下，逃难平津。长沈公路上的难民络绎不绝，造成长春市民人心恐慌的空前现象。虽然政府一再声明坚守长春，决不放弃，长市各报也大声疾呼：“援军出关，源源北上，即可扭转东北危局。”可是强心剂打烦了，人们的心反感麻痹不仁了。

这时一方面长春人口激减，一方面吉林逃来的难民又添满它的空缺。所有吉林撤退中途被俘的军人和眷属，以及遗留在吉林的党团公教人员眷属，共方都允许登记，遣送长春，全部以汽车送到饮马河西岸卡伦附近，同时自动逃到长春的人民也很多，共军也不加以阻制。表面是宣传共党的宽大，实际是在实行“蝗虫政策”。

吉林撤退后，长春老百姓心里最恐惧的是国军放弃长春。直到今日，长春确未放弃，然而五十万长春军民，却都要变成饿殍了。从本年五月二十三日长春郊区战火突燃，共军形成大围困，以迄今日，已经四个多月了。长春的老百姓究竟过着怎样惨厉的饥饿生活，虽然报章略有记载，但都不够真切。笔者于三月十二日进入长春，七月十四日化装离长，在市郊国共军事真空地带的“洪熙街”，度过十一昼夜的地狱生活，乘夜阴豪雨，突破共军封锁的重围，辗转跋涉，始经沈阳入关。虽然托天之幸，保此一命，但长春人民苦难的情形，那血泪斑斑的事迹，每一念及，如在目前。

流亡的渊藪

长春是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枢纽的新兴都市，国军于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正式收复。两度停战，东北收复区的边缘仅止松花江南岸，于是松北难胞都猬集到长市。那里长春铁路畅通，中长路北至松花江岸，南达沈阳，长白线通至农安西柴岗，东通吉林。它是东北军事上战略基地。那时东北局势安定，政府一再表示前进接收松北，具有政治上更美丽的远景。三十六年五月，东北共军五次攻势中，长沈输血路曾一度中断。战事风暴过去，长沈路修复已行试车。共军十月的六次攻势又发动了，于是长沈吉陆路交通寸断，长春和吉林在线断之下都成了孤点，此后即未打通。十月下旬，长春周边的卫星据点如德惠、九台、双阳、公主岭、农安等地陆续失陷，各县政府公教

人员以及豪门地主阶级，都以长春为流亡的渊藪。吉林此时也是同样的收容磐石、桦甸、舒兰、蛟河各县流亡政府以及难民。十月中旬，吉林被共军十数万人进犯，快到一个月的攻防战，驻军六十军以及地方团队，确实的打了一次漂亮仗，击退了共军。岂知喘息未定，小康之局未久，本年三月九日吉林弃守，又把磐桦等各县难胞以及吉林市民，被迫流亡到长春。目下长春是吉林省政府治下绝无仅有的一块土，四十华里圆周内的空间，更收容来自不同县份的难胞与生长此地保卫此地的军民。他们现在面临饥馑死亡的绝境。五十万黄帝子孙被收容在世界最大的集中营里，度着较纳粹德国俘虏集中营更惨忍的非人生活。我流着泪执笔向全世界人类控诉这由战祸酿成的大集中营里的惨状，善良无辜的老百姓被投掷在死地，究竟是谁的罪恶！

今年三月以前

长春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一切设备都极完善。但自去年十月中旬，共军破坏小丰满至长春的输电高压线以后，市内即失掉一切动力，工厂生产停顿，全市陷于黑暗。一年来市民均以豆油点灯，饮用井水。燃料成了问题，煤矿木柴产区都在共军手中，市内存煤不多，而这些存煤又不属于老百姓所有。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市郊有很多伪满留下的住宅区，工厂区，那里有整齐壮伟的建筑物。先由枪杆阶级率先垂范的拆除大木料，运到市内论斤卖薪柴；暴民承继其后，拾点唾余。自被围迄今，经过我们同胞彻底的焦土破坏，早已成为一片瓦砾。至于一般顺良的老百姓，都挖掘过去伪满官厅公司大工厂烧过的煤屑，用以升火，勉可煮饭。然而这种烧过的煤屑，现在已快掘尽。今年三四月间，市场上有很多人以薪柴价论斤出卖木质家具。但不久亦即绝迹，足证长春燃料的何等匮乏。

食粮在长春是一个要命的问题。长春自去年十月孤立以来，驻军不时扫荡周边，政府协助商民，出外“抢购”。加以长市外围猬集着外县的警察保安队以及携带武器的流亡地主们，他们都是变相的土匪，尽是抢而不购，搜括民间存粮，运入市内出卖。共军也随时抢运民食。于是长春周边七十华里以内地带，在兵匪交征之下，的确做到“坚壁清野”的地步。可怜农村的百姓，在拉夫、抢粮、吃光的惨状下，家无壮丁、食无隔宿。在长春被围攻之前，外围的农家、房屋木料多半被拆运走了，就是茅屋上的草，都被战马当

干草吃光了。然而长春市内在这几个人为的条件下，存粮很多，物价平稳，较吉林撤退时的物价要低三成。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三月底没有太大的波动。

四五两月

四月上旬，一般民众都相信局势即将好转，人心稳定。粮价因军粮筹购委会在市内收购，渐次上涨。长市虽有民生安定委员会的限价，以及市长尚传道的努力，可是粮源枯竭，消耗照旧，再加奸商的操纵，特权阶级的垄断，粮价涨而不落。当局一度发动警察取缔，市场上立刻有行无市。四月下旬，粮价涨三月中旬上涨了五倍。五月中旬驻军大举扫荡周边，开辟粮源。把距长市三四十华里的小据点——卡伦、小合隆、大屯、孟家屯都收复了。想不到在五月廿一日，一昼夜的功夫，局势全非，小合隆守军被吃掉外，其余的外围国军都退守市内。大房身机场失陷，空路交通也断绝了，从此二十余万共军把长春围困起来。粮价如脱缰野马，立刻领导物价在翻跟斗。贫苦的百姓早已吃不起高粱米，豆饼、豆腐渣、米糠、野菜，都成了充饥的珍品。米每斤由五万、十万、二十万直线上升，这天文数字的米价，都是由收购军粮一手创造出来的。百姓手中的流通券总不如飞机空投整箱万元大钞来得方便。

六七两月

六月下旬，米价迫近三十万大关。长市参议员表现一次“泣秦庭”的行动，当局痛下决心，组织长市战时食粮管制委员会，由兵团司令部、警备部、省市政府参议会派员参加，着手调查存粮，每户不准超过三个月存粮，划分军粮民食界限，军粮暂停在市内收购。一方面由省市政工大队派员赴区保调查，郑兼主席也下一道严令执行，这样一来，特权阶级以及奸商们有所警惕，把部分囤粮抛售市场，另一方面集中游资，猛袭黄金黑市，于是黄金每钱由三百万直跳一千万大关，粮价因之稳定，游动在三十万大关之内。七月初旬，国军出击一次，战事不利，粮价又开始跳动。粮管会的“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作风，使存粮户又暗中活跃起来。七月十二日粮价终于突破百万大关了。军粮收购的人不管价格高低，麻袋装满了现钞，横行市

场。后来空运现钞数字追不上粮价，便由中央银行发出大额本票，额面都是数千万几亿几十亿的数字。长春市银行发行五百万以下的本票。贫苦的老百姓只有出卖旧衣物，换钱到市上买一点米糠、榆树皮、树叶、曲子面、野菜等充饥。百分之八十的市民连蔬菜都吃不起了。食野菜有好多中毒，面现浮肿。曲子面（酿酒原料）虽是高粱玉蜀黍做成，但时隔经年，早已发酵，苦辣不堪。不过饥者易为食，烧锅仓库几天间卖空了所有的曲子、公园里树皮树叶剥光了，卡哨内空地的草根野菜都挖净了。老百姓对于“吃”已做到罗掘俱穷的绝境。

洪熙街

七月十四日，笔者不堪生活压迫，忍痛偕妻离开长春，当天下午通过长春市南郊国军最前线的卡哨，进入了人间地狱的“洪熙街”。在这军事真空地带，幅度只三华里的空隙，塞满了五六万难胞，被阻不能南下；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的挣扎着。我亲自领略了人类怎样与饥饿死亡做最后搏斗的惨酷情景。

长春市民凡是籍隶冀鲁或有财势能飞到平津做寓公的，差不多在本年三月起，大举南飞了，从陆路南下的，大都是贫苦大众。（五月下旬以后，飞机无法降陆，空运即告中断。）长沈公路上几乎塞满了企图入关的难民，共军对此并不留难。长春市内新兴的大车店如雨后春笋，每日出卡哨的大车最多的时候达三千辆以上。“洪熙街”原是“满映”（光复后接收而为长春制片厂）所在地，是著名的一条南下的通路。六月初旬，国军限制难胞出市后即不准再度入市。共军则每隔三五日，放难民车辆通过一次。但自六月中旬起，共军便遮断交通，加强封锁，任何人不准通过。可是洪熙街与市内消息不通，国军卡哨放行，难胞的车辆仍源源而来，于是这三四华里的空隙，几千幢被拆毁的住宅，便塞满五六万不能南下的难民，洪熙街立刻成了闹市。

人间地狱

笔者踏进这人间地狱的门槛，死亡恐怖的气息充满在这狭窄的圈子里。最初难胞可以杀马吃肉，用带来仅有的衣物，换取偷过共军封锁线的老百姓背来的少量粮食度命。青壮年人还可以空身乘黑夜爬出封锁线。可是后来共

军调来一批韩共，充实军事封锁线的力量，使难胞想做漏网之鱼也不大可能。

笔者七月十四日来到洪熙街，正是韩共换防。四十华里圆周的封锁线，把长春困得水泄不通。这封锁线幅度约十里，难胞必须爬过七八道共军卡哨，每个卡哨保持电线杆的距离，昼夜在那里监视。老百姓扶老携幼，三五成群，趁黑夜隐匿在高粱地里伺机爬伏前进。可是人体拨动禾叶的响声，孩子们被蚊子咬哭以及老年人的咳嗽声，很容易招来共军监视的注意。一位母亲怕孩子哭，把乳头塞在孩子嘴里，竟把小生命断送了。共军发现老百姓之后，初则喝令“回去！”继则向空鸣枪恐吓，最后纠集几个卡哨，把高粱地潜伏的老百姓驱聚在一起讲话。他和藹的告诉大家说：“这是军事命令，任何人不准通过，你们百姓回去吃，吃光了，长春就快‘解放’了。”百姓无论怎样哭求都无效。天明之后，他们便将这些偷跑的难民执枪护送到洪熙街原处。假如强行通过，自将惨被射杀。老百姓在洪熙街那里，昼间不得饱食，体力衰弱，夜里爬过几次不能脱出，饥饿与食野菜中毒，只有奄奄一息，坐以待毙。笔者亲眼看到倒毙的饿殍，尸体发散着糜烂的臭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躺在马路旁哭喊着：“我的亲妈！可把我饿坏了。”一个三岁的婴儿，母亲把他丢在马路上，已经饿得不会哭了。洪熙街也有破烂市，衣物不值一文，吃食价格与市内平行。买糠饼小贩时遭饥饿群众的抢劫分食。僻路上专有抢吃的暴民。这地方没有“统治者”，国共两军的谍报员则出没其间。夜里两军开火，这数万难胞就变成火线上射击的“活靶子”。笔者和妻处于这生死线上，没有恐怖，一心一意的寻觅怎样挣扎脱出险境的路子，鼓起生之勇气与饥饿死亡做最后的搏斗。

冲出重围

十一昼夜的功夫，我们和同伴六人做了四整夜的突围行动。但是因为突围的人太多，夜里月光，共军卡哨太密，结果都归失败。同伴中三人不能忍受苦难折磨，决计设法回长。我和妻每天吃两顿炒面混和野菜煮的稀粥（炒面是从市内带出的），夜里宿在两层破楼的底层水泥地上，忍受蚊蝇的锥刺，却能稍避风雨。置身死地，只有前进才有生路。七月廿四日这一天，我们听到市内高粱米每斤已需流通券二百万，黄金每两达三亿六千万，银元每

个三百万。市内难民仍陆续不绝的外出，因为市内报纸造谣，说共军又开放卡哨，所以洪熙街附近熙熙攘攘，擦肩接踵，皆是饿殍。入夜阴云密布，旬日来一场豪雨。我们纠合两个识途的同伴，突出冷门，沿共军碉堡工事边缘爬越封锁线（因共军卡哨多集中监视主要路线，碉堡工事夜有灯火，老百姓多不敢靠近，然而工事周围的草原并无卡哨）横穿庄田、草原、公路、河流、共军交通壕、孟家屯铁路线，遍体雨水淋漓，一身污泥，辗转曲折一夜间踏破四十华里，拂晓前抵达长春南的大屯站。从此途经公主岭、四平、昌图、开原等地，除稍受共党儿童团啰嗦与共军检查外，乘大车并无任何麻烦。八月一日抵沈阳。报载长春米价每斤五百万。八月十日到天津，《民国日报》载长春米价法币二亿五千万（核东北流通券二千五百万），《益世报》载南京专电：长春黑市出售人肉，每斤流通券一百五十万，消息传来，惨绝人寰。

（九月廿五日）

饥饿的野火

《观察》读者投寄

（《观察》北平通信）十月，西伯利亚的寒流已经开始侵入了北平。一个月来，北方各战场接连的失利，上海疯狂的抢购热潮，以及如水涌来的远地流亡的难民，种种压力从四面八方一起压向这座华北的心脏。本来就摇摇欲坠的限价，哪禁得起这种凶猛的激荡？这一下就全部彻底崩溃了。面粉由金元十元一袋一下子跳到七八十元。黑市明市各种物价无不上涨。唯一不涨的，被限在限价内的，只是可怜公教人员的薪津。这一下，不论是以血汗换棒子面的劳力，或是卖智识卖脑力的劳心者，举凡一家无隔日之粮一靠固定薪水吃饭的人，全都逼上了山穷水尽的死路！

饥饿，饥饿的洪流吞没了一切。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吃饱或吃不饱，而是怎样设法不饿死。在二十日，一向生活最苦的国民学校的教员们，实在受不住饥寒交迫，终于喊出了救命的呼声，集体请假四日，为了好参加挤购可以使他们多活几天的限价配面。在教育局王局长和张厉生副院长连唬带哄之下，答允每人立刻发给十月份下半月薪水和三十几斤杂粮，总算把事情拖了过去。

一波甫伏，一波又起。小学先生们刚刚无可奈何的上了课，大学里的教授们又停了教。那是二十四日晚上，翁院长从南京带了一套新经济方案来平，晋见总统，并且就在总统的行馆中召开了一个宴会，邀请了几位经济学者参加，请他们对当前的经济情形贡献意见。翁院长并有意请他们到南京去，会同京沪的专家们，厘定一个挽救危机的计划。这听说是胡适之校长的建议，当胡氏正在忙着帮总统筹划安国大计时，不料在校内的教授员工变得

等不及了，有八十二位教授就在那天晚上，发表宣言，停教三天。宣言的内容出乎意料的简短，仅说物价过高，生活不易维持，只好停课三天，出外借贷。宣言既未附具体的要求，而全文亦仅寥寥一百余字，不仅使人感到突兀，而且颇堪玩味。（这次北大教授的宣言，是在星期日下午数小时内以闪电式的行动完成的，这在北大历次教授们所表现的正义行动中还是创举。）据记者的猜测，这里有着如下的两个原因：第一，在教授们看来，具体条件的提出，不但不能全部兑现，而且他们也没有提出具体条件的责任。陷教授，陷广大人民于水深火热的深坑当中，只是一批自私自利的权力掌握者，他们有气魄玩弄战火，冻结物价，就应该估计到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负责的办法来挽救危局，用不着教授们再来饶舌。第二，教授们对政府已感到完全绝望，他们已不愿向政府请求，他们的宣言实际上只是向社会控诉，博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援；这一点，说明了政府已经和这批睿智硕学之士起了可怕的隔离，这隔离，替政府未来的命运作了极强有力的注脚。另外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当总统坐镇，翁内阁来平的“当口”上，教授们毫不顾忌，发出这个文告，罢教三天，多多少少隐含着对总统和内阁一个猛烈讽刺的意味。

在北大，待遇最高的教授，其底薪也不过六百三十元。依照改革币制后的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六百三十元底薪者只能拿到一百二十五个金圆，外加研究费二十金圆，兼课约四十金圆，（兼课每人最多不过四小时，而且有许多教授并不一定有课兼，）合计不过一百八十五金圆。九月份配给面到现在尚未领到，十月份的遥遥无期，还不知要等到何时何日？在面粉由八金圆跃进到七十金圆一袋的情形下，一般的物价也跟着跳了六倍以上，三轮车夫每日卖劲蹬能赚十个金圆，北平私立中学的教员每月可以拿八袋面粉，而大学教授们的薪水却冻结在固定的数目上面，绞尽心血脑汁，一个月拿到这一点钱，事实上早已不够一家三口的最起码生活了！楼邦彦先生在某一次的讲演会上曾提到，说四口之家最低的要求，每人每天半斤米，一个月六十斤米，这就需要一百二三十元了；求最少的营养，每人每天一两肉，一个月也需一百多元，单这两项要求已经超过一个月二百元薪水所能供给的了。事实上很多的教授，早已吃不起米，不消说更吃不起肉了。譬如像韩寿萱先生家里，已经天天是窝窝头和白菜了。韩先生苦笑着说，他去年从美国回来还带

着有一千多元美金，现在这点积蓄早已贴家用贴光了。以后再拿什么往下贴，他也不知道。再如教育系主任留德的专家张天麟先生家里，也早就是小米粥和窝窝头。张先生患有骨髓炎不能走路，不少的薪水要花在三轮车上。大多数的教授，如著名的经济学者樊弘先生，如考古学权威向达先生，差不多每星期都得向学校借钱，几乎将下一个月的薪水都透支光了。有些教授除了自己，还寄钱养活在南方的母亲，像胡世华先生一个人拿钱两个开支，只好把自己最心爱的书都卖光。还有些教授为了节省甚至不坐车，每天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到学校里上课。如果家有八九口的，那就更不堪设想。

拿最高薪津的教授们已如是之惨，那些薪津更低的讲师助教工警等，其情形当然更惨。教授停课的消息传出以后，讲助会立刻响应，从二十六日起停课五天，工警随之向学校要求每人先借一百元，以救目前之急。同学们为了表示支援，也决意罢课五天。于是停教停课的野火，随饥饿的北风，四处蔓延。由北平到天津到唐山，由大学研究院到市立各中学各小学，由国立到私立院校，包括北大、清华、师大、燕大、辅仁、华北学院、东北铁院、艺专、南开、北洋、唐山交大，以及平市各市立中学，几乎全华北所有的教育机关，在两天之内完全停顿。在停课的期内，各大学的学生像北大、清华、燕京等，都纷纷的组织了争温饱委员会，进一步向员工向市民向广大的社会，展开具体的访问，在这次访问里，更清楚的知道，今天古城里的人们，究竟是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

一位参加访问教职员眷属的同学回来报告，他说这是一位曾受过大学教育主妇的家庭，只住一间鸽子笼大小的房间，挤满了炕、板凳、火炉、锅……人几乎都无法转身。主妇正背着一个孩子，牵着一个孩子，头也没有梳，脸也没洗，站在地上煮白菜。旁边是一个盆，里面全是没有洗的脏衣服。炕上还爬着两个小孩，满脸的鼻涕。访问者进去还能说什么呢？只好默默地退了出来。和这位主妇住同院的有一位月拿一百三四十元的高级职员，他有八个小孩，没法子，他只好把最大的男孩送出去当校工。这都是读了十几年书，而又在人人羡慕的大学里做事的人，饥饿已经把他们逼成了这个样子！

这还算是幸运的。最苦的是工警。说起来令人不能相信，他们一个月才拿二十元，天知道他们怎样用！在蔡子民先生任北大时，一个月曾拿七块大

洋钱吃白面的红楼门房老陈，现在每顿只有一碗开水和一只窝头了。他常常叹气说，在敌伪时代还有配粉，从来没有吃过像现在这种苦。他说年头儿真是变了。有家眷的校工，更出我们意料之外，那真是比狗还不如的生活。访问组的同学特别参观一位曾在学校服务二十多年的老校工的家，那是在一座破落的大杂院内，一间不过一丈见方的房子，没有窗户没有炕，黑阴阴的八九个人挤在一起，他们没有被褥，只有一张草席，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八九口人靠这二十元就是吃草也不够的，只好把他儿子也带进学校做校工，他的太太天天出外找点针线零活，凡是能够动的都出外找食。当访问者走进去时，他的七八十岁没有牙的老太太，正啃一块已经干硬如铁的冷窝头，她红着眼睛问来人：“你说，到哪一天我们才能过到好日子哟？”谁听了能不为之酸鼻？

作社会访问的同学回来，个个摇头叹气，尤其是访问难民的同学。他们看的难民还算是好的，几十个人挤在一间破庙的泥土上，四面空空的窗户，使他们在寒风中战栗。有些人身上穿的还是单衣。唯一使他们多活几天的是社会局发的每人每天十二两小米，就连这个据说也有好几天没有发了。有些人只好到外面的垃圾堆找白菜皮儿，拾回来煮煮吃。每个被苦难磨练悲愁的脸，都写出了他们各自不幸的历史。尤其那双被过重痛苦压塌了无神的向前望着似乎已经麻木的眼，更使人看了想痛哭。访问的人不忍访，也不忍问，就悄悄地走了。

饥饿也把同学给逼倒了，学校门口的小馆子和小食摊，全都冷清清的。宿舍的门口，出让的条子突然增多，而征求却几乎看不见。有一位同学愿意以一百金元忍痛出售他过冬必用的皮袍，在他出让的条子上附有一首诗，最后一句是：“买者身上暖，卖者肚内酸。”馒头膳团的人已逐渐减少，吃丝糕的经济膳团，虽一再扩充，还是人满为患，有很多同学补不进来。有时在上课时，未吃早点的同学肚子突隆隆作响，即面有菜色的教授也不禁随之叹息。

附 录

部分作者简介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振汉（1912—2008），浙江诸暨人。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教育家。解放前夕与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相约坚留北平，1950—1951年担任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1952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主任，为期一年；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获平反；1981年，陈振汉先生应邀至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任客座教授，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1982年返国，被授予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资格。2008年1月19日溘然辞世，享年96岁。

陈志让（1921—），四川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1947年考取中英庚款赴英深造，1956年在伦敦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1963—1971年执教于英国利兹大学，先后担任讲师、高级研究教授，1987年以后，为加拿大约克大学名誉教授。1980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研究兴趣广泛，在中国近现代史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对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研究，成就尤其突出，有著作《军绅政权》《袁世凯》《毛和中国革命》等。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1928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去英国伦敦留学研究政治学，1938年回国后任《中央日报》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等职。先后创办《客观》

和《观察》，并任《观察》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反右运动开始后被作为典型打倒，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

笪移今（1909—1998），江苏句容人。曾任句容县立小学教员，江西《政治情报》月刊主编，重庆上川实业公司专员，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上海银行研究员、《观察》代主编。参与发起组织九三学社，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950年后，历任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学院教授、院长，复旦大学教授等职，是第五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世界经济的教学与研究，撰有《节制资本的再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等论文。

董时进（1900—1984），四川省垫江县（现属重庆市）人。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25年回国，担任北平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农学院教授及院长，主编《现代农民》月刊，创办重庆大新农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中国农民党。1949年12月，董时进曾诚恳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另辟蹊径的分析和精准概括的结论，被今天的学界一一重新认可。1950年到香港，1957年到美国，1984年在美国去世。董时进一生著述宏富，《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国防与农业》是其代表作。

樊弘（1900—1988年），四川人。经济学家、教育家。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先后在《国民公报》、北平社会调查所、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任职，1937—193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1939—1945年先后任湖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46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解放战争时期，曾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上，冒着生命危险发表演讲，积极支持进步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爱国运动，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和尊重，被誉为民主教授。1949年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1950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京大学第一位由中共中央直接批准入党的教授。樊弘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了第一部专著《劳动立法原理》，也是较早用比较法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在国际经济学界有很大影响，主要著作有《社会调查方法》《工资理论之发展》《进步与贫困》《现代货币学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凯恩斯的整个就业理论的崩溃》等。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1913年入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与同学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起游学英德，先后在爱丁堡、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任该校教授兼国文学、历史学系主任，后又兼文学院院长，创立该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筹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后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京，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教授、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治学理念在学术界影响深远。1949年赴台，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员”。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辩证》三卷、《古代中国与民族》等专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过《傅斯年全集》。

韩德培（1911—2009），江苏如皋人。武汉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1939年考取中英庚款出国研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国际私法，获学士学位，1942年转入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研究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法理学等。1945年受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国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哈佛求学期间，韩德培就撰写了评价庞德社会学派学说和凯尔森纯粹法学派学说的文章，回国后在《观察》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法治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之上的法治。韩德培教授是我国当代的一位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德高望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在国内外法学界

久负盛名，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际私法学理论体系，被公认为是新中国国际私法的一代宗师。译著有《苏联的法院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院》，学术论文有《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国际私法中的反致问题》等，《美国国际私法（冲突法）导论》和《韩德培文选》也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好评。

何彭，《观察》读者。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江西省新建县人。植物分类学家，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毕生从事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是继钟观光后的又一位大规模植物标本采集者。一生发表植物学论文一百四十余篇，发现一个新科六个新属和一百几十个新种，有著作《植物分类学简编》。

季羨林（1911—2009），山东人，字希逋，又字齐奘，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读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其著作汇编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简贯三，河南息县人。留日学生，曾在前河南大学任教。1940年11月29日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1943年1月12日免该职。1942年7月18日，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第四届立法委员。1947年5月4日，任“行宪”第一届立法院集会筹备处筹备委员，并当选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1月6日，任中华民国工商部政务次长。1949年4月4日，又任中华民国经济部政务次长。

李纯青（1908—1990），曾用名李询青，笔名寒飞、对岸同胞、吕焯、孔白之、杜微、何家通等，台湾台北人。1928年毕业于福建集美师范学校、

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市政系，后又到东京日本大学专攻科学社会学。回国后任职《大公报》，后主编《时代青年》周刊。1948年到香港，主持香港《大公报》转变立场事宜。1949年任天津《进步日报》副总编辑、天津《大公报》副社长。后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及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现任台湾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著有《日本春秋》《献曝》《反扶日论》《日本问题概论》等。

李孝友，时为中央大学学生。

刘大中（1914—1975），原籍江苏武进，生于北京，著名计量经济学家，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的唯一一位华裔学者。193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即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4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康乃尔大学。196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和税制改革中，都发挥出了相当大的作用。1975年因肠癌逝世于美国，学术著作汇编成《刘大中院士经济论文集》一书。

刘滌源（1912—1997），湖南湘乡人，西方经济学研究专家。193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货币相对数量说》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学术奖。1942年至1944年，任重庆大学商学院讲师，讲授货币与银行等金融课程。194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专攻西方经济理论。1947年学成归国，回母校武汉大学经济系执教，任教授数十年。他是中国研究西方凯恩斯主义的著名学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也颇有造诣，有所建树。主要著作有《垄断价格机理研究：垄断价格机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与陈恕祥教授合作）、《凯恩斯经济学说评论》、《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教科书）、《凯恩斯主义研究》（主编）、《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理论与实践》（和谭崇台教授主编）等。

楼邦彦（1912—1979），笔名硕人，浙江人，现代宪法学家。清华大学毕业，曾留学英国，研究宪法、行政法，回国后在西南联大、武汉大学、重

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任教，著有《不列颠自治领》、《法兰西共和国地方政府》、《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合著）等。

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区）人，字仲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笔名光旦，西名 Quentin pan。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政学罪言》等，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

施复亮（1899—1970），原名施存统，曾用名方国昌、光亮、子元、施伏量等，浙江金华人。1919年发表《非孝》之文，引发“一师风潮”。1922年，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建国后，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一、二、三届全国人代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著译有《现代唯物论》《资本论大纲》《中国现代经济史》《实用经济学》《经济科学大纲》等。

施若霖（1917—2005?），浙江鄞县人，原名施润德，字若霖，笔名之沧、云天、方祺、方穆、施云天等。1937年在上海编《年青人》，“孤岛”期间协助胡山源编《申报·自由谈》，1941年主编《申报·春秋》及《文艺世界》，解放后一直在上海虹口的继光中学任教。曾为启明书店编过《八十家佳作集》，在《红茶》上发表一部长篇小说《突围》，也为《文汇报》《光明日报》写过稿，著有《中国语文漫话》《李时珍的故事》等。

陶永芳，《光复日报》记者。

王克浪，报人。1940年时为《民国日报》记者，1942—1945年应蒋经国之邀，在他兼任社长的赣州《正气日报》担任编辑主任，1948年在南昌创办了一张四开综合性报纸《天下报》，任社长兼总编辑。

王水（1929—1950），原名甘传昌，浙江宜平人。1947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以学生身份参加革命，先后在《新路南报》和《金华新闻》任采编工作，后任职新华社金华分社，《金华大众》创刊后调入该报社，1950年《金华大众》停刊，王水根据组织安排，去《浙江日报》工作，就在他接到调令当天晚上，刚出门就遭到股匪偷袭而牺牲。

王芸生（1901—1980），原名德鹏，天津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早年家贫，曾在天津当学徒，自学成才。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天津《商报》总编辑、上海《大公报》总编辑，以《大公报》为阵地，呼吁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策。1948年底，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从上海经台湾、香港进入华东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到已解放的北京，发表《我来到了解放区》一文。同年5月，随军进入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并作为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之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曾历任多职，1980年5月30日逝世于北京。有著作《芸生文存》《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

伍启元（1912—？），广东台山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留学英国，1937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纽约大学公共行政学教授，台中东海大学荣誉讲座兼首任法学院院长等职。主要著作有《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Outline of International Price Theories* (London, 1939)、*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联合国出版）、《公共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主要论文有 *Policy Sciences*, *Management Sciences* 等。

吴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海宁人。早年获燕京大学文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荣誉硕士学位。1935年后曾任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辑，《史学集刊》编委，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国文系讲师，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桂林师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央大学国文系教授，1949年后历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及导师、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校外考试委员，伦敦大学中国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

授及博士研究生导师等职。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对《红楼梦》颇有研究，见解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为红学专家，有专著《〈红楼梦〉探源》（英文）、《〈红楼梦〉探源外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等。

吴元黎（1920—2008），天津人。出生于上海，南洋中学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与政治科学系博士。曾在中国中央银行任职，1949年移居美国，为美籍著名华裔，美国经济及军事学家。1960年以来任美国旧金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顾问。1969至1970年曾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1985年被选为“1985年旧金山大学杰出教授”，获得“杰出服务奖”。著作甚多，内容以国际经济与政治为主，其中多部被译成英、中、德、日、西班牙文。

严仁赓（1910—2007），天津人。早年受祖父严修影响较大，193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到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做研究工作。1946年回国，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校长助理。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旧中国地方财政的研究，专于西方经济学，尤长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学，论著有《北平之市财政》、《中国之营业税》、《云南省财政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英文）、《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合著）等。

杨人榭（1903—1973），史学家，湖南醴陵人，杨东莼之弟。1922—1927年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1927年任江西省政府秘书，参加革命工作，曾被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嫌疑拘留一周，写有《西牢七日记》。后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福建泉州黎明中学、江苏苏州中学等执教。1934—1937年入牛津大学奥里学院攻读世界史，获文学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历任四川大学、西北联大、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京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直至1973年9月15日逝世。在法国史和非洲史领域做了大量研究，造诣颇深，主要著作有《圣鞠斯特》、《非洲史纲要简编》，译著有《法国大革命史》（克鲁泡特金著）、《法国革命史》

(马迪厄著)等。

杨西孟(1900—1996),研究员,四川江津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37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数学系,获硕士学位。曾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长,对外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副所长、顾问,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全国美国经济学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顾问。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美国经济的研究。著有《论分割数》《当前美国经济问题及八十年代经济前景》《略论现代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和价值转移》等。

袁国弼,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州人。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51年6月卷入“美国特务案”,被撤销所任的一切职务。1973年6月在北京病逝。张东荪曾参与创办我国第一本专门性哲学杂志《哲学评论》,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多元认识论重述》《阶级问题》《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

张培刚(1913—2011),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国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1934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194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法学院代理院长。建国后历任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华中工学院建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等职。专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理论、外国经

济学说，著有《清苑的农家经济》、《浙江省粮食之运销》、《农业与工业》（英文）、《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等，有《张培刚选集》。

赵迺抃（1897—1986），字述庭，号廉澄，杭州人，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达55年、系主任达18年，培育出了无数优秀人才。著有《欧美经济思想史》（台湾版）和《披沙录》一、二集等。

郑林庄（1908—1985），广东中山人。1931年获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教授、系主任、法学院代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经济系、农业经济系、外国经济管理研究所教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加入美国经济研究会。著有《中国合作运动史》、《战后中国农业金融》、《合作理论基本知识》（合著）、《美国的农业——过去和现在》（译文选编）。

郑慎山（1895—？），湖南长沙人。原名张素民，字效敏，号慎庵（也写作“厂”），化名郑慎山。五四时期曾写有《什么是集产主义》等文，介绍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曾担任《民治日报》主笔，青年毛泽东与之趣味相投，多有交往，1922年毛泽东领导长沙铅印活版工人罢工，任铅印活版工会秘书，曾邀请张效敏出面调停，张效敏被公推为铅印活版工会主席。1924年张效敏以北京明德大学毕业生资格赴美留学，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宾州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31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光华大学经济系主任、沪江大学商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教授兼会计银行系主任等职。七七事变后投靠汪精卫集团，以本名“张素民”先后出任汪伪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兼敌产管理处处长、中央储备银行常务理事、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董事等职。1945年9月，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拘捕，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1948年在狱中，曾化名“郑慎山”

与张东荪、吴恩裕、潘光旦等在《观察》杂志上讨论自由主义问题。1949年2月获保释出狱，后定居国外。有著作《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等。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朱自清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解放前夕，患胃病辞世。

庄智焕（1900—1978），字仲文，浙江鄞县人。上海南洋大学、巴黎高等电气学校毕业，获无线电工程师学位。1925年回国，任黄埔军校电讯教官，后曾历任南京无线电台台长，交通部电政局局长，交通大学教授等职。1947年5月，出席第三十届国际劳工大会，任中国代表团资方代表。后定居美国。

《观察》（全六卷）篇目索引

（依拼音排序）

A

- 阿尔泰山的烽火（新疆变乱记略之一） 第一卷第十四期
哀悼许季萋先生 吴世昌 第四卷第六期
爱惜学生时光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爱与死 李慕白 第二卷第十九期

B

- 八方风雨会中州（《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十二期
八根火柴 Tabi 作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罢课期间的清华园 健民 第四卷第十期
巴黎会议成就了什么 钱能欣 第一卷第十五期
巴黎来函 第五卷第三期
巴力门·电影业·“中国出路” 费孝通 第四卷第二期
把学生抓做壮丁 第四卷第九期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 季羨林 第六卷第三期
跋《一多遗集》 吴晗 第三卷第十二期
把灾区变成人民的谷仓 郢瑞·白磐 第六卷第十四期
白报纸！ 储安平 第三卷第九期
白报纸的浪费 第三卷第十一期

白崇禧之言 第二卷第十三期
百孔千疮的物价管制 刘滌源 第五卷第十期
半年来新疆情形综合报导 (迪化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三期
鲍埃斯谈中国远景 (北平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三期
暴动以后的台湾 第二卷第五期
鲍尔汉与麦斯武德 (迪化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五期
包华丽夫人逝世一百年 凌卓 第四卷第六期
宝天铁路与天兰铁路 (兰州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九期
保障人权 北平十三教授 第二卷第一期
北大“三·二九”前后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七期
北大同学是怎样搞膳团的? 樊骏 第六卷第十一期
北大自治会竞选记 (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六期
北方哀情 第三卷第十六期
北方大局识小录 《观察》读者投寄 第五卷第十六期
“北方的观察” 第二卷第十二期
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 王水 第二卷第十七期
北方战局展望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二十三四期
北方政局观测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二十期
北疆战局的背景及展望 (迪化通信)本刊特约记者(甲) 第二卷第十七期
北京大学教授宣言(来件) 第二卷第十四期
北京大学一年来的改革与学习 彭越明 第六卷第八期
悲剧世界之变迁 宗白华 第一卷第八期
北平大拘捕 (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二期
北平的征兵戏 (北平通信)本刊通信记者 第一卷第十一期
北平风雨中 第三卷第九期
北平护权运动的侧面观 (北平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五期
北平教员学生被捕案续志 (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九期
《北平日报》来函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北平四“罢”合流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八期

- 北平四大学教授九十人来函 第四卷第十期
- 北平探监记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五期
- 北平学生被捕被释记 (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七期
- 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 (北平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四期
- 北平学生示威记 (北平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 北平学生又被捕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一期
- 北票之围追记 陈善基 第三卷第四期
- 被牵着线的独立国——菲列宾 William Winter 第五卷第四期
- 被杀与被辱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 北塔山事件发生后的迪化政情 (迪化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 北塔山事件·新蒙边界·新疆问题 周东郊 第二卷第十九期
- 地图:北塔山附近形势图
- 地图:迪阿交通略图
- “北望满洲”(《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四卷第三期
- 北行记 第一卷第十五期
- 本刊第二卷目录索引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本刊第二卷作者索引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本刊第一卷目录索引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 本刊第一卷作者索引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 本刊在兰州 第一卷第十五期
- 蚌埠紧张 第三卷第七期
- 币 邵燕祥 第五卷第十五期
- 币制非改不可 朱偁 第三卷第十期
- 币制改革有办法吗? 夏炎德 第四卷第十九期
- 币制再变革与物价前途 徐毓枬 第五卷第十四期
- 变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 编辑后记 第二卷第一期
- 辩论 齐星 第四卷第二十期
- 辩“日本复兴问题” 刘子健 第四卷第九期

编选中学国文课本的几个实际问题和改进意见 周河冬 第六卷第十四期
编者报告 编者 第三卷第十七期
编者报告 编者 第四卷第三期
编者简复 第六卷第三期
病社会 第一卷第三期
柏拉图放逐诗人辩 戴镛龄 第一卷第二十期
波兰之行（上） 叶君健 第五卷第六期
波兰之行（下） 叶君健 第五卷第七期
补充与更正 第二卷第九期
不改造就落后 费孝通 第六卷第七期
部会的裁并 第四卷第三期
不令人服输的成功 费孝通 第二卷第十六期
补评《英文新字典》 钱钟书 第三卷第五期
不要消极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不要再玩老把戏 第二卷第十八期

C

财产税与有钱人 第四卷第十七期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费孝通 第二卷第十七期
惨！惨！惨！ 第四卷第十七期
参政会和平运动的三个阶段（南京通信）浦熙修 第二卷第十六期
察北一村落 萧离 第六卷第十四期
拆炉话北美 费孝通 第四卷第五期
“柴那门的机会” 史超礼 第三卷第十八期
阐述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件史料 赵俪生 第六卷第十三期
长城线内外的争夺（《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七期
长春征兵，惠及狱囚 第四卷第七期
长春征兵，有钱即免 第三卷第二十期
长沙人民团体如雨后春笋 第二卷第十五期
昌潍失守·鲁局鸟瞰 蔡洞国 第四卷第十五期

- 长指甲里藏着什么 刘绪贻 第五卷第十六期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建设 《观察》编辑部 第六卷第五期
- 朝阳学生的哭诉 第二卷第十六期
- 撤去贪官·提升污吏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陈辞修去矣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七期
- 陈赓南渡与陕豫局势 (陕豫通信)《观察》读者投寄 第三卷第十期
- 陈衡哲函 第一卷第九期
- 沉静中的中大 第一卷第四期
- 陈明仁的胡子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 沉默中的潘光旦·费孝通 (南京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一期
- 陈铁大少回家 杨绛译 第二卷第十期
- 陈之迈函·潘光旦函 第一卷第二期
- 成都国民教师街头下跪饥饿请愿详记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八期
- 成都解放以后 《观察》读者投寄 第六卷第十期
- 成都四月九日血案详记 陈痛 第四卷第九期
- 成都新中国日报被捣详记 (成都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 成见的根源 阮春芳 第一卷第十八期
- “成见”的故事 第一卷第十八期
-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刘绪贻 第四卷第十六期
- 城乡互助的范例 《观察》特约记者 第六卷第二期
- 程孝刚 第四卷第十八期
- 持论务须矜慎 第二卷第十六期
- 斥一种谬论 上海益世报 第三卷第十四期
- 吃重·苦斗·尽心 储安平 第四卷第二三四期
- 重归英国怀抱后的香港 (香港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四期
- 重庆饿民抢米记 雨沫 第四卷第十八期
- 重庆扒手自请坐牢 第四卷第十五期
- 重庆抢米记 第四卷第十九期
- 重庆政闻 (重庆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七期
- 重新做人——北京市妓女改造前后的访问 孙执中 第六卷第六期

重演历史？创造历史？ 孙克宽 第四卷第八期

重阳风雨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期

雏型中国 史超礼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川东不靖 第四卷第八期

川局近貌 （成都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六期

传统的经济学说何以竟成了阻挠中国进步的绊脚石？ 樊弘 第五卷第五期

创造的统一 金克木 第三卷第八期

春城秋意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二期

春风中的风波 （沈阳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五期

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 王铁崖 第四卷第十一期

此中消息 第二卷第五期

从北京到长安 汪圻 第六卷第十四期

从北平到北京 《观察》记者 第六卷第三期

从北塔山事件说起 吴世昌 第二卷第十九期

从答辩听声音 适夷 第二卷第四期

从迪化暴动看新疆前途 （迪化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九期

从杜鲁门主义到马歇尔方案 杨刚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从对比到统一 高觉敷 第一卷第二期

从妇女运动看妇女问题 李超 第五卷第八期

从个人到世界·矛盾引导着前进 （北平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四期

从共同纲领看私营企业政策 千家驹 第六卷第三期

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问题 周子亚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从黄河到长江的军事大转盘 （《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六期

从黄金风潮论经济对策 庄智焕 第二卷第一期

从几个世运选手拒绝返国说起 潘光旦 第五卷第二期

从济南逃到浦口 王大卫 第五卷第八期

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 伍启元 第一卷第二期

- 从经济立场看美苏关系 郑林庄 第二卷第十四期
- 从经济上考察中苏三大公司的协定 樊弘 第六卷第十四期
- 从剧评听声音 李健吾 第二卷第四期
- 从冷仗说起 费孝通 第三卷第十六期
- 从立法院的派系说到国民党的改造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 从卢布金比看中国黄金问题 笄移今 第六卷第十一期
- 从美国看中国 张义昌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 从美军下旗到张今吾被释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三期
- 从美苏说到国内 吴世昌 第二卷第六期
- 从民主到帝国 谷春帆 第三卷第十期
- 从人事上论中国政治 浩然 第四卷第八期
- 从世界潮流论中国出路 伍启元 第二卷第七期
- 从数字看江西 王克浪 第三卷第八期
- 从四平之战看东北前途 (沈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二十期
- 从四种观点论美苏两国的经济平等 吴景超 第五卷第十三期
- 从天津工展看工业的道路 《观察》特约记者 第六卷第二期
- 从“天下国”到“地缘国家” 何永佶 第二卷第十九期
- 从往上爬到大家互助 费孝通 第六卷第九期
- 从“为人民服务”引起的谈话 费孝通 第六卷第十期
- 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 杨振声 第六卷第十三期
- 从“新经济学”谈到凯因斯和马克思 张培刚 第四卷第十五期
- 从心理学观点解释中国悲惨的现状 高觉敷 第二卷第十八期
- 从印度分治说到中国前途 何永佶 第二卷第二十期
- 从粤汉铁路惨案看中国的公共事业 (广州通信) 邓嗣禹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从战局看政局 (《观察》专稿) 《观察》记者 第四卷第一期
- 从“战前标准”看公教人员待遇 王璧岑 第五卷第八期
- 从政策上论中国政治 浩然 第四卷第十一期
- 从政治·经济·法理分析金潮之因果与处理 简贯三 第二卷第一期
- 从中国的历史看民主政治 吴世昌 第三卷第十八期

从中国人的家说起（上） 梁漱溟 第二卷第十一期
从中国人的家说起（下） 梁漱溟 第二卷第十二期
从中国乡村看中国政治 （皖中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八期
从朱绍良到谷正伦 （兰州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期
脆弱的局面 第二卷第十一期

D

大钞出笼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大钞的波浪在北平 米兰民 第三卷第十八期
答樊弘先生 第三卷第十六期
答复《观察》周刊记者对我评语 张君勱 第一卷第三期
大韩民国李氏王朝 （汉城通讯）《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一期
大局的抢救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三期
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储安平 第二卷第十三期
大局外弛内张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六期
大圈子里小圈子的日本政局 刘子健 第四卷第二期
大生产运动的一个环节 胡冰 第六卷第十三期
大事记 第六卷第二期
大事记 第六卷第三期
大事记 第六卷第四期
大事记 第六卷第五期
大事记 第六卷第六期
大同学生被殴目击实录 第二卷第十五期
大夏大学来函 第四卷第十五期
大选的费用 第三卷第二期
大选史料 第三卷第十五期
大选太平 第三卷第十四期
大选与时局 吴之椿 第三卷第四期
大学生的风度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大战后的美国 陶孟和 第一卷第十二期

- 大战时期的美国文学 钱歌川 第四卷第十三期
- 挡不住·围不拢·共不起 第三卷第七期
- 党籍与出路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 当局与六二 第二卷第十四期
- 当前几种经济急救方案效果的估计 陈振汉 第三卷第二期
- 党务机关并吞敌伪产业又一例 第三卷第七期
- 荡漾中的和平运动 (南京通信) 浦熙修 第二卷第十四期
- 悼柏蒂也夫教授 潘光旦 第四卷第二十期
- 悼贝纳斯 朱若华 第五卷第五期
- 到处是明礁的新疆 (迪化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四期
- 道德的眼镜 刘绪贻 第五卷第七期
- 道德上有个毒刺 费孝通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 到了最后的时候 第六卷第三期
- 悼朱佩弦先生 吴晗 第五卷第一期
- 德国问题的症结 The New Statesman 第五卷第一期
- 德国问题与欧洲和平 钱能欣 第二卷第十三期
- 邓锡侯迟不赴任的原因 (成都通信) 《观察》读者投寄 第五卷第二期
- 邓锡侯真除后四川省政的新局面 (成都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五期
- 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储安平 第四卷第十期
- 第二转形期的新疆 周东郊 第三卷第六期
- 地方财政往何处去? 李恭宇 第三卷第六期
- 低气压中的巨雷 第二卷第十六期
- 滇谣小记 李广田 第二卷第九期
- 吊俞再麟之死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定都问题 张印堂 第一卷第十七期
- 东北到处有啼痕 (沈阳通信) 本刊读者投寄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 东北共军六次攻势 (《观察》专稿) 《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九期
- 东北工矿的创造新纪录运动 《观察》特约记者 第六卷第五期
- 东北教育的溃烂症 张高峰 第二卷第十八期

- 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 钱邦楷 第四卷第五期
- 动荡的国际现状与美国最近的外交倾向 杨刚 第二卷第六期
- 动荡中的世界政治潮流 李侠文 第一卷第五期
- 动荡中的四川政局 (成都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七期
- 东欧·西欧及新的战争 叶君健 第四卷第十四期
- 冬天里的夏天 李慕白 第二卷第四期
- 动员·戡乱·行宪 楼邦彦 第三卷第一期
- 斗争中的莎士比亚(一) Donald Morrow 著 梁实秋译 第一卷第十五期
- 斗争中的莎士比亚(二) Donald Morrow 著 梁实秋译 第一卷第十六期
- 斗争中的莎士比亚(三) Donald Morrow 著 梁实秋译 第一卷第十七期
- 斗争中的莎士比亚(四) Donald Morrow 著 梁实秋译 第一卷第十八期
- 斗争中的莎士比亚(五·完) Donald Morrow 著 梁实秋译 第一卷第十九期
- 读报的困难 第二卷第三期
- 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 李孝友 第三卷第十九期
- 读《赫尔回忆录》 费孝通 第四卷第十二期
- 读胡适之先生校足本《密尔自传》书后 吴恩裕 第四卷第十九期
- 读教育部两个代电后 楼邦彦 第四卷第十五期
- 读李陈关于我父许寿裳在台被杀是政治性暗杀二文后 许世玮 第六卷第十二期
- 杜鲁门的胜利就是华莱士的胜利 何永佶 第五卷第十四期
- 杜鲁门胜利的分析 杨庆堃 第五卷第十二期
- 读《论程孟明案》后(一) 第四卷第二期
- 读《论程孟明案》后(二) 第四卷第二期
- 读《论程孟明案》后(三) 第四卷第二期
- 读潘光旦先生妇女问题的论文后 黄碧遥 第五卷第八期
- 杜蒲及其漫画(附漫画四帧) 王琦 第三卷第九期
- 读史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 读书的自由 潘光旦 第五卷第十六期
- 读孙科谈话 储安平 第二卷第十八期

- 杜威入选与对华政策 费孝通 第四卷第十九期
- 黠武的心理 第一卷第十期
- 读《向全国的父母们哭诉》后(一) 第四卷第十四期
- 读《向全国的父母们哭诉》后(二) 第四卷第十四期
- 读者的盛意(一) 第四卷第三期
- 读者的盛意(二) 第四卷第三期
- 读者投书 第二卷第一期
- 读者投书六封 第三卷第一期
- 读者投书六封 第三卷第三期
- 读者投书(五封) 第二卷第一期
- 读者证实《清剿与轮奸》一函正确 第三卷第八期
- 读《自由主义宣言》 潘光旦 第四卷第三期
- 对付学生并无禁用达姆弹之例 第二卷第十六期
- 对民青两党的最低希望 第二卷第十三期
- 对日和约政治问题 李纯青 第三卷第六期
- 对日贸易开放与损害赔偿问题 马寅初 第三卷第二期
- 对外容忍·对内决绝 第二卷第十期
- 对于北大孟宪功等是否犯罪及假定其已犯罪究审判权属于何种机关之意见
蔡枢衡 第三卷第九期
- 对于《论当前政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 第三卷第八期
- 对于钱端升先生所拟“联立之路”的意见 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 第二卷第八期
- 对于荣誉的新认识 吴世昌 第六卷第八期
- 咄咄逼人 第四卷第七期

E

- 鄂东广济征兵实况 第二卷第十九期
- 二二八事件后的台湾 (台北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六期
- 恶化中的新疆局势 (迪化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三期
- 二十一国和会 蔡维藩 第一卷第一期

F

- 法币出关与流通券贬值所激起的波浪 高超 第四卷第六期
法国的磨难和危机 Thomas Cadett 第五卷第十二期
法国妇运领袖维尔米什访问记 吕德润 第六卷第六期
法国走上重建的路 本刊特约驻欧记者 第二卷第七期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本刊特约驻欧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法律! 第五卷第十一期
法律·道德·与大众利益 吴恩裕 第三卷第十五期
法外天地·人间血泪 (晋南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期
《法意》出版二百年 凌卓 第五卷第十一期
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谊 第六卷第六期
法治实行问题 李浩培 第二卷第十二期
反对恢复自费留学考试 第三卷第一期
范汉杰与辽西战场 (锦州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三期
樊弘先生更正 第五卷第二期
樊笼 李慕白 第二卷第十一期
烦恼的美国人的烦恼 杨刚 第一卷第四期
房屋·麦粉·报馆 第一卷第十九期
废除剥削与增加生产 施复亮 第四卷第四期
费孝通及其研究工作 胡庆钧 第四卷第二十三四期
愤世之作 第一卷第十期
丰湖之春 第一卷第十八期
烽火边沿的清华园 《观察》读者投寄 第五卷第十六期
烽火四起的“法兰西联合” 本刊特约驻欧记者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封建领主统治下的西藏 李有义 第六卷第十期
疯狂了的 中国 周绶章 第二卷第十六期
风浪·熬炼·撑住 储安平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风雅里的悲剧 刘绪贻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 服从社会与意志社会 李澈庐 第一卷第十九期
复旦的秋天 第一卷第六期
符定一致何思源书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三期
复活 李慕白 第二卷第十七期
福建农业建设的轮廓 刘建绪 第三卷第十八期
负了气出的门 费孝通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傅孟真的文章 第二卷第三期
妇女·女权 雷海宗 第二卷第一期
妇女问题的一个总答复 潘光旦 第五卷第三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四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五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六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七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八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九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十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十一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十二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十五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十七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十八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十九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负生偶记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阜阳被炸 第三卷第九期
“福哉马利亚” 戴镛龄 第一卷第十三期
副主席的谜 楼邦彦 第三卷第五期
副总统选举的曲折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期
傅作义的部队也贬质了 于文 第四卷第十七期
傅作义的困惑与北方局势 《观察》记者 第四卷第九期

G

- 甘地、罗曼·罗兰会谈详记 凌卓译 第四卷第十期
甘地、罗曼·罗兰会谈详记 凌卓译 第四卷第十一期
甘地与新印度 严绍端 第四卷第一期
甘地之死 严绍端 第四卷第一期
改革币制已届成败关头 刘大中 第五卷第四期
改革地方政制刍议 刘迺诚 第三卷第八期
改革台湾建议七点 第二卷第五期
改进中国政治的几个问题 孙克宽 第三卷第十三期
“干部”之累 田汝康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港币统治华南 第四卷第二十期
钢铁国营议案与工党内部困难 田汝康 第三卷第九期
钢铁在苏联 王遵明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告有志赴新疆者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告知识分子 张东荪 第四卷第十四期
哥哥的不幸 第五卷第五期
个己的产生 廖世承 第一卷第八期
革命人生观的几个基本观点 沈志达 第六卷第九期
给高岗同志 王文铎 第六卷第八期
给全国各专科以上同学的一封信 第二卷第十四期
给英国老约翰 萧乾 第一卷第九期
共产党的斗争作风 第三卷第六期
公道吗？ 第三卷第二期
共和党援华运动 杨刚 第三卷第十六期
公教人员的待遇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伍启元 第一卷第八期
共军入川之势（西安通信）《观察》读者投寄 第三卷第十七期
共军在陕北陕南发动攻势（西安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三期
共区大学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名词有什么区别？ 第六卷第八期

- 共同纲领中的经济政策 樊弘 第六卷第一期
- 拱卫甘·宁·新的马鬃山 (兰州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 工业化的经济建设在号召着新中国的青年奔向东北! 林维仁 第六卷第十四期
- 工业化的利弊 刘绪贻 第五卷第十期
- 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与人口 吴景超 第三卷第三期
- 工业化与人格 潘光旦 第五卷第七期
- 《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书评) 潘光旦 第三卷第二期
- 公营与私营 张敬亭 第六卷第四期
- 公债与建设——苏联的先进实例 第六卷第九期
- 工作检讨 邹再萍 第六卷第八期
- 工作与娱乐 戴文赛 第一卷第十九期
- 谷仓边缘的饥谨 (湖南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九期
- 古城夕照 第一卷第六期
- 故国风光 戴镛龄 第四卷第四期
- 古迹与今迹 第二卷第七期
- 观测日月食 戴文赛 第四卷第十一期
- 顾翊群函 第一卷第三期
- 《观察》第六卷目录索引 第六卷第十四期
- 《观察》第四卷目录作者索引 第四卷第二三四期
- 《观察》改组声明 本社 第六卷第十四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一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三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四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五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七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八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九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十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十一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十二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十三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十四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十五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十六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十七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十八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十九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二十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 《观察》漫画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 《观察》漫画 第三卷第二期
- 《观察》漫画 第三卷第四期
- 《观察》漫画 第三卷第六期
- 《观察》漫画 第三卷第七期
- 《观察》漫画 第三卷第八期
- 《观察》漫画 第三卷第九期
- 《观察》漫画 第六卷第二期
- 《观察》漫画 第六卷第三期
- 《观察》漫画 第六卷第四期
- 《观察》漫画 第六卷第五期
- 《观察》漫画 第六卷第六期
- 《观察》漫画一页 第三卷第一期
- 《观察》漫画一页 第三卷第三期
- 《观察》三卷目录·作者索引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 观察社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经过追记 本社被害同人集体执笔 第六卷第一期
- 官场一套 第二卷第十三期
- 关内外的烽火 (《观察》通信)《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 关于安南地名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 关于本刊的售价 第二卷第十一期
- 关于传统经济学的总答辩 樊弘 第五卷第十五期
- 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 座谈会记录 第六卷第十二期
- 关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新宪典 魏登临 第二卷第十期
- 关于“Fellow Traveller”及其他 第四卷第十七期
- 关于共军图川和政府部署的报告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一期
- 关于工作母机 第四卷第一期
- 关于“观察丛书”的报告 编者 第四卷第六期
- 关于胡海门 第二卷第八期
- 关于湖南省政府的参事 第三卷第十四期
- 关于“互助会”和“联谊会” 第二卷第九期
- 关于火车要人推 第三卷第十三期
- 关于“技术定额”的几点解释 第六卷第七期
- 关于校对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 关于“军与民的社会地位” 吴世昌 第一卷第十六期
- 关于“立法顾问委员会”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 关于《恋爱·婚姻·家庭》 第四卷第二十期
- 关于留美攻农同学计划的生产农场近况 第三卷第二十期
- 关于《论当前政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答张绍先君 第三卷第九期
- 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吴方高 樊弘 第六卷第四期
- 关于“美国的机器” 第三卷第十九期
- 关于美国人的性格 胡适 费孝通 第三卷第四期
- 关于“民主国际”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关于七五惨案最近的报导 (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一期
- 关于青年军保送升学 第三卷第十三期
- 关于青年一个最普遍而又最真实的陈述 第二卷第十期
- 关于取消学生公费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 关于“日本复兴会不会威胁中国” 费孝通 第四卷第一期
- 关于沈阳最近实际情形的详细报告 黎深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关于沈阳最近实际情形的又一报告 柴汉时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关于生产要素四分法 第五卷第八期
关于数理化要注意的问题 郑华炽 第四卷第十八期
关于四川最近混乱情形的详细报告 (成都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关于投书 第二卷第十六期
关于西北最近局势的报告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二十期
关于“乡土工业”和“绅权” 费孝通 第四卷第四期
关于新疆 第一卷第八期
关于新疆 效先 第一卷第十六期
关于新闻纸杂志用纸节约办法 第三卷第五期
关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樊弘 第四卷第十八期
关于冤狱 第三卷第十三期
关于云南最近一连串的民变的详细报告 黄伯骆 第四卷第四期
关于云南最近治安情形的详细分析 伯骆 第四卷第十九期
关于在华德侨 第三卷第九期
关于自由思想分子(通信) 陈衡哲 第二卷第十二期
关于《政治热忱与科学热忱》 刘达德、卢于道 第六卷第六期
关于“中共往何处去?” 杨人榘 第三卷第十期
关于中国出路看法 张东荪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关于“中国的政局”(通信) 梁漱溟 第二卷第四期
关于“转战” 第四卷第十八期
关中抢粮战 (西安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二期
广东不靖,交通瘫痪 陈微子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广东的走私 陈微子 第三卷第十三期
广东一角 第三卷第二十期
光度常常变化的星 戴文赛 第二卷第十五期
广告而已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光荣是属于谁的? 高岗 第六卷第三期
广西在寻觅一条道路 怀蓝 第五卷第七期

- 广州公务员的五点建议 第四卷第十一期
- 广州记者和香港记者 第二卷第十七期
- 广州近情 第三卷第九期
- 广州乱抓壮丁 第四卷第二十期
- 广州中山大学的新生 王宗炎 第六卷第九期
- 归来 李慕白 第二卷第十八期
- 贵阳的食盐 第三卷第二期
- 国大毕竟召开了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七期
- 国大评论 储安平 第四卷第九期
- 国大召开前夕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四期
- 国大·政局·战局 褚光明 第四卷第五期
- 国大·总统·宪法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八期
- 国代和立委的选举纠纷 褚光明 第四卷第六期
- 国法与校章之间 楼邦彦 第五卷第三期
- 国防前线之阿拉善旗 (宁夏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 国共双方军事实力的分析 (《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四期
- 国共问题何以不能和平解决的追索 陈彦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国际干涉 第二卷第四期
- 《国际公法成案研究》(书评) 周子亚 第三卷第八期
- 国家不争气·华侨倒了霉 第四卷第十三期
- 《国家与道德》(书评) 吴恩裕 第三卷第七期
- 国军全盘战略 (《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十三期
- 国民党党团合并前后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五期
- 国民党三中全会记 浦熙修 第二卷第六期
- 国民党三中全会鸟瞰 (南京通信)浦熙修 第二卷第四期
- 国民党往何处去? 杨人榷 第二卷第三期
- 国民党在康定 第三卷第十期
- 国民所得 陈振汉 第四卷第一期
- 果园文化 陈力 第一卷第二十期

H

- 哈尔滨归来 (沈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三期
- 哈密的瓜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 海滨 李慕白 第二卷第六期
- 海德拉巴—印度的“问题”土邦 严绍端 第五卷第八期
- 海南岛的风·匪·人 (海南岛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 海南岛的台湾人 (海南岛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六期
- 海南岛之铁输日 第四卷第九期
- 海外党报抨击豪门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 孩子·奶头·工作 全慰天 第四卷第八期
- 汉代末年的学生运动 刘大杰 第五卷第十五期
- 汉字的改革 刘学濬 第四卷第十六期
- 豪富与民意机关 第二卷第十八期
- 豪门儿女 第四卷第十八期
- 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捷克 何永佶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二十期
- 何德奎案 李浩培 第一卷第十五期
- 何厚此而薄彼 第三卷第二十期
- 和平何以会死了 张东荪 第二卷第六期
- 和平谈判及其后(新疆变乱记略之五) 第一卷第十四期
- 和平与太平 雷海宗 第一卷第九期
- “和平之谜” 费孝通 第四卷第十四期
- 和平之助抑战争之路? Michael Straight 第四卷第八期
- 何其芳的转变 沈宗澂 第五卷第二期
- 赫契生·穆懿尔·邹秉文·沈宗瀚的中国农业观 (北平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期
- 和苏联相处之道 拉斯基 第四卷第三期
- 和谈一年 吴世昌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 何谓“四面八方”政策? 第六卷第九期

- 和谣吹遍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二三四期
- 和谣与战局 (《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四卷第三期
- 和真比战难么? 董时进 第五卷第十五期
- “黑白分明” 史超礼 第三卷第五期
- 恨 第五卷第十期
- “红帽子”在美国 (美国通讯)段连城 第五卷第二期
- 湖北师范学院学生的申诉 第四卷第十二期
- “胡海门” 第二卷第六期
- 胡马谈片 第一卷第十期
- 湖南监委选举原原本本 黄潮如 第三卷第二十期
- 湖南邵阳的减租斗争 陈本中 第六卷第十一期
- 湖南省参议会旁听记 (长沙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 湖上秋游 第一卷第十五期
- 呼吁国内大学增设成都考区 第四卷第七期
- 呼吁和平 张申府 第五卷第九期
- 呼吁“解除恐怖的威胁” 第二卷第十六期
- 呼吁优待俘虏 第二卷第十九期
- 华北大战前夕鸟瞰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七期
- 华北山雨欲来 (北平通信)《观察》读者投寄 季明 第五卷第十五期
- 华北学联会对于沈崇案的表示 第三卷第二期
- 华莱士竞选的道德意味 费孝通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 华莱士生在中国 第二卷第十期
- 华莱士晤见记 田心源 第四卷第十二期
- 华罗庚教授回到了祖国! 孙执中 第六卷第十二期
- 花瓶詎可充立委 洋婆岂能登议坛 第三卷第十二期
- 华侨、侨汇、侨眷 第三卷第五期
- 话说天下大势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二期
- 华釜山之战 (成都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九期
- 怀愤激以切痛 第三卷第九期
- 淮上血泪 梁马 第三卷第十一期

宦途一例 匈牙利 K. 米克萨作 第四卷第十七期

黄泛区的灾情和新生 史镜涵 第三卷第三期

灰尘吸入症 蔡壬侯译述 第二卷第十一期

恢复人性·重视人权 第二卷第二十期

晦明初冬 杨刚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回乡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I

I. N. O. 第二卷第十五期

J

记半年来全国各项产业工代会的召开 《观察》读者 第六卷第十三期

记北平学生反扶日突击大游行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七期

记表现旅大人民生产力量的大连工展 《观察》特约记者 第六卷第二期

记陈达教授 全慰天 第二卷第八期

鸡蛋直立的故事 戴文赛 第二卷第一期

记迪化的“二·二五”事件 (南京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六期

记东北春耕以前的备耕工作 王政 第六卷第十二期

记东北的伐木工作 萧玉之 第六卷第十期

冀东风云 (天津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五期

饥饿的沈阳 《观察》读者投寄 第四卷第十八期

饥饿的野火 《观察》读者投寄 第五卷第十一期

急官儿 第二卷第八期

记河南农村的土地改革 穆家军 第六卷第十三期

记湖南田粮大贪污案 (长沙通信)《观察》读者投寄 第五卷第八期

记华东大学学员唐世岑的转变 刘秋鸣 第六卷第十二期

寄还信袋·读者响应 第三卷第二十期

鸡肋! 鸡肋! 季明 第五卷第十期

记刘伯承南下中的安徽党政军 曼容 第三卷第十期

记罗隆基招待会 辛耶 第三卷第八期

- 极目中原 益成 第二卷第十五期
- 记南京大学的课程改革运动 田欣 第六卷第十期
- 济南之战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六期
- 纪念闻一多在清华园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 记清华新生怎样进行人民助学金的评议工作 黄国宪 第六卷第六期
- 记清华一个集会 《文汇报》 第二卷第三期
- 记去年一年天津公私银行怎样扶助私营工业 张高峰 第六卷第七期
- 记上海解放后肃清特务、强盗、窃偷以及救火的工作 曹锡珍 第六卷第八期
- 记上海游民的收容与改造 陈楚熊 第六卷第七期
- 技术人员与内战 第三卷第一期
- 记四大学联考北平区漏题案 张汉清 第三卷第一期
- 记松江省农村副业生产工作 胡冰 第六卷第十三期
- 记苏联劳动英雄乌巴伊杜拉耶娃的谈话 于夫 第六卷第八期
- 激速转舵下的美国对日政策 Mark Gayn 第五卷第六期
- 记天津车站丢尽国家体面的一幕 (天津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八期
- 记天津前后九天的新闻检查 (天津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八期
- 极为欣赏 第三卷第四期
- 记武汉大学的活命罢课 祥敬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 冀西农村旅行所见 《观察》特约记者 第六卷第四期
- 记修筑中的青新公路 (西宁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期
- 记阎锡山治下的山西 叶平 第五卷第四期
- 记一九五〇年度新中国教育工作的重点 萧凤 第六卷第六期
- 记浙江大学的工读互助运动 贝加 第六卷第十二期
- 记最近陕西省东战役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九期
- 加强舆论力量的呼吁 第三卷第十五期
- 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民主政治 吴恩裕 第一卷第四期
- 夹在锯齿间的皖中 《观察》读者投寄 第三卷第七期
- 饯别战犯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艰难·风险·沉着 储安平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建议大学里添设“时事研究”一科 严仁康 第三卷第七期
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 笄移今 第四卷第十八期
将军与青年（记贺龙将军） 卢耀武 第六卷第十四期
江南情（江南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八期
蒋主席抵平以后的北方政军 万钟民 第三卷第十七期
蒋总统二次北巡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一期
交大学生迎接新年 竹手 第六卷第六期
胶济西段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教师与进步 钱端升 第二卷第一期
教育的矛盾与救急的治标 萧公权 第三卷第十三期
教育莫忘群育！读书莫忘救国！ 樊弘 第二卷第二十期
教育与政治 刘大杰 第五卷第八期
解放后的江南农村 王小石 第六卷第三期
解放后的上海电影戏剧界 《观察》特约记者 第六卷第九期
解放区印象记 一个联总工作者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解放以后的开滦矿区 《观察》记者 第六卷第一期
解放以后的兰州 《观察》特约记者 第六卷第八期
解放以来中国工业的转变和今后的工业问题 郑伯彬 第六卷第七期
揭开豫西的内幕 野军 第三卷第十二期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宪法剖析 《观察》编辑部 第六卷第三期
揭破美国政府对日和约的阴谋 第六卷第三期
戒严令不可随意使用 第二卷第二十期
进步的包袱 费孝通 第六卷第十二期
近代科学推翻了马尔萨斯人口论 竺可桢 第六卷第十二期
今后读书步骤 第三卷第三期
晋南共产党的残暴 第三卷第十一期
晋南解放区的斗争情形 李子静 第四卷第二期
今年的起码希望 陆志韦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今日川东 第四卷第十三期

- 今日的开滦煤矿 (天津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今日兰州 第三卷第十二期
- 今日与年前 第二卷第十四期
- 今日之粮政!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 今日之沈阳 (沈阳通信) 本刊通信记者 第一卷第十一期
- 锦上添花的代价 刘绪贻 第四卷第二十三四期
- 近十年来在新疆各党派活动秘录 (迪化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九期
- 禁舞问题 第三卷第一期
- 金圆券能够稳定物价吗? 樊弘 第五卷第一期
- 金圆券与政治的延续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五期
- 进展中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郭有守 第一卷第十七期
- 警察与法律 第五卷第二期
- 敬答樊弘先生 张东荪 第三卷第十六期
- 敬悼甘地先生 陈梦家 第四卷第三期
- 静的戏剧与动的戏剧 陈瘦竹 第一卷第四期
- 敬告社会贤达 谢扶雅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 精工与草率 徐中玉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 京汉道上 江横 第六卷第十二期
- 京郊土改实验区——巴沟村访问记 孙执中 第六卷第三期
- 京津生产实例反击了敌人的封锁 第六卷第八期
- 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 张东荪 第四卷第二期
- 经济学人与经济方案 徐毓枬 第五卷第十三期
- 经济正义与社会安全 郑林庄 第二卷第三期
- 经济之改造(一) 胡先骕 第一卷第二十期
- 经济之改造(二) 胡先骕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 经济之改造(三) 胡先骕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 经济之改造(四·完) 胡先骕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 泾渭河谷之战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二期
- 竞选费用的统计 第四卷第一期

“九龙事件”在北平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 杨西孟 第一卷第三期
九月沈阳 第一卷第十二期
举办了一次新型展览会的经验 袁翰青 第六卷第十三期
居然有这等事 第四卷第四期
局势又临紧张阶段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七期
举世瞩目的柏林问题 朱若华 第五卷第九期
居正·司法的尊严 第二卷第三期
捐官之风复活 第三卷第五期
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 《观察》记者 第六卷第六期
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军与民的社会地位 潘光旦 第一卷第九期

K

开除学籍以后，继以驱逐出境 第三卷第八期
开封浩劫九死一生记 黎先慧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开封失陷·在京豫人请愿详记 李铮 第四卷第十九期
戡乱委员 第四卷第二十期
戡乱游行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看守所 鲁勒 第五卷第七期
看一角糜烂的内地 方朗 第五卷第三期
康泽殉职记 雨严 第四卷第二十三四期
考据学的再估价 王瑶 第六卷第九期
考生控诉 第五卷第三期
考生与公费 第三卷第二期
科举·选举与中国式的民主 林志纯 第四卷第十三期
科学·和平 王次通 第一卷第十六期
科学精神与民主态度 杨人榭 第五卷第六期
科学在新时代里 陶孟和 第六卷第八期
客座记言（一） 陈衡哲 第一卷第十一期

- 客座记言(二) 陈衡哲 第一卷第十三期
客座记言(三) 陈衡哲 第二卷第三期
客座记言(四) 陈衡哲 第二卷第五期
客座记言(五) 陈衡哲 第二卷第十期
空心战与穿心战 《观察》记者 第四卷第十一期
狂澜 刘绪贻 第五卷第十七期
狂妄为什么会招致失败 罗素 第五卷第十一期

L

- 来函照登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来函照登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莱茵河底的魏玛阴影 费孝通 第三卷第十八期
烂污东北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七期
兰州秋色 (兰州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八期
老百姓之诉 第四卷第十一期
“老成持重”——英国政治风度 Kingsley Martin 第五卷第四期
劳动先锋马星祥谈一九五〇年大生产 高超 第六卷第十一期
劳莱·哈台 第一卷第七期
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亡 蒋家丁 第三卷第八期
泪眼看东北 高超 第四卷第一期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 金毓黻 第六卷第十三期
立法院首届会议草草开幕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二期
李璜是否官僚·且看此事下文 第二卷第十期
李璜问题 第二卷第十二期
离开沈阳·经过共区·走到锦州 高超 第四卷第十三期
历史回忆片段 张西曼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李四光教授及其在地质学上的成就 徐盈 第六卷第十三期
李闻之死 (昆明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一期
恋爱·婚姻·家庭 胡庆钧 第四卷第十八期
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和平 李浩培 第四卷第七期

联合国大会上的斗争 第六卷第二期
联合国大会怎样工作 张振鹗 第五卷第五期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 吴元黎 第二卷第三期
联合政府 第二卷第九期
联总·行总·解总的官司 《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五期
两次币制改革中之技术错误 徐毓柵 第五卷第十七期
两分三裂的民主党 费孝通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两个共和之间的法兰西》(书评) 楼邦彦 第四卷第九期
两管区里的百姓 第五卷第九期
两广考铨处 第四卷第三期
两广考铨处来函 第四卷第五期
梁华盛在吉林的作风 (长春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五期
两难 第五卷第十期
两年前的老样子又回来了 (天津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六期
粮食的国际分配 (华盛顿通信) 陈之迈 第一卷第一期
两头动 第五卷第五期
“良心”问题 第二卷第十一期
两种克服自然的知识活动及其冲突 刘绪贻 第四卷第十期
两种历法·两种文化 戴文赛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辽阳之失 第四卷第一期
邻人 季羨林 第二卷第五期
林溪和地球 蔡壬侯 第一卷第七期
林语堂不能到台讲学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令人费解 第二卷第十九期
令人醉的诗和令人醒的诗 何达 第三卷第七期
零下三十度的人心 (长春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一期
刘伯承南下记 《观察》读者投寄 第三卷第七期
刘不同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六二”在民主广场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六期
刘建绪及其左右 张大军 第四卷第二三四期

- 刘戡阵亡·西安震动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四期
- 留美攻农同学复函 第三卷第十期
- 留美学界的几个问题 任鸿隽 第二卷第十一期
- 琉球应归还中国 万光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刘文辉与西康烟匪之乱 (康定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 留学生汇率的问题 第五卷第六期
- 留学问题·第一流大学问题 金克木 第三卷第十二期
- 留学制度? 留学生 许君远 第一卷第五期
- 陇东之战结束以后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七期
- 龙套自述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 卢汉张邦翰之间 (昆明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八期
- 庐山缆车·陶行知遗事 第一卷第二期
- 陆志韦及其研究工作 余才友 第三卷第十九期
- 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 储安平 第六卷第五期
- 逻辑上的“排中律” (南京通信) 《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一期
- 略论文艺与象征 宗白华 第三卷第二期
- 略论中国政治问题 梁漱溟 第三卷第十四期
- 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宗白华 第五卷第四期
- 论保长——“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之三 胡庆钧 第三卷第十七期
- 论悲剧人生观 陈瘦竹 第二卷第二十期
- 论不满现状 朱自清 第三卷第十八期
- 论存储反应 吴世昌 第三卷第十一期
- 论程孟明案兼论社会有心人能否合拢来做一点事情 储安平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 论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 楼邦彦 第六卷第四期
- 论大学入学考试国文题的“合理化” 余冠英 第四卷第十八期
- 论党的职业化 吴世昌 第二卷第一期
- 论当前的经管情形 施复亮 第五卷第十期
- 论当前的土地问题 笄移今 第四卷第六期
- 论当前的政局和美国对华政策 吴世昌 第三卷第五期

论当前中国经济情势 伍启元 第一卷第一期
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楼邦彦 第四卷第十期
论发展学术的计划 陈序经 第三卷第十七期
论反对政府 严仁赓 第三卷第二十期
论反扶日 李纯青 第四卷第十六期
论风度 张啸虎 第二卷第二十期
论革命 周钟岐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论革命与科学的统一 王亚南 第六卷第五期
论“公然反对政府” 楼邦彦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论公务员的罢工问题 楼邦彦 第二卷第十三期
论官吏的民权 楼邦彦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论国体问题 吴世昌 第一卷第十八期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傅孟真 第二卷第一期
论和平问题 吴世昌 第二卷第十六期
论皇权 吴晗 第四卷第六期
论金币铸造与修正 刘滌源 第五卷第十四期
论教育政策 萧公权 第二卷第一期
论经济与政治 陈振汉 第三卷第二期
论竞选费用应有限制 周叔厚 第三卷第十四期
论科学研究的动机 丁骥 第三卷第九期
论朗诵诗 朱自清 第三卷第一期
论立法院内应设置一“立法顾问委员会” 周叔厚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论立法院与条约权 王铁崖 第三卷第二期
论琉球归属问题 李纯青 第三卷第十二期
论美军事事件 吴世昌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论“民主国际” 吴世昌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论排场戏 陈瘦竹 第一卷第二期
论聘请外国教授 季羨林 第四卷第三期
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之不妥 储安平 第三卷第十六期

- 论人性与私产 吴恩裕 第三卷第四期
- 论日本赔偿问题 谭崇台 第四卷第十七期
- 论赏罚 张述祖 第三卷第十二期
- 论商贾——“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之五 袁方 第三卷第十九期
- 论上海民乱 储安平 第一卷第十六期
- 论商业银行的前途 笄移今 第一卷第二十期
- 论“神话政治” 周绶章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 论神境 曹觉民 第四卷第三期
- 论神秘思想——神秘的逻辑 张述祖 第四卷第六期
- 论绅士——“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之一 费孝通 第三卷第二期
- 论省自治 陈柏心 第一卷第十五期
- 论师儒——“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之四 费孝通 第三卷第十八期
- 论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 朱悛 第六卷第十四期
- 论苏联提高卢布官价兑率及降低国营贸易物价 瞿宁武 第六卷第十期
- 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 吴晗 第四卷第十四期
- 论台湾的动乱 吴世昌 第二卷第四期
- 论坛两事 第二卷第四期
- 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 储安平 第二卷第十四期
- 论文艺底空灵和充实 宗白华 第一卷第六期
- 论文字改革与语言改革 高名凯 第六卷第五期
- 论物价的局部管制 刘滌源 第五卷第六期
- 论物价稳定后工业经营遭遇的新困难及其克服道路 郑伯彬 第六卷第十三期
- 论习文史 陈梦家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 论现行的留学政策 季羨林 第三卷第七期
- 论现行法律教育制度 徐道邻 第五卷第三期
- 论行政的无能 张锐 第一卷第十七期
- 论雅俗共赏 朱自清 第三卷第十一期
- 论亚洲与远东的经济重建 夏炎德 第二卷第十八期

论“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兼论我们的道路 周东郊 第四卷第十三期
论勇敢的表现 徐中玉 第三卷第十五期
论远东马歇尔计划 罗志如 第五卷第九期
论张君勱 储安平 第一卷第十九期
论这次的大选 楼邦彦 第三卷第十七期
论政府大捕学生 赵超构 第五卷第二期
论政府的改组 吴世昌 第二卷第九期
论政府改组 刘迺诚 第二卷第八期
论征用豪门富室在外国的资产及征用的技术问题 韩德培 第三卷第三期
论政治变动 陈仁炳 第五卷第十七期
论政治上的新病态 浩然 第四卷第七期
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焦孟甫 第六卷第六期
论知识阶级——“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之二 费孝通 第三卷第八期
论知行 冯友兰 第一卷第一期
论中纺让给民营的方法 李烛尘 第三卷第一期
论中国的“官僚制度” 张锐 第二卷第七期
论中国土地改革 施若霖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论中国式的代议制度 何永佶 第四卷第十一期
论中美经济关系之前途 夏炎德 第一卷第十九期
论中学国文课本 陈治文 第六卷第十期
论中央各级领导机关的职权及其互相关系 龚祥瑞 第六卷第三期
论中英建立外交关系 第六卷第七期
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 施复亮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论尊孔与民主的矛盾 朱本源 第三卷第十期
论作官与用人 浩然 第四卷第十六期

M

马的故事 周维明 第五卷第九期
马迪厄著：《法国革命史》（书评） 王绳祖 第三卷第一期
马开维里代表思想选集 吴恩裕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 《马克斯的政治思想》(书评) 李理黄 第三卷第十三期
- “马克斯的私生子” 何永佶 第四卷第十二期
- 玛瑙戒指 蓝蒲珍 第四卷第十五期
- 马歇尔方案实施第一章 《观察》特约驻欧记者 第四卷第十三期
- 马约翰底体育 余才友 第四卷第十五期
- 麦斯武德长新后的新疆局面 (迪化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甲) 第二卷第十七期
- 漫画与标题 第一卷第五期
- 漫谈方言文学 王了一 第五卷第十一期
- 蛮一点,孩子! 费孝通 第二卷第二十期
- 毛主席从莫斯科回到北京 第六卷第九期
- 毛主席到了莫斯科 第六卷第五期
- 美帝在亚洲的新阴谋 《观察》编辑部 第六卷第十一期
- 梅光迪之五万元 第一卷第三期
- 美国大选点将录 段连城 第四卷第十期
- 美国的机器 史超礼 第三卷第十期
- 美国的军备经济 Fritz Sternberg 第四卷第十七期
- 美国的钱在中国用到什么地方去的 Maxwell S. Stewart 第四卷第五期
- 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 张东荪 第二卷第六期
- 美国对华政策的冒险 Nathaniel Peffer 第四卷第四期
- 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看法 费孝通 第二卷第十六期
- 美国反动政府迫害美共领袖 第六卷第二期
- 美国和平中的火药味 杨庆堃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 美国进步党大会旁听记 陶维大 第五卷第六期
- 美国教师的贫困 梁瓯第 第一卷第十三期
- 美国教授关于北平迫害大学事件的两封公开信 W. W. Lockwood 等 第四卷第十六期
- 美国阔步世界 拉斯基 第三卷第二十期
- 美国人和癌症的抗争 蔡壬侯述 第一卷第十六期
- 美国人在青岛的行为 第三卷第四期

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变 本刊特约驻美记者 第二卷第九期
美国未成年劳动者的失业问题 易梦虹 第六卷第十三期
美国西部之世界爷与万县之水杉 胡先骕 第二卷第十四期
美国心理的诊断 潘光旦 第六卷第十四期
美国学生与政治 第四卷第八期
美国与德国 杨刚 第三卷第一期
《美国与中国》 刘子健 第四卷第十七期
美国援华问题的估量 杨庆堃 第五卷第十六期
《美国政制的改造》(书评) 楼邦彦 第三卷第十四期
《美国之内》(书评) 费孝通 第三卷第十二期
美国在华还能做些什么 费孝通 第五卷第十四期
美国在旅程的尽头 费孝通 第二卷第十一期
美苏斗争的影响 蔡维藩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美苏关系的现在与将来 蒋学模 第五卷第十八期
美苏间的恐惧 蔡维藩 第二卷第八期
美苏能否相互了解? 蔡维藩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费孝通 第二卷第十期
没有钱结婚 第三卷第十九期
美援究竟能帮多少忙? 程子汶 第五卷第七期
美援与英国外交 田汝康 第四卷第七期
梅月涵与清华大学 余才友 第三卷第十三期
孟德逊——最幸运的作曲家 戴文赛 第一卷第九期
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发展 斯杰班诺夫 第六卷第七期
梦魇的觉醒? 潘光旦 第四卷第七期
米本位 第四卷第九期
免于恐惧之自由 第三卷第九期
闽局将动 (福州通信)《观察》读者投寄 第五卷第四期
民盟来函更正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民社党内争中之“马歇尔” 第二卷第九期
民主波兰五年来国民经济的复兴与发展 阿·郭济克 第六卷第六期

- 民主集中与“三权分立” 龚祥瑞 第六卷第六期
民主园中的嘉木与恶草 陈衡哲 第二卷第五期
民主政治与自由 邹文海 第一卷第十三期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补义(上) 张东荪 第五卷第一期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补义(中) 张东荪 第五卷第二期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补义(下) 张东荪 第五卷第三期
民族受辱案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命”的等级 第二卷第七期
末日 第五卷第八期
魔术! 第五卷第五期
莫斯科所见 子冈 第六卷第二期
墓 李慕白 第二卷第十二期
目前所需要的文字改革 陆志韦 第四卷第九期

N

- 纳粹西迁录 (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四期
南昌乱抓壮丁 第四卷第一期
南昌《中国新报》第二次 第四卷第十五期
南疆的动荡(新疆变乱记略之四) 第一卷第十四期
南疆记行 陈力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南京 第一卷第十期
南京初冬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四期
南京重阳后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九期
南京大拘捕 严冬 第五卷第二期
南京大学政治学习的具体情况 田欣 第六卷第十二期
南京的风向:内战外患化 (南京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九期
南京的外交圈 (南京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七期
南京的新岁 政治氛围雨雪霏霏 (南京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南京五二〇惨案的前因后果 (南京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四期

南京学生宣布联防 冰若 第四卷第十四期
南京中华门外一事 第四卷第十二期
南欧和北欧 叶君健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内潮汹涌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三期
内蒙自治问题 傅斯年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内战给予工矿事业的摧残 胡为柏 第四卷第五期
内战论 杨人榘 第四卷第四期
内战全局的检讨与展望 (《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五卷第一期
内战中的广东南路 (广州通信)《观察》读者投寄 第三卷第十四期
拟J·马萨里克遗书 萧乾 第四卷第七期
逆流与歧途 孙克宽 第一卷第十三期
拟“顽固派”出洋考察的路线 第二卷第十三期
鸟的浩劫 第一卷第七期
宁波抢米记 第四卷第十九期
《宁波时报》 第四卷第十八期
牛郎织女 戴文赛 第一卷第六期
牛、牛贩、人牛公司 第三卷第五期
纽约来鸿 田庄 第一卷第十三期
纽约来鸿 第二卷第二十期

O

欧洲各国的局势 林同济 第三卷第八期
欧洲团结的基础 Kingsley Martin 第四卷第十八期
欧洲完了么? 拉斯基 第三卷第十七期
欧洲与美援 Victor Perlo 等 第四卷第一期
欧洲仲夏夜之梦 费孝通 第三卷第三期

P

派与汇(一) 潘光旦 第一卷第十五期
派与汇(二) 潘光旦 第一卷第十六期

- 派与汇(三) 潘光旦 第一卷第十七期
派与汇(四) 潘光旦 第一卷第十八期
派与汇(五·完) 潘光旦 第一卷第十九期
潘光旦底人文思想 余才友 第三卷第十七期
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 费青 第三卷第一期
贫穷与贫穷问题 全慰天 第五卷第十五期
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一) 韩德培 第三卷第十五期
评《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储安平 第三卷第十五期
评对国际现势的一种论调 钱克新 第四卷第二期
评方显廷先生的经济观点 笄移今 第二卷第二十期
平衡生活的一个方案 陈衡哲 第二卷第十期
平津短兵相接·京沪山雨欲来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八期
评李广田创作《引力》 李长之 第五卷第五期
评南京《中央日报》对王芸生的攻击 方秋苇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 储安平 第三卷第九期
评全国学生被捕事 张志让 第五卷第四期
评翁文灏内阁 储安平 第四卷第十五期
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 费孝通 第五卷第一期
平抑物价乎? 管制收益乎? 罗坚白 第四卷第二十三四期
评《英文新字辞典》 戴镗龄 第三卷第四期
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 韩德培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评最近官方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 施复亮 第五卷第十二期
扑朔迷离的太原战局 《观察》读者投寄 季明 第五卷第十八期

Q

- “期待东方的文艺复兴” 冯大麟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七点希望 第三卷第一期
七个月来的中国经济情势 笄移今 第四卷第二十三四期
契诃夫断想 徐中玉 第四卷第五期
齐鲁企业公司接收青岛敌伪产业内幕又一告报 第三卷第五期

七五事件的政治的·道德的·法律的责任 侯庭督 第五卷第四期
栖霞山的一幕 第四卷第九期
企业家与企业精神 简贯三 第一卷第七期
钱昌照的担负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期
前后两种谈话 第三卷第三期
千回万转中“新政府”揭幕前后的透视 (南京通信) 浦熙修 第二卷第九期
乾坤一掷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八期
钱面前的平等 何永佶 第四卷第十期
前夕! 第五卷第三期
黔西情形 第二卷第十七期
千言万语只为“煤” 田汝康 第三卷第四期
前账未清·免开尊口 第二卷第十三期
钱钟书函 第一卷第四期
请参政员领导全国和平运动 第二卷第十三期
清查团在平津 (天津通信) 本刊特约读者 第一卷第五期
青城游 第一卷第五期
青岛军火库爆炸 第四卷第五期
青岛乱抓壮丁 第四卷第一期
青岛乱抓壮丁 第四卷第十八期
青海的马步芳 (西宁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六期
青海之恋 本刊读者投寄 第一卷第十五期
清华全校学生进行思想总结的典型意义、经过情况和胜利收获 君羊 第六卷第九期
清华是怎样进行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 谢逢我 第六卷第十三期
清华园的制法与大选 (北平通信)《观察》读者投寄 第五卷第十期
清华园:让血化为更坚强的力量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四期
清剿与轮奸 第三卷第六期
请看今日之河北 (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六期

请看今日之山东 第三卷第八期
请看西安 第四卷第十一期
清算掉我的官僚主义作风! 张佑瑜 第六卷第十四期
请外交部解释 第二卷第十二期
请政府一读此函 第三卷第十五期
请注意外国流氓 第四卷第五期
秋风! 第五卷第二期
邱吉尔的投降主义 新政治家 第五卷第十四期
求生与求胜 全慰天 第一卷第十八期
去蔽 第二卷第十三期
全国进行生产救灾 第六卷第七期
全国人口选样调查的计划 陈达 第六卷第五期
全堂大笑 第二卷第十四期

R

让爱与憎结成一股钢铁般的力量 吴四维 第六卷第三期
热河:东北与西北之间的走廊 (承德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七期
热河之战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六期
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 潘光旦 第一卷第二期
仁鸿隼函 第一卷第九期
人口普查与技术人才 陈达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人类的世界观念 史立常 第二卷第六期
人民币的管理本位 刘滌源 第六卷第八期
人民币的战斗任务 笄移今 第六卷第四期
人民的火车 李梅 第六卷第四期
人民对于内战的负担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人民何辜! 第四卷第三期
人民开始需要合理的生活 第三卷第十期
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 第六卷第六期
人权与国权 第二卷第四期

人身自由的保障问题 韩德培 第三卷第十一期
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上） 潘光旦 第二卷第八期
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下） 潘光旦 第二卷第九期
人我一心 第二卷第十一期
人物素描 Theophrastus 第三卷第十八期
人像 范泉 第五卷第十八期
人心 第一卷第三期
人心·国是·现状 孙克宽 第一卷第二十期
人性的压抑与了解 刘绪贻 第四卷第十三期
人与文 美·赛珍珠著 天行译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日本复兴会不会威胁中国？中国应该怎样应付复兴的日本？ 刘子健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日本政局 谢南阳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如何能粉饰得了太平？ 楼邦彦 第四卷第五期
如何研究列宁主义 柯鲁普斯卡亚 第六卷第七期
如何约束日本的金属工业 王遵明 第三卷第八期
如何走上民主建设之路 庄智焕 第一卷第六期
如此今朝 第三卷第十二期
如此行宪，与训政有何异乎？ 第三卷第十四期
《如是他见》（书评） 费孝通 第三卷第六期
如斯政党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瑞士三咏 凌卓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S

三百二十三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 安平 第二卷第十二期
三轮车与人力车 第一卷第十一期
散沙要集合起来 第二卷第七期
三十年来中国科学工作的检讨 袁翰青 第四卷第十二期
三十一年来在战斗中成长的上海职工运动的总回顾 陈楚熊 第六卷第五期
三题征答 第三卷第十期

- 三峡行 第一卷第八期
- 沙龙 冯至 第一卷第十二期
- 莎士比亚十四行 戴镗龄译 第一卷第五期
- 莎翁戏剧的历史背景 李慕白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 陕北密云将雨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九期
- 陕北榆林之战 (《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十五期
- 陕北战局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期
- 善后救济在汉口 (汉口通信)本刊读者投寄 第一卷第十二期
- 陕晋战局与胡宗南部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一期
- 山水·人物·艺术 卞之琳 第一卷第一期
- 山西省政府来函 第四卷第十二期
- 山西忻县专区干部学校教导工作的初步经验 许诚 第六卷第十期
- 山野行记 卞之琳 第一卷第七期
- 山云多幻变·柳暗花不明 (南京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期
- 殇 汪铭 第四卷第十九期
- 上海的小学教师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 上海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掌握了新方向 左步青 第六卷第十三期
- 上海监狱 第三卷第十九期
- 上海解放以后金融、轻重工业、商业情况的总报导 《观察》上海通信组集体执笔 第六卷第一期
- 上海散记 贺笠 第六卷第十四期
- 上海与政府 第三卷第四期
- 上海杂志界联合宣言 第三卷第十六期
- 上海在反轰炸斗争中 陈楚熊 第六卷第十一期
- “邵元冲国葬” 第二卷第十二期
- 社会出路与人类前途 李中严 第五卷第四期
- 《社会契约论》(书评) 吴恩裕 第四卷第十二期
- 社会性的统一 高觉敷 第一卷第五期
- 社会运动的口号问题 黄炳坤 第二卷第十五期
- 社会主义乎?“新资本主义”乎? 严仁赓 第四卷第十七期

什么叫搞通了思想 费孝通 第六卷第六期
什么是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第六卷第八期
什么是计划经济? 中国目前能否实行计划经济? 第六卷第七期
什么是西欧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六卷第九期
绅权的继替 史靖 第四卷第十七期
沈阳春愁 高超 第四卷第五期
沈阳冬令营的风波 高超 第四卷第二期
沈阳观感 梁实秋 第四卷第二期
沈阳失守的尖锐报告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三期
沈阳晚寒 (沈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七期
沈阳小事 第一卷第三期
生产要素四分法合理乎 第五卷第七期
“生产因素四分法”与革命 谭崇台 第五卷第十五期
圣诞夜 李慕白 第二卷第一期
圣教与异端(上) 萧公权 第一卷第十期
圣教与异端(中) 萧公权 第一卷第十一期
圣教与异端(下) 萧公权 第一卷第十二期
胜利进入一九五〇年 第六卷第五期
生铁焦煤·不可运日 王遵明 第二卷第十五期
生物学战争 胡先骕 第三卷第五期
生意经与外交 何永佶 第四卷第十六期
《生育制度》(书评) 袁方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失败的统治 储安平 第一卷第三期
时代的悲哀 第三卷第二十期
时代的分析 陈友松 第一卷第三期
时代背景与学术环境 第四卷第四期
士大夫的考验 第二卷第十六期
士的使命与理学 张东荪 第一卷第十三期
史地公民 雷海宗 第四卷第十八期
师法十月革命的原则性 第六卷第二期

- 是否移都北平? 沙学浚 第一卷第十七期
- 诗家妙处 徐中玉 第四卷第十四期
- 世界大势与中国地位 钱端升 第二卷第三期
- 世界各国教育普及之比较观 陈友松 第二卷第十七期
- 世界和平与中苏友好关系 翁独健 第六卷第一期
- 世界之两极化 何永佶 第四卷第一期
- 时局答客问 张奚若 第二卷第三期
- 时局问答 陆君平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 释 Liberal · Liberalism 郑慎山 第四卷第六期
- 试论“猜不透上帝的意志”就教于费孝通先生 刘英臣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 试论美国的“中韩调查团”及我国的反应 吴世昌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第二卷第十六期
- 示威的自由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 实现海关自主·重订关税税则 第六卷第十期
- 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储安平 第二卷第九期
- 释“左”与“右” 严仁赓 第三卷第七期
- 首都各大学纪念“五四”记 (南京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二期
- 书名页与版权页 邱克勤 第六卷第六期
- 疏广答劝买田宅书 第一卷第十八期
- 树立信用·力求合作 梁漱溟 第二卷第一期
- “熟性”与“关人” 第二卷第十五期
- “双活”和联着的两张“弓”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八期
- 谁能代替人民说话 吴世昌 第一卷第四期
- 谁说军人喜欢内战? 第二卷第十七期
- 谁说中国人没有自由? 邓嗣禹 第二卷第十九期
- 谁下令逮捕学生 第二卷第十六期
- 谁在扩大学潮? 第二卷第十五期
- 谁知道中国的资源? 第六卷第十期
- 说“回家” 钱钟书 第二卷第一期

说民主 萧公权 第一卷第七期
四川的防务 《观察》读者投寄 第四卷第十四期
四川的团防 第四卷第十五期
四川解放以后的农村工作 思雪 第六卷第十一期
四川省委的分析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四期
四川政局的暗潮 (成都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六期
斯大林的生平 《观察》编辑部 第六卷第四期
斯大林教导了我们(社论) 第六卷第四期
斯大林著作的中译本 第六卷第五期
四年 黎宁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四平解围之日专机视察报告 (沈阳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一期
四平街之战 第二卷第十九期
私人感情与国家利害 第二卷第八期
四人语录 第二卷第十一期
思想之改造(上) 胡先骕 第一卷第七期
思想之改造(中) 胡先骕 第一卷第八期
思想之改造(下) 胡先骕 第一卷第九期
四月天·沉醉的大地 伊布拉因·阿尔敏沙林 第二卷第十一期
松花江畔的阴阳界 (长春通信)本刊读者投寄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送穷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宋子文的好作风 第二卷第三期
宋子文的捐款 第三卷第四期
宋子文的失败 傅孟真 第二卷第一期
宋子文的政绩·政策·作风·资本 (南京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三期
三期
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 (南京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一期
宋子文捐款动机 第三卷第七期
宋子文治粤一年 木艮 第五卷第十期
宋子文主粤·孙立人练兵·张岳军北巡 第三卷第六期

- 苏北军事的变化 常寿之 第五卷第十八期
- 苏北实地视察录 乡少 第三卷第十九期
- 苏联的戏 子冈 第六卷第五期
- 苏联即将东顾 丁骥 第四卷第十九期
- 苏联经济制度的轮廓和神髓 《观察》编辑部 第六卷第一期
- 苏联一九二一年在国内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在什么地方 华西里耶夫
第六卷第七期
- 苏联准备发动世界战争吗? Henry, J. Taylor 第四卷第二十期
- 苏联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一九四八年度卓越成就的详细介绍 《观察》
编辑部译 第六卷第二期
- 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制度介绍 《观察》编辑部 第六卷第十期
- 苏侨北撤记 (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五期
- 肃清官场应靠上层 第三卷第二期
- 算算看:直接订阅合算不合算 第四卷第十三期
- 岁寒谈大局 (《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 虽然对立,不见得就有战争 周炳琳 第四卷第一期
- 随时可以发生暴动的台湾局面 (台北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一期
- 岁尾年头战局总分析 (《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 所谓亲帝反苏 傅雷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所谓“责任内阁” 第二卷第十七期
- 孙内阁的五大彷徨 王渡之 第五卷第十八期
- 孙中山从美国走到苏联 胡绳 第六卷第一期

T

- 塔城的沦失(新疆变乱记略之三) 第一卷第十四期
- 塔塔木林 第一卷第十七期
- 台湾暴动纪实 (台北通信)本刊读者投寄 第二卷第五期
- 台湾暴动鳞爪 第二卷第五期
- 台湾的传奇人物 第一卷第十七期
- 台湾的公务人员 第二卷第五期

台湾点滴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台湾风声 第五卷第十一期
台湾鳞爪 (台湾通信) 读者投寄 第一卷第九期
台湾民变真象钩沉 纯青 第二卷第四期
台湾人的行政训练及技术训练 第二卷第五期
台湾人民看宪法 第四卷第七期
台湾事件的分析 (台北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五期
台湾与米 第五卷第十期
台湾与祖国 汪留照 第一卷第十三期
台湾总有一天 郑侠 第三卷第十九期
谈翻译 季羨林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谈方言文学 郭绍虞 第五卷第五期
谈家庭津贴制度 吴伯渊 第四卷第十三期
谈今天的学生 余才友 第四卷第九期
谈“孔家店” 周绶章 第二卷第十期
谈美国的广告 仝复 第三卷第六期
谈诗歌的晦涩 戴镗龄 第三卷第十七期
谈伍光建先生的翻译 戴镗龄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谈玄诗 张道真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谈谣言 袁昌英 第二卷第十三期
塘沽新港中国记者受辱详记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一期
唐山学生的呼吁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逃亡 汪铭 第五卷第六期
提得起·放得下 周绶章 第一卷第七期
提供许寿裳先生两年前在台被杀是政治性暗杀的种种事实 李何林 第六卷
第八期
天昏地黑 第二卷第十六期
天津市易长记 (天津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期
天津邮检 第四卷第二十期
天下第一无脑筋事 第二卷第八期

- 天下第一无脑筋事又一例 第二卷第十期
天灾人祸锦城劫 (成都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铁幕安在 费孝通 第五卷第十期
听话的艺术 杨绛 第四卷第八期
痛斥编者 第五卷第四期
痛定思痛·为谁而战·杀了又杀·此结怎解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七期
统一国家财经工作是战胜通货膨胀的有力保证 第六卷第十期
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 钱端升 第六卷第一期
投考 曾玺发 第五卷第三期
透视川西的农地与农村 小庄 第五卷第四期
土地改革·地道战 《观察》记者 第四卷第六期
土地改革与国家工业化 施建 第六卷第十一期
土地税 马寅初 第一卷第十八期
土改教育了我 陈振洲 第六卷第十一期
土革问题 第四卷第九期
团体改革的内在因素 刘迺诚 第三卷第二十期
蜕变后的中大选潮 郝稼 第三卷第二十期
退伍 沙平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退无以守·进必以战 刘绪贻 第四卷第十九期
托治: 联合国的试金石 萧乾 第五卷第五期
TV 宋的平行公路 第四卷第十九期

W

- 挖出我的思想根源 云映海 第六卷第十三期
外交部情报司来函 第二卷第十六期
外交部长的继任人选 第二卷第六期
完全的自由·无情的正直 第二卷第十六期
宛西烽火与鄂中江汉之间的溃疡 浩 第四卷第十六期
王凤岗其人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五期

王陵基面对的难题（成都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三期
为本届大学毕业生进一言 任鸿隽 第二卷第二十期
韦伯夫人《我俩的伴侣生活》 吕玉文 第五卷第八期
为“草根民主”呼吁 第二卷第十二期
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脱逃记（长沙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七期
为陈诚叫屈 第四卷第十一期
《围城》与“Tom Jones” 林海 第五卷第十四期
魏德迈告别声明的背景 Frank L. Tsao 第三卷第五期
魏德迈回国后，美国将如何的对中国？ 许德珩 第三卷第一期
魏德迈来华使命 Leo Rissin 原著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魏德迈与国民政府之间（《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三期
魏德迈与斯考比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魏德迈在平津的一段（北平·天津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一期
魏德迈在中国所了解的·所烦恼的·和可能建议的（《观察》专稿）《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一期
卫立煌出长东北剿匪总部与全盘战略的新部署 褚光明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未了知之人类》（书评） 胡先骕 第一卷第三期
唯和平可以统一论 钱端升 第二卷第四期
为何要维持原价？ 第二卷第十七期
为配纸事向上海市书业公会建议几点 第四卷第二十四期
为什么要先打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茅冥家 第六卷第十二期
为什么政府一定要开放对日贸易 第三卷第三期
危世盛典（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七期
为婴儿立志 第一卷第十七期
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 留美八学生 第三卷第三期
《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刊出后的响应 安平 第三卷第五期
为中国问题忠告美国 张东荪 第二卷第二十期
为自由而歌 斐多菲 第三卷第十四期
文明在生死之间 Arnold Toynbee 第五卷第二期

- 问题与答复 成纪、钱端升、樊弘 第六卷第三期
- 文学的价值 李广田 第一卷第三期
- 文学运动与文学创作 李广田 第一卷第十二期
- 《闻一多的道路》 徐述纶 第三卷第三期
- 文字改革的实验 金轮海 第四卷第十四期
- 翁文灏组阁经过及就职以后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六期
- 我不赞成“哲学概论”定为半年的大一共同必修 第三卷第十三期
- 我从泰兴来 朱东润 第一卷第六期
- 我的认识过程 胡遇复 第六卷第四期
- 我的事业苦闷 顾喆刚讲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 我的思想总结 谢逢我 第六卷第八期
- 我对《大公报》的看法 张啸虎 第二卷第五期
- 我对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意见 徐述纶 第三卷第二期
- 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 董时进 第三卷第十一期
- 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 樊弘 第三卷第十八期
- 我看台湾 第一卷第十九期
- 我看学潮 王芸生 第二卷第十四期
- 我们的刊物·我们的意见 沈叔平 第六卷第三期
- 我们的太阳 戴文赛 第二卷第四期
-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编者 第一卷第一期
- 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 本社同人 第六卷第一期
- 我们对学潮的意见 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等 第二卷第十五期
- 我们对于大局的看法与对策 杨光时 叶毅 孟庆渊 陈序廷 叶蔚华
虞世兰 车载 周扬 吴奇策 吴文烈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 我们对于当前时局之建议 王絮非 毛一心 吴伦 徐治平 洪甘人 章钰
邹慎之 刘咏春 刘子瞻 第二卷第八期
- 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 王遵明 王铁崖 孟昭英 邵循正
徐毓枬 袁翰青 陈振汉 杨人梗 楼邦彦 戴世光 第三卷第八期
- 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 储安平 第一卷第十一期
- 我们对于美苏关系的态度 傅雷 第二卷第十期

我们对于设立特种刑事法庭的抗议 清华·北大四个学会 第四卷第十二期
我们对于时局的几点认识 严仁赓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 周炳琳等四十八人 第三卷第十一期
我们对于争取学术独立的意见 国立七大学研究所同学会 第三卷第二十期
我们访问了斯太林 K. Zilliacus 第三卷第十六期
我们建议政府调查并公布白报纸配给情形 储安平 第三卷第十九期
我们所需要的“法治” 韩德培 第一卷第十期
我们为什么像人 蔡壬侯 第二卷第十八期
我们向哪条路走？ 陈旭麓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我们需要再来一次“五四运动” 于鹤年
我们眼中的工友变了 何孝达 第四卷第十五期
我们要的是私斗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我所见的英国 叶君健 第六卷第七期
我逃出了长春 陶永芳 第五卷第七期
我向你高呼万岁 郭沫若 第六卷第四期
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 张东荪 第三卷第七期
我在犯法中求生 第三卷第十八期
我在国文教学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 宋科 第六卷第七期
我主张中学不要教文言文 季振平 第五卷第七期
无病之病 张述祖 第四卷第十二期
武大两教授病逝 第四卷第四期
污垢“七七”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无独有偶 费孝通 第四卷第三期
武汉大学自治会普选记（武昌通信）《观察》读者投寄 第三卷第十七期
武汉的护权游行 第二卷第六期
误会 李慕白 第二卷第七期
物价·豪门·大局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二期
物价狂涨！物价狂涨！ 刘滌源 第四卷第十八期
物价往哪里去？ 笄移今 第二卷第五期
物价涨风的新阶段 笄移今 第四卷第二十期

- 物理战争 刘朝阳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武领兴学公然摊派 第二卷第十八期
五十天军事局势的总检讨 季明 第五卷第十二期
“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 王芸生 第二卷第十期
“五四”二十九周年 许德珩 第四卷第十一期
“五四”纪念在北大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二期
五四来信一 第二卷第十二期
五四来信二 第二卷第十二期
五四来信三 第二卷第十二期
五四前夕胡适专访记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期
无所事事 第三卷第十二期
无言的焦急 第一卷第四期
吴有训出国记 (中大通信) 《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三期
吴有训在中央大学 刘郝稼 第四卷第二十三四期

X

- 西安的面荒 (西安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西安漆黑 第三卷第八期
西北局势报告 (兰州通信) 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西北民生实业公司迪化分公司经理被捕 第三卷第七期
西方人“回到宗教去”的意义 陈衡哲 第一卷第十三期
西化问题的侧面观 季羨林 第二卷第一期
西江月 第一卷第九期
西江月(重刊) 第一卷第十期
戏剧与观众 陈瘦竹 第一卷第十期
细看中国 Nathaniel Peffer 第二卷第十八期
西康的民变·夷变 (成都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一期
西南边疆见闻录 蒋笃才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西南联大·任务完成·化整为零 (昆明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六期

西欧纪行（一）：英国 钱能欣 第三卷第十一期
西欧纪行（二）：法国 《观察》特约驻欧记者 第三卷第十二期
西欧纪行（三）：义大利 《观察》特约驻欧记者 第三卷第十三期
西欧鞋底烦恼处 费孝通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西山游 第一卷第十二期
习尚与价值判断的标准 张述祖 第二卷第十二期
《希特勒之末日》（书评） 郑慎山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希望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今夏招考时增设西北考区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希望择肥而噬 第三卷第二期
希望出“西南航空版” 第三卷第十四期
西洋诗之音乐性 张道真 第一卷第十一期
惜一人命而寒万人心 第二卷第十六期
西藏商务考察团之谜 李有义 第五卷第十六期
狭路相逢 刘绪贻 第四卷第五期
厦门恢复邮检 第四卷第十八期
现代财政动向与中国财政政策 伍启元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现代经济思潮的趋势 吴元黎 第二卷第九期
现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几种原则 刘迺诚 第二卷第五期
限价解除·危机依旧 笄移今 第五卷第十一期
现阶段的战局总检讨 《观察》记者 第四卷第五期
宪警私斗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宪政和中国文化 郭叔壬 第四卷第三期
向党干部的学习高潮看齐 第六卷第八期
香港报界对于孙科谈话的反应 第二卷第二十期
香港看大选 第三卷第七期
乡间苦 第三卷第十一期
湘江拦不住——反内战游行在长沙 （长沙通信）本刊读者投寄 第二卷第
十五期
湘粮开禁重禁前后详记 胡人章 第三卷第十期
向全国的父母们哭诉 吴国钧 第四卷第十二期

- 湘西社会 第一卷第十一期
- 萧伯纳访问记 珍·戴林波 第四卷第十八期
- 小疵与大谬 拉斯基 第三卷第八期
- 小康经济 费孝通 第三卷第十一期
- 小康之局·如何实现? 孙克宽 第四卷第二十三四期
- 小学生与国代 第四卷第七期
- “小总统” 第四卷第四期
- 写生被捕 第二卷第十七期
- 写在《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的前面 陈衡哲 第三卷第三期
- 写在《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的后面 王泽农 第三卷第六期
- 写在“五四”的前夕 吴世昌 第二卷第十期
- 新大陆的余音 杨庆堃 第三卷第十四期
- “新”的感觉 第二卷第十期
- 新的中学国语文课本该怎样编 王泗原 第六卷第七期
- 新官上任第一周 (南京通信) 浦熙修 第二卷第十一期
- 新婚姻法建立了新的男女关系 芮沐 第六卷第十三期
- 新疆变乱记略专辑 周东郊 第一卷第十四期
- 新疆的国大代表 (新疆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二期
- 新疆的危机在那里? (迪化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二期
- 新疆观感录(上) 丁芸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 新疆观感录(下) 丁芸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 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来函 第二卷第十六期
- 新疆危机的明朗化 (迪化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 新疆问题(新疆变乱记略引言) 第一卷第十四期
- 新近在巴黎发现的莫泊桑写给一位美女的三封信 凌卓 第三卷第十期
- 新局面前夕的派系争斗及人事布置 (南京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八期
- 心理的独立 第四卷第九期
- 新年新政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 辛勤·忍耐·向前 储安平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 新时代的教育宗旨 陈友松 第一卷第十期
- 新时代与新时代的人文科学 伍启元 第一卷第四期
- 新文字 第四卷第十九期
- 新闻自由的低潮 葛思恩 第二卷第十六期
- 新五四运动之前夕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三期
- 新政府的成立和旧条约的审查 王铁崖 第六卷第二期
- 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施复亮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初基工作——记中央召开的各项专业会议 《观察》记者
第六卷第五期
- 性格及职业兴趣的遗传问题 钱蕪 第一卷第十五期
- 形同摊派·于法无据 第二卷第十九期
- 行宪前夕的一个违宪之法 芮沐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 行宪序幕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行宪与出殡 包安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 雄圣甘地 费孝通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
- 匈牙利的经济建设·政治领导·宪法精神 《观察》编辑部 第六卷第二期
- 秀才遇见兵 石熙文 第三卷第十七期
- 休矣! 第二卷第十二期
- 徐蚌会战的分析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四期
- 徐淮战局的变幻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四期
- 许寿裳案的审判人对于李何林文的补充 陈醒民 第六卷第十期
- 许勇三的音乐作品 戴文赛 第四卷第九期
- 徐州乱抓壮丁 第四卷第一期
- 徐州琐闻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选·打·吃——张群内阁登台后的三件事 (南京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
二卷第十三期
- 选举与命令 第四卷第七期
- 玄武湖上的秋月 戴文赛 第一卷第十期
- “学潮”平息了么?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二十期
- 学潮平息以后的认识 钟伯平 第二卷第十七期

- 学潮中的西安 第二卷第十七期
学府权威·炙手可热·中大“解聘”教授别记 (南京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六期
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 储安平 第二卷第十四期
学生骇不退 第二卷第十三期
学生是怎样吃饭的 何孝达 第四卷第十一期
学生运动转变的开始 第二卷第十八期
学生之言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学术自由与文化进展 罗忠恕 第一卷第十二期
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艾思奇 第六卷第二期
“学运指导委员会” 第三卷第五期
荀子与斯宾塞论解蔽 潘光旦 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Y

- 亚澳工人阶级团结万岁 静远 第六卷第三期
延安攻占后的南京 第二卷第五期
延安归客谈 第二卷第八期
燕京被搜在场谈话 陆志韦 第五卷第二期
研究生公费只有四角七分 第五卷第九期
掩口葫芦 第二卷第四期
言论自由与自律 吴世昌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俨然第二个暴风雨的前夕 杨庆堃 第四卷第六期
盐税 第三卷第四期
阎锡山的生死关头 (西安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六期
晏阳初与中国农村建设运动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一期
兖州易手详记 倍原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要向前看 方非 第六卷第八期
要做的事不做 第四卷第十八期
洋顾问 第一卷第六期

养士教育的穷途 陈孝禅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一八四八·一九四八——历史的两个转折点 严仁赓 第五卷第十八期
一笔账 第五卷第十期
一笔账：请看老百姓的负担 第四卷第十五期
一场烂污 储安平 第五卷第十一期
宜川之役的检讨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六期
伊方人士撤离迪化后的新疆 （迪化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九期
一封信 第三卷第十一期
一个参加竞选的人的自白 胡慎明 第三卷第四期
一个出席国大采访的新闻记者的来信 第四卷第十期
一个大学毕业生对于大学教育的意见 龙正大 第四卷第十七期
一个冬天的黄昏 金隄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一个非洲森林中黯夜的乌鸦寻觅者 （北平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三期
一个工学院学生对于工学院教学的意见 黄开柵 第六卷第十期
一个老百姓的控诉 第五卷第八期
一个历史的教训 吴恩裕 第三卷第十七期
一个“联谊会”的建议 第二卷第七期
一个面临毁灭的世界 Aldous Huxley 第五卷第十七期
一个农业工作者的自白与意见 袁国弼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一个退伍学生的自白 第二卷第十五期
一个为《观察》而牺牲的邮务员 第五卷第十一期
一个英国乡村时事讨论会旁听记 田汝康 第四卷第十五期
一个知识分子的改造自述 李子英 第六卷第九期
以国家财富变为一党私产 第三卷第一期
以国家财富变为一党私产又一报告 第三卷第三期
以“积点制”及“服务纪录”解决用人问题 李翰如 第五卷第十一期
以教育救中国 傅统先 第二卷第十二期
一九四八年度苏联经济建设成绩的报告 苏联国务院中央统计局 第六卷第

四期

- 一颗微妙的心 袁昌英 第四卷第七期
以科学服务人类 左垵 第一卷第十六期
依丽莎白公主的婚礼 第三卷第三期
以民主缔造统一 李澈庐 第一卷第十二期
一年之间 第四卷第七期
伊宁事变(新疆变乱记略之二) 第一卷第十四期
一丘之貉 匈牙利 B. 易澳士 第五卷第一期
一曲难忘 李慕白 第二卷第八期
依什么标准来划分民族资产阶级? 第六卷第九期
亦是边区 本刊通信记者 第一卷第十一期
译诗五首 W. B. Yeats 等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一团和气” 荒野 第二卷第四期
一位国大代表的来信 第四卷第十一期
一位老太太的血汗 第四卷第十九期
一样争民主·多样的方式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一衣七亿五 第三卷第十四期
因地制宜税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印度的道路 严绍端 第三卷第十九期
印度独立一年 The New Statesman 第五卷第三期
引退的风度 第一卷第八期
音乐的幻想 第一卷第十八期
英报论中国 《观察》特约译者辑译 第五卷第十六期
应变与求援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十五期
英方在康藏边区筑路 吴湓赓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英国并未忘情远东 费孝通 第五卷第十七期
英国工党政府对于民营事业的管理办法 The World Report 第二卷第九期
英国人看中国 田汝康 第四卷第十九期
英国人看中国共产党 The Times 第四卷第二期
英国司法制度 李浩培 第一卷第五期

英国议会访华团在重庆（重庆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四期
英国舆论中的南斯拉夫事件 第四卷第二十二期
英国整军及其影响 朱若华 第五卷第十三期
迎接苏联人民的盛大节日 第六卷第九期
迎接文化高潮的信号——记最近北京演出的几出大戏 萧凤 第六卷第十一期
英美未来可能的战略联防线 张印堂 第一卷第二期
英文 朱光潜 第四卷第十八期
英文的中国化 蔡壬侯 第二卷第四期
又爱又怕 第二卷第十二期
有关东北农村生产的一些主要问题 高岗 第六卷第六期
忧患重重的西北角（兰州通信）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七期
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 马寅初 第二卷第一期
游剿战术的做法 第五卷第五期
游剿制面与冀东战事（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五期
游历者的眼睛 钱钟书 第三卷第十六期
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就不应当活着吗？ 第三卷第十八期
又是一个不明白的数字 第五卷第九期
有条件的父母之爱 费孝通 第二卷第十五期
又一个被斗争者的陈诉 第三卷第十九期
又一篇关于共区生活的报导 《观察》读者投寄 第五卷第七期
又一位军人的申诉 第二卷第十九期
与爱因斯坦的谈话 罗忠恕 第三卷第二十期
豫鄂川陕边区态势 邓威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豫鄂皖陕晋鲁形势略图（地图） 第三卷第六期
预伏一着 第二卷第十六期
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上） 梁漱溟 第三卷第四期
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下） 梁漱溟 第三卷第五期
与梁漱溟先生论“国土太大”及其利弊 沙学浚 第二卷第十三期
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 樊弘 第三卷第十四期

- 与密理根教授的一席谈 何永佶 第五卷第三期
与潘光旦先生论文化书 倪正和 第二卷第十六期
语言的宗教 高名凯 第一卷第十六期
与张莘夫先生同难者 第二卷第十四期
狱中生活简记(一) 张东荪 第二卷第十三期
狱中生活简记(二) 张东荪 第二卷第十四期
狱中生活简记(三) 张东荪 第二卷第十五期
狱中生活简记(四) 张东荪 第二卷第十六期
狱中生活简记(五·完) 张东荪 第二卷第十七期
远东经济委员会与中国 方显廷 第三卷第二十期
原子能研究的发展经过 戴文赛 第一卷第四期
原子能与世界大局 陈志让 第五卷第十二期
原子能与世界和平 袁翰青 第四卷第十五期
原子时代第三年 戴文赛 第四卷第八期
越北见闻回忆录 第一卷第九期
“阅读《观察》的自由” 第五卷第十期
约会 李慕白 第二卷第三期
陨星与流星 戴文赛 第二卷第十九期

Z

- 杂言 钱钟书 第四卷第二期
在北塔山的高峰上 (北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八期
在共军“疲劳战术”下的沈阳 高超 第三卷第二十期
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 储安平 第六卷第四期
再和施复亮先生谈“新资本主义” 严仁赓 第四卷第二三四期
在菏泽解放区所见(上) 江沙 第四卷第二期
在菏泽解放区所见(下) 江沙 第四卷第三期
在胡志明旗帜下的越南 薛谋洪 第六卷第八期
在冀东共区所见 《观察》读者投寄 第五卷第十一期
在记录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费孝通 第二卷第十三期

在焦虑中的河大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在牢狱中 昶明 第五卷第十三期
再论美国大选 费孝通 第四卷第九期
再论内战 杨人榘 第五卷第九期
再论知行 冯友兰 第一卷第六期
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 杨人榘 第五卷第八期
在美国船上看美国 第五卷第九期
在美国的烦恼 第三卷第十三期
在内战最前线 何彭 第三卷第五期
在欧洲看大局 《观察》特约驻欧记者 第四卷第十一期
在生产救灾战线上的苏北 郢瑞·白磐 第六卷第十期
再为征用国外资产呼吁 简贯三 第四卷第十六期
在闻一多的衣冠冢前 (昆明通信) 本刊读者投寄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在我们的“大海船”上 何孝达 第四卷第十四期
在无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发展原动力是什么? 第六卷第八期
“在阴谋与魔术导演下看新疆的前途” (迪化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乙)
第二卷第十七期
怎样把我们的经济学习提高到毛泽东阶段 吴大琨 第六卷第一期
怎样理解并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 赵俪生 第六卷第十四期
怎样实现“草根民主”? 第二卷第二十期
增产与革命 张东荪 第四卷第二十三四期
乍暖还寒时候 (沈阳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七期
战败后之日本 味橄 第一卷第三期
战从义·政从仁 纯青 第一卷第八期
战后中国教育 Nathaniel Peffer 第三卷第三期
战火西延·全川设防 (成都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八期
战局鸟瞰(《观察》专稿) 《观察》记者 第三卷第二期
展开和平运动 第二卷第十五期
战胜今年的春荒 王鸿 第六卷第七期
站稳自己的工作岗位 雷丽珍 第六卷第八期

- 战云弥漫下的美国 段连城 第四卷第八期
- 战争与和平 王庆源 第一卷第二十三期
- 张东荪谈话补遗 第二卷第七期
- 张东荪先生来函 第四卷第八期
- 张含英谈黄河河政 (兰州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三期
- 张群返川与川康政局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十五期
- 张群访日之行 方秋苇 第五卷第四期
- 张群院长的曲解 楼邦彦 第二卷第十五期
- 张垣之战 (张垣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期
- 张治中独镇西陲 (兰州通信) 本刊特约读者 第一卷第五期
- 朝气蓬勃的华莱士进步党 Howard K. Smith 第五卷第五期
- 这笔钱赔得冤枉 第四卷第十三期
- 浙大情形 第三卷第十三期
- 浙大文院革新运动详记 S. Y. 第四卷第十六期
- 浙大学生被捕惨死案 萧扬 第三卷第十一期
- 浙大学生被捕详记 S. Y. 第五卷第四期
-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傅孟真 第二卷第一期
- 浙江的蚕灾 第二卷第十一期
- 浙江的征丁征税 (杭州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十二期
- 浙江共军实力及其分布情形 (杭州通信) 《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五期
- 浙江政情 (杭州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九期
- 哲学精神的价值 卢愚 第二卷第七期
- 这一代青年生长在光辉的毛泽东时代! 之钟 第六卷第十四期
- 政府的度量 天津益世报 第三卷第十四期
- 政府德化·已及鸟类 第二卷第十八期
- 政府对付异己 第三卷第六期
- 政府封锁大学毕业生的出路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 政府改进为一切之前提 第三卷第十九期
- 政府和人民愈站愈远了 第四卷第十二期

政府利刃 指向《观察》 储安平 第四卷第二十期

政府·民情·人心 第四卷第七期

政府通盘调剂全国粮食 第六卷第十二期

政府限制大学生就业又一例 第三卷第一期

政府·学生·百姓 第五卷第十一期

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储安平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政局报告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九期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胡适 第三卷第七期

郑兆良和积铁 费孝通 第四卷第七期

政治大学报告 《观察》读者投寄 第四卷第十一期

政治大学游行记 尚吕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政治经济学绪论学习提纲 东北初级组广义政治经济学广播讲座 第六卷第九期

政治力量安能稳定物价 严仁赓 第五卷第六期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吴世昌 第一卷第五期

政治年度总结账 (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六期

政治热忱与科学热忱 卢于道 第六卷第四期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张东荪 第四卷第一期

政治失常 储安平 第五卷第十三期

致半价定户 第四卷第十四期

支持 第三卷第十二期

致读者 编者 第六卷第三期

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 张东荪 第五卷第十一期

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 费孝通 第六卷第二期

知识青年的道路 袁翰青 第四卷第十三期

知识生活的偏向 刘绪贻 第三卷第十九期

知识·生活·宇宙 刘绪贻 第五卷第三期

“只要这不是个选举年” 费孝通 第三卷第二十期

只有两条路 樊弘 第四卷第七期

- 只有一条命 (晋南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二卷第十九期
- 中长路一月见闻 庐芷 第三卷第二期
- 中大竞选旁观记 本刊读者投寄 第二卷第十三期
- 中大竞选武剧前后 郝稼 第三卷第十五期
- 中大回到了南京 第一卷第二期
- 中大暑期二三事 冰若 第四卷第二十三四期
- 中大学生自治运动的新阶段 郝稼 第四卷第十期
- 中大“一二五”纪念会的论战 (南京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 重大招生漏题继又有人被捕 第四卷第二十四期
- “中风”与芸香精 蔡壬侯 第三卷第二十二期
- 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 季羨林 第四卷第十三期
- 中共临末为何拒绝和谈 梁漱溟 第二卷第十五期
- 中共人员的撤退 第二卷第三期
- 中国当前的经济祸患应由既得利益阶级负责 杨西孟 第二卷第十七期
- 中国的对美政策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第三卷第七期
- 中国的危机及其将来 拉铁摩尔 第五卷第十八期
- 中国的政局 储安平 第二卷第二期
- 中国非无化工人才 第二卷第十四期
- 中国非无“华莱士” 第二卷第十二期
- 中国教育一例 第四卷第五期
- 中国经济往何处去 戴世光 第一卷第十期
- 中国经济危机的出路 笄移今 第一卷第九期
- 中国经济问题 赵迺抃讲 第三卷第二十一期
- 中国军人本来前进 第二卷第二十期
- 中国军人在前进中 第二卷第十八期
-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抗议 第四卷第十四期
- 中国历史的悲剧(上) 贺昌群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 中国历史的悲剧(下) 贺昌群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 中国留美学生政治意见测验统计 莫如俭 第四卷第二十期

中国留美学生政治意见测验统计的来源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中国能永远中立化么？ 端木正 第三卷第十六期
中国缺乏“杜鲁门” 第二卷第十五期
中国人民收回了美法荷在北京的兵营 《观察》记者 第六卷第七期
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工作纲领读后感 第四卷第四期
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 王芸生 第一卷第一期
中国未来的西伯利亚——记大西北的工业资源 张白 第六卷第十一期
中国文化特征之研究（上） 梁漱溟 第二卷第五期
中国文化特征之研究（下） 梁漱溟 第二卷第七期
中国文化特征之研究（中） 梁漱溟 第二卷第六期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 吴世昌 第二卷第十八期
中国文字的改革 第三卷第十四期
中国现在是否有组织集体农场的条件？ 第六卷第七期
中国新社会革命党来函 第四卷第十五期
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陈之迈 第三卷第十三期
中国需要重建权威 吴世昌 第一卷第八期
中国语言之结构及其表达思想之方式 高名凯 第一卷第十一期
中国在联合国 何永佶 第五卷第十期
“中国政局论战” 第二卷第九期
中国政治上的四种矛盾 庄智焕 第一卷第十一期
中国之过去与将来（一） 张东荪 第一卷第一期
中国之过去与将来（二） 张东荪 第一卷第二期
中国之过去与将来（三） 张东荪 第一卷第三期
中国之过去与将来（四） 张东荪 第一卷第四期
中国之过去与将来（五） 张东荪 第一卷第五期
中国之过去与将来（完） 张东荪 第一卷第六期
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复亮 第二卷第九期
“中韩调查团” 第三卷第三期
中美英苏之关系与世界和平 胡先骕 第一卷第五期
钟山秋色（南京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四期

- 中苏关系大事编年 第六卷第二期
- 中苏签约·举国欢腾 《观察》记者 第六卷第九期
- 中苏新条约——国际主义的教科书 陈体强 第六卷第九期
- 中苏友好合作万岁 第六卷第九期
- 中学国文教学的研讨 张云横 第六卷第十二期
- 中央大学竞选规则 第三卷第十五期
- 中央电影公司来函 第四卷第十五期
- 中央各部会内部组织的原则与方式 龚祥瑞 第六卷第一期
- 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 储安平 第六卷第二期
-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 夏鼐 第五卷第十四期
- 中原烽火几时休? 《观察》记者 第四卷第十二期
- 中原战局与最近情形 公羽 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 周外长的严正声明 第六卷第三期
- 主张中间路线的也算犯法了 第四卷第八期
- 壮丁的市价 第三卷第二期
- 追悼·示威·探监 (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三卷第十二期
- 追念顾临先生 任鸿隽 第二卷第十四期
- 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 张东荪 第二卷第六期
- 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 严中平 第五卷第七期
- 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 陈志让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 陶大镛 第六卷第八期
- 自发的爱护 张文琦 第六卷第四期
- 自由的心理 张述祖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 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 朱光潜 第三卷第十九期
- 自由乎? 平等乎? 吴恩裕 第三卷第十二期
- “自由·平等·博爱”的再生 楼邦彦 第一卷第二十期
- 自由与发展 第二卷第六期
-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 杨人榘 第二卷第十一期
- 纵谈东北大局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四期
- 总统北巡与北方大局 (北平通信)《观察》特约记者 第五卷第八期

总统的灾难 杨刚 第四卷第四期
总统副总统之选 《观察》特约记者 第四卷第九期
总统问题 第四卷第七期
走过北欧 叶君健 第六卷第十四期
走向人民大学的里程碑——记清华大学的代表会议 《观察》特约记者 第
六卷第四期
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 (南京通信) 本刊特约记者 第一卷第一期
足以引起战争的紧张情况的原因 世界八专家 第五卷第十三期
组织·生活·信仰 第二卷第六期
最后的一批大钞 第四卷第二十一期
最完整的人格 李广田 第五卷第二期
左鞭右打 第三卷第十八期
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样子 田汝康 第三卷第十五期
作者·读者·编者 第一卷第五期

出版说明

《观察》是储安平 1946 年 9 月 1 日创办的一份周刊，不管是创办者储安平，还是杂志本身，甚或它的作者群，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1999 年岳麓书社将周刊全部影印出版，为知识界提供了许多便利，但六卷的影印本出版已久，部头巨大，影印本繁体竖排，且部分文字模糊不清，不利于读者购置和阅读。缘此，我们愿意出版唐骋华先生选编的这本《文选》，为读者提供便利，同时也祈引得玉来。

关于本书的编辑加工，我们有以下说明：

1. 本书的编辑加工以岳麓书社的影印本为底本，为符合现代的阅读习惯，将选文重新排版，由繁体竖排变成简体横排，以便读者阅读。

2. 由于诸多原因，《观察》杂志的原文有漫漶不清之处，我们尽量一一辨识，实在无法辨识清楚的，以“□”代替。

3. 我们的编辑加工以尊重历史、忠实于原文为基本原则，在不影响意思表达、不影响读者阅读的前提下，文字和标点符号一一照录。原文明显有错且可能影响读者阅读的，加以修改，并不出注；原文无误但与现代汉语使用规范存在差异的，尽量保存其原貌，不加以修改，特别是与现代习用译名不同的专名，如史太林等，一一照录；民国文献中通常没有书名号，文字中“那”与“哪”、“分”与“份”也没有清楚的区分，部分篇章中还有前后不统一之处，如“金圆券”和“金元券”，两种写法原文都曾出现过，我们以忠实于原文、便利读者阅读为前提，根据语境判断是否应该添加、修改。当然，这些判断当或不当，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4. 在正文之后，我们增加了“部分作者简介”和“《观察》（全六卷）篇目索引”，以便利读者，并提供工具，方便读者检阅《观察》影印本以对照原文。

5. 《观察》周刊诞生于一个动荡的年代，作者们所写所思，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相信，现代的读者必能透过文字，看到言论背后的真意，体会到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也不枉选编者和编辑的一番辛苦。

6. 人事播迁，信息获取不易，我们无法与本书部分版权所有人取得联系，祈望版权所有人能与本社联系，我们立即呈奉薄酬和样书，不胜感激。

编 者